『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

下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 防 大 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

下　　册

中国人民解放军
国　防　大　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1988年10月·北京

说　　明

根据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精神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问题、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课教学及研究的需要，我们编印了《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949 年 10 月至 1985 年 9 月)共十四册(序号 19—32)。本书为"文化大革命"时期资料(上<25>、中<26>、下<27>三册)。

所收文件资料，有的公开发表，有的内部发表使用过，汇编时，保持了文件的原貌，未作改动，如需引用，请查对原文。本资料只供内部教学和研究参考，不得翻印。

为反映历史发展的逻辑，便于从历史事件的相互联系上研究问题，所有资料都按时间顺序编排。

本书编辑委员会由段浩然、张天荣、何理、肖甡、胡庆云、林蕴晖、李兴仁、丛进、王年一、郭占波、李浚组成，负责整个资料的编审。

本书由王年一选编。

刘星星负责编辑工作。

徐胜华、郑又晨、刘星星具体经办承印。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

一九八八年十月

目　录

一九七三年

新年献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3年元旦社论（ 1）
要学外国的长处（1973年2月26日） …………………………………… 周恩来（ 3）
北京、上海、天津大批先进分子被吸收入党（1973年6月30日） ……………………（ 4）
一定要把“五·七”干校办好（1973年7月11日）…………………… 《人民日报》社论（ 7）
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1973年8月7日） ………………………………………………… 《人民日报》社论（ 9）
《人民日报》转载《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编者按语（1973年8月10日） …………（ 11）
〔附〕《辽宁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编者按语
（1973年7月19日） …………………………………………………………（ 11）
张铁生信原件（1973年6月30日） ……………………………………………（ 12）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
个假典型的调查 …………………………………………………………（ 13）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深入发展（1973年8月20日） ……………………………………（ 15）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的决议
（1973年8月20日） ……………………………………………………………………（ 17）
〔附〕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 ……………………………（ 20）
要记取“左”倾危害的教训 ……………………………………………… 李雪峰（ 20）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 …………… 周恩来（ 21）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1973年8月24日） …………………………………… 王洪文（ 28）
中国共产党章程（1973年8月28日） ………………………………………………………（ 31）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1973年8月29日） ……………………（ 34）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1973年8月30日） ………（ 36）
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37）
“焚书坑儒”辩（1973年9月28日） ……………………………………………… 施　丁（ 41）
论尊儒反法（1973年10月1日） ………………………………………………… 石　仑（ 44）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1973年11月1日） …………………………… 劲云戈（52）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1973年12月28日） …………………………… （56）
〔附〕揭穿一个政治骗局——《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 ……………… （59）

一九七四年

元旦献词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4年元旦社论（63）
〔附〕清华大学党委作出关于"反右倾回潮运动"问题的决议 …………………… （65）
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1974年1月17日） …………………………… （66）
〔附〕这样介绍"体会"对吗？——对《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的意见（1974年2月15日） …………………………… （67）
"四人帮"勒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事件真相 …………………………… （69）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通知（1974年1月18日） …………………………… （72）
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1974年1月25日） …………………………… （90）
〔附〕玩火者必自焚——"四人帮"篡军乱军的反革命"放火烧荒"事件始末 …………………………… （109）
林彪与孔孟之道（1974年2月1日）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114）
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1974年2月1日） ………………… 《红旗》杂志短评（119）
继续革命　反对复辟（1974年2月10日） ………………… 《文汇报》评论员（121）
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1974年2月20日） …………………… （123）
批"克己复礼"（1974年2月20日） ………………… 《人民日报》社论（124）
评晋剧《三上桃峰》（1974年2月28日） ………………… 初　澜（125）
再批"克己复礼"（1974年3月15日） ………………… 《人民日报》社论（130）
孔丘其人（1974年4月1日）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131）
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1974年4月10日） ………………… （135）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 ………………… 邓小平（135）
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1974年5月18日） ………………… （140）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1974年6月19日） ………………… （141）
〔附〕"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是怎样搞篡党夺权阴谋的 ………………… （148）
"四人帮"尊法丑剧的幕前幕后 ………………… （151）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1974年8月4日） ……… 初　澜（162）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的通知（1974年8月5日） ………………… （165）
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74年9月29日） ………………… （165）
〔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1974年9月13日） ………………… （166）
元帅之死 ………………… 胡思升（168）
贺龙被害内幕 ………………… 杨金路　江海洋（171）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1974年10月11日) …… (190)
〔附〕长沙诬告前后 …… 纪希晨等(191)
一出反革命闹剧——"四人帮"炮制"风庆轮问题"
的真相 …… 交通部大批判组(194)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通知
(1974年12月19日) …… (197)

一九七五年

新年献词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5年元旦社论(198)
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1975年1月5日) …… (200)
政府工作报告(1975年1月13日) …… 周恩来(200)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1975年1月13日) …… 张春桥(204)
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1975年1月17日) …… (207)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1975年1月17日) …… (2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
(1975年1月17日) …… (208)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1975年1月17日) …… (2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1975年1月17日) …… (2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75年1月17日) …… (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1975年1月17日) …… (2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1975年1月19日) …… (216)
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命姬鹏飞
为四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1975年1月20日) …… (217)
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
(1975年2月5日) …… (218)
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1975年2月9日) …… 《人民日报》社论(218)
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1975年2月10日) …… (220)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1975年2月18日) …… (22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1975年2月22日) …… (221)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讲学习的部分)(1975年3月1日) …… (231)
〔附〕"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 …… (235)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1975年3月1日) …… 姚文元(238)
〔附〕"四人帮"同林彪一样都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 …… (24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1975年3月5日) …… (248)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1975年4月1日) …… 张春桥(249)

〔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255)
迟群传达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的电话"指示"……(262)
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1975年4月23日）……(263)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请示报告上的批语（1975年5月17日）……(263)
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指示（1975年6月4日）……(264)
〔附〕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1975年5月22日）……(265)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1975年7月14日）……(268)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节录）（1975年7月15日）……(272)
〔附〕丹心向党　功炳千秋……(274)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1975年7月17日）……(278)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来信的批语（1975年7月25日）……(280)
全国铁路一九七五年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1975年7月29日）……(280)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1975年8月14日）……(282)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短评(283)
评《水浒》(1975年8月31日)……竺方明(284)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记录稿（1975年9月12日）……(289)
〔附〕"评《水浒》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296)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隆重开幕（1975年9月15日）……(301)
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节录）（1975年9月16日）……(304)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1975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304)
普及大寨县（1975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306)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1975年11月1日）……池　恒(307)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1975年11月26日）……(309)
〔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310)
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清华大学党委公开纠正这一错案……(310)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975年12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311)
〔附〕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部大批判组(317)
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1975年12月9日）……梁　效(321)
路线正确　破浪前进——喜看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1975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记者述评(324)

一九七六年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1976年元旦社论(328)
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1976年1月1日）……………………………………尹　铭(330)
张铁生的新"答卷"——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1976年1月6日）………(332)
北大校园风雷动（1976年1月7日）……………………………………………………(334)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周恩来同志逝世（1976年1月8日）…………(335)
〔附〕在最后的日子里……………………………………………………………高文谦(336)
批判极左思潮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读《周恩来选集》下卷…………文　谦(341)
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1976年1月8日）…………………………………………(344)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隆重追悼周恩来同志（1976年1月9日）………………………(344)
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1976年1月9日）…………………………………………(345)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代表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1976年1月11日）…………………………………………………………………(345)
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1976年1月14日）………………(346)
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节录）（1976年1月14日）………………………………………(349)
〔附〕磨不灭的光辉　砍不断的怀念——新华社记者对姚文元破坏悼
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的控拆……………………………………………(350)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节录）
（1976年1月15日）…………………………………………………………………(354)
邓小平副主席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1976年1月15日）………………(358)
中共中央通知（1976年2月2日）………………………………………………………(361)
〔附〕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张春桥(36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
浪前进（节录）（1976年2月6日）…………………………………………………(361)
孔丘之忧（节录）（1976年2月13日）…………………………………………高　路(363)
要继续批孔（1976年2月13日）…………………………………………………李　成(364)
再论孔丘其人（1976年2月24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365)
评"三项指示为纲"（节录）（1976年2月29日）……………………梁　效、任　明(369)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节录）（1976年3月1日）…………………………池　恒(371)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1976年3月2日）……………………………………………………………………(374)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
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1976年3月3日）…………………………………………(385)
《文汇报》删去了新华社关于向雷锋学习报道中的周恩来的题词
（1976年3月5日）……………………………………………………………………(386)
〔附〕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就要同他斗（节录）（1976年3月25日）………………(387)
光明与黑暗的一场大搏斗——追记万众声讨"四人帮"
制造的《文汇报》"三·五"、"三·二五"反革命事件…………………………(388)
"克已复礼"再批判（1976年3月6日）…………………………………………梁　效(392)
翻案不得人心（1976年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396)
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1976年3月24日) …… (398)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节录)
(1976年4月1日) …… 程 越(398)
批判洋奴哲学(节录)(1976年4月1日) …… 方 海(402)
〔附〕"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洋奴 …… (404)
江青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一出丑剧 …… 邵 兵(405)
满纸洋奴腔 一部伪造史——评江青在广州对外国"作家"的
一次谈话 …… 广州部队大批判组(408)
《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节录)(1976年4月) …… 康 立、延 风(412)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1976年4月1日) …… (417)
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1976年4月5日) …… (417)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1976年4月7日) …… (418)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1976年4月7日) …… (418)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1976年4月8日) …… 《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人民日报》记者(418)
〔附〕天安门事件真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
再颠倒过来 …… 《人民日报》记者(420)
揭露"四人帮"及其心腹炮制天安门事件报道的阴谋 …… 《新闻战线》记者(434)
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 …… (440)
四五运动日志 …… (441)
伟大的胜利(1976年4月10日) …… 《人民日报》社论(449)
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1976年4月18日) …… 《人民日报》社论(450)
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1976年4月28日) …… 梁 效(452)
社会主义大集好——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节录)
(1976年5月9日) …… (454)
〔附〕"哈尔套经验"出笼的前前后后(节录) …… (456)
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节录)
(1976年5月16日)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458)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 (460)
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
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节录)(1976年5月31日) …… 吕 达(463)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节录)(1976年6月4日) …… 斌 音(465)
〔附〕军事战线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 《解放军报》编辑部(469)
十年来围绕军权问题同林彪、"四人帮"的激烈斗争 …… 军事科学院批判组(472)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朱德同志逝世(1976年7月6日) …… (476)
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1976年7月6日) …… (477)
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1976年7月6日) …… (477)
首都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1976年7月11日) …… (478)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1976年7月11日） ……………… (481)
〔附〕最后的十年——康克清谈朱德同志 ……………… (482)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1976年7月28日） ……………… (485)
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1976年7月28日） ……………… (486)
《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前言
(1976年7月)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486)
〔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1975年9月2日） ……………… (487)
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评"四人帮"
对《二十条》的"批判" ……………… 国家计委大批判组(498)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前言
(1976年7月)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507)
〔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1975年10月7日） ……………… (507)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批判"四人帮"
对《论总纲》的"批判" ……………… 向　群(518)
《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前言
(1976年7月) ………………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527)
〔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　讨论第一稿）（节录）
(1975年8月11日) ……………… (528)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推翻"四人帮"
对《汇报提纲》的诬陷 ………………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531)
以华总理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达地震灾区转达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
关怀和慰问（1976年8月4日） ……………… (537)
〔附〕"四人帮"破坏抗震救灾十恶不赦（节录） ……………… (53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1976年9月9日） ……………… (53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公告（1976年9月9日） ……………… (541)
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1976年9月9日） ……………… (542)
张铁生、刘继业的反动言论（1976年9月9日—14日） ……………… (544)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1976年9月16日) ………………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548)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
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节录）（1976年9月18日） ……………… (550)
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
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1976年9月18日） ……………… (554)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1976年10月1日） ……………… (557)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1976年10月3日） ……………… (557)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1976年10月4日） ……………… 梁　效(558)

〔附〕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操纵舆论工具，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
一些情况 …… (561)
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 (566)
“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揭批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大批判组”的罪行 …… (572)
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的急先锋——揭露“两校大批判
组”的反革命面目 …… (576)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清算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反革
命罪行 …… 申涛声(578)
自掘坟墓 自造墓砖——揭批“四人帮”通过帮刊《学习与批判》
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 (584)
中共中央通知（1976年10月7日） …… (586)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
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1976年10月7日） …… (587)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建立伟大的
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1976年10月8日） …… (587)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1976年10月8日） …… (587)
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1976年10月10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588)
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1976年10月18日） …… (589)
向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猛烈开火（1976年10月20日） …… (593)
上海人民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反党篡权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1976年10月20日） …… (594)
北京、上海广大军民连日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1976年10月21、22日） …… (595)
全国各省、自治区军民连日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1976年10月23日） …… (602)
首都百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1976年10月24日） …… (605)
吴德在首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1976年10月24日） …… (609)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76年10月25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611)
上海军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1976年10月29日） …… (613)
〔附〕“四人帮”在上海大量选拔培植亲信阴谋篡夺中央和国务院
各部委的领导权 …… (615)
民心不可欺——“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始末 …… (617)
从“文攻武卫”到“第二武装”的彻底破产 …… (624)
十年经营顷刻瓦解——揭露“四人帮”在上海搞“第二武装”
的前前后后 …… (629)

附　录

十年中我国与各国建交情况 ……………………………………………… (637)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 ……………………………………………… (639)
"十年动乱"中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 ……………………………………… (654)
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 ………………………………… 李成瑞(663)
国民经济发展情况部分统计数字（1966—1976年） ……………………… (672)

正气歌 ……………………………………………………………… 张书绅(680)
划破夜幕的陨星——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 (696)
九死一生献国策 …………………………………………………… 叶永烈(701)

新 年 献 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三年元旦社论

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满怀革命豪情，跨进了一九七三年。

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我们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贡献的广大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致以革命的敬礼！向全国各族人民表示亲切的问候！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和各国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人民在政治思想战线、经济战线和外交战线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

批修整风运动在全国更加深入扎实地开展，保卫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广大干部和群众攻读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开展对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的成果。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作风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了新的提高。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更加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推动下，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了新的成就。亿万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依靠集体力量，在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下，以顽强的斗志战胜了严重自然灾害，夺得了好收成。工业生产继续上升，质量提高，品种增加、钢、煤、原油、化肥、电力、交通运输等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财政贸易情况良好、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有了改善。教育革命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医药卫生取得了新的成就。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体育活动广泛开展。无产阶级的新生事物在各条战线蓬勃兴起，茁壮成长。

我国政府和人民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在外交战线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我国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革命友谊继续增进，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支援，互相帮助，促进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国内外形势的发展，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那些千方百计破坏这场大革命的牛鬼蛇神，那些做梦也想着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英雄好汉们，已经遭到了历史的无情嘲笑。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胜利了，不要忘乎所以。过去军队打仗，打了胜仗就要总结经验，提出新的任务，继续前进。毛主席还指示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搞好批修整风，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沿着党的"九大"路线继续前进。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继续抓紧抓好。批修整风，首先是批

修，其次才是整风。各级党委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始终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刘少奇一类骗子，牢牢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搞修正主义，不搞马克思主义；搞分裂，不搞团结；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他们叛党叛国，成了叛徒卖国贼。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共反革命。这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实质，进行深入的批判。全党同志，要坚持不懈地认真看书学习。特别是高中级干部，要下苦功夫学好中央规定的几本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只有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才能识破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伪装，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那些修正主义谬论批深批透，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在批修整风中，要认真汲取两条路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纠正不正之风。要警惕和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批修整风搞好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两条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必将进一步加强，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会继续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我们要充分看到广大群众在批修整风中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制订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要充分发动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必须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多数，首先是工农基本群众的多数，这是我们的基本出发点。只要我们真正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就一定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较快地前进。为了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要全面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把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服务。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要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处理好农、轻、重的关系，搞好农业，加强农业。农业战线要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做到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战线要抓紧基础工业，加快原料、材料、燃料、电力工业的步伐，促进钢铁和整个工业的发展。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依靠工人群众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要坚定地把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继续进行下去，使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更加繁荣，更好地为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人民解放军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努力提高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各条战线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关于“**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在执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牢牢记住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科学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才不至于迷失方向，才能做好工作。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各条战线夺取新胜利的重要保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一个地区，由当地最高一级的地方党委，对党政军民各个方面实行一元化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传统。各级党委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党委内部，要搞“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基层党组织要健全党内的民主生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工会、共青团、红卫兵、红小兵、贫下中农组织、妇女组织，应当经过整顿逐步健全起来。各级领导机构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注意培养新干部，特别是要注意从工人中、从妇女中、从少数民族中培养干部，并努力帮助在职干部更快地提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不管老干部、新干部，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都要虚心向群众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当前国际形势一片大好。整个世界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中改变着面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中、小国家更广泛地联合起来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苏修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出它的社会帝国主义面目。不论苏修、美帝玩弄多少阴谋诡计，都不能阻止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进一步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的和平共处，为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

最近，美帝国主义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大规模的轰炸袭击。对美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中国人民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谴责。如果美国政府不立即停止轰炸，不签署"关于结束战争、恢复越南和平的协定"，坚持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全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援老挝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我们深信，胜利一定属于英雄的印度支那三国人民。

在欢度新年的时候，我们对台湾省的骨肉同胞表示深切的关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对港澳同胞表示怀念。我们对海外侨胞致以问候，祝愿他们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更多的贡献。

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要学外国的长处[①]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周恩来

最近我们出去了两个代表团。一个医学代表团在国外看了回来，不敢做报告，他们要做报告，有一个军代表说，不要把我们说得一团漆黑。这么老大，随便给人家戴帽子，结果他们不敢讲了。这种风气不好。出去花了不少钱，回来连报告也不敢做。科学家代表团出国回来后，连一个报告都没有写出来，不敢谈人家的长处，也不敢谈我们的短处，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自己不懂，又随便给人家戴帽子。出国参观、考察，就是为了学习人家的长处。

① 这是在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一九七三年计划和《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的草稿时的谈话节录。

北京、上海、天津
大批先进分子被吸收入党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北　京　市

北京市各条战线党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发展的六万多名新党员，同老党员团结一致，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意气风发地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北京市的这批新党员，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其中百分之七十六是工人、贫下中农。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三十五岁以下的青年（包括一部分插队和回乡知识青年），女同志占百分之二十七。北京市各级党组织在接收新党员入党以后，普遍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把新党员放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让他们经风雨，见世面，不断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广大新党员在批修整风运动中，遵照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条基本原则，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批修整风运动，成为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骨干力量。北京新华印刷厂的一百六十四名新党员，把看书学习同批修整风紧密结合起来，普遍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和理论水平，推动了批修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北京第一机床厂齿轮车间团总支书记曹双琴是一名新党员，她和车间其他团干部一道，组织团员和青年进行社会调查，用大量的事实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诬蔑大好形势的罪行，使大家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密云县高岭公社高岭大队新党员，同老党员一道，联系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的罪行，带领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抵制资本主义倾向，深入开展学大寨运动，促使集体经济日益巩固，生产迅速发展。

战斗在北京市各条战线上的广大新党员胸怀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积极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各项任务，努力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务，不少人做出了突出事迹。北京铁路分局东郊站工人、青年党员周明，一九七一年到坦桑尼亚参加坦赞铁路建设。在一次即将发生撞车事故的紧急关头，他冒着生命危险，奋不顾身地跳到快速下滑的货车上，拧紧手闸，保护了车辆，不幸被轧断了右腿。在病床上，周明以顽强的革命毅力，与剧烈的伤痛作斗争，经受了考验。为了早日返回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装上假腿以后，他扛着铁棍练习走路。现在，他已能从事一些轻微的体力劳动。他的这种革命精神和国际主义精神，受到青年们的赞扬，已被选为共青团北京市第六届委员会的委员。崇文区南昌路粮店负责人胡尚文，带领粮店职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受到街道居民的称赞。有二百多户铁路职工离粮店比较远，买粮不方便。一九六三年以来，胡尚文和粮店的六名职工坚持每月两次为居民送粮到户、风雨无

阻，从未间断。一九六九年，胡尚文入党以后，带领粮店职工不断提高服务质量，经常到居民家里征求意见，使服务工作越做越好。昌平县长陵公社东水峪大队赤脚医生、新党员文希云，身背药箱，爬山越岭，积极为群众防病治病。她还和贫下中农一起，办起了“土药房”，自己采集和种植中草药，炼制了二百三十多种丸、散、膏、丹。文希云在为群众防病治病的过程中，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发动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大队几年来没有流行过传染病，为提高社员的健康水平做出了贡献。

在各条战线上担任领导工作的新党员，带头贯彻执行党的“九大”团结、胜利的路线，虚心向老党员、老干部学习，自觉维护党的一元化领导，搞好领导班子的革命团结。他们保持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在通县马头公社长凌营大队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朱宗义，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一九六九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去年又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他当了干部以后，更加坚定地和贫下中农结合在一起，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除了外出学习、开会，他一有时间就下地劳动，去年共劳动了二百一十天。在工作中，朱宗义注意学习老干部的好作风、好经验。和党支部委员们一道，带领贫下中农狠抓阶级斗争，开展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大队革命和生产搞得生气勃勃，粮食和棉花产量都比过去有了大幅度提高。北京锻压机床厂的新党员中，有三分之二担任了车间、科室的领导工作和班组长。他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蓬勃开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修整风运动，使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几年来，北京市文化、卫生、科学、教育等各条战线的党组织吸收了两千八百多名新党员。这些新党员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刻苦改造世界观。他们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工作中，也都做出了新的成绩。

上　海　市

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党路线指引下，上海市工交战线党组织从党的“九大”以来，已经吸收了三万三千六百多名新党员。这些新党员朝气蓬勃，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发挥了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

上海市工交系统“九大”以来吸收的新党员，都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和批修整风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具有十年以上的工龄，也有一大批年纪不满二十五岁的优秀青年工人。妇女党员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三。从工交系统的局、公司到许多基层工厂，都有一些新党员担任了党委和行政的领导工作，他们和老党员、老干部紧密团结在一起，带领广大群众为发展革命、生产大好形势而努力工作。

上海工交系统各级党组织十分重视对新党员的教育培养工作。许多工业局、公司和工厂都坚持定期上党课的制度，对新党员进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历史、党的基础知识的教育。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每发展一批新党员，厂党委都要举办学习班，组织新党员在学习班里认真看书学习，批判修正主义，总结交流改造世界观方面的体会，把入党作为继续革命的新起点。

上海工交系统这些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锻炼成长的新党员，自觉地把批修整风这个头等大事放在首位。他们紧紧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深入

开展革命大批判，表现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上海杨树浦发电厂有一个二十六岁的新党员、团干部，为了驳斥刘少奇一类骗子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和污蔑，组织团员、青年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自己家庭在旧社会的苦难史和解放以后的翻身史，以及本厂过去受外国资本家剥削的历史和解放以后的发展史。他们运用这些社会调查材料进行对照批判，揭穿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是地富反坏右利益总代表的真面目，激励了自己的革命斗志。这个新党员在批修整风中成长很快，现在已被推选担任厂党委副书记。

广大新党员深切感到**“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在批修整风中认真看书学习。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既是批修的闯将，又是学习的模范。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达丰铸造厂和化工机械厂的一些新党员，在党组织的培养教育下，从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坚持读马列原著，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反对不求甚解；坚持用革命理论解决实际斗争中的问题，反对理论脱离实际。通过认真看书学习，他们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普遍有了提高。

党的“九大”以来，上海工交战线革命不断深入，生产连年增长，到处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许多新党员在大好形势面前，牢记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重视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不断在斗争中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上钢五厂第二电炉车间炉前工段有一个新党员是青年炉长，他担任了炉前工段党支部委员和团支部书记以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更加自觉地带领青年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持续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使青年工人在政治上迅速成长。这个工段现在已有二十八名青年工人担任了电炉的正副炉长，其中十七名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进厂的新工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工交系统不少新党员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上海录音器材厂有一个新党员是青年技术员，他坚定地与工人相结合，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在填补我国电子工业的某些空白方面作出了成绩。

上海工交系统一批担任了领导工作的新党员，坚持不脱离劳动，不脱离群众，虚心向老干部学习，向工人群众学习，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上海港务局第五装卸区担任党委委员兼第八装卸队副队长的一个新党员，原来是个知识青年。当了干部以后，她继承和发扬党的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虚心向老干部、老工人学习，注意团结群众，经常抢着干重活、累活，还利用假日和休息时间访问工人家庭，受到了群众的称赞。

天　津　市

天津市工业战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一万六千多名新党员，在各级党组织的关怀教育下，积极参加批修整风，认真看书学习，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天津市工业战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的新党员，大部分是生产第一线的优秀工人，有的是做了几十年工的老工人，也有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工人，其中有一大批是女工。天津市工业战线各级党组织把培养和教育新党员的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通过各种形式组织新党员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不断提高他们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广大新党员入党以后，自觉地以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要求自己。他们把看书学习和

批修整风结合起来，带头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天津市第一机械工业局所属二百五十多个工厂企业的两千三百多名新党员，几年来读了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有些党员还选读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马列著作。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许多新党员在批修整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天津四新纱厂青年女工郑桂明，入党以后刻苦看书学习，努力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联系思想实际写读书笔记，写了二十多篇大批判文章，还和班组的老工人一起写批判稿，带动群众对刘少奇一类骗子开展革命大批判，在车间和班组的学习和批修整风中起了带头作用。

广大新党员在党的"九大"团结、胜利路线指引下，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团结群众，扎扎实实地做好当前的工作，不断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天津第一炼钢厂的许多新党员，为了多炼钢，炼好钢，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朝气蓬勃地投入工业学大庆的运动，和群众一起团结奋战。一号平炉司炉张再吉从一九七O年入党以来，一直是废寝忘食地工作，那里有困难就到那里去。为了缩短每炉钢的熔炼时间，炼出优质钢，他仔细地观察钢水的变化，摸索和掌握炼钢的规律，不断创造冶炼新纪录。几年来，他所在的班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天津冶金实验厂开坯车间班长、新党员刘瑞强，勇于抢困难，挑重担，团结和依靠群众，使钢坯的班产量由八十多吨提高到一百四十多吨，他所领导的班成为全厂的先进班组。

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天津市工业战线还有一批新党员被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担任了领导职务。他们当了干部以后，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老干部学习，较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天津市纺织工业系统的新党员中，有六百多人担任了工厂、车间和班组的领导职务，他们同老干部一起，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着骨干作用。天津发电设备厂青年女工刘连珍被推选为厂党委委员以后，仍然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不脱离劳动，抢着干重活和脏活。工余时间，她和大家一起开展革命大批判，并且走家串户进行家庭访问，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群众反映很好。

(新华社 1973 年 6 月 30 日讯，载 7 月 1 日《人民日报》)

一定要把"五·七"干校办好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五·七"干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革命新生事物。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这一革命的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日益完善，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型干部学校。

中央机关最近召开"五·七"干校工作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办好干校的问题。各地党委也应当关心"五·七"干校，加强对"五·七"干校的领导。

伟大领袖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马列主义的党要注意抓上层建筑，注意抓路线。对干部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搞好干部思想革命化和机关革命化，是贯彻执行毛主席这个教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干部教育工作做好了，才能保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才能使上层建筑的这一个方面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这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各级党委务必十分重视。

如何培养教育干部，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刘少奇一类骗子在干部教育方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曾经毒害了一部分干部，使他们在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这一教训，应当永远记取。要做好干部教育工作，必须清除刘少奇一类骗子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

“五·七”干校是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教育路线培养教育干部的一种好形式。在“五·七”干校里，既能结合现实斗争认真看书学习，又能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还可以插队锻炼，做社会调查，从事群众工作，向工农兵学习。这样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比较全面地落实了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比较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了我们党在干部教育方面的革命传统。四年多的实践表明，通过“五·七”干校教育干部，可以使干部受到生动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受到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等革命传统教育，有利于把广大干部培养成有路线斗争觉悟的，能上能下，能“官”能民，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

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为了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好干部教育工作，我们一定要把“五·七”干校长期办下去，切实把它办好。

在当前的批修整风运动中，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应当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和“**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等有关指示，结合狠批刘少奇一类骗子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批判他们在干部教育方面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深入批判他们反对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干部，反对干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反对干部与工农相结合的种种谬论，以及他们攻击和破坏“五·七”干校的罪行。通过革命大批判，准确地划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界限，更加坚决地办好“五·七”干校，更加坚定地走“五·七”道路。

“五·七”干校要坚持正确的办校方向，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干校工作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紧密为现实斗争服务。要把“**学政治**”、“**批判资产阶级**”放在首位，组织学员围绕批修整风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还可以学习一点历史。要坚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实行开门办校和勤俭办校，把参加生产劳动和插队锻炼作为重要课程。遵照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教导，干校各项活动都要着眼于改造世界观、提高学员的路线斗争觉悟。干校工作人员都要热爱党的干部教育事业，带头搞好思想革命化，自觉地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干校。

各级党委要把办好“五·七”干校，作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应当把“五·七”干校的工作经常列入党委议事日程，首先从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加强领导。要组织好干部轮训工作，做好规划，形成制度，由领导干部带头，轮流进“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应当为干校配备坚强的领导班子。对于干校的工作人员，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完成教学任务创造必要的条件。要教育各行各业的干部和革命群众，支持和爱护“五·七”干校，做“五·七”干校的促进派。还要

为长期办好干校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切实解决有关干校体制、配备理论干部，以及物资供应和图书供应等问题。这样做，“五·七”干校就会越办越好，就能在培养无产阶级干部队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七日）

《人民日报》社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件大事。在毛主席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下，几年来，几百万青年学生满怀革命豪情，奔向祖国的农村、边疆，到人民公社、生产建设部队和国营农场，实行与工农相结合。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涌现出大批先进集体和邢燕子、侯隽式的先进人物。有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有些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有些担任了基层各项工作，不少人并有所发明创造，成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支积极活跃的力量。事实充分证明：**“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股滚滚的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了几千年来剥削阶级轻视农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和旧习惯，起了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巨大作用，密切了城乡关系，加强了工农联盟，对我国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领域，已经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在我国，每年有这么多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生动地体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情况如何，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关系极大。农业要上去，农村要改变面貌，需要大批知识青年把学到的政治、文化、科学知识，同农村阶级斗争的实际和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实践结合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许多贫下中农说得好：“农村需要知识青年”。下乡知识青年从小生长在城镇，很少和农村社会接触，长大了让他们到农村锻炼成长，这是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农村也是大学。在那里，青年们有学不完的知识，干不完的事业。知识青年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逐渐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经受锻炼，就能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许多知识青年也说得好：“我们更需要农村。”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所说的两个“需要”，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需要，是加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实行毛主席所说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既然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不存在两种思想、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各级领导必须用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识和对待这场革命。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必然衷心拥护这场革命，把抓好上山下乡的工作，当作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的一件大事来抓。我们广大干部正是这样做的，许多同志还积极送子女务农，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值得提醒的是，有那么一些同志，

对这场革命还不理解，也不得力。希望他们快些改过来。抓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要以身作则，坚决抵制不正之风。对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要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青年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他们的主流是好的。要坚决保护和支持知识青年的革命精神，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要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积极地培养他们，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特点。

搞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要以批修整风为纲，深入批判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读书做官”、“下乡镀金”和“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揭露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那些迫害、摧残知识青年的阶级敌人和犯罪分子，一定要狠狠打击，依法惩办，切实保护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

各级干部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统筹解决下乡知识青年在前进中遇到的问题，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以帮助青年们长期扎根农村。要组织知识青年认真读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学习文化科学技术知识，努力锻炼培养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下乡知识青年也要关心上层建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关心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会辨别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同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和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思想和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对知识青年中符合党员、团员条件的，要积极而慎重地发展。注意从知识青年中培养干部。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重在政治表现。要教育青年们艰苦奋斗，积极参加劳动，大力发展生产。要做到下乡知识青年和当地社员同工同酬。要对青年们在生产上耐心指导，关心他们的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在农活安排上，要照顾女青年的生理特点。这些方面做好了，就能更好地鼓舞青年们走工与农相结合的道路。

总结几年来的经验，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严格检查，总结经验，作出规划，孜孜不倦地做好工作。共青团和妇联，要把团结教育广大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动员城市和接收地区要紧密配合，派一些思想作风好的得力干部去带领知识青年。革命家长要协助农村的同志，对子女进行思想教育。各地农村的同志要进一步做好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管理教育工作。文化出版系统，应当多为知识青年出一些读物。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都要大力配合，为培养革命接班人贡献力量。知识青年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让我们满怀对党的事业的政治责任感，对无产阶级下一代的高度负责精神，热情关怀他们的成长，进一步做好上山下乡的工作。

广大下乡和回乡的青年同志们，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关怀你们，对你们寄予了殷切的期望。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我们国家的面貌，特别是农村的面貌，将要发生极大的变化。青年们一定要树雄心，立壮志，在农村扎根成长，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大力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实现农业现代化，为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历史使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民日报》转载《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编者按语

（一九七三年八月十日）

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

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发表已经五年了。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正在继续深入。我们要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

〔附〕　《辽宁日报》发表《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编者按语

这里刊载的是张铁生同志在今年大学招生考核试卷背面写的一封信。

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把有实践经验的优秀工人、农民、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选送大学，这是我国教育制度上的重大改革，它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必然会遇到各种旧的思想、旧的习惯势力的阻力。大学招生，在群众评议、群众推荐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文化考核是需要的。但是，文化考核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检查记住多少中学课程？录取的主要标准，是根据他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还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是鼓励知识青年积极接受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再教育，努力钻研和完成本职工作，还是鼓励他们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而闭门读书？今天，我们发表张铁生同志的信，目的就在于请大家讨论、研究这些问题，欢迎关心教育革命的同志发表自己的看法。

（原载 1973 年 7 月 19 日《辽宁日报》）

〔附〕　张铁生信原件①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的进行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1968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质工作。每天近18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27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所以愿意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烦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他们的自由生活和为个人的努力，等于了我的为人民热忱忘我的劳苦工作和诚恳的心。人们把我送到这里来，谈些什么呢？总觉得实在委曲。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专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的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截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的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抱着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很浅，有2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的并非可耻，可以勉强的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

① 此信曾在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和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发表时经过删改，划有黑线的字句是发表时被整句删除的。

〔附〕 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的调查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九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精心炮制的所谓《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下简称《答卷》)连同“编者按”，在《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接着，《人民日报》等许多报纸，都以显著位置转载。一时，《答卷》成了所谓反潮流的“代表作，《答卷》作者也被吹捧为所谓反潮流的“英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大肆宣扬：《答卷》作者“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更是得意忘形，到处狂叫：《答卷》作者“是块有棱有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随着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份所谓《答卷》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了。它完全是“四人帮”蓄意炮制的一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要拣“石头”打人，是蓄谋已久的。

一九七三年四月，国务院下达了大学招生文件，强调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的指示，改革旧的招生制度。明确指出：要坚持选拔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入学，坚持群众评议和群众推荐，在政治条件合格的基础上，重视文化程度，进行文化考查，了解推荐对象掌握基础知识的情况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也要防止“分数挂帅”。这些规定，给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高等院校招生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成果，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新的招生办法，既同“以分取人”那种旧的招生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又同否定学文化这种形而上学的教育思想划清了界限。文件发下不久，“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窜到北京，同“四人帮”在某大学的亲信进行了密谋。他们诬蔑文化考查是大学招生的“弊病”，是“智育第一”，“文化至上”，要“辽宁拿出点材料来”。“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回去以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胡说什么：“文化考查可以搞，但是，我保留批判权。”他们一方面同意搞文化考查，一方面却要“保留批判权”，这不是赤裸裸地暴露出他们存心要整人吗！

当时，兴城县是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的一个试点。本来，在兴城考区，考生可以翻书，考题不是偏题怪题，考试方法也不是突然袭击。可是，“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却瞎说是什么“闭卷”，“搞得很紧张”，“从考题本身来看有些问题、考试方法也有问题”。他还别有用心地说，这“不是辽宁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大家知道，这次大学招生，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如何搞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一次试验，路线是正确的，即使有些地方由于缺乏经验，在实践中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也是不难纠正的。“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抓住文化考查大做文章，以百倍的疯狂咒骂：“在今天，我们刚刚着手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居然有人千方百计逼迫工农兵去适应旧的教育制度，这实在是大有资产阶级反攻倒算之嫌。”“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更是居心险恶地叫嚣：“这样搞是复辟，把我们寄予希望的人都给卡了。”他们此唱彼和，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把攻击的罪恶矛头，直接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国务院其他负责同志，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心怀卑鄙目的的人，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得出来。"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为了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弄虚作假，真是费尽心机。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在辽宁省大学招生文化考查座谈会上，锦州市招生办公室负责人、汇报兴城县考试情况，谈到一个生产队长答不上卷给领导写信一事。"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听了以后如获至宝，下令当晚打电话，把考卷和信火急送来。信一到手，他立即决定要《辽宁日报》加"编者按"发表。当时，有不少群众反映，《答卷》作者在信中打击别人、吹嘘自己，暴露出他自己倒是个"大学迷"。"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心切，竟说什么："不要孤立地看一句话两句话，要看主流嘛，要看这封信发表后起的作用。"七月十八日，他在退给《辽宁日报》的送审小样上，竭力为所谓的《答卷》乔装打扮，把最能反映《答卷》作者写信意图的最后一段话，即"我所理想和要求的，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人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统统删掉了，并亲自改写了"编者按"，为《答卷》涂上一层"反潮流"的油彩，指定第二天（即七月十九日）立即见报。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他精心改写的"编者按"中，胡说什么《答卷》作者在这次考试中"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却是"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是墨写的谎言。事实是，六月二十八日下午，这个自称为"自我表现胜似黄牛"的《答卷》作者参加语文考试，谈《学习〈为人民服务〉的体会》，竟是不知所云，只得三十八分；二十九日上午，他参加数学考试，只得六十一分；下午，又参加理化考试，只答了化学部分的六道小题，得六分。结论很明白：《答卷》作者参加了所有的考试，每门考卷都答了题，他交的根本不是什么"白卷"。

《答卷》作者写信的目的，完全是乞求上大学，向上爬。考试前，他借书复习功课；考试时，他按期赴考。第二天下午考试，他睡过了时间，竟从窗子跳进考场应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在公社文化考查时，《答卷》作者就给领导写过乞求上大学的信。这次在县里考试，他答理化题时，"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苦闷的地方就在这里，几个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深感自己上大学的"自幼的理想"即将变成泡影。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故伎重演，把卷子翻过来，掏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本子，从上面抄下早已准备好的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答卷》作者在信中表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等都清白如洗"。现在一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答卷》作者的生父，解放前是兴城县一家粮业油坊的股东、经理，公私合营后每月还收房租，拿定息，政治历史也很不清白。"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在所谓的《答卷》发表之前，也曾装模作样地派人到兴城县，作关于《答卷》作者"情况的调查"，但是不顾事实，美化《答卷》作者"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均未发现政治历史问题"。考试结束后，《答卷》作者还跑到县公安局找熟人挖门子，又到他原来的老师、县教育局长那里。请求"在录取考生时考虑考虑"他的要求。《答卷》作者上大学临行时，还对他的生父说："这回我可熬出来了！"大量事实证明，《答卷》作者根本不是什么反潮流的"英雄"，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学迷"。

"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炮制《答卷》作者这个假典型，把他捧起来，吹起来，"诱以：官、禄、德"，完全从属于"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揭露"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大量反革命罪行，使我们进一步看到，"四人帮"需要有《答卷》作者这样的人，充当他们的前台打手，在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说他们想说的话，办他们要办的事。果然《答卷》作者随着"四人帮"的指挥棒，疯狂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他打着所谓"反潮流"的旗号，到处大放厥词，煽风点火，制

造混乱，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毛主席逝世以后，他公开跳出来，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终于堕落成了一个现行的反革命。

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拣“石头”打人，结果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驱散了我国上空的那股乌云。这个反革命的政治骗局的炮制者——“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被揪出来了，《答卷》作者也现出了他真右派的原形，真是大快人心！我们要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乘胜前进，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辽宁日报》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 1976 年 11 月 30 日《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教育革命深入发展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在伟大的批修整风运动推动下，北京大学里到处呈现着热气腾腾的新景象。

理科、文科和外语科一些系的师生，在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参加了一段时间的批修整风和教育革命实践之后，已经陆续返回学校，正在认真总结经验。

今年各系的应届毕业生纷纷打起背包，在教师们的带领下，意气风发地开赴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到那里去开展毕业前的综合训练。

整个学校的教育革命，正在加快步伐地向前进。

批修整风这个纲，带动了教育革命这个目，促使北京大学的教育革命不断深入发展。现在，北京大学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已经深入到学科领域。经济系在学习《反杜林论》时，重点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等谬论。一位从事经济学说史研究几十年的老教授也积极投入战斗，一边参加批判，一边亲自讲课。文科各系师生，今年春天深入到北京郊区二十九个公社、二百六十多个大队，同贫下中农一起，联系农村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活生生事实，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很好地检验和锻炼了学生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发挥了文科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的战斗作用。哲学系一些师生到工厂、农村、商店进行社会调查，写出一批调查报告，批判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文科各系这样结合现实斗争组织教学，有利于从根本上改造旧北大文科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的恶劣学风。现在，各系都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出发确定专业方向，把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作为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中心，把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列为主要课程，并增设了研究现状和批判资产阶级的课程。有关“史”的课程也努力贯彻“古为今用”的原则，在斗争中逐步得到改造。

理科各系也深入开展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数学系党总支组织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批判微积分教材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对微积分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材编写等方面进行认真的改革。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写出论文《微积分的理论是怎么来的?》研究数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从中考察理论与实际、科学与生产的关系，深入批判自然科学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潮，批判把数学看作与生产实践无关的种种唯心论的先验论。这样深入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搞得生动活泼，深刻有力，既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又推动了学科的改造。

在批修整风中，北京大学针对旧教育制度的"三脱离"的要害，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更加坚定了开门办学的方向。中文系新闻专业师生到天津市北郊区岔房子公社，结合调查养猪事业进行教学时，抓住刘少奇一类骗子窜到这里所散布的谬论及其影响，深入调查，认真研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写出了《关键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调查报告和《为革命大养其猪》的评论，配合了当地的批修整风运动和落实党在农村各项政策的工作。两年多来，北京大学文科各系师生每年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下厂下乡参加现实斗争，先后写出几千份调查报告，在报刊上发表了八百多篇文章。他们还协助工矿企业、机关、农村举办各种类型的读书班、学习班、政治夜校六百多个，参加学习的有四万多人，在社会上辅导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二百多次，听众六万人次，深受群众的欢迎。理科各系在认真巩固和发展校办工厂的同时，和校外六十多个工厂建立了厂校挂钩关系，逐步建立起教学、科学研究和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把课堂教学、实验室教学和参加校内外工厂生产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他们在校内外举办气象、地震、可控硅、生物电子学、数理统计、超导材料等短期训练班二十八期，共有一千八百多名工人、技术人员等参加学习，对发展生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起了良好的作用。校办工厂几年来由三所发展到十所，产品由几种发展到几十种，既为现场教学和科学实验提供了有利条件，又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富。

北京大学以批修整风为纲，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科学研究方面也作出可喜的成绩。理科各系从我国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与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出发，并考虑到专业培养目标和发展方向，近两年来进行了一百多项科学研究，其中有四十多项进展较大，有些项目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文科一些教师经过大量的研究，写出了《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危机的新风暴》等论文。理科各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积极参加了科学研究。许多工农兵大学生在科学实验中显示出较强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不久前，农业微生物专业四名学生由教师带领，到北京市清河粉丝厂研究酸浆为什么能沉淀淀粉的原理。他们跟班参加劳动、了解生产过程，虚心向工人学习，查阅和分析有关文献，设计出实验方案，并且和这个厂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实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取得了初步成果。粉丝厂的工人兴奋地说:"几百年来用酸浆沉淀淀粉的谜解开了"。有机化学专业参加科学研究训练的五十多名学生，已经有四十多人取得了初步成果。农药组一名学生同北京市农药二厂工人、技术员一起合成一种新杀菌剂，提出了一条用多磷酸作失水剂的工艺路线，使最后一步的缩合反应收率在实验室里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心血管药物小组和麻醉药物小组的师生合作，试制出抗心绞痛和强效安定剂两种新药，现已送有关单位进行药理试验。参加这项科学研究训练的一位学生，入学前在一个制药厂工作十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尽管她文化基础低些，但在科研训练中严格要求，认真操作，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多年实践经验，打破框框，大胆试验，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

两年来，北京大学文科、理科和外语科各系还先后组织八百多名教师，以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旧教材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编写出五百多种新教材，初步满足了目前教学的需要。历史系一些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批判唯心史观，仅用半年多时间，编写出一套《简明世界史》教材，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是历史教材改革中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化学系物理化学和化工原理教学小组一位教授和几位青年教师，先后到北京几个化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广泛进行现场调查，虚心向工人学习，认真总结生产实践的经验，突破了旧教材从概念到概念的封闭体系，编写出了理论与实际结合较好的新教材《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在改革物理化学教材中取得了新的成果。

(原载 1973 年 8 月 20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的决议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败露后，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和几个死党，私乘飞机，叛党叛国，仓惶逃命，投奔苏修。他们所乘外逃的飞机，在蒙古境内温都尔汗附近坠毁，林彪、叶群等成为死有余辜的叛徒卖国贼。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声讨了林彪，揭发批判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开展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批林整风运动。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和中央专案组的调查研究，查获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大量罪证。中央专案组编印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之二、之三，说明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经过。这些材料戳穿了林彪的伪装和欺骗，彻底揭露了林彪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事实真相。这些材料提供了林彪反党集团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确凿证据。它足以证明，林彪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个叛党叛国的反革命阴谋集团。

一

中央专案组根据已经调查核实的物证、人证，现已查明：

（一）早在“九大”前后，林彪就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伙同他的老婆叶群，勾结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结成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还通过他的儿子林立果，秘密建立反革命特务组织小“联合舰队”。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已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他们密谋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发动的突然袭击，是有预谋的。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在会前和会中多次秘密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向党进攻。从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发表反党讲话，到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他们的反党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向毛主席、党中央夺权。它的性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三）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反党集团立即秘密进行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他们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政变纲领，并从政治、军事、组织、情报等各方面加紧进行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手令。九月十日，林彪给黄永胜一封亲笔密信。在林彪的直接指挥下，林彪死党用穷凶极恶的手段，妄图乘毛主席外出巡视的机会，在外地谋害毛主席，并策划于同一时间，在北京谋害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林彪又通过吴法宪私调飞机，要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一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妄想造成所谓“南北朝”的局面。林彪还企图勾结苏修，对我实行南北夹击。他们的种种阴谋，都遭到彻底的破产。

（四）林彪叛党叛国是有其历史根源的。林彪出身于大地主兼资本家家庭，入党以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林彪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林彪追随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竭力宣扬“短促突击”。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指挥红军从挫折走向胜利的紧急关头，林彪伙同彭德怀要夺毛主席的权。红军到达陕北之初，林彪蛮横地一再坚持要脱离红军主力部队，独自到陕南去“打游击”，向党闹独立性。在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发表反党文章，无耻吹捧蒋介石和国民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林彪一再抗拒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部署。林彪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林彪是高饶反党联盟的幕后策划者。在六十年代初我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赫鲁晓夫叛徒集团掀起反华逆流的时候，林彪反对党的总路线，要搞“包产到户”，反对我党揭露和批判苏修，要跟苏修妥协。林彪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培植亲信，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他提出“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等反党乱军的口号，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妄图篡夺毛主席的统帅地位，炮制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不能指挥军队的谬论，狂妄地提出军队要由他“直接指挥”。他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的原则，要从根本上篡改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毛主席、党中央对林彪历史上所犯的错误，一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就

是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仍然对他进行了仁至义尽的教育和挽救，给他以悔过自新的机会。但是，林彪对党一直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阳奉阴违，口是心非，欺骗党，欺骗人民，最后终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二

林彪反党集团的出现，是国内外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首先取得了粉碎刘少奇叛徒集团的伟大胜利。但是，阶级敌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要作垂死的挣扎。帝国主义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时时刻刻都在企图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样的形势下，林彪反党集团作为国内外阶级敌人的代表，迫不及待地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但是，这不过是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的痴心妄想。他们表面上极端狂妄，本质上极端虚弱。他们的阴谋，是见不得人的，因而成不了什么气候，无碍大局。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党是久经考验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取得了党的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国内外阶级敌人最沉重的打击，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三

鉴于林彪反党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叛党叛国，罪大恶极，中央专案组建议党中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

（二）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叛徒、卖国贼叶群的党籍。

（四）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雪峰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五）对参与林彪反革命政变的其他骨干分子，由有关部门负责审查，按照党的政策，区别情况，提出处理意见，报中央审批。

中央专案组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日

〔附〕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的决定》。决定说："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决议（中发〔1973〕34号文件）中认定李雪峰同志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将他永远开除党籍。这一处分的主要根据是，'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出笼，他们专了两天半的政'。""根据调查证明：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华北组简报（即六号简报，主要内容是拥护林彪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讲话），是按照当时会议的规定，由记录人员根据华北组同志的发言，如实整理的。简报写出后，经华北组负责人李雪峰、吴德和解学恭同志共同阅鉴，大会秘书组印发的。因此，不能说华北组的简报就是林彪、陈伯达指使李雪峰炮制的。虽然九届二中全会上，李雪峰同志在林彪、江青两个阴谋集团互争权力中，也有错误，但根据这一期反映小组讨论情况的简报，就认定李雪峰为林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是不符合事实的。他本人以后也遭到'四人帮'的迫害。""因此决定：撤销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中，把李雪峰定为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恢复李雪峰同志党籍。"决定也指出，李雪峰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是有错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应该深刻地吸取教训。

〔附〕要记取"左"倾危害的教训

李雪峰委员说，三中全会以来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恢复和发展了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各方面的同志和朋友都和党一起非常珍视团结，要团结好，就要克服"左"倾错误。我个人经历过十年内乱，深刻体会到"左"倾错误的危害。"文革"初期我执行了"左"的政策，伤害了一些同志，我诚心表示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同时，我自己也受到"左"的政策的害。我要非常重视这些经验教训，今后要努力学习，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包括自己所能做的团结方面的工作。

（原载1983年6月9日《人民日报》）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周 恩 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

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主要内容是：关于九大路线，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关于形势和任务。

关于九大路线

党的九大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举行的。

九大根据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历史经验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鲜经验，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再次肯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同志们记得，毛主席在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九大开幕的时候，发出了“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在同年四月二十八日九届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又一次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毛主席并且预言：“过若干年，也许又要进行革命。”毛主席的讲话和大会通过的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为我们党规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大家知道，九大政治报告是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政治报告。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陈伯达的这个政治报告，理所当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对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报告，林彪暗地支持陈伯达公开反对，被挫败以后，才勉强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线，在大会上读了中央的政治报告。但是，九大期间和大会以后，林彪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抵制和挽救，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一直发展到一九七O年八月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政变未遂，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九月八日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阴谋失败后，九月十三日私乘飞机、投奔苏修，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胜利，是对国内外敌人沉重的打击。九·一三事件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亿万各族人民进行了认真讨论，对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表示了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对伟大领袖毛

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坚决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批林整风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展对林彪一类骗子的革命大批判，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清算了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提高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事实证明、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九大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党的九大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得到更好的落实。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新成果。被林彪破坏了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作风，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得到发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了新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加强战备、参加人民的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了新贡献。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更加坚强。我们的党，经过吐故纳新，现在已经是由二千八百万党员组成的更加朝气蓬勃的无产阶级先峰队。

在批林整风运动的推动下，我国人民战胜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破坏，克服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夺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财政贸易情况良好。我们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市场繁荣。文化教育卫生科学技术事业，也有许多新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坚决地贯彻执行了九大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同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之间的革命友谊，同友好国家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加强。我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孤立中国的政策宣告破产，中美关系有所改进。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广泛，我们互相帮助、互相支援，推动着世界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九大以来的革命实践，主要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实践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领导是正确的。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胜利

关于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过，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已经知道。因此，在这里就不需要多讲。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党内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刘少奇叛徒集团垮台，林彪反党集团跳了出来，继续同无产阶级较量，正是国内国际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早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处于高潮时刻，苏修叛徒集团的头子勃列日涅夫在高尔基州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就疯狂地反对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公开宣布他们站在刘少奇叛徒集团一边，说什么刘少奇叛徒集团的垮台，“对中国一切真正的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大悲剧。因此，我们对他们深表同情。”勃列日涅夫并且公开宣布继续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方针，说什么要“争取使它回到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四日《真理报》）一九六七年三月，苏修另一个头目在莫斯科的群众大会上，更露骨地说什么“代表中国真正利益的健康力量迟早还会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在自己伟大的国家获得胜利。”（一九六七年三月四日、三月十日《真理报》）他们所说的“健

"康力量"就是代表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利益的腐朽力量，他们所说的"决定性的话"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所说的"思想胜利"就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真修正主义在中国上台，他们所说的"国际主义道路"就是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殖民地的道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迫不及待地说出了反动派的共同愿望，也说出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

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实质，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罪恶目的，就是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彻底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变为修正主义的法西斯党，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内，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

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不是经营了十几年，而是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毛主席把"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主要条件之一，并且写进了我们的党章。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正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林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参加共产党的。那时他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正在古田会议以后，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给林彪的长信，对他进行了严肃的耐心的教育。事实证明，他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世界观根本没有改造。在革命的重要关头，他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是当中国革命的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并且逐步深入，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时候，林彪这一类只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地位越高，野心越大，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就再也隐藏不住，就要跳出来，同无产阶级较量了。当他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需要，跟着苏修的指挥棒，妄图"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的总暴露，总破产。

恩格斯说得好："无产阶级的发展，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在内部斗争中实现的"。"谁要是象马克思和我那样，一生中对冒牌社会主义者所作的斗争比对其他任何人所作的斗争都多(因为我们把资产阶级只当作一个阶级来看待，几乎从来没有去和资产者个人交锋)，那他对爆发不可避免的斗争也就不会感到十分烦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三十五卷380页)

同志们!

在半个世纪中，我们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林彪反党集团的垮台，并不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束。国内外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由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比地主、资本家亲自出马要好得多，特别是地主、资本家在社会上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何况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

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彭德怀、高岗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我们全党同志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要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不论阶级敌人怎样变换花样，都能因势利导，夺取无产阶级的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中央的领导权、地方的领导权、军队的领导权，也要垮台。路线正确，没有一个兵也会有兵，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我们党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是如此。林彪要"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问题决定于路线。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

毛主席总结了党内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我们每个同志都要牢记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积极地正确地进行党内路线斗争。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这种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种潮流来了，多数人跟着跑，只有个别人顶住的事，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而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涌来的时候，要不怕孤立，敢于反潮流，敢于硬着头皮顶住。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毛主席就是在党内十次路线斗争中敢于反潮流，敢于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我们每一个同志应当向毛主席好好学习，坚持这个原则。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武装的、非武装的、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敌人，进行了长期的较量。我们党没有被分裂，没有被打垮。相反，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更加发展，我们党更加壮大。历史的经验使我们深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正象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所预言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只要我们全党牢记历史经验，坚持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资产阶级的一切复辟阴谋总是要失败的。不管再发生多少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也改变不了历史的规律，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终究是要胜利的。

关于形势和任务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科学分析，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帝国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极端尖锐化。因此，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并且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斯大林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正是列宁分析过的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在今天的表现。缓和是暂时的、表面的现象，大乱还将继续下去。这种大乱，对人民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它乱了敌人，分化了敌人，唤醒了人民，锻炼了人民，推动国际形势进一步朝着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它在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中加强了团结，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伟大胜利，有力地鼓舞着全世界人民反帝反殖的革命斗争。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略的斗争，非洲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的斗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坚持二百浬领海和经济区的斗争，都在继续前进。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争取和捍卫民族独立，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资源的斗争，有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发展。第三世界同欧洲、北美、大洋洲人民的正义斗争，互相支持，互相鼓舞。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列宁说：“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宣布欧洲年，召开欧安会，表明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西方总想推动苏修向东，把这股祸水引向中国，西方无战事就好。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但是，这块肉很硬，多年来谁也咬不动。“超级间谍”林彪垮台了，更难下手。现在，苏修是声东击西，加紧在欧洲的争夺，加紧向地中海、印度洋以及一切可以伸手的地方扩张。美苏争霸是世界不得安宁的根源。这是它们制造的各种假象掩盖不住的。这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民和国家所识破，受到第三世界的强烈抵抗，引起日本和西欧国家的不满。美苏两霸内外交困，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今年六月美苏会谈及其以后的形势，更加证明这一点。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美苏两霸的野心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想吞掉中国，咬不动；对欧洲、日本，也咬不动，更不要说广大的第三世界了。美帝国主义从侵朝战争失败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它公开承认自己日益衰落，不得不从越南撤退。苏联修正主义统治集团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这二十年来已经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它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矛盾日益深化；它对外，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

古，支持朗诺卖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专家被赶，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这一系列的事实，深刻地暴露出它新沙皇的丑恶面目，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它做的坏事、丑事越多，被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送进历史博物馆去的日子来得越快。

最近，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对中苏关系问题讲了许多废话。说什么中国反对缓和世界局势，中国不想改善中苏关系，等等。这些话，是说给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听的，妄图挑拨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掩盖新沙皇的真面目。更主要地是说给垄断资本家听的，希望仗着反华反共有功，得到更多的赏钱。这是希特勒的老把戏，只是勃列日涅夫表演得更加拙劣罢了。你那么想缓和世界局势，为什么不做一两件事情，比如从捷克斯洛伐克或者蒙古撤退军队、归还日本北方四岛，来证明你的诚意呢？中国没有侵占别国的领土，难道要中国把长城以北统统让给苏修，才算表示我们赞成缓和世界局势，愿意改善中苏关系吗？中国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妨碍两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正常化，中苏边界问题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是我们的一贯原则。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在这里，我们应当指出，需要把苏修、美帝的勾结、妥协，同革命的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必要的妥协区别开来。列宁说得好，“有各种各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列宁同德帝国主义签订布列斯特条约，属于前一种；列宁的叛徒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干的是后一种。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毛主席在一九七O年五月二十日声明中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只要日益觉醒的各国人民，认清方向，提高警惕，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就有可能制止战争。如果帝国主义硬要发动战争，必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更大的革命，加速它们的灭亡。

在当前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十分重要。因此，在国际，我们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在国内，我们要遵循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对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突然袭击，保持高度警惕，做好一切准备。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台湾省是祖国神圣领土，台湾人民是我们的骨肉同胞。我们对台湾同胞寄予无限的关怀。台湾同胞热爱祖国，向往祖国。台湾同胞只有回到祖国的怀抱，才有光明的前途。台湾一定要解放。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定要统一。这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志愿和神圣义务。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

同志们!

我们必须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总是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任务还很繁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任务，各条战线都需要继续深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和某些不正之风，还有待努力克服。我们全党要抓紧当前的有利时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把各项工作做好。

首先，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使广大群众从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吸取历史经验，进一步认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

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改造世界观。特别是高级干部，更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力求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新老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斗争的历史，了解毛主席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希望，经过持久的努力，"使我们广大干部同人民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

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继续认真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继续搞好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办好五·七干校，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我国在经济上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要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抓革命、促生产。要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二十多年来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基本经验，就是依靠群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就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充分发挥广大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在这个基础上，加强计划，加强协作，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更好地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组织要重视经济政策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做好调查研究，切实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国家计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各级党委要学习毛主席《关于健全党委制》、《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等著作，总结经验，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要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群众组织的作用。要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使那里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贫下中农、其他劳动群众手里，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各级党委要健全民主集中制，提高领导水平。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希望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警惕这种倾向，认真地改变这种作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群众创造的老、中、青三结合的经验，为我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各级党组织都要把这项百年大计经常列入议程。毛主席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

的，"要经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经过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因此，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能上能下，经得起几上几下的考验。不论新老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到党和人民需要的任何岗位上去，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

同志们！党的十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将有深远的影响。最近，我们还要举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对我们党、对我们国家寄托着很大的希望。我们相信，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全党一定能够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我们的工作做好，不辜负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让我们全党团结起来，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197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王　洪　文

同志们！

现在，我受党中央的委托，就我们党的章程的修改问题，作一个扼要的说明。

根据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修改党章的指示，今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九大党章的修改问题。会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党委和中央直属单位的党组织，都成立了党章修改小组，广泛征求了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正式向中央报来了四十一份修改稿。在这同时，各地党内外群众还直接寄来了许多修改意见。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修改草案，就是根据毛主席关于修改党章的具体建议，在认真研究了各地修改稿和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的。

在讨论修改党章的过程中，全党同志一致认为，从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九大路线指引下，深入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在国内和国际斗争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胜利。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改的不

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话，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修改草案和九大党章比较，主要是充实了两条路线斗争经验的内容，这也是各地送来的修改稿的共同特点。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已经取得了十次大的路线斗争的胜利，积累了战胜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丰富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全党是十分宝贵的。毛主席说："**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我们全党同志都要十分注意路线问题，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党的建设，保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实现。

在这个方面，修改草案增写了哪些内容呢？

第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也是一次深刻的整党运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子和以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对国际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一次沉重打击。**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这次革命的伟大胜利和重大意义，并且明确写上了："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国内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国际上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对我们进行侵略和颠覆，也必然会到我们党内来找代理人。一九六六年，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阶级斗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毛主席揭示的这个客观规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深入进行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还要进行多次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第二，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提出的"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最基本的是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搞马克思主义，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大多数人谋利益，就一定要团结，要光明正大；搞修正主义，专为少数剥削阶级分子效劳，就必然要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修正主义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分子是资产阶级和帝、修、反采用打进来或拉出去的手法，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这类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尽管表现有所不同，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从思想、政治到生活，都彻头彻尾资产阶级化了，烂透了！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这是千真万确的。修改草案根据各地的建议，把"三要三不要"写进了总纲。在党员必需做到的第一条、基层党组织任务的第一条中，还吸收了北京市修改党章座谈会上工农兵同志的意见和有些省、市的建议，增写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是我们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一个长期任务。

第三，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民主革命前期，曾经几次出现过错误路线的统治，在民主革命后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也有过某种错

误路线、某种错误观点一度被许多人当作正确的东西加以拥护这样的教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同那些错误的东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当然，对错误潮流，不仅有个敢不敢反的问题，还有个能不能识别的问题。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许多同志往往不予注意，而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又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经过讨论，许多同志认为，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知的。“**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只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区分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正确观点与错误观点。

在开展斗争的时候，要学习毛主席关于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坚定的原则性，而且实行正确的政策，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注意团结大多数，遵守党的纪律。

第四，要在群众斗争中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说：“**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里所说的要培养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千百万。这样的任务，只有全党重视才能完成。在讨论修改党章过程中，许多老同志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求进一步做好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使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许多年轻同志也热烈地表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有丰富的经验，要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接好革命的班。新老干部都表示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草案在总纲部分加了要培养接班人的内容，条文部分加了各级领导机关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我们要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还要注意培养妇女和少数民族干部。

第五，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扬党的传统作风。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党必须领导一切，这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修改草案吸收了各单位关于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建议，在条文部分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我们党历来的规矩，必须坚持下去。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不能用几个方面的“联席会议”来代替党委会的领导，同时也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和各个方面、各级组织的作用。党委会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要搞“群众言堂”，不要搞“一言堂”。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各级党委都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修改草案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写进了总纲。毛主席倡导的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是老一辈共产党员熟知的，但也有一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续发扬的问题；许多新入党的同志，更有一个学习、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毛主席经常拿党在艰苦斗争年代的事例来教育我们，要与广大群众同甘苦，共命运。我们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糖衣炮弹的袭击，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坚决反对特殊化，认真纠正“走后

门"之类的一切不正之风。

这里，着重讲一下接受群众的批评监督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和广大劳动群众，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有权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实行革命的监督。这个观念，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党是加强了。但是，目前仍有少数干部、特别是有的领导干部，听不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甚至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个别的还相当严重。对人民内部问题，采取"说不服就压，压不服就抓"的错误做法，是党的纪律绝对不能允许的。修改草案在条文部分增加了一句话："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我们应当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同这类违反党的纪律的现象进行坚决的斗争。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武器，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第六，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们党的一贯原则。这次修改草案，又写上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永远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在当前，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我们务必做好一切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

毛主席说："**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大物博，我们一定要使国家富强起来，也完全能够富强起来。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不称霸**"的原则，不做超级大国。全党同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同时在国内，也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各种表现，进一步增强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同志们！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我们相信，全党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去做，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 1973 年 9 月 2 日《人民日报》）

中 国 共 产 党 章 程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通过）

第一章 总 纲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了五十多年的艰苦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

党要依靠工人阶级、巩固工农联盟、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要善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要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以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路线前进。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　　员

第一条：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遵守党的纪律，交纳党费，都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第二条：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有党员二人介绍，填写入党志愿书，经支部审查，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由支部大会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第三条：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做到：

（一）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

（二）为中国和世界的大多数人谋利益；

（三）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

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

(四) 有事同群众商量；

(五) 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

第四条：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由党的各级组织，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按照具体情况，分别给以警告、严重警告、撤消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的处分。

党员留党察看最长不超过两年。在留党察看期间，没有表决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党员革命意志衰退，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可劝其退党。

党员要求退党，由支部大会通过除名，并报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备案。

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应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第三章　党的组织原则

第五条：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应根据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

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定期向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报告工作，经常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接受监督。党员有权向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提出批评和建议。党员对于党组织的决议、指示，如有不同的意见，允许保留，并有权越级直至向中央和中央主席报告。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第六条：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的领导机关，是同级的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和它产生的党的委员会。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由各级党的委员会召开。地方、军队和各部门党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党委员会的人选，都必须经上级组织批准。

党的各级委员会，根据密切联系群众和精简的原则，设立办事机构，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关。

第七条：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卫兵、红小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在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中，可设立党的委员会或党组。

第四章　党的中央组织

第八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九条：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产生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

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召开。

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处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

第五章 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

第十条：党的地方县以上、人民解放军团以上的代表大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地方和军队各级党的委员会，产生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副书记。

第六章 党的基层组织

第十一条：厂矿企业、人民公社、机关、学校、商店、街道、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根据革命斗争需要和党员多少，设立支部、总支部、基层委员会。

党的支部、总支部每年改选一次、基层委员会每两年改选一次。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前或延期举行。

第十二条：党的基层组织的主要任务是：

（一）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

（二）对党员和非党员经常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他们向阶级敌人作坚决的斗争；

（三）宣传和落实党的政策，贯彻执行党的决议，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任务；

（四）密切联系群众，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党的生活朝气蓬勃；

（五）发展新党员，执行党的纪律，经常整顿党的组织，吐故纳新，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朝气蓬勃的大会。

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主持了这次大会。

大会的议程是：一、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二、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选举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八月二十四日，大会正式开幕。

当毛主席出现在主席台的时候，全场欢声雷动，代表们怀着激动的心情，长时间地热烈鼓掌，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毛主席亲切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大会选举了由一百四十八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

大会一致通过毛主席为主席团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同志为主席团副主席，张春桥同志为主席团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陈锡联、李先念、姚文元、董必武、纪登奎、汪东兴、华国锋、吴德同志。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路线取得伟大胜利，国内外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同志为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会作了充分的准备。经过广泛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代表候选人，征求代表候选人所在地区或单位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最后选出了一千二百四十九名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前，全体代表认真地讨论了大会的全部文件的草稿和草案。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十大的召开。

大会正式开幕这一天，来自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五湖四海的大会代表，通过高悬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巨幅画像的大厅，进入了庄严的会场。他们之中，有的是产业工人党员代表，有的是贫下中农党员代表，有的是来自祖国边疆、警惕地守卫在国防前哨的人民解放军党员代表，还有的是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党员代表。工农兵党员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七。妇女党员代表占百分之二十以上。汉族以外兄弟民族党员代表，也占有一定比例。有待解放的祖国神圣领土——台湾省在全国各地的党员所选出的代表，是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们带着全国二千八百万党员的委托，各族亿万人民的心愿，同自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地进行了工作。

八月二十八日，大会经过认真、热烈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政治报告和王洪文同志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代表们高兴地说，这几个文件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分析了国内外大好形势，充分肯定了在九大路线指引下各条战线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总结了两条路线斗争，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基本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和任务，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战斗纲领。

大会经过反复酝酿、讨论，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当宣布选举结果的时候，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和口号声。

当选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员和一百二十四名候补中央委员，体现了老、中、青三结合。他们有的是建党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的是经受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火考验的各条战线的领导干部，有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三大革命运动和反对帝、修、反斗争中的优秀战士，还有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新入党的青年同志。老、中、青济济一堂，共同学习，相互激励。代表们兴奋地说，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充分说明了我们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和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坚强团结。

大会愤怒地声讨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全体代表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议：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的党籍；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委员会对林彪反党集团其他主要成员的处理和所采取的全部措施。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大会的各项文件，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

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大会指出：当前，我们要继续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要充分利用林彪反党集团这个反面教员，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要继续抓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斗、批、改，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按照十大确定的政治路线和通过的新党章，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大会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这种乱，是好事，不是坏事，它正在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而不利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方向发展。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党的一贯政策，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各族人民，务必加强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警惕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爆发，特别警惕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团结胜利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万岁！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原载 1973 年 8 月 30 日《人民日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八月三十日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选举结果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　泽　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毛泽东　王洪文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女）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女）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

（一九七三年九月四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两千多年来，一切反动统治阶级都极力吹捧孔子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也大谈孔孟之道，用孔孟之道冒充、修正马克思主义、妄图篡改党的理论基础，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为了识破和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阴谋，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于孔子和儒家学派的反动思想必须进行批判。

孔子生在公元前五五一年，死在公元前四七九年，春秋末期鲁国人，是一个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后代，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他创立了儒家学派。那时，正是我国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激烈变革的时代，奴隶起义和奴隶逃亡摧毁和瓦解着整个奴隶制度，土地所有制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地主经济和个体经济，旧的奴隶制一天天崩溃，新的封建制一天天兴起。新兴的地主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向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对奴隶制社会的各种旧制度进行革命的变革。孔子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上，竭力反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他反对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的税亩制度，反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的所谓“犯上作乱”，反对破坏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度的“刑鼎”，反对传播适应新兴地主阶级发展要求的新思想，甚至把宣传新思想的少正卯杀了。他一生到处奔走，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为自己的责任，目的就是为了挽救奴隶制社会的灭亡。

在孔子心目中，最美好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最发达的西周时代，最完善的等级制度是体现在相传是西周初期奴隶主的政治代表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中。他赞美西周时代说：、周是根据夏殷二代发展来的，它的各种制度真是兴盛啊！我是要按照周的各种制度办事的。”[1]又说：“如果有人用我，我将在东方把周礼复兴起来！”[2]孔子所希望恢复的周礼的中心内容，就是奴隶制的等级服从关系。所以说，孔子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要把正在向前发展的社会拉回到旧制度中去。

孔子为了实现他维护奴隶制的政治主张，不仅亲自帮助没落奴隶主贵族统治者镇压新兴的封建势力，反对各种新生事物，而且制造了一大套唯心论的政治、道德、哲学理论。

孔子在政治上提倡所谓“礼”和“德”。他认为，统治者统治人民光用残酷的刑罚镇压还不行，重要的是要注意精神统治，用奴隶制的等级服从观念去麻痹人民，使人民不仅在思想上认识到犯上作乱是“可耻”的，而且在一言一行上都能做到符合奴隶制的统治秩序。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提倡的“礼治”，是为了从思想上防止“犯上作乱”，作为反对社会变革、维护旧奴隶制的工具。这种主张，在当时社会大变革时期，是针对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而发的。

为了维护旧的奴隶制的等级服从关系，阻止社会向前发展，孔子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政治和道德理论，作为“礼治”的内容。他特别强调了“仁”的根本思想是维护奴隶制宗法关系的“孝”和“悌”。原来，周代的奴隶制，是氏族奴隶主的统治。所谓“孝”，就是要求这个奴隶主氏族集团的成员怀念和尊重他们的祖先；所谓“悌”，就是要求大家服从当时属于这个统治集团中心的嫡长子。孔子提倡孝、悌，就是要人们不得改变从祖先传下来的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巩固奴隶主贵族的内部团结，压制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要求。孔子的一个大弟子有若，曾清楚地解释说：“如果做人都讲孝和悌，那末喜欢犯上的事就少了；不好犯上，那末好作乱的事就根本不会产生了。……所以说孝、悌是‘仁’的根本！”[3]所以孔子给“仁”下了一个定义：“克已复礼为仁”。这里，既是为调整奴隶主贵族之间的关系说的，也是对一些不遵守“周守”即旧的奴隶制度的新兴地主说的，要他们克制自己的改革愿望，回到“周礼”所规定的奴隶等级制度去。

孔子还说什么“仁者爱人”。孔子所说的“爱人”，就是爱奴隶主贵族，奴隶是不包括在内的。他提出这个主张，也是为了维护和挽救没落的奴隶制度。当时，奴隶主贵族中的许多人在奴隶起义和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冲击下，失去了原有的特权地位，有的吃不饱饭，有的去做一些被他们认为是下贱的事，还有些奴隶主的地位也不很稳固了。孔子所说的“爱人”，就是为了维护和恢复奴隶主贵族原有的地位。他说什么“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要讲什么“忠恕之道”。他要立的是什么呢？他要立的就是“礼”。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要“立于礼”，即各个等级的人应根据周礼的规定处在各自的等级地位上，这就是他所谓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至于所谓“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根据“周礼”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实行反革命团结。这当然是行不通的。因为一切剥削阶级从来实行的都是“已所不欲，要施于人”。所以孔子所说的“爱人”和“忠恕之道”，完全是为了掩盖极少数剥削者、统治者的最狭隘利益的骗人说教。

为了论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合理性，孔子还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君主、圣人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孔子说，有一种人是生来就具有知识的，即所谓“生而知之者”。这种人就是“上智”、“圣人”、“君子”，是天生的统治者，他们是和“下愚”、“小人”等被统治者根本不同的。而“上智”和“下愚”的区分又是不能改变的，[4]“小人”只能听从“君子”的统治和教育，就好象草随风倒一样，“君子”引向那里，“小人”就倒向那里。[5]孔子还主张对于奴隶，只能让他们听从奴隶主使唤，而绝不能让他们有知识。[6]

总之，正如鲁迅先生所揭露的那样：“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的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所以，孔夫子是“权势者们的圣人”。

战国中期的唯心论的思想家孟子，是儒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代表。孟子约生于公元前三八五年，死于公元前三O四年。那时，大部分诸侯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建立起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一部分诸侯国则正在经历这个社会变革。孟子对孔子的思想十分崇拜，他说，他一生的愿望就是学习孔子。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思想。孟子站在保守、反对的立场上，反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法家所提出的革命变革的措施，提出所谓“仁政”的思想。他说，行“仁政”首先要从“正经界”开始[7]，就是反对法家的鼓励开荒，承认私人占有土地，发展封建经济等主张，而要求恢复已经被破坏了的“井田制”，按照旧的奴隶制来把土地重新整理、划定。他的“仁政”，还反对法家主张的按照在开垦土地、发展生产和战争中的功绩大小，重新确定政治等级，重新分配财产，认为应该恢

复奴隶主贵族世世代代把持各级政权和享有经济特权的世卿世禄制度。他甚至说：用暴力改变旧奴隶制度的人应该受最重的刑罚，主张开垦土地、充分发挥土地作用的人也应该受刑罚。孟子是一个企图复辟奴隶制，阻止社会向前发展的复古主义者，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

孟子为了给他的"仁政"找理论上的根据，提出了"性善"说。他认为，奴隶制的那些规范，都发端于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所谓"善性"。他认为小孩子都知道"亲亲"和"敬长"，并用这种现象来论证维护奴隶制的政治道德观念如仁义之类都是永恒的、万世不变的东西。

孟子也竭力鼓吹唯心论和先验论的圣人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他说，剥削阶级的道德知识和才能都是不用通过后天学习，也无需接触外界事物，是人生来就具有的，这叫做"良知"、"良能"。[8]他把人分为"先知先觉"和"后知后觉"两种，"先知先觉"者是专门动脑筋的"劳心者"，"后知后觉"者是只知用耳、目、身体的"劳力者"。"劳力者"必须听从"劳心者"的统治。被统治者应该供养统治者，统治者生来就应该享受，这是普天下不可改变的共同道理。[9]孟子鼓吹的这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成为后来一切剥削阶级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理论根据。

以孔孟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是为维护奴隶制，反对革命变革的社会反动势力服务的。这种思想在当时起着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作用。所以，儒家思想在当时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法家的尖锐批判和抵制。

在封建社会确立之后，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由于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日益发展，在公元前二O九年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

汉王朝建立以后，地主阶级为了防止农民革命再起，从巩固他们的封建专制统治的要求出发，开始鼓吹起"儒家"思想。因为，这时地主阶级已由新兴的阶级转化为保守的阶级，他们不再要求革命，不希望社会再变革了；同时，旧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也可以为地主阶级巩固封建等级制所采用。加上孔孟所提倡的"仁"、"义"等道德说教和天赋"性善"理论可以作为束缚劳动人民的思想的精神枷锁；孔孟所宣扬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圣人，君主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心史观，又能为剥削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论证。因此，到汉武帝时，董仲舒（公元前一七九年——前一O四年）为了巩固封建政权，适应当时统一的形势，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说，凡是不在儒家所教的各门课程之内的，不符合孔子思想的，统统要杜绝，不让它发展。[10]同时，他对孔孟所讲的君臣、父子等等级关系，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认为，"君权"、"父权"、"夫权"是维护封建统治制度的三条根本大纲，这就是后来总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句话。他还认为，这种固定不变的封建等级服从关系，又都是来源于"天"的"神权"，"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封建等级关系也是永远不变的。为了维护和调整这种关系，董仲舒还提出了"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观念。这些，就是以后封建社会长期加以维持的所谓"三纲五常"的反动理论。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从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大都利用并随时补充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为维护封建统治镇压农民的反抗服务。

到唐朝后期，韩愈(公元七六八年——八二四年)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地位、克服封建社会的危机，制造了一套儒家思想发展继承关系的理论。他说什么儒家思想由尧舜开始，传到周公、孔子、再传到孟子，目的是为了论证只有孔孟的儒家思想才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只有提倡"孔孟之道"才能克服封建社会的严重危机。他这种突出孔孟正统地位的理论，以后又为北宋的程颐（公元一〇三三年——一一〇七年）和南宋的朱熹（公元一一三〇年——一二〇〇年）等人所接受和发挥。从此，孟子被提到了仅次于孔子的重要地位。朱熹还把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记载孟子言行的《孟子》两本书，和儒家思想家编定的经典《礼记》一书中《大学》、《中庸》两篇文章，称为《四书》，并重新做了注释，作为正统儒家思想的基本经典。在南宋以后，《四书》就成为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必读教科书。

朱熹等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经过多次农民革命的猛烈冲击后，社会危机加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加剧，民族矛盾也十分严重的时代。朱熹等为了维护封建制，进一步利用和发展了"孔孟之道"。他们把封建统治秩序、等级服从关系，说成是万古长存的"至善"的"天理"，而把一切违背封建统治秩序、反抗封建压迫、剥削的言行说成是"万恶"的"人欲"。他们的口号是"存天理、灭人欲"，而且认为只有"灭尽人欲"才能完全恢复"天理"。朱熹所鼓吹的这些，和北宋的封建卫道者程颐提出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是一脉相承的，都是要人们无条件地遵守封建统治秩序，即使饿死，也必须保持对封建统治的绝对忠诚。清代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戴震（公元一七二三年——一七七七年）痛斥这是"以理杀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鲁迅更深刻地揭露了在满纸写着"仁义"的字缝中，全是"吃人"二字，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儒家孔孟之道乃是封建统治者手中一把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

明朝中期，封建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下，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王守仁（公元一四七二年——一五二八年），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总结出一条"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反革命经验。所谓"山中贼"，是对农民起义军的污蔑，所谓"心中贼"，则是指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造反思想。王守仁认为，封建社会的危机，主要是人心不好，不服从封建道德造成的。他提出要把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的言行，消灭在"一念发动处"，即消灭在违反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念头刚开始发生的时候。王守仁特别发挥了孟子的"良知"、"良能"的理论，提出要彻底克服各种违背封建统治的"恶"的念头，恢复自觉服从封建道德的所谓"良知"。王守仁满口"仁义"、"道德"；有时甚至"痛哭流涕"地讲"爱人"。然而，就在他讲"仁义"、"爱人"的同时，却用最残暴的手段，挥动屠刀，无情地杀戮农民起义军。王守仁的言行，最充分地暴露了儒家"仁义"说教的虚伪性和剥削阶级的豺狼本性。王守仁的这套"破山中贼"和"破心中贼"的反革命经验，为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所继承。

在我国长期封建社会中，直至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切反动阶级无不利用儒家思想作为镇压人民、反对革命的精神武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孔子成了封建社会的第一号圣人——"至圣先师"，孟子则成了第二号圣人——"亚圣"；而"孔孟之道"也就成了封建主义的同义语。要推翻封建社会，也就必须彻底摧毁它的精神支柱——儒家正统思想，即"孔孟之道"。

伟大的"五四"运动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旗帜，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革命口号。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继承和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精神。它在政治上要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文化上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的文化和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封建文化。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势力却竭力鼓吹所谓"中国固有文化"、"固有道德教条"的"孔孟之道"，以对抗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推行法西斯专政。而那些钻进党内的地主资产阶

级的代理人也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这场思想领域中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和野心，也从剥削阶级的思想武库中拣出“孔孟之道”的政治、道德说教，或者直接贩卖，或者改头换面，鼓吹“德”、“仁义”、“忠恕”和“中庸之道”等等，以欺骗人民，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科学理论。但是，孔孟的亡灵挽救不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命运，毛主席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使他们同历代反动阶级一样，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注：

(1)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

(2)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3)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

(4) “子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

(5) “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6)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7)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

(8)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

(9)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

(10)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原载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焚　书　坑　儒”　辨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施　　丁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统治时期的一次重要政治事件。对于这一事件，历来评论的人很多，意见虽然有些出入，但多数意见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是暴虐行为，反动措施，直接导致秦朝覆亡。例如，汉朝人贾谊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废除了先王之道，烧毁了诸子百家的书，以欺骗民众（“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烧了书，用残暴的刑法对待人民（“焚文书而酷刑法”），所以它的灭亡必然是很快的（“故其亡可立而待”《过秦论》）。贾谊的这个看法，在历史上影响很大。唐朝人章碣的《焚书坑》一诗也写道：“竹帛烟销帝

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意思是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得秦朝衰弱了，所以不久就在刘邦、项羽的打击下垮了台。贾谊、章碣等人的看法，是歪曲历史、颠倒是非的错误之见。对于秦始皇"焚书坑儒"，我们应当认真辨析一下它的具体内容、性质和效果。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焚书坑儒"，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统一了中国。面对这一新的政治局面，是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还是瓦解统一，取消中央集权，当时秦朝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派人主张分封诸侯。廷尉李斯反对分封，认为推行郡县制，有利于巩固统一。秦始皇毅然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以下凡引此文不另加注)，由中央委派地方长官，以便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此后，李斯升为丞相。但是，主张分封的人并不甘心，两派之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时过八年，即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二一三年），博士淳于越又把这一斗争挑了起来。当时秦始皇在咸阳宫中召集群臣举行盛大宴会。博士仆射（博士的长官）周青臣在秦始皇面前称颂，说把过去的诸侯国改为郡县，统一了中国，是威德空前的大事业。淳于越听到周青臣的话非常不满，便恶意攻击，说推行郡县制是不遵守古代法制，周青臣的话是"面谀"。秦始皇就把这两种意见交给群臣议论。丞相李斯当即反驳淳于越。李斯说：时代变了("时变异")，不能照旧("不相袭")，古代的规章制度今天不能效法("三代之事，何足法")。并指出：现在诸生不学习当代的东西而专门推崇古代的东西，用古道来反对当今的政治，以欺骗民众，扰乱人心("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此，他主张禁止私学，建议焚书。凡是敢于在背地里谈论《诗》《书》的处死刑。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道不检举的同罪。命令下了三十天还不烧的，脸上刺字，罚做筑城四年的劳役。("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李斯想要通过这种办法，使天下人不能以古非今("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李斯传》)。秦始皇采纳李斯的意见，批准执行。秦始皇这一措施，给了"以古非今"者以严重打击。

就在秦始皇公布这个法令的次年，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方士"侯生和卢生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他们私下议论秦始皇"刚戾自用"，"贪于权势"，专门重用管刑罚的官吏，虽然设有博士七十人，但不重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这显然是对秦始皇采用李斯的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的诽谤和攻击，为淳于越之流鸣不平，为儒生博士争权夺势造舆论。这两个靠方术行骗的人在这样大肆攻击秦始皇之后偷偷地跑了。秦始皇知道后，联想到诸生在咸阳诽谤朝政，用谣言欺骗群众等情况，便令掌司法的官员审问诸生，严加追究。诸生相互告发。违犯法令的共有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就将这些儒生全部在咸阳活埋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以警告以后的人。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

秦始皇"焚书"，并不是要毁灭文化，烧光书籍。他"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鲁迅：《准风月谈》)。他只是要烧除秦国史书以外的各国史书和民间私藏的《诗》、《书》、诸子百家等典籍。而对于"博士官所职"的书籍不烧，所有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也明确规定不烧。因此可以肯定，秦始皇焚书是有限的。秦始皇"坑儒"，是为了打击主张复古的反对派，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儒生都杀掉。对于赞同郡县制的周青臣和一些遵法的儒生是不加害的。汉初著名的儒者伏生、叔孙通、陆贾、郦食其等人在当时都没有遭到什么迫害。而且，就是在"坑

儒"事件之后，秦王朝之内仍然有博士儒生，还选取博士。例如，秦二世得到陈涉起义的消息的时候，便召博士诸生发问。当时就有"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对答、"待诏博士"叔孙通还因对答之词使得二世满意，"拜为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这就说明，秦始皇不仅没有杀害无辜的儒者，而且还任用了一些儒者。

"焚书坑儒"就其性质来说，在当时是一个反篡权复辟的"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中国自春秋至战国，是处于由奴隶制转为封建制的社会大变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由于奴隶暴动对奴隶制的摧毁性的打击，由于新兴地主势力日益抬头和发展起来，并逐步夺取了政权，进行封建制的社会改革，全国就由几百个小国归并为几个大国，新的郡县制逐渐代替着旧的分封制，进步的封建制代替了腐朽的奴隶制。以孙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反映出奴隶主贵族垂死挣扎、妄图挽回奴隶制的反动性，其结果是一败涂地。而以商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实行社会变革的进步性，从而获得了胜利。秦始皇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他直接继承了商鞅变法的事业，沿着法家的政治道路，重用法家李斯等人，灭了韩、魏、楚、赵、燕、齐等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他还在统一过程中和统一之后，废除了分封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在全国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国家体制等一系列巩固统一、加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发展了封建制度。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于失败，梦想从历史垃圾堆里爬出来，篡权复辟。为其代言的一些反动政客、儒生博士王绾、淳于越、侯生和卢生之流，依然继承其祖师爷孔丘、孟轲的衣钵，顽固地坚持奴隶主贵族的立场。他们在新形势下，称颂《诗》、《书》，以古非今，造谣惑众，主张分封诸侯，反对郡县制度，企图瓦解统一，取消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复辟奴隶制。毫无疑问，他们"以古非今"是反动的。秦始皇和李斯顺应当时"势之所趋"，否定了早已过时的分封制，坚决推行业已发展的郡县制，并揭穿了反动派以古非今的反动面目，给予坚决打击，应该说是做得很对的。因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当时新取得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奴隶主贵族的一场政治斗争，是统一不久的秦王朝粉碎旧势力复辟阴谋、维护新封建统治的一次果敢行动，是"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应该历史地去看它。贾谊等人把它说成是反动措施，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效果，也是应该肯定的。从秦始皇统治时期来看，自"焚书坑儒"之后，虽然民间还有人收藏和诵习《诗》、《书》、诸子百家的书，也还有人诅咒秦始皇和封建国家制度，但是秦王朝内部就再没有一个博士儒生敢于明目张胆地"以古非今"，反对郡县制，反对中央集权，从而使群县制得以较为顺利地发展，日益巩固了地主阶级国家的统一。从秦朝以后的中国历史看，秦朝的封建统治制度，对延续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发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秦朝以后的各个封建朝代，不管其地方建置的名称怎样改变，基本上都只是郡县制的变换和发展；无论其政治制度的组织形式怎样变化，基本上也只是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演变和发展。正如清初人王船山所说，郡县制实行了两千年，而不能改了("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读通鉴论》卷一)。近代人谭嗣同也说，两千年来的政治制度，是秦朝的政治制度("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卷上)。因此，我们可以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对封建国家的巩固统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起到了积极作用。

那么，是否可以因秦朝覆亡于"焚书坑儒"之后不久，而断定这是由"焚书坑儒"所导致的呢？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焚书坑儒"之后的第三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O九年），奴

隶主贵族分子陈余和儒生孔鲋之流都乘陈胜、吴广起义的时机而叛秦。再过三年（公元前二0六年），秦朝就垮了台。如果从表面上观察问题，就会觉得秦朝灭亡同"焚书坑儒"似乎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仔细分析当时的矛盾，就能看到情况并非如此。

国家机器从来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当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地主阶级专政，一方面要打击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另方面又要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焚书坑儒"是秦王朝打击反动派搞复辟活动、而"用苛法峻刑使天下的人不安宁"（"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则是秦王朝对人民的迫害。陈余、孔鲋之流叛秦，同农民起义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秦朝的灭亡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同广大人民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陈胜、吴广起义，是反对封建剥削者的革命斗争，促使了秦王朝的灭亡。因此，秦王朝是被农民革命所推翻的。章碣等人硬是把"焚书坑儒"同陈胜、吴广起义，刘、项亡秦连在一起，断言其因果关系，完全是牵强附会，混淆了历史是非。

我们今天对待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历史事件，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透过历史的一些表面现象看实质、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然而，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及其死党诅咒秦始皇"焚书坑儒"，念诵章碣《焚书坑》诗，借以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寄同情于淳于越、侯生和被坑的儒生等历史上的反动势力，否定秦始皇"厚今薄古"的进步措施，歪曲历史、颠倒是非，企图拉社会倒退，也恰恰足以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从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叛党叛国的罪恶行动来看，他们以唯心史观颠倒历史、制造反革命舆论，其险恶用心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当年淳于越之流代表历史上腐朽的奴隶主贵族残余势力反对秦朝统一，反对封建制度，妄图恢复奴隶制；今天林彪反党集团代表资产阶级，代表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妄图恢复地主资产阶级的"天堂"。然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都是短命的。淳于越之流的复辟阴谋，在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中早已破灭。林彪反党集团的复辟阴谋，也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锤砸得粉碎。这就是不以一切反动派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原载《辽宁日报》，1973年9月28日《人民日报》转载时略有删改）

论 尊 儒 反 法

（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

石　仑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反动学派，法家是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学派。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在思想政治路线上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国历史上，历来就存在尊儒反法同尊法反儒两种对立的观点和派

别。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尊儒反法思潮的影响，儒法斗争的本质经常被颠倒和掩盖了。今天，**“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阶级分析的方法”**，弄清楚儒法斗争的阶级本质，对于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孔子是坚持奴隶主阶级专政的顽固派

儒家的主要代表是孔子。尊儒也就是尊孔。歪曲孔子的阶级性，抹煞孔子思想的阶级内容，是尊儒反法思潮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任何思想家都只能是一定阶级的代言人，而不可能站在什么超阶级的立场。毛主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种斗争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就成为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主要内容。孔子生活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激烈大变动的春秋末年，旧的奴隶制度在无数次奴隶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正趋于崩溃，新的生产关系即封建制度已经出现，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成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新旧社会的大变动中，孔子坚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成了一个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反动思想家。他把生产关系的大变革说成是“天下无道”[1]，坚决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任何改革措施。他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2]，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旧制度办事。他公开宣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3]，谁使用我，我就要恢复周朝奴隶制的那一套。

孔子思想的核心——“仁”，最鲜明地反映了他的奴隶主贵族本位的立场。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孔子所鼓吹的“仁”，深深地打上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烙印，想抹也是抹不掉的。“仁”的概念在奴隶社会早就存在了，本是奴隶主贵族的观念形态。（在孔子以前的不少反映奴隶社会阶级关系的典籍中，都有关于“仁”的记载。《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爱而又顺从祖宗），这里的“仁”是指奴隶主贵族间的相互关系。《诗·郑风》：“洵美且仁”（有真正的美，又有真正的仁爱），这个“仁”也是指的奴隶主贵族间的相互关系。《左传》中关于“仁”的记载更多，例如：“亲仁善邻”（相亲相爱，又能处理好与邻邦的关系）；“仁以接事”（以仁爱的原则办事）；“参和为仁”（和睦共事就是仁），等等，这些材料都说明，“仁”是用来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此外，《国语》中也有不少关于“仁”的记载。）奴隶社会的统治者认为，只有奴隶主是讲“仁”的，奴隶们应该归向“有仁”的奴隶主。孔子说的“仁”就是“爱人”[4]，但决不是爱一切人，更不是爱奴隶，而仅仅是爱奴隶主贵族。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那种抽象的所谓“爱人”，正好表现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在奴隶社会中，所谓“君子勤礼，小人尽力”[5]、“君子务治，而小人务力”[6]，也就是说，奴隶主贵族是从事统治的，小人则应老老实实地忍受剥削和压迫。可见，孔子所说的“仁”，完全是奴隶主阶级的观念。

“仁”的具体阶级内容，集中地反映在“复礼”上。孔子反复地强调说：“克已复礼，天下归仁[7]。什么是孔子所维护的“礼”？它是奴隶主贵族用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8]的统治工具。对于奴隶来说，“礼，所以整民也”[9]，完全意味着剥削和压迫。奴隶主贵族是非常重视这种“礼”的，他们把“礼”视为“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10]，谁敢于“无礼”，就要被镇压，直到被杀掉。总之，“礼”是区分奴隶主和奴隶的贵贱尊卑、确保奴隶主贵族所有权的典章制度，而孔子所说的“礼治”，就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那时，封建生产关系开始逐步代替奴隶制生产关系，“礼崩乐坏”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是，孔子这个顽固派却死死抱住“礼治”不放，念念不忘“复礼”。他以“好礼”、“爱礼”著称，口口声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11]。在他看来，“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12]、“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13]原来，孔子提倡“复礼”，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的“犯上作乱”。只要做到这一点，就算达到了“仁”的境界。这一切说明，孔子的思想体系是维护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利益的，目的是为了开倒车，恢复西周奴隶制全盛时代的政治制度，以挽救摇摇欲坠的奴隶主贵族专政的残局。

法家和儒家是两个对立的学派

尊儒反法思潮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抹煞儒法的对立斗争，把法家说成是儒家的继承者，把“法治”说成是“礼治”的发展，抹煞和颠倒思想领域内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的阶级界限。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种思潮，任何一个学派，都根源于阶级斗争，都是一定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即使同一学派，随着社会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发展变化，也是不断地一分为二的。当然，历史上一个新的学派的兴起，往往是以先前的学派为思想材料的，但这是流，而不是源。考察法家同儒家的关系，同考察任何学派的相互关系一样，必须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说明，而决不能用续宗谱的方法来代替阶级分析，用师承关系来抹煞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

法家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并且是在同儒家的激烈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还在春秋末年，随着地主阶级势力的抬头，法家的先驱者就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儒家的“礼治”思想。战国初年，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逐渐壮大，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明确提出了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的政治主张，并且在魏国、楚国、秦国实行了变法。魏国李悝变法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权，促进新兴地主阶级经济的发展。楚国吴起变法的主要内容，是“明法审令”[14]，实行“法治”，改变奴隶社会的风俗习惯，并废除了一部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大力扶植新兴地主阶级的势力。这些说明，法家一开始就执行了同儒家根本对立的政治路线。

到了商鞅和孟子的时期，法家和儒家在革新与守旧、“法治”与“礼治等基本问题上的对立更加尖锐了。商鞅的变法思想，是在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斗争中，对法家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孟子则是战国时代颂古非今派的主要代表，孟子的复古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儒家反动学说的进一步发挥，是为奴隶主的复辟活动制造舆论的。

商鞅在实行变法前，曾经在变法还是“循礼”的问题上，同秦国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奴隶主贵族打起“厚古薄今”的旗号来反对变法，他们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儒家的“法古无过，循礼无邪”[15]。商鞅针锋相对地提出“厚今薄古”的主张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16]，国家制度是随着时代变化的，如果不及时变法，拘守旧礼，就一定要灭亡。商鞅认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17]，反对古代的旧制度是无可非议的，而拘守“礼治”则不值得赞美。这场大辩论，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封建制度和奴隶制度两个阶级、两种制度的尖锐斗争的反映。

商鞅变法，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领域里都提出了一系列同儒家对立的变革措施。商鞅

的“开阡陌封疆”[18]、“变法修刑，内务耕稼”[19]的政策，进一步破坏了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从法律上确认了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同经济基础的变革相适应，商鞅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实行“变法易俗”，取消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建立了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以代替奴隶主贵族的宗法统治。在这个基础上，改造了同封建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国家机构，把秦国分为三十一县，由国王直接派官吏治理，使秦国走上了地主阶级中央集权的道路。商鞅变法的实质，是用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为建立地主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同商鞅等法家直接相对立的孟子，是一个“守旧术，不知世务”[20]的没落奴隶主阶级顽固派。孟子时期，奴隶制政权已支离破碎，正在被新兴地主阶级一块一块地吃掉。没落奴隶主阶级为了挽救他们的灭顶之灾，对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反扑。孟子的思想，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孟子公开反对取消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主张保存“世臣”、“世禄”制度。他咒骂法家是“民贼”，要求严厉镇压。孟子提出了一整套颂古非今的反动理论，否认封建制比奴隶制优越，认为什么都是古代好，“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21]，解决当时社会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倒退到奴隶社会中去。他竭力用奴隶社会的“古之制”，对抗新兴地主阶级的“今之道”。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仁”的反动思想，提出了“仁政”的复古理论。他说：“仁政，必自经界始，”[22]他认为古代存在过一种人人都有“恒产”、“恒业”的“井田制”，这是“仁政”的理想境界。其实，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们哪来什么“恒产”？至于“恒业”，那就是永远当奴隶。所谓“井田制”，只是孟子对奴隶主土地所有制的理想化，其目的就是对抗法家“开阡陌封疆”的政策，以挽救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奴隶主土地所有制。

在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他们给了孟子时期嚣张一时的儒家思想以重大打击。真是物极必反！荀子是儒家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法家的，并对儒家各个派别作了一定的批判。韩非则大大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用“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系统地批判了“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23]的儒家“显学”，批判了美化古代奴隶制的孟子的“仁政”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根据法家的理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并采取了包括统一文字、修筑驰道、废除分封制和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进步措施。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

古往今来，一切尊儒反法派都把“焚书坑儒”当作秦始皇和法家的一大罪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远的不说，近代从资产阶级买办学者胡适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大劫”。对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焚书坑儒”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几百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儒家原来对秦国是看不上眼的。春秋时期的秦国，还被看作“夷翟”之邦，儒家势力在秦国是比较薄弱的。“孔子西行不到秦”[24]。这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言人，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为挽救腐朽的奴隶主专政而奔走呼号，但恰恰就是忽略了以后统一中国的秦国，真

是悔之莫及矣！直到荀子入秦时，还说秦国"无儒"[25]。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儒家开始进入秦国。特别是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徕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生，编了一部《吕氏春秋》，打着"杂家"招牌，大肆宣扬儒家思想，企图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来改造即将建成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失去了原有靠山的儒生源源涌入秦国。秦王朝建立之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这样，儒家势力就在秦王朝内部迅速膨胀起来了。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秦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以儒家为代表的旧势力还十分顽强，并利用他们霸占的这个世袭领地，大量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企图颠覆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即表现为法家与儒家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是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这是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国家政权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26]，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但是，被推翻的奴隶主贵族坚决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们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就曾建议恢复分封制。法家著名代表李斯驳斥了这种开倒车的反动主张，指出只有郡县制才是巩固封建王朝的"安宁之术"[27]，如果恢复分封制，就必然要重新导致诸侯"相攻击如仇雠"[28]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29]，分封制是分裂和内战的根源，坚决否定了分封制，坚持了郡县制。

但是，奴隶主贵族不甘罢休，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秦始皇三十四年，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坚持孔学的一派儒生叫嚣："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30]，要求复辟殷周的分封制。李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是对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重威胁。他严厉驳斥了"师古"的主张，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三代之事，何足法也？"[31]他还进一步指出："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32]鉴于儒家打着"私学"的幌子，结成死党，在街头巷尾造谣生事，因此李斯提出了"焚书"和禁止"私学"的建议，要求剥夺儒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使天下无以古非今"[33]。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禁止儒家"私学"，实行"焚书"，是对坚持孔子思想的一派儒生的一次沉重打击。但是，他们仍没有停止复辟活动。以卢生、侯生为代表的儒生，竭力诽谤"法治"是"专任狱吏"[34]，攻击中央集权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35]，咒骂秦始皇勤于政事是"贪于权势"[36]，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迫使秦始皇对这些"诵法孔子"[37]的儒生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亲自选择了"以古非今"情节最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把他们"坑之咸阳"。这就是所谓"坑儒"事件。

"焚书坑儒"事件，是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上对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在此以前，商鞅为了巩固变法的成果，就曾提出过"燔诗书而明法令"[38]的主张。以后，有一些关于周代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古代文献，各国"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39]，也被烧掉了。但是，秦始皇以前的国王，都未能象李斯那样了解儒家反动思想的危害性，没有采取坚决镇压的有效

措施。可见，新兴地主阶级实行"焚书坑儒"的措施，是总结了秦王朝建立前后政治思想领域内两个阶级的斗争的经验才逐步认识到的。

"焚书坑儒"事件的爆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那些顽固坚持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的儒生，对新的封建政权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如果不坚决打击企图复辟的儒家，就不能巩固新兴地主阶级的经济地位和国家政权。鲁迅曾经深刻地指出："不错，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但他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他收罗许多别国的'客卿'，并不专重'秦的思想'，倒是博采各种的思想的。"（《华德焚书异同论》）秦始皇所坑的，只是儒生中少数复辟党，同时，书也没有烧光。然而，"焚书坑儒"这个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革命行动，到了一千八百多年后的明朝，还"直使儒生至今犹害怕"[40]。如果历史上的一次革命行动，能够在几百几千年后还使那些反革命死硬派胆战心惊，岂不令人痛快，岂不是一件大好事！须知，阶级斗争从来是不讲什么仁慈的。倘若让儒家的复辟阴谋得逞，奴隶主卷土重来，他们对法家的镇压，将会比"焚书坑儒"不知残酷多少倍。吴起被乱箭射死，还灭了族；商鞅车裂，全家被杀。这样血淋淋的阶级报复，为什么偏偏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呢？

秦始皇"焚书坑儒"，击溃了儒家的复辟活动，坚持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制度，在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这一点，连封建时代的进步思想家也看到了。唐代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就鲜明地肯定了法家的进步性，肯定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度，认为历史不能倒退，奴隶社会的旧制度不能复辟。他说："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秦始皇死了，秦的制度却存在着。明代王夫之也指出："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41]郡县制施行了将近二千年而不能改变，如果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难道能够这样长期存在着吗？当然，封建割据势力总是力图恢复或部分实行分封制的，但其结果无不造成了分裂和混乱，阻碍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历史证明了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法家同儒家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斗争表明，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一旦建立起来以后，尽管道路是曲折的，可能会出现暂时的倒退、局部的复辟，但它终究会取得胜利的，在更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它以前，谁也没有力量把它消灭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尊儒反法思潮说明了什么？

法家为建立地主阶级政权作出了贡献。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它自己却经常处于被排斥被咒骂的地位。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也有类似情况。罗伯斯庇尔为代表的雅各宾派，是为法国资产阶级统治打下基础的，但后来资产阶级中许多人都骂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残暴"、"恐怖"。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汉袭秦制"。秦以后，地主阶级的历代统治，都是建立在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专政的基础上的。他们实际上都是采用了法家学说中主张中央集权制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内容，可是又都要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痛骂法家，吹捧孔孟。汉武帝时，根据董仲舒的意见，封建王朝正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同时又"以法制驭下"。当汉元帝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向他的父亲汉宣帝建议"宜用儒生"，汉宣帝就骂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2]

封建统治阶级打出尊儒反法的旗号来代替尊法反儒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法家主要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汉代以后，经过吴楚七国之乱，奴隶制复辟的

严重时刻过去了。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基本矛盾日益加深。陈胜、吴广起义显示了农民的力量，使地主阶级深为震撼。地主阶级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不再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了。它所面临的任务，已经不是进行社会变革，而是全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主张变革的法家思想，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地主阶级政治的需要，而儒家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体系，却同日趋没落的地主阶级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通之处。更重要的是，法家比较暴露、赤裸裸地主张地主阶级专政。阶级面目很鲜明，而儒家比较虚伪，更利于地主阶级进行思想上的欺骗宣传。儒家那套反对任何社会变革，劝人安分守已的反动哲学，只要稍加改造，就可以用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作辨护。就这样，地主阶级打起了尊儒反法的旗帜，转而采用儒家学说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

但是，地主阶级内部尊儒反法与尊法反儒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自汉武帝以后，日益没落的封建阶级的思想代表，如董仲舒、朱熹、王阳明、曾国藩等，都是尊儒反法的。而地主阶级中主张搞一些革新的人物，如曹操、柳宗元、王安石、李贽、王夫之等人，却是肯定法家，肯定秦始皇的。曹操为了消灭东汉末年封建军阀割据造成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曾积极主张实行“法治”。他崇尚刑名，立法很严，公开宣称：“吾在军中持法是也”[43]。王安石为了实行变法，也吸收了法家的变革思想。他强调指出：“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44]李贽赞扬秦始皇完成了全国的统一，是“千古一帝”[45]。所有这些，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守旧和革新的斗争的反映。

在近代历史上，太平天国用革命的实践打击了尊孔思想，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孔运动。洪秀全砸掉了孔子的牌位，把孔子列为“妖魔”之一，说“孔丘教人之书多错”[46]。这个革命行动，吓得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曾国藩恐惧万状，惊呼道：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47]。这场反孔和尊孔的激烈斗争，是革命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生死斗争的反映。

尊儒反法问题对于资产阶级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在驳斥康有为攻击法家“焚书坑儒”的谬论时，指出清朝统治者“尊事孔子，奉行儒术”，是为了“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48]。他宣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49]，并为法家辨护说：“世徒见鞅初政之酷烈，而不考其后之成效。”[50]他在不少论文中肯定了法家，肯定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指出“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51]。但是，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章太炎的思想也明显地倒退了，最后走上了“尊孔读经”的道路。至于胡适，由于他所代表的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性，早在五四时期就是一个尊儒反法派。胡适吹捧孔子是“气象阔大的人物”[52]。说他栖栖皇皇到处奔走，是为了使天下由“无道变成有道”[53]，并大肆攻击法家“阚成焚书坑儒的大劫”[54]，为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效劳。

历史证明，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才能彻底批判尊儒反法的反动思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青年运动的方向》等光辉著作，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反动的孔学。毛主席明确地指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半封建的文化是要打倒的反动文化，“**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以后，毛主席又深刻地指出：“**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写下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一系列的讨孔檄文，打击了形形色色的尊孔派。他针对攻击“焚书坑儒”的反动观点指出：“秦始皇实在冤枉得很，他的吃亏是在二世而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华德焚书异同论》），揭露了尊儒反法思潮的反动实质。

在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要不要批判尊儒反法思潮，也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

容。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共分子陈伯达之流就把孔子吹捧成"宇宙间之伟人"[55]，叫嚣要继承孔孟的"可贵历史传统"[56]，妄图阻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建国以后，他们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尊儒反法思潮。叛徒刘少奇曾亲自到曲阜向孔子"朝圣"，并再次抛出贩卖孔孟之道的黑《修养》，直接导演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尊孔丑剧。卖国贼林彪也吹捧孔子，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公然标榜要学朱熹的"待人"哲学。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专门著作和论文，大肆鼓吹尊儒反法思潮，竭力吹捧儒家，诋毁法家，攻击秦始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热衷于吹捧孔子这个古代反动派，目的是为了支持刘少奇、林彪那样的现代中国的孔子。他们企图从古代反动派那里寻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武器，请出历史的亡灵来为他们的反革命复辟和颠覆阴谋服务。

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潮，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深入开展这场斗争，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更好地进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有助于我们识别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家、野心家是怎样利用古代反动派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有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注：

(1) 《论语·季氏》

(2) 《论语·尧曰》

(3) 《论语·阳货》

(4) 《论语·颜渊》

(5) 《左传·鲁成公十三年》

(6) 《国语·鲁语上》

(7) 《论语·颜渊》

(8) 《左传·鲁隐公十一年》

(9) 《左传·鲁庄公二十三年》

(10) 《左传·鲁昭公二十五年》

(11) 《论语·颜渊》

(12) 《论语·子路》

(13) 《论语·雍也》

(14)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15)(16)(17)(18) 《史记·商君列传》

(19) 《史记·秦本纪》

(20) 《盐铁论·论儒》

(21) 《孟子·离楼上》

(22) 《孟子·滕文公上》

(23) 《韩非子·奸劫弑臣》

(24) 韩愈：《古鼓歌》

(25) 《荀子·强国》

(26)(27)(28)(29)(30)(31) 《史记·秦始皇本纪》

(32)(33) 《史记·李斯列传》

(34)(35)(36)(37) 《史记·秦始皇本纪》

(38) 《韩非子·和氏》

(39) 《孟子·万章下》
(40) 李贽:《藏书·秦始皇帝》
(41) 王夫之:《读通鉴论·秦始皇》
(42) 《汉书·元帝纪》
(43) 曹操:《遗令》
(44) 王安石:诗《商鞅》
(45) 李贽:《藏书·卷二目录》
(46) 《太平天日》
(47) 曾国藩:《讨粤匪檄》
(48)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49) 章太炎:《演说录》(《民报》第六号)
(50) 章太炎:《馗书·商鞅》
(51) 章太炎:《秦献记》
(52)(53)(5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55) 陈伯达:《原意志》
(56)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原载《红旗》杂志1973年第10期)

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一日)

劲 云 戈

孔子死去已经有二千四百多年了。但是,历代反动派、北洋军阀、蒋介石反动派,都捧他为"圣人"。党内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尊孔的。五四运动时期曾经批判过尊孔思想的陈独秀,当他搞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以后,就叫嚣要"重新评定"孔子的"价值"、说什么孔子的"价值"在于"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吹捧孔孟是"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瞿秋白曾经搞过"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当他向蒋介石屈膝投降写《多余的话》时,就承认他自己"很懂得孔夫子忠恕之道",有"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王明、刘少奇都是尊孔的。彭德怀也不绝口地宣扬孔子的"忠恕之道"。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野心家、阴谋家,在背地里装模作样地谈论"忠恕"和"仁义",甚至在阴谋炮制反革命政变计划时也不忘写上一句"不成功便成仁"。他们是信古好古、装潢门面吗?不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是"**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他们抬出孔子的亡灵,借用孔子的名字、口号、语言和服装,是为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服务的。

孔子是没落的贵族奴隶主的后代,生活在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春秋末期。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和实践,是为了阻止奴隶制度的崩溃和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

治，妄图把社会拉向后退。现在我们正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并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动我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国革命，竭力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妄图把当代的中国社会拉向后退。因此，他们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就是很自然的了。

（一）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目标就是"复礼"。他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所谓"复礼"，就是要恢复西周贵族奴隶主阶级统治的一套政治制度和秩序。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已经出现以后，孔子以复辟西周贵族奴隶制度为自己的政治纲领，这无疑是反动的。孔子施行"仁"的方法是"忠恕"，而"仁"的标准和限度则是"中庸"。所谓"忠恕"，孔子曾简单地解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所谓"中庸"，就是不要"过"和"不及"。孔子对"仁"，还有"爱人"、"泛爱众"等欺骗性解释，来掩盖其爱奴隶主贵族的阶级本质。孔子的这些反动论调，适应了隐藏在我们党内的历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需要，被他们吸收和发挥为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他们用以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方面，王明是突出的一个。

叛徒、卖国贼王明，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是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又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对孔子思想不进行阶级分析，反而跟在蒋介石屁股后边宣扬"孔孟之道"是什么"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他胡说孔子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民族自卫战争中发扬为真正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种用剥削阶级的思想、传统、道德来冒充全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正是孔子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的反动伎俩。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掩盖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和搞阶级调和，在政治上必然走上投降主义道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王明竭力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反对划分左、中、右，混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阶级界限，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回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去。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彭德怀，很懂得王明这一套的来路，他在抗日战争的漫天烽火中，却跳出来大讲孔子的"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彭德怀鼓吹这一套，就是不准中国人民起来反抗日本侵略者，不准革命人民起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奉苏修主子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华旨意，配合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活动，又重新祭起"尊孔"的破旗。他恶毒咒骂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的"焚书坑儒"的革命行动，充分表现了他仇恨一切进步措施的反动立场。

（二）

孔子是春秋战国时期唯心论的先验论者。孔子要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反动统治，主张

从"克己"做起，即要奴隶主们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多少克制一下自己的欲望和行为。他又很相信"天命"，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天"赋予的。因此，孔子和他的学派特别强调"修养"和内省的工夫，即所谓"慎独"。他们要人们不去接触外界，只要关门修养就能使人从心灵深处体验出"天"所赋予的先验的知识和德性。这完全是唯心论的先验论的一套。为了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以适应地主资产阶级阻止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叛徒刘少奇把孔子及其学派的"修养"，搬到共产党内来。

刘少奇也是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早年被捕叛变，捧着反动军阀赏赐给他的"四书"，从敌人狗洞里钻出来又重新混进党内。他早就是一个尊孔派。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鼓吹说："孔子思想在当时是反映了社会前进的倾向和要求的，到今天还有其合理的因素"，"对我们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就有用"，"应该充分利用它"。刘少奇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把反动说成"进步"。他所指的所谓"合理因素"和"有用"的部分，并且要加以"利用"的，就是孔子及其学派的唯心主义的"修养"。一九三九年第一次出版的黑《修养》，就是刘少奇利用孔子思想破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杰作"。在这本黑书里，刘少奇根本不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谈如何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不谈武装夺取政权，而是大量引用孔子及其门徒关于"修养"方面的话，号召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向这些复辟奴隶制度的"圣贤"学习唯心主义的"修养"经。他要求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讲孔子的"忠恕之道"，要"'将心比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体贴人家，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忍受各种屈辱与虐待而无'怨恨之心'"。在刘少奇看来："逆来顺受"才算得上实行了孔子的"忠恕之道"，才算有了"修养"。在黑《修养》中，刘少奇妄图利用孔子思想，按照他自己对待敌人屈膝投降的叛徒面貌，来改造我们的党员。他妄想否定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所深刻阐明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毛主席所培育的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改造成为实行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的机会主义政党，从而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奇又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主张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要把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发展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统统交给国民党，实行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刘少奇要我们放弃武装斗争，就是妄图把我们党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那样只进行"议会"斗争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党，把我们的党员改造成象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人那样的不搞革命战争、不要武装夺取政权的"议会迷"。

一九四九年，我国无产阶级政权即将在全国建立的时候，刘少奇又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一九六二年，我国处于暂时经济困难特别需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刘少奇再一次修改出版了他的黑《修养》。在这两个版本里，刘少奇继续发挥其尊孔思想，而在谈到社会主义时期的政权和为将来的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问题时，却连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也没有用。在引用列宁论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两段语录中，刘少奇也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字样及有关对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论述，都有意地删去了。对照他的另一些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行，其反对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用心，就一目了然。一九六二年，在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下，召开了一次疯狂吹捧孔子的黑会，竭力煽起尊孔的黑风。刘少奇在天津对共产党员和广大工人群众说，"要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他还要革命人民"要有很大的气量去容忍一切无理的事情，不要斤斤在意气上计较"。这实质上就是不许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否则就是什么没有"气量"啦，什么在"意气上计较"啦，就

是没有象孔夫子那样讲"恕道"了。总之，刘少奇就是要对地主资产阶级实行孔子的所谓"仁政"、彻底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黑《修养》的要害。

孔子有抹煞阶级矛盾和否认阶级斗争的"忠恕之道"，刘少奇就有"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党内和平论"；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张，刘少奇就有"驯服工具论"和"群众落后论"；孔子有"学而优则仕"的谬论，刘少奇就有"入党做官论"和"公私溶化论"。

很难怪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刘少奇在他的黑《修养》中"杰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为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任务"。刘少奇就是妄图利用孔子思想腐蚀和毒害我们的党员，使我们党员越"养"越"修"，使我们马列主义党"和平演变"为修正主义党、法西斯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从而使整个党和国家都改变颜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建党路线和黑《修养》，批判了孔子的反动思想影响，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沉重打击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在中国搞"和平演变"的罪恶企图。

(三)

孔子言必称周公、文王，说他们是天生的"圣人"，是"生而知之"的特殊天才，非常崇拜他们。至于他自己，有时虽然也说是"学而知之"者，但实际上他标榜自己也是象周公、文王那样的"天才"。他说："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 孔子梦想把当时社会拉回到西周天子的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中去，造成他所谓的"天下有道"的政治局面，"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政不在大夫"，"庶人不议"。(《论语·季氏》) 这就是要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承天命的奴隶主贵族的总头目手中。他又特别强调贵族奴隶主的等级制度，严格划分治人的"君子"和治于人的"小人"、"上知"和"下愚"的界限。为了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即复辟西周贵族奴隶主的统治，孔子大力培养和训练了一批维护奴隶制度的人，形成一个以复辟奴隶制度为宗旨的学派或集团，并亲自率领他们周游列国，到处兜售他的反动政治主张，寻找一个可以把它付诸实践的机会，甚至支持并准备亲自参加被他视为有利于复辟奴隶制度和打击新兴地主势力的地方叛乱。由于孔子这种对抗社会发展规律的反动行径，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只能到处碰壁。当时就有人批判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但是，孔子的这些反动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实践，后来被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地主阶级吸收和发展为封建帝王的"天人合一"、"王权天授"的反动政治理论。

林彪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也是尊孔派。他吹捧孔子的反动政治思想，首先表现在他疯狂地咒骂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正义措施，而为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派辩护。林彪鼓吹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动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是来自孔子的"生而知之"、"唯上知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谬论。林彪混进革命队伍以后，顽固地坚持剥削阶级世界观，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欺骗人民。当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林彪同刘少奇一样，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为帝、修、反和地、富、反、坏、右效劳，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他在背地里攻击我们对被赶下台的反动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讲"忠恕"、是"做绝了"。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驳斥主张对敌人施"仁政"的孔孟之徒时指出："**'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

政。”我们坚持了毛主席这一条原则，才保证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林彪的咒骂，只是暴露出他自己是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代理人。

林彪继承了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衣钵，大力宣扬从周朝以来的几千年的政变史，蓄谋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方法，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建立一个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林彪按照孔子唯心论的先验论，把他自己和他的儿子，打扮成什么“超天才”。他和他的死党利用各种形式“大树特树”林家父子的“绝对权威”，为建立林家父子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大造反革命舆论。林彪还网罗了一小撮反革命死党，结成一个阴谋集团，并建立武装特务组织。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在林彪的指使下，这一小撮反革命死党又炮制了一个《“571 工程”纪要》，精心策划了一个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的反革命武装政变。但是，林彪同历史上一切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一样，在人民群众中极其孤立，因而他们的阴谋计划必然遭到彻底失败。他们叫喊“不成功便成仁”，实际上是夜过坟场吹口哨，给自己几个死党壮胆，作垂死的挣扎罢了。林彪反党集团永远也“成”不了“仁”，请出孔子的亡灵和主义，也无法挽救他们彻底败亡的命运，就因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子的倒行逆施一样，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

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在我们党内企图借用孔子的亡灵来达到破坏中国革命和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更加清楚地说明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复杂性。我们坚决响应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在批林整风运动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 1973 年第 11 期）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人民日报》编者按：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发表了红小兵黄帅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并加了按语。现转载如下，供同志们学习、研究。

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象她这样的青少年，在我国何止成千上万。

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我们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对教育战线的干部、革命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深入的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同时要认真总结教育革命的经验，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不移地实践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各项政策，使青少年们更加朝气蓬勃地成长起来。

《北京日报》编者按：我们热情地向读者推荐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红小兵黄帅同学（女）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这个十二岁的小学

生以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提出了教育革命中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在教育路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还远没有肃清，旧的传统观念还是很顽强的。

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黄帅同学提出的问题虽然直接涉及到的主要是"师道尊严"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继续努力作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革命的教师和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团结起来，共同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我们希望大家都要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而反对那种促退派；要当动力，而不要成为阻力，更不要站在运动的对立面。毛主席教导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有了许许多多象黄帅这样的积极分子，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大有希望。学校的领导和革命的教师、包括在教育革命中有一些缺点或者犯有一些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都应当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坚决支持教育革命中出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热情地欢迎和支持这些可爱的革命小将，帮助他们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我们要认真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用党的基本路线武装头脑，深入批林整风，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提高路线斗争觉悟的基础上，总结工作，搞好教育战线的斗、批、改。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在斗争中，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分正确与错误。要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在教育革命中，还要注意维护按照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的教学制度、纪律和秩序。希望大、中、小学的干部、教师和同学们把在这一斗争中的经验、体会，以及对于各种错误观点、错误倾向的批判文章写给我们，以便在报纸上开展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从而推动教育革命的发展。

来　信

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学生。九月听了红卫兵节目报道的兰州十四中学红卫兵帮助老师的事迹，受到启发，随后我给老师写了三篇日记提意见。顿时，师生的关系紧张起来，老师批判我"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意攻击老师"。我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星期班上可热闹了，老师上课的主要任务就是鼓动同学训斥我，我去上课就是准备挨整。老师拍桌瞪眼在班里说："直到现在，我还是公开号召同学们和黄帅划清界限"、"跟黄帅一起跑的人立场站错了"。班里还出了板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平时每日换一期，这篇板报老师宣布登一星期，并对板报组表示"感谢"。最近，班里同学在老师的率领下，不断对我嘲笑讽刺，大轰大哄地进行围攻，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

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毛主席，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也表示了日记中是有缺点的，如个别用词不当影响了老师的尊严，可是近两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嚎声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

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

奴役下的奴隶吗?

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二班学生　黄帅

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日　记　摘　抄

一九七三年九月五日

今天，我班的×××同学犯了错误，当老师问他情况时，他带理不理，不象承认错误的样子。我看他那样，无意识的笑了一笑。老师把我叫起来，批评我不该笑。这点我虚心接受，一定改正。但是老师说:“有同学反映你和×××……，你内心非常爱听×××骂”。这句话我不能接受。我敢发誓：除了他骂我，我跟他顶嘴以外，我再也没有和他瞎逗过。今天的日记如果错了，请批评指正。

九月七日

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教鞭是让你来教学，而不是让你用来打同学脑袋的。我觉得你对同学严厉批评很多，耐心帮助较少，拍桌子，瞪眼睛，能解决思想问题吗？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象今天老师骂我装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椅子丢了，站着上课。算术老师把老师上课时坐的椅子借给×××坐，这种关心同学的精神值得我学习。第三堂课时，你不应该把椅子夺回来自己坐。

十月十三日

今天，××在课上向老师提了意见，老师说是我起的头，说我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同学应该正确接受老师批评，老师应该冷静考虑同学的意见。

十月十八日

今天，老师在全班又批判我。我对老师的意见有些是能够接受的，但不能接受的很多。如“黄帅你也真表帅，从小就表帅，太帅了”，这不是讽刺是什么？你还说:“黄帅从现在起不许打篮球”，……我感到这更是报复行为。

十月十九日

最近我是天天受老师和同学的训，以下就是老师对我批评中的语言:“听校外群众说：中

关村一小出了一个反潮流者、好家伙，这事儿都传到社会中去了”；“你在这次斗争中，当不了张铁生那样的人物”；“直到现在我还是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限”；“黄帅你这样折腾，也是没有好结果的”。

(原载1973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

〔附〕 揭穿一个政治骗局

——《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真相

《人民日报》编者按：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四人帮”控制下，加“编者按”转载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全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接着，又加“编者按”发表了小学生答复王亚卓同志的信，使提出正确意见的三位同志惨遭政治迫害。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们发表了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同志写的题为《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的文章，为这三位同志平了反，并在“编者按”中表示：我们要“彻底揭批‘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所犯的一切罪行，一笔一笔算清楚。”

最近，我们有机会看到这位小学生的全部日记，并向有关方面调查核实。调查结果证明，所谓《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完全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蓄意编造出来的，是一个政治骗局。

粉碎“四人帮”后，小学生事件拖了近二十个月，现在总算基本上弄清楚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它再次说明欺骗是不能持久的，谎言是掩盖不住的，一桩桩，一件件，到头来都会水落石出。

(一)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教育战线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使各级各类学校遭到巨大的破坏。《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就是一个突出的反革命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人民日报》是有帐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指使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转载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刊登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以及《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人民日报》在自己的按语中，吹捧这个小学生“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生动地反映出毛泽东思想哺育的新一代的革命精神面貌”。姚文元还指令《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这个材料时，配一个中关村一小“形势大好”的“简短新闻”，从另一个侧面来肯定小学生的信和日记。“四人帮”在北京的那个女黑干将在这个新闻中加上了“要看到资产阶级右倾势力的危险性，要向他们应战”一句，公开表明了“四人帮”炮制这个黑典型，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罪恶目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后，“四人帮”就开动他们手中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把一个十二岁的五年级小学生，吹捧成“可爱的革命小将”、“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树起了这样一个“革命小将”，便立即在教育战线掀起大批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所谓“师道尊严”的恶浪。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刚刚恢复教学秩序的学校，又被糟踏得不成样

子。就拿北京为例，短短几个月内，仅学校的玻璃，就被砸碎二十多万平方米；好的校风、学风遭到极大的破坏。广大干部、群众、家长，无不对此痛心疾首，而"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却得意洋洋，称赞这"是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抗"，是对"师道尊严"的"惩罚"，夸奖小将"造反精神""可爱极了"。事实充分说明，《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大批"师道尊严"，大树"反潮流"人物，是"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组成部分。这一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查，彻底批判。

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战线的广大师生、干部，一直强烈要求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罪行。最近，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一个署名"钟诚"的教师给大会写信，对长期不认真揭批"四人帮"炮制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事件，义正辞严地提出了批评，反映了教育战线广大干部和师生的呼声。为此，我们进行了一些调查。大量事实证明，所谓"不能完全否定'师道尊严'存在"、"日记确是小学生本人所写，内容已经查证落实"云云，完全是欺人之谈。现在，我们向广大读者披露"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真相，以便进一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

(二)

五年前，《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日报》发表的前夕，当着有人跑来跑去"调查"的时候，中关村一小的同志曾气愤地指出："这完全是一出戏"。事实正是这样。

所谓小学生的"来信"，完全是在小学生家长的指令下制造出来的。也可以说，"小学生的来信"，实际是"小学生家长的来信"。请看事实：

小学生家长在"来信和日记摘抄"出笼前两个月，即一九七三年十月间，别有用心地进行了频繁的活动。

十月十六日，小学生家长到中关村一小找班主任谈话。这时正是那个小学生和班主任的矛盾比较"尖锐"的阶段。可是小学生家长在班主任面前，根本不提及那个小学生同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是问班里的同学对这个小学生有什么意见。同时，他背着班主任，向在校的同学们调查班主任是不是学校领导成员，是不是党员，并向同学们发泄他对班主任的不满。

十月十八日，小学生家长给中关村一小党支部和班主任老师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信。说什么"一个小学生在日记中说出自己对老师的意见，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不可想象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具有深远的意义"。他"写这封信也不是××一个孩子的教育问题，通过这件事的解剖，有许多问题是值得引起人们的研究"。

十月十九日，小学生家长又跑到海淀区教育局"反映情况"。他从那里听到了"师道尊严"这个词，但不解其义，回到本单位立即向一个同志询问"师道尊严"是什么意思。于是，在十月二十日的"小学生"日记上，"师道尊严"这个词就第一次出现了。

十月二十一日，用小学生署名的所谓反"师道尊严"的"来信"，便以"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这样一句上纲很高的话作结尾，一式几份，分别寄给《人民日报》、《北京日报》、《文汇报》、《北京少年》。

十二月十二日，《北京日报》于一版头条位置，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当时就引起人们的普遍怀疑：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这样带有严重政治性的信?熟悉小学生的老师也认为，象"来信"结尾那样的长句，小学生根本不会使用，背后肯定有人唆使，操纵和支持。果然，现在查明，小学生的"来信"，基本上就是小学生家长

给学校党支部和班主任那封长信的第五个自然段的内容，“来信”中最厉害的话，如说老师批评她“拆老师的台”，“打击老师威信”，“恶毒攻击老师”，她认为老师是“压制民主”，“打击报复”这些话，同家长的信一字不差。其他，如“班里还出了简报，点名批判我的日记。……甚至个别同学提出把我‘批倒批臭’的口号”一段话，也基本上同其家长信中的话一样，只是语言、人称上有些改动而已。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被“四人帮”树为“反潮流英雄”的小学生“来信”的真相。

(三)

小学生的“来信”为伪造的，那么，为“来信”提供根据的“日记摘抄”，又是怎样一回事呢？

最初，用小学生署名向几家报刊寄出那封信时，并没有日记。见报时才增加了“日记摘抄”。我们看了这个小学生一九七三年的全部日记，经过对比分析，不难看出，“日记摘抄”同样是为了迷惑视听而歪曲、编造出来的。

小学生的日记从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十一月五日止，共一百四十篇。九月四日以前的所有日记中，没有任何一处反映出师生之间有对立。相反，倒是几次提到班主任对她的帮助和教育。例如，小学生在六月九日的日记中，记述了两个同学指出她不虚心，同学一给提意见，“就凳（瞪）眼睛”，“老师批评时也不服气，由（尤）其当上红小兵以来很严重”。这是“说明我当上红小兵以后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六月二十一日的日记，详细记述了她对班主任严格要求学生的认识。这天全班小学生参加修篱笆。班主任看见他们修得不合要求，让拆了重修。这个小学生写道：“这时我才意识篱笆修得是很不好，左看右看不合式（适），老师说得对，老师这种认真精神值得我学习”。班主任也在这个小学生的日记上写过一些评语，如“写得认真”，“希望为革命努力学好外语”等，给予鼓励。事实表明，这里记述的是尊师爱生的关系，哪有什么“师道尊严”可言。

再看小学生反映和班主任闹矛盾的日记，即九月五、六、七、二十八日，十月一、十三、十六、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九日的十一篇日记，这该是“师道尊严”的真凭实据了吧！但是，许多事实又都是小学生自己也否定了或基本修正了的。这十一篇中间，就有三篇是小学生检查自己的错误，或说明自己批评老师不当的。例如，九月六日的日记，是检查五日在课堂上当老师批评一个同学的错误时，自己表现不好的。又如，十月一日的日记，小学生分析和检查了三篇日记（“日记摘抄”中九月五、七、二十八日三篇）的缺点，说，“第一次提意见是因为一次老师批评我，我发现了一些语句不够确切。……第二篇日记我是全为帮助老师而写下的，……现在我认识到对老师有意见可以提，但又得保证有利于团结，我认识到我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今后一定改正。第三篇日记我是完全在情绪上写的，所以这篇日记写得很不好，今后一定改正。”十月二十九日小学生还在日记中总结检查了“最近两个月”自己和老师闹矛盾，“影响了老师工作，也影响了自己学习”，表示今后要和老师搞好团结。老师批评学生有“一些语句不够确切”，就是大搞“师道尊严”？小学生“在情绪上”对老师提了批评，就是敢于“反潮流”吗？当然不能。正因为如此，这些日记就在“摘抄”者的手中“落选”了。

但是，“日记摘抄”中，确实把“师道尊严”说得很严重，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见报的六篇“日记摘抄”，我们不一一说了，只看两个实例，事情就一目了然。例如，十月十九日的日

记、全文九百字，经过“摘抄”，用了一百四十字。小学生在这篇日记中集中记录了那段时间老师对她作的十多条批评，编者只“摘”了四条。老师严正向这个小学生指出的：“在这次斗争中，你反潮流反错了，你把老师当作反潮流的对象反，反错了。毛主席是提倡领导有一点缺点就反吗?”这些话被删去了；老师揭露小学生的父亲在后面捣鬼，制造师生对立的话，如“小学生对老师提意见过头了一点，只能说明小学生比较幼稚，这话不可能是你写的，是别人教你的”，也被删去了；老师旗帜鲜明地反对乱扣“师道尊严”大帽子的话，被删去了；老师告诫这个小学生对同学的一些错误，不应当“上纲到政治性错误”的话，也删去了。又如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记原来写着：“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你（指老师）提意见，说什么（我）老不承认错误，就抓住老师的一句话不放……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编者“摘抄”为：“今天，老师批评我不该给他提意见。对不起，以后我有意见，还是要提的”。经过这样“加工”的“日记摘抄”，老师被渲染成为“师道尊严”十足，连学生提点意见也不接受!

还需要指出的是，报纸上刊登的几篇日记本身，不全是当时的真实情况。本来这个小学生到五年级时还不是红小兵，这说明她确实有缺点。正是刚刚接手五年级的班主任，看到她的学习、纪律、劳动等方面都有进步，才把她发展为红小兵。这年下半年，班主任发现这个小学生由于受家长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参加劳动、遵守纪律、师生关系、同学关系等方面有明显的退步。老师出于关心，曾多次对这个小学生进行教育，这无疑是对的。即使老师的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一点，甚至有一些错误，学生提出意见，提出批评，这与“师道尊严”有什么相干呢！如果老师对学生进行这些批评和教育，就是“师道尊严”，那么，教师还要不要教育学生，要不要管学生，要不要指出学生的缺点、错误？教师对小学生只能说是，不能说不，还要教师干什么！

事实被歪曲了，是非被颠倒了，于是一个十二岁孩子被树成“反潮流英雄”、“可爱的革命小将”。“四人帮”那两个黑干将当时就吹捧小学生，说什么“一个很小的小学生提出了一个大问题”。从此，这个小学生就被吹捧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又是请她在报上写文章，大会作报告，又是上银幕，赴宴会。

“来信和日记摘抄”抛出以后，虽然人们普遍怀疑这个“典型”的真实性，但没有人认为是小孩子的责任。北京内燃机厂一位老工人当时就给小学生写信，要她“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是些什么玩艺？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我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严肃地指出此事是背后有人导演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看得更清楚了，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四人帮”。

欺骗不能持久，谎言终究掩盖不了事实，“四人帮”炮制《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的真相，终于被揭露出来了。这是一件大好事！其实，在这个事件中，小学生是无辜的，是受害者。现在彻底揭露“四人帮”炮制这个事件的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是为了消除“四人帮”给小学生造成的压力，并使小学生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在“四害”横行的时候，《人民日报》转载了“来信和日记摘抄”，欺骗了广大读者，起了极恶劣的作用。我们决心和广大师生、干部一起，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一罪行，彻底肃清其流毒。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 1978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

元 旦 献 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四年元旦社论

战斗的一九七三年过去了。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跨进了一九七四年。

过去的一年，是我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战斗的一年。**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祖国大地欣欣向荣。

我们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掀起了学习十大文件，贯彻十大精神的热潮。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政治上、理论上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向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展开了新的进攻。教育战线出现了生气勃勃的革命景象。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文艺创作和演出活动广泛开展。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发展壮大。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茁壮成长。我们党更加朝气蓬勃，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我国人民意气风发，为革命大干苦干，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二年增长百分之八以上。农业连续十二年丰收。粮、棉、麻、糖、烟的产量达到了新的水平。工业生产大幅度增长。钢、钢材、有色金属、原油、电力、木材、机械等重工业产品、棉纱、棉布、化学纤维等轻工业产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支农产品，都完成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基本建设取得了新的成就。交通运输日益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对外经济交通进一步扩大。人民币的信誉越来越高。科学技术获得了新的成果。

国际上同样是一片大好形势。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世界局势的发展，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对国际形势所作的一系列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过去的一年，苏修美帝争夺世界霸权愈演愈烈，整个世界很不安宁。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扩张各自的势力范围和争夺中东石油，搞得剑拔弩张，促使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更加激化，加深了世界大动荡的局面。苏修散布的所谓国际局势“和缓”的谎言，已为无情的事实所粉碎。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世界人民日益觉醒，阔步前进。越南和老挝人民抗美救国战争赢得了重大胜利。柬埔寨爱国军民战果辉煌。朝鲜人民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的事业取得新的成就。阿拉伯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抗击以色列侵略者的战争，冲破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在中东制造的“不战不和”的局面，对亚非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产生积极的影响。第三世界更加壮大，更加团结，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衰败没落、危机重重。美帝国主义内外交困，日子很不好过。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声东击西，野心很大，力量不够，它到处伸手，到处碰壁，面目更加暴露。它在世界上已经是声名狼藉，处境越来越孤立。

过去的一年，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新的胜利。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

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战斗团结日益加强。我国已同九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往来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锻炼了群众，教育了干部，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们各项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前进。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说明这场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我们一定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继续贯彻十大精神，抓紧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发展大好形势，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林彪路线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个反党集团的斗争，都是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批判修正主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林彪这个反面教员，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要重温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吸取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在批林整风中，要认真看书学习。要坚持学好中央规定的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继续办好工农兵干部的学习班。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都是我们应当反复学习的。还要努力读一点历史和小说。马列主义弄通了，路线才能搞对头，才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坚持反潮流这个马列主义的原则，识别和抵制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潮。

要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战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任务。毛主席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我们要善于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指导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满腔热情地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搞好斗、批、改，把教育卫生革命、文艺革命等进行到底。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要继续执行党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

今年是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关键性的一年，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毛主席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下去。这样，我们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国工农业增产的潜力很大，只要我们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关心群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因素，就一定能够使国民经济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要以各项工作的优异成绩来迎接四届人大的召开。

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委要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大事要多讨论，讨论才能引起大家注意。大事不讨论，埋头于小事，这样很危险，势必要搞修正主义。我们要深刻领会十大文件强调抓大事的重要意义，提高抓大事的自觉性。各级领导机构都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认真注意培养革命接班人。要实行民主集中制，经常听取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坚持真理，纠正错误。要加强调查研究，分析各阶级的状况，抓好典型。共产党员要执行党的纪律和党章的各项规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认真纠正"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要把毛主席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真正落实到各个基层。

毛主席缔造和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军队。人民解放军要继续学习和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从政治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加强建设，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训练，严格要求，不断提高战斗力。要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加强民兵建设，特别是城市和边疆民兵的建设，坚决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和解放台湾。解放台湾是包括台湾省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神圣义务。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取得更大的胜利。让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完成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四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附〕　清华大学党委作出关于“反右倾回潮运动”问题的决议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清华大学党委对"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于一九七三年十月至一九七四年一月在清华大学发动的一次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即"三个月运动"），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并于最近作出了关于"反右倾回潮运动"问题的决议，受到了全校师生员工热烈拥护。

现已查明：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一伙打着"反击右倾复辟势力"、"反击修正主义回潮"的旗号搞的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是一个反革命政治阴谋，是他们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极右路线、阴谋篡党夺权的产物。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把反革命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敬爱的周总理，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对广大革命干部和教职工在政治上进行打击和迫害。"运动"中全校共有六十四人受到立案审查和重点批判，受到批判的达四百零三人，受到点名指责或被迫作检查交代的人为数更多，一批干部被无理撤销工作。这个"运动"严重地破坏了党的十大路线，干扰了批林整风运动和毛主席、周总理的各项指示的贯彻执行，破坏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搅乱了阶级阵线，践踏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严重地打击了教职员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搞乱了教学、科研等各方面的工作，流毒甚广，影响极为恶劣。

清华大学党委认为，"反右倾回潮运动"是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严重罪行，应该完全予以否定。当时有些同志迫于形势，说了错话，办了错事，应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丢掉包袱，轻装上阵。

党委号召全校师生员工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紧密团结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及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一伙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揭发控诉他们炮制“反右倾回潮运动”的反革命罪行。

为此，校党委作出以下决议：凡因“反右倾回潮运动”被打成“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和定为敌我矛盾的，都属于错案、冤案，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受打击迫害，立案审查的，应予销案；停止党组织生活的，应予恢复；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对教育革命”、“裴多菲俱乐部”等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的，一律推倒。被无理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同志，应安排适当的工作。“运动”中的揭发材料和本人被迫检查交代的材料，予以销毁。查抄的个人笔记本、信件等，进行清理，退还本人。凡属“运动”以前的问题，或与“反右倾回潮运动”无关的问题，虽在“运动”期间立案审查或定案处理的，不属于上述平反范围。如本人提出申诉，可根据党的政策，进行复查。

校党委这一决议公布以后，在全体师生员工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欢欣鼓舞，激动万分。他们说，这个案翻得好，真是大快人心。大家决心在校党委领导下，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夺取抓纲治校的新胜利。

（本报通讯员）

（原载1977年12月14日《北京日报》）

既要讲批评 又要讲谅解

——空军某部航修厂党委搞好革命团结的体会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

空军某部航修厂党委成员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中，正确理解和处理批评与谅解的关系，增强了“一班人”的革命团结，做到了“**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以前他们开展党内批评，有时“鸡毛蒜皮”的小事也争论个你是我非。结果不但是非“断”不清，还使党委成员之间产生隔阂。怎样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从正副书记处理工作上相互“撞车”的事受到很好的教育。一次，领导共同商定第二天全厂收土豆，可是早起一看，天阴云浓，很可能有雨。副书记李维藩怕冒雨收获把土豆弄坏了，便通知大家等下雨之后再收。书记曲甫听说改变了原定计划，心里非常着急，他怕已经割掉秧子的土豆遇了阴雨天会烂在地里，也没问是谁作的决定，就通知大家马上出发，趁下雨之前抓紧抢收。李维藩知道了这个情况，开始感到下不了台，转念一想，曲甫虽然没有商量就否定了自己的意见，但他是从工作出发的，考虑得也比自己周到。他用毛主席关于“**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的教导要求自己，不去计较个人的面子，立即协助书记组织抢收。这件事使曲甫很受感动。事后，他主动检查了自己的急躁情绪，正副书记之间更加信赖了。

党委成员结合这件事学习毛主席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主席在第二条中先讲了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接着又强调“**还要能互相谅解**”。大家联系实际悟出了这样一个道

理：批评与谅解是相辅相成的，讲批评能做到思想上的统一，讲谅解又能避免无原则纠纷，要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

从此，他们在实际中注意处理好批评与谅解的关系。去年以来，到地方支左的干部回到部队，领导班子人数增多了。书记曲甫想，这么个大的班子能合拢在一起很不容易。因此，强调相互谅解多，强调开展批评少。一段时间，有的同志由于看到航修厂领导班子人多，产生了临时观念。开始，曲甫想：这点思想问题不算啥，只要大家不争不吵不闹矛盾就行了。但事与愿违，由于有临时观念，心就想不到一起，劲就用不到一块。曲甫想：批评与谅解不能搞片面、走极端，谅解不是对原则问题迁就姑息，而是对非原则问题不计较，批评也不是大小事一味指责，而是对事关路线的原则问题要批评。他就和其他成员一起研究了两条规矩：一是大事不含糊，坚持摆到桌面上来；二是小事不计较，提倡谦让。"临时观念"是个要不要继续革命的原则问题，事关路线，他们就多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高度分析这种思想的危害，从世界观上挖根源。使几个不大安心工作的同志觉悟提高了，努力做好党交给的工作。

处理好批评与谅解的关系，坚持做到出以公心是个重要问题。党委副书记于晓青原是航修厂的老厂长，从支左单位回来后，在原来的下级李维藩厂长领导下工作。他唯恐别人说自己有不服气的思想，开展批评很不大胆。后来他对这个"怕"字进行了认真解剖，看到在"怕"字后边，反映着自己缺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他端正了认识，决心既要当好革命的"配角"，又要出以公心，大胆批评。他发现两个一把手一度对小事抓的多，就主动找他们谈心，提出批评意见。两个同志认真检查了自己的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以后，积极抓大事，推动了全厂批林整风的深入发展。结合于晓青的实践，党委进一步总结了开展批评和相互谅解的经验。他们说，谅解不是勉强克制自己；批评不是发泄私愤，无论是只讲批评不讲谅解，还是只讲谅解不讲批评，都与考虑个人得失分不开。只有出以公心，才能坚持正确地处理批评与谅解，使"一班人"团结战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

（本报通讯员）

（原载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

〔附〕　这样介绍"体会"对吗？

——对《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的意见

《解放军报》编者按：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边牛乾一、胡兴培、罗志成、王凤山四同志，对本报一月十七日第三版《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的意见，写得很好。他们在原则是非问题面前，旗帜鲜明，表现了勇敢的反潮流精神。他们的批评是正确的。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我们发表这篇文章，在讲团结的时候，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歪曲了毛主席的教导，大讲谅解，貌似全面，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作这样的错误宣传，正如牛乾一等四同志所尖锐地指出的，是关

系到“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要搞折衷、调和、取消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的大问题，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

我们决心改正错误，总结经验，接受教训。我们诚恳地希望同志们继续提出批评，共同搞好《解放军报》的宣传，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

当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的时候，我们看了《解放军报》今年一月十七日登载的《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一文，觉得有些奇怪。

奇怪之一。元旦社论在谈到今年的战斗任务时，明确指出：“首先，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又指出：“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篇介绍某单位党委搞好团结的文章，却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的问题。它不讲党委如何在事关大局的两条战线斗争中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增强革命团结，而是宣扬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主要以讲谅解来达到所谓团结。这种“体会”与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批林批孔斗争是相符合的吗?!

奇怪之二。文章引用了毛主席的“**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还要能互相谅解**”这两句话，来强调谅解的重要性。文章特别点出，大家联系实际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批评与谅解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认为这段话的意思和毛主席讲的意思根本不一样。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这篇重要著作第二条中，首先讲的是：“**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然后讲的是党委成员之间“**还要能互相谅解**”。毛主席讲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是在“**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的前提下达到的。毛主席还在第十二条中特别强调地指出，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但《解放军报》这篇文章既不是真讲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揭露矛盾，进行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以解决矛盾，又不讲划清两种界限。它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大肆强调谅解，把批评和谅解说成是什么“相辅相成的”，还说什么“要搞好‘一班人’的团结，就要把两者结合起来”，甚至硬把这叫做搞好批林整风的经验。我们学习毛主席关于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的一系列指示，找不到批评与谅解相辅相成、两者结合的说法。在我们看来，“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样的“经验”，貌似全面，实则片面强调谅解，倒很象是折衷主义，很象是中庸之道。这不是对毛主席教导作正确的宣传，而是作了不能容忍的曲解。

奇怪之三。文章最后一段说：由于这个单位的党委用既讲批评又讲谅解这个方法，加强了团结，“推动了全厂批林整风的深入发展”，并结合实践，“党委进一步总结了开展批评和相互谅解的经验”。这更是莫名其妙！按照这个逻辑，岂不就是说，要使批林整风运动深入发展，就要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个法宝吗?!

搞好批林整风，搞好批林批孔，到底靠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深思的大问题。

毛主席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毛主席又说过，“**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我们批叛林彪和孔孟之道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对林彪反党集团绝不能施“仁政”，绝不能采取什么谅解。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和某些不正之风，我们当然要把它同解决敌我矛盾区别开来。但是，这里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决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去片面地强调谅解。因此，要继续深入搞好批林整风，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扬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充分发动群众，坚决向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向孔孟之道开火。要联系现实的

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革命，反对倒退，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忱地支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而决不能按照这种"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所谓深入批林整风的"体会"去做。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清楚吗？

还要指出，这篇"体会"是在当天《解放军报》第三版上发表的，版面安排的也很奇怪。左边小专栏的栏题是："共产党员不要爱吹不爱批"。小专栏右上方介绍的就是这篇"体会"，地位显著，标题醒目，处理的是很突出的。我们要问：介绍这样的"体会"是真要宣传"不要爱吹不爱批"呢，还是要宣传爱吹不爱批呢？

我们还要问：在全国展开批林批孔斗争的时候，这样来介绍"体会"是为了什么？是要批判中庸之道，还是要保护中庸之道？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推动批林批孔运动前进，还是磨灭工农兵斗争的锋芒，阻挡运动的发展？是要把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还是要搞折衷、调和，取消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为了搞好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我们愿意把这些意见摆出来，和大家一起搞清楚这个原则是非问题。

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某部六连
牛乾一　胡兴培　罗志成　王凤山
（原载1974年2月15日《解放军报》）

〔附〕　"四人帮"勒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事件真相

本　报　记　者

一九七四年初，亿万军民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而王张江姚"四人帮"却跳出来大搞"三箭齐发"，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叶副主席，把黑手伸向军队，妄图毁我长城，，以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

就在这个时候，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被"四人帮"强迫取消了编发自己稿件的权利，变相停刊了。从一九七四年三月中旬到同年九月初，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中央军委的重要喉舌被卡断了，我军广大指战员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要阵地被取消了。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完全是王张江姚"四人帮"有预谋、有组织地制造出来的。这是他们反军乱军、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还在批林批孔运动尚未开始之前，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七日，军报三版《党的生活》专版中，刊登了一篇不足一千五百字的短文，题目是《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这篇短文介绍了空军某厂党委，按照毛主席《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有关教导，搞好党委团结的经验。文章着重讲党委成员之间**"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还要能互相谅解"**。这篇文章，也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副主席一九七三年在空军一次党委会上讲话的精神。"四人帮"就从这篇短文开刀，大整军报。

一月二十八日晚在一次会议散会之后，"四人帮"单独把参加会议的某些新闻单位的几个

人留下来。白骨精江青首先叫嚷："要到《解放军报》去几个人，我气得很！"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张春桥跟着点出题目，具体布置说："《解放军报》一月十七日有篇文章，怪得很，你们可以写文章批评"。蜕化变质分子王洪文也煽动说："这篇文章很坏"。在他们密谋筹划之后、"四人帮"安插在某报的那个心腹，立即指派记者到一个连队去搞所谓座谈，要干部战士写批评信。本来时间早已过去半个来月，连队同志也没有留心这篇报道，他们却硬要人家重读，并引导"联系当前的批林批孔来找问题"，给连队同志定调子、划框框。当这个连队的几个同志起草了一封信，如实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应当按组织系统，把意见转给军报时，"四人帮"派去的人不但不准许，反而严令连队同志保密，不得泄露给任何人。

这封批评信被秘密送到"四人帮"那里，他们看后，觉得"份量不够"，干脆撇开连队同志的信，让记者捉刀代笔，大加"修改"。经过一番"加工"，一篇盗用连队干部战士名义，给军报横加罪名的批评文章《这样介绍"体会"对吗?》终于炮制出来了。他们连拿回连队让干部战士履行一下通过的手续都顾不上，"四人帮"就一个个兴高采烈地"批示"起来。江青对这篇既不是战士提出的问题，又不是战士写出的文章大加赞扬说："这几个战士是勇敢的，对的"，还让张春桥、姚文元"仔细推敲一下，使它变成一把更加锋利的匕首。"姚文元则批道："告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发表。"王洪文更勒令："解放军报社组织群众认真讨论一下这封战士的来信，要发动群众揭开报社阶级斗争的盖子。"

一切策划就绪，"四人帮"既不报告军委，也不通知总政，就让他们安插在某报的那个心腹直接给军报打电话说："你们一月十七日的那篇文章《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几个战士看了后，写了个意见给我们，中央领导同志看后，认为几个战士是勇敢的，是对的，请军报加一个有自我批评的按语，在《解放军报》上发表。"并说：这是江青、春桥、文元的指示，这是对军报的"爱护和照顾"。军报被迫按照他们的规定写了按语后，"四人帮"又亲自删改，然后让那个心腹通知军报说："你们写的那个按语，上边批示下来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修改的，批件由我们保存。"他还让把这篇"批评意见"及按语一定要放在一版头条位置，标题占多长，字号用多大，都一一替军报作了规定。就这样，在他们一手包办下，那篇"批评意见"和按语，在军报二月十五日一版刊出了。

从这以后，"四人帮"又接二连三地对军报找岔子、扣帽子、打棍子。今天指责宣传某个连队的报道是"和中央唱反调"，明天批评把两条批孔新闻摆在一个版上是"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界限"。江青还特别交代一个连队，要"眼睛盯着《解放军报》，挑他们的毛病"。王洪文狂叫：全军都盯住它。"四人帮"还公然破坏中央关于稳定部队、基层单位不搞"四大"的规定，唆使某些人以连队名义轮番到军报贴大字报。江青叫嚷："大字报要贴得高高的"。他们对军报上下夹攻，内外夹攻，百般刁难，不到一个月，就制造了多起事端。到三月中旬，"四人帮"见时机已经成熟，就由张春桥盗用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悍然下令军报停止编发自己的稿件，强迫军报变相停刊了。

军报被迫变相停刊，这在我军历史上是空前的。这一事件的发生，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一月十七日那篇短文的作者、所报道的单位受到很大压力，军报编辑部受到很大压力，更为严重的是，损害了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威信，打击了广大指战员的情绪。

"四人帮"一手炮制的那个"批评意见"，是直接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他们给《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那篇短文，加上了一个吓人的罪名，叫做"宣扬了中庸之道，阻碍了批林批孔"。这是无耻的捏造。军报的这篇短文，明明是强调用毛主席的建党思想，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破坏党委建设的罪行，肃清其流毒，是反映一个单位批林整风成果的，怎

么倒成了"阻挡批林批孔"呢？毛主席历来强调党的团结，军队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要团结，不要分裂**"是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三项基本原则中的重要一项。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的光辉文献中明确指出："**有了问题就开会，摆到桌面上来讨论**"，又说党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就告诉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四人帮"竟把毛主席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原则污蔑为"中庸之道"，这恰恰暴露了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丑恶嘴脸。

"四人帮"抓住军报这篇短文大做文章，还有一个极端险恶的用心，就是借此来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一九七三年五月，空军在批判林彪反党集团之后，整顿了党委领导班子。周总理和叶副主席在空军党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党委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办事，要讲团结，不要搞一言堂，不要称霸。空军各级党委传达和学习了这些重要指示，出现了团结战斗、朝气蓬勃的新局面。军报发表的这篇短文，反映了学习这些指示取得的成绩。周总理、叶副主席那次在空军讲话时，"四人帮"在场，听了这些讲话。因此，张春桥在策划炮制"批评意见"时，就阴阳怪气地说：最近"又有什么人讲了什么话"，含沙射影地向有关人员暗示，把攻击的矛头直接对着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历来把周总理看作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打击、陷害周总理，这次又来借题发挥，罗织罪名，真是卑鄙到了极点。

"四人帮"对军报有着刻骨仇恨，他们一提起《解放军报》就"气得很"，这是因为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这块舆论阵地。《解放军报》自创刊以来，一直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爱护。毛主席亲笔为军报题了报头和《思想战线》的栏头，多次亲自审批了军报的重要言论和宣传计划，毛主席在对军报的批示中谆谆教导我们："**不应当关门办报，应面向群众，又要有大方向，又要新鲜活泼**"。毛主席还几次亲切接见了军报的编辑、记者和工作人员。毛主席对军报的亲切关怀和教导，永远是我们办好报纸的根本方向和前进动力。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对军报也是关怀备至。他亲自审批创办《解放军报》的请示报告，对如何贯彻毛主席的办报方针，多次作过重要的指示。特别是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中，敬爱的周总理应军报的请求，亲笔写了题词，并就题词的内容非常亲切地同军报的同志商量。周总理那种严肃认真、虚怀若谷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至今还深深刻印在军报同志的记忆中。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也十分关心和爱护军报，经常给予重要指示。我军广大指战员，更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办好自己的报纸。而"四人帮"却对军报始终抱敌视态度。他们深知，要搞乱军队，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就非把军报这块舆论阵地搞到他们手中不可。因此，他们不但制造了勒令军报变相停刊的严重政治事件，而且狂吼"揭开报社阶级斗争的盖子"，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法，直到把军报领导班子整垮。他们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和军报过不去吗？他们的"匕首"难道仅仅是刺向军报的吗？不！江青曾经明目张胆地说："这不是一张报纸的问题"。他们整垮军报，是为了要整垮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人民军队，他们的"匕首"是对准中央军委的，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为了夺党的兵权。

在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关怀下，在全军指战员强烈要求下，"四人帮"不得不取消禁令，恢复了军报编稿的权利。但是，"四人帮"控制军报、乱军反党的野心不死。窃踞"总政治部主任"的张春桥，在他任职的一年零九个月中，没有向军报传达过一句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对军报应该宣传什么，不应该宣传什么，没有指示过半个字。军报上送宣传计划请他批示，他一个一个都打回来。军报打电话向他请示报告，他的秘书竟凶神恶煞地严厉申斥，勒令把电话号码销毁，不许再给他们打电话。军报进行红军长征四十周年的

宣传，向军队进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张春桥却暴跳如雷，硬说宣传长征是"宣传邓小平"，"是为那些老家伙们评功摆好"。军报宣传毛主席批准试行的"两个条令"，张春桥横加阻挠，连说"不妥"，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叶剑英副主席。军报宣传唐山、丰南地区军民抗震救灾的英雄事迹，"四人帮"加罪说是冲淡了批邓。军报写了一些社论，他们扣住不让发。他们盗用两报一刊社论名义，提出"按既定方针办"，事前对军报纹丝不漏，直到广播之前，才让军报知道社论署了《解放军报》的名。一句话，"四人帮"对在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领导下，没有控制到他们手中的《解放军报》，是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历史是无情的。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为党锄了奸，为国除了害，为民平了愤，也为全军广大指战员解了心头之恨。"四人帮"强迫《解放军报》变相停刊的阴谋终于揭露出来，长期压在军报头上的一块大石头已经掀掉。我们军报的全体同志和全国亿万军民一样，在斗争实践中，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华主席和我们心连心。我们决心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切听从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誓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把《解放军报》办好，使它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可靠舆论工具。

(原载 1976 年 12 月 19 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指示：同意转发。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八日)

现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发给你们，供批林、批孔时的参考。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这个材料的传达方法，请你们按照中发〔1972〕3 号文件的范围、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进行。传达以前你们要首先学习讨论，进行试点，训练骨干。

林彪与孔孟之道

(材料之一)

(仅供批林批孔参考)

(一九七三年十二日)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家、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这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体系一致，都要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他就指使一些人，到处收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卡片，用它装腔作势，骗人唬人，制造反革命舆论，大搞阴谋活动，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

为了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我们从林彪的黑笔记、手书题词和住宅里的其他材料以及他的公开言论中，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供批判用，这个材料选编得还不够完善，注译也不尽妥当，有待进一步研究。

我们将陆续选编此类材料。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一九七三年十二日

目　　录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 (74)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 (75)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 (77)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 (79)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 (81)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 (83)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 (85)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 (86)

附件：名词简释 ……………… (88)

一、效法孔子"古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　　彪

悠悠万事　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叶群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十九

(条幅，林彪卧室)

注：育容即林彪。同日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幅赠叶群。

悠悠万事　惟此为大。　克己复礼。

书赠育容同志

叶群

于六九年十月二十三日

(条幅，林彪卧室)

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
克己复礼。

育容书赠宜敬

于苏州

一九七0·元·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宜敬即叶群。

按："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和叶群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连续写下了以上四条。这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野心，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

孔　　孟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译文：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了。

对过去……以莫须有罪名加以迫害的人，一律给于〔予〕政治上的解放。

《"571工程"纪要》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论语·尧曰》

译文：复兴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接续断绝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起用没落的〔旧贵族〕人士，……

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

吴法宪交代林彪的话、转引自中发〔1972〕24号文件

按：林彪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反动说教为根据，顽固地坚持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论语·子路》

译文：必须正名分！……名分不正，讲起话来就不顺当合理；说话不顺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

二、鼓吹"生而知之"的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林　　彪

天马行空　独往独来

林彪赠叶群

六二·六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据《史记·大宛传》记载，天马是一种神马。《庄子·在宥篇》有"独往独来"一语，原文是："出入六合，游乎九州，独往独来，是为独有。独有之人，是谓至贵。"

按：这是林彪手书，挂在他的床头正中墙上。林彪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妄图实行独裁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这件材料写于一九六二年，可见林彪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由来已久。

天马行空　猛志常在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天马横空　知无涯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革命领导权历史地落在我们舰队头上。

《"571工程"纪要》

孔　　孟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如果要平治天下，在当今这个时代，除了我还有谁吗？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论语·述而》

王者莫高周文，伯者莫高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骄故也。

育容书于苏州

六九仲冬

（条幅，林彪卧室）

注：见《汉书·高祖本纪》十一年求贤诏。"骄"原文是"交"，两个"莫高"后，原文都有"于"字。"患"字写后又圈去。《汉书》原文的意思是：帝王没有比周文王再高的，霸主没有比齐桓公再高的，但是他们都是依靠贤人才成名的。现在天下有智能的贤人有的是，难道只有古代才有吗？问题在于做人主的不去和他们结交。

按：林彪写这段话，挂在他床头右侧墙上，他自比周文、齐桓，把历代统治者当"人主"的经验作为座右铭，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的王霸之业。

每临大事有静气，
不信今时无古贤。

叶群同志存

伯达 退思书屋

（题词，叶群办公室）

按：陈伯达吹捧叶群为今时之"古贤"，颂扬她赞助林彪搞反革命政变能沉住气。

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我认为人有两方面：一方面有天生的问题，一方面有教育的问题。人才，人的智慧和能力，这是两方面的结合。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译文：上天把治天下的圣德和使命赋予了我，桓魋（魋音颓。宋国司马，管军事行政的大官）能把我怎么样！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论语·季氏》

译文：生来就知道的人，是上等的；经过学习然后知道的人，是次一等的；遇到困难还学习的人，是再次一等的；遇到困难不学习，老百姓就是这样下等的人。

温文、豪放、理智，既受于天，且受于人。

书赠爱妻叶群
林 彪
五·廿六

（刻在砚盒上，叶群办公室）

我的脑袋长得好，和别人的不一样，特别灵。有什么办法呢？爹妈给的么。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

《论语·子罕》

译文：太宰问子贡："孔夫子是位圣人吗？为什么这样多才多艺呢？"子贡说："这本是上天让他成为圣人，而且使他多才多艺。"（太宰，官名。据汉郑玄注，这里的太宰是指吴国太宰伯嚭。嚭音痞。又据唐孔颖达注，是指吴国的还是宋国的太宰，不能确定。）

……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讲话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

《孟子·公孙丑下》

译文：每过五百年一定会有英明的帝王出现，那中间一定有闻名于世的人产生出来。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见清代赵翼《论诗绝句》。李杜指唐代诗人李白、杜甫。

按：陈伯达借这首诗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吹捧林彪是"天才"，为林彪抢班夺权制造根据。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林 彪

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

林彪一伙的黑话，转引自
中发〔1972〕4号文件

孔 孟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

《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没有统治者，就没有人治理劳动人民；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人供养统治者。

先知先觉是有的，否认先知先觉的存在，这是大的错误。

陈伯达：《三民主义概论》

（一九四О年增订版）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

《孟子·万章上》

译文：上天生育人，就是要先知先觉者来使后知后觉者有所觉悟。我呢，是天生的先知先觉者；我就要拿这个〔尧舜之〕道使现在的人有所觉悟。不是我使他们觉悟，又有谁呢？

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
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录译诗

（陈伯达题词册，林彪卧室）

注：垠音银。无垠即无边、无止境的意思。

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朱子语类》卷九十三

老百姓天天不是在谈抗日，在谈共产党这一套。他们谈的是他们本身的事情，怎样种田，年成好，每天怎样做工流汗，怎样做生意。整天男女大小全在这一套。……他们想他们生活那一套，我们想我们这一套。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注重道德，劳动人民想的是种地的事；统治者关心维护法律制度，劳动人民想的是小恩小惠。

你看中国人民见了面说，你吃了饭没有？蒙古人见了面说，牲口好不好？这就是讲生活问题。过了年见面时说，"恭喜发财"，写对子时，写一个大"财"字，"招财进宝"贴在门上。老百姓脑筋里想的就是这些东西。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译文：统治者明白大义，劳动人民只知道小利。

我们同志的脑筋不是普通农民的脑筋，也不是普通工人的脑筋。他们想的是怎样搞钱，怎样搞米，油盐酱醋柴、妻子儿女。……我们的思想与他们的思想是有天壤之别。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七大的发言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论语·阳货》

译文：高贵的有智慧的人和卑贱的愚蠢的人是先天决定的，是不可改变的。

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译文：劳动人民只能供使唤，不能让他们知道什么道理。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林　彪

秦始皇焚书坑儒

转引自中发〔1972〕4号文件

按：在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毛主席讲到“**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时，林彪插话指责秦始皇，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主席当即予以严厉驳斥。这里便暴露了林彪尊孔反法，借咒骂秦始皇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面目。

汉朝废百家，独尊儒术，有个董仲舒，我希望大家都当董仲舒。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的讲话

林×××号召我们做个革命的董仲舒，他是西汉人。秦始皇当皇帝后，主张愚昧政策，大搞焚书坑儒，使孔孟的学说吃不开了。这时董仲舒给皇帝讲道理，要想永远统一天下，就要有一种能统一人民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一种思想，那就是孔孟之道。如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由于他高举了孔孟之道，所以很快被人民接受了，一直传了几千年。

陈伯达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的讲话

孔　孟

秦……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

董仲舒：《对策》(《汉书·董仲舒传》)

译文：秦朝……严禁学术文化，不许挟带书籍，抛弃礼义，连听到礼义的话都厌恶，其用心是要把先王之道完全毁灭掉。

汉儒，惟董仲舒纯粹，其学甚正，非诸人比。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译文：汉朝的儒家，只有董仲舒〔继承孔孟之道〕最纯粹，他的思想〔是儒家的〕正统，别人没法比。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

赠宜敬同志

育容

一九六九·十·一

（条幅，林彪卧室）

注："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见《史记》卷六十八引《尚书》的话。意思是：依靠德行必然兴旺、依靠暴力必然灭亡。"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见苏轼《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意思是：用君子长者的道理治理天下，这就是最忠厚的了。

按：正当亿万人民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之际，林彪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孟子·公孙丑上》

译文：以力压服人的，人家不会从心里服从，……以德服人的，人家才会心悦诚服。

忠孝节义是封建的　用其

…………　内容

仁—团

勇—斗　不同地词，

智—唯物论　用归纳法

吸其内容

（林彪存用的卡片）

按：林彪鼓吹儒家的"忠孝节义"，把孔子的"仁"、"勇"、"智"说成是"团结"、"斗争"、"唯物论"，用儒家的反动思想冒充并篡改马克思主义，赤裸裸地继承封建糟粕，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武器。

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中庸·二十章》

译文：智、仁、勇这三样是通行于天下的美德。

关于中国的旧道德，如"忠孝节义"，"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些东西，我们认为在新的历史内容上可有其存在的价值。我们认为这些道德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

陈伯达：《论抗日文化统一战线》

（一九三八年五月）

孔子认为具有知、仁、勇三种德性，才是完全的人格。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一九三九年四月）

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

（《辞海》3058页，“恕”字条上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从来人们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极高的美德，其实还是限于一面；极高的美德，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就把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

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一九三九年四月）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论语·里仁》

译文：曾子说：“孔夫子〔贯彻始终〕的道理，就是‘忠恕’。”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论语·卫灵公》

译文：子贡问：“有没有一句话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答：“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林　彪

中庸之道……合理

（林彪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谈话》笔记本上）

△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　果大则现　果小、或其他力

孔　孟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论语·雍也》

译文：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仲尼不为已甚者。

《孟子·离娄下》

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

例

阿处其女政局委员——做绝了

绝　对X骂绝了

则　对明斗绝了、(乱了套)

错　对大公做绝了

"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注：阿女政局委员指阿尔巴尼亚党内修正主义分子贝利绍娃。X批赫鲁晓夫。明指王明。大公指苏修。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反修斗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译文：孔子不做太过分的事。

个对集之相成作用，　(当前积

过集对个之相成作用，　极性问题

过分则转化，　最大—乃

而过极则相反　大中之大

结果相同　积来于生活)

而不过极则成。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五日)

按：林彪用中庸之道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

译文：〔办事情〕超过了〔礼的规定〕就象做不到〔礼的规定〕一样。

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

(《辞海》461页"反粒子"条上

林彪的批语，林彪办公室)

两斗皆仇，两和皆友。

一九六〇年十月二十日在

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译文：有子说："礼的应用，以调和为贵。"

本来在目前，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人所强调的并不是阶级斗争；相反，我们是主张各阶级的联合，实行互相互让。

陈伯达：《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若干辩证》（一九三九年五月）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

译文：天下的人都是自己的兄弟嘛。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　彪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条幅、林彪卧室）

按：林彪抄录《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的这道诗，把原文的"趋身"改为"栖身"，一字之改，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

韬讳

操之论英雄　胸有大志
　　　　　　腹有良谋

范蠡

（林彪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二日口授，叶群亲笔记在《101谈话》笔记本上）

注："韬讳"，原文是"韬晦"，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玄德也防曹操谋害，就下处后园种菜，亲自浇灌，以为韬晦之计。""胸有大志，腹有良谋"也见《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原文是："操曰：'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范蠡（蠡音里）是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谋臣，越灭吴以后，他离开了勾践。

按：这件材料和上件材料一样，充分暴露了林彪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他妄图用韬晦之计隐蔽其反革命真相，窥测方向，伺机而动。

孔　孟

子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易·系辞下》

译文：孔子说："……尺蠖（蠖音获）这类昆虫弯曲它的身体，为的是向前伸展。龙蛇的冬眠，为的是保存自身。研究屈伸一类的道理达到入神的境界，为的是应用。用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为的是发扬（奴隶主的）道德理想。"

忍耐，大度的科学根据……

小不忍则乱大谋。

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

（林彪亲笔写在一九六三年《工作手册》（十）上）

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条幅，林彪卧室）

注：见苏轼《留侯论》，原载《应诏集》。苏轼曾做"侍读"，为皇帝讲授统治术。《留侯论》中吹捧张良为"盖世之才"，"能有所忍也，然后可以就大事。""骤"原文是"卒"，在"卒然临之"前原文有"天下有大勇者"，在"无故加之而不怒"后原文有"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按：这是林彪手书，挂在他床头左侧墙上。林彪自命为"盖世之才"、"天下大勇者"，告诫自己，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狂妄野心，必须暂时"忍耐"。

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

立场
- 三不
  - ①不干扰人之决心（免己负责免争领导之嫌）（不建言）
  - ②不批评
  - ③不报坏消息（去影射之嫌）
- 三要：
  - 要响应
  - 要表扬
  - 要报好消息

（叶群亲笔记在《工作手册》（五）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之间）

朱熹注：小不忍，如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皆是。

《论语·卫灵公》

译文：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小事上不能忍耐，诸如妇人的见识、匹夫的勇敢都是。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孟子·离娄下》

译文：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

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大学·十章》

译文：喜好人家所厌恶的，厌恶人家所喜好的，就是违背人性，那灾难就必然要临头了。

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论语·季氏》

译文：〔对上说话要察颜观色，〕不看脸色而贸然说话，就是瞎子。（瞽音古）

闭目养神 照上面办
不置可否
三不主义{不负责 不建言 不得罪
韦编三绝——孔子读易的精神
面带三分笑
(叶群一九六三年亲笔记在《工作手册》(十)上)

按：以上两件材料，充分暴露林彪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嘴脸。

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

《孟子·离娄下》

译文：说人家不好的地方，招来后患怎么办呢？

不成功便成仁。

《"571工程"纪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

译文：有志之士，有德之人，不会贪生怕死以损害仁，只会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以完成仁。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林　彪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

《"571工程"纪要》

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

《"571工程"纪要》

按：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措施。林彪对此进行恶毒攻击，妄图煽动群众，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孔　孟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滕文公上》

译文：脑力劳动者统治人，体力劳动者被人统治；被统治者养活别人，统治者靠人养活，这是天经地义的。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论语·卫灵公》

译文：种田嘛，免不了饿肚子；读书嘛，就可以升官发财。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

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论语·子路》

译文：孔子的学生樊迟向他请教如何种田，他就说：“不知道，我不如农民。”又问如何种菜，他又说：“不知道，我不如种菜的。”樊迟出去以后，孔子骂道“樊迟这家伙是个没出息的小人！统治者如果重礼制，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统治者如果讲仁义，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统治者如果讲信用，那么老百姓就不敢不说真情。这样的话，四面八方的老百姓都会背着儿女投奔前来，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林　彪

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道之所止也。强而羽，忍而刚，……道之所起也。故义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录武经太公兵语赠虎儿

爸爸

一九六三·十一·十六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注：见《武经七书》中《六韬·文韬·明传》。“时至而疑”四字林彪写了又划去，并略去“文王寝疾”、“明传子孙”、“柔而静”、“恭而敬”等语。《明传》原文是：

“文王寝疾，召太公望，太子发在侧。曰：‘呜呼！天将弃予，周之社稷将以属汝。今予欲师至道之言，以明传子孙。’太公曰：‘王何所问？’文王曰：‘先圣之道其所起所止，可得闻乎？’太公曰：‘见善而怠，时至而疑，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静，恭而敬，强而羽，忍而刚，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义

孔　孟

胜欲则昌，欲胜义则亡；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

原文的意思是：周文王病危，召见姜太公吕望，太子姬发（即周武王）在旁。周文王说："唉！老天爷要抛弃我啦，周朝的天下，将要托付给你啦。现在我想学习最高的道理，来明确地传给子孙。"太公问："王问的是什么呢？"文王说："是不是可以把先圣之道提倡哪些，禁止哪些，说一说？"太公说："遇到好事而怠慢，时机到了而犹豫，明知事情不对反而参与，这三点是先圣之道所禁止的。柔顺而又沉静，谦恭而又敬重，强毅而能卑弱，忍耐而能刚劲，这四点是先圣之道所提倡的。所以大义胜过私欲就昌盛，私欲胜过大义就灭亡，恭敬胜过怠慢就兴旺，怠慢胜过恭敬就覆灭。"

按：这是奴隶主头子周文王临死前对其子武王传授统治经验的遗嘱。林彪亲笔抄录，作为教子经，挂在林立果办公室正中墙上，梦想建立林家封建法西斯世袭王朝。

学习韦编三绝的治学精神

书赠老虎儿

爸爸

六三·十·二十四

（条幅，林立果办公室）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

《史记·孔子世家》

译文：孔子〔反复〕读《易经》，以致编联竹简的皮绳断了多次。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赠豆豆女儿

爸爸

一九六二·十一·十七

（条幅，林立衡卧室）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

译文：君子心胸宽广，小人经常忧愁

笑一笑，十年少；愁一愁，白了头。

书赠豆豆

欢欢喜喜　　爸爸

坚持到底　六三·十·廿四日

六八年四月加写

（条幅，林立衡卧室）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附件

名 词 简 释

这个附件，是我们对《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涉及的一些人名、名词概念所作的简要注释。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所限，注释不一定妥当，仅供参考。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这个注释的不妥之处将得到纠正

周 朝 代名。我国大约从夏朝（起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开始进入有阶级的奴隶社会。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期，商朝（又称殷）灭夏。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周武王灭殷，建立周朝，都城在今陕西西安，历史上称为西周。公元前七七〇年，周迁都今河南洛阳，称为东周。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

春秋战国 春秋原是鲁国的一部历史书名，记载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前四八一年的历史。后来把东周开始的那一年即公元前七七〇年，到前四七六年这一时期，称为春秋时期。战国指公元前四七五年到前二二一年秦统一。由于这个时期各诸侯国连年战争，因而后来称为战国。春秋后期到战国，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

孔子 名丘，又叫仲尼，排行老二，春秋末期鲁国（在今山东）人，生于公元前五五一年，死于公元前四七九年。他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生活在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社会大变革时代，他一生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奔走卖命。他在鲁国代行宰相的时候，一上台就杀了主张革新的少正卯。他游说各国诸侯，推行反革命主张，进行复辟活动，到处碰壁。他又通过所谓办教育、删改史书，制造舆论、培养人材，妄图复辟奴隶制度。孔子建立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反动思想体系，提出"克己复礼"的复辟纲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生而知之"的先验论，以及"学而优则仕"、"鄙视生产劳动的反动教育思想。孔子的主要言行由他的门徒记载下来，编成《论语》一书。

孟子 名轲（轲音科 Kē），战国中期儒家的主要代表，约生于公元前三九〇年，死于公元前三〇五年。当时，封建制在各诸侯国已经或正在建立，孟子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上，激烈地反对主张变革的法家，鼓吹"法先王"即效法前代的帝王，要开历史的倒车。孟子提出"仁政"学说，主要是反对革命暴力，要求恢复奴隶制的井田制和奴隶主贵族的世袭权利。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思想，宣扬"万物皆备于我"的主观唯心论，天生"性善"的反动人性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英雄史观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孟子的言行和思想记载在《孟子》一书中。

孔孟之道 指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反动政治路线和唯心论思想体系。孔孟反对社会变革，主张复古倒退，顽固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度。汉代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的修饰和发挥，孔孟之道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武器和束缚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到现在，孔孟之道仍为中外反动派和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所利用。

儒家 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儒，起先是指替奴隶主贵族办丧事之类的那些人。孔子开始也是从事这类职业的，后来办私塾，招收学生讲学，宣扬复古倒退的思想，从事反对变革的政治活动，千方百计挽救奴隶制旧制度，逐渐形成一个学派，后人称它为儒家。秦汉以后，继承发挥孔孟思想的，统称为儒家。

法家 战国时期与儒家对立的一个重要学派，以商鞅（？至前三三八年）、荀子（约公元前三一三至前二三八年）、韩非（约公元前二八〇至前二三三年）为主要代表。这个学派反映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宣

传"人定胜天"的唯物论，反对"听天由命"的唯心论；提倡变法革新，反对复古倒退；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实行地主阶级的专政以代替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后人称这个学派为法家。

礼治 儒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求按周礼进行统治。儒家从孔子起就强调绝对遵守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礼节仪式，严格划分奴隶主和奴隶的社会地位，各级奴隶主贵族要安于等级名分，不得越轨。

法治 法家提倡的政治主张。它要用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公开法令，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和等级分封制度，用暴力打击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建立和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法治"和"礼治"的对立，反映了法家和儒家两条对立的政治路线。

董仲舒 西汉儒家的代表、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约生于公元前一七九年，死于公元前一O四年。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他提出"罢黜（黜音触Chù）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奉为正统思想，董仲舒继承发挥了孔孟的反动天命论，建立了一个神学唯心论体系。他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上天（神）有目的安排的，封建皇帝的统治权力也是上天授予的。他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提出"三纲五常"的反动说教，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制造理论根据。

朱熹 南宋儒家的代表，是继孔孟之后封建时代影响最大的唯心论哲学家，生于一一三O年，死于一二OO年。朱熹认为，宇宙万物和封建秩序都是由先于事物存在的"理"决定的。他把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不变的"天理"，把一切违反封建统治秩序的欲望、要求，说成是万恶的"人欲"，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动主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制造根据。朱熹编成的《四书集注》，被以后的封建统治者规定为必读教科书。

仁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孔子关于仁有许多说法，根本的一条就是他说的"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人们一言一行完全符合周礼，为复辟奴隶制服务。他还宣扬"孝悌"，把孝顺父母和顺从兄长，作为仁的重要内容，以维护奴隶制的宗法关系，防止"犯上作乱"。他又说仁是"爱人"，实际上他们爱的只是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孔子鼓吹"杀身以成仁"，要"志士仁人"为奴隶主阶级卖命。

义 孔孟说的义，是指行为服从奴隶制统治秩序的精神。孔子说："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可见他们宣扬义，正是为了防止"犯上作乱"，维护旧的传统和秩序。儒家标榜重"义"轻"利"，实际上是根本否定奴隶的利益，反对法家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保护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利益。

礼 孔子所说的礼就是周礼，是指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礼节仪式等，属于奴隶社会的上层建筑。在孔子看来，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破坏了礼就是大逆不道。孔子口口声声叫嚷"复礼"，是要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把社会拉向后退。

忠恕 孔子仁的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忠，就是要求尽心竭力为奴隶主阶级效劳。恕，就是所谓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宣扬恕，是要奴隶主阶级内部互相体谅，对劳动人民则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决不宽容。

中庸 孔子宣扬的一种"最高的美德"。它要人们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完全按照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度的规定办事，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违背和偏离。历代统治者鼓吹中庸之道，就是要用折衷调和、平庸保守的思想，掩盖社会矛盾，反对阶级斗争，巩固旧的统治秩序。

德 孔子鼓吹的德，是指奴隶主贵族的道德，它要奴隶主遵照仁义、孝悌、忠恕、中庸等规范行事，以调整本阶级内部关系，和对奴隶进行精神统治。他鼓吹"为政以德"是要用奴隶主的道德说教，来麻醉劳动人民，加强思想奴役，维护奴隶主阶级的专政。孔子宣扬德是天生的，只有奴隶主阶级才具备。

正名 所谓"正名"，就是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君要象个君，臣要象个臣，父要象个父，子要象个子，这一切都不能乱，不能动。孔子宣扬这种反动的唯心论，是妄图保住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度。

三纲五常 董仲舒提出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说，君、父、夫具有绝对

统治的权力，而臣、子、妻只能绝对服从，就是上天（神）的意志规定的。这"三纲"也就是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成为两千多年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绳索。"五常"就是所谓五个永恒不变的原则，指"仁、义、礼、智、信"，它是儒家用来维护和调整"三纲"关系的反动道德教条。

五经 五部儒家的"经典"，即《诗》、《书》、《礼》、《易》、《春秋》。汉以后，封建统治者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作为统治人民的思想工具。

《诗》，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相传经孔子删过，又称《诗经》。

《书》，又名《尚书》、《书经》，是春秋战国以前的政治文告和历史资料的汇编。

《礼》，指《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周礼》记载周朝关于国家机构和官职的规定。《仪礼》记载周朝的婚、丧、祭祀、交际等礼节仪式。《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关于礼的论述的汇编。

《易》，又名《周易》、《易经》，古代一部占卜的书，分"经"、"传"两部分。《系辞》就是"传"的一种。

《春秋》，春秋时期鲁国按年记载当时历史的书。孔子根据维护奴隶制的需要作过删改。《左传》是一部解释《春秋》的书。

四书 儒家的"经典"。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和《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作了注解，称为《四书集注》。

井田制 我国奴隶社会奴隶主剥削奴隶的土地制度，当时全国土地属于奴隶主头子天子所有，土地被划成井字形的方块田，分封给各级奴隶主贵族，由他们强迫奴隶耕种。井田是奴隶主贵族受封多少的计算单位，也是强制奴隶劳动的计量单位。

江青、姚文元、迟群、谢静宜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江青：这个材料里头可能印的有赵纪彬写的《孔子杀少正卯》。他是很用了功夫的。我看了两遍，我个人啊，用了工具书，还是没有完全看懂，因此暂时不发给同志们，但是那写批判文章的地方，我们准备发。这个材料里面没有印好，没有推荐。但是不能抹杀他的功劳，因为他是用了很长的时间研究的。赵纪彬，教授吧？

迟群：江青同志给我们两个人的任务有三条，下去以后，一个我们是送信、送材料，当通讯员；第二就是去学习；第三就是大家还有什么要求和意见带回来汇报。我们下去座谈和了解一些情况，许多同志提出一些问题来，当场有的时候我们临时作点准备，临时来回答，但是今天一下子开这么个大会，中央领导同志都来了，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是一个很大的教育了。刚才总理的讲话，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到抓大事的重要。就是说要用什么样的姿态，去抓大事，抓路线，如何理解抓大事的重要意义，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地去抓大事，所以中央给我们作了榜样，我自己要很好地学习、贯彻。因为在这一点，在我们自己所工作的那个部门，那个单位，问题都很多，差距是很大的，需要很好地赶上来的。刚才总理

念的这个材料，就是主席批示同意转发中发〔74〕1号文件，这个材料的产生过程，简单给同志们介绍一下。就是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那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同志看了以后，立即找我们去了，就是说，给我们提了意见了，感到东西不多，江青同志指（示）啊，东西不多，有些不够准确，还有一些个别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

迟群：似是而非。

谢静宜：也似是而非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提议，我们……

迟群：当时讲到了，抓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当前的一个大方向。

谢静宜：当时我们提议，我们想成立一个班子，专门下点功夫好好地搞一下。江青同志同意我们这个意见，而且指示我们要老中青三结合，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他们那个里头的大磁缸子里头的东西，条幅，还有挂的条幅、横幅，我们反正到那里翻箱倒柜呀，东西很多，材料这样就丰富了。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特别是在一些带有原则性的一些提法，作了一些指示。

谢静宜：看得很细，给我们作了指示，（把）我们叫去之后，讲了，肯定了这个材料比上次内容丰富多了，但是编得还比较乱，就是要分类，要通俗易懂，为工农兵着想，应该还编上一个简释出来，这样以便大家好理解。还给我们指出，有些地方不够准确，所以要查，要核实。那就多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天马行空”，我们只查到了汉，江青同志查到了宋，昨天晚上江青同志又查到了唐，今后还要查。这样，我们遵照这个指示，以后，我们又回去研究了。后来江青同志再让我们去毛家湾，看林贼大批的一些卡片，几十箱子，好多。就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改动了，待会儿，卡片的问题，迟群同志还补充，所以后来又写了解释，包括前言怎么写，封面怎么写，都指的很细的，内容更是如此，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我和迟群同志在下边讲的时候，感到江青同志象抓样板戏一样这么认真啊。当然，样板戏江青同志抓了好多年了，但是专案工作江青同志也是有几年的经验了。最后，编写完了之后，送给主席、江青同志看了，最后定了稿，同志转发。但是由于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水平是有限的、很低呀，学习也不够，还有很多不妥的之处，希望同志们提出意见，我们再修改。

另外，我还再讲一遍，就是对批孔的文章，主席是非常关心的，听我们说到，就是说北大冯友兰也写了批孔的文章啦，主席立即让我们回去，说你回去拿，拿回来，给我看一看。所以我们当时就回去了，然后返回，把那一篇冯友兰的文章拿来给主席看，主席是一口气地把它看完。很长呐，字也很小，主席戴放大镜把它看完呐，一直都没休息，而且还看出了里头那些标点错了，叫我们去改一改，很细。第二篇文章也是这样的，第二篇冯友兰的文章出来之后，又送给主席，主席又看了。所以主席总是看到这些老人的进步啊，主席是很高兴的，那怕是微小的进步，主席就肯定。而且这两篇，江青同志看了，又转发了。

迟群：准备看第三篇。现在第三篇也出来了。

江青：我插一句。今天我们这个会，有一个缺点，忘了通知写作班子的同志来，我道歉。

迟群：这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想到这个事。

谢静宜：现在已经通知了。

迟群：通知了，现在可能来的要晚一些。

谢静宜：所以，后来看了文章以后，我们说，我们学报要发表的。报纸有人给冯友兰要约稿啦，可能是要会登报的，所以，主席就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所以后来等到报纸发表的时候，郭老的名字，郭沫若同志的名字去掉了，连书的名我们都没有登呢，这是主席保护郭老哎。

江青：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郭定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他这个《十批判》是不对的，听说，郭老今天来了。

迟群：这个材料的编写过程，当时组织了一个班子，江青同志是建议叫组织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一个班子，就是找一些老教授，在这方面有些研究的，作点顾问。当时北大、清华组织了一个班子，其中有的是江青同志提名的，就是譬如说，北京大学的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清华大学的王世敏，这不是教授了，是个讲师了，还有我们提出来，江青同志同意了的，象清华的石国洪，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不在这里读了。一共有那么三、四十人。此外，就是为了搞这个材料，我们一些工人同志，就是给了很大的支持。但两校它是应该的了，它是印刷厂了，随叫随到，有的是昼夜地干，有时因为为了审查清样，要求都比较严格的了。

江青：我的材料是这两个学校昼夜赶出来的。这两个学校的印刷厂，后来是人民日报的印刷厂昼夜赶出来的。春节没有按照旧习惯过，过了一个革命的春节。要感谢这些印刷工人。

迟群：还有新华印刷厂，也是春节期间，是大年三十都一个一个找来的，一要就是很多的，其中还有个别的，任务不太重了。但是科教组的这个印刷厂也参加了的。这些同志休息的很少。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水平所限，对于一些指示的精神理解不够，所以不妥当的地方是会有的，我们相信，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必将使这份材料逐步地完善起来。另外，据江青同志说，人民日报的鲁瑛同志也是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工作的。再一点，汇报一下，我们和谢静宜同志带着江青同志的那个信和材料

江青：还有党校的班子。……

迟群：那二十军的防化连去的情况，简要地汇报一下。那个材料，当时批的那个材料，都是反映了这个连队它对批孔这方面一些模糊认识和提出的一些问题。

谢静宜：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这个材料印出来以后了，就是《林彪与孔孟之道》印出来之后了，江青同志有一天晚上突然找我们去了，所以当时我们莫名其妙是怎么回事，后来看了，江青同志给我们看了一个军报的一个内参，就是讲了二十军的一个防化连的批孔批不下去了，遭到了一些抵制了，叫我们去了解一下情况。其中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说到河南去，

有一个马振扶公社，唐河县的马振扶公社，有一个中学，出现了一些问题。

迟群：那个地方在反攻倒算、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在翻文化大革命的案。

谢静宜：所以我们就去了，因为这个事呐，我们就不在这里展开来谈了。

迟群：这是到的这个军，我们当天到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并且把材料发给大家。当时那个群众的心情哪，是特别激动的，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我们遇到了，一个连队遇到了这么一个困难，批林批孔，中央领导同志都这样的关心，而且派专人来送信，送材料，特别是亲自给我们写信。他们谈到，这真是雪里送炭，那时正好是他们在研究批孔问题，是及时雨，是对部队批林批孔的很大推动。当时他们在座谈当中都说，林彪一伙和孔孟一样，他们根本不把劳动人民放在眼里，我们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我们的中央的首长，时刻都想念着，想着我们战士，关心我们的成长。所以当天，(那连队九点熄灯)后来我们快十二点了，我们去看了一下子，都没有睡觉，大家因为都在看材料，都觉得非常好，很兴奋，有的在写决心，表决心了、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座谈当中，使我们也很受教育。就是说，战士们对批林批孔的认识，许多问题不象我们有些人反映的那样，好象那么样的愚味无知，好象只有知识分子，只有那些个权威们，才能够去批。他们很概括的，很简练的说清楚了一个问题，说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两个人是一样的。很简单。而且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一个批孔的问题，绝不是单独的是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所以大家的认识、谈的一些话，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同时一些领导干部也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军里头一些领导同志了。这件事情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一个高级干部，一个领导者，怎么样经常地议政，作为一个军队来讲，不仅要议军，而且要议政，怎样来议政，怎样抓大事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谈到怎样改进我们的领导作风，说问题就在我们鼻子底了，但是我们无动于衷。中央领导同志工作那么样的忙，还发现了我们一个连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就是大事。我们却不敏感，说明不深入，政治上缺乏敏感，作风上不深入。他们的这样一些自我批评，这样一些认识，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当即说是我们马上就改，当即就把信的精神和材料，关于批林批孔的问题，当天就发了电报，噢、第二天就发电到各师，传达到团，到基层。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有关领导同志，也到了二十军，也在整个军区来抓这件事情。后来我们进一步了解，对这个材料编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去搜集意见么，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战士们能不能看懂，我们调查了九个班，九个班七十九个人，绝大多数的是初中以下，初中以下的，或者说高小的占多数，初中以上的占少数，初小和文盲的占少数。那么这七十九个人有七十一个人，他们粗看了那么一次到两次、他们就说可以懂，而且可以批得起来，那非常之好。因为过去光说是批林，还得批孔，说是林彪到底有些什么孔孟的语言，找不到，这个材料非常直接，非常好，孔老二怎么讲的、林彪怎么讲的、林彪有些直接的语言、间接的语言，一下子就给了我们批判的武器，批判的靶子。七十九只有八个人，看了以后觉得难懂、看不大懂、但是后来呢，各种程度的同志搁在一起，他们一边看，一边议，就是一个班的战士，他们互相这么议论，也能够批得起来了，也能够领会这个材料里边所说的意思。所以他们最后在看到材料，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们刚刚开始、刚开始他

们粗看了那么几次，议了几次，他们就谈了自己的体会了，他们说确实是批孔是批林的继续和深入，是批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一位班长，八班的班长，他说："批林必须批孔，锄草必须刨根。批林不批孔，流毒难肃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当批林批孔的闯将，要作批林批孔的尖刀子，用实际行动搞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谈的，我们认为谈得都比较好。因为时间关系，简单把这个点上的情况，因为这个点在陆陆续续地还要往上报了。当时，材料里讲的是高中了，好象只有高中生他们能看得懂，就是能够才能批孔，就是初小的呀，什么文盲，现在所谓文盲，我们到连队了解，就是说入伍的时候是文盲，现在已经都能够写家信了，恰恰这些同志呢，是可以看得懂的，可以批得起来的。

谢静宜：人家批得也很好，不见得比那个高中生就批得差，而且我们听到了，就是一个初小的，还有一个文盲，就在当场我们认为他的水平还是很高的，认识得很深。

迟群：再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为什么要批孔，就是说，批林同批孔的关系，这个因为给我们谈了很多，因为有些意思，我们丢三拉四，我们也没有很好地理解，所以简单谈那么几点看法。关于这个问题，大家有很多的话要说了，因为主席对这个方面有一系列的论述，从《新民主主义论》里头，那里头有很多批孔的指示的，以及以后组织的，解放以后组织的几次批判《武训传》哪，什么红楼梦研究的一些问题，批胡风等等的问题，以至于后来在去年的中央五月工作会议上，又提出来批孔的问题。首先要看到孔子，他所顽固推行的政治路线是什么？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是孔子，他是生活在春秋的末期，也就是说在奴隶制的崩溃，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制兴起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大变动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那么当时孔子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他的政治路线，他的理想就是要拚命地维护和挽救奴隶制，就是要复古倒退，反对社会的变革，开历史的倒车，这就是他所主张的政治路线，但是他一辈子，他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了，结果是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了，淘汰了。孔子是两千多年反动统治阶级的圣人，被称作所谓圣人，封建地主阶级在孔子的时代，是一种新兴的力量，本来它是孔孟所反对的，可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剥削阶级，所以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也就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了另外一种剥削制度，所以本质上是一样的。那么，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以后，一个阶级斗争的规律，证明他们不可能再继续地推动社会向前发展，也就是说，不能继续的去革命。他们就要反对变革了，他们就要强化和巩固他们对劳动人民的统治，随着这种阶级地位的变化，他们同孔孟所主张的复古倒退、反对变革，维护和挽救旧制度的思想路线的共同语言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汉朝以后，经过历代统治者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些改造和发挥，这样，就使孔孟之道成为两千多年以来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思想武器。这正如主席所指出的，这段话是主席同斯特朗的谈话的那个题解里头有一段话，是主席解放以后讲的，就是说是五八年武昌会议上讲的，但是是在四卷的同斯特朗谈话的题解当中写上的，主席说：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他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他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他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所以在这样一个时候，这些剥削阶级，他们为了拚命地维护自己的生存，镇压人民，它们就要大力地吹捧同它们思想体系是一致的孔孟之道，推行反革命的路线，孔孟的政治路线。那么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主张尊孔读经的半封建文化是帝国主义文化的非常亲热的兄弟，他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

动的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人民革命，所以孔孟之道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三座大山的一个精神支柱。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有很多。这样一个阶级斗争规律，在我们党内也明显地反映出来，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从陈独秀开始，象王明、刘少奇等等，他们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他们用它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一个具体的阶级内容。在今年的元旦社论里头专门提到这段话，点出了历次的机会主义头子。譬如说，陈独秀就有这样的话，他孔教之今化，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所谓共产党人，这是孔教，孔子那一套东西，是我们中国的伦理政治之根本，这怎么搞共产主义呢？并且说，孔孟是优秀分子，恨不能发展他们入党了。孔子有没有价值呢？他说，我敢肯定说，有。王明讲什么呢？王明称忠、孝、仁、勇、礼、义、廉耻为五千年的民族美德和民族精神。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一直到现在，他一直在苏修那里头骂我们，写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文章，最近他还写文章吹捧孔子为堂堂夫子，宣扬所谓的温、良、恭、俭、让，忠恕之道，仁爱等等。刘少奇他在二五年从那个，他就是自首叛变以后，他出来以后，军阀还给了他“四书”，带着这“四书、，爬出了狗洞。五一年他到曲阜去朝圣。六二年又修改他的黑《修养》，推行孔孟之道，他说，孔夫子是圣人，人民政府也要祭祀他。不光他自个要，还要叫人民政府、全国人民来朝圣孔子。林彪是这些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现在大量的材料证明。江青同志要是在会上给大家说那么几段，我们自己理解的水平不够了，先说这么几段。这个材料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林贼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里头有一个对比，林彪和叶群有这么一些个话，就是他们写的条幅，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叶群同志，育容，一九六九・十”，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这一个条幅挂在林彪的卧室里。就在同一天，林彪还写了内容相同的另一条条幅，赠给了反革命分子叶群。这就两条。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三号，又写了一条，就是、这是反革命分子叶群写的了，是“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书赠育容同志”，育容就是林贼。在一九七〇年一月一号，还有一条，是林贼又赠给反革命分子叶群的，是“悠悠万事，唯此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多了个“唯此”两字，“育容书赠宜敬”，宜敬就是反革命分子叶群。“于苏州”。这就是说，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面，这两个家伙连续地写下了四条。孔子他在《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克制自己，克己复礼呀，使自己的言论和行动符合于周礼。他所讲的周礼就是讲的西周，因为西周是奴隶制最兴旺的时期，就是说典型的奴隶制，符合于周礼，这就是仁。关于仁，在这个名词注释里头讲了这个东西，就是说，要在政治上、道德上、思想上达到一种最高的境界。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把它翻译过来，什么叫“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呢？他们互相赠送这样的条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头等大事就是叫作复辟。在现在来讲，就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它并不是要复那个周礼，那一套东西，而是要恢复资本主义。特别是值得注意，当时的背景是，我党召开了“九大”之后，他们在不到三个月里头搞的。还有一条，就是材料里边，二十四页里边所谓讲绝了的问题。他们在黑笔记里头，有这么一段，说，“凡事勿做绝了，做绝即一点论，必有恶果，果大则显，果小、或其他力量能压得住则不显（但大胆肯定必有恶果），例，绝则错，什么例子呢，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对赫骂绝了。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对大公做绝了。‘才不可露尽，势不可使尽’。”（反革命分子叶群她亲笔的笔记，一九六一年到六四年之间的。）象他对比之话，孟子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是“仲尼”，讲的是孔子了，“不为已甚者。”就是说孔子不做太过份的事，不做绝了，是一

样的，那么对于林彪他所讲的绝，我们也得给他加以翻译。他所谓的大胆肯定必有恶果，就是说，我们不能够革命，不能够造反，不能够反潮流，要这样做那就必然有恶果，这就叫反对革命，就是反革命。他讲“阿处女政局委员做绝了”，是谁呢？就是阿尔巴尼亚的，大家都知道的贝利绍娃，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一个间谍，一个特务，他支持的是什么人呢？支持的是苏修的特务。说“对赫骂绝了”，对赫鲁晓夫骂绝了，怎么骂绝了呢？当时赫鲁晓夫他们到我们国家里来，搞什么呢？说是要提出来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他们的阴谋是要控制我们。这是一场非常严重的斗争，它涉及到我们党，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一件大事，现在的事实、别的国家的教训已经证明这个问题了。当时我们主席说，我们自己搞。因为他们要想搞合股一个公司，实际要控制我们，主席说我们要自己搞。他们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合起来搞，就是要控制我们，主席说，要搞，我们不要了。你不是要搞什么共同舰队吗，要搞我们一些个沿海，要控制我们整个沿海。搞长波电台，主席说我们不要了，上山么。同志们，知道上山是什么意思吗？主席当时讲的上山，就是要上山打游击，要揍他。所以林贼在这时说，骂绝了，对赫骂绝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我们同修正主义作斗争，他要控制我们，要颠覆我们，我们主席顶了他，同他们斗了，保证了我们国家，我们党不变颜色。“对明斗绝了，乱了套”就是对王明，王明他是执行错误路线的，先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后来从苏联回来，又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主席领导全党同他进行了坚定的斗争，清算了他这条错误的路线，保证我们党沿着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使我们取得了胜利。怎么叫乱了套了呢？说明林贼完全是站在王明这个反党、反革命分子一个立场上，他们是一丘之貉。“对于大公做绝了”，大公就是苏修，就是他那个俄罗斯。什么做绝了呢？他们把专家撤退了，把我们那一些个项目工程搞了半截，他们就甩手走开了，甚至于把一些个图纸都拿走了，他们这样的整我们，想卡我们，结果怎么样呢？在我们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搞得更好更快。所以，他这些黑笔记里讲得做绝了，完全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主席，反对我们主席的路线，反对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立场上说的。

江青：也反对全国人民噢。

迟群：反对全国人民。

江青：也卖国嘛。

迟群：还有材料上林贼有一句话，是六〇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叫两斗皆仇，两和皆友，这里正好对比着子曰，孔子讲的，“礼之用，和为贵”，“礼之用”就讲的周礼。“礼之用，和为贵”，林贼讲的两斗皆仇，这完全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混水摸鱼，他骗人的，他分裂我们革命的队伍，所谓斗，我们有两种性质，一个同阶级敌人斗，一个还有我们队伍内部的斗争的问题，因为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我们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一个斗争问题，这样一斗就是仇，仇人了，敌人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也是用这样一个指导思想，去分裂了我们一些革命的队伍，所以我们且不要上他的当，被他分裂了的地方，我们要团结起来，批林批孔。“两和皆友”恰恰刻画出这一个右倾投降分子的一个面孔，他要谋害我们主席，要谋害我们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要砍我们的头，那里还有和呢？完全是骗人。后边一句话也是给他作了注解的，说“勉从虎穴暂栖身”，后边的话就不读了，这是抄录了《三国演义》里的一句话。

江青：后边应该说，这一首诗呀，他用了，恰恰是刻画他这个反革命两面派，你得都读，因为到会的同志没有拿到这个。

迟群："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二十七页第六个问题。"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是一个条幅。

姚文元：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自我暴露他怎么搞反革命的两面派，他除了改了一个字之外，这两句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

迟群：刚才文元同志讲，就是他后面那两句、特别后边那两句他是搞反革命两面派的，除了改了两个字，因为这个暂栖身，原来那个《三国演义》上叫"趋身"，就是趋向的趋，"暂趋身"，他把个"趋"字改了个"栖"，栖就是住的意思。两栖动物那个栖。

江青：这一段要文元同志解释。

姚文元："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把这个"趋身"改为"栖身"，"栖身"就是暂时住一住，鸟啊栖在树上，就是说他是这里讲的对啊，分析得很好啊，不打自招地告诉他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他是"栖身"嘛，栖身之后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要杀头啦，就要谋害毛主席，谋害党中央。运用什么手段呢？"巧借闻雷来掩饬，随机应变信如神、，就是你看到什么气候要变，随机应变，这样子混过去之后呢，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就搞反革命的政变，这又暴露了他是野心家、阴谋家，又暴露了他搞野心家、阴谋家的手段，是反革命两面派。我这个理解对不对啊？

江青：对。

迟群：那就可以了，我就不解释了。文件里因为里边还有很多就不多说。

江青：这里搞错了一个字，"韬讳，操之论英雄，胸有大志，腹有良谋，就是范蠡、春秋战国。"是一九七〇年三月十三日。同志们，那个时候就是搞《"571 工程"纪要》的时候。《"571 工程"纪要》，大家在座的同志都有了，这个你们没有，所以我想这要说一下、实质上不是"韬讳"，是"韬晦"，他要把自己藏起来，藏起来，反革命、所以他搞反革命两面有很多东西我们都不知道，还欺骗我们，伪装。

迟群：他就是说把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作为一个虎穴了，栖身嘛，藏起来，搞了许多画皮了。

江青：七〇年他搞国家主席，就是这个"名不正言不顺"这一段、这七一年三月搞《"571 工程"纪要》，就这个小讳，刚才讲错了，历史背景。

迟群：林贼呢，他本来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的大党阀、大军阀、四书五经他也没有看，但是为了他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推行他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的这条路线，所以他就找了一伙子人，为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东拼西凑，分类摘抄、搞了大量的卡片。这卡片上他们还有一些记号，批了一些话。

江青：我补充一句。主席说，才不要迷信他什么读了什么什么孔孟的书，他才不读书呐。这个话原文就在这个地方。哎，林彪是个政治骗子，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是个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这是我们主席讲的。

迟群：当时江青同志叫我们去了，又到了林贼的黑窝去，我们去翻箱倒柜，查出了一些东西。首先看到有一层楼，就是他找了一伙子人专给他搜集这些卡片，搞阴谋诡计的那些东西的一层楼。我们看到了一个房间有四十七盒子卡片，其中搜罗了不少古今中外反动腐朽的一些东西，有些卡片是林彪、叶群他们批批划划，放了许多毒，极其恶毒。他们恶毒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攻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篡改马克思主义。譬如说他们就在一些卡片上写，"两分法是思想水平低"，他们宣扬世界上一切等于一锅粥。屁也不懂，这是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他是为了搞阴谋的。他混

淆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它的界限，他们利用历史来反党，进行阴谋活动。譬如说，他抄录了德国俾斯麦的反动言行，德国的一个反动的一个头子了，一个首相了，所谓基辛格所崇拜的一个德国首相了。他挖空心思地研究剥削阶级统治人物的上台和下台，怎么上的台，怎么下的台。他利用语言文学，来进行反党活动，等等。这里举一个例子，这事情都使人很吃惊的。

江青：我想提几条给同志们，很简单了。林彪不是唯心主义的天才论吗？他有这样的话、一九六六年，"这样的天才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孔孟呢，就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五百年必百王者、就是说出一个人材了。"其间必有名世者"、就是出名在世界上。这是他们的罪证。我们的主席怎么批他这一段呢？这说得过分了嘛，根本没有天才。这个我不讲，就是说他说得过分这一点，我来补充一下，我所听到的，可能不完整，和主席的意见，全世界几百年才能出一个，而十九世纪就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不是不是几个世纪吗？而且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了一个，为什么这么自卑感呢？中国就在二十世纪初吧，还出现了孙中山嘛，主席举了，还有洪秀全嘛。洪秀全，同志们知道吧？太平天国的领袖。这个还举了几个，我一下子都记不清楚了。总而言之，他这个他这几句反革命的话，对中国人说是踏到地上，外国人他也说的不对，几百年，中国要几千年，因为中国人人家讲我们是东亚病夫嘛，过去，帝国主义，他接过来。这个地方我想讲一下，因为许多同志们还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外呢，林彪的这个政治纲领啊。除了设主席以外，就是天才论了。他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这个文件上发了，孔孟怎么说呢？孔孟说，"不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就是说没有君子，就不能统治咱们的劳动人民，而没有劳动人民呢，就没有人养他那些鬼君子。这就是他们一个鼻孔通气。我们这儿，他们可能没有准备，我就提一下。

迟群：这些卡片中有一些个目录上面写的"上下关系"、"干部政策"、"追求真理"、"有勇有谋"、"辩证法"、"唯物论"等等。原先我们认为这后边都是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我们主席的一些话，结果一翻呢，下面都是子曰。他的干部政策也是子曰，辩证法、唯物论也是子曰。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一句，"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他也写到这就是辩证法。还有他的所谓唯物论，是"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这就是唯物论，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了。

江青：这个地方我们准备不足，.我要再说一下，林彪啊、对秦始皇，他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孟呢，"秦……重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这是董仲舒的啊，就是汉朝的那个天下一孔孟，这个家伙。那么我们的主席怎么样驳林彪呢？我们的主席说，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这个大概因为还在档案馆了，是为了搞专案才弄出来的。我们的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我念一下，这个我们的主席当场驳了他这以后，接着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四万六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了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现在苏修、美帝大骂我们批孔啊，蒋介石最近他们又祭孔了，还有香港有的教授抗议呀，说我们批了他的老祖宗啦。我们的主席是有这样的气魄的，实质上我们的主席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当时骑在人民头上的民愤甚大的、有血债累累的，你要不杀，群众起不来。我就土改的时候就杀了一个恶霸，不杀他群众起不来。在全国范围，我们有几亿

人口啊，还是比不上秦始皇呐。同志们请算一算这个比例噢。我们现在是几亿人口，将近八亿了吧？总理，算八亿了。看那个时候只有多少人口啊？这当然要去问问我们的老先生们、查一查，因为汉志有人口的。唐朝好象只有六千万，秦更少了，连年战争嘛，又是从奴隶制转到封建制，所以那时人口是很少的，恐怕还比不上咱们现在一个省啊，这是个比例啊。我们的主席对于重要的案犯都不准虐待，养着留活口供。同志们都知道，这个传达，不许逼供信。所以在这儿主席这样子是驳那些资产阶级谬论，才这样说超过了一百倍。

迟群：他这个唯物论里边还有一句话，他们引的卡片，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馀所在。"就是说他的唯物论就是说要说假话，说了也可以不去做。还有他在所谓"组织观念"这一个栏里边，他们引的孔子的话，一个意思就是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讲的是什么呢，组织观念呢，就是说当时在周朝的时候，天子要是宴会的时候，要找人唱，载歌载舞，天子找的是八排八个人，就是跳舞的，八八六十四个人。当了诸侯呢？就得降一级，就是六排六个人，六六三十六。那么到了大夫这一级呢？再往下降，只能是四个人，四排，四四一十六。后来慢慢地这个地主阶级慢慢地兴起来了，这时候下面就不管那一套了，连个大夫一级的，他也来了个八八六十四，他也不管你什么四四一十六了。所以关于这个林贼把它弄到组织观念。

江青：天子，天子，八佾之舞，六十四。

迟群：八佾之舞是指天子，六呢，是讲的诸侯，四个是讲的大夫。所以他用这个、把这些东西归纳到组织观念，这林贼。还有"坚持真理"这一栏里边，他引了孔子的话，叫作"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是蒋介石他们经常鼓吹的就是不成功便成仁，这就是追求真理。

江青：蒋介石老说的。

迟群：这是他们引的是这一些了。还有他们在论学习的这一……

江青：他（指蒋介石）的老婆子当时他们那些人跑到那个岛子上去了。他们张灵甫也不是，《南征北战》的张灵甫也没有成仁，那是歪曲，张灵甫是被我们的战士打死的，因为他杀我们的人太多了，我们的战士气愤不过打死的。当时要为了使起义的人能多一点、所以就歪曲了这段历史。今后至于《南征北战》我们就要改回来，他是投降的，这个样子的。张灵甫啊，孟良崮他的王牌军队，我们的粟裕同志还在嘛。涟水战役七战七捷，我们的主席和中央要他撤，我们的战士说打了胜仗还要撤，不哪。当时中央、主席坚决要撤，要保存有生力量，才能歼灭敌人，这个王八蛋，张灵甫啊，杀了我们的人太多了，战士打死他，应该原谅这个战士，违反了主席的俘虏政策，不是一个战士，好几个人。王牌军啊，蒋介石替他、替戴知琪开了追悼会的，都是他的王牌军，全副美式装备，七十四师全副美式装备，我们是小米加步枪。

迟群：林贼在论学习的这一个栏里边，摘了孔子的这样一些话，论学习，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学习，"学也禄在其中矣。"禄嘛，就是金钱啦，地位啦。还有，他们在一些卡片上搞的批语，他们批些什么话呢？我也摘了一点，相当之多了，在这里给大家介绍那么几句了。他们批的是这样的话，"古皆真话惹祸。"就是从古以来，说真话的，都要闯祸的，都要惹祸的，都要惹祸的。"好坏正义，非正义，以利益为标准。有利就是朋友，不利就是敌"。他们还胡说八道，说"生产前必须生活，生活前必须是肉体的存在"。(共产主义只讲生产，未从根本上说起）完全是胡说八道。再说，他们还写了这样一些话，"进庙多磕头，少说话，说好实质是懂事，说坏是大是大非，政治工作是危险工作"。这回找着根子了吧。、懂

决心方能当统帅，统帅是决心帅也，希特勒未当好大统帅也。大致艺术不差，只差一字之差、所以才复国旺盛。。"意思就是说，他不懂决心。另外，还有的讲，他们还在卡片上题的三保："要保官、保产、保命。"另外还讲，说是德国那个反动首相俾斯麦，他只有用轻蔑的眼光和铁的手腕来对付人类。

江青：俾斯麦，德国的，镇压巴黎公社的那个宰相，德国的，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

迟群：还有他们讲所谓的养身之道，说，他们写的"口张言少"，口嘛就是嘴，言少，说话少。"心中事少，肚中食少"食就是饮食的食，吃饭的，食少。"子言虽少，以此事少，神仙可了。"胡说八道。另外，还批的三声好听，有三个声音好听，书声，就是诗书的声音；歌声；小娃声，娃娃的声，小娃声。唇是圆的，嘴唇是圆的，天是扁的，天空是扁的，话是转的，说话是转的。他因为对这个他有好多的批法，还说"嘴是扁的，嘴是扁的，舌是圆的，舌头是圆的，话是转的"。"人情大于王法。千里做官，为了吃穿"。他们还有一句话抄的，叫作"打起红旗造反，叫人不易看穿"，非常之重要，这是一语道破了。他们还搜集了一些所谓一些语言文学里头一些话，象什么，他专门搜集这样的东西，叫作成语，里边什么"口蜜腹剑"，"两面三刀"，"过河拆桥"、等等。还有什么"辣手造乾坤"，辣手，就是手段要毒辣，才能造乾坤，说的就是改造世界，创造世界了、等等吧。所以说，林贼是历次我们党内机会主义头子当中吹捧孔孟之道非常突出的一个。所以主席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所以我们批孔，中外反动派都在反对，蒋介石他一直是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的，这我们大家都了解。最近，蒋经国又在说，今天批判孔子，（就指的我们现在批孔）就是批判中国文化，就是清算中国人。严家淦，是他的副总统，最近也说，我们与中共的作法，是完全不同的，中共在大陆上搞批孔运动，而我们是以孔子哲学为依归。依靠的依、归宿的归。还有些话了，不说了。苏修最近发表了一些许多的文章，就是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还有象那个帝国主义的小走狗阮文绍，也在攻击我们批林批孔，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的政治路线，他们的哲学立场，是反对社会进步，反对社会的变革，主张历史倒退，他们反人民的，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这样一条政治路线。同时，也恰恰证明了我们坚持了一条主张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他们是搞中庸之道，就是讲折中主义，调和的，反对搞阶级斗争。在这个材料的二十三页，林彪讲中庸之道合理，是七O年三月十三号口授，叶群亲笔记在所谓的一O一谈话笔记本上。那么，孔孟呢，他也有论述，所谓的论述了，"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朱熹注了这句话，"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这里作了一个翻译，是中庸作为一种道德，该是最高的了。翻译孔孟的话。老百姓缺少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既不过度又没有不及叫做中。庸，是任何时候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程子说：不偏就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就叫做庸。中是天下必须遵循的道，庸是天下永恒不变的理。

姚文元：这个中庸之道啊，是历史上反动派向革命的阶级、革命的人民进行复辟，进行镇压，进行反攻倒算的一种虚伪的、很毒辣的武器，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孔夫子是这样，搞中庸之道，但是七十二而诛少正卯啊。林彪也是这样，讲中庸之道合理呀，他就不搞，他那里呀，他就是要暗杀、要杀人哪。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搞《"571工程"纪要》的反革命政变纲领。毛主席历来主张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看世界上的问题，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毛主席认为看问题，应该是要全面的

看，要有分析，但是要反对折中主义，这是一致的。同志们只要看一看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农民运动轰轰烈烈起来的时候，毛主席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驳斥了那种打着中庸之道的幌子，来反对农民革命运动，当时就是有一句话了，"矫枉不能过正"，毛主席就驳斥了它。什么"矫枉不能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在革命高潮的时候就是这样，当蒋介石反动王朝将要覆灭的时候，当时又有一些所谓的自由民主人士拿着孔夫子的中庸之道，想保存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就是以南北为界，要解放军不要再打。毛主席反驳了这种论调，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这篇文章就是反驳中庸之道的。毛主席指出：一切革命人民和人民的朋友要更加巩固的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到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执行了毛主席的路线，粉碎了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有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时也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保护反动势力的阴谋诡计，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就有了今天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青：我想说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也是很尖锐的写的这个问题。当时巴黎公社要起义，马克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是对革命可能不利的，但是当巴黎公社起义，起来以后马克思是欢欣鼓舞，他的《法兰西内战》是写的非常的深刻，非常的动人。马克思从来不搞折中主义，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就是这个在原则上不能作交易。我补充这一点。

迟群：这个正说明了我们党，我们主席坚持了社会的进步，社会的变革，强调了抓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路线，这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批林批孔使帝修反非常的惊恐，这正说明历史上一切行将灭亡的阶级，一切反动派，一切开历史倒车的人都要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现在则用他来恶毒地攻击和诽谤我们党，我们主席，我们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攻击诽谤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和文化大革命，攻击我们的批林整风等等。所以，批孔是批林的深入，是贯彻"十大"、元旦社论中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在批判中建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批孔中，批林中结合批孔，要从阶级立场，阶级根源，阶级就是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从哲学的观点，理论基础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等方面来认识林彪与孔孟之道的关系，这样才能深入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的极右实质，挖他们的祖坟，挖他的这条路线的老根，把林彪散布的反动谬论批深批透。通过批林批孔，将使我们进一步地打破旧的传统观念，同几千年来的旧的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获得思想上的解放，这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以及反对帝修反有着重大的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下面座谈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联系实际问题，因为时间关系简单讲两句。这个问题有些人有些糊涂认识，说是孔子流毒咱们人人身上都有，所以我们人人都要作检查，都要挨批了，后来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什么是实际，联系什么，联系最大的实际，最本质的实际就是林贼他要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妄图谋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要叛党叛国，要当汉奸卖国贼。这就是最大的实际，丢掉了这个实际去联系，必然要走偏方向。

江青：当我们的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二十七次会议上，主席讲，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点象梁先生。梁先生者，何人也，梁漱溟也，他现在还反对我们，反对我们批孔。他是尊孔。"吾自得子路而谋生，无辱与尔"，这是孔老二

的话，"三盈三虚"，这不是，这是荀子的话，"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我们的主席说孔老二有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我愿朋友们尤其是梁先生不要学孔夫子这一套，则幸甚。那么当时讲的这段谈话，象梁漱溟这样的先生老爷，会不领教的。《关于孔子诛少正卯问题》，赵纪彬教授很详细地考证了资料，反复核对了，写了这本书。这本书是出版了的，如果有的同志有兴趣学，我建议学，可是比较难一点，不过也没有什么，世界上没有难事，只怕有心人。

迟群：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样联系实际啊，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拍的一个纪录片，叫作《中国》，我们翻译过来的了，据说是还给有关的外宾去看，去作为介绍中国面貌的一个片了。该片里头有很多话，我就举两句，因为有的没有记清楚，里头有这样的说明词，说是中国人他们的生活是痛苦的，但并不悲惨，他们怀念过去，但是他们既怀念过去，也忠实于现在。他们尽拍了一些歪曲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镜头，我们有些个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个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和他们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搞你这个形象，所以象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吗？而我们有的人，出去拍别人的、到国外去拍片子，拍什么呢，生怕露了一点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的那一点表面的骗人的繁荣，对于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的受压迫的人民那些痛苦的生活，那种景况，一点也不敢往镜头里去拍，是什么指导思想？难道批林批孔不应该联系吗？我们有的人就在那里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五七干校执行主席的这样一个指示，他说要还给我青春。这样的人不应该联系吗？教育战线上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一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一个中学所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十五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昏头胀脑。家长们都提出意见，说这样势必把学生身体搞垮，他们完全违反了主席的指示，不要把学生当作敌人，不要搞突然袭击，不要搞闭卷考试，要开卷，可以交头接耳，他们不，搞 A、B 题，要互相背着答题，每天考一次，所以这个女孩她就有反潮流精神，她就写了一些个意见上面，结果就给逼死了。

谢静宜：全校批判。

迟群：全校来批判人家，还，还把人家家里还诬蔑人家。说他们家里人有跳井、跳河、跳坑的习惯，这么样诬蔑人家。

谢静宜：贫下中农老大娘说，这是对我们贫下中农的诬蔑，根本没有这回事。

迟群：没有那么回事嘛，所以，

江青：这个材料是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人民日报的记者有一功。

迟群：那里完全是在反攻倒算，体罚学生，扎针，有一个教师学会了针灸，那是本来是治病的，后来发展成什么呢？就是谁要所谓他们讲的调皮捣蛋，就说给他针灸针灸，就扎得你，反正是叫你难受，这样……

谢静宜：说扎一个好了三个。

迟群：因为有几个他因为那几个调皮是扎他一个，那几个说是……

谢静宜：吓的就赶快跑了，是这样的，扎跑了三个。

迟群：不得了，完完全全是法西斯专政。象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江青同志批了以后，

我们去了，去了，这个我们也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也到了他们小队，大队，学校，公社，县里，地委都去了。

谢静宜：到了他们家里进行家访。

迟群：到了，见到她父亲、她母亲、以及他的其他的一些亲属了。那里从县里头，当然教育部门还是主动反映了这个问题，教育部门，但是县里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也还是有些问题的了，公社里的第一书记，事情发生了半年，没有到这个人家里去，没有去看看人家的父亲、母亲，就隔了那么三、四里地，所以这一次他们都作了一些表示了，当然还要看下一步了。说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这样忙，还看到了这件事情，派人来。直接到了公社去，到了大队，小队，到了本人家里去，我们就离得那么近没去。我说那不光是个领导作风问题，查一查你们里头有没有什么背景，因为我们去，还让那一个逼死学生的人给我们带路，这事就莫名其妙了，事到如今还没处理这个人，而且给了人家五十块钱，县里头说，那从教育经费挤出一百块钱，加起来县和公社给了一百五十块钱，人命逼死了，只值一百五十块钱。这是路线斗争问题。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所以当时江青同志要了一份关于南京一个大学生走了，叫钟志民，就是一份申请退学的书了，大家可以再看一看，我们是在路上听到了广播发表了这个消息，那个按语说得很好。讲了两条，根本问题就是说，要搞马克思主义，还是要搞修正主义的问题，那批孔，孔老二就是嘛，学而优则仕嘛，我们把自己的孩子看成是私有财产，看成是商品了，有的人。

江青：叫钟志民。他的父母现在接受儿子的意见，作了自我批评，我们也准备在人民日报发表。

姚文元：这里顺便说一下，请人民日报把新华社的一些清样，就是关于父母接受批评，请你们把这些东西，采访的东西编一个报道，加上一个按语，加以支持。顺便插一句。

江青：另外，还有一个很好的典型的例子，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人了，而是一批上山下乡的青年，就是湖南株洲市办的厂社结合，他们派了最好的最有觉悟的贫下中农，男的女的都有，去照顾上山下乡的青年。这个点是人民日报的内参，我现在请人民日报的同志再去深入地调查研究，如果这个典型啊，能够普及呀，是可以减少城市跟乡村的差别，是可以减弱知识分子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这个是非常好的，大有前途的。这个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在这儿道歉，因为我的疏忽，在这个材料第二个补充通知啊，总理是要我帮他，因为有疏忽，第二个学习单元里应该有周一良教授写的有关唐朝柳宗元《封建论》的那篇文章，人民日报转载了，因为是我让他们转载的，这篇文章很值得看，这个我忘了，再补充一次。

迟群：当时关于钟志民的问题，总理也有指示。就是当时他们叫说是退学，但是省里头决定，说是还保留他，在学校里学习，保留，就是继续学习。后来我们给他们打招呼，你既然申请退学，要造反你就彻底造反，不要人家造反，还不让人家选反。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检查，那里首先就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党委常委的一个孩子，是走后门进去的，所以我们首先作了自我批评，开了常委会的，在书记当中也专门作了研究，坚决退回，从一外退回来。但是，不光这一个人。所以，要想到我们的教育战线现在有一亿七千多万人，你开了这样一个口子，就不得了，它关系到上山下乡的问题，关系到一些人参军、招工、上大学等等，我们接班人的培养的问题。希望错了纠正，纠正的越快越好，另外，还有的单位，有一些个扯皮的问题，但是看我们正确与否，就是看我们是否执行了主席的路线，你是否团结了百分之九

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没有做到这一点，谈不到正确，没有做到这一点，说别的统统是屁话！你什么正确，你正确你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

另外，我们要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要针对着林贼，他所提倡的，我们就要反对，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他要搞修正主义，我们就要通过批林批孔，搞马克思主义。他要搞分裂，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团结。他要搞阴谋诡计，我们通过批林批孔，就要搞光明正大。我们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东西南北中，那里都可以去，但是不要能左能右。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总理读了那些信，对这个信，我们和谢静宜同志我们商量过多次，怎么来看这个信？我们认为这个信，写信人也不是孤立的，就是说，也不是江青同志一个人的意思。第二，写的信也不只是一个批孔问题，它涉及到整个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一场革命的问题。它也不只是写给一个连队和一个部门、一个地区的问题，它是涉及到我们全党全军全国的问题，它是体现和坚决贯彻执行我们主席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思想政治工作，关于能文能武等一系列的指示的问题。总理、王洪文同志代表中央在"十大"作的报告当中，传达了我们主席的声音，就是要重视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所以，深入批林批孔，就是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一场革命，是防修反修的一个战略措施，所以它是贯彻"十大"的问题，是深入批林、批修、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所以，这些信，它本身关系到的问题是我们党的建设、军队的建设、整个革命队伍的建设，关系到我们正确地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地对待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支持和保护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成果的问题，关系到如何正确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正确理解，正确地解决本单位、本地区至今还在那里扯皮的问题，关系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要准备打仗的问题，关系到各级领导如何敢于抓大事的问题。所以，信就不是一个孤立的批孔的问题，也不是给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问题。现在有些单位，有一种不正之风，风气不正，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什么呢？就是不抓大事，或者是抓得不够。所以现在就是要造成这样一种风气，要注意思想路线方面的问题，经常研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研究我们党的政策，也就是主席提出来的总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注意研究，并且提出正确解决的办法。我们要对批林批孔加强领导，要领导带头，要发动群众，要抓典型，要进行试点，训练骨干，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要知难而进，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要开花结果，遵循"十大"的路线，我们要批出一个成果来，使思想澄清，觉悟提高，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团结，争取更大的胜利。讲的不对的地方，请中央首长和同志们批评指正。以上研究的都是我和谢静宜同志我们俩领会一些指示精神，下面她还要作补充，不对的大家批评，完了。

谢静宜：迟群同志讲了。我再补充几点，也是我们议过的事了。主席教导，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警惕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主席叫我们抓大事，我们体会到就是抓国家大事，国际大事，党的大事，阶级的大事，一句话，就是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批林批孔就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抓大事，就是要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与林彪反党集团划清界限，肃清流毒，挖掉他的祖坟的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因此，这就不是孤立的给某一个领导同志，某一个单位的写的信的问题，而是给全党全军全民写的信。也不

是孤立的在批孔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继续深入，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防修反修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问题，也是就是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

我们到了一些别的单位，去学习的时候，在座谈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绝大多数的同志和指战员同志们，对这个认识，那还是正确的，要求批林批孔的心情是非常迫切的。但是，也有相当部分同志，有某些模糊的认识。你譬如说，认为孔子还是个大的教育家呀，什么批林与批孔呢，关系搞不大清楚啊，有的说是批孔是宣传部门的事，是教育界的事情，是学校里面的事情，是历史学家的事情，是文学家的事情，那是哲学家的事情，反正就是说与本单位无关啦，与己无关啦，就是这么一些问题啦。我们认为，这都是不对的，当然有些是认识问题了。还是我们认为，批林批孔是无产阶级整个阶级的大事，不是少数人的事，是我们国家的大事，是我们全党全军全民的一个大事，也是工农兵的大事。只有发动工农兵群众起来进行批判，才能够批深批透，才能够肃清流毒，才能提高广大群众的路线觉悟和阶级觉悟。你譬如什么，文章难懂、难学呀、难批呀、难联呀，才不要相信这一套，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什么历史学家了、教育家了，文学家的事情、主席讲过嘛，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而且事实也是这样。我们下去座谈，我们觉得，广大群众通过了学以后，通过大家一议一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批判的是很好的，而且还不见得是那些高中生批判的。所以，也不在于职位的高低，不在于文化程度的深浅，而是在于路线觉悟，在于识别能力，在于阶级立场，在于认真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才不要盲目的迷信一些专家权威。就从考试一些教授来看，就破除了这个迷信了嘛，东北就考过嘛，而且这一次、北京市去年年底三十号，当天国务院科教组、北京市科教组召集会议，上午、完了之后，就在清华出题、出完了下午五点钟到北京市集合二十辆小车，同时到十七所院校去考试，当时我们说的是开座谈会，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啊，他们还真拿着笔记本，还认为开什么座谈会。我们说，今天就是来突然袭击，给你考试，你不是看不起学生吗？这么一考啊，六百一十三名教授、副教授参加的，及格的是五十三名，占百分之八点六，不及格的是五百六十名，占百分之九十一点四、还有二百名教授、副教授是交了白卷，打了零蛋的。其中还有两所学校都是考零的。还有些学校是平均零点一分、零点四分的，就是因为有那么一个教授大概考得好些，其他教授不好，那么一平均、还有零点一分、还有零点四分。

迟群：有一个单位是六个教授平均一个人一分，原来是有一个教授答了六分，其他是零分，所以一平均一个人一分。

江青：这个我还得要讲一下，有一些教授啊，他答不出来啊，是应该谅解的，因为他多年不搞了，多年不搞了，但是他经常用这种方法来整学生啊。我觉得是应该的。这个考教授，是从东北开始，就是张铁生。我呢，也冒了冒失，我也不知道谁搞的，我是在一次会议上说，我说这是大好的事情，后来不是说东北也不对嘛，东北考教授的这个人，他自己本人就是大学生，他自己先考了，结果他有几道题答不上，他说我总是个大学生吧，他这样考了教授。那么北京考了，北京考了，这两次考都有缺点了，说是没有出社会科学的题目。上海考的时候出了社会科学的题目了，你连基本路线都答错了，另外……

姚文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什么呢？有的教授答是注意清洁卫生。还有说是《水浒传》是讲什么东西呢？有的教授说是讲社会上很怪的事情。

江青：最糟糕的是，自命为社会科学家，但是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哪，五大特点

哪，一概答不上，那么，这就不能够说考得不对了。你自己专业是社会科学家嘛，列宁的名著嘛，《帝国主义论》嘛，有五大特征嘛，一个也答不上。

姚文元：儿大特征。

谢静宜：还有答基本路线是三要三不要。

江青：哎，基本路线他说是，不是，还有多快好省，总路线有的说是三要三不要。

姚文元：有的说是遵义会议上提出来的。有一位教授写了一首诗，我想也是暴露嘛，孔孟之道的危害啊，说，突闻考试实担心，突然闻到考试，实在心里很害怕了，此事当年害学生，这件事情当年害学生，指的从孔夫子下来害了多少人，搞资产阶级呀，修正主义呀，苏修那一套啊，此事当年害学生，今日临头试滋味，今天临头我尝到了这个滋味，从今开始做新人，从现在开始要象，现在是谁，以张铁生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谢静宜：所以考完了，考糊了，有的说什么，这一次啊，我对张铁生的信才有体会啊，所以教育革命，一些旧的制度，原来的一些旧的制度啊，非要改革不行，我们一定提一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有些这样的，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是不满意了，到现在也还是不服气，也有那样的。所以这是一个例子。譬如在批林整风这个过程中，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好象是些难题，就是这不理解，那不理解，但是到了工农兵那里呢？很好解决问题。劈如说，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妇女，她说为什么不理解呢？她说林贼出来，我们是完全理解的，她说千尺的水深能看清，寸厚的人心看不透，你不暴露他怎么能知道呢？说他不暴露啊、咱们怎么能知道呢。因为还有一个贫下中农老大爷讲了，它就象我们种庄稼选种子一样，种下去之后，选完种，挑了又挑，选了又选，种下去之后，我们又浇水，出来了苗又锄草，我们总希望它长个好庄稼，而最后呢？谁知道它长了一个大乌米，

迟群：有的个别的长了个大乌米。也有个别的。

江青：孔孟之道啊，有"三纲五常"，其中一纲就是对着我们妇女的。

谢静宜：譬如说，搞封资修这一套，工农兵是外行，但是批判呢，封资修，工农兵是内行。还有什么难学呀、难懂、难批、一大堆的难字，一堆矛盾。但是，主要的矛盾就是要不要批判的问题，这是要害问题，这是根本问题，这是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有决心要批，敢批的话，就不怕困难，就会知难而进，迎着困难而上，而不是知难而退。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要有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要敢字当头，因为这是挖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祖坟，是啊，向封资修帝修反的宣战。所以要把批林批孔看成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所以，不懂不是主要矛盾，不懂可以问嘛，不会可以学嘛。主席讲了，入门并不难，深造也是可以办得到的，是人的因素第一。关键在于觉悟，在于学习，敢于斗争。一个善于抓大事的人，一个有创见的人，一个敢于反潮流抗逆流的人，一个敢于向帝修反作斗争的人，一个谦虚的人，必然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就是要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所以，我们体会到，不怕人的水平低，就怕你不学习，就是不学习马列主义，不学习主席著作。不怕你能力弱，就怕你没有干劲，没有革命的干劲。也不怕你事情多，忙，就怕你不抓大事、不抓大事，那就是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么，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不怕你摊子大，就怕你不抓典型，因为没有典型就没有领导。

迟群：没有发言权。

谢静宜：毛主席就是善于抓典型的典范。江青同志这次写信，送材料，就是贯彻执行主席抓典型的指示的。江青同志抓样板戏，我们感到这是抓典型，而且最近又抓了好多关于教

育革命这方面的一些典型，把教育革命现在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是抓典型。而对于这个，批林整风的问题，批林批孔的问题，我们认为这又是抓典型，是抓大事，就是要点起批林批孔的烈火，就是要深入开展批林整风运动，提高广大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所以，我们觉得要克服一切困难，排除一切障碍，掀起批林批孔的高潮，就是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我们各项工作做好，因为这是一个纲嘛。

再一点，就是从一个材料上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于批林批孔的认识还有一些问题的。你譬如说，把批孔定出什么样的口径呀，批到什么程度啊，定出一个什么标准哪，口号怎么提法，位置怎么摆法，什么还讲了不能搞运动啊，不能登小报啊，军区的小报上不要登批林批孔的文章，等等。这么多的清规戒律啊，这是实际上是下的禁令，就是不让你批孔，实际上就是不批林。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从那里那些框框来的，那儿定的调子，所以才不要相信这些屁话的。

谢静宜：我念念这个屁话吧。总政宣传部一个负责人在战备教育座谈会上关于批孔问题一段讲话。关于批孔的问题，最近中央报刊发表了一批文章，军队怎么搞？总政宣传部根据总政首长的指示，拟了一个意见，已通知下去了。主要谈了三点，一是批孔的意义。二是批孔的位置，要把批林摆在首位。三是批孔的方法。对批孔再提两点，请大家注意。一是批孔的口径，批什么问题，批到什么程度，一定要以中央报刊为标准，不要乱批，不要乱提口号，不要乱点名。二是批孔的位置和声势，一定要按"十大"精神办。实际上他没有按"十大"精神办。"十大"强调一定要把批林整风放在首位，批林可以联系批孔，揭露林彪利用孔子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连队可以讲讲孔子是个什么人，批孔的意义，引导学习中央报刊的批孔文章，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整个这一点，就是不能把批林和批孔并列，不要把批孔搞成运动。军队的小报要注意掌握，不要登载部队批孔的活动，发表批孔的文章在数量上也要控制，不能搞多了，内容也要很好进行审查。你审查什么不知道！

江青：屁话！就是主席讲的屁话。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

江青：不准批林，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

谢静宜：批孔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在去年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嘛，那时候就讲过这个问题，而以后呢，主席又非常关心这件事情，这一次七四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是主席批示转发的嘛，是党中央同意的嘛。因为我们在下面的一些座谈会上，有的同志说，部队为什么不动呢？他们说，一是有的同志把批孔与批林与贯彻"十大"精神割裂开来了，对立起来了。这个问题，"十大"精神，总理报告、洪文同志的讲话当中，首先第一条就是要继续搞好批林整风嘛，敢于反潮流嘛。但是有的单位呢，对……

江青：在这个"十大"、"十大"的党章讲话，王洪文同志也特别提出，这是主席讲的，反潮流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原则，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的总纲上了。

谢静宜：但有的单位呢，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其实这样就是不批林的问题。二是有的同志把批林批孔与军队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所以那么离开了批林批孔，离开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离开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你军队建设还有什么可言呢？

迟群：还有国家机关建设，就是说，整个的党的队伍的建设，我们革命队伍的建设。

谢静宜：你这样的话，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提到纲上来嘛。

谢静宜：所以说呢，不批孔呢，种种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你作为一个领导，你领导什么？关键是领导抓大事，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所以，对批林批孔的问题，是批呢还是不批、

是促进还是促退，是赞成还是反对，是积极呢还是消极，是对每一个革命者，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一个考验，是马列主义、是真马列主义还是假马列主义的一个试金石。

最后一点，就是要敢于反潮流，抗逆流，坚持斗争的哲学。主席指出啊，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革命精神的表现，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一个革命者就是要为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到天不怕，地不怕，特别是当一种错误倾向象潮水般地涌来的时候，要敢于反，不怕有压力，就怕不敢顶，要硬着头皮顶住。要出以公心哪，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最多是一死嘛，有什么了不起。反潮流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大局，是能够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一个大问题。毛主席就是敢于反潮流，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和导师，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没有毛主席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胜利。毛主席教导，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革命的精神是斗出来的，革命的事业是在斗争中发展的，不斗则退，不斗则垮。

迟群：不斗则修。

谢静宜：不斗则修。就要敢于同阶级敌人斗，敢于同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一切言行作斗争，要敢于同一切不正之风作斗争。譬如说，走后门，特殊化的歪风邪气作斗争。这个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啊，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封建士大夫阶级的特权思想，是孔老二的思想，它严重地破坏了干群关系，军民关系，破坏我党的优良传统，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下面搞座谈的时候，以及我们在底下到学校的，在学校的工作，我们经常碰到的是这些问题，群众极其不满意呀。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个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同志不要忘了，是党是人民是毛主席给我们的权力，没有党，没有毛主席，没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有我们的一切嘛，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嘛，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嘛，我们只能有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的义务，丝毫没有搞特殊化的权利。什么，就是在我们碰到一些问题上，经常有这样一些体验，这个人不好办啦，什么不同意呀，领导就不会高兴。我们办事情要让谁高兴呢？应该是让党高兴，让党高兴，让毛主席高兴，让全国人民高兴。要符合原则，就是符合党的原则，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原则。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主席要我们做的，我们一定要做好。什么走后门，等等，领导同志批准了，某某领导同意了，不好办呀。我们说他指示了同意了，算个什么！毛主席对关于杜绝走后门多次的指示，多次的指示，你知道吗？应该按照谁的指示去做呢？谁的指示最重要呢？服从谁？应该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嘛。有些人总是口口声声说他忠于毛主席，但是不照主席指示去做。可是某一个领导人，为了让自己的子女当兵上大学，什么一批示，一点头啊，一个电话，比主席的批示都重要哎。这是为什么？几千年的封资修的流毒，孔老二的一些流毒，旧的习惯势力，还有什么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裙带关系，把一些人就给俘虏了，这些关系超过了阶级关系，超过了政治关系，超过了党的关系。我们的干部要坚持原则，要不受捧，不受压，不受软硬兼施这一套东西。什么请客吃饭啦，他请客你可以不去嘛。所以有的群众就给我们说嘛，说："酒杯一端，政策就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可是也就有那么些人有人愿意请他的客，他就愿意去吃饭、吃饭了你不干还好嘛，吃饭吃了就给人家干，几十年的原则他都能坚持，但是一两小时就被人家给拉过去了，俘虏了。

迟群：所以就说在一个人的身上失去了原则，将在千万人身上失去了说服力。所以我们就要在第一个人身上不要失去原则。如果在第一个人身上失去了原则，那么我们就要在第二个人身上去纠正过来。

谢静宜：你这个很重要味。有的群众给我们说，他说有些领导，就是他那省的了，去给他作上山下乡的动员报告，他说你上面在讲话，底下就议论，说你有什么资格给我们作报告，你首先把你的孩子叫回来嘛，你跟我们一块上山下乡，我们没有话说，一块去。可是你说话没有用。这样的人简直是革命的败家子，所以主席讲到文化大革命搞一次不行，要搞多次。当然这一方面例子很多，因时间关系我不多讲。

江青：我在这儿要说一句话，这是少数人的事情，当然了，他也是相当典型的事情，我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我们的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下，在西沙群岛为保卫祖国的主权，打了胜仗。

谢静宜：通过这次江青同志的信，送的材料，抓典型，通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努力，特别是今天中央首长同志这次这么重视，都亲自到会，我们还是深受教育，对我们自己本身是个教育，是个鞭策。所以我们深信，我们有信心，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直接关怀下，一定会把批林批孔的斗争进行到底，以取得更大的胜利和团结。完了。

姚文元：我稍微讲几句。刚才江青同志还有谢静宜同志讲到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写进了党章，写进了"九大"的政治报告，党章报告。我想起主席一首词，水调歌头，第一次横渡长江的时候毛主席写的，"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第一，我们今天就要有毛主席横渡长江那一种迎着风浪前进的革命精神，把批林批孔搞到底。"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对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迎着风浪前进，比在平稳的环境里生活，有意义得多。一个革命者，毛主席说过，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另外一个呢，主席这个气魄大，主席是迎着风浪前进，这个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而主席提到孔子说是逝者如斯夫。孔子是个着眼于已经死亡阶级的人，一个反动派，主席藐视他，嘲笑他，批判他。所以这里一面表现了主席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一面批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要学习主席这一种反潮流的精神，横渡长江的精神，把这一场批林批孔的仗，认真地发动广大群众打好、打胜。

（当中联部政工组宣传组李宪魁讲到部领导不让印北大的材料时）**江青**：给你们送去。

〔附〕 玩火者　必自焚

——"四人帮"篡军乱军的反革命"放火烧荒"事件始末

许多同志一定还记得，一九七四年春天，批林批孔初期，首先从总政治部开始，到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曾经弥漫起一团团"放火烧荒"的乌烟邪火。

这"火"，是"四人帮"放的，是喧嚣一时的所谓"三·五"讲话点起来的。

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的"三·五"黑讲话，是一道露骨的篡军乱军的动员令；"放火烧荒"事件，是一桩彻头彻尾的反党乱军事件。今天，在举国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欢庆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大喜日子里，这一反革命事件的真相，更清楚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放毒箭祸心毕露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人民解放军，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四人帮"篡党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四人帮"对人民解放军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忧心忡忡地说："军队最危险"、"军队最难办"、"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整天做着吕后篡权梦的江青，经常咬牙切齿地唱一句旧戏："只恨我手中没有杀人的刀"，正是她仇恨军队、惧怕军队的阴暗心理的反映。"四人帮"为了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处心积虑地要把军队搞乱，妄图把我军变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一九七四年春，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了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千方百计破坏这个运动。他们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转移斗争大方向，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迫害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大搞篡军乱军的阴谋活动。

"三·五"黑讲话，就是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尖锐、激烈的时刻出笼的。

一月二十四日，他们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炮制了一封以江青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的信，突然下令驻京机关部队召开万人大会。他们指派两个不在军队工作的黑爪牙，在大会上发表反党演说，吹捧江青。他们搞"三箭齐发"，对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搞突然袭击，肆意攻击我军的高级领导机关。

二月八日，在一次会议上，王洪文、张春桥对我军高级领导机关大扣帽子，大打棍子。他们胡说什么：总参领导"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二月十日，他们在一个兵种的汇报会上，制造借口，气势汹汹地大整这个兵种的负责同志。

从一月十三日起，在军队没有任何职务的"白骨精"江青，俨然以军队的太上皇自居，接二连三地以个人名义给海军领导写信，给空军领导写信，给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写信，施加压力；并指派亲信，爪牙直接到几个连队煽风点火。他们还选派一批没有军籍的记者，到各部队领导机关，专门为他们搜集"情况"。真是乌云压城城欲摧。"四人帮"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系列部署，拉开了一副非把人民解放军整垮不可的架式。

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于二月十五日对他们作了严厉的批判。但是，他们贼心不死，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变本加厉地加紧了篡军乱军的步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抛出了臭名昭著的"三·五"黑讲话，发出了"放火烧荒"的反革命号令。

点鬼火黑话出笼

"三·五"黑讲话，是在一个不伦不类的场合抛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三月五日晚上，由"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出头，狗头军师张春桥帮腔，还有他们在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亲信捧场，召见了三个部队的人，其中有一个是当时没有职务的待分配的干部。江青以听取汇报为名，讲了许多黑话，把矛头始终对着伟大的人民解放军。

讲话一开头，江青就露出青面獠牙，气势汹汹地向着那个当时没有职务的人说："今天我

是斗胆，我不敢得罪军队，今天把你×××也请来了，就是要整一整军队。"短短几句话，毫不掩饰地暴露出了她无比仇恨伟大的人民军队的狰狞面目。

"整一整军队"，是"三·五"黑讲话的核心。为了"整"军队，江青居心险恶地给军队捏造了种种罪名。什么"军队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啦，"不许普及样板戏"啦，"有错误批评不得"啦、"看封存片军队最严重"啦，"我们的话根本不听"啦，把无产阶级的人民军队诬蔑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江青信口雌黄地给军队定的许多罪名，都是凭空捏造，只有一句话算是说对了，这就是她所说的"我们的话根本不听"。人民军队最听毛主席的话，怎么会听"四人帮"的话呢！而这正是"四人帮"咬牙切齿地叫嚣"要整一整军队"的根本原因。

为了"整"军队，江青打开她的"帽子工厂"，恶毒地诬蔑攻击我军各级领导干部，从军委领导同志、军区负责同志，到高级领导机关和其它一些部门的负责同志，都逃不脱。她泼妇骂街地咒骂这个是"军阀"，那个是"坏人"。一九七三年九月，中央领导同志曾观看过一次部队文艺演出，并接见了各单位领队，江青不知羞耻地硬往前钻，突出自己，挤在两位党的副主席的前面。一位部门负责同志在向大家介绍中央领导同志时，没有在介绍党的副主席之前介绍她，把她跳过去了，她就一直怀恨在心。"三·五"黑讲话中，她狠毒地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对我有刻骨仇恨"，"不是个好人"。江青在讲话中还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口大骂军队各级领导："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他们"指的是谁？江青召见的那个人在传达这篇黑讲话时作了注释：这就是指部队的"高级干部"、"坏头头们"、"这股势力相当大"，"各军兵种也有"。"四人帮"妄图打倒一大批我军各级负责同志的险恶用心，在这里不是昭然若揭吗！

怎样去"整"军队呢？怎样打倒一大批军队负责同志呢？江青在破口大骂一顿之后，发出了"放火烧荒"的反革命号令。她声嘶力竭地叫嚷："看来要夺权。"露骨地指使被她召见的人："你们要放火烧荒。""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她又指令那个当时没有职务的人"把军队文化工作管起来"。江青还得意忘形地扬言她"要管军队"，她说："我是有军籍的嘛，我已经去领军装了。""四人帮"利令智昏，不打自招地暴露出了他们妄图篡夺军权的狼子野心。

煽阴风烧向全军

"放火烧荒"的反革命号令一发出，"四人帮"便一齐上阵，煽风引火，推波助澜。他们上下夹攻，内外策应，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恨不得把伟大的人民军队翻个底朝天。

"放火烧荒"的主要目标，是搞乱我军高级领导机关，妄图从这里打开缺口，一举把军队整垮。"三·五"黑讲话，首先是拿总政治部开刀，在总政造成了混乱。紧接着，他们又把火引向总参谋部。

三月六日，也就是"四人帮"抛出"三·五"黑讲话的第二天，政治流氓王洪文窜到总参，杀气腾腾地叫喊要揭开总参的"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

三月十五日，王洪文更恶毒地诬蔑叶剑英副主席兼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维持会"，胡说什么，"真的打起仗起，会有维持会长、副会长，一套班子齐全。"他们丧心病狂地攻击叶剑英副主席、妄图打倒我军的许多高级领导干部。

三月十八日，张春桥又以处理总参一个部门的问题为借口，大整总参负责同志。

…………

短短十来天中，"四人帮"对我军首脑机关总参谋部又搞了这么多破坏，这一帮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搞乱军队，篡夺军权，是多么狠毒、多么不遗余力啊！

"四人帮"篡军乱军还有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就是破坏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早在"三·五"黑讲话之前一个多月中，"四人帮"就多次对解放军报社进行刁难、攻击和迫害。"放火烧荒"的号令一发出，他们迫害《解放军报》的罪恶活动更达到新的高潮。

三月五日晚上，江青在策划"放火烧荒"时，就情不自禁地泄露了他们同时围攻和迫害《解放军报》的天机。几天前，他们曾通过亲信，派人到一个连队捉刀代笔，盗用连队战士的名义，给《解放军报》写了所谓"揭发信"。在"三·五"黑讲话中，江青得意忘形地说："战士写了揭发信……我批给军报了，叫他们在屋里张贴出来，大家批判，今天晚上军报就要开锅了！"

江青的"三·五"黑讲话，是从三月十一日晚上开始下传的。真是无独有偶，也就是在同一天晚上，"四人帮"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盗用政治局名义，勒令《解放军报》停止编发稿件，剥夺了中央军委通过报纸指导全军工作的发言权。从第二天起，在五个多月中，《解放军报》被迫变相停刊了。

在"放火烧荒"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四人帮"都作了精心策划和布置。在向总政、总参开刀之后，三月十七日，那个被江青召见的人，又以'根据铁道兵同志的要求"为借口，背着军委，背着总政，背着各级党组织，向各军种、兵种和北京部队文工团的几个人"传达"了"三·五"黑讲话。三月十八日，这个讲话在铁道兵等单位传开了。三月十九日，王洪文便立即在铁道兵机关一个人给他送的小报告上作了"批示"，让他给铁道兵的负责同志贴大字报。

"妖为鬼蜮必成灾"。在"四人帮"的操纵和指挥下，"三·五"黑讲话点起的"放火烧荒"的鬼火，从北京到全国，从部队到地方，到处蔓延，一时间甚嚣尘上。

阴谋败欲盖弥彰

伟大的革命先驱鲁迅曾经讲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撼山易，撼解放军难。"四人帮"及其死党、亲信，使出了吃奶力气，施展了浑身解数，耍尽了阴谋诡计，尽管在一些单位、一些地区造成了混乱，但是，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全军广大指战员，对"三·五"黑讲话是不满的，对"放火烧荒"是抵制的，"四人帮"篡军乱军的反革命目的永远也不会达到。他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哀叹："简直是一堆湿柴禾，点也点不着。"

"偷鸡不着蚀把米"。"三·五"黑讲话传出不久，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察觉了"四人帮"的鬼蜮伎俩。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党的原则的中央负责同志，和"四人帮"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三月二十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对江青利用特权搞阴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江青一伙的阴谋败露了。惯于文过饰非、嫁祸于人的"四人帮"，卑鄙地搞了一条"苦肉计"，妄图欺骗中央，蒙蔽群众：三月二十一日，王洪文、张春桥带着他们在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亲信，把那个被江青召见并根据他们的旨意传出"三·五"黑讲话的人叫去，当着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面，演了一出拙劣的丑剧。为了掩护江青，摇鹅毛扇的张春桥抢先撒谎。他抵赖说，什么什么话江青没讲过，什么什么话江青不是那么说的。无耻地说，江青"根本没讲那些话，也不可能那么讲"。他还故意向着他们在国务院文化组的几个亲信说："我在场，他们也都在场。我没听到，你们听到了吗?"几个亲信连忙鹦鹉学舌地说："没有听到，没有听到。"王洪文也接着装腔作势地说，传出"三·五"黑讲话的人是"造谣"。那个被江青召去的人，为了开脱江青的罪责，对这些谎言，当时都默认了。

三月二十二日、那个被江青召见的人，又把听了他“传达”的几个人找来，作了一点羞羞答答的说明。说什么“这个传达是根据我们三个人的记录整理的，可能记得不完全，不够准确”。“这个‘指示’主要在文艺单位传达。有的在机关作了传达，已传达了就算了，没有传达的就不要再传达了”。实际上是继续肯定和散布“三·五”黑讲话。他们以为这样敷衍几句，便可以蒙混过关了。

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了结。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四人帮”的处境越来越被动。过了两个月，五月十八日，“四人帮”又不得不指派他们在文化组的几个亲信，给那个传出“三·五”黑讲话的人捎话，要他出来“擦屁股”、“承担责任”，并暗示他，只要照着办，是会“保”他的。

于是，那个被江青召见的人，立即按照“四人帮”的意图，写了一个声明，作了六点更正，把江青的罪行全部包起来，洗刷得一干二净。这个更正声明送给“四人帮”审查批准后，于五月二十二日抛了出来。

“四人帮”罪责难逃

假更正抛出来了，一出双簧戏至此好象是结束了

但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四六六页）“四人帮”这些卑劣的手法，不过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罢了！这个更正声明究竟是怎么回事，许多同志心里是很明白的。

就在那个假更正抛出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在天桥剧场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面：江青当着许多人的面，握着那个传出“三·五”黑讲话的人的手，亲昵地说：

“××啊，你还乱说不乱说啦？”

“不乱说了。”

江青说：“你写的检查我看到了，行了，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打起精神好好干！”

看，江青对那个把她的“指示”“传达错了”的人，多么“宽宏大量”啊！

事实上，“四人帮”口头上收回了“三·五”黑讲话，在行动上并没有收回，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不死，他们篡军乱军、毁我长城的阴谋也决没有停止。“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四人帮”一方面抛出一个妄图瞒天过海的假更正，一方面继续紧锣密鼓地“打起精神”推行着他们的反革命事业，又在军内军外先后制造了一连串反党乱军的反革命事件。他们的这种做法，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更清楚地看清了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更加激起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义愤，大家采取各种形式同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干尽了坏事，当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他们制造的“放火烧荒”反革命事件，连同他们自己，一起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全军指战员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决心彻底清算“四人帮”反党乱军的滔天罪行。

历史千百次地证明了一个真理：玩火者，必自焚！

本 报 记 者

（原载 1976 年 12 月 14 日《解放军报》）

林彪与孔孟之道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在党的十大精神的鼓舞下，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激烈搏斗中，**"剥削者愈是千方百计地拚命维护旧事物，无产阶级也就愈要更快地学会把自己的阶级敌人从最后的角落里赶走，挖掉他们统治的老根"**。当前蓬勃兴起的批孔斗争，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深挖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老根的一场战斗。在林彪居住的黑窝里，到处充斥着儒家的思想垃圾，散发着孔学的霉烂臭气。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反动的孔孟之道是林彪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林彪一伙无论在政治上搞资本主义复辟，在思想上篡改党的理论基础，还是在组织上招降纳叛、结成死党、拼凑反革命队伍，在策略上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搞阴谋诡计，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剥开林彪的画皮，暴露在我们面前的，正是一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的丑恶嘴脸。

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是一条复辟倒退的极右路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克己复礼"。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内，林彪和他的死党连续写下了四条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是孔子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把"克己复礼"作为自己万事中最大的事，这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春秋末期是我国历史上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社会大变革时期。当时天下大乱，奴隶们纷纷起来造反，新兴地主阶级大力倡导革新、向奴隶主展开夺权斗争，使奴隶制旧秩序——"礼治"处于全面崩溃之中。孔子站在没落奴隶主阶级立场上，把这种"礼崩乐坏"的大好形势诬蔑为"天下无道"，提出了"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他的"复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西周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总之，孔子的"复礼"，就是复辟。林彪也是搞复辟的，他们具有共同的反革命本性和政治需要，所以林彪紧紧抓住"克己复礼"不放，认为"唯此为大"。他搞反革命政变和《"571工程"纪要》，正是他"复礼"内容的最好说明。

林彪的"复礼"，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林彪一伙极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诬蔑保护人民镇压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制造矛盾"；他们竭力诋毁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大肆诽谤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

事业诬蔑为"危机四伏"、"停滞不前"，把无产阶级红色江山描绘成漆黑一团。一句话，在他们的心目中，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切，都不符合他们的"礼"。他们和孔子一样，都是颂古非今、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

林彪的"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恢复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在写下"克己复礼"条幅的同时，还学着孟子的腔调，告诫他的死党要"当务之为急"。他们的"当务之急"究竟是什么呢？请看：

一九六九年冬，林彪亲笔题书"王者莫高周文……"的条幅，挂在床头，自称"人主"，自比"文王"，急于要实现当皇帝的美梦。

一九七O年，林彪再三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抛出他的反党政治纲领，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急于要当"国家的头"，阴谋篡党夺权。接着，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了未遂的反革命政变。

一九七一年，林彪一伙炮制了《"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急于"夺取全国政权"，并于九月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林彪反党集团"复礼"的首要目标，是他们反革命战略的"当务之急"。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要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在国内，他们照搬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那一套，进行复辟变天的反革命活动，猖狂叫嚣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要"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妄图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复辟资本主义。到那时，大大小小的黄世仁、南霸天就会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叛徒、特务、卖国贼王明之流就会大摇大摆地重新上台，成为林家王朝的"座上宾"，千百万革命者就会惨死在他们的反革命屠刀之下，亿万工农群众就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国际上，他们按照自己的座右铭——孟子的"小国师大国"行事，进行投降卖国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合帝、修、反，反华反共反革命。如果林彪这个"超级间谍"的阴谋得逞，我国锦秀河山就会遭到苏修坦克的蹂躏，社会帝国主义强盗就会在我国横行霸道，中国人民就会成为亡国奴。

总之，林彪捡起孔子"克己复礼"的破旗再三挥舞，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但这一切，不过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毛主席说："**'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各国反动派也就是这样的一批蠢人。**"林彪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本来想打着苏修主子的"核保护伞"，登上儿皇帝的宝座，结果却葬身沙漠，扛着"克己复礼"的破旗，走完了"**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穷途末路，到孔老二那里报到去了。

用孔孟反动哲学反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

林彪为了复辟资本主义，不但有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而且有一条为它服务的反革命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孔孟的反动哲学。他用孔子的天命论、天才论反对唯物论、用中庸之道反对唯物辩证法，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发动了全面进攻。

孔子鼓吹"天命"，说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叫作"天"老爷，他生育万物和人，主宰自然

界和人间的一切。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周文王等奴隶主所以有权统治人民，就是因为受命于天，而周公和孔子本人所以有“德”成为“圣人”来“教化”人民，也是因为受命于天。这完全是一种为了维护奴隶主专政而制造出来的宗教神学的唯心理论。孔子“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和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就是从这种反动的天命论引伸出来的。林彪为了篡权复辟，把孔子的这一套唯心论当作宝贝。他手书“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八个大字，悬挂在床头正中墙上，自比天马，把自己说成是上天赐给人间的象龙一样的神人、超人和天才。他还在给其死党的题词中，把他们自吹的“美德”说成是“受于天”，这同孔子所说的“天生德于予”岂不完全是一路货色！多年来林彪及其死党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用谣言和诡辩把天才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这完全是枉费心机。他亲手写的“受于天”三个字，证明了林彪的天才论是孔子天命论的翻版，他坚持天才论的反党理论纲领，就是企图论证他是“受于天”的最高统治者。

林彪说什么“中庸之道”“合理”，这就暴露了他反对革命、反对辩证法的真面目。孔孟所谓的中庸，就是做什么都要合于“礼”，既不过度又无不及叫做“中”，不改变常规叫做“庸”。一句话，按奴隶制老规矩办事，不能有丝毫偏离和改变，就是中庸之道。这完全是反动阶级维护旧制度、反对变革的一种形而上学理论。对于这种东西，林彪赞不绝口，说是“合理”。按照这种“理”，林彪恶毒咒骂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是什么“过分”、“全左”、“做绝了”、“斗绝了”、“乱了套”。好家伙，一大堆帽子扣上来。其实，这丝毫无损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恰恰说明了林彪所坚持的，是一条维护旧制度旧秩序妄想开倒车的极右路线。林彪的所谓“过分”，就是用中庸之道反对革命。毛主席早就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林彪说“乱了套”，无非是乱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这一套，不乱这一套，就不能消灭旧世界，创造新世界。怕乱你们这一套吗？这才刚开始，到全世界彻底消灭剥削阶级，还差得远呢。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法，**“就它的本质说，它就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的跋）是扶植新事物战胜旧事物，还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这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这个斗争在理论上必然表现为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林彪用孔孟的中庸之道反对辩证法，正是他搞极右路线的一个思想根源。

林彪说儒家的“德、仁义、忠恕”是“人的关系”的原则，并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还说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儒家的原理”。他完全抽掉人的阶级性来讲什么“仁爱之心”，抹煞阶级对立来讲什么“人的关系”，这就是拿孔孟之道的反动的人性论，篡改和否定历史唯物主义阶级论。

儒家所宣扬的人性论，是一种虚伪的唯心主义理论，它总是宣扬一种先验的超阶级的人性。孔子宣扬什么“仁”就是“爱人”，孟子说“仁心”是人生来就有的，“人性善”。他们果真不分阶级地爱所有的人吗？没有那回事。郑国把起义奴隶“尽杀之”，孔子不是表扬他们干得好，赞为“善哉”吗？孟子不是专门论证对奴隶和劳动者进行剥削和统治是“天下之通义”吗？对新兴地主阶级，他们也是一点不爱的。孔子在鲁国代行宰相，一上台就杀了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冉求为新兴地主阶级干事，孔子就马上开除他的学籍，断绝师徒关系，还要煽动学生攻他。这就说明孔孟讲的什么不分阶级的“人类之爱”、什么天生的“仁心”等等，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剥削阶级中的奴隶主那一小撮，只是那个反动的奴隶制度。林彪讲什么“仁爱之心”，可是，在《“571工程”纪要》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中，凶相毕露地叫嚷：要一口“吃掉”无产阶级，要谋害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要把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统统打下去，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们爱的，实际上只是被我们打倒的那一小

撮阶级敌人。这就是林彪的"人性"，也就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蒋帮头目在林彪死了两年后哀悼他说："林彪……较有人性，这就是孔子的伦理学说潜在人心的佐证。"蒋帮的这种赞扬，对林彪的人性究竟是什么货色，是一种绝好的说明。

反动阶级拚命宣扬人性论，一方面是为了把自己打扮成关心人民的"仁义之主"，掩盖自己的吃人真相。另一方面，则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旗号，向先进阶级的革命暴力兴师问罪。孔子不是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为乱"，骂造反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为盗"吗？孟子更是这样，他破口大骂革命暴力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是"食人肉"，"罪不容于死"，应当处以极刑。林彪完全承袭了孔孟的一套，以反动的人性论为理论根据，猖狂叫嚣"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大骂无产阶级专政是"不仁"。"'**你们不仁'。正是这样。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敢于反抗的反动阶级的反动分子，必须给以坚决无情的镇压。不这样做，我们就要亡国，地主资产阶级就要复辟。在林彪的假仁假义后面，难道不就是要用反革命暴力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吗？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暴力，我们只能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革命的暴力来镇压反革命的暴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使无产阶级专政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玩弄儒家权术　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林彪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上搞修正主义，决定了他在组织上搞分裂、结党营私，在策略上耍两面派、搞阴谋诡计。为了在党内隐藏下来，为了拼凑反革命队伍，伺机而动，实现其"复礼"的野心，林彪指使他的死党和一些人，挖空心思从四书五经、中外历史、以至小说谚语中搜寻材料，研究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权术。奴隶主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所总结的一套反动统治术和两面派的伎俩，都成了他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重要思想武器。

孔子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作为处理奴隶主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关系的准则，林彪在反党集团内部搞的也正是这一套。

林彪的"君使臣以礼"，是一种虚伪的姿态。林彪明明是一个法西斯独裁者，他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以我划线，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但他却偏要唱起"使臣以礼"的腔调，打出"求贤"的招牌。其实，他这里所说的"礼"，不过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一句话，就是用名利地位收买拉拢一些人为其反革命复辟事业服务。当他的死党的狐狸尾巴被群众揪住时，他便利用职权，包庇保护，使其蒙混过关。他的所谓"求贤"，就是按照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组织资产阶级司令部，拼凑大小反革命"舰队"。

林彪标榜"君使臣以礼"的真实意图，是要他的死党"臣事君以忠"。象历代反动统治者一样，林彪也把"忠君"思想作为维持其反革命队伍内部统治的精神支柱。他宣扬孔孟"敬上"、"无违"的"忠孝"之道，提倡绝对服从；他强迫其特务组织成员向林家父子宣誓效忠，要他们"永远忠于"林家父子；当林彪反党集团末日来临的时候，他还发出"不成功便成仁"的反革命训令，妄想要其反革命"舰队"成员为"林家王朝"殉葬。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就是孔孟之道的纲常名教。

林彪十分欣赏孔子的"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它抄录下来，挂在墙上，作为反革命的信条。林彪对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多次耐心的批评教育，怀恨在心，伺机反扑。为了阴谋篡

党夺权，他反复告诫自己，要“忍耐”，切勿因“匹夫之勇”而败坏了“复礼”的“大谋”，“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在“忍”的背后，林彪咬牙切齿、磨刀霍霍，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这实际上是胡风“在忍受中求得重生”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为了“在忍受中求得重生”，实现他的“大谋”，林彪把“韬晦之计”奉为至宝。一九七〇年三月，正当林彪反党集团紧锣密鼓策划篡党夺权的时候，林彪指使他的死党把“韬晦”二字记在黑笔记上，并亲笔抄录了《三国演义》上赞扬刘备用“韬晦之计”欺骗曹操的一首诗：“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在这里，他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是“虎穴”，自比为暂时栖身于“虎穴”中的“英雄”。这就不仅暴露了他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同时也暴露了林彪用两面派手段乔装打扮，把反革命真相掩饰起来，等待时机，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下毒手的狰狞面目。

为了伪装掩饰自己，“随机应变信如神”，林彪又根据孔孟的所谓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就会大难临头等说教，暗地里制定了一系列反革命两面派策略。什么“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什么“面带三分笑”，这一切，无须多加一字，就活灵活现地暴露了林彪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两面派。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为什么乞灵于孔孟之道？

林彪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是不折不扣的尊孔派。人们会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什么要到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那里去寻找思想武器，党内的修正主义头子为什么无不乞灵于孔孟之道？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修正主义头子林彪之流尊孔不是偶然的，是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

首先，林彪之流的尊孔是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的历史特点和阶级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它自己的阶级特点。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是异常软弱的，在思想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大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结合的产儿，买办性和封建性是这个阶级的根本特性。他们历来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尊孔读经的封建文化的顽固的维护者和狂热的推销者。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谁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必然要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在思想文化上也只能是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那里寻找武器。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搞修正主义，乞灵于孔孟之道，正是反映了这样一个阶级的特点。出身在地主兼资本家家庭而又长期抗拒世界观改造的林彪，更是如此。

其次，从历史根源来看，孔孟之道原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剥削阶级思想体系，它的实质是主张倒退、反对进步；主张保守，反对革新；主张复辟，反对革命；是剥削压迫之道，反革命复辟之道。它后来被腐朽的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利用，也被妄想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所利用，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成为历代反动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成为一切搞复辟、搞反共的反动派的思想武器。由于历代反动统治者大力提倡、强制推行孔孟之道，使它渗透到旧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年深日久的传统观念。一切主张开倒车的反动派，总

是祭起尊孔的破旗，千方百计地利用孔孟之道，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反对革命，主张倒退，他们尊孔也就毫不奇怪了。修正主义头子林彪，是一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但他到处搜集孔孟的言论，大讲孔孟之道，这完全是由于他和孔孟的反动思想一致，要搞复辟的反革命本性决定的，完全是出于利用反动的传统观念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险恶用心。

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当前开展的批林批孔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斗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头等大事。不批孔，不批判尊孔反法思想，实质上就是不批林。深入批判孔孟之道，批判尊孔反法的思想，对于彻底揭露和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搞好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发扬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夺取批林批孔斗争的新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 1974 年第 2 期)

广泛深入开展批林批孔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二月一日)

《红旗》杂志短评

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运动正在全国掀起。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这是把批林整风引向深入的关键，是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努力作战。

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抓大事，要抓路线。深入批林批孔，就是当前全党的大事，全军的大事，全国人民的大事。不批林批孔，就是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就是放弃对修正主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进攻，这样下去，势必滑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我们必须引起注意和警惕。

为什么要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呢? 因为林彪同历史上的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一样，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一向尊孔反法，多次攻击秦始皇。他对腐朽不堪的孔孟之道五体投地，把它视为信条，奉为经典，贴在和藏在那些阴暗的角落里。他的反革命言行中，浸透着孔孟的反动思想。林彪尊孔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出于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为推行他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的。他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我们党同林彪之间围绕着反孔还是尊孔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时期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还没有结束。因此，要深入批林就必须批孔，批孔正是为了深入批林。只有通过对孔孟之道的批判，才能进一步认清林彪反党集团搞复辟搞倒退的反革命罪行及其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才能挖出林彪反动思想的老根，清除林彪和孔子

的反动思想影响，也才能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正因为这样，深入批判孔孟之道，就不是个“学术问题”，也不是象有的人所认为的仅仅是“文化教育界的事，与己无关”；恰恰相反，它是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紧密联系的政治问题，是工、农、商、学、兵、政、党都必须关心的反修防修的大事。这怎么能说“与己无关”呢？“不破不立”，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必须批林批孔。我们不信“中庸之道”，我们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要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无产阶级革命者，把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打好打胜批林批孔这一仗。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利用孔孟之道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罪行。孔子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是这个阶级的死硬派，他反对变革和进步，坚持复古和倒退。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是妄图复辟日益崩溃的奴隶制，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克己复礼”，是他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林彪很懂得“克己复礼”的政治含意，对它心领神会。他认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林彪万事中的大事是什么呢？就是效法孔子的“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孔子不是说过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吗？林彪正是继承了孔子的这个衣钵，妄图把被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植起来，让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恢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使我们的国家变成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宣扬“德”、“仁义”、“忠恕”、贩卖“中庸之道”，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教子尊孔读经，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等等，都是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这就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把批林和批孔结合起来，还要着重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反动世界观及其根源。孔子为了复辟奴隶制，是以反动的“天命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思想基础的。林彪的反党理论纲领——“天才论”，就是来自孔子的“天命论”。他胡说自己的脑袋“长得好”，“特别灵”，把自己比作“天马”，可以在空中“独往独来”。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是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是他妄图建立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林家世袭王朝的精神支柱。这也正表现出林彪这个反动派的虚弱性。深入揭露和批判林彪的“天才论”，结合批判孔子的“天命论”，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维护“吃人”制度的剥削阶级世界观的反动性，认识到无产阶级世界观同地主资产阶级世界观斗争的长期性。

批林批孔，触及到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有一些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如轻视劳动，蔑视妇女，瞧不起工农群众，看不惯新生事物和新生力量，崇洋复古，以及“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这些除了有它们的社会阶级根源外，都可以从孔孟之道那里找到思想根源。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要通过深入批判林彪和孔子的反动思想，清除这些流毒。

批林批孔必须掌握思想武器、加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许多著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历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毛主席对于孔孟之道和尊孔思想多次深刻的批判；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都是我们批林批孔的强大思想武器。联系林彪宣扬的孔孟之道，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才能把批林批孔的斗争搞深搞透，真正分清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革命和反革命，进一步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批林批孔中的许多有质量的文章、资料和发言，都是作

者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而产生出来的，要坚持这样做下去。

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从来是站在反孔斗争的前列，是批孔的主力军。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每一次农民革命战争，总是冲击了被反动统治阶级尊为“圣人”的孔子。他们对孔子的批判一次比一次更勇敢、更深刻。但是，由于他们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而不可能用科学的革命理论彻底战胜孔子的反动思想。这个任务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才能完成。现在放在我们工农兵肩上批林批孔的担子是很重的。我们要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继续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孔孟之道批个落花流水，批得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要同工农兵相结合，积极投入战斗。“工农兵文化低，不懂古文，批不出水平”，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工农兵的污蔑。工农兵具有高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和丰富的斗争知识，在批判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方面，已经涌现出一批敢于和善于斗争的生气勃勃的先进分子，他们必将在批林批孔斗争中做出更巨大的贡献！

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带领群众切实抓好批林批孔这件大事，领导干部要做出榜样。要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批林批孔中促进和加强广大群众的团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我们坚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有几亿工农兵做坚强的主力军，深入批林批孔的斗争必将取得更大的胜利。

（原载《红旗》杂志 1974 年第 2 期）

继续革命 反对复辟

——评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

（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

《文汇报》评论员

恩格斯在批判“哥达纲领”时指出：**“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

彻底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反动纲领，对于进一步认清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进一步认清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流毒，是十分重要的。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反动的政治报告，被中央理所当然地否定了。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继续进行阴谋破坏，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和他的死党效法孔丘连续四次写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打出孔丘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克己复礼"的"礼"，决不是谦让、礼貌之"礼"。孔老二当年怕他的信徒弄错了，就特地告诫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就是说：我常讲的礼，并不是玉帛礼物。这个"礼"的实质，是"为国以礼"、没有礼，"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很清楚，他说的礼就是要镇压奴隶起义，反对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的革新路线，把社会拉向倒退；要按照周礼恢复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奴隶主阶级专政；要"兴灭国，继绝世，兴逸民"，把已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丧失了特权地位的奴隶主贵族重新扶植起来，向新兴地主阶级进行反夺权。

是"复礼"还是反"复礼"，这当中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反动剥削阶级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都是为了砸碎"礼"的枷锁，推翻反动政权。而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拚死斗争，也都是为了维护这个"礼"；当他们被推翻之后，又梦想恢复这个"礼"。历史上无数次的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的反抗斗争，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阶级力量，还没有先进阶级的政党领导，因而不能彻底打碎这个"礼"；只有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彻底打碎"礼"的枷锁，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国家。

中国人民对于召唤孔老二的亡灵、扯起"克己复礼"的破旗，穿着古怪的服装，演出一幕幕的复辟丑剧，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的，并在斗争中深深懂得"礼"不是礼让，而是孔丘杀少正卯的毒剑，是曾国藩镇压太平军的屠刀，是蒋介石放在雨花台前的机枪。"复礼"者，就是反革命对革命人民的反攻倒算，就是反革命复辟。

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林彪和他的死党相互书赠"克己复礼"反动条幅之时，正是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党的九大提出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号召，把社会主义革命进一步向前推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林彪如此穷凶极恶地反复书写"克己复礼"，他的反革命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吗？

林彪的"克己复礼"，就是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建立林家封建买办法西斯王朝。简而言之，"克己"就是搞阴谋诡计，"复礼"就是搞复辟；"克己"是手段，"复礼"是林彪路线的实质。

从孔老二到林彪，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一个又一个的复辟头目，虽然都曾扯起过"克己复礼"的黑旗，但是，"复礼"者，必覆灭。

复辟的祖师爷孔老二，为了实现"克己复礼"，奔走呼号了一辈子，结果成了一条丧家之犬。近百年来，袁世凯的皇帝梦，做了不到一百天即一命呜呼；"辫帅"张勋的复辟丑剧，上演了十来天，就被迫收场；靠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建立起来的蒋家王朝，也被中国人民所埋葬。一切效法孔老二"复礼"的信徒们都是短命的，他们都没有好下场。

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尽管再三挥舞"克己复礼"的黑旗，但其篡党夺权妄图复辟的阴谋，也很快被无产阶级打得粉碎了。

"复礼"者之所以必然覆灭，是因为他们代表腐朽的、反动的势力，气息奄奄，没有前途。林彪所代表的是地、富、反、坏、右和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这些人只是一小撮，极端孤立。尽管他们的复辟之心不死，但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必然碰得头破血流。

"复礼"者之所以必然覆灭，还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违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林彪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把中国置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核保护伞之下，使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必然要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

轮碾得粉碎。

"复礼"者之所以必然覆灭，更主要的是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志，因此他们必将被人民群众所埋葬。林彪搞"复礼"，人心、党心和党员之心都是不允许的。人民群众起来斗争，"复礼"者必然垮台。

有"复礼"的阴谋活动，就会有反对"复礼"的革命斗争。历史正是在"复礼"和反"复礼"的斗争中向前发展、向前推进着。林彪"克己复礼"阴谋的被粉碎，提高了革命人民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使党的基本路线更加深入人心，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强大和巩固。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反对"复礼"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今天，正当我们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却在莫斯科大声叫嚷："'礼'的学说，即天下一切人都应遵守的道德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的体系，在孔子的学说中起着重大作用。"他们生怕中国人民不识货，使"礼"在中国绝了种，竟然充当义务推销员，要中国人民遵守"礼"的准则。这些无耻的叛徒在苏联干成了复辟的勾当后，还想把它作为"礼物"赠送给我们，这不是太慷慨了吗?! 可是，克里姆林宫的骗子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中国人民是不要那一套"礼"的，苏联人民决不会饶恕你们在苏联复辟的罪行，你们倒行逆施的法西斯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阶级斗争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复礼"和反"复礼"的斗争将长期存在，革命人民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反对复辟！这是一条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特别是对于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国际上的一小撮帝、修、反分子，国内的地、富、反、坏、右和他们的代理人，是极端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的。他们在行将灭亡时，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要复辟。前进和倒退，革新和守旧，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将要长期进行下去。就是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这些人中的最死硬分子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的失败的。当前，深入开展对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的批判，将使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增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对复辟斗争的自觉性。今后如果有谁扯起"复礼"的破旗，为林彪和孔老二翻案，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及时识破它、粉碎它！

(原载1974年2月10日《文汇报》)

中共中央关于"走后门"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了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中央认为，对来自群众的批评，领导干部首先应当表示欢迎。但是，这个问题牵涉到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需要具体分析，慎重对待。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当前批林批孔运动已经展开，主流是好的。各级党委，首先是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党组织，应当继续努力，放手发动群众，加强学习，联系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实

际，认真地抓紧批林批孔。要注意不断总结经验，使批林批孔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开展起来。

（这一文件发到县、团级，可向基层群众传达。）

批“克己复礼”

——林彪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纲领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大规模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全国蓬蓬勃勃地兴起。

当前，许多地方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首先集中批判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效果较好。

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克己复礼”。他把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这面破旗，视为至宝，称为万事中的大事。在九大以后，从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九日到一九七〇年元旦，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林彪及其死党就写了四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反党集团迫不及待地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林彪“复礼”的政治纲领，是坚持设国家主席。他对抗毛主席的多次指示，叫嚣“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名正言顺”地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林彪“复礼”的理论纲领，是“天才论”。他把自己吹成“生而知之”的“天才”，以“天马”自居，自比文王，为他篡党夺权制造理论根据。

林彪“复礼”的阶级内容，就是把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重新扶植起来，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他接过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口号，狂妄叫嚣要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

林彪这条“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反映了地、富、反、坏、右和帝、修、反在中国搞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早在建国前夕，毛主席就告诫全党：“**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二十多年来，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更是一次尖锐复杂的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抓住林彪鼓吹的“克己复礼”，深入地进行批判，就能进一步认清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的真面目，认清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肃清其流毒。这对于我

们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反对复辟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极为重要。

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要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妄图复辟修正主义那一套的罪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恶毒咒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种种谬论，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坚持干部下放劳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批判林彪反党集团妄图投靠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的罪行，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总之，要通过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广泛深入地进行反修防修的教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各项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批林批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批林批孔的一系列指示和党中央规定的有关文件。这是我们战斗的武器。我们要把学习和批判结合起来，学好学通，批深批透。在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著。这样才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深刻地理解反对修正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长期战斗任务，从根本上提高广大干部和群众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紧紧掌握批林批孔这个中心，放手发动群众。要把革命大批判一步步地持久深入下去，防止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要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是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的。只要我们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具体问题要进行具体分析，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就一定能使批林批孔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胜利前进。

评晋剧《三上桃峰》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初　澜

当前，文艺战线的形势同各条战线一样，一派大好，欣欣向荣。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群众性的革命文艺创作运动蓬勃兴起，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越来越多，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情鼓励和欢迎。最近，在北京举行的华北地区文艺调演，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取得的新胜利。但是，文艺战线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总是敏锐地反映着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在大好形势下，冒出个把毒草，这也是不足为怪的。

由山西省文化局创作组集体创作的晋剧《三上桃峰》，就是一株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为叛徒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大毒草！

《三上桃峰》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说的是某公社杏岭大队，以欺骗手段把一匹病马当作好马卖给了桃峰大队。杏岭大队党支部书记发现此事，亲自三上桃峰，退款道歉。

该剧的炮制者和鼓吹者声称："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嘛！""《三上桃峰》就是要通过小题材表现大主题"。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三上桃峰》的"大主题"究竟是什么？

一

《三上桃峰》的出笼，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文艺上的反映。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在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妄图用桃园对抗大寨，用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取代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但是，刘少奇一伙贼心不死，负隅顽抗。王光美不得不从桃园撤退以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死守桃园这块阵地。他们不仅在桃园附近立起了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亲自跑到旧文联礼堂作报告，策动文艺界运用文艺形式来为她树碑立传，歌功颂德。

就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下，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个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在这场阶级斗争中，以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及其同伙，倾巢而出，喧嚣一时。在当时被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文艺界，以《一匹马》的故事为题材的报告文学、连环画、纪录影片和各种样式的戏剧、曲艺，纷纷出笼。旧中宣部的一个副部长，指令在北京的某一话剧院赶排同一题材的《春风杨柳》，叫嚷"要搞出样板，起示范作用"。旧文化部的一个副部长，计划亲自带领一个文化工作队去抚宁县，把王光美蹲点的这个地方搞成群众文化活动的"样板"。

紧步周扬之流的后尘，一九六六年一月，山西省的《火花》戏剧专刊，以卷首的显赫位置，发表了根据上述通讯改编的大型晋剧《三下桃园》。请同志们注意：通讯中的真实地名是"桑园"，剧本却偏偏改为"桃园"。一字之易，点在题上，更为醒目。剧中大唱什么"社社队队全一样，唯有桃园不大同"，用反动的"桃园精神"，对抗毛主席发出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他们唯恐观众看不清楚这个戏的政治意图，还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个原通讯中没

有的人物——一个姓王的女县长，让她从幕后走到前台，颐指气使，招摇过市，用她之口点破这个剧本的主题在于歌颂桃园"社教运动的胜利果"。这是在文艺舞台上为刘少奇、王光美树起的又一块"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到了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说明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故事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太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人们不禁要问《三上桃峰》的炮制者和支持者：既然明明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三下桃园》，明明知道这个毒草剧本的要害所在，为什么现在又为它改头换面、乔装打扮，迫不及待地搬上舞台？

《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曾经说过："要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个戏早就红了！"一语泄露了天机；他们这个戏跟刘少奇是同命相连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刘少奇垮台了，他们如丧考妣，于心不甘。经过几年的炮制，他们认为时机成熟了，就明目张胆地把《三上桃峰》抛了出来，大喊大叫什么"《三上桃峰》是山西的代表性剧目！""《三上桃峰》是经过七年锤炼的。别的戏不上，行；《三上桃峰》不上，不行！"当演员表示不愿排练这个戏时，他们竟威胁说："是毒草也要演"，不演就"以破坏革命现代戏论处"。看，他们要用这个戏来为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气焰何等嚣张！可是，当革命群众揪住了他们的狐狸尾巴之后，他们又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什么"没有看过原来的报道"呀，"不知道这个故事有什么政治背景"呀，等等。躲躲闪闪，支支吾吾。事实胜于雄辩。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三上桃峰》是经过精心炮制，有人批准，有人支持抛出来的。《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的事实，是任何人也抵赖不掉的！

二

从《三上桃峰》的政治背景看，是为刘少奇翻案的。从《三上桃峰》所表现的政治内容看，也是为刘少奇翻案的，是为刘少奇、林彪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的。

第一，《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竭力鼓吹刘少奇、林彪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三上桃峰》却千方百计地掩盖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大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二而一"。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杏岭的贫下中农和党员不反击，不斗争。剧中还将老六美化为想为集体"办好事"的人。对农村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杏岭大队的大队长李永光，不仅不去表现党员、群众对他的斗争，反而为他开脱罪责，把他的错误性质说成是什么"本位主义思想"，还为他评功摆好，故意回避这场

尖锐激烈的路线斗争。

在这个戏里，没有阶级矛盾，没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可真是个人人"忠恕"、个个"礼让"的"君子国"呵！当年大刮吹捧"桃园经验"的妖风时，报纸上不是有人通过讲述小说《镜花缘》里"君子国"的故事，号召人们在创作中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君子国"吗？《三上桃峰》的炮制者果然把一个"君子国"搬上了舞台。这个"君子国"不是别的，就是刘少奇、王光美在桃园已经建立过的地、富、反、坏、右重新上台，劳动人民重新受压迫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王国！

第二，《三上桃峰》的炮制者，狂热地宣扬刘少奇、林彪所贩卖的"孔孟之道"，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冒充为共产主义风格和无产阶级思想

风格是观念形态，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中，风格是有阶级性的。《三上桃峰》所宣扬的这种不讲阶级、不讲路线、互相"礼让"的"风格"，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是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两千多年前，反动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孔丘之流鼓噪什么"忠恕"、"克己"，什么"礼之用，和为贵"，目的是"复礼"。刘少奇、林彪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也大讲什么"以德报怨"、"忍辱负重"，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目的是复辟。《三上桃峰》所宣扬的"风格"，就是这种主张倒退、反对革命的孔孟之道，是束缚革命人民斗争意志的精神枷锁。剧中的"风格"体现者、主要人物青兰，就是奉行孔孟之道的典型人物。她在全剧中的行动，就是往来奔波于杏岭、桃峰之间，忙于补过失、堵窟窿。这是个只抓小事不抓大事、只顾"马情"不顾敌情的政治庸人。炮制者把这样一个依照黑《修养》的规格铸造出来的人物，冒充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赋予她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名字，就是要人们学习青兰，做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以便推行他们"复礼"、复辟的反革命政治路线。

第三，《三上桃峰》的炮制者，采用含沙射影的卑劣手法，使用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语言，诬蔑社会主义制度，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诋毁和谩骂。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尚汗，四肝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难道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的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是"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个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采："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做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通过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晋剧《三上桃峰》大肆兜售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对毛主席革命路线进

行肆无忌惮的攻击。他们叫嚷这出戏要表现的"大主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刘少奇、林彪和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翻案。有人还叫嚷这出戏"好就好在突破了样板戏的框框"，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与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敌、与革命样板戏为敌的反动面目。《三上桃峰》正是顽固地坚持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集"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反"题材决定"论，"人性论"、"时代精神汇合论"之大成的大毒草。

三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从《一匹马》、《三下桑园赎马记》，到《三下桃园》，再到《三上桃峰》：桑园改桃园，桃园变桃峰；一匹病马上台又下台，下台又上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不管革命的阶级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的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还是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有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要想避免，也不可能。它说明了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就是政治战线上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反映。某些地区、某些部门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回潮的现象，就是政治上那股妄图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翻案风在文艺上的表现；这也是和国际上阶级敌人反华、反共、反革命的反动逆流相呼应的。它还说明了当前深入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击中了国内外阶级敌人的要害，他们必然要跳出来进行破坏和捣乱。

因此，我们对大毒草《三上桃峰》的批判，不是一般的文艺论争，不是什么创作问题，而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是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的大是大非问题。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这样的斗争，今后还要长期地进行下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三上"被揭露了，会不会搞"四上""五上"呢？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重视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密切注视思想文化战线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和新特点，反击一切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击退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回潮，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胜利！

（原载 1974 年 2 月 29 日《人民日报》）

再批“克己复礼”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

《人民日报》社论

目前，全国人民集中批判林彪“克己复礼”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林批孔运动正在健康地发展。

党的九大以后，正当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提出的“**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号召，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时候，林彪及其死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了许多条“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据《后汉书·李杜列传》的李固传中记载，东汉质帝被害，朝廷没有皇帝，太尉李固等联名上书大将军梁冀说：“今当立帝”，“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林彪把“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和“克己复礼”连在一起，多次地大书特书，充分暴露了他迫不及待地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

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林彪想当“皇帝”，搞“克己复礼”，也是要“兴灭国，继绝世，兴逸民”。

林彪“兴灭国”，就是要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国”在中国复辟。“继绝世”，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继”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绝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举逸民”，就是为地、富、反、坏、右鸣冤叫屈，为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翻案，让那些牛鬼蛇神重新上台。

林彪的这一套，根本违背历史发展的规律。他推行的是一条倒行逆施，妄图扭转我国社会主义历史车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就要深入揭露和批判他阴谋篡党夺权，“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罪行。

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两千多年来，从孔老二到林彪，那些叫嚷“克己复礼”，要倒退、复辟，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英雄们，都被历史的车轮压得粉碎。今天，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倒退更是没有出路的。批判林彪的“克己复礼”，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解决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阴谋复辟的罪行，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是巩固和发展这场革命的伟大成果，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倒退回去，搞资本主义复辟？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旗帜鲜明。林彪反党集团疯狂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妄图开历史的倒车。中外反动派，包括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包括蒋介石集团，包括一小撮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都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他们现在又在极力攻击、诬蔑、破坏批林批孔运动。对于阶级敌人的诬蔑和攻击，我们要给予有力的回击。对于我们队伍中犯有错误，包括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让我们在批林批孔的斗争中，达到更大的团结和胜利。

孔 丘 其 人

（一九七四年四月一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孔丘其人，顽固凶狠却又十分虚弱，阴险狡诈而又极端腐朽。这是他所代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本性，也是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代表人物的共同特点。今天，彻底揭露孔丘的反动面目，对于识别王明、刘少奇、林彪这一类政治骗子，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

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孔丘（公元前五五一——四七九年）生活的春秋末期，奴隶起义、平民暴动、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汇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得“礼坏乐崩”，使整个奴隶主阶级面临灭顶之灾。新兴的地主阶级正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占领历史舞台。

孔丘出身的没落奴隶主贵族家庭，在这个社会大变革中急剧地衰落下来。他的祖先原是宋国的大贵族，后来搬到鲁国。到他父亲郰叔纥（郰音邹，纥音合）一死，孔家就更加日益没落。孔老二从小接受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教育。年轻时就走上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道路。阶级的衰败和家庭的没落，更使他顽固地、狂热地为恢复被夺去的“天堂”而斗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孔丘终生的复辟梦想。它的集中表现，便是一条“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

什么是“礼”？就是西周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孔老二把它吹得天花乱坠，说：“周代的制度是多么昌盛，多么丰富多采呀！我崇拜它！”（《论语·八佾》）实际上，周代实行的奴隶制，是一种在当时已经过时的极其反动、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它的“丰富多采”，正是无数奴隶的鲜血染成的！在这种制度下，奴隶主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待。一匹马一束丝就能换五个奴隶。奴隶们没有任何人身自由，被迫从事极繁重的劳动，受到残暴的压榨。如果逃亡，抓回来后就要被活活锯掉一条腿，然后被扔到荒野“与禽兽为伍”，悲惨地冻饿而死。而奴隶主却靠着榨取奴隶的血汗，过着极其奢侈腐化的生活。甚至在他们死后，也要建筑富丽豪华的大坟墓，还把大批奴隶残酷地杀掉或者活埋，作为殉葬品，有时一次达上百人之多。孔丘要复的“礼”，就是这种奴隶的地狱，奴隶主的天堂。这种大批摧残劳动力、大量浪费劳动成果的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

孔丘这个家伙对于往日奴隶主阶级的旧制度、旧秩序、旧文化十分怀念，对于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刻骨仇恨，满脑子反革命复仇思想。看到烽烟滚滚的奴隶起义，孔老二破口大骂是“强盗”和“祸害”，恨不得斩尽杀绝。郑国奴隶主在一次镇压奴隶起义时，杀害了全部参加起义的奴隶，他听到后狂叫“杀得好！”（《左传·昭公二十年》）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奴隶主屠杀有理，奴隶造反无理，他完全是奴隶解放的死对头！

在孔老二心目中，周朝奴隶制的一切，从井田到法律，从音乐到酒杯，都是尽善尽美、神圣不可侵犯的。对于新兴地主阶级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任何一项革新，对于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一切新生事物，孔老二都疯狂的跳出来反对。学生冉求去帮助革新，促进封建生产关系发展，他就恶狠狠地要门徒“鸣鼓而攻之”；晋国铸了刑鼎，破坏了奴隶制的贵贱秩序，他诅咒人家要“亡国”；甚至在他七十一岁，重病在床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杀了奴隶主头子齐简公，夺取了政权，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再三请求讨伐。

孔丘如此仇视新事物，以种种努力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简直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孔老二这个“复礼”狂，正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

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

孔丘此人，阴险狡猾。明明要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吃人政治，却偏偏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他平时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不射窝里的鸟，不用带许多钩的大绳钓鱼，简直是不仅爱人，而且连鱼、鸟都爱。实际上，他是一个心黑手狠的恶鬼。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假仁假义地熬了一点粥给服苦役的奴隶喝，孔丘为此大发雷霆，认为这是触犯了“周礼”，急急忙忙派人砸了饭锅饭碗，把粥泼在地上。这就是孔丘的“仁者爱人”，真是虚伪到了极点！

孔丘还拼命鼓吹“信”。说什么“做人不讲信用，是根本不可以的”，妄图要人们相信他孔老二才是天下最讲信用的人。其实，“信用”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孔老二的所谓“信用”，不过是奴隶主贵族骗人的手段。他自己就承认“君子只注意坚持正道，而不必守信用”。（《论语·卫灵公》）就是说，为了实行“克己复礼的反革命之道，什么撒谎骗人，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可以干。有一次孔丘路过一个叫蒲的地方，被当地起义抗卫的群众包围，不准他去卫国。孔老二指天发誓，与蒲人订下盟约，保证不去卫国。但刚一被释放，他就跑到卫君那里，递情报，出主意，要卫国派兵镇压起义。当面赌咒发誓，背后冷箭黑枪，这就是孔丘的信用。

政治骗子都很注意窥测方向，见风使舵，经常涂改自己的脸谱。用孔丘自己的话说，就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这就是说，国家形势对复辟有利时，就大喊大叫，赤膊上阵；形势不利时，还要坚持复辟活动，但表面上要说好话，装笑脸，不露马脚。公元前五O一年，鲁国发生了一次政变。公山不狃以费城为据点，准备推翻新兴地主阶级季桓子等人的统治。公山不狃派人与孔老二联络。一心要复辟变天的孔老二欣喜若狂，手舞足蹈，企图利用这次政变，从费城起家，干一番“复礼”的大事业，大叫要“使周代的制度在东方复兴”（《史记·孔子世家》），抛出了一个反革命复辟的行动纲领。但是，这次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贼心不死，摇身一变，隐瞒了自己要参与政变的真象，还说了一个政变头目的坏话，蒙蔽了季桓子，骗取了信任，居然当上鲁国首都行政长官，并很快窃取了警察总监和代理宰相的要职。就这样，孔丘这个政治骗子改用“钻进去”的战术，篡

夺了鲁国的一部分权力。

凶狠残暴的大恶霸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立刻把复辟希望变成复辟行动，疯狂地推行他的反动政治路线，残酷地镇压劳动人民和新兴地主阶级，特别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

孔丘这个公开申明搞政治根本不需要杀人的伪君子，稍一得势，就露出了一副大恶霸的凶残面目。他当代理宰相仅三个月，就对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少正卯下了毒手，杀了之后，还下令把尸体示众三天。

少正卯是鲁国的大夫，是一位法家的先驱者。他宣传革新思想，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在他周围"聚徒成群"（《荀子·宥坐》），集合了一批先进的社会力量。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纷纷赶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王充：《论衡·讲瑞》），学生好几次都跑光了，冷冷清清，只剩下颜渊一个人。少正卯的革新理论严重威胁着孔老二的复辟事业。孔丘把他看成眼中钉，肉中刺，迫不及待地要干掉他。按照周礼，"刑不上大夫"，而且少正卯声望那么高，杀害他必然遭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孔老二的学生也表示反对。然而孔丘为了反革命复辟的需要，根本不顾舆论的反对，利用他篡夺的代理宰相的权力，给少正卯硬安上五大"罪名"，极端凶残地把他杀害了。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孔丘的"克己复礼"，就是复辟奴隶主阶级法西斯式的专政。孔丘杀害少正卯这一事件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是生死斗争。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所谓超阶级的"仁政"。代表反动阶级的复辟势力一旦上台，就会象孔丘那样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革命者就会人头落地。这是一个值得记取的历史教训。

不学无术的寄生虫

孔丘从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政治需要出发，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集中了西周文化的天生"圣人"、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欺世惑众。后代的反动派同样是为了维护和复辟旧制度的需要，也把孔老二捧为"大学问家"。这个纸老虎，必须彻底戳穿。

孔丘是什么"大学问家"吗？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指出："**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整顿党的作风》）孔老二这个家伙，一不懂革命理论，二不会生产劳动，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而是一个满肚子秕糠的大草包。当时劳动人民就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的生产知识等于零。他向学生灌输的所谓礼乐仁义，也完全是奴隶主贵族僵死的旧文化。他修的《春秋》，更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是一本无耻美化奴隶主头子、恶毒攻击革新势力的变天账。

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当中，有不少人写了专门著作，总结了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某一方面的经验，在认识史上有所贡献。特别是法家的一些优秀代表，如商鞅、荀子、韩非子等人，更是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阐发了革新的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灿烂的文化。而孔老二这个家伙却是"述而不作"，根本写不出什么东西。儒家经典《论语》也不是孔丘的亲笔，而是他生前的一些言行，由他的徒子徒孙回忆记录下来，拼凑而成，鸡零狗碎、杂乱无章。

查其内容，更是反动腐朽。不是鼓吹"天命"论，就是大念复辟经，再有便是如何搞阴谋，耍两面派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和处世哲学。什么"粮食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细越好"，"烹调不到家，不吃。肉切得不方正，不吃"，"穿黑色的羊羔皮袍，一定配上黑色的罩衣；穿白色的鹿皮袍，一定配上白色的罩衣；穿黄色的狐皮袍，一定配上黄色的罩衣"；什么对国君如何毕恭毕敬，对权臣如何笑脸相迎，在大庭广众之中如何装出一副忠厚老实的面孔，在社会上如何骗取正人君子的美名。（《论语·乡党》）看，乌七八糟，腐败不堪，这就是儒家的经典！卑鄙无耻，百般钻营，这就是孔丘的学问！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无学无术"。（《焚书·答耿中丞》）连德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也瞧不起孔丘那一套，说在孔丘那里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还说："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哲学史讲演录》）这对于孔老二这个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倒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到处碰壁的丧家狗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孔丘一生，到处搞复辟，到处碰壁。当时人民群众骂孔老二"累累若丧家之狗"，这句话生动地概括了孔老二一生的遭遇。这是他推行那条倒行逆施的政治路线的必然结果。

孔老二打着"克己复礼"的破旗，坐着一辆马车，颠颠簸簸，先后到过齐、卫、宋、陈、蔡、楚等国。奔波了十几年。但所到之处，不是坐冷板凳，就是被驱逐出境，大家都厌恶这个死顽固。卫国国君听说孔丘善于搞阴谋，派人带着武器出出进进地盯着他；齐国和宋国的新兴势力还要杀掉他。孔老二每次都夹着尾巴狼狈逃窜。在陈、蔡，新兴势力还派人把孔丘一伙包围在野地里，使他们七天吃不上饭，饿扁了肚子，一个个面黄肌瘦，有的还病得爬不起来。连他的几个得意门生也大闹情绪，对孔老二那一套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孔老二在劳动人民那里，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种田的，背筐的，守门的，都对他群起而攻之。有的唱歌嘲笑他，有的斥责他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反动派。匡城的老百姓还把他包围了五天，要杀他。孔老二几乎丢了一条老命。有一次，孔老二装出一副亲善的样子，面带三分笑，心藏一把刀，跑到奴隶起义的杰出领袖柳下跖那里，妄图用"仁义道德"的说教和名利地位的诱饵瓦解奴隶起义军。柳下跖满怀革命的义愤，痛斥孔老二是"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吸血鬼，是当面说好话、背后搞阴谋的两面派，是油嘴滑舌、"诈巧虚伪"的"巧伪人"，是"罪大极重"的盗丘"！骂得孔老二脸色刷白，两眼发黑，丧魂落魄地滚跑了。（《庄子·盗跖》）

孔丘到处碰壁，连他的弟子们也纷纷离开了他。孔老二哀叹："如果我的主张行不通，我要坐着木筏到海外去。能跟随我的人，大概只有子路了。"（《论语·公冶长》）但就是这个子路，也在一次维护奴隶制的战斗中被人砍成肉酱，成了奴隶制度的殉葬品。孔丘如果还想坐着木筏亡命海外，就连一个追随的人也没有了。到处碰壁，众叛亲离，这就是一切搞复辟的反动头子的必然下场。

马克思说："**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吧。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他们命运是令人羡慕的。**"（《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死抱住孔老二僵尸不放、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人，他们的前途是不美妙的。世界的未来属于无产者！

（原载《红旗》杂志1974年第4期）

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

全国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胜利展开，逐步深入，形势很好。

对有些单位请示中央的几个问题，答复如下：

一、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连。中央重申毛主席的教导："**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对已经成立的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一类组织，各级党委应做好工作，劝他们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二、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在三支两军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已经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不要再回支左单位参加批林批孔。如果对他们有批评意见，可以送到所在部队的领导机关。部队各级党委和被批评的同志对人民群众的批评应当表示欢迎，认真地妥善地处理。

三、应当强调指出，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批林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批孔比批林更困难些。各级领导同志务必理解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要把各级领导机关的批林批孔作为重点认真搞好。要欢迎群众联系本地区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实际所提出的批评。有极少数领导干部，不批林、不批孔、捂盖子，怕群众，甚至采取恶劣手段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革命，破坏生产，煽动经济主义，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是完全错误的。对阶级敌人的破坏，要提高警惕。中央希望各级党委认真加强领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使批林批孔进一步开展起来。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

邓　小　平

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四月十日在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发言全文如下：

主席先生：

联合国大会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革命委员会布迈丁主席的倡议下，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支持下，顺利召开了。联合国成立二十九年

来、举行专门会议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反映了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中国政府热烈祝贺这次会议的召开。中国政府希望会议将为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维护民族经济权益，为促进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前国际形势对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非常有利。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遭到了日益深刻的破坏和冲击。国际关系激烈变化。整个世界动荡不安。这种状况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天下大乱”。这个“乱”是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的表现。它加剧了腐朽的反动势力的瓦解和没落，促进了新生的人民力量的觉醒和壮大。

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了急剧的分化和改组。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在战后一个时期内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因为出现了社会帝国主义，现已不复存在。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也已四分五裂。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

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它们两家都拥有大量核武器。它们进行激烈的军备竞赛，在国外派驻重兵、到处搞军事基地，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它们都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颠覆、干涉和侵略。它们都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掠夺别国的财富，攫取别国的资源。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它出兵占领自己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它策动战争，肢解巴基斯坦；它说了话不算，毫无信义，唯利是图，不择手段。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对第三世界国家保持着各种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的关系；象葡萄牙这样的国家，甚至还在继续野蛮的殖民统治。这种情况应当结束。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着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或欺负，其中有些国家在所谓“大家庭”的幌子下，实际上被超级大国置于附庸的地位。这些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摆脱超级大国的奴役或控制，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的要求。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最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它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间的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什么“均衡裁军”，什么“限制战略核武器”，到头来都是一句空话，实际上，既没有“均衡”，也不可能“限制”。它们可能达成某些协议，但是这种协议只不过是表面的和骗人的东西，骨子里是为了进行更大、更剧烈的争夺。超级大国的争夺遍及全

球。欧洲是它们争夺的战略重点，处在长期紧张对峙之中。它们在中东、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角逐正在加剧。它们天天讲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它们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它们争夺到那里，那里就出现动乱。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界就决不会安宁，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不是它们相互之间打起来，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阐明的那样，**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

两个超级大国为自己设置了对立面。它们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激起了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的强烈反抗。亚非拉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斗争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印度支那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继续前进。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巴勒斯坦人民，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冲破了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和"不战不和"的局面，取得了反对以色列侵略者的巨大胜利。非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歧视的斗争深入发展。几内亚（比绍）共和国在武装斗争的烈火中光荣诞生。莫三鼻给、安哥拉、津巴布韦、纳米比亚和阿扎尼亚人民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和南非、南罗白人种族主义的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拉丁美洲国家带头兴起的维护海洋权的斗争，已发展成为世界规模的反对两上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第十届非洲国家首脑会议、第四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和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次又一次地强烈谴责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表达了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相互支援、同仇敌忾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亚非拉国家和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戳穿了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沉重地打击了它们妄图统治世界的野心。

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激起了第二世界发达国家的强烈不满。这些国家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干涉、威胁、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斗争，日益发展。它们的斗争，也对国际形势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无数事实说明，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既然能够通过长期斗争取得自己的政治独立，就一定也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加强团结，联合受到超级大国欺负的国家，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通过持续不断的斗争，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为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创造必不可少的条件。

主席先生：

原料和发展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中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这是当前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大家知道，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亚非拉人民进行了肆无忌惮的奴役和掠夺。它们利用当地人民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推行畸形的单一经济、攫取廉价的农矿产品，倾销自己的工业产品，扼杀民族工业，进行不等价交换，榨取超额利润。发达国家的富和发展中国家的穷，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掠夺政策造成的结果。

许多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控制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旧的经济结构并没有根本改变。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采用了新殖民主义形式，变本加厉地继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和掠夺。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通过"跨国公司"这样的国际垄断组织，建立"国中之国"，在经济上进行掠夺，在政治上

进行干涉。它们利用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提高它们自己的产品的出口价格，压低发展中国家原料价格，牟取暴利。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它们相互间竞争的激化，它们还用转嫁经济、货币危机的办法，加剧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

应该指出的是，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超级大国在进行新殖民主义的经济掠夺方面，并不逊色。它在自己那个“大家庭”中以所谓“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的名义，采用高压手段，榨取超额利润，其损人利己的程度，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也不常见。它打着“援助”、“支持”的旗号，在一些国家中搞的联合企业，实质上就是“跨国公司”的翻版。它惯于利用陈旧设备和报废武器，标高价格，换取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原料和农产品。它大做军火买卖，成了世界军火商。它经常乘人之危，进行逼债。在这次中东战争中，它用贩卖军火赚取大量外汇，用低价买进阿拉伯石油，再用高价出售，转瞬之间大发横财。它还鼓吹什么“有限主权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是国际财产，它竟然说，“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主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工业对这些资源的利用能力”。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理论。它比另一个超级大国所标榜的名为“相互依存”，实则维持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论调，更加霸骨。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理应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真诚地支援被压迫的国家和民族，帮助人家发展民族经济，而这个超级大国却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更加证明它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掠夺和剥削，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帝国主义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打破它们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掠夺，扫除这些障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国家的经济资源和其他权益，这是完全正当的。

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所作所为，阻止不了发展中国家在争取经济解放的道路上胜利前进。最近在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用石油作为武器，狠狠地打击了犹太复国主义及其支持者。这件事做得好，做得对。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帝斗争中的一个创举。它大长了第三世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它冲破了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垄断国际经济的局面，也充分显示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进行战斗的巨大威力。既然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可以勾结在一起，任意操纵市场，严重地危害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那么发展中国家又为什么不可以团结起来，冲破帝国主义的垄断，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呢？石油斗争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在石油斗争上已经做到的事情，在其他原料问题上也应该、而且能够做到

还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捍卫自己的自然资源的意义，绝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超级大国为了扩军备战、争霸世界，必然要疯狂地掠夺第三世界的资源。发展中国家掌握和保护自己的资源，不仅对于巩固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必要的，而且对于反对超级大国扩军备战、制止它们发动侵略战争，也是必要的。

主席先生：

我们认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首要的前提是维护政治独立。一个国家的人民取得政治独立，还只是走了第一步，还必须巩固这个独立，因为在国内还存在殖民主义的残余势力，还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危险。巩固政治独立必须经历一个反复斗争的过程。归根结底，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是不可分的。没有政治独立，就不可能获得经济独立；而没有经济独立，一个国家的独立就是不完全、不巩固的。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巨大的潜力。只要各国根据自己的特点和条件，沿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完全有可能在工农业现代化方面逐步地

达到我们的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生产水平。帝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所散布的一切悲观失望、无所作为的论调，都是毫无根据的，别有用心的。

我们说的自力更生，就是主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掌握本国的经济命脉，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努力增加粮食生产、有计划地、逐步地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决不是脱离本国实际，而是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条件，区别不同情况，确定各国自己的自力更生的途径。在现阶段，发展中国家要发展民族经济，首先必须掌握自己的自然资源，并且逐步地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原料生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较大的比重。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把原料的生产、使用、销售、储存、运输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通过平等的贸易关系，以合理的价格出售原料，换取较多的为它们发展工农业生产所必需的产品，它们就有可能逐步解决面临的困难，为早日摆脱贫穷落后状态，铺平道路。

自力更生决不是"闭关自守"，拒绝外援。我们一向认为，各国在尊重国家主权、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条件下，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取长补短，对于发展民族经济，是有利的和必要的。

这里，我们要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第三世界国家过去有着共同的遭遇，今天都面临着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大国霸权主义，发展民族经济，建设各自国家的共同任务。我们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互相疏远。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正在利用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暂时分歧，进行挑拨分化，破坏团结，以达到它们继续操纵、控制和掠夺的目的。我们应当保护充分警惕。我们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某些分歧，完全可以而且应当在有关发展中国家内部，通过协商，求得解决。在石油问题上，有关的发展中国家，正在做出积极努力，寻求适当途径，谋求问题的合理解决，对此我们感到高兴。我们发展中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应该互相支持，在经济上也应该互相帮助。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真正平等的合作，是具有广阔的前景的。

主席先生：

第三世界国家强烈要求改变目前这种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并且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革建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热烈赞同并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提出的一切正义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

我们主张，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对一切外国资本特别是"跨国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直到把它们收归国有。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各别地或集体地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的主张。

我们主张，国家不论大小，不论贫富，应该一律平等，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当由一、两个超级大国来垄断。我们支持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参与有关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一切决定的充分权利。

我们主张，国际贸易应当建立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改善它们的原料、初级产品、半制成品和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扩大销售市场，确定公正有利的价格等迫切要求。我们支持发展中国家建立各种原料输出国组织，进行反殖、反帝、反霸的联合斗争。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当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政治、

军事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或借机牟取暴利。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当是无息或低息的，必要时可以延期还本付息，甚至减免债务负担。我们反对假借援助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高利盘剥和敲诈勒索。

我们主张，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让必须实用、有效、廉价、方便。派往受援国的专家和人员有责任向受援国人民认真传授技术，尊重受援国的法令和民族习惯，而不应当要求特殊待遇，更不得进行非法活动。

主席先生：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这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叫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果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必然会变成超级大国。过去几年内，在中国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都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保证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

主席先生：

历史在斗争中发展，世界在动荡中前进。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困难重重，日益衰败没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我们相信，只要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不断地取得新的胜利。

(原载 1974 年 4 月 11 日《人民日报》)

毛 主 席 已 圈 阅。

中共中央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几个政策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五月十八日)

中央最近根据毛主席指示，讨论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几个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几个月来的运动，冲破了种种阻力，排除了一些干扰，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正在深入发展。当前，要注意掌握党的政策，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争取批林批孔的更大胜利，争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胜利。

二、在运动中，广大群众揭发批判了许多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人和事，这是完全必要的。继续把这方面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领导上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在时间上，应当以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八、九月巡视各地打招呼为界；以听到传达中发[1971]57号文件为界。在这以前的事、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只要向党讲清楚，同林彪反党集团划清了界限，就不要再算这些老账。中央重申中发[1971]57号文件宣布的政策："中央对于坚决同林彪划清界限的同志，不论他过去是否受过林彪的影响，是否犯过错误，都是同样爱护而不会轻易怀疑的。"中央希望在林彪问题上犯了错误，但是已经交代了问题的同志，放下包袱、振作精神，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投入批林批孔，将功补过。也希望那些隐瞒了某些问题的同志，把问题讲清楚。凡属好人犯错误，都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应当为这些同志创造条件，使他们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三、确定陆、海、空军的军（省军区、警备区、科研单位、军事院校不含，野战军含）以下领导机关和部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一律坚持正面教育。这样做，有利于集中力量把军以上单位的运动较快地搞好。请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照此方针安排自己的工作和学习，并随时总结这方面的好坏经验报告中央军委。

四、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把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把孔孟之道批深批透，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我们全党作极大的努力。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了一批搞革命大批判的积极分子，应当注意培养，并且团结一切愿意批林批孔的知识分子，推动他们同广大工农兵群众结合起来，逐步地造成一支宏大的理论队伍，使全党全军能文能武。各级党委都要把这个问题当作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百年大计认真抓起来。

五、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证明了毛主席历来的估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是比较好的，我们的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好的，是经得起风浪的。经过八年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巩固的。各级党委应当结合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历次指示，认真地总结自己的经验，分析形势，加强领导，争取批林批孔运动和各项工作的新胜利。

（发至县、团级、传达到群众）

江青在"天津市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九日）

同志们：

没有准备讲话，因为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来啦。我们来的有一些专家，专门写批孔文章的专家，老先生，老、中、青相结合的写作班子，我们还有文化组的成员，领头的就是你们的市委书记。

我没有什么准备，想到那里就讲到那儿。我对历史不很知道，就是为了打这一仗而努力

学习。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如果有讲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我很抱歉，刚才我迟到了一刻钟的样子，因为有几个文件要急着处理，没有准时来到，希望同志们谅解我。

首先，报告同志们一个好消息，在十七号的下午二时，我们又爆炸了一颗氢弹，但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会，听了工人同志们批林批孔，比那个氢弹的威力还要大。

有几个问题我想提出来和同志们商量讨论，跟专家商量商量。在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凡是尊儒反法的都是卖国主义的，所有的尊法反儒的都是爱国的，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标志。刚才这个女同志年龄虽小，她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的历史知识是很菲薄的。历史上凡是法家都是受压的，他们是基层起来的，要斗争；凡是有作为的封建人物也好，封建帝王也好，不管是打天下的还是治天下的，一般都是法家或接近法家。但程度不同，都要作具体分析。总的来看，历史上法家是爱国主义的，对群众是爱护的，使群众受到鼓励；儒家对群众，奴隶也好，农民也好，对我们工人阶级也好，他们是残酷无情的，残酷极了。孔老二那一套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后来被他的徒子徒孙粉饰起来的，完全是赤裸裸的。他是吹鼓手，是过街的耗子人人喊打，他到过很多国家，想作官，到处都不要他，好容易在鲁国当了官。他本来不是鲁国的人，他的祖先是宋国的贵族，叫孔父佳，是宋国的后代，是第几代记不清了。孔老二的父亲叫叔梁纥，是个没落的贵族子弟。孔老二到处想作官，到处劝人家要恢复奴隶制。那时候，春秋战国时期，经济上不平衡，有的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经济，有的是落后的反动的奴隶制，所以在历史分期上我们的郭沫若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功的。在尊孔问题上，他有点问题，特别是对秦始皇的看法上有些问题。他有一本书，叫做《奴隶制时代》，是值得看一看的。主席肯定这一本书，就是说中国奴隶制跟封建制的分界是春秋战国，这是对的。我看历史材料跟专家比起来看得少得多了，主席说郭老这一功是肯定的。

实际上，四书五经起到了束缚人们思想的作用，最大的束缚人们的思想的还是宋朝，就是程朱理学，就是程颐、程颢、朱熹，他们是理学家。从宋朝以后，做官要用四书五经作考试，人就不要自己去想了，所谓十年寒窗就是自己去背四书五经，学了以后思想很受束缚。最近，《参考消息》上（同志们有参考消息吗？大家答有）有篇英国学者研究中国历史的文章，很长，他说，欧洲人的科学是从中国的古典的科学得到了很大的启发。我们祖国的天文学最早了，指南针，造纸，火药，排字，这都是很早的，还有炼丹，从炼丹发展到火药。火药，欧洲原来是没有的，怎么到的欧洲呢？成吉思汗不是一直打到莫斯科、打到欧洲匈牙利嘛，同志们知道吗？这样就把我们汉族发明的火药带过去了。比如足球，宋朝就踢，这是我看《聊斋》知道的。就是说，不要对自己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也不要肯定得过分，过分了就象主席批评我们的成了大国沙文主义了。对自己的祖先有那些好的东西，要批判地继承，全部否定是不对的，当然全部肯定更是错误的。《参考消息》上讲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对世界的影响，有一些说的是不错的，有一些说得有遗漏，有待于我们自己的学者、工农兵集中起来，整理起来。

我建议全国各省市都要建天文馆，这不仅对儿童需要，象我们这样的人也很需要。北京的天文馆什么东西都是外国人的，只有一幅是中国的，其实这一幅也是错误的。你们天津建立天文馆，应该着重从历史上整理我们自己的。二十四史同志们看一看，对天文学记载特别多，

我想讲一个问题，就是刚才听到薛清泉同志讲到的孔子修《春秋》的问题。这本书可能

是假的，我没有考证，据说是后来人搞的，当时他可能有这个意思。这一点请专家来考证。《论语》也不是孔老二写的，也是后来他的徒弟写的，他有那些话，他的徒弟给他记载下来的。《春秋》也不是孔老二亲自搞的，可能他有这个思想，传下来的。时代的问题不要说死，我们还要做一些工作。

刚才讲到"星火燎原"的问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是主席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主席写给林彪的信，是主席批评林彪的悲观主义、失败主义的，过去我们都不知道。林彪要主席改掉许多话，现在《毛选》上的不是那时候的东西了，我找到原来的东西看了，批评得很厉害。刚才那位同志批到：林彪的"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但是没有讲到这个情况，我补充一下。

奴隶、农奴、农民是有区别的，奴隶跟农奴有区别，农奴跟农民有区别，刚才那个同志提出西藏电影《农奴》就是奴隶，要注意奴隶、农奴、农民的区别。奴隶是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而且带着枷锁，就是在井田上劳动，而他们本身是那样的不值钱。在春秋战国的时候，要四个奴隶一束干肉，才能换一匹马，殉葬的就很多了。刚才说的郭老的那本书，就有大量的证明。现在出土的大量材料更说明这个问题。农奴，就稍微好一点，就是不带枷锁了，个别的也有殉葬的。后来搞殉葬，大量的是做假人，就是墓里挖出来的俑。在我们家乡，我小的时候看到做童男童女，也是一种殉葬的意思。解放以前，我家乡的土地还残存着"圈地"的痕迹，不象江南，当然这是极少数的。我的家乡主要是实物地租，江南是交货币地租。在我们那里地契都刻在地主的房基石上。在土改时候，我们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不敢要，问我们，你们分土地、房屋是真是假？我们说是真的。他们说你们跟我走，就到了地主房前，把房子扒开一看，房基石上都刻着×××欠我多少租子。农民、农奴、奴隶这三种东西不能混淆。西藏的农奴，就是比较偏向于奴隶制的，但是他们不等于完全的奴隶、不是奴隶制时代的奴隶。少数民族地区，因为经济发展不平衡，有一些兄弟民族如海南岛，解放的时候，还是刀耕火种，就是用一把刀耕地，放一把火烧了草当肥料，就种田，单位面积产量很少，现在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海南岛收获三季，如果有水的话，恐怕四季都可以。水不够，东部、北部好一些。

解放以后，在汉民族帮助下，少数民族很快摆脱了类似奴隶制或者农奴制，一下子就过渡了，当然经过一个民主改革了。最近一、二年前还进行了人民公社化，现在合作化基本上搞完了。有些地方还残存着个体生产，象黑龙江、江西的山上，也有一家一户开荒种地的，这是少数，例外。整个来说，我们是社会主义经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

我建议同志们看两篇文章，就是法家代表人物介绍，原来登在十五日北京日报上，我当天就批给《人民日报》转载，十六日人民日报就转载了，我看你们今天也转载了。现在人民日报又出第二篇了，我刚收到还没来得及细看。第一篇先秦的，也有遗漏，第二篇从秦始皇一直到西汉，有一部分没有写全，主要的代表人物写上了。有不少的遗漏，有一些缺点。

刚才薛清泉同志讲秦始皇是有功勋的。我想，他的功勋还不单是郡县制，他统一全中国，实行郡县制，统一中国的文字，统一度量衡，车同轨，等等，都是很先进的。我最近在《文物》上看到，商鞅变法用的斗是长方形的，现在出土了，秦始皇就是在那个基础上改的。

还有一点同志们也要知道，所谓西周，就是指文王、武王。武王伐纣，他名义上统一了，实际上有八百诸侯。到了春秋战国时候，就是七雄，这在中国发展史上就是很大的进步。而秦始皇能够消灭六国，统一全中国，是了不得的。筑长城的不单是秦始皇，而是到了

秦始皇时是大量的修。同志们看到八达岭吧，见了长城吧，我到过雁门关，沿着长城走过，很了不起，是很大的工程，是抵抗外来侵略的，因为我们当时是先进的农业国家，要抵抗游牧民族的侵犯。当时顶住了匈奴的侵犯，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凡是法家都是爱国主义的，从头到尾都有这一点。秦始皇的时候，就存在着匈奴，还有其他游牧民族，还有那些反动的、没落的奴隶主，一直到汉代初期还有很大的奴隶主。刘邦分封了同姓王，异姓王都干掉了。当时最大的是吴王濞。当时也存在着不平衡，四川的大奴隶主卓王孙（有个卓文君大家知道吧，她是司马相如的老婆，是卓王孙的女儿），他家有家奴一万，我们讲的一万是个数目字，可能还不止。吕不韦也有家奴一万。

自从我们进入批林批孔，世界上都很震动。苏修是尊孔的，拼命骂我们，美帝还不这样。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震动得很厉害。日本的军国主义就是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日本的友好人士，来了说：不得了了，你们批孔老二，我们受不了。一个友好人士说：你们这么搞，我们受不住了，批到我们这儿来了。还有回教，批孔对他们也有影响，有人说"汉族兄弟批了他们的圣人，也批了我们的圣人，我们的穆罕默德也是这样"。对基督教也有影响。欧洲的朋友说，他们那儿也有圣人，都受影响。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南亚都受影响，有的跟着批孔，有的反对批孔，日本的反动组织青岚会反对我们批孔，苏修最卖力了。所以不要以为批林批孔这只是中国的斗争，现在是涉及到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的大斗争。过去外国人到中国来跟中国人学，都是学的四书五经，孔老二是"大圣人"，你们怎么批起圣人来了？

刚才那们同志讲到荆轲刺秦王。当时燕太子丹要报仇，他是没落的奴隶主的头子。太子丹有一个征求人才的黄金台，荆轲是很反动的侠客，是个小丑，他一定要找一个人作助手，这个人叫秦舞阳。当时为什么要搞"图穷匕首见"？因为秦王在殿上，卫士在殿下，荆轲刺秦王，秦王跑到柱子后边，荆轲没有刺着，卫士就跑上去了。实际上荆轲是一个遗臭万年的小丑。我们一个电影叫"狼牙山五壮士"，本来五壮士是非常英雄的，牺牲了三个，剩了两个，但是，电影还弄得凄凄惨惨的，什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把五壮士比做荆轲，这是不对的。

刚才那位同志讲到秦始皇的时候。当时，儒、法对立：一面是秦始皇、李斯，那一面是吕不韦、嫪毐以及没落的、搞复辟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就是皇帝的亲戚朋友，内戚、外戚。吕不韦不是秦国人，是赵国人。那时候，秦国有一个公子叫异人，被质于赵。吕不韦是大商人，他看到异人便和自己父亲说，这人奇货可居。吕不韦就要在异人身上投资，把他弄到他家去，把他的赵姬给异人做老婆。后来，他又到秦国去，买通了华阳夫人，因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要她把这个异人做为她的儿子，将来年老气衰就可以巩固她的位置。当时华阳夫人接收了异人为儿子。秦王死去后，就把异人接回去了，做了秦王。异人是秦始皇的父亲。秦始皇很年轻的时候就当政了。吕不韦为仲父，他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搞了一部书叫做《吕氏春秋》。我建议同志们很好地看一下那篇文章，就是《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吕不韦勾结没落的奴隶主，皇亲贵戚、内戚一块搞政变，被秦始皇扑灭了。然后秦始皇任用李斯。

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秦就亡了呢？因为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信奉儒，秦始皇不喜欢，就派他到大将军蒙恬那里守卫边疆。秦始皇死在路上，政权落到宦官赵高手里，这是秦复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毕竟是个剥削阶级代表，封建帝王，有对人民剥削压迫的一面。要看到他的功勋，同时要看到他的剥削。同时他杀人太少。他迁了几十万户豪强到咸阳，把很多儒都养起来了，他坑的知识分子是儒家的一派，就是胡说八道搞政变的，

而且是宣传天老爷的，宣传迷信的，杀的对。焚的书更少了，他下令保护好书，对农业、医药有帮助的书不许烧，只烧儒家的书，全国那么多儒家的书那能都烧掉。杀人四百六十个，杀的太少了。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年龄小，不懂事。代表没落奴隶主的赵高执了政，赵高是代表儒家的。汉朝打的时间并不长就灭了秦，统一了中国，刘邦有一定的妥协的，采取了分封制，封了同姓王，搞掉了异姓王。吴王濞最大，他可以自己铸钱，可以晒盐，他比中央集权要富的多。

刘邦、吕后是法家，以后的文、景、武、昭、宣帝都是法家。他们用的大臣不是儒家、是法家。汉武帝用的大臣不是儒家，主要是法家。有一个大臣叫汲黯，在朝上当面对汉武帝说："你内多欲外施仁义"。汉武帝一听，很生气，脸都变了颜色，罢朝后回宫去了。别人都替汲黯担心，都以为要杀他，结果没有杀，汉武帝说：汲黯戆也。

刚才说的刘少奇、林彪那一段，同志们提供了很新鲜的材料，我知道也是最近才知道的。刘少奇进城初期亲自祭过孔。一九六二年他亲自组织好多人到曲阜去，有上千把人吧。全国很多单位都去了，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人去。你们不要以为社会主义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的儒，同志们都有材料，都可以看。

刚才讲了刘邦，就是汉高祖。吕后、张良、肖何、曹参、晁错、桑弘羊都是法家。

刚才有的同志说到了男女不平等的事，孔老二的东西到董仲舒才增加上夫为妻纲。其实孔老二老早就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不过到董仲舒成了一纲。汉朝的女人，还是比较自由的，可以有"面首"，什么叫"面首"，同志们知道不知道？"面首"就是除了丈夫以外，可以有男妾，男的小老婆。

唐朝的女人也没有那么严重的不自由，因为唐朝的女人不自由就可以出家，做女道士、尼姑；在劳动人民中就有更多的自由了。只有到了宋朝就倒霉了，这可能是与封建制的经济下降不是上升有关。他们奴役、束缚的厉害，反抗就更强一些。中国的农民暴动是上百万到几百万人，两汉有黄巾、赤眉、铜马，唐朝有王仙芝、黄巢，元末有张士诚、陈友谅，明末有李自成，清朝有太平天国、义和拳，这是最大的两次。朱元璋也是反儒的。

再就是我们党领导的工人阶级为基础的、贫下中农为巩固的同盟军的革命，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使我们的国家得到解放。十年内战，抗战八年，解放战争只用了三年半，把蒋介石打得滚到那个岛上去了，蒋介石是个大儒。

我昨天晚上才把《盐铁论》的本子读完了。我建议你们读一下。斗争很激烈，主要是昭帝坚持执行汉武帝的路线，另一批王八蛋要反对。刘邦开始不信儒，他不愿见郦食其，说老子不见儒生，郦食其就骂："我不是什么儒生，老子是高阳酒徒。"刘邦当时正在洗脚，光着脚丫子就去见郦食其，他不是真的儒。刘邦为什么尊儒呢？因为他统一天下后，不好支配他的几个大臣。后来叔孙通给他制礼作乐，刘邦说我才知道当皇上的滋味。

《红旗》杂志的一篇文章叫《读〈盐铁论〉》，我建议同志们看一看。林彪不是骂我们笔杆子压枪杆子吗，他的笔杆子可多了，反革命舆论多的很，造谣诬蔑我们中央的同志跟主席革命就是笔杆子压枪杆子。我也算笔杆子，我也不会动笔，我压了你们没有？你们今天来了一百多个战士嘛。造谣，他用这个骗人，什么"民富国强"！他是大叛徒、大卖国贼，是大盗窃犯！"一平二调"！我举一个例子，云南有他的一个相当大的死党，给他送茅台，一次一千，一次一千五百瓶，还有云烟几百箱，他有那么高的薪水吗？是不是贪污来的？（大家答是）"一平二调"！在杭州修行宫用了两千七百多万元，还没有修完，还不算施工的部队。他

吃的东西全国进贡，家里有很多灵芝草、他还抽鸦片烟，他想长生不老，过去我们不知道。毛家湾有工作人员去过，看到前面两间小房，后面可了不得，从来不让我们去。我去过几次，很隐蔽。他在北戴河也修了行宫，楼梯很宽，只有人民大会堂有那么宽的楼梯。有两个放映室，在中间还修了个大游泳池，说林彪怕水，混帐！造谣骗人。说他小腿出汗，其实他一走道走多少公里。这个人是胆小鬼就是了。主席在"九·一二"晚上回来前他就跑了，他不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吗？他就是独往而没有独来嘛。他说吃茶叶还膀胱出汗，谁看得见？

诸葛亮虽然维护正统，过去以为他有正统思想，实际是法家。

曹操是很了不起的法家。他用的郭孝直很年青就死了，是个大法家。曹操很能用人。袁绍有个谋士叫陈琳，他写了一篇檄文骂曹操，骂得很厉害。曹操正在生病，头疼，看了他这篇文章后，出了一身汗，连头也不疼了。后来曹操把陈琳俘虏了，他问陈琳，你为什么骂我骂得那么厉害？陈琳说：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曹操没有杀他，留用了。还有个大将庞德被俘虏了，放回来也没有杀。在历史上法家杀人少，儒家杀人多。孔子上台三个月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影响很大，孔老二的门下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没有走。孔老二上台以后杀了少正卯，七天不准，三个月可靠。少正是官名，是个大夫，杀要有手续，三个月比较可靠。

唐朝李世民，要做具体分析，恐怕法家的成分多一点，希望专家研究一下。他的父亲李渊，给隋皇帝守行宫，在晋阳，不敢起来造反。李世民手下有一个人叫刘文静（晋阳令），说要起来造反。李世民用了他的建议，取得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做了皇帝。他还用一批农民暴动的领袖，就是瓦岗寨的人，同志们知道不知道？比如李勣，原来叫徐勣，就是徐茂公。魏征是法家还是儒家，还值得研究。武后用武元衡、狄仁杰、姚崇、宋景、裴度等，这些人都值得研究。

后来有韩愈。韩愈是儒家有点法家味道，要分析。柳宗元是法家。王叔文是法家。所谓八司马，其中也有韩愈。韩愈被贬到了潮州，哭哭啼啼的，有一首律诗，说："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即《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而柳宗元被贬到柳洲，就不那样。也有一首诗，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韩愈作为文学家不能完全抹煞。他是儒家，还有点法。对他不能绝对化，要具体分析。他就批评过孔丘，说："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石鼓歌》）当时对孔丘是不能批评的。

武元衡、裴度、李愬等是儒家还是法家值得研究。他们都是反对藩镇割据的。李师道派人去刺武元衡和裴度，武无衡被刺死了，裴度滚到沟里去了，没有死，这时就有人把刺客抱住喊"有贼"！刺客把抱的人的臂砍断逃跑了。

李愬在雪夜攻蔡州时，抓了一个俘虏，大家要杀掉，李愬不让杀。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连俘虏带到皇帝面前，皇帝把这个俘虏赦免了。

八司马是八世纪末、九世纪初的人。

宋朝的赵匡胤、赵匡义也要研究。

寇准是爱国主义者。岳飞也要研究，是法是儒，也许又是法又是儒。

王安石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变法除了维护较先进的封建制度外，还是为了防御异族的侵略。李世民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当时的游牧民族侵略我们，每到草肥马壮的时候，他们就来了，靠轻骑兵、重骑兵。轻骑兵两匹马，重骑兵四匹马，不带干粮，吃马奶就可以，马奶没有了，就用锥子扎马腿喝马血。他们不要辎重，不象我们的部队要有很大的后勤。

汉朝的霍光有个兄弟，叫霍去病，此人很了不起。大将卫青，是霍去病的舅舅，奴隶出身。还有武帝的皇后卫子夫，是卫青的姐姐，最初是平阳公主的歌奴。汉武帝用人很了不起。当时两派斗争，挑拨武帝父子关系，戾太子受一些人鼓动，反对汉武帝。武帝劝他不听，后来才把他干掉了，并且追查余党。戾太子的孙子关在狱里，在搜查时，邴吉拒门说："里面有皇帝的骨血，谁也不能进去。后来武帝觉得杀人太多，就宣布赦免。邴吉就这么顶一下，汉宣帝就这样保存下来了。

刚才那个同志的报告说孔融和弥衡都是曹操杀的，这不对。弥衡不是曹操杀的，是黄祖杀的。弥衡是个大文学家。要看《三国志》，不要看《三国演义》。小说不可信。李白有一首诗讲这个事：

魏帝营八极，蚁观一弥衡，

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唐朝有三个姓李的大诗人，二李是法家：李白、李贺。李白的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见《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讲："中国儒家对孔子就是迷信，不敢称孔丘，唐朝李贺就不是这样，对汉武帝直称其名，曰刘彻、刘郎……一有迷信就把我们的脑子压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学习马列主义没有势如破竹的风格，那很危险。"我这是念的主席的原话。李白也是这样。主席讲学马列要有势如破竹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是很危险的。我们今天批林批孔，也要有这种精神，同志们说对不对？没有这种势如破竹、风扫残云的精神是不行的。主席讲批林比较好办，批孔就难了，我们就是要知难而进。

王安石变法，许多是针对外族入侵的，都是有针对性的，是为了国家强盛起来。司马光的后台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是宋神宗的祖母；王安石的后台是宋神宗。后来宋神宗怕了，王安石也就下台了。

明朝的李贽，他的书我没有全看，《焚书》翻过一点，不多。上海新发现了一种李贽的《〈四书〉评》，已拿到北京去印，不久可以发行。厦门大学还发现了一部《史纲评要》，现正出版。他是不能忍受凌辱，死在监狱里的。

对清，也要很好做点研究。比如康熙，康熙是顺治的儿子。有人说顺治死了，有人说他出家做了和尚。顺治的母亲下嫁给多尔衮，多尔衮统一了全中国。康熙八岁登基，他的辅政大臣是鳌拜，他没有自由。他想了个办法，搞了一些小孩和他一起玩。到十六岁时，等鳌拜来的时候，这群小孩一下子围上去，将鳌拜捕捉下狱质罪，他就自己搞。十六岁他就过问政治。这样的人值得研究。要注意这些人，但不要过了，过了就要回潮，就又出来让步政策了。那来什么让步政策是绝对没有的，是反革命造出来反对历史唯物论的。他们反对历史唯物论就来一个让步政策；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就来一个合二而一。让步政策实际是合二而一在史学中的反映。

同志们，我自己的历史知识也不多，你们讲得不够的地方，或者错了的地方，我加以补充，少数地方加以纠正。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也向在座的两个写作班子的同志学习，向天津市的同志学习，我们共同学习吧！我可能说的有错误，有缺点，同志们允许我改正，不然，我以后就不敢来了，也不敢给同志们讲话了。我的话完了。

（当薛清泉同志讲到孟姜女哭长城的事时，江青同志插话说：）那么远，她怎么去呀？那时候交通又不方便，即便是有的话。

东晋的刘昆也是爱国主义的。

〔附〕"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是怎样搞篡党夺权阴谋的

王张江姚"四人帮"篡党夺权之心由来已久。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背着中央，另搞一套，赤膊上阵，东窜西跳，四处点火，反党乱军，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次大演习，是他们反革命狂妄野心的一次大暴露。

先看看他们在批林批孔中，进行了哪些罪恶活动吧！

其一，人们记忆犹新，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和一月二十五日，"四人帮"背着毛主席，背着中央政治局，擅自召开了驻京部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两个大会，都是万人规模，但开得非常急迫，临时通知，仓促组织；各单位人员放弃春节休假，紧急整装赴会。然而会议开得不伦不类，给人们头脑里留下一大堆问号。一·二四大会，名义上是中央军委召开的会议，而中心内容却是宣读江青以个人名义写的一封信。传达中央文件被放到次要地位，并且不是由出席会议的军委领导人传达，而是由江青指派的两个在军队中没有任何职务的人来传达。江青的这两个爪牙，在会上信口雌黄，大放厥词，肆意污蔑和攻击人民军队，对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施放明枪暗箭，恶语中伤。在一·二五大会上，江青俨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领导的人身份出场，两个黑爪牙又做了一次丑恶表演，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这样的会议，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少有的怪现象。

揪出"四人帮"，真象大白，怪事不怪了。原来这两个大会，都是"四人帮"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密谋策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对我党我军搞突然袭击。一·二四大会前夕，江青以凌驾于中央和中央军委之上的狂妄口气，打电话要军委召开驻京部队的万人大会，而会议内容却只字不透露。会议当天，预定开会时间已过，江青指派的那两个爪牙才匆匆而来，拿出江青的那封信，在会上宣读。飞扬跋扈、目空一切到了极点。江青的两个爪牙在两次大会上的反动讲话，也是"四人帮"精心预谋，江青当面口授的。他们开这两个大会，完全越过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也不报告毛主席，把谁都不放在眼里，气焰十分嚣张。

江青的那封信和两个爪牙的讲话，都是鼓吹"三箭齐发"，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反党乱军的大毒草。利用两次大会，把毒草抛出来，是"四人帮"有组织有计划地发起的一次进攻。在一·二四大会上，政治流氓王洪文坐在台上，得意忘形，使劲鼓掌，为毒草出笼助威。会后，狗头军师张春桥又阴险地提出，要"军委议一议"，对江青的那封黑信"如何落实"。真是台前台后，有唱有和，配合十分紧密。张春桥的"提议"，受到了军委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然而，他们一计未成，又生一计。江青、姚文元又煞费苦心，对一·二五大会的讲话录音连续进行了三天的修改，迫不及待地要发往全国全军，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对他们的讲话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扣发了他们的录音带，使他们的阴谋再次遭到破产。

"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批评和扣发录音带极为不满，在政治局讨论毛主席批示的会议以

后，江青一回到家，就大发雷霆，发泄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仇恨。在行动上，他们不仅毫无悔改表现，反而变本加厉，愈走愈远。

其二，“四人帮”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王洪文、江青接二连三地给外交部、中共中央联络部、中国科学院等党政机关，国防科委、海军、空军、南京部队、广州部队等领导机关以及一些连队和人民公社写信，施加压力，煽风点火。他们送的材料，五花八门，包括许多充满孔孟之道毒汁的坏书，名为供大家批判，实则广泛散布。江青还别有用心地向部队的一个单位说：“批林批孔材料每人给你们一份，你们那个司令部还没有印”，公然散布分裂党的言论。

其三，他们向中央和地方党政军机关大量派人，控制这些单位的运动，搜集整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们以“学习组”的名义，把一些没有军籍的人，派到总参等军队领导机关，他们在幕后指挥，让这些人指手划脚，操纵运动。还选派一些没有军籍的记者，到各军区机关和部队，专为他们搜集“情况”。江青的那两个黑爪牙、也受江青的“委托”，闯到军队高级领导机关，看大字报，窥测动向，向其主子汇报。一时，部队、地方到处被闹得乌烟瘴气，上下不宁。

其四，他们还通过批文件，搞“接见”，亲自出马，把黑手伸向许多单位。江青在关于七机部的一个材料上恶狠狠地批道：要用“重型、威力的炮弹才能轰开”，要“一个堡垒一个堡垒的攻克”。江青、张春桥和他们的亲信还私自接见军队的几个人，抛出臭名昭著的“三·五”黑讲话，公然叫嚷要在军队“放火烧荒”，“要夺权”。王洪文也在第二天听取军队领导机关情况汇报时，叫嚷要把盖子揭开，“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用炸弹炸！”真是杀气腾腾，凶相毕露。

“四人帮”在上述这些活动中，搞了一些什么名堂呢？江青厚颜无耻地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那是胡扯，是颠倒黑白。按照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批林批孔是要进一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深挖其思想根源，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彻底查清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一些问题，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与此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是接过革命的口号，进行反革命的勾当，以批林批孔为名，行反党乱军、篡党夺权之实。他们实际搞的是：

（一）借批林批孔，搞“三箭齐发”。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大措施。“三箭齐发”，就是批林批孔又夹进一个批走后门。走后门这个不正之风，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是，这同解决敌我问题的批林批孔不能混淆，不能相提并论，这是极为普通的常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人帮”是要借一个题目，整掉一批党政军负责同志。

（二）借批林批孔，鼓吹批所谓“现代的儒”，把攻击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实执行、勇敢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忠心耿耿，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四人帮”一直把周总理看作他们篡党夺权巨大障碍。批林批孔一开始，他们就通过大会小会，刁难周总理，攻击周总理。江青、姚文元还授意他们的爪牙要写文章批什么“现代的儒”，一个劲地要把周总理当作“现代的儒”来批判，用心何等恶毒！

（三）借批林批孔为名，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在部队擅自发动政治运动、煽动在军队“放火烧荒”，蓄意把军队搞乱整垮，篡夺兵权。“四人帮”对我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不听他们招呼，恨之入骨。批林批孔一开始，他们就处心积虑地要把攻击的矛头引向人民军队。他们把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长期培育的我国污蔑成“荒”地，胡说什么“军队最难办”，

“军队最危险”、“我们的话根本不听”。这些攻击，正是说明我们军队是“四人帮”妄想利用而利用不了的。江青咬牙切齿地说：要“斗胆”“整一整军队”。“放火烧荒”就是他们整军队，夺军权的一个行动口号。江青不仅指使其亲信在驻京部队五次“放火烧荒”，从军队领导机关和直属单位烧到驻京各大单位，而且亲自出马到部队借着女军帽的问题煽动说：“你们为什么不造军委的反，我是造了军委的反”。他们在自己抓的“点”上，煽动干部战士，盯着领导机关，找领导机关的岔子，还捉刀代笔，假借战士名义，给《解放军报》编造罪状，进行围攻，迫令《解放军报》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八天之久。江青背着中央军委，擅自指定一个人，把部队的文化工作“管起来”。王洪文也背着中央军委插手军队干部工作，说什么军队干部问题“要有个战略考虑，要有个总的计划”，要把所谓“拔尖的”、“精干”的、“能真正起作用”的提起来，也就是说要换上一批紧跟他们、他们信得过的人。这是批林批孔吗？这分明是要篡夺军队的各级领导权。

（四）他们还借批林批孔之机，招摇撞骗，大树自己，为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江青在军队无任何职务，也未受中央委托，却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请代我问候全军同志们春节好”，“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好大的口气呀！俨然以党和军队最高领导人自居。西沙反击战胜利后，国务院、中央军委立即给西沙军民发了嘉奖令，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鼓励，但是江青这个沽名钓誉的野心家，却又以个人的名义，派“特使”，送“贺信”，送“材料”，表示“慰问”。吹嘘自己和战士“心连心”，冒充西沙之战的“鼓舞者”，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他们还授意亲信为自己抬轿子，吹喇叭，把江青吹捧成“毛主席的代表”，这个单位、那个单位的“爹娘”，鼓动一些人向江青写信，表示效忠。他们还借批儒评法之名，把吕后抬出来，戴上“大法家”、“重新统一汉朝的女皇帝”等桂冠，为江青篡权上台当“女皇”造舆论。真是卑鄙之极

（五）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进一步抱成一团，把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完全撇在一边，自成体系，发号施令，私自处理大量党政军重大问题，实际上是篡夺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权。

“四人帮”是一伙假革命的反革命，长期以来，采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革命策略，借革命以营私。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达到篡党夺权这个罪恶目的。在批林批孔过程中，毛主席三番五次对他们提出尖锐的批评，进行耐心的教育。批评他们另搞一套，冲淡批林批孔，指出他们“不要设两个工厂”，告诫江青，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用个人名义送什么材料，特别警告他们：“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但是，他们对毛主席的指示阳奉阴违。迫于形势，他们不得不假惺惺地作几句检讨，承认“两次大会的召开未经政治局讨论，未报告过主席”，是“原则性不强，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等等。而一转身，他们仍然抱成一团，而且愈抱愈紧，反党活动愈来愈猖狂。他们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他们不会违背的逻辑。

（郑攀理　李　文）

（原载1977年1月30日《解放军报》）

〔附〕 “四人帮”尊法丑剧的幕前幕后

《人民教育》编辑部　《历史研究》编辑部

一九七四年夏季，“四人帮”继恶毒攻击周总理的假批孔，搞了一场大树他们自己的假评法的阴谋活动。在这年七月五日到八月八日召开的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以下简称法注会议）上，“四人帮”一伙乘机连袂登场，竞相表演。他们竭力通过这次会议，大搞假评法，把他们关于儒法斗争史的屁话合法化，并把它推向全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其影响所及，对有些同志来说，直到今天还是一种精神枷锁，使他们不敢理直气壮地揭批“四人帮”借口尊法反儒、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行。因此，揭穿这出尊法丑剧内幕，肃清其流毒，就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

从假批孔到假评法

“四人帮”的尊法黑风，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刮起来的？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四人帮”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到评法批儒这一段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表演。

一九七一年九月以后，全党开展的批林整风运动，对于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揭发批判。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手解决由于林彪一伙破坏所造成的种种问题，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全国形势显著好转。广大群众对比两种路线带来的两种结果，更加感到必须深入批判林彪及其同伙“四人帮”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地清算他们的罪行。

同我党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相比较，林彪和“四人帮”的一个更加显著的特点是搞反革命两面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披着极左的外衣，采取顺着来的反革命策略，俨然装做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人的模样，到处骗人。他们在非常“革命”的口号下，制造分裂，颠倒敌我，否定一切，破坏生产，其危害之烈，在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中，是尤为突出的。他们高喊“革命”口号而猖狂反党反人民，妄图毁灭我党我军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破坏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否定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钳制我国人民正常的思想和行动，大干多少年来国内外反动派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因此，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批林整风开始后展开的批极左，批假左真右，就等于撕开了“四人帮”的“左派”画皮，捅到了他们那极右实质的心窝子。“四人帮”十分恐慌，江青叫嚷：“批林整风，都整到我们头上来了！”“四人帮”的死党、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也跌足嚎叫：“陈伯达倒了，必然要炮打张春桥、江青同志。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为了掩护林彪，隐蔽自己，“四人帮”悍然下令：不许批极左，不许批形“左”实右。他们以攻为守，接过批林批孔的口号，大搞假批孔，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一九七二年秋冬之际，江青下令梁效进驻林彪住宅，编辑所谓“批林材料”。梁效对林彪的大量罪证不感兴趣，而只从别人已经整理并且准备上报的材料中，抽出一点东西，编成一

本什么《孔孟之道》，用以欺骗毛主席和党中央，似乎在林彪住宅里面除了这点东西，什么都没有了。江青事前向梁效面授机宜，说是搞材料要从"现实的斗争需要"出发。江青的需要就是掩盖他同林彪的黑关系。为了这个需要，选材料必须另找诸如孔孟之道一类的题目来转移斗争大方向。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四人帮"强行召开万人批孔动员大会，三箭齐发，搞突然袭击，放了一把假批孔、真批周的反革命邪火，闹得个举国骚然。他们猖狂地大搞批"周公"，批所谓"孔老二徒子徒孙"，在军内"放火烧荒"，矛头针对周总理和叶剑英副主席、针对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这一切，理所当然地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受到广大群众的坚决抵制。

"四人帮"的假批孔、有点混不下去了。但是为了打倒周总理和大批革命老干部，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计划，他们决不就此罢休。早在一九七四年一月间，江青、姚文元有两次秘密谈话。江青对梁效说："历代的政治家都是儒法两派的斗争。"姚文元对罗思鼎的头目们说："要注意中国出修正主义"，"要研究一下法家的问题"。当时，摆在"四人帮"日程上的第一件大事还是假批孔，因此姚文元只是要罗思鼎做些准备。及至假批孔受阻，他们就变换手法，大搞其假评法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姚文元、张春桥在修改一篇社论时，胡说什么：不尊法"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

不尊法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张春桥和姚文元编造这种荒唐的因果关系，目的何在？一个月以后，姚文元在《人民日报》六月十八日社论《在斗争中培养理论队伍》一文中加进去的一段黑话，回答了这个问题。文曰："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还会影响到今后。"这就为"四人帮"的"尊法"丑剧，确定了主旋律。在六月十八日社论发表前后，六月十二日，十五日，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三日，江青频繁召见梁效、唐晓文等，并由梁效成员随侍窜到天津东站、小靳庄，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吹吕后，捧武则天，兜售尊法反儒黑货。一则说，"儒法斗争，从历史到现在都是贯穿着这个斗争"，授意迟群等人写黑文批"现代大儒。"二则说，"单纯批儒，没有对立面，……看不到路线斗争的规律"，"现在要深入批林批孔，必须在批判儒家的同时宣扬法家"、"要革命，对历史上法家就要批判继承"，因此，要大胆地发掘法家，宣传法家，要大动干戈，动员"全党全民干"。三则说，毛泽东思想"继承了历史上的优良传统"，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主要是法家的东西"。这就是说，封建专制主义的法家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之一。江青的谬论，充分证明"四人帮"一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凶恶敌人。

江姚的黑话，明显地暴露了他们鼓吹尊法的反动意图。批林批孔必须解释为古代儒法斗争的继续，而且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了现在；毛泽东思想一定要说成是法家思想的继续，"四人帮"则是法家的嫡传子孙，只有他们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当然继承者。"四人帮"借古说今，胡诌五四时代批孔不彻底，在于未能宣扬法家的功绩。实际是说，他们的假批孔搞不下去，是因为没有充分肯定他们这几个"当代法家"的作用。尊法也者，尊"四人帮"之谓也！问题的要害，恰恰就在这里。一语双关，这里，"四人帮"既发泄了对毛主席的怨恨，也为他们下一步的阴谋部署制造了口实。果然，在这一阵尊法的鼓噪声中，"四人帮"利用召开法注会议所演出的跳梁丑剧，也就开场了。

好一个"白虎观会议"！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一切传统观念，包括古代社会的各种思潮和学派，都要进行马

克思主义的分析和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批判地继承。就中国古代社会思想而言，举凡儒、墨、道、法、刑、名、阴阳、杂等诸子百家，汉唐文化，宋明理学，乾嘉考据，清季新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给以历史的科学的总结。因此，注释法家著作，研究法家思想，对法家作出正确的评价，本来是应当提倡的正常的学术研究工作。

但是，"四人帮"的注法、尊法，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姚文元在法注会议中间召见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时，居心叵测地说："要把会议开好，意义不仅是注释法家著作"，"搞得好，可以象白虎观会议那样"。好一个"白虎观会议"！姚文元的私房话，把"四人帮"注释法家著作的阴谋打算，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东汉章帝于建初五年亲到白虎观大会群儒，讲议五经同异，制成定论，写成了《白虎通议》。实际是独尊董仲舒的今文经学，从思想上巩固东汉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姚文元竭力要把法注会议开成白虎观那样的会，说穿了是要把用所谓法家思想掩盖着的"四人帮"的反革命谬论定于一尊，以便拥戴他们的当代"法家女皇"江青上台。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四人帮"竭力把法注会议纳入借尊法反儒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轨道。毛主席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有关同志在起草会议开幕词时，引用了毛主席这段指示，并明确指出，毛主席这一指示"给我们提出了批判儒家、研究法家的指导方针"。但是，迟群做贼心虚，他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却别有用心地将"给我们提出了批判儒家、研究法家的指导方针"这句话删去。这是为什么？因为毛主席的指示一是不许颂古非今，不准赞扬任何的包括法家思想糟粕在内的封建毒素；二是反对引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后看。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同"四人帮"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格格不入，如果依此行事，他们的尊法吹女皇，就尊不起，吹不动。因此，把毛主席的话摆在那里，不过是为了欺世盗名，装点门面。他们是不准人们把毛主席的话当作研究儒法问题的指导方针的。他们的指导方针是什么？乃是江青天津之行关于尊法反儒的一系列讲话。当时他们虽然迫于形势("四人帮"正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不敢在会上公开传达这些讲话，但却通过各种渠道，大肆散布。"四人帮"由辽宁调来安排在科教组的那个黑干将，在六月底的一次筹备会上就鼓吹说："江青同志去天津是个重大行动，对当前运动提出了新问题。会议要跟上这个形势，否则就搞偏了。""新的精神搞清了，就可以开会。"他们要在江青反动思想的指导下，制造"四人帮"所期望的那种"天下大乱"，乱中夺权的"新形势"。这一点，他们的人是心领神会的。广东那个号称"反潮流"、实际是把评法批儒当成敲门砖，大搞政治投机的教授宣称："必须以儒法斗争为一条线来重新改写整个中国史"和中国哲学史。唐晓文的顾问赵纪彬叫嚷："儒法斗争这条线索的明朗化，使得中国思想史上学派、体系、范畴，都要重新加以研究"，"这是振奋人心的"。梁效的某顾问先生说，讲儒法斗争史"是一个新事物"，读法家书，是"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寻诗觅句、宣扬江青尊法反儒的谬论，表示要在"带路人"江青的麾下"参加战斗"。凭着先生的生花妙笔，确实把江青六月间上窜下跳，猖狂活动时所鼓吹的尊法昏话中所包含的反革命目的，颇为形象地反映出来了。名为尊法反儒，实乃大盗窃国，这就是"四人帮"演出一幕幕假评法丑剧的反革命主题。

其次，法注会议是以国务院科教组等单位名义召开的，但"四人帮"及迟群一伙，却背着党中央、国务院，撇开参加会议工作的其他负责人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搞了许多阴谋活

动，竭力从组织上操纵、控制这个会议。会议中，迟群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经常居于幕后，由他的一个心腹穿梭般地来往于迟群和会议之间，拿着迟群的令箭，颐指气使，发号施令，俨然迟群的代理人，迟群反复强调这次会议是“前所未有”的“大事”，要“全力以赴”。在他亲自策划下，“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唐晓文的某些头目、顾问和成员，或者充当领导小组成员、正式代表，或者充当特邀代表，他们成了在会上宣扬“四人帮”反革命谬论的主要喉舌。

为了进一步控制这次会议，姚文元还特别指令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亲自带队前来赴会。在此以前，一九七四年上半年，姚文元曾经多次授意上海写作组准备法注方面的材料。因此，罗思鼎对于要召开一个“白虎观会议”，早有成竹在胸。离开上海前夕，“四人帮”在上海市委的那个余党，亲赴上海写作组办公楼送行。他同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一唱一和，大捧江青的天津讲话，情不自禁地狂叫：“现在，理论工作是大好的春天！”会议中间，罗思鼎是“会中有会”。那个大头目，派人掌握每天会议情况和人员动向，严密控制会议。对于会议发言、会下谈话中出现的不同意见，他们视为“异端”，随时组织人马进行围攻，不准越“四人帮”的雷池一步，打棍子、戴帽子，充分施展了上海滩文痞的卑劣手段。

“四人帮”和迟群一伙，对毛主席、党中央封锁会议的一些真实情况。反映这次会议中尖锐斗争的《情况反映》，他们既不送党中央，也不送毛主席，只送到“四人帮”那里。他们同“四人帮”的联系畅通无阻。会议中间，张春桥、姚文元又共同召见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进行长时间密谈。姚文元还不断给此人送来信件、文稿，布置任务。罗思鼎的大头目因与“四人帮”关系密切，成为控制会议舆论，举足轻重的一霸。迟群与江青、姚文元也保持密切联系，“四人帮”的黑指示，通过迟群明里暗里传达到会议上来，使与会者感到一种颇为神秘的气氛。“四人帮”就是这样，借助于幕后的阴谋伎俩，打着种种幌子另搞一套，在法注会议上大造他们的反革命舆论。

解决所谓“理论”问题——补漏和反扑

“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竭力要解决所谓“理论”问题。早在会议筹备阶段，迟群就一再强调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理论”问题上。解决什么“理论”问题呢？就是如何在全国范围宣扬他们关于尊法反儒的谬论。

“四人帮”所谓尊法反儒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借召唤封建专制主义的幽灵，妄图用封建法西斯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这种散发着腐朽气息的封建专制主义，早已是极不象样的破烂货。当江青的那些鬼话一经传播开来，理论界和广大群众顿时议论纷纷，提出了一系列质问和抨击。江青说：“知识界有点混乱，产生了一些问题”，指的就是这种反对的呼声。因此，补漏弥缝，排除“混乱”，使江青的胡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把尊法反儒的“学说”迅速地推向全国，就成为“四人帮”要在法注会议上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应当指出，修补漏洞，是为了向党进攻，而当这个无法修补的漏洞越补越漏时，他们的修补就变成了直截了当的反扑。这种猖狂反扑的气氛，一度笼罩着法注会议。

且看，他们是如何补漏，又是如何反扑的吧！

主宰一切的法家之神

法注会议在研究“理论”问题时，由迟群那个心腹策划炮制并散发了一份题为《关于哪些

人是法家的问题》的“参考资料”，对于当时报刊已经发表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法家人物及其著作的二百六十多篇文章，做了一番分析。指出关于法家人物的论述，涉及较多的是政治家、思想家，也有少数的文学家、军事家和科学家，“其他方面未涉及”。在政治家中“对秦汉以后居于统治地位的人物很少涉及，西汉以后的帝王仅提到曹操一人”，以致出现了大段的空白。结论是：一曰“对于儒法斗争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两千年这个问题，前阶段的认识和研究都还很不够”；二曰“对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如何贯穿和反映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亟待加强研究”。现在查明，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二日、十五日江青对梁效的两次谈话，就已说过：“我们现在对哪些是法家，哪些是儒家，还顺不下来，一个历史长河还联不起来。”“现在材料说明（法家路线）能联得上。应该比较有系统的搞。今天比较有系统的是孔老二。孔老二这个人，必然有个对立面，不然，他不能存在。没有（儒法）矛盾，历史就不能存在”。这就是说，自先秦以至于今天，中国存在着一个超历史、超时代、超阶级，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主宰一切的法家之神。此神不在，历史发展的长河就要断流。这个“理论”之荒诞，自不待言。然而，在法注会议上，颂扬和捍卫法家之神，却成为一个引人入胜、兴味无穷的题目。梁效某顾问先生说，法家“了不起”，“值得表扬”；“对于他们，要三七开或四六开，要分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要分别主流和支流”；“表扬法家，批判儒家，这就是要叫人民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请看，顾问先生为了替“四人帮”的“法家”歌功颂德，把我们今天用来评价无产阶级革命家、评价革命运动和革命工作的现代语言，都接过来派上了用场。这样做，除了愚蠢可笑之外，恰好暴露了他们的阴暗心理。为了论证法家之神的永恒存在，乖巧伶俐的风派史学理论家，除了给法家送上一个“革命”的光环，把法家统治说成是农民战争的继续和发展，农民战争为法家上台开辟道路之外，又发明了更玄妙的理论：封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二重性，法家代表适合生产力的一面，儒家代表不适合的一面。论者把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的封建生产关系，说成永远有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面，又由法家不断地调整其不适应的一面，封建制度就得以万古常青，法家之神也就永世长存了。他们哪里是在评价历史上的法家！赵纪彬公然说：“我们今天主要是要宣扬法家的功绩，局限性还是少说为好”；“说法家代表整个地主阶级，而且只代表地主阶级，我理解不开。”法家不代表地主阶级，那它代表谁呢？

“法家爱护人民，法家代表人民”

这是江青胡诌儒法斗争史的一大“发明”，因而也成为她的侍从、顾问之流在法注会议上探讨的另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是他们所谓“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的一个杰作。那个“反潮流”的教授认为：“凡是具有法家思想的，都是属于进步的阶级，或者是被压抑的阶级”。有人问道：“在封建社会各时期，人民的内容是什么，是否包括一些剥削阶级？”赵纪彬的回答是：“‘人民’是个历史范畴，历史上凡是进步的，都属于当时的‘人民’，法家也应当包括在内”。在他看来，生存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无疑应当始终称之为“人民”。这种高超的“理论”，当即遭到一些同志的驳斥。他们指出，就地主阶级而论，只有在由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期，它才属于“人民”的范畴。即使在这个时期，地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利益也不是完全一致的。地主阶级是剥削阶级，它不可能永远置身于人民的行列。当它取代奴隶主成为社会的统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后，当地主阶级作为革命对象不断受到农民革命风暴冲击之时，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再属于人民了，不论地主阶级中的任何派

别，其中包括法家在内，概莫能外。至于说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敌对阶级某些政治主张有什么“共同点”，那更是天下奇谭。法家和农民起义军的某些政治口号看来相似，两者的阶级内容和实际效果却迥然不同。如果只就字面而言，儒家讲“天下为公”，同农民起义“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岂不是也可以说成“相似”的了？如果说法家代表劳动人民，甚至是劳动人民的保护者，那么请问：历史长河谁主沉浮？是法家地主创造历史，还是劳动人民创造历史，还是法家和农民共同创造历史？这些一针见血的质问，刺痛了“四人帮”的无耻之徒。

于是，赵纪彬赤裸裸地跳出来，大叫：“法家思想，不可能从地主阶级中来”，“只能来自人民，或反映人民的要求”。“法家的进步性与劳动人民的长远利益、社会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劳动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的长远利益同社会发展的趋势是一致的，它的灿烂美好的远景就是实现世界大同。充当唐晓文顾问的赵纪彬不会不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那么，他这样说，就把地主阶级的法家捧到了九天之上。这究竟是为什么？让我们稍许回溯一桩往事。五十年前，当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时候，赵纪彬在他的《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之综合对勘法的探讨》一书中，曾经向蒋介石条陈“铲共”之策。他写道：“共产党已经转化成国民革命上之不可救药的最险恶的敌人”，要“从政治上”“扑灭共产党”，“理论上所需要的是严峻区别革命与反革命的学说之不同”。蒋邦逃台以后，它的一个御用文人看到赵纪彬的这段条陈，曾经惋惜地说：在“思想上分清敌我”，是“民国十六年清共时，就应该作的工作”；可惜“那时我们没有作，我们只清了党，而未清思想”，以致铸成失败的结局。这一点，“赵君确有先见之明”。看看赵纪彬的过去，就知道他的现在。几十年前，效忠于蒋介石，在“围剿”共产党的战场上往来驰骋的赵纪彬，今天又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余孽“四人帮”的麾下，向共产党杀过来了。用地主阶级法家取代共产党，用封建专制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他昔日从政治上、理论上条陈“铲共”的继续。时代剧变，老谱翻新，他的反革命立场和他所追逐的反共反人民的目的，却是绝对不变的。

如此“古为今用”

“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的又一丑恶的表演，是接过“古为今用”的口号，大搞影射史学。

就历史学领域来说，中外古今的一切历史学家，无论他们之中有些人怎样声明他们所从事的历史研究工作，是“纯粹而又纯粹”的学术活动，但是归根结底，他们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本阶级、集团和党派所用。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不为任何阶级、集团和党派服务的历史家、是不存在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历史家的“古为今用”在于用马克思主义揭示历史的客观规律，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那么，剥削阶级的历史家，总是通过歪曲历史，为本阶级最终必然灭亡的命运进行辩护。不同的阶级对“古为今用”，各有自己的解释和运用。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古为今用”、只能把历史学引向邪路。重要的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和发现隐藏在“古为今用”口号下的现实的阶级的需求。多年来，从陈伯达、戚本禹到“四人帮”，摒弃毛主席早已全面阐述过的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针，歪曲“古为今用”这一口号，把历史研究工作纳入了影射史学的轨道。

在法注会议上，“四人帮”也正是这么干的。迟群在一次会议上说：“大家都在研究法家，目的是什么？研究法家，是为了指导今天的斗争。否则，谈不到古为今用。”所谓“指导今天的斗争”，就是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现实需要。梁效某顾问先生神通意会，发表谈话

说:“我们现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以前路线斗争的继续。所以我们还继续用法家、儒家这两个称号。这正表明我们不割断历史。”所谓“不割断历史”，为的是继承地主阶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衣钵。罗思鼎的大头目说:“研究儒法斗争史，无非是为了今天”。这个善于伪装的阴谋家，玩弄两面派手法，一面在会上侈谈研究历史“搞简单类比要出毛病”，一面又以提问题的方式，试探舆情，诱人上钩。他提出的被誉为“富有启发性、指导性“的问题有:“‘两千年’与‘五十年’，是什么关系？儒法斗争与党内两条路线是什么关系？注法家著作与党的建设是什么关系?”他不谈结论性的看法，但是结论呼之欲出。在他“启发”、“指导”之下，果然有人说:“二千多年来，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贯穿着整个中国历史，一直影响到五十年来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党内五十年来的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儒法斗争”。这样一来，可把“四人帮”“古为今用”的老底，全部抖落出来了。“四人帮”以法家自命，宣扬法家功德无量，为的是给自己涂抹脂粉，树碑立传，为的是打倒周总理和大批革命老干部，以便临朝登基，篡党窃国，实现其反革命幻梦。就在法注会议期间，罗思鼎的大头目从张春桥、姚文元那里领得黑指示，加紧炮制《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这篇黑文。同时，他打电话布置上海写作组赶写吹捧吕后的黑文。在毛主席批评了“四人帮”，提出安定团结的口号之后，这个大头目马上接过这一口号，贩卖“四人帮”黑货。他一面大讲黄老之学，说刘邦死后“吕后基本上把领导班子保留下来了”，执行法家路线，“才有文景之治”，借以吹捧江青；一面以谈黄老之学的“局限性”为名，影射攻击安定团结口号是“保守，不想革命了”，把他们的反革命仇恨发泄到毛主席身上。

“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演出这一幕幕明枪暗箭，诡谲阴险的尊法丑剧的过程中，那个顾问先生，喜不成寐，穷搜苦索，竟一口气写了七首咏史黑诗。江青接见后，他还有一段绝妙的自白:“古为今用的问题，过去我以为共产党讲厚今薄古，不会重视历史的研究，后来虽然认识有了变化，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新主子“四人帮”竟千方百计地运动群众，大规模地“研究起历史来，而且这样深刻，这样生动”。他“前前后后反复地想，感触很深。”顾问先生的政治嗅觉，是相当灵敏的。他嗅出了“四人帮”尊法反儒，借古讽今，妄图搞乱人心，搞乱全国的火药味。在法注会议开始时，顾问先生在一首黑诗中，曾写“前门一会释鞅非。”原意不过是说给商鞅平了反。这时，他感到那样写，已经不足以表达他们狂热的反革命情绪，于是改成“前门一会振鼓旗”。在顾问先生看来，“四人帮”在法注会议上大振了“法家”的旗鼓，“当代法家”将要袍笏登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衣钵，已经不愁后继无人。这当然是值得大书特书，永志不忘的了。

在革命的挑战面前

在中国的土地上，一切反共活动，必然遭到唾弃和反对。“四人帮”及其党徒们，在法注会议上的倒行逆施，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和坚决的抵制。不少同志，不顾“四人帮”的高压政策和迟群的淫威，同他们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斗争。“法家是地主阶级，怎么现在变成那么好的好人了呢”“说法家‘代表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的立场’、‘反映人民的要求’，这不是阶级调和论吗?”——一些同志把工厂、农村中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群众的声音，带到了法注会议，反映了广大工农群众对“四人帮”的革命义愤。史学工作者在会上会下，提出了很多尖锐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第一、关于儒法斗争继续到现在的问题。

有的同志指出：法家是不是一定的历史范畴、阶级范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不是法家？共产党叫不叫法家？如果说有作为的就是法家，那么，禹、汤、文、武也可称之为法家。如果都叫法家，这样法家是否是超阶级，超时代的？说革新、进步的就是法家，那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法家了。

第二、关于法家的阶级基础问题

有的同志指出：一九六五年姚文元批过中小地主进步论，现在上海（指罗思鼎，下同）为什么又大讲中小地主好？一九七一年，上海大批过几个"斯基"（指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把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代表人物否定了，而现在肯定封建社会没落时期的"法家"，为什么厚地主而薄资产阶级？过去，有人认为"不能以阶层分析代替阶级分析"，而现在说法家代表中小地主，法家爱护人民，那不是地主、农民一家了？

第三、关于法家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有的同志指出：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最近时期发表的文章，掩盖法家缺点，局限性一点不讲，回避不开就掩盖一下。法家不能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现在报上天天讲帝王，天天宣传地主，而不讲人民。到底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帝王将相创造历史？

第四、关于法家"爱护人民"的问题。

有的同志指出：讲法家很爱护人民，这与过去讲清官"爱民如子"有什么不同？说没有"爱民如子"的"清官"，又说法家爱护人民，又该怎么解释？法家的"法治"，难道没有阶级内容，不对付农民？

此外，还谈到了所谓儒法斗争和农民战争的关系，所谓"法家爱国"等问题。

这一连串的质问，犹如一颗颗子弹，射向了江青、姚文元及其顾问和侍从们，戳穿了"四人帮"尊法反儒的鬼把戏，痛斥了法注会议中那一股强辞夺理，以黑为白的谬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是多么尖锐犀利，多么旗帜鲜明，多么难能可贵的有力的一击呵！被"四人帮"污蔑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坚决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向"四人帮"挑战了。

在尖锐的革命挑战面前，"四人帮"和迟群恨之入骨，极端恐慌。他们一面虚伪地表示可以允许"百家争鸣"，一面则大搞见不得人的特务活动。在迟群和那个心腹的直接策划下，派人以走访、听会为名，广泛搜集与会同志的动态和反映，整成黑材料，名之曰《情况反映》，径直单线密送迟群，上报姚文元。他们给这些革命同志按上了一顶顶帽子，什么"对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有关指示及社论精神理解不够"，什么"思想跟不上形势"，叫嚷"应注意分析思想动向，掌握其中的斗争"。这种语言所包含的杀机，已经很清楚了。这个黑材料，从七月六日到九日，连续上报三期。七月十六日的第四期，又详细列举了一位同志发表上述言论的时间、地点，显然是罗织"罪证"，准备整人。但是，这种黑材料，在七月十六日以后，突然停止整理上报。这个变化，意味着什么？

现在已经弄清。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地批评了"四人帮"，把他们反党宗派的问题提了出来，向"四人帮"发出了严重警告，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的猖狂反党活动。"四人帮"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反映在法注会议上，继停止整理《情况反映》之后，七月十九日，迟群又在一次会上，对于他在一·二五大会批"走后门"的问题，假惺惺地做了"检查"，并且表白"这是我个人的问题"，与他的主子无关，为"四人帮"开脱罪责。七月二十一日，姚文元在新华社关于报道法注会议的内部材料上写了一个批示，说会议原定计划"并没有要求对人物一一作出评价"。张春桥批道："应先注主要法家的

主要著作"。江青同意张春桥的鬼点子。迟群接到这个批示，又玩弄其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故伎，竟妄图迫令有关负责同志就此作"检查"。过去，他们分明说，"要大规模地搞"，要解决"儒法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这一"重大新课题"，现在他们统统否认了。他们分明早就滥封了一大批"法家人物"，无限制地扩大法家队伍，上伸下延，一直到把共产党也说成是法家，现在也都不认账了。他们分明是以江青的天津讲话为纲，指导他们在法注会议的活动，现在他们却企图加以掩盖。迟群竟煞有介事地当众"辟谣"，说是"现在有些地方到处传播中央领导同志讲话，有些是伪造、歪曲、有些是传抄错的"，是"阶级敌人伪造、歪曲、破坏"，下令"禁止传播小道消息"。连他在梁效内部散布过的一些反动谬论，也被他自己辟为"谣言"，极力加以否认了。

"四人帮"的反扑

欲盖弥彰。反革命分子，只要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的狐狸尾巴，总要露出来。这在迟群的话中，已经初见端倪。迟群说："少说一点，容易收；说多了，没把握"。"斗，也有个策略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这种转变，不过是策略性的暂时退却。就在毛主席批评后的第三天，七月十九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了罗思鼎的大头目。在坐的还有王洪文的那个秘书。四个人围桌而坐，促膝密谈。姚文元问道："春桥给你们批些什么，你们都保存着吗？将来会不会有什么麻烦？我给你们批东西还是很注意的。"张春桥则说："国外敌人的报刊上，老是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是影射什么的，这个问题你们要注意一下。"张、姚还叮嘱：批谚语之类，"要分析"。这是因为"四人帮"抛出的一些文章，已经把毛主席著作中引用的一些话，也当成靶子大批特批起来。这些阴谋家心怀鬼胎，生怕露出他们的马脚，企图加以掩盖。但是，张春桥把话头一转，就反扑过来。他故作镇静地说："将来要杀头，无非是杀我的头。我这个头本来早就该杀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张春桥的豪语，一则为自己提神壮胆；二则为奴才撑腰打气，表示他们反革命的顽固立场。密谈中，姚文元唾沫横飞，昏话连篇。他说："法家是革命阶级，革命阶级当然是人民"。又说："吕后时期，政治清明"，"黄老与刑名，汉初的历史值得研究"，"道家与法家相通"。姚文元肯定吕后，赞扬道家黄老之学，为的是吹捧江青。姚文元还说："汉代的文景之治值得研究，吴王刘濞清君侧的经验值得研究"，"康熙平定三藩是有功的"。姚文元对一个皇朝的第二代、第三代帝王，如此感兴趣，说明"四人帮"已经在考虑他们夺权上台前后，要干的两件大事：一是要"清君侧"，即打倒以周总理为代表的大批中央领导同志；二是要"平藩"，即搞掉大批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特别是要打倒一些大军区的负责人。张姚的这一席黑话，充分证明了"四人帮"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决心在反革命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果然，不到半个月，在接见法注会议全体人员时，"四人帮"就公开的进行反攻了。

江青对于广大群众谴责她的天津讲话，又恼又恨；对于法注会议上提出的一大串问题，感到十分棘手。在迟群多次劝驾，密谋"回避那些问题"之后，她才抛头露面。但是，这个反革命野心家，无法控制她的歇斯底里。当她连说了四声"要谨慎"之后，就脱下伪装，赤膊上阵了。她时而说："等待我们的还有更大量的工作"，"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又有现实意义"（姚文元帮腔："古为今用搞好了，注释法家著作就可以在方向、效果上，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挥作用"）；她时而叫喊："这次会议没有兵参加，是个很大的缺点"（张春桥马上应声："各省回去开会，都要找军队！"）；她时而赞赏出土的吕后印，说："这就是玉玺"，"是相

当重要的东西！”她在张春桥引见之下，同罗思鼎的那个大头目连连握手，予以嘉奖；她向那个“反潮流”的教授说：“×××教授，你回去也要促一促你们那里吧！”尤其恶毒的是，江青恬不知耻地把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同“八七会议”相提并论，杀气腾腾地嘶叫：“今天是‘八·七’，‘八七会议’呀！我们就是斗儒！那时是主席斗陈独秀！”含沙射影，肆无忌惮地把矛头指向了敬爱的周总理。

会议至此，算是告了结束。“四人帮”煽起的批大儒，反总理；尊法家，捧黑帮；赞女皇，树江青的反革命狂潮，从此在全国泛滥开来。至于批林，很快就被这股尊法的狂潮所淹没了。

尊法狂潮大泛滥

“四人帮”利用召开法注会议，替尊法谬说取得合法外衣，于是通过种种活动和手段，在全国范围大规模地强制推行他们的尊法“学说”。尊法狂潮所到之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被置之高阁，封建专制主义的论调甚嚣尘上。“四人帮”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对法家是顶礼谟拜，一片颂声。

在政治上，“四人帮”利用尊法反儒，进一步大搞影射史学，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梁效、罗思鼎摇动笔杆，连篇累牍地抛出了一大串尊法反儒黑文。例如，梁效的《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赵高篡权与秦朝灭亡》、《论爱国主义者王安石》、《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罗思鼎的《论吕后》（未刊）、《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论李斯》、《论西汉初期政治与黄老之学》、《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略论思想发展的源和流》，等等，不胜枚举。梁效、罗思鼎的这堆文章伪造历史，紧密配合“四人帮”密谋在四届人大由江青上台组阁的阴谋活动，突出地吹捧吕后、武则天，借以美化他们的女皇江青；他们把“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归结为一点：要使“法家路线”不致中断，就必须有那么几个“在中央决策的法家人物”，使“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中央机构中的法家领导集团”手中，亦即掌握在“当代法家”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手中。他们以批判儒家的“篡权”、“复辟”、“因循守旧”、“投降卖国”为名，放肆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和大批领导同志，妄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全面复辟封建法西斯专政。

要知道“当代法家”怎样治国，那就请看“四人帮”在浙江搞的那个黑典型。

“四人帮”在浙江的死党翁森鹤，对于“四人帮”尊法反儒的反动意图深有体会。早在“四人帮”搞假批孔之时，他就叫嚷：“批林批孔要解决中央谁掌握领导权的问题”。等到尊法狂潮泛起，翁森鹤更发挥得淋漓尽致，公然提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是法家和儒家的矛盾”，胡说“老干部是儒家，复辟派；新干部是法家，革新派”。他心怀杀机，口出狂言：“我们现在不坑‘儒’，他们就要坑‘法’。”一九七四年八月，翁森鹤一伙以罗思鼎的黑文为兰本，搞了一个黑剧本。剧中虚构了一个名叫“周理”的反动儒生，用以影射周总理。他们借剧中一个农民之口，说什么“赵高、周理他们又要搞井田制，我们的日子一天难似一天，又要当奴隶做牛马”；又通过另一个农民之口狂吠：“为什么（坑儒）坑得这样少，为什么不把周理一道坑？”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翁森鹤宣称：“严惩厚赏，这是法家的根本手段”、“就是要按照法家的办法管理工厂”。他一手控制下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就是一个“法家治厂”的黑样板。在那里，翁森鹤的一帮小兄弟被誉为法家、阿卯哥、革新派；真正抓革

命、促生产的干部和工人则被诬蔑为儒家、复辟派。他们把原来的厂党委和总支一、二把手统统推倒，二十二个支部书记换掉了二十一个。他们挑选一些杀人犯、打砸抢分子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用"飞过海"等手段拉一些坏人入党，名曰建立"法家党"。他们用抓、关、打等残暴手段，对干部和工人实行"法治"。他们到处挑动武斗，破坏生产。翁森鹤还把这一套"经验"，强行推广到全省，造成了很大的恶果。仅翁森鹤直接插手破坏的杭州丝绸工业系统，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停工停产造成的损失，就等于毁掉了整个杭州丝绸工业的全部固定资产。

这，可以看做是"当代法家"治国的一个缩影，其他的例不必举了。尊法狂潮泛滥之时，人们对于它在政治上、经济上所造成的危害，都有非常深刻的感受，早已切齿痛恨，视同寇仇。如果按照"四人帮"宣扬的法家这一套来治工、治农、治军、治学、治商，大而至于治党、治国，那么，我们的党就要变质，国就要变色，我国八亿人民就要重新堕入苦难的深渊，那是何等悲惨的情景呵！

"四人帮"煽起的尊法狂潮，在思想、理论上所造成的混乱，更是严重的。这一时期，评法图书、文章泛滥成灾。据出版部门统计，从一九七三年下半年起到一九七六年底止，共出版评法批儒图书一千四百零三种，约占同期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的四分之一。一千四百零三种图书中，评法的有九百零七种。省级以上报刊所发表的评法之类文章达五千篇以上。这类图书动辄印刷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耗纸四万吨。至于传播于工厂、农村、部队、学校、机关的"内部"文集、资料，尚不在上述统计之列。"四人帮"尊法反儒的谬论，在这些图书中，在法家著作注释本的前言、按语、后记中，都有大量的反映或影响。其中，江青授意梁效炮制的《儒法斗争史概况》，姚文元授意罗思鼎组织、审定的《儒法斗争史话》，尤其着力于将"四人帮"尊法反儒谬论"系统化"和"通俗化"。在这两本打着"为工农兵服务"、"供知识青年自学"的幌子的通俗小册子里，"四人帮"关于儒法斗争贯穿二千年，一直影响到现在；关于儒法斗争涉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关于以儒法斗争代替阶级斗争；关于法家帝王将相决定历史的发展，等等谬论，应有尽有，一概俱全。在一些书籍、文章和信口开河的谈话里，"法家"模式满天飞，不仅将许多思想家称做法家，而且许多皇帝、皇后、王侯、霸主、政治家、军事家、政客、将领、酷吏、诗人、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财政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水文学家、矿物学家、植物学家、冶金学家、建筑学家、医药学家、纺织学家、造纸学家、印刷术家、以至农民领袖，都谥以法家称号；这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体系还嫌不够，此外更有法家先驱者、法家同盟军、法家领导集团、不象样的法家、不自觉的法家、尊法者、具有法家倾向者，以及道表法里者、儒表法里者、法家的老师、法家的朋友，等等，等等，真是名目繁多，洋洋大观。

"四人帮"以尊法反儒为中心的反动历史观影响所及，在教育界、学术界也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迟群说："中央领导（指江青）指示，要注意对青少年的教育"，"法家著作注释本印出来，中小学每个学校要发一本，这是百年大计。"根据"四人帮"和迟群的黑指示，在中小学教材中，塞进了大量的尊法反儒、儒法斗争的黑货。高等院校的情况，特别是文科教学的破坏，更为严重。学术界的某些同志，或闻风而起，或违心附和，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著述，从通史、哲学史、文学史、教育史、军事史到科技史，也被贴上儒法斗争的标签。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近代史专著，由于受到尊法风的影响，着力论证法注会议确定的几个"近代法家"，结果费时两年，劳民伤财，印出来根本无法使用。通读全书，凡有关"近代法家"的论述和论据，大都难以经得起推敲。

江青在法注会议结束时的接见中说："研究法家儒家的问题，这是百年大计的问题，又有现实意义。"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我们看清了江青这段话的本质；所谓"百年大计"，就是要把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转变成极端落后、极端野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使社会主义的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所谓"现实意义"，就是把中国人民的思想搞乱，用集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大成的"四人帮"的反革命思想，代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便为"四人帮"实现其复辟大业铺平道路。

无奈"四人帮"生不逢时，法家的幽灵丝毫换救不了这一小撮反革命丑类走向覆灭。"四人帮"竭力宣扬的一位法家韩非，曾经用"守株待兔"这则寓言嘲笑那些食古不化的蠢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四人帮"开历史的倒车，硬要把中国社会拉回到多少世纪以前，难道不正是韩非所讥刺的"守株之类"蠢人吗？"四人帮"反动透顶，愚蠢到家、逆流而动，天怒人怨，他们的灭亡是必然的。

(原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5期)

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

——评湘剧《园丁之歌》

(一九七四年八月四日)

初　澜

湘剧《园丁之歌》，是一出名为反映"教育革命"，实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招魂的坏戏。它所歌颂的路线和人物都是错误的，其要害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

在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的大好形势下，联系教育战线和文艺战线的斗争实际，把这个坏戏作为反面教材，提供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分析批判，这对于进一步提高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划清两条教育路线、两条文艺路线的界限，巩固并发展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成果，是很有必要、很有现实意义的。

《园丁之歌》的剧情，说的是一个工人的孩子陶利，本来很有生气，因为想当火车司机，爱玩小火车，就被教师方觉斥为"不守纪律、不爱学习、不讲礼貌"，甚至是不能成"材"的"锈铁"；但在另一教师俞英的"循循善诱"之下，终于"悔悟"过来、"进步了"。这出戏通过它的剧名和全部情节，特别是对俞英这一主要人物的塑造，向观众宣扬了如下的观点：一、培养我们青少年的"园丁"是教师；二、没有文化就不能承当革命的重担；三、学生如不循规蹈矩地死啃书本，就是"糊不上壁"的"稀泥"。十分明显，这些观点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旧调重弹，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一系列革命变革的反攻倒算。对此，必须坚决批判。

"花红要靠育花人"、"培育还靠好园丁"，这是贯穿《园丁之歌》全剧的主调。这个主

调，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培育青少年一代的“园丁”。俞英、方觉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们都是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这就不只是一个剧名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教育事业的领导权究竟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大是大非问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的学校，竟然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文化大革命的急风骤雨有力地冲击了资产阶级的这块“世袭领地”。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开进了学校，登上上层建筑斗、批、改的政治舞台，与广大革命师生一起团结战斗，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了教育事业的领导权，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工人阶级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来实现的。因此，如果把我们的青少年比作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幼苗”，那么，培育革命幼苗的“园丁”，就是我们伟大的党！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滋润着革命幼苗茁壮成长，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着青少年一代前进的方向！

两个阶级争夺教育阵地的斗争，必然要在领导权问题上进行长期的、激烈的反复较量。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和人民的事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推动教育革命深入发展，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重要措施。但是，资产阶级对于失去这块“世袭领地”，是怎么也不会甘心的，他们总是要用孔孟之道的“师道尊严”和资产阶级的“教师治校”等谬论，来排斥和对抗工人阶级的领导。《园丁之歌》把俞英、方觉这样的教师奉为“树人”的“园丁”，甚至称之为什么“引路人”，大加美化和颂扬，其实质就是否定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而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重新统治我们的学校！

革命的教师，是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我国有一支很大的教师队伍。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好的，是要革命的，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涌现出许多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同时由于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这就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认真改造世界观，才能不断增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自觉性。在党的教育事业中，一个革命教师的职责是光荣而又重大的。教师在组织、进行教学活动的整个过程中，应当发扬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和积极主动的工作精神。但是，作为教育者，又“**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学校里，革命的教师和革命的学生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同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和同志，应当互教互学、共同前进。《园丁之歌》否定这种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恢复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所鼓吹的“园丁”和“桃李”的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否定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

《园丁之歌》在俞英的最后一个唱段中，唱出了“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只强调文化的重要。这是在文艺舞台上露骨地宣扬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至上”论，贩卖“智育第一”这一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出戏出笼的一九七二年前后，教育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鼓噪一时，胡说什么“教育质量下降”，要走“关门教学”的老路，妄图迫使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死啃书本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个新生事物。联系这一现实的阶级斗争背景来看，《园丁之歌》宣扬这样的谬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这出戏的全部剧情，集中到一点，就是围绕着解决所谓“学生不好学”的问题，渲染俞英

同方觉的"矛盾"。其实，俞英同方觉在维护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鼓吹"文化至上"，贩卖"智育第一"的黑货，配合默契，殊途同归。他们的争吵，不过是"方法"之争。《园丁之歌》就是以这种"方法"之争，掩盖了宣扬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方觉用"停课"、"没收"等"管、卡、压"的"行政手段"来推销"智育第一"，俞英却认为这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爱护"和"严格要求"，只是不如她那样"夫子善诱"，"水往根上浇"罢了！她可以同陶利一起玩小火车，然后搞了个"突然袭击"，用一道难题把这个"不好学"的学生憋得"脸上发烧汗直淋"。她还善于进行这样的"忆苦"教育：以陶利的祖父在旧社会因"望儿成长"，宁可乞求地主的阎王债，也要送儿子去进学堂的家史，来诱使这个爱玩小火车的孩子——"淘气"，"晓得没文化开车也开不上"，服服帖帖地当"智育第一"方针的俘虏！请同志们想一想，象陶利的祖父那种行径，不也颇有点武训那种"穷人若是能识字，就不会受人欺负"的味道吗？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时代，不去触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一根毫毛，反而做着"望儿成长"实即"望子成龙"的迷梦，请问，这是哪个阶级的"家史"教育？剥去这个戏所谓"教改新篇"的包装，原来还是武训那个"念书好！念书好！"的腐烂货色，是宣扬"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反动的孔孟之道。

"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反动观点，它完全经不起革命实践的检验。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承当革命重担、推动历史前进的，难道不是创造文化却不能占有文化的奴隶、农民和工人、反而是那些奴隶主、地主阶级的"圣贤"和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吗？在我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史上，不是也有成千上万从未进过校门的工农，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勇挑革命重担，为党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吗？历史事实雄辩地说明：虽然一切剥削阶级都实行文化专制主义，剥夺广大劳动人民学习文化的权利，但是为推翻那些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承当革命重担的，恰恰就是被剥夺了文化权利的广大劳动人民。今天，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劳动人民掌握文化创造了条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普及教育和工农兵上大学开辟了广阔的途径。文化，只有掌握在革命人民的手中，才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所以，决不是没有文化就不能干革命，而是掌握了文化更好地干革命。《园丁之歌》鼓吹这种"没文化怎能把革命重担来承当"的谬论，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公然挑战，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污蔑中伤，也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攻倒算！

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为哪个阶级服务，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对《园丁之歌》中陶利这样的学生持什么态度，反映着究竟按照哪个阶级的面貌来教育青少年一代的斗争。陶利本来不错，朝气勃勃，热爱劳动，立志要当工人。他的行为本身，实际上就是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种抵制和反抗。但剧本却硬说他"错"。他究竟"错"在哪里呢？无非是触犯了"师道尊严"之"礼"，越出了"智育第一"的轨道。把陶利这样的学生视为"糊不上壁"的"稀泥"、"不成材"的"锈铁"，却把小玲那样"五分加绵羊"的学生，树为"桃李"的标本，这就清楚地表明《园丁之歌》所鼓吹的培养目标究竟是什么了。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时而贩卖"读书做官"论，时而又散布"读书无用"论，就是为了破坏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问题从来就不在于读书是否有用，而在于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所用。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重视学习和掌握文化知识的必要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死读书、实行强迫纪律、死记硬背的方式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为着把我们的青少年一代培养成

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在校学生必须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必须上好社会主义文化课，并使这种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书本知识，同阶级斗争的实际，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如果依着《园丁之歌》宣扬的那一套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只讲脱离实际的文化知识，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又红又专，那就是依了地主资产阶级，即使培育出有"高度的文化知识"的"桃李"，也不可能承当无产阶级的革命重担，而只能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栋梁"和"精神贵族"，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由他们去驾驶"时代的列车"，就会象苏修出现的那种情景，大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

《园丁之歌》所唱的，就是这种"克己复礼"的调子。它要复"师道尊严"、"智育第一"之"礼"，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之"礼"，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礼"。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是长期的，象这样的调子，现在有人在唱，今后也还会有人要唱的。但是，教育革命的小闯将黄帅说得好："在革命滚滚向前的洪流中，资产阶级老爷们发出悲哀的嚎叫，挽救不了自己灭亡的命运"。坚持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并肃清其影响，这是教育战线极其重要的战斗任务。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广大的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必将在这场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中，夺得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更大胜利！

（原载1974年8月4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八月五日）

为了使批林批孔不断深入，使广大工农兵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现将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若干问题》之一、之二，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中发〔1974〕1号文件的传达方法，向群众进行传达，组织学习讨论，继续开展对林彪和孔孟之道的革命大批判。

中央这个通知和附件之一、之二，军队可以发到排以上单位，地方可以发到党的支部。

中共中央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九日）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林彪要整贺

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象，以欺骗和封锁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中央直接对贺龙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审查。毛主席多次指示，要抓紧给贺龙同志作出结论，予以平反，恢复名誉。经中央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事实是：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反动政客熊贡卿“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贺龙同志发觉后，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将熊贡卿处决，并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

二、所谓“阴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人“篡夺军权”的问题，经过调查，并无此事。

三、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

贺龙同志已于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病故。

贺龙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在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以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

因此，中央决定，对贺龙同志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的这个通知，印发到县团级，并口头传达到党内外群众。

〔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问题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

毛主席、党中央：

贺龙同志原任党的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时参加革命，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因病逝世。

林彪要整贺龙同志蓄意已久，早在一九六六年就向中央提出，贺龙同志历史上曾向国民党反动派“请求收编”、和“阴谋篡军反党”等问题，要进行审查。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楚也是必要的，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予以同意。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发生以前，对贺龙同志问题的审查，一直为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所把持。他们捏造事实，隐瞒真象，以欺骗和封销中央，诬陷贺龙同志历史上“通敌”和“篡夺军权”。“九·一三”以后，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查证甄别。

一、所谓“通敌”问题，完全是颠倒历史，蓄意陷害。贺龙同志自一九二七年“八·一”南昌起义后，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一直坚持武装斗争。他对国民党反动派派人“游说”、“策反”的阴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蒋介石派反动政客熊贡卿（又名熊瑞龄）“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贡卿先派梁素佛（又名梁天闻）来到湘鄂西红三军。贺龙同志首先发觉来人之阴谋，报告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经分局决定，“为要得到蒋

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允许熊贡卿来到湘鄂西，在熊供述情况后，即"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予以处决。事后，湘鄂西中央分局于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将此事经过报告了中央。所谓"通敌"，本无此事（见附件一、二）。但林彪和黄、吴、叶、李等反革命分子，不将查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报告呈报中央，反而大搞逼供信，捏造假材料，甚至还把敌伪报纸上刊载的造谣诬蔑贺龙同志的一些消息、报道，作为证据，诬陷贺龙同志"通敌"，和向国民党反动派"乞和"、"投诚"。

二、所谓"篡夺军权"问题，是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贺龙同志对林彪提出的以"四好为纲"，"向空军学习"等口号，提出过不同意见。林彪等人怀恨在心，采取特务手段，有计划地编造黑材料，胡说贺龙同志"阴谋篡夺军权"，并支持一些人在总参、海军、空军和北京、成都军区等单位"篡夺军权"。

关于所谓贺龙同志搞"二月兵变"的问题，纯系讹传，并无此事。

林彪、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等人使用阴谋手段，颠倒历史，捏造事实，欺骗党和人民，陷害贺龙同志，罪恶至极。

我们建议，对贺龙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

附：一、湘鄂西中央分局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二、蒋介石为优恤熊瑞龄所颁发的命令（节录）

附件一：

湘鄂西中央分局来件

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七日写　四月十八日到

中央：

……

八、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二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作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

此致布礼

夏曦、贺龙、关向应

三月十七日

（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附件二：

训　　令

训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呈称熊瑞龄奉派招降贺匪惨被诱杀拟恳特加优恤令仰该部长从优议恤民字第五〇六号 二十三年三月三日。

案据本行营第一厅第二处处长晏勋甫签呈称，窃查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一案，兹接湖北何主任来电，谓被贺匪诱杀等语，查熊瑞龄……因与贺匪昔年友善，……恐该匪入川与徐匪会合，遂愿深入虎穴，招安投诚，追行抵施南后，与该匪见面，一切办法，均已议妥，不料该匪阳为归顺，阴实叵测，竟将熊瑞龄惨杀。……查该故员因招降贺匪，致遭惨杀，殊堪惋惜，除指令外，合行令仰该部长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为要！此令。

委员长　蒋中正

（注：原文载一九三四年蒋匪南昌行营《军政旬刊》第十八期）

〔附〕　元　帅　之　死

——贺龙同志被林、江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前后

胡　思　升

一九六九年六月九日，身经百战、所向披靡的贺龙元帅，在暗害的屠刀袭击之下，倒下了。

这一天清晨，在面临死亡威胁之前，贺龙同志神志清醒，他对夫人薛明同志说："你可要当心啊！他们可能要下毒手啦！"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中短短一句话，"贺龙被迫害致死"，包含着什么内容？林彪、叶群、吴法宪、康生之流是如何必欲置贺龙元帅于死地而后快的黑幕，通过法庭的审理，触目惊心地被揭示了出来。

为了诬陷贺龙、打倒贺龙，林彪亲自赤膊上阵。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大会堂浙江厅召吴法宪去谈空军党委一次全会的情况，劈头就定调："你们这次会议贺龙插手了。贺龙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又说："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贺龙派人要"夺你的权"，"你要警惕和防备"。

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马上亲笔写信，诬陷贺龙在空军内部搞地下活动、篡官夺权。

与此同时，林彪也召见李作鹏，诬蔑说："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采取种种卑鄙手段拉了一批人来反我"。同吴法宪一样，李作鹏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给林彪写信，诬陷贺龙。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九年，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相互配合，给贺龙同志加了无数顶帽子、数不清的罪名："大土匪"、"大军阀"、"向敌人投降"、"篡军夺权活动的黑手"、"不知杀了多少人"、"一条以贺龙为首的黑线"、"定时炸弹"、"里通外国、苏修"、"搞反革命政

变"、"在上海布置盯梢毛主席"，等等。真是挖空心思啊！

贺龙同志愤然地说："他们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有证据，也是假的"；"他们要是叫我签字画押，我就写'冤枉'两个字"。他想到的不只是个人的冤屈，而且是林彪一伙的用心："他们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凡是在林彪陷害忠良的场合，决不会没有叶群的魔影。

这一次，叶群选中了军队内负责警卫工作的处长，此人名叫宋治国。叶群数次口授诬陷贺龙的材料，叫宋治国以自己的名义写揭发信。从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至二十四日，宋治国一共写了四封诬陷贺龙同志的信给林彪，林彪立即下令印发。

叶群假宋治国之手写的诬陷信的原件，如今都已查获。这些信，有些纯属捏造，有些十分荒唐可笑。为了立此存照、录以备考，不妨摘引几例：

一、"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玻璃板底下压着一张照片，其中有贺（龙）、薛明、罗（瑞卿）、郝治平四人的合影，天天看。但没有放主席的照片"。

二、"我觉得贺（龙）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反党分子来往很为密切。他们经常密谈。""常去他（指贺龙）家的人神态不正常"。

三、"贺（龙）本人自己房间里亲自保管着一支精制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不知为了什么？"

四、"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以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大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练得百发百中。"

五、"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一百二十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六、据说贺龙家曾经"在电话上安过一个窃听器"。

等等，等等。

既要借刀杀人，又不想留下痕迹，叶群还精心导演了一番。宋治国按照叶群的口授，在写好诬告信后，来到叶群处。叶群当着林彪办公室三位秘书的面假惺惺地问宋治国："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

宋治国答："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

双簧演毕，叶群还嫌不足，又叫"林办"三位秘书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无非是证明此事与叶群无关，是宋治国主动揭发的。

康生，这个专门经营诬陷勾当的坏人，也在贺龙同志背后插了一刀，制造了一个在北京一度闹得满城风雨的"二月兵变"事件。

天下本无事，何来"兵变"之说？

一九六六年春，经军委批准，北京军区组建一个团给北京卫戍区担负民兵训练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到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商借房子。不料到了七月上旬，北大有人贴出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

康生马上抓住这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

这是康生一九六六年夏天的信口雌黄。到了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七日，这位身居要职的造谣家还对专案组说："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所谓"对准中南海"，就是要加害于毛主席。康生血口喷人，就这样无中生有地把所谓"兵变"、"谋害毛主席"的罪名强加给贺龙同志。

从此以后，叶群、康生、黄永胜、吴法宪四个人完全控制了“贺龙专案组”。

吴法宪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八日对专案组布置任务：“贺龙是国民党右派、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怎样打倒，就是把敌人的罪恶挖出来，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做到‘五个忠于’”。

忠于林家王朝的专案组，从各个方面向贺龙元帅进逼，他们把无说成有，把白说成黑。

他们拿来一个书面问题，要贺龙交代历史上的“罪行”，所谓一九三三年同蒋介石派到湘鄂西的“说客”熊贡卿“谈判”的问题。明明是贺龙当时下令逮捕并枪决了熊贡卿，并报告了中央，现在却成了他“通敌”的罪名。贺龙同志怒不可遏，吼道：“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

贺龙透过吹来的黑风，看清了林彪一伙的罪恶用心。他对薛明同志一再讲：“咳，我们党里出了鬼，出了奸臣啦！”“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一九六九年二月的一天，贺龙同志用手杖敲着当时到处泛滥的林彪相片：“你这个家伙，整起人来啦！”“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康生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

贺龙不低头。他们的折磨越加骇人听闻了。

对一个七十一岁高龄的糖尿病人，大热天只给一小壶水。不洗脸，不漱口，都很难应付。贺龙同志为了接天上的雨水以救急，有一次大雨中在台阶上滑倒，扭伤了腰，十八天不能动弹。

贺龙同志经常吃的是清水煮白菜、糠萝卜。有一次，送饭的人竟然把饭菜全部倒在地上。薛明同志一次望着贺龙消瘦的脸，问他：“你是不是饿啊？”元帅凄然一笑：“嘿！算你说对了。”

派来治病的一个“医生”，是经过专案组六次“政审”、精心挑选的。他没收了贺龙身边必需的备用药品。贺龙的病情更加恶化了。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贺龙同志突然说不出话来，口角歪斜，剧烈头疼，被送进医院。按照邱会作“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指示，诊断书上竟然写的是“诈病”，治疗措施是：“请有关军医主宰”。堂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病历上的姓名却写成：王玉

贺龙同志洞察其奸，对夫人说：“他们硬是想把我拖死，杀人不见血呵！”

一九六九年六月八日早晨，贺龙的糖尿病发展到了酸中毒的严重程度，连续呕吐，呼吸急促。找医生，迟迟不来，拖了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八时许，才来了“医生”。糖尿病是不能输葡萄糖的，却给输上了，输了整整一夜，整整二千毫升。

次日，六月九日，宣布要把贺龙送往医院。贺龙不愿去，反抗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上午九时，来人七手八脚地把贺龙同志往担架上抬，送上救护车，开走了。

下午三点多钟，来人把薛明同志带走，说是到医院核实一个材料。到了医院，薛明同志听到一个冷冰冰的宣布：“人已经死了。”时间是六月九日下午三点零九分，也就是送往医院六小时零九分钟之后。

凝视着亲人的遗体，薛明同志不能自制：没有花束，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元帅的身躯和头部。

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在反动统治时期，敌人悬赏十万大洋都买不去的头颅，却在自己亲手打下江山的土地上，被躲藏在内部的奸贼狠毒地谋害了生命！

元帅倒下了，他们也不放过贺龙的夫人薛明。

特别是叶群，心怀鬼胎，盘算着如何斩草除根的毒计。

有必要提一段往事。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同志曾揭发过叶群参加CC特务组织、当过国民党电台广播员的问题。

时隔二十三年之后的一九六六年，叶群对薛明说："过去你说我那么多坏话，今后你只要不讲，我就既往不咎了。"薛明没有置理。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的一天下午，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薛明很了解我的情况，把她迁送到离北京远一点的地方，放在空军的监护下"。吴法宪一口称是。叶群责令第二天就派人送走。

吴法宪选定贵阳磊庄的空军干校，作为囚禁薛明的秘密地点。在派遣一个班的兵力押送之前，吴法宪、邱会作亲自交代："薛明去空军干校监督劳动，不许她乱说、乱道、放毒，找几个人监护。不许她写信。"

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日子里，记者访问了薛明同志。讲到林彪一伙竟然无法无天地对包括贺龙同志在内的几乎所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横加残酷迫害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行时，薛明同志愤恨万分。她说："对林彪、江青这一伙，不是私人的冤仇，他们要毁掉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被毁掉的，何止一个贺龙！"

(原载1980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

〔附〕 贺龙被害内幕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元帅记实

杨金路　江海洋

北京。

1969年6月9日。

301医院14病室，几个医护人员围在一张病床前紧张地忙碌着。病房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外面的走廊里，几个身穿军装、面部毫无表情的人在不停地踱来踱去。人们隐约感到有一种同医院很不协调的气氛笼罩着这里的一切。

医院的住院簿上记载着：患者姓名王玉，上午8时55分入院，系糖尿病性酮症酸中毒。入院前，因"误诊"为肠胃炎，确诊后又继续输入大量的高渗葡萄糖液，这对于病危的糖尿病人是绝对禁止的。这种反治疗措施，导致了病情急剧的恶化。

人们万万没有想到，病床上这个被称作王玉、年逾七旬、骨瘦如柴的老人，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贺龙元帅。

病床上，元帅艰难地睁开双眼，他终于回忆起来了，这里，是医院的病房。

病床前，没有战友，没有亲人，只有一名住院军医和几位助手在忙碌着。

他想挣扎着站起来，想马上逃出这个阴森森的病房。

"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清晨，当医生准备送元帅住院时，元帅紧紧拉住夫人薛明的手，虚弱的语调微微有些颤抖。

1968年初，元帅病情恶化，患了"失语症"，也是在这所医院，在医生的诊断书上，竟

留下“此人狡猾，不能排除‘诈病’可能”的字样。在一次化验时，因为不慎将小便倒在了瓶子外边，被一个普通的护士骂得狗血喷头。从那以后，元帅就再也不愿住进这所医院了。但是，他丝毫不怨恨那个护士，因为当时的他已不是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而是作为一名“专案审查对象”住进医院的……

一

1966年9月下旬。

一辆黑色高级轿车从反帝路17号贺龙元帅的家中开出，于下午1点30分整，停靠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前。

元帅走下车，远远看去，他那前得短短的平头，加上嘴唇上那撮硬硬的小胡子，赋予他的脸庞一种精干、威严的表情。长期的戎马生涯，造就了元帅特有的军人风度，使人感到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气质。

元帅习惯地点上烟斗，信步跨上台阶，坦然自若地朝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林彪的临时住所走去……

建国以来，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元帅，一直负责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他以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惊人的体魄，如同一个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一样，不遗余力地在党交给的工作岗位上拼搏着，并用这种精神去感染全军的将士们。1964年，贺龙元帅曾同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一起，组织了著名的“大比武运动”，毛泽东、刘少奇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亲自观看了汇报演习，并予以充分肯定。

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林彪那种把政治工作说成可以代替一切的极端的理论，元帅一直是很有看法的。一支军队如果不讲究军事素质，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

性情耿直、精力充沛的贺龙元帅，无疑是林彪篡权的一大障碍。

军委碰头会就要召开了，林彪这个时候约他来谈谈，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9月14日，毛泽东主席在游泳池约见了贺龙元帅。当元帅在服务人员的指点下走进休息室的时候，毛泽东主席正靠在沙发上，翻阅着手中的一份材料。

“主席”！

元帅脚跟并拢，做了一个标准的立正姿式。

看到准时到达的贺龙元帅，一种对军人特殊的好感油然而生。毛泽东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观场面。是的，过去依靠人民解放军，为劳苦大众打下了江山。而今，要巩固江山，反修防修，在依靠红卫兵小将的同时，还必须紧紧地依靠人民解放军这一坚强的柱石。

几句简短，亲热的寒暄。

毛泽东主席的目光再次停留在手中的那份材料上，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微微地皱起了眉头，似乎是在某种矛盾的心理中努力寻求平衡。

“贺老总，……”

毛泽东望着面前的这位当年南昌暴动的总指挥，红二方面军的领袖，欲言又止，只是将手中的那几页材料递了过去。

这是林彪办公室呈送主席的几份吴法宪诬告贺龙元帅的黑材料。指责元帅插手干扰空军

党委十一次全会，在幕后操纵部分同志，“把会议搞得乌烟瘴气”。

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元帅正在吃晚饭，西南军区的几个干部迈进了元帅的家门，他们是来京参加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的代表。

“贺老总，久违了!”

老部下前来拜访，免不了一阵寒喧，之后便是老婆、孩子、身体、上学之类的闲话。

元帅很快吃完了晚饭，起身递给每人一支纸烟，信口问道，“你们的会开得怎么样?”

“这次开会和过去的不一样，领导对会议组织很不利，也不召集小组长研究研究。”

“你们小组长可以自己研究研究提出来嘛。”元帅显然是在开导这位同自己一样耿直的老部下。

……

为了不影响元帅休息，前后又谈了十几分钟，空军的几位同志便起身告辞了。

心地坦荡的贺龙元帅万万没有想到，身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竟就此毫无根据地告起了黑状，看来这里面似乎有大文章。

小人!

“主席，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

毛泽东主席看着贺龙，似乎在揣测元帅的用意。

“我是想找吴法宪他们解释一下。”

几句饭后的闲谈，怎么竟会变成幕后操纵了呢?

身正不怕影子斜。元帅要面对面地同他们讲清楚，让他们好好看一看，我贺龙从来就没有背后捣鬼习惯!

“解释一下是可以的!”毛泽东主席的脸上再次露出微笑，他好象已经洞察到了元帅的心理:“贺老总，我对你是了解的。放心，我作你的保皇派!”

……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贺龙第一次应约来到林彪住所征求意见。

此时，林彪正在他挂满毛巾的卧室里不安地踱来踱去。自从平型关战役之后，林彪的身体一直不好，一见冷水就感冒。1949 年进城后一直在各地疗养。林彪还有个从不洗澡的怪癖，按照林彪的理论，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水乃属寒性，寒是随着毛孔进入内脏，与火相冲突便产生感冒，据说自 1953 年以来林彪从不洗澡，而后干脆连脸也不洗了。于是，各式各样的毛巾便成了他的卧室、起居室内特有的装饰。

要窃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必须牢牢地握住军队，精通“政变经”的林彪自然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

“贺龙要在空军夺权，你可要警惕哟!”

一个月之前，在吴法宪向林彪汇报空军党委十一次全会情况时，林彪劈头定调:“你们这次会贺龙插手了。贺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机动性强，是块‘肥肉’，谁都想吃”。

这位经林彪一手提拔，业已死心塌地上了贼船的空军司令员对主子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几天前毛泽东主席给贺龙元帅看的几份材料，便是吴法宪在这次召见之后，按照林彪的旨意炮制的。自然，素以“天才”自居的林彪当然知道软硬兼施的作用。军委碰头会就要召开了，他要借这个机会向贺龙“最后摊牌。”

两位元帅在铺着墨绿色地毯的会客室里见面了。也许是为了提醒来人少说废话，这里除

了一扇高大的屏风之外，看不到客厅里常见的沙发、茶几，甚至连一个小方凳也没有。

"贺老总，我对你没什么意见。"林彪假惺惺地寒暄着，进而马上把话锋一转："你的问题可大可小。军委碰头会就要召开了，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

林彪的语调意味深长，虽然脸上挂着笑意，仍让人感到一种阴森森的恐怖。

"军委碰头会我是要参加的。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贺龙的答复简单、明确，同样有些咄咄逼人。

话不投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贺龙是不会在威胁面前退缩的。

谈话陷入了僵局。

两个元帅保持着距离，在沉默中对视着。

沉默。

林彪脸上的肌肉开始抽搐起来，他有些后悔了。"贺胡子"软硬不吃，本应是在他预料之中的，他感到有一种难以压抑的怒火在往上冒，在这同时，还不由自主地往屏风后边望了一眼。

因为听说贺龙身上常带着一柄进口的小手枪，在贺龙来到之前，一向作贼心虚的林彪责令他的老婆叶群亲自带领几个彪形大汉持枪埋伏在屏风后边，"以防万一"。他感到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怖一直笼罩着他的全身，直到贺龙元帅泰然离开后许久，才慢慢地镇静下来，他抬头看了看站在他身边的叶群，欲言又止，转身走回卧室。

二

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一侧，一个身着军装的中年人正独自伏在一张小长桌上冥思苦想着什么。不远处，一个同样是军人装束，体态略有些臃肿的女人用眼角的余光瞟了一眼那个正在伏案疾书的身影，嘴角露出一丝奸诈的微笑。

在迫害贺龙元帅的阴谋中，林彪的老婆叶群自然成为最阴险、最凶狠的帮凶。

1966 年 8、9 月间，林彪在毛家湾的住宅正在扩建，人民大会堂浙江厅便成了他的临时住所。为落实警卫工作，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便成了这里的常客。

"宋处长，别急着回去，我们聊聊好吗？"9 月初的一天傍晚，宋治国向警卫人员交待完公务，正准备离去，林彪的老婆，"林办"主任叶群站到了他的面前。

宋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机械地被叶群挽着手臂，拉到了西大厅一侧。

过了几天，又一次神秘的谈话之后，宋治国匆匆忙忙地找到林彪办公室的张秘书，索要纸和毛笔。

"宋处长要练毛笔字吗？"

"不。叶主任交给我一个重要任务。"宋的表情十分严肃。

是的，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权衡，这个自认为政治嗅觉异常"灵敏"的警卫处长业已做出了明确的选择。事过数日之后，张秘书才得知宋××在那神秘的气氛中所写的东西，都是所谓揭发贺龙元帅的材料。

经事后查证，"揭发材料"所罗列的内容有的纯属捏造，有的则全是根据叶群的口授。当然，也有一些内容荒唐到了极点。甚至将元帅常与警卫战士闲扯，有时外出不要警卫车，以及罗瑞卿大将家里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贺龙夫妇与罗的合影照，却不放毛主席的照片

等等，都说成是元帅的“可疑之处。”

既要借刀杀人，又不想留下痕迹。

“宋处长，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给往上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叶群有意当着林彪办公室三位秘书的面，阴阳怪气地向宋治国发问。

“是事实，我完全负责。”宋××当然不是傻瓜：“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有责任向首长先反映这些情况！”

“那我们就照转不误了！”

一切都在按叶群所导演的那样进行。自然，宋××的保证与其是说给叶群听，不如说是做给林彪办公室的三位秘书看。果不其然，9月27日晚上，叶群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找到了当时在场的三位秘书，指令他们联名写一份关于宋××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材料，以证明宋××写这些材料完全是出于本人的主动，绝非他人授意。

为了搜罗所谓贺龙四处插手的证据材料，在指使吴法宪出面诬告贺龙元帅之后，林彪再次亲自出马，召见海军政治委员李作鹏密授机宜。于是，两封诬告贺龙反对“四好运动”、支持海军某些人“罢官夺权”的黑材料很快送到了林彪手中。

……

对这些诬告贺龙元帅的黑材料，林彪一一批呈毛泽东主席。

据“林办”张秘书回忆，1966年9月中下旬，“林办”主任叶群一次交给他保存的有关贺龙元帅的黑材料就有一、二十份之多。在这些材料上，均有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圈阅的笔迹。

“林副统帅”的话可不是开玩笑。贺龙的问题终于变大了！

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幕后活动，林彪的第一步棋终于达到了目的：毛泽东主席对贺龙元帅的信任动摇了，他点头同意，可以就贺龙问题“在小范围内打招呼”。

军委碰头会的名单上，贺龙的名字被抹掉了；

1966年10月，“打招呼”的范围已扩大到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负责人；

在有关会议上，对贺龙元帅的诬陷也在逐渐升级。

……

三

凡有林彪黑手触及的地方，自然少不了江青一伙的魔影。

“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在文化革命开始后渐露峥嵘的江青，是一个十足的迫害狂。

对林彪来说，这是一个得力的同盟者。曾吵遍天下的江青，却从来没有跟林彪和叶群翻过脸。追根溯源，就是“林副主席支持我的。”不是吗？尽管江青的心狠手毒、志大才疏、刚愎自用的品行在老干部中人人皆知，但文革一开始，林彪便无耻地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内、同志中很杰出的同志，也是我们党的干部中很杰出的干部。”1968年3月，林彪居然还使出了一个罕见的招数，把江青的行政级别一下子从九级提到了五级。

是林彪一手将江青扶上政治舞台，扶上“文化大革命光辉旗手”的宝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林彪在江青身上的政治投资确实是“一本万利”，其利无穷。

林彪一心要搞掉贺龙，江青是早有查觉的。贺龙是林彪掌握军队的直接障碍。

在陷害贺龙元帅的阴谋中，江青一伙积极地进行配合。

1966 年，秋冬以来，全国的政治气浪急剧上升，几乎达到炽热化的程度。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在一小撮阴谋分子的愚弄下，扔下书本、关掉车床、放下镰刀，怀着"誓死捍卫"的赤诚红心投人到那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运动之中。

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这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1966 年 12 月，江青跑到了清华、北大等地不顾中央对贺龙问题只在小范围内打招呼的精神，接见红卫兵头头时，赤裸裸地进行煽动。之后，又找到元帅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儿子贺鹏飞，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到他了!"

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元帅的家被抄了，大量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围攻的人挤满了庭院，"打倒贺龙"的大标语贴满了庭院，贴满了首都的大街小巷。

在战场上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贺龙元帅，竟落得无家可归……

1967 年初，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上，林彪、江青一唱一和，一出双簧戏演得维妙维肖。

在"一月风暴"席卷之下，"文化大革命"进人向"走资派"全面进攻、全面夺权的新阶段。史无前例的革命风暴强烈震动着全国的每一个角落。1967 年 1 月 9 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在军委副主席林彪的主持下，中央军委在京召开了碰头会。

身为军委副主席的贺龙元帅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

在这个政治气候非同寻常的时候，就文化大革命在军队内如何开展等一系列问题，两股不同的势力进行着激烈交锋的同时，林彪、江青竭尽其能事，对贺龙元帅诬陷、诽谤。

一箭双雕。

让那些敢于同"革命势力"抗衡的人看一看"逆我者"的结局。

为立此存照，不妨将林彪等人的讲话摘引几例：

林彪："全面内战现已打了一半，要打下去，取得全胜。"

"兵坏坏一个，将坏坏一窝。贺龙到处搞夺权，搞山头主义，他不是正派人。"

江青："零敲碎打是不行的，要宣布彻底革命，要选中打击目标。"

林彪："贺搞鬼名堂，巩固山头，扩大山头。搞鬼名堂是彭德怀、贺龙。一是兵痞，一是土匪，要做真龙天子。他的总路线同我们不同，他的灵魂深处是个大阴谋家……。

"不要看他不搞政治，他同罗、邓、彭结合起来就不简单。

"贺、罗、彭是一帮的。"

江青："三结义现在直接跳出来了。"

林彪："南昌暴动有了他成了拖累，不然仗就可打好了。"

……

提起南昌暴动，"林副统帅"的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嫉恨之情。"文化革命"开始后，林彪的喽罗们为了给其树碑立传，曾组织御用文人炮制了一幅关于"南昌暴动"的油画，当时仅仅是见习排长的林彪俨然以起义总指挥的姿态出现在画面上。对此，只要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看后都不禁哑然失笑。因与史实出人太大，中央及时制止，才未得以谬种流传……

四

两个月之后。

毛家湾林彪住宅。

刚刚用过晚餐的林彪穿着落地的长睡衣，手里玩弄着一盒造型精致的高级檀香木火柴，打着赤脚，在卧室的地毯上不停地踱来踱去。他的夫人叶群此刻也许还在餐桌上研究那只肥大的海蟹，对于海味，叶群格外偏爱。据说某日清晨叶群起床后，发现院中他人送来的新鲜海蟹堆成了一座小山，这位“副统帅夫人”竟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

同叶群挥金如土，每日山珍海味的奢侈生活相比，“副统帅”的生活可谓“俭朴之极”，每日的菜谱千篇一律，大多是一盘烧得烂烂的黄豆白菜，外加几块兔肉。当然，香烟这种奢侈品同“林副统帅”也是毫无缘份的，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林彪养成了一个古怪的癖好：喜欢火柴的硝烟味。今天，林彪的兴致特别高，他信手划着了一根火柴，有意无意地端详着那紫蓝色的火苗。他拿着火柴的手轻轻一挥，火苗熄灭了。代之以一股淡淡的硝烟，他喜欢这硝烟，他要点起一把大火，让比这浓重百倍、千倍、万倍的硝烟，充斥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自从1966年9月那次“最后摊牌”之后，林彪煞费苦心，一心想把贺龙元帅置于死地。但是，他自己也非常清楚，这绝非轻而易举的。

1916年春天，年轻的贺龙用两把菜刀砍了芭茅溪的盐税局长，拉起了最初的那支杀富济贫的队伍。大革命失败之后，他拒绝了高官厚禄的引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率部参加了南昌武装暴动，起义失败后，他甘愿脱下将军的马靴，回到家乡发动农民起义，几经挫折，终于创建了湘鄂红色革命根据地，……

贺龙两个字，成了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名字。

“贺龙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建国后对贺龙元帅的评价。

要想搞掉贺龙，必须在历史上大作文章。为此，林彪可谓煞费苦心。

今天上午，在秘书为林彪讲文件时（林彪不看文件，而由秘书看后向他讲述文件的重点），一份材料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

武汉市二十中教师晏章炎于1967年2月14日炮制了一份“关于揭发贺龙在抗战前叛变的罪恶活动的材料”，诬告贺龙元帅在1934年国民党对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后，向蒋介石企降，并与伪南昌33营第二厅特工人员熊贡卿秘密接头……。

天赐良机！

五

1967年秋。

寒风瑟瑟，灰蒙蒙的云层好似泼妇的围巾遮住了落日的余辉。西山某地附近的一条山间小路上，两个老人蹒跚的身影时隐时现。

除了几幢孤零零的房屋和几名持枪的哨兵外，这里没有住户，没有炊烟，似乎给人一种与世隔绝的印象。满山红叶开始凋落了，就象北京街头巷尾那些被鲜血染红的大字报的残片，在寒风的吹拂下纷纷飞扬。

1967年初，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一批批戴着红袖章的青年学生闯入反帝路元帅的家中，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住进中央第六招待所“避难”，可是，造反派们的消息异常灵通，每到一个地方，总是有人前来揪斗。

"这搞得是什么鬼名堂哟!"

元帅震怒了!

"我贺龙一向光明磊落，是不怕别人捣鬼的"。贺龙元帅执意要同前来"揪斗"的学生们见面，他要站出来揭穿那几个"捣鬼的人"的阴谋，他要让那些无知的娃娃们看到，我贺龙的血是红的还是黑的!

在元帅的夫人薛明和周恩来总理的劝阻下，元帅把满腹的怒火强压了下去。令元帅感到安慰的是，在这种艰难的非常时期，周恩来总理把元帅接到自己家中安置下来，而后，将元帅送到西山保护起来。

"毛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 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临行的前一天，周恩来总理正式找贺龙元帅谈了一次话。"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分两派，连朱老总的箱子也被撬了。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总理安慰着元帅，他那微锁的眉宇之间，流露着一种难言的忧虑。

山麓的小道上，只有元帅和他的夫人薛明蹒跚的脚步声。

秋天到了。几天来，元帅常常长久地伫立在门前，向山角下眺望，一天傍晚，竟将几盏闪烁的路灯误认为是上山来接他的车灯。

元帅那里知道，此时，林彪、江青一伙对他的迫害正在日益加剧。

1967 年 9 月 11 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叶群等人的筹划下，一份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元帅"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报告，从林彪办公室送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办公桌上。

两天之后，也就是 9 月 13 日，毛泽东主席圈阅同意。

1967 年春，林彪意外地收到武汉市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诬告贺龙元帅的"揭发材料"，这对于林彪来说，无疑是一枚送上门来的重磅炸弹，林彪当即批给江青转呈主席。

1967 年 6 月 13 日，林彪、叶群迫不及待地派空军办公室处长朱××等人前往南昌等地调查。

"林彪统帅"和"叶主任"的意图，调查人员自然心领神会，在 1967 年 7 月 12 日朱××等人员的调查报告中，把 1933 年 12 月贺龙元帅诱杀由蒋介石派出向他策反的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件，竟颠倒事实，说成是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上报中央。

1967 年 9 月 7 日，在中央一次碰头会议上，叶群作了长篇发言，提出了许多诬告贺龙元帅的耸人听闻的问题。所谓"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自然放在首位。她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一些证据材料，向与会者展示。声称贺龙问题严重，要求立案审查。

康生、江青、谢富治、陈伯达对叶群的提议积极赞同。

林彪、江青一伙的苦心终于没有白费。

经过一系列秘密的、公开的、非法的、合法的积极活动，对贺龙元帅的迫害大张旗鼓地进行了。

一切都可谓"名正言顺"了。

六

1968年8月16日下午。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贺龙专案组在京的全体人员，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中央领导人、贺龙专案组组长康生的接见。

在座的这些人，都是从各军兵种抽调上来的“好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都变得异常积极，调到贺龙专案组之后，经过一年来的“战斗洗礼”已变得更加“成熟”。

今天，能在这里再次聆听“理论权威”康老的教诲，不能不使人感到兴奋。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清楚地感觉到了自己的份量。

人们忘记了相互间的交谈，静静地等待着。

按约定的时间过了一刻钟，会议室的门打开了，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康生在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簇拥下走进了会场，他抬手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然后驱步上前，作出十分亲热的样子，同到会者一一握手。

身为“中央文革”顾问的康生，称得上是一个造谣、诽谤的老手。早在40年代，一位女同志被康生诬陷为特务，根据竟是：“她走路象日本人”，还无耻地说：“你长得那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建国以后，作为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的贺龙元帅，以他那非凡的精力和惊人的体魄，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同时，还兼任了国家体委主任，他就如同一个向终点冲刺的运动员那样，不遗余力地工作着，并把这种拼搏精神传导给他麾下的将士和体育健儿们。1955年根据国家主席毛泽东同志开展国防体育的指示，经有关部门批准，在京成立了航海、航空、无线电、坦克等俱乐部，为国家训练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才。没想到康生竟然信口雌黄，以此作为诬陷贺龙元帅的材料。

1968年4月22日，贺龙专案组一位副组长在工作日记上，虔诚地记下了康生指示的全文。

康老指示：

“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海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

……。”

据原贺龙专案组的一位同志证实“……关于什刹海的一个破炮，是海军退役下来的，在国防体育项目中只能作为练习瞄准用，不论炮口对准哪里，都打不响。说得很玄，根本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按照康生的指示去理解，“炮口对准中南海”，无疑是为了威胁甚至准备谋害中央核心领导人。

这自然属于“十恶不赦”之列！

1966年夏，康生一手炮制的“二月兵变”事件，用心更为险恶。

由于“极左症”的广泛传染，1966年7月，北大团委的一位干部贴出了一张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提出北京卫戍区于二、三月跑到北大、人大商借房子，怀疑是为搞“兵变”作准备。

这张本来不屑一顾的大字报，在当时特定的政治气候下，却在北大校园内引起了强烈反映，并迅速被转抄到北京师范大学。

机不可失。

康生抓住这张大字报，添油加醋地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兵变。他的计划之一是在北大，大人每一个学校驻上一营部队。这个事情是千真万确的。"最后，竟连"兵变"班底都罗列得一清二楚，什么"兵变"的总参谋长是许光达，许是贺龙的人等等。

经事后查证，康生认定兵变"千真万确"的唯一依据，竟仅仅是那张捕风捉影的大字报而已。

谁敢想到一个"德高望重"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竟说谎到如此程度呢？

当然，老奸巨猾的康生自然也不会忽视"历史问题"的重要。

1967年11月1日，在康生、叶群亲自主持下，贺龙专案组制定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专门强调了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此刻，他正操着沙哑的山东口音，靠在沙发上大发厥词：

"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同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贺龙不但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过去他和我们打过仗的，一直是斗争的……。

"湘鄂西肃反他杀了许多共产党，到底是肃反扩大化，还是贺龙有意杀共产党，向蒋介石投案，扫清投降的道路？"

"你们有成绩，历史问题搞了不少。"

讲到这里，康生停顿了一下，抬手往上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狡诈的微笑……

的确，专案组成立的近一年内，并没有辜负"首长"的期望，立下了汗马功劳。

七

1968年9月18日。

西山某地。

"撞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枪毙了，栽赃！这完全是栽赃！"元帅把手中的几页信笺使劲扔到面前的几案上，象一只受伤的雄狮怒不可遏地在房间内踱来踱去！

中午，负责守卫的战士给贺龙送来一封"贺专"以军委办公厅名义发给贺龙的亲启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要元帅交待历史上"罪行"的书面提纲："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洪湖，与贺龙是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有那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原来自1968年6月14日开始，贺龙同志由原来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作为审查对象，实行监护。以后，贺龙同志就从周总理的保护之下，落入林彪、康生、江青、黄永胜、吴法宪、叶群直接控制之下的专案组的魔网。

在那个近乎于宗教狂的年代里，专案组强迫两位老人每天站在"宝像"前"早请示"、"晚汇报"，深刻反悟，专案组还多次通过军委办公厅转来密封的"交待提纲"，强迫元帅交待历史上和现实上的反党罪行。

元帅的心在"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口号中颤抖着，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面对敌人的子弹他眼睛都不曾眨一眨。他的三个亲姐妹和贺龙家族上百口人死在敌人的屠刀下。而今，面对林彪、江青一伙用最最堂皇的革命词句装璜起来、盗用他所最为信赖的党的庄严名义射

来的毒箭，却把他那颗赤诚的心伤害了。

"狗娘养的，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根本没有确凿的证据，如果有了证据，那就是假的!"

的确，林彪、江青一伙也深知，要彻底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置元帅于死地，只靠他们手中的几份信口雌黄的告状信和红卫兵从敌伪报纸上剪来的一些造谣材料是远远不够的。

要扩大材料来源。在林彪、江青的直接操纵下，在北京地区全国各地和军队内部，将贺龙元帅的一些老部下和同贺龙有"重大"关系的人分别立案审查，作为"贺龙"的分案被打成"贺龙的人"。实行"隔离审查。"为获取他们所需要的材料，非法进行了一系列的逼供、诱供、套供，甚至不惜动用法西斯式的肉刑。根据专案日记记载，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在1967年8月至1969年，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一共被审讯416次。在将军含冤逝世的前三天，还被拖下病床"请罪"。一个出生人死，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竟然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色卫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终于1969年6月6日惨死在医院的马桶上。

这，就是斗争的需要。

与此同时，为查证贺龙历史上"投敌叛变"的材料，专案人员不辞劳苦，奔赴全国有关省份。

八

贵阳。

1967年12月2日。

几个手持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介绍信的军人，急匆匆地走进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再含的办公室。他们是根据红卫兵从北京《晨报》上抄来的一条线索，专程前来查证所谓"贺龙在1927年南昌起义后于8月5日向蒋介石致电企降的反革命罪行。"

没有进省革委班子的副省长欧百川等十几个人被电传到了省公安厅"集中考虑问题。"

几天以后，在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里，北京来的人同欧百川的"谈话"正在进行。

北京来的人："现在贺龙在北京搞'二月兵变'，你要揭发他的罪行，证明是因为贺龙叛变革命，才使南昌起义失败的。"

欧百川：'二月兵变'我不清楚，据我所知，贺龙历史上没有叛变。"

北京来的人："你要老实交待，不要欺骗中央。"

欧："我确实不知道。"

北京来的人："贺龙参加南昌起义，是投机革命。你是当时贺龙手底下的副师长，要和他划清界限。"

欧："……。"

北京来的人："你要大胆揭发。听说你子女的工作还不错。不要给子女脸上抹黑……"

欧："……"

北京来的人："怎么样？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立案审查贺龙，是中央和林副统帅亲自批准的。"

欧："我不敢欺骗中央，可这个问题我真的不清楚……"

"你这个老混蛋！不说今天就站在这儿，不许喝水，不许吃饭！"

如果能够获取“八·五求降电”属实的口供，无疑将会有力地证实贺龙这个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南昌暴动的总指挥是怀着“投机革命”的动机参加起义的。为此，贵阳调查组专门制定了“02 号战斗方案”，并从地方军队抽调了十几个人充实力量，设立了保密室，安装了直通北京的专线保密电话，准备每天向中央汇报“战果”。没想到“计划”刚刚开始实施就受到如此挫折，……

在贵阳“02 号战斗方案”实施的同时，四川成都也在积极行动。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谷志标、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李文德、秀山县的“老秀才”唐再扬等多人受到审查。

1967 年底，身为四川省最高检察官员的谷志标，在一个班全副武装的战士看护下，被秘密监禁两个多月，每天分三班轮流进行批斗审讯，让其交待段德昌被杀一事的经过。

段德昌是红三军高级将领，其被杀，是王明左倾路线指导下肃反扩大化的牺牲品，与贺龙同志毫无关系。

“我的天呀，你哪里知道当时的恐怖，我的枪都给没收了。”这是专案组向贺龙元帅本人调查这一问题时，元帅向在场的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不堪回首!

元帅难以理解，这种曾给我党造成极大创伤的左的悲剧，在几十年之后，竟会在新中国的土地上重演，再次向后人留下不堪回首的历史。

元帅 80 多岁的堂叔贺勋臣也未能幸免。

1967 年底，几个身穿军装的人突然闯进了贺勋臣的家门。

“我是军委派来的，来了解贺龙的问题。你说，贺龙是不是杀过一个共产党!”一个身穿军大衣的大个子气势汹汹地问。

“没有。”贺勋臣回答得很坚决。

对方失望地走了。

时隔不久，这些人再次找到贺勋臣:“你跟了贺龙那么多年，不会一点情况都不知道。这次你非谈不可。”

“同志，我确实不知道。”

“谁他妈的跟你是同志。”大个子说着，抬手就是两个耳光。

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当即昏倒在地，鼻血直流……

在长沙，省参事室参事王尚质被逼得无可奈何，于 1967 年 4 月 30 日凌晨跳楼自杀……

九

1968 年秋。

西山某地。

满天的阴云象一群专事毁灭的精怪，在天空中骤驰。看上去显得十分疲惫的太阳在炫耀了一天的光芒之后，正有气无力地向地平线的下边落去，它那淡淡的余辉把天边的云朵映得彤红，象沙场上将士的鲜血染红了天的一角……

党的“九大”就要召开了。

这天，贺龙打开箱子，拿出一身笔挺的元帅服穿在身上，在屋子里不停地踱来踱去。

1955 年 9 月，贺龙同志首次穿上这身元帅服，在中南海怀仁堂，接受了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衔。这是党和国家给予贺龙同志的崇高荣誉。在多少次庆典中，

贺龙都是穿着这身元帅服。今天，他再次将这身元帅服穿在身上，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他，一个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滚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士，骤然离开了群众，离开了工作，与世隔绝。被送到了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这对于他烈火般性格来说，是难以忍受的。

元帅多么希望能早日回到主席、总理的身边，再为党多做点工作。

他清楚的记得1966年9月下旬，在人民大会堂浙江厅同林彪的那次“最后摊牌”：

墨绿色的地毯上，两位元帅在沉默中对视着，从林彪那隐约抽搐的嘴角上，贺龙感到一股阴森的杀气。

几十年来驰骋疆场，磨砺了他铁一般的性格。

贺龙是绝对不会在对手的威胁面前退却的！

元帅坚信我们的党最终能战胜这些党内的败类。坚信毛泽东主席最终能识破这些阴险的小人，善用忠良。

此刻，元帅是多么希望毛泽东主席能够站出来为他讲一句话：贺龙是好同志！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以他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使他成为我们党和军队的核心，每当革命进入关键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总是高瞻远瞩，为我党指明了正确的斗争方向，领导革命最终走向成功。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这种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预见性，使得我党、我军一大批杰出的领导干部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形成了一种坚定的信仰。

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这种信仰是必要的。

同许多老帅一样，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信仰，贺龙深信这场革命的必要。但是，林彪、江青一伙，要把那么多的老干部统统打倒，使他洞察到这伙奸臣的狼子野心，他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感到无比的忧虑。

元帅手中的烟斗早已熄灭了，他还是久久地伫立在窗前，凝望着窗外荒凉的山谷和那颗即将逝去的夕阳。

天边的云朵还是血红血红的，那灰蒙蒙的黄昏的阴影试图遮掩住元帅消瘦的身躯。

远远望去，他那身本来很合体的元帅服已显得有些宽大……

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元帅一颗赤诚的心并没有因此而磨灭。

1967年春，元帅被送到西山后不久，在夫人薛明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回忆和思考，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关于洪湖地区肃反扩大化的报告》，请周恩来总理阅呈主席。报告中，元帅详细地回顾了当时的情况，总结了当年惨痛的历史经验。

凭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嗅觉，元帅已经觉察到在一片最最“革命”的口号中，类似当年王明路线极“左”的东西正在产生、泛滥。

为避免血腥的历史悲剧再次重演，元帅中肯地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历史经验。他要以他的疾呼引起全党的警觉，用他赤诚的胸膛去阻挡那些阴冷角落里射来的毒箭！

十

1968年底。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江青、叶群、康生、张春桥一伙正聚集在那里，研究中央文革"一办"、"二办"专案审查对象的定案问题。

周恩来总理也被迫参加了会议。

会议已接近尾声。

由于长时间歇斯底里的喧吵、与会者大都显得有些疲倦，就连一向坐姿笔直，试图以此来抬高自己形象的张春桥也开始蜷曲起身躯，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中央文革"顾问兼贺龙专案组组长康生强打着精神，正操着沙哑的山东口音进行最后的总结式发言。

"……时间很多、问题很多、材料很多，要把主要问题，能定的或基本能定的定下来。能说明他们这些王八蛋共产党员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当、天安门不能上。"这个"德高望众"的"理论权威"一改往日的斯文，言语中露出腾腾杀气。

但是，仅凭专案组现有的材料，还难以将他们所审查的对象致于死地。

"九大"召开的日期越来越临近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确有些慌了手脚。如果让这些"老家伙"们再度当选为中央委员，再次登上天安门城楼，无疑是在给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抹黑"，也是给专案工作抹黑。

"专案组同志的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我看就凭现有的材料，对贺龙定'二变'（即历史上叛变，现行政变——笔者注）就没问题……"江青从沙发上欠起身，将刚刚看过的一份关于贺龙元帅的黑材料扔到面前的几案上，左手无力地垂放在大腿上，抬起右手，用力地揉了揉太阳穴，似乎想以此使她疲惫的大脑重新兴奋起来。她操起那种永远是教训他人口吻的女高音，一边说着，一边用挑战似的目光注视着凝眉沉思的周恩来总理。

早在 1967 年 3 月，江青收到林彪亲笔批转来的武汉市 20 中教师晏章炎诬告贺龙元帅历史上曾向蒋介石投降的黑材料，就曾气势汹汹的闯进总理的办公室，质问总理："怎么样，这下可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当即被总理制止。而后，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安排将贺龙元帅送往西山保护起来。

在 1967 年 2 月，陈毅元帅被数万名红卫兵围困在大会堂内，也是周总理全力保护，与红卫兵代表整整谈判了一夜，迫使对方妥胁，使陈毅元帅准时出席了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碰头会。

江青一伙已明显的意识到，周恩来已成为当前必须攻打的堡垒。

1967 年 9 月 19 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曾亲自出面，召见北京大学的一个红卫兵头头，指示她带人到山东曲阜"讨孔"，并特意加了一句："到了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于是，数百名红卫兵星夜奔赴曲阜孔庙，召开群众大会，声讨"孔夫子"的罪行，并当场砸毁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

石碑上的落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奥秘正在这里！

为使世人更加明了，这伙"红色卫士"又雄赳赳地向周公庙开拔，声称要捣毁这座象征着"现代周公"的庙宇。

是的，林彪、江青一伙所要打倒的决不是一个贺龙而已。

在"文革"开始后一段不长的时间里，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被网罗罪名，戴上了"叛徒"、"内奸"、"特务"、"反对毛主席"之类的帽子。

就贺龙一案而言，自 1967 年 9 月 13 日贺龙专案组建立至 1968 年止，先后将许光达、元帅夫人薛明等人列为审查案犯和有关案犯，还将若干人列为备查名单，至于全国各地因此而受株连者不计其数。

1968 年 5 月 18 日，“贺龙专案组”经黄永胜、吴法宪批准，上报给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份《贺龙专案案情进展综合报告》，现只摘引其引言中的一个段落，有关情况便可略见一斑：

“贺龙专案组去年 9 月 13 日建立，现有办案人员 24 名，负责审查的案犯 18 名，有关案犯 5 名，共 23 名。其中省、军以上的 19 名（内有政治局委员 2 名，中央委员 1 名，候补中央委员 1 名）。”

早在 1967 年 5 月，后来成为“四人帮”二号人物的张春桥在与上海市革委会科教卫生组主要负责人陈琳瑚等人的一次谈话中，曾对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作了赤裸裸的注释。

张：“你们知道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陈：“反修防修……”

张：“不对，你说的这些只是一般地对外宣传上讲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那些老家伙通通打下去，一个也不留。”

陈：“难道象朱老总、陈老总、贺老总等人也包括在内吗？”

张：“刚才不是说了吗？通通搞掉，一个不留吗！怎么还觉得有点可惜吗？你还认为他们都是好人吗？老实告诉你，他们没有一个好东西！朱德是个大军阀，陈毅老机会主义，一打仗就开小差，靠吹牛起家的。贺龙是土匪……就是这些货色，哪个能留下？一个也不留！

十一

1968 年的冬天过早的降临了。

清晨的雾霭遮住了疲乏的冬日。满山业已凋落的红叶，在寒风的吹拂下顽强地挣扎着，似乎要以自己已经残碎的躯体去遮盖那干裂的土地。

刚刚听完广播的贺龙元帅，默默地靠在床头，那日渐消瘦的脸庞隐约露出一丝沉重的疑虑……

来到西山之后，元帅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均被切断了。虽然当时他仍身为“八大”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报纸和广播竟成为他唯一的消息来源。

广播中刚刚传来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的消息。由于江青、林彪一伙的迫害，身为“八大”政治局委员的贺龙元帅竟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力。从公布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中，贺龙还得知，许多八大中央委员及大部分候补中央委员，也没有出席会议。

元帅默默地点起了烟斗，陷入久久的沉思……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薛明正在灯下为贺龙缝补棉衣，元帅突然对她说：“要有思想准备哟，他们是完全有可能把我们分开的。”

薛明吃了一惊：“这怎么行，分开了谁来照顾你？”

“你应该先照顾好自己啊！你在延安揭发了叶群那么多问题，她能放过你吗？”

对于这一点，薛明是坚信不移的。

林彪等人欲将元帅和薛明置于死地而后快，除了是为清除篡党夺权的障碍外，还有历史上的原因。

“七七事变”后，薛明随平津学生到南京请愿，发现后来成为林彪老婆的叶群与国民党人物来往密切，还曾参加过CC派学生讲演比赛，并获得第一名。1943年延安整风时，薛明找叶群谈话，叶承认当时在南京讲演时曾宣称：“只有蒋介石才是我们唯一的领袖。”在薛明要她向组织交代上述问题时，叶群却大撒其泼，又哭又闹、满地打滚。

……

1966年国庆节后的一天，叶群刚刚从浴池里爬出来，江青突然来到毛家湾，看望林彪夫妇。

“我看到你，非常高兴，非常高兴，非常高兴！”就象举着红语录本高呼“万寿无疆”一样，林彪强调什么都要说上三遍。

在林彪卧室，林兴致勃勃地向江青谈起了他的养生之道，诸如人不应洗脸、洗澡；吃东西应该全部地吸收掉，拉大便是不正确的等等。

江青看林彪露出倦容，便拉起叶群的手，把嘴贴在林彪耳朵上说：我跟宜敬去坐一会，我们女人去说点女人的事。”

叶群卧室，江青和叶群肩并肩地坐在一起。

“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去整他们；我的仇人，告诉你，你想办法帮我去打倒！”

听江青道出此行的真实目的，叶群不禁感到后背一阵发冷，打了一个寒颤。在作了一番权衡之后，向江青表示：“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我的事，我这边能办，就不用你操心了，我自己找人办。”

叶群深谙江青的毒辣，不愿让她抓住自己的把柄。另外，在整治冤家，排除异己方面，这位“副统帅”夫人似乎还要比江青略胜一筹。

不是吗？

1969年，贺龙元帅被迫害致死之后不久，叶群便亲自打电话给林彪的死党，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要他“想办法把薛明送出北京，越远越好。”

对于“叶主任”亲自交代的事情，吴法宪是绝对不敢怠慢的。

1969年11月中旬的一个星夜，三辆军用小轿车急速驶入北京丰台火车站，在一列即将发出的列车边停了下来，四男四女八个军人，将一位虚弱的老人押上一节普通的车厢。

这样，贺龙元帅的夫人薛明被押送到贵州的一个空军农场。在那里，这位年逾五旬，身体虚弱的老人被当成一个重要犯人看管，强迫她改名换姓，不准给三个孩子写信，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派了一个班的兵力看押。

她的一切自由都被剥夺了。吃饭、走路、劳动、睡觉，甚至上厕所都有两个以上的人监视。他们竟以准备打仗、练习行军为由，经常在半夜将薛明叫醒，要她打起背包在狭小阴暗的房子里转来转去……

十二

一个寒冷的冬日。

时针已经越过晚上九点，西山某地，两个步伐蹒跚的老人相互搀扶着，在几个军人的催促下走出房门，艰难也爬上停放在门外的一辆军用吉普车。

老人瘦弱的身躯在寒风中簌簌发抖。

刚才，已经上床入睡的贺龙夫妇，被一阵紧似一阵粗暴的敲门声所惊醒。

“什么事啊，都这么晚了?”薛明一边起身开门，一边向门外问到。

“要修这屋里的暖气管道，给你们换栋房子。”一个战士生硬地回答。

“我已经睡了，这么冷，明天再换吧。”门开了，元帅向已经走进房间的战士商量。

“少罗嗦，让你换就得换!”一个战士不由分说，一把掀开贺龙的被子。

……

这一晚，薛明始终没有睡，望着贺龙清瘦的面颊，默默地流着眼泪。

在元帅的一生中，曾遇到过许多危难，蒋介石当年出十万大洋买他的人头都没有买到，但是，恐怕这一次是在所难免了。

在搬家前几个月的一个傍晚，北京某部负责联系监护的一个警卫参谋，带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走进了贺龙的房间。

“贺老总，这是师部新给你们派来的保健医生。”那位参谋将这位年轻人推到前面:“无产阶级司令部对你们很关心，让我们检查一下你们自己存放的药物是否变质。”

“检查药物是否变质”自然是件好事，一向心底坦荡、善良的贺龙夫妇将存放的所有药品毫无保留的全部拿了出来，让来者“检查”。

事情远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飞快地驶出京西宾馆的大门。

“贺龙专案组”负责人刚刚受到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召见。根据黄总参谋长的授意，几天之后，“贺专”负责人亲自写了一份报告，提出收缴贺龙同志的自备药品，并要求专门选派一名政治可靠的医生或护士。

贺龙自1950年发现有轻微糖尿病，多年来，经药物、饮食治疗，病情一直较为稳定。由于近两年政治、人身上的迫害，病情逐渐加重。

专案组的报告经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圈阅并报康生批准后，通过六道“政审”，从天津某医院挑选了一名“政治可靠”的护士，×××来当“医生”。

在其来京报到的当天，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芦某某便郑重其事地向他强调：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划清界线，收缴和控制贺龙的药品。

就这样，元帅夫妇从家中带来的治疗糖尿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的药品37种计三千多片被全部收缴，甚至检验尿糖的试剂也全部拿走。此后，根据某参谋关于“维持现有水平就行，也不要象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元帅的指示，这位“政治上可靠”的“医生”不仅不给元帅以必要的照顾和治疗，而且还中断和减少过去元帅服用的降压灵和D860等必备药品的用量，使贺龙同志失去了基本的药物保证。在元帅逝世前的半年多时间里，竟连一次血糖也没查过。

为迫害、折磨贺龙元帅，林彪一伙可谓费尽心机。

当时某些人借口怕有人发现贺龙住在西山，将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元帅和夫人薛明只好睡在没有卧具的床上，用手臂当枕头。夏季，以水源困难为借口，曾断水45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用水，其它生活用水则全靠接雨水凑合。一次，已是71岁高龄的元帅同薛明抬一大盆雨水，将腰部扭伤，剧烈的疼痛使他整整18天靠在椅子上不能活动。

元帅的衣服早已破旧不堪，补了又补，他与薛明合用的一块毛巾中间已破了一个大洞，只剩下了四个边。

“过去长征时穿的衣服就是这样，现在又穿上了旧衣服，很好嘛!”这一切，元帅都毫不在意，他常常对夫人薛明说:“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革命的，所以，无论多

么背时我都不怕。”

一天午间，元帅一边用力地嚼着那老得象甘蔗皮一样的豆角，一面兴致勃勃地向薛明讲起当年湘鄂西的艰苦斗争……

“咱家乡的糍粑可真好吃啊！说着说着，元帅忽然自言自语。他望着薛明，嘴角露出一丝苦笑：“67年春咱们在总理家时，邓大姐问我们要吃什么，就叫厨房做，你要过什么没有哇？现在说说，画饼充饥也很有意思嘛！”

“你是不是饿啊？”薛明望着元帅，强忍着心头的酸楚。

“嘿嘿，你算是说对了！”贺龙凄然地笑了笑。

对糖尿病人来说，除以药物控制，治疗之外，饮食治疗也是防止各种严重并发症发生的保证，但在这里，贺龙夫妇的饮食经常是象今天这样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或是清水煮白菜、糖罗卜，一个两格的圆形饭盒，一格里盛着菜，一格里盛着饭，也常常不给盛满。每次吃饭，都是薛明犯愁的时候，对元帅这种病来说，副食就是他治病的医药，为了让元帅多吃一点菜，薛明常常是把筷子伸到饭盆里，蘸一点咸水放在嘴里吮吮。

这个动作很快被元帅发现了，他拿起筷子把饭盒里的一点菜从中间划开，要“各自包干”。没办法，薛明只好在元帅不注意的时候，把“分界线”悄悄地挪动一下。

这，又能解决多大问题呢？

……

窗外的暮色已在慢慢地消失了，薛明还沉浸在这痛苦地思虑之中。

看来，他们是要把元帅往死里整啊！

这一天，薛明翻箱倒柜找到了一把破旧的剪刀，将元帅已经长得很长的头发剪成短短的平头，又认真地将元帅的胡子修剪成原来的模样。

不管林彪、江青一伙怎样迫害贺龙，贺龙还应该是贺龙的样子！

十三

1969年4月1日至4月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在林彪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全面肯定。此外，在所通过的新党章中，林彪被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进党章。

这是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

元帅从报纸上得知，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都“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些人是整老干部有功啊！”元帅愤愤地敲打着这些人的名字：“说不定我的专案正被他们把持着，这些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贺龙元帅已清楚地感觉到，在林彪一伙的迫害下，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几天来，在一个小小的日记本上，元帅写满了“冤枉”二字。

1969年5月上旬，元帅连续摔倒了七次，到后来，连他心爱的烟斗也不愿拿起来了……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元帅的夫人薛明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详细地记叙了贺龙元帅病危时的经历。

“1969年6月8日清晨，贺龙同志听完广播之后，连续呕吐了三次，呼吸急促，全身无力。我意识到这是以前保健医生给我讲过的要时刻加以提防的糖尿病酸中毒出现了。我非常

焦急，马上向监护人员报告，要医生来医治，但等了半天没有回音，只由那个冒牌医生打了一针'止吐针'，也没有止住呕吐。我催了五次，他们一直借故拖延；直到晚上八点时，才来了两个医生。没有做详细检查，就给输上了葡萄糖和生理盐水，而且是挂上瓶子就匆匆走开了。原来，专案人员就在屋外直接掌握着这次抢救，他们是'请示'去了。

"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同志的神志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小声对我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

元帅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知是由于诊断失误，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医生对元帅这种典型的糖尿病酸中毒表现竟诊断为肠胃炎。在当晚确诊后，仍继续采用错误的方法治疗。

作为一名医生，似乎应该知道对糖尿病人使用大量高渗葡萄糖液而不加胰岛素所可能引起的严重后果。

即使是胃肠炎脱水，也不能使用这种只能加重脱水的高渗葡萄糖。

这种危害病人生命的葡萄糖输了一夜：整整两千五百 CC。

也许，这就是"医疗为专案服务"的具体表现吧！

据有关资料记载，6 月 8 日晚 10 时，元帅的呼吸为 28 次／分；11 时 45 分为 30 次／分；12 时，40 次／分；凌晨 3 时，45 次／分。这提示酸中毒越来越严重。

6 月 9 日上午 8 时 55 分，专案组负责人在电话请示黄永胜之后，将元帅送入 301 医院 14 病室"抢救"。

根据林彪死党邱会作"医疗要为专案服务"的指示，在不见病人的情况下，搞了个"背对背"的会诊并规定："病人到医院后，有几个医生抢救治疗就行了？不要从各部找那么多人去。"

元帅的病床前，只有一名住院医和几位助手在忙碌。

……

1969 年 6 月 9 日下午 3 时零 4 分，贺龙元帅含冤而死。

他去了，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洁白的床单覆盖着他颀长枯瘦的身躯。

一个曾使敌人闻风丧胆的元帅，一个十万大洋都买不去的头颅，却在自己亲手打下的江山上，死在混进自己营垒内部的奸贼的手中！

（原载《法律与生活》1986 年第 10—12 期）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准备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一日)

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毛主席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中央已经发了几个通知，传达了毛主席各项指示的精神。在毛主席指示的指引下，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各条战线的形势越来越好。在国际上，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不断取得重大胜利。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正朝着越来越有利于我们而不利于敌人的方向发展。

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中央希望各单位抓紧做好下列准备：

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这是运动深入的关键。要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工农兵在运动中的主力军作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做好培养、壮大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各级领导同志要注意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正确对待在运动中给自已贴过大字报的广大革命群众。决不容许打击报复，“秋后算账”。

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抓紧专案清查工作。全国在清查与林彪反党集团阴谋活动有关的人和事方面，经过三年的时间，总的来说，除个别单位和个别人以外，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清查大致差不多了。应当对清查出来的人和事加以分析。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严格区别、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对于极少数属于敌我矛盾的林彪死党，要继续清查、批判。对于少数犯了错误包括严重错误的同志，如问题已基本查清，要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作出结论，把他们解放出来。

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把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要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表扬那些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批林批孔搞得好，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先进单位、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总结、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今年还剩下最后一个季度，要努力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国军民务必提高警惕，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为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新的贡献。

中央希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加强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发展当前大好形势，以实际行动迎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

这个通知可以传达到广大群众，但不登报、不广播、不贴大字报。在中央宣布召开人大以前，对外保密。

〔附〕长沙诬告前后

——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侧记之一

纪希晨　林　钢　鲁　南

阴谋，阴谋……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一个阴谋，接着又搞一个阴谋。

到长沙诬告，是"四人帮"搞的许多阴谋中的又一个阴谋。

1980年11月24日和26日，第一审判庭开庭调查这一阴谋。

江青是主谋

26日上午9时，被告人江青被两名女法警押上法庭。

江青在被告席上，动作笨拙，神态茫然若失。看来她的女皇梦还没有做醒。

审判长曾汉周审问江青：现在我问你：1974年10月17日夜，你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钓鱼台17楼密谋策划，这是不是事实？你们四个人在一起策划了什么？

江青抵赖：不知道。

审判长问：王洪文第二天去长沙是不是你们共谋的？

江青摇头，不答。

审判长宣布：被告人江青否认起诉书认定的事实，一一记录在案。

9点15分，王洪文被传到庭作证。他再次供认自己24日在法庭调查的一切事实。但是作了补正。王洪文说，是他自己提出要到长沙去的，江青立即表示同意，并且说，你要去，就早去，最好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

在24日的法庭调查中，王洪文供认是1974年10月4日张玉凤用电话传达毛泽东主席提议邓小平同志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王洪文当时作了电话记录。

审判长问：你去长沙告状的目的是什么？

王洪文回答：要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职务。

24日，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他说过"已有庐山会议气息"。他供认"长沙告状"，是江青出的主意。

"四人帮"为诬告周总理、阻挠邓小平同志出任第一副总理，是怎样进行阴谋活动的呢？

恶人南飞

1974年10月18日9时左右，一架银白色的专机，从北京起飞了。坐在这架飞机里的，是窃取党中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他背着周总理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偷偷地从北京起飞，赶在毛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向正在长沙养病的毛主席诬告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

江青一伙的诬告，要从他们炮制的一出反革命闹剧——"风庆轮"事件说起。

1974年"五一"节刚过，我国制造的一艘风庆轮，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启程，驶

往欧洲，往返航程3.2万海里，历时150天，在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了。

这时，正是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阴谋筹组“内阁”活动最紧张的时候。当他们得知风庆轮的一位副政委，曾对“四人帮”有过不满言论时，他们就蓄意扩大事态，把迫害的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邓小平副总理。

10月14日，江青一伙连续在一份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大写批语。江青杀气腾腾地责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一个部？”叫嚷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抡起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棍子，指桑骂槐，诬陷那个副政委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叫嚷要揪“大后台”！

1974年10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江青借机发难，挑起争端，拿出关于风庆轮的传阅材料，质问邓小平同志是什么意见。

邓小平同志说：我已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呢！

江青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同志，对批评“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

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批驳江青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这时已经散会，邓小平同志走了。惯于摇羽毛扇的张春桥，马上煽动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四 人 密 谋

政治局散会以后，“四人帮”回到钓鱼台。当天晚上，江青立即通知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到她住的17号楼去“碰头”，分析、议论邓小平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同江青吵架的原因。

江青说：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

张春桥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是与四届人大上，对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还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王洪文说：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不支持新生事物。

姚文元在这次会上也讲了自己的看法。

姚文元在10月18日日记中写道：

“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形势如何发展，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

江青等密谋策划后，王洪文提出他到长沙去，得到江青鼓励。第二天，他就坐专机飞向长沙。

10月18日下午2点左右，毛主席接见王洪文。当时在场的有张玉凤同志。1980年7月18日她的证词写道：

> “王洪文开始询问了一下毛主席最近的身体情况，然后便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这次来湖南没有告诉总理和政治局其他同志，是我们四个人春桥、江青、文元和我开了一夜会，商定让我向主席汇报。我是冒着危险来的。
>
> “王洪文还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这件事，江青同邓小平同志发生了争吵，吵

得很厉害，并把江青和小平同志当时讲的一些话重述了一遍。王又说，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还猜测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

"接着，王洪文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并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王洪文还在毛主席面前对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分别做了一番吹捧……

"谈话结束时，王洪文说，今天还要赶回北京，他们几个人还等着我传达主席的意见呢。

"主席说，那好，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毒 蛇 之 心

"四人帮"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1973 年 11 月，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江青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借题发挥，恶毒攻击和诬陷周总理"迫不及待地要代替主席"。

1973 年 12 月 9 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会见尼泊尔国王之后，针对江青对周总理的攻击和诬陷批评说："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指江青）迫不及待。"

就在王洪文南飞长沙这天中午，江青把将去长沙参加会见的王海容、唐闻生同志找到钓鱼台 10 号楼。

江青说，主席不久将在外地会见外宾，你们也要去参加有关工作，所以找你们来谈一件重要事情。并且要她们报告毛主席。

江青说，17 日晚在政治局讨论风庆轮问题的会上，小平同志和她发生争吵后扬长而去，致使政治局会议无法开下去。江青还胡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

江青说，小平同志和总理、叶帅都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江青一伙还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等象林彪在 1970 年一样搞篡权活动。胡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

王洪文在 1980 年 6 月 27 日的笔供是这样写的：

"目的就是在毛主席面前搞臭邓小平同志，使他不能工作，当然更不想让他当第一副总理了……这次去长沙告状……主要是恶人先告状，抢在邓小平同志陪外宾去前，目的是要毛主席了解吵架的所谓'真相'，也就是了解邓小平同志的所谓问题……实际上是诬蔑陷害邓小平同志的一次阴谋活动……"

江 青 还 在 闹

王洪文在长沙告状的当天下午回到北京。

在长沙时，他当面向毛主席说，一定按主席指示办。但是一回到北京，他不去找周恩来、叶剑英同志，而是先到钓鱼台，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禀报了他的长沙之行。

就在 18 日夜里，他们四个人再一次聚集到钓鱼台 17 号楼。此外，还特地把毛主席接见

外宾时担任记录、翻译的王海容、唐闻生同志也找了去。

在26日的法庭上，王海容、唐闻生同志先后出庭作证。

王海容说，到17号楼时，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已在场。会上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形势问题。张春桥把批林批孔后国内财政开支和外贸中逆差，说成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崇洋媚外造成的。张春桥还把17日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

江青要王海容、唐闻生再去长沙诬告邓小平。在谈话中，透露出王洪文已见过主席。毛主席叫他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会打仗。

第二天，王海容、唐闻生到医院向总理报告了江青找她们谈话的情况。总理说，是他们四个人事先计划好整小平同志，他们已多次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了很久。

10月20日，毛主席在长沙接见外宾以后，王海容、唐闻生把跟总理谈的情况，报告了主席。毛主席听后很生气地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先念等同志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

主席还建议邓小平同志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主席十分赞扬小平同志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并指示她俩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但是，利令智昏的“四人帮”哪肯罢休。他们以百倍的疯狂，继续扑向邓小平同志。

1976年3月2日，江青在部分省、自治区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语无伦次，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她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啊，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

紧接着江青又在1976年4月26日，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诬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他们又承袭了刘少奇、林彪他们的惯伎……我看他们是否高超过林彪？据说，他们的大小舰队活动有些雷同，有些不同。小舰队有过之无不及。”

她在信末写道，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打一场更大的胜仗！”

江青一伙究竟要和谁打仗呢？难道仅仅是和邓小平同志吗？不，他们是在和全国九亿人民打仗！

这场战斗的结果，人民胜利了，“四人帮”被押上了人民的法庭！

（选自《历史在这里沉思》第2卷）

〔附〕一出反革命闹剧

——“四人帮”炮制“风庆轮问题”的真相

交通部大批判组

《人民日报》编者按：所谓“风庆轮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打倒了“四人帮”，真相大白于天下。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采取种种卑劣的手段，厚颜无耻地捏造

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等罪名，胡说有人不搞自己的造船工业，把矛头指向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英明的领袖华主席。他们利用风庆轮大作文章，既是摘桃子，又是打棍子，妄图证明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戳穿这个大阴谋，人们就会看到，这伙丧心病狂的阴谋家、野心家，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是怎样结帮营私、欺世惑众的。

一九七四年"五一"节刚过，风庆轮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从上海港启程，驶往欧洲。风庆轮往返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航程三万二千浬，历时一百五十天，在国庆节前夕返回上海。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全部采用国产机器和设备的万吨轮，它的远航成功，是我国造船工人、远洋海员和有关单位广大职工辛勤劳动的成果，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伟大胜利。然而，正当人们为风庆轮的胜利返航欢欣鼓舞的时候，"四人帮"却借这件事策划着一个恶毒的阴谋。

(一)

"风庆轮问题"是"四人帮"精心炮制的一颗反党炮弹，因"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而起，随"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没，它是一出反革命闹剧，前后喧嚣达两年有余。

"风庆轮问题"的起因，需要追溯到一九七四年年初。那时候，风庆轮尚在重载试航阶段。"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蓄意制造事端，别有用心地利用用船部门在验收过程中同造船部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无限上纲：他们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妄加罪名，污蔑上海远洋运输分公司是"崇洋公司"。在他们一伙的精心策划下，召开了上海市批判所谓的"崇洋迷外"的大会，围攻远洋运输分公司，点名批判交通部。他们这样干，仅仅是为了要整垮一个分公司和打击交通部吗？当然不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四人帮"采取指桑骂槐的卑劣手法，以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为名，矛头直指中央。他们一伙阴险地宣称"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这就不打自招地证明，挥舞"崇洋迷外"的大棒，是要打"中央的人"，要把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打成"当代的李鸿章"。这就是"四人帮"炮制"风庆轮问题"的实质和要害。

在风庆轮重载试航成功之后，船员们怀着热爱国产轮船的心情，贴出了《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的革命大字报。出航前，中央领导同志极为关怀，对航行的安全作过许多具体指示。有关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这时，毒似蛇蝎的"四人帮"，得知风庆轮安全通过风浪很大的好望角，预计航行胜利在望时，就象毒蛇看准了猎获目标一样，立即张开血口，恨不得把胜利成果一口吞下。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训斥说，报上登风庆轮航行的消息不引人注目，要在返航时大写特写，登在头版头条。狗头军师张春桥下令轮船返回上海时，要组织盛大欢迎。人们不禁要问："四人帮"为什么对一艘国产货轮的远航归来这样"关切备至"呢？难道这是第一艘国产船远航吗？不是。在风庆轮远航前两年，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就已经多次横渡太平洋远航加拿大了。还有其他的国产船也远航西非。那时，"四人帮"并没有表示过任何"关切"。同样是国产轮，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这里面有鬼。这个鬼就在于，风庆轮远航归来的时间，正是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阴谋筹组"内阁"活动最紧张的时候。他们背着政治局，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遭到了毛主席的痛斥。他们不仅毫无悔改之意，竟利用"风庆轮问题"继续向周总理施放毒箭。也就在那个时候，所谓"风庆轮问题"就形成了一个高潮。

在这个反党高潮中，"四人帮"倾巢出动，大打出手。当他们得知风庆轮的一位副政委，曾对"四人帮"有过不满言论时，政治流氓王洪文就借题作文章，追他的"后台"。同时，"四人帮"蓄意扩大事态，用一种出奇的高速度，在十月十四日一天之内，在一份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材料上大写"批语"。江青杀气腾腾地责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叫嚷交通部是"买办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张春桥、姚文元在"批语"中，说什么"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要国务院把这个问题拿到经济部门去进行"教育"。一时间，被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发表了连篇累牍的文章，以风庆轮为背景的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广播也纷纷出笼，鼓噪上阵，彻头彻尾地造谣说、"有人说国产轮只能跑近海，不能跑远洋"、"有人主张风庆轮必须换上五大件进口货才能远航"。什么"风庆轮是批出来，斗出来的"、"远航权是争得来的"；什么"瞧不起国产的东西"、"在洋人面前矮了一头"；什么"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大帽子，也一顶顶飞舞出来。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打成"高级走资派"，就可以取而代之，夺权上台了。但是，这不过是篡党夺权者的一枕黄粱。"四人帮""组阁"的阴谋，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戳穿了，打破了。他们只得收敛鬼把戏，暂作韬讳之计，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一九七六年一月，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四人帮"大失所望，怨恨已极！于是，"风庆轮问题"又一次被他们搬上了反党的舞台。一九七六年三月，江青擅自召集十二省、自治区会议，大谈"风庆轮问题"，把一年半以前他们的所谓"批语"在会上捅出去。接着，在一次会议上，江青象泼妇似的大骂中央领导同志："真是洋奴、买办、汉奸"！反动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江青还要把她的讲话的部分内容印发全国，企图进一步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请示报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洞察一切，当即指出"**不应该印发，此事是不妥的。**"从而又一次挫败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

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就在毛主席作出批示五天之后，又布置一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以风庆轮为题材的电影，说什么"写风庆轮要敢于触及中央各部，部的背后有中央的人，风庆轮就写中央的两条路线斗争，要写高级走资派"、"主要写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矛头所指，昭然若揭。然而，这部反党电影还来不及出世，就在"四人帮"的遗腹之中呜呼哀哉了。

（二）

毛主席对一些反派人物作过这样生动的描绘："**好象唱戏一样，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象、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象，装腔作势，不大自然。**"在"风庆轮问题"上，"四人帮"想扮演"正派人物"，他们装腔作势地打出"支持国内造船工业"的幌子，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可是，这一伙凶神恶煞，演"正派人物"总是不象。他们看不起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力，对风庆轮能否远航是有怀疑的。张春桥在风庆轮远航出发的时候，不怀好意地说："风庆轮开出去是个胜利。风庆轮沉在海里也是个胜利"。这就露出了狐狸尾巴，充分暴露出他们哪里是关心国产轮船，只不过是以"关心"为名，施展阴谋诡计罢了。就是说，风庆轮远航成功了，他们既可以摘桃子，又可以打棍子，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打成"崇洋迷外"的"洋奴"。但是，黑白不容颠倒，是非岂能混淆。人们知道，最关心、最支持国内造船工业的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忠实执行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对发展造船工业、建设远洋船队十分关心。一九六三年，周总理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亲自提出过一个发展造船工业和买船的规划，并经过毛主席的批准。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周总理指示，加速发展我国远洋船队，要立足于发展我国的造船工业，但也不排斥在有利条件下适当购买一些船只，以尽快结束依赖租船的局面。一九七三年，周总理又作了部署，集中力量在短期内建成一批深水泊位，加速我国沿海港口建设。这是随着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周总理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究竟谁是扼杀我国造船工业的罪魁祸首？是"四人帮"。他们口头上"关心"国内造船工业，实际上极力破坏毛主席关于大搞造船工业、建立海上铁路的战略方针，竭力抵制周总理关于积极发展造船工业和我国远洋运输事业的指示。王洪文打着批判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幌子，利用批林批孔，同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在有利条件下适当买一些船只的意见大唱反调，恶狠狠地说什么"那些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必然赞成和拥护立足于向外国买船"。他们不择手段地肆意破坏国家的统一计划，不顾沿海、内河都迫切需要中小船只的客观实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从而严重地影响了沿海和内河航运事业的发展。他们破坏军、民造船工业的比例，妄图毁我海上长城。"四人帮"既破坏我国的造船工业，又反对向外国买进一些船只。如果依了他们，我国的远洋船队就难以发展壮大，远洋运输就不得不大量租用外轮，处于受制于人的局面。什么"风庆轮问题"？难道这不正是他们篡党夺权活动最真实的写照吗？什么"正确路线的代表"？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卖国贼！

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风庆轮问题"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围绕着"风庆轮问题"展开的这场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我们党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一个侧面。通过这场斗争，我们可以看出，"四人帮"是如何接过革命的口号，干着反革命的勾当；他们的反革命气焰是何等猖狂，他们的反革命手法是何等卑鄙，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又是何等顽固！

（原载1977年1月17日《人民日报》）

毛 主 席 已 圈 阅。

中共中央转发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通知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为了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使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进一步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深入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现将军事科学院编的《批判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广大干部群众和部队指战员开展对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的批判，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中央这个通知和附件，军队发到排以上单位。地方可以发到党的支部。

新　年　献　词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五年元旦社论

团结战斗的一九七四年过去了，我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地跨入了一九七五年。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过去的一年，我们胜利地进行了批林批孔运动。亿万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进一步揭露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联系实际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宣扬复辟、倒退、卖国的孔孟之道，提高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前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发展较快，毛主席倡导的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的空气在许多单位大为浓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蓬勃发展。批林批孔运动巩固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

革命推动了生产。农业在连续十二年丰收的基础上，又获得全面丰收。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三年有新的增长。工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工作都获得了新的成就。我国市场繁荣，物价稳定，生产建设蒸蒸日上。这同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衰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面临深刻的经济危机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优越性。

一年来各条战线的胜利，特别是经过批林批孔运动，使人们从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中，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性。反修防修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松懈自己的斗志。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又一次指出："**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这十年来，我们认真实践了毛主席这个教导。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继续牢记毛主席的这一教导。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搞好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多快好省地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加强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

批林批孔还要抓紧。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学习和批判上来。对林彪、孔老二的批判，要抓住路线问题，抓住他们搞复辟、搞倒退的反动实质，从政治上、理论上批深批透，进一步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批判他们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少数没有很好批林批孔的单位，应当认真批一下。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做到古为今用，还需要继续努力。在批判中，要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应当同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加强战备、加强部队建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批孔应当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更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和《国家与革命》，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实践论》、《矛盾论》和主

要的军事著作，还要深入学习。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学，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切实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的建设，这样，才能带领群众把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

学习和批判要紧密联系实际。要根据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重点，做到有的放矢。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系列指示，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的罪行，进一步促进革命团结。要推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前进，继续搞好斗、批、改，注意总结各方面的新经验和解决出现的新问题。要联系各个领域各条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倾向。领导机关首先要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并善于运用**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来指导工作，抓好典型，抓好重点，抓好三分之一，扎扎实实地有步骤地解决本地区、本部门还存在的一些问题，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联系实际时，要始终注意掌握斗争大方向，切实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准确地打击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只有这样，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大好形势。

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要继续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大办农业，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基础工业，认真抓好国防工业。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的群众运动。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人，必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我们对这一点要有足够的估计。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进一步加强部队建设，认真搞好军事训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加强军政团结，军民团结。要充分发挥民兵的战斗作用。全国军民都要进一步落实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要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各级党委必须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成为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战斗指挥部。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增强“一班人”的团结，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要紧密联系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接受群众的革命监督。党支部要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党员要努力实践党章中规定的必须做到的五条，增强党的观念，遵守党的纪律。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发挥工、农、妇、青等各种群众组织的作用。

过去的一年，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取得了新的成就。我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团结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日益发展，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更加扩大。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各国人民的方向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反对两霸的革命斗争的主力军。两个超级大国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世界更加动荡不安。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科学分析，加强对国际形势的研究，特别是对苏美两霸的相互争夺和当前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为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广大群众和干部都回顾一下过去的工作，议论一下形势和任务，订出本单位的大体规划，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着新的胜利奋勇前进！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同志任职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

（一）任命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二）任命张春桥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

周　恩　来

各位代表！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我代表国务院，向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届人大以来，我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它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是这场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巩固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保证了我国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它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上层建筑领域的斗批改取得了重大成就。老中青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密切了和群众的联系，大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茁壮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深入发展，教育卫生革命生气勃勃，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上百万赤脚医生成长起来，近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参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正在壮大。这一切新生事物的涌现，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了无

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五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十三年夺得丰收，一九七四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一。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百分之六十，但粮食增产一点四倍，棉花增产四点七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八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业总产值一九七四年预计比一九六四年增长一点九倍，主要产品的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钢增长一点二倍，原煤增长百分之九十一，石油增长六点五倍，发电量增长两倍，化肥增长三点三倍，拖拉机增长五点二倍，棉纱增长百分之八十五，化学纤维增长三点三倍。在这十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国内外反动派曾经断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定会破坏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事实已经给了他们有力的回答。

我们同各国人民一道，在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我们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加强了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我国在联合国长期被非法剥夺的席位得到恢复。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增加到近百个，有经济贸易关系和文化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一百五十多个。我们的斗争得到各国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锻炼，我国各族人民更加团结，我们的军队更加坚强，我们的伟大祖国更加巩固。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各位代表!

我们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阐明了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方向。我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努力实现十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决不能因为批林批孔已经取得很大成绩而有所松懈。我们要继续深入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遵循古为今用的原则，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并在斗争中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就是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武装起来。要通过批林批孔，进一步推动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推动各条战线的斗批改，支持一切新生事物，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各级领导班子要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积极培养青年、妇女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着重从工人、贫下中农中选拔优秀分子到领导岗位上来。精兵简政，减少层次。新老干部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要能上能下，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稳、准、狠以准为重点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针，采取民主的方法，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团结其他劳动群众和广大知识分子，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我们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共同奋斗。

社会主义革命是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更加巩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O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O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为了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必须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执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和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政策。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

我们的各级领导同志，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务必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抓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要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铺张浪费等错误思想和作风。

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使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任凭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风潮起伏，我国经济始终扎实地蓬勃发展。我们要永远坚持这条路线。

各位代表！

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天下大乱，而且越来越乱了。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倾向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争夺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争夺重点在欧洲。苏联社会

帝国主义是声东击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策源地。它们的激烈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世界上到处讲缓和、讲和平，恰恰证明，这个世界没有缓和、更谈不上什么持久和平。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总是光明的。

我们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把对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我们要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第三世界是反殖、反帝、反霸的主力军。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三世界。我们要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坚决支持他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我们坚决支持朝鲜、越南、柬埔寨、老挝、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我们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我们支持西欧国家在这个斗争中联合起来。我们愿意同日本政府和人民一起，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增进两国友好睦邻关系而努力。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三年来两国关系有所改进，两国人民的往来有了发展。只要中美上海公报的各项原则能够认真执行，两国关系就可以继续得到改善。

苏联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同他们的原则争论是要长期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历来认为，这种争论不应妨碍中苏两国正常的国家关系。苏联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步骤，对我国进行颠覆，直至挑起边界武装冲突。他们背弃中苏两国总理早在一九六九年就已经达成的谅解，拒绝签订包含有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内容的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协议，致使中苏边界谈判至今没有结果。他们连中苏边界存在着争议地区都不承认，连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防止武装冲突这样的事情都不干，却侈谈什么互不使用武力、互不侵犯的空洞条约，这除了为着欺骗苏联人民和世界舆论以外，还有什么呢？我们奉劝苏联领导，还是老老实实坐下来谈判、解决一点问题，不要再玩弄那些骗人的花招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们要保持警惕，加强防御，准备打仗。英雄的人民解放军担负着保卫祖国的光荣任务。全军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战备。要认真办好民兵。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实现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崇高目标而共同努力。

各位代表！

在国内外大好形势下，我们首先要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我们必须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抓大事，抓路线，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

我们必须坚决拥护党的一元化领导。**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

导一切的。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必须置于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

我们必须发扬遵守纪律的光荣传统，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我们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坚定地相信和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我们必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应当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乘胜前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75 年 1 月 20 日讯，载 1 月 21 日《人民日报》）

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报告，一月十七日通过）

张　春　桥

各位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经发给各位代表。我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作一些说明。

二十年前，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一九五四年宪法，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它用根本大法的形式，总结了历史经验，巩固了我国人民的胜利成果，为全国人民规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前进道路。二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宪法是正确的。它的基本原则，今天仍然适用。但是，一九五四年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部分内容，今天已经不适用了。总结我们的新经验，巩固我们的新胜利，反映我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共同愿望，就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主要任务。

二十年来，我国人民的新胜利，最主要的，就是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地巩固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同国内外敌人的反复较量，特别是经过八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国各族人民空前团结，无产

阶级专政空前巩固。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为我们制定了一条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同刘少奇、林彪的斗争，集中到一点，就是坚持这条基本路线，还是改变这条基本路线。历史的和现实的阶级斗争都证明，这条基本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也是我们国家的生命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也是我们这次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

现在提出的这个修改草案，是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继承和发展。它是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反复讨论产生的，是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产物。序言是新写的。条文从一百零六条，缩减为三十条。重要的修改，有以下几点：

（一）修改草案从序言开始，记载了我国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我国人民从一百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得出的结论，现在写进了修改草案总纲。草案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由于不设国家主席，草案对一九五四年宪法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作了相应的修改。这些规定，必将有利于加强党对国家机构的一元化领导，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

（二）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又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和政策。在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的政社合一的农村人民公社和实行革命三结合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也分别写进了修改草案。这样，就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国家的阶级性质，各个阶级在我们国家的地位。马克思、列宁一贯教导我们："**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是无产阶级压迫资产阶级的机器**"。我们的草案，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一原则立场，同孔老二的什么"仁政"，同苏修叛徒集团的什么"全民国家"之类的谬划清了界限。

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它是我国人民战胜敌人、保护自己的法宝。我们必须很好地爱护它，不断地加强它。我们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加强国家机关的建设。要继续巩固工人阶级和它的可靠同盟军贫下中农的联盟，团结其他劳动人民和广大知识分子，发展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在内的革命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行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我们伟大祖国的独立和安全。

（三）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

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其中特别规定了各兄弟民族和妇女的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自由的内容。我们相信，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革命群众一定能够更好地运用这些规定，"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四) 一九五四年宪法提出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修改草案充分肯定了我国人民取得的这一伟大胜利，规定我国现阶段主要有两种所有制，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修改草案对于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对于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也作了规定。这些规定，把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性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同刘少奇、林彪包产到户、取消自留地之类的荒谬主张划清了界限。

修改草案重申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规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应当指出，在我们国家，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象初升的太阳，还很年轻。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也只能在斗争中成长。就拿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去占领。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无产阶级的扫帚不到，这类垃圾决不会自动跑掉。修改草案关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及国家机关、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密切联系群众、纠正不正之风等项规定，就是要我们十分注意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把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一切阵地。

(五) 根据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教导，我们将"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写上了修改草案，表示我们国家今天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们要永远同全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各位代表!

修改宪法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将近五年。这次大会将要完成这项工作，公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法。这是一件值得我们热烈庆祝的大事。长期以来，为了争取和捍卫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权利，为了粉碎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妄图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阴谋，为了战胜国内外反动派，我国人民进行了尖锐复杂的斗争，成千成万的烈士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正是这些斗争的胜利，产生了这个社会主义宪法。我们相信，全国各族人民，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一定会认真地执行这个宪法，勇敢地捍卫这个宪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保证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新华社 1975 年 1 月 19 日讯，载 1 月 20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浙江、云南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军区、省军区党委:

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实现"安定"、"团结"，发展大好形势，中央规定:

一、不论什么人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都是错误的，都是不容许的。

二、凡因资产阶级派性严重，在思想上组织上还没有联合好的地区和单位，一律不要成立"民兵指挥部"或"民兵团"之类的机构，一律不要给民兵发枪。民兵组织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在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整顿，通过整顿民兵促进实现革命大联合。

三、凡已发生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的地区和单位，省委应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收缴被抢的武器、弹药，集中封存，妥善保管。

此通知精神，浙江、云南可口头传达到基层党支部和群众，其他各省传达到县、团。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八日至十日举行了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新华社1975年1月17日讯，载1月18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新闻公报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北京隆重举行。

大会的议程是：一、修改宪法；二、政府工作报告；三、选举和任命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主席台上悬挂着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画像。画像两边树立着鲜艳的红旗。大会选举了由二百一十八名代表组成的主席团。朱德、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主席团常务主席。吴德为秘书长。

在主席台前列就座的还有：周恩来、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许世友、华国锋、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

朱德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幕，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乐队奏国歌。

会上，张春桥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政府工作报告》

从一月十四日起，全体代表认真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请大会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上述两个报告。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全国经过广泛的民主协商，反复讨论，共选出代表二千八百八十五名。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共二千八百六十四人。他们当中有产业工人、农民、其他劳动人民、人民解放军、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归国华侨的代表。工农兵代表占百分之七十二。妇女占百分之二十二以上。五十四个少数民族都有代表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十二名台湾省籍同胞的代表。许多代表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充分体现了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各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在内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反映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欣欣向荣的兴旺气象。

大会正式开幕前，从一月五日到十一日举行了预备会，全体代表讨论了会议的主要文件和其他准备工作。

这次大会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批林批孔运动取得很大成绩，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大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欢欣鼓舞、紧密团结、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气氛。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一月十七日，全体代表一致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张春桥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批准了周恩来总理所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代表们为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光荣任务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会根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经过认真讨论，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当宣布选举结果和任命名单时，全场又一次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兴奋地表示，这次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大法，规定了今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任务，选举和任命了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这一切充分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底的共同愿望，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在我国的历史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大会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执行和勇敢捍卫新的宪法，努力实现大会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大会指出，全国人民要继续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建立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设。要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争取提前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

大会指出，当前天下大乱的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各国人民对于世界大战必须有所准备。大会强调要继续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决支持第三世界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支持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超级大国控制、威胁和欺负的斗争。大会号召全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加强战备，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新华社1975年1月18日讯，载1月19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选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委员。现公告如下:

委 员 长

朱 德

副委员长

董必武 宋庆龄（女） 康生 刘伯承 吴德 韦国清 赛福鼎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委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千比 马成杰 马纯古 马学礼 马恒昌 王世泰 王世惠 王观澜 王克强
王秀珍（女） 王作山 王冶秋 王茂全 王淦昌 王景升 王道义 王耀花（女）
邓初民 邓颖超（女） 区棠亮（女） 贝时璋 牛发和 毛迪秋 巴桑（女）
甘祖昌 龙梅（女） 史良（女） 白寿彝 白迪·海山 朴春子（女）
吕玉兰（女） 吕正操 吕美英（女） 刘大年 刘文辉 刘斐 江礼银
朱克家 朱良才 朱蕴山 伍修权 许存贵 华罗庚 庄希泉 孙玉国 严济慈
克尤木·买提尼牙孜 杨东莼 杨坡兰（女） 杨佩莲（女） 杨荣国
肖劲光 吴从树 吴玉英（女） 吴先锋 吴有训 吴冷西 吴承清 吴德峰
吴耀宗 沙千里 沙马力汗（女） 陈玉娘（女） 陈此生 陈阿大 陈奇涵
陈逸松 陈望道 陈淑清（女） 李凤兰（女） 李世荣 李庆霖 李延禄
李金荣 李顺达 李聚奎 张文裕 张世忠 张达志 张延成 张国清（女）
张洪池 张桂珍（女） 张铁生 张福财 武新宇 茅以升 林巧稚（女）
林丽韫（女） 岩帅 罗叔章（女） 季方 金秀清 金祖敏 周世钊
周叔弢 周锡林 周慧芬（女） 宝日勒岱（女） 赵忠尧 赵俊祯（女）
荣毅仁 胡子昂 胡绳 胡愈之 侯隽（女） 俞霭峰（女） 姚士昌
晋桂香（女） 夏菊花（女） 殷诚忠 郭宏杰 郭映福 唐克碧（女）
唐岐山 浩亮 诸惠芬（女） 陶峙岳 姬鹏飞 黄作勤 曹轶欧（女）
崔海龙 康克清（女） 梁必业 梁吉泉 彭绍辉 董天祯 董加耕 董其武
粟裕 傅玉芳（女） 傅秋涛 童第周 曾生 曾志（女） 谢静宜（女）
错其（女） 解力夫 蔡树梅（女） 廖承志 樊德玲 薛清泉 薛喜梅（女）
魏秉奎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新华社1975年1月18日讯，载1月19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请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已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经大会一致通过。现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予以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新华社 1975 年 1 月 19 日讯，载 1 月 20 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目　录

序　言

第一章　总纲

第二章　国家机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节　国务院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序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

二十多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乘胜前进，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

我们要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要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

在国际事务中，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我们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加强团结，互相支援；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我国人民有充分的信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胜国内外敌人，克服一切困难，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一章　总　　纲

第 一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 二 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 三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 四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

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

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第 五 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

第 六 条　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

矿藏、水流，国有的森林、荒地和其他资源，都属于全民所有。

国家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第 七 条 农村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的组织。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一般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以生产队为基础核算单位的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

在保证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和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人民公社社员可以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牧区社员可以有少量的自留畜。

第 八 条 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公共利益。

第 九 条 国家实行"不劳动者不得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

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

第 十 条 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第十一条 国家和机关和工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官僚主义，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各级干部都必须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国家机关都必须实行精简的原则。它的领导机构，都必须实行老、中、青三结合。

第十二条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卫生、科学研究都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第十三条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第十四条 国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惩办一切卖国贼和反革命分子。

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地主、富农、反动资本家和其他坏分子的政治权利，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

第十五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支战斗队，同时又是工作队，又是生产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任务，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

第二章　国 家 机 构

第一节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十六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人民解放军选出的代表组成。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特邀若干爱国人士参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在特殊情况下，任期可以延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提前或者延期。

第十七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修改宪法，制定法律，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免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的组成人员，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

第十八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它的职权是：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解释法律，制定法令，派遣和召回驻外全权代表，接受外国使节，批准和废除同外国缔结的条约，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副委员长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

第二节　国　务　院

第十九条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国务院由总理，副总理若干人，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等人员组成。

第二十条　国务院的职权是：根据宪法、法律和法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议和命令；统一领导各部、各委员会和全国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工作；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管理国家行政事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三节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省、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地区、市、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农村人民公社、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两年。

第二十二条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罢免，并报上级国家机关审查批准。

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都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上一级国家机关负责并报告工

作。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本地区内，保证法律、法令的执行，领导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审查和批准地方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第四节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第二十四条 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它的自治机关是人民代表大会和革命委员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除行使宪法第二章第三节规定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外，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行使自治权。

各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充分保障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第五节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

第二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设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任免。

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

检察和审理案件，都必须实行群众路线。对于重大的反革命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批判。

第三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公民的崇高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是公民的光荣义务。

第二十七条 年满十八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照法律被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除外。

公民有劳动的权利，有受教育的权利。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

公民对于任何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书面控告或者口头控告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刁难、阻碍和打击报复。

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国家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第二十八条 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

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宅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公安机关

批准，不受逮捕。

第二十九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任何由于拥护正义事业、参加革命运动、进行科学工作而受到迫害的外国人，给以居留的权利。

第四章 国旗、国徽、首都

第三十条 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首都是北京。

（新华社1975年1月19日讯，载1月20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通过）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周恩来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认为，从三届人大以来，国务院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目前正在全国普遍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对内对外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会代表深信，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新华社1975年1月20日讯，载1月21日《人民日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提议，任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现公告如下：

总　　理　周恩来	副总理　陈锡联
副总理　邓小平	副总理　纪登奎
副总理　张春桥	副总理　华国锋
副总理　李先念	副总理　陈永贵

副总理 吴桂贤(女)
副总理 王震
副总理 余秋里
副总理 谷牧
副总理 孙健

外交部部长 乔冠华
国防部部长 叶剑英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余秋里
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 谷牧
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
对外贸易部部长 李强
卫生部部长 刘湘屏(女)
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 方毅
农林部部长 沙风
冶金工业部部长 陈绍昆
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水清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刘西尧
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际泰
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王诤
第五机械工业部部长 李成芳
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 边疆
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 王扬
煤炭工业部部长 徐今强
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 康世恩
水利电力部部长 钱正英(女)
轻工业部部长 钱之光
铁道部部长 万里
交通部部长 叶飞
邮电部部长 钟夫翔
财政部部长 张劲夫
商业部部长 范子瑜
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
教育部部长 周荣鑫
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 庄则栋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七日于北京
(新华社1975年1月18日讯，载1月19日《人民日报》)

四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命姬鹏飞为四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日)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月二十日下午举行。会议由朱德委员长主持。

会议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命姬鹏飞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新华社1975年1月20日讯，载1月21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央军委常委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二月五日)

(一) 为了加强军队建设和战备工作的领导，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取消军委办公会议，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二) 叶剑英、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刘伯承、陈锡联、汪东兴、苏振华、徐向前、聂荣臻、粟裕十一位同志为常务委员。军委常委会由叶剑英同志主持。

总参谋部第一副总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总后勤部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厅主任列席常委会议。

(三) 军委党委会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对军内外一律用军委名义，不用军委常委会名义。

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一九七五年二月九日)

《人民日报》社论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这个指示，对于进一步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搞好反修防修的斗争，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团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在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它的任务，作了深刻的论述。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路明灯。我们一定要认真学好，懂得为什么要对资产阶级专政，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什么，懂得怎样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

实践。我们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批判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重要思想根源孔孟之道，取得了很大成绩，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但是，我们决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我们同修正主义的斗争，不是一两次较量，而是长期的斗争。我们的任务，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象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

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为了消除这些痕迹，需要进行长时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我们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毛主席还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毛主席的书。要看到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要看到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注意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要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些都是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我们在学习中，要深刻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不仅要镇压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防御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颠覆和侵略，而且要同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战胜资产阶级和旧社会习惯势力对无产阶级的腐蚀和影响，从而更加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促进和加强广大群众的革命团结。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态度，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对尚存在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必要的限制。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这样那样的糊涂观念，甚至把某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东西。只有认真看书学习，才能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各级党委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认真抓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领导干部应当带头学，并组织好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学习，注意发挥理论队伍的作用，注意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学习四届人大有关文件，也要抓住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心。要进一步批判林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谬论，进一步分析产生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要继续批判孔孟之道，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认识。要研究苏联的修正主义是怎样上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怎样变质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的。要进行社会调查，研究各个领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现状，搞好各条战线的斗批改，发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基层。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批转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日）

中央同意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现在把这个报告，连同《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发给你们，请发动群众，充分讨论，具体落实。

毛主席提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还再一次强调指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各地区、各部门都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要认真读书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当前要特别学好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当前特别要把交通运输和煤炭、钢铁生产抓上去。

全党同志要谦虚谨慎，继续努力，发扬成绩，克服困难，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

现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认真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党外群众学习。

毛主席的指示极为重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定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毛主席指示摘编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不久将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也请你们认真学习，并且要努力多读一点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这个学习可以同批林批孔紧密地结合起来。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在学习中，注意联系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亲自对目前实际状况做一点调查研究。同时，要领导并帮助党员和群众学好。注意总结学习中的先进经验。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

本通知和毛主席指示发至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群众。

学习的情况和问题，望及时报告中央。

毛 主 席 指 示

毛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说，这次谈两个问题，一个人事安排，一个理论问题。

关于理论问题，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要写文章。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注：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日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说过，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

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无产阶级专政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者按：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说：**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 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

毛主席还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

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毛主席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了当前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极端重要性，应当引起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高度重视。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选辑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部分论述，供大家学习。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好这些语录，并且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著作。同时，要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学好。要充分理解毛主席指示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全国亿万人民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反修防修的大事，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各级党委一定要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抓紧抓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政策，进一步搞好批林批孔运动，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马克思：《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八五〇年一月——十一月一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通过把一切劳动资料转交给生产者的办法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从而迫使每一个体力适合于工作的人为保证自己的生存而工作，这样，我们就会消灭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的唯一的基础。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

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

马克思：《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一八七一年九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272页。

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
选集》第3卷第199页。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拚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韧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〇
年四月——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81页。

在由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的任何过渡中，由于两个主要原因，或者说在两个主要方向上，必须有专政。第一，不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便不能战胜和铲除资本主义，因为不能一下子就把这些剥削者的财产，把他们在组织上和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期间，他们必然企图推翻他们所仇视的贫民政权。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会主义革命，即令不发生对外战争，也决不会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国内战争造成的经济破坏比对外战争造成的更大，国内战争中会发生千百万起动摇和倒戈事件，会造成方向极不明确、力量极不平衡的混乱状态。旧社会中的各种坏分子，数量当然非常之多，大半都是与小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因为一切战争和一切危机，首先使小资产阶级破产，首先摧残他们），这些人，在这种大转变的时候，自然不能不“露头角”。而这些坏分子“露头角”就不能不使犯罪行

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及各种坏事增多。要消除这种现象，就必须花费时间，**必须有铁的手腕**。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表现其除恶灭害决心，把盗贼就地枪决的。从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群众努力地无情地镇压坏分子的那种革命热忱，未能长久坚持下去。当时群众革命热忱之所以这样不能持久，其社会原因、即阶级原因，就是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强大，而又**唯有**它（如果它已经有充分的数量，充分的觉悟和充分的纪律）才能把**大多数**被剥削劳动者（如果更简单更通俗些说，就是大多数贫民）吸引过来，才能掌握政权在一个足够长的时期内来彻底镇压一切剥削者和一切坏分子。

历次革命中这个有历史意义的经验，这个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经济的和政治的——教训，马克思把它总结了，给了一个简单、严格、准确、明显的公式：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16—517页。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部。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们反抗的劲头正由于他们的失败而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与他们在人口总数里所占的人数相比，要大得不可计量。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末情形也就只能这样。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92页。

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是在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也许这个时期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对于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需要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才能抵制这种恶劣影响，才能使无产阶级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这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

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化活动制造着为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恶果。谁要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哪怕是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201页

是的，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死尸抬出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人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工、农和红军代表苏维埃，工会联席会议》（一九一八年六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407页。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象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不同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象一切权**

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2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252页。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1页。

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九一七年八——九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56页。

虽然杜林先生给每个人以“等量消费”的权利，但是他不能强迫任何人这样做。相反地，他感到骄傲的是，在他的世界中，每个人都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金钱。因此，他无法阻止下面这样的事情发生：一些人积蓄起一小部分钱财，而另一些人靠所得的工资不够维持生活。他甚至使这种事情成为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明确地承认家庭的共同财产的继承权，从而就进一步产生父母养育儿女的义务。但是这样一来，等量消费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裂缝。独身者用他每天八马克或十二马克的工资可以过得舒适而愉快，可是家有八个未成年小孩的鳏夫用这么多工资却只能勉强度日。但是另一方面，公社不加任何考虑地接受金钱的支付，于是就提供一种可能，不通过自己的劳动而通过其他途径去获得这些金钱。没有臭味。公社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样就造成了一切的条件，使以前只起劳动券作用的金属货币开始执行真正的货币职能了。现在，出现了一方面贮藏货币而另一方面产生债务的机会和动机。货币需要者向货币贮藏者借债。借得的货币被公社用来支付生活资料，从而又成为目前社会中那样的货币，即人的劳动的社会体现、劳动的真实尺度、一般的流通手段。世界上的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对它都无能为力，就象对乘法表或水的化学组成无能为力一样。因为货币贮藏者能够迫使货币需要者支付利息，所以高利贷也和这种执行货币职能的金属货币一起恢复起来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2—343页

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末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

恩格斯：《反杜林论》（一八七六年九月——一八七八年六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350页

什么是周转自由呢？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就是说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周转自由和贸易自由，这就是指各个小业主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我们所有的人，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初步原理的，都知道这种周转和贸易自由不可避免地要使商品生产者分化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分化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这就是说，重新恢复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这种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在全世界都正是从商品农业经济中生长起来的。我们在理论上很了解这一点，而在俄国，凡留心观察小农的生活和经营条件的人，都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列宁：《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一九二一年三月），《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6页。

资产阶级是产生于商品生产的；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一个农民家里有几百普特的余粮，不肯贷给工人国家救济挨饿的工人，而要拿去做投机生意，——这是什么呢？这不是资产阶级吗？资产阶级不正是从这里产生的吗？

列宁：《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全集》第30卷第206页。

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

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一九一八年四月），《列宁全集》第27卷第275页。

非常熟悉经济情况的李可夫同志对我们说，我国现在存在着新的资产阶级。这是真的。它不仅从我们苏维埃的职员中间（从这里也能产生极少的一部分）产生出来，而且更多地从那些摆脱了资本主义银行的桎梏、目前因铁路不通而处于隔绝状态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产生出来。这是事实。你们想用什么方法来回避这一事实呢？你们只能沉溺在自己的幻想中，或是把不周密的书本知识当做复杂得多的现实。现实向我们证明，甚至在俄国，也同任何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活着，起着作用，发展着，产生着资产阶级。

列宁：《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162页。

在苏维埃的工程师当中，在苏维埃的教员当中，在苏维埃工厂内享受特权的、即最熟练、待遇最好的工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所固有的一切坏处都在不断地复活着，我们只有用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再接再厉的、坚持不懈的、长期的、顽强的斗争，才能逐渐地战胜这种祸害。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九二O年四——五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267页。

工人和旧社会之间从来没有一道万里长城。工人还保存着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的传统心理。工人在建设新社会，但他还没有变成清除掉旧世界的污泥的新人，他还站在旧世界的污泥里面。只能幻想把这种污泥清除掉。如果以为这可以马上办到，那就是愚蠢透顶的空想，就是在实践上把社会主义世界移到半空中去的空想。

不，我们不是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我们是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壤上建设的，我们要同劳动者身上也有的、经常拖无产阶级后腿的一切弱点和缺陷进行斗争。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403页。

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代表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管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代表实际参加管理工作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逐渐与各人民委员部合并成了一个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工作,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其形式愈多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多的经验来检查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除做八小时"份内的"生产工作外,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过渡到这个制度,是特别困难的,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起来。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525页。

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我们也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只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列宁:《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一九一九年十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机会主义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工人运动中的上层分子的机会主义,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事实证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

列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一九二O年七——八月),《列宁全集》第31卷第203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如果不解决这个任务,那也就是说,还没有社会主义。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九一八年三——四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列宁：《伟大的创举》（一九一九年六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共产主义的东西”只是在出现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时候才开始产生的，这种劳动是个人为社会进行的、规模巨大的、无报酬的、没有任何当局即任何国家规定定额的劳动。这不是农村中常见的邻舍间的帮忙，而是为了全国需要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起来的、无报酬的劳动。因此，不仅把“共产主义”这个词用做党的名称，而且把它专门用来指我们生活中真正实现着共产主义的那些经济现象，是会更正确一些的。要说在俄国现在的制度中也有某种共产主义的东西，那就是星期六义务劳动，其他都不过是为反对资本主义和巩固社会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社会主义只有完全取得胜利以后，才会生长出共产主义，生长出我们从星期六义务劳动中看到的那种不是书本上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的共产主义。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143页。

我们一定要坚决地把我们已经开始的进行了两年的革命进行到底。（鼓掌）这个革命是一定可以实现的，只要我们使政权转到新阶级的手里，只要我们在整个国家管理方面、整个国家建设方面、整个新生活的领导方面，从上到下完全由新阶级来代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奴隶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切有产者。

列宁：《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一九年一月），《列宁全集》第28卷第398页。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一八七五年四月——五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二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我也希望除听讲以外，你们还花些时间，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要著作至少阅读几本。毫无疑问，你们在参考书目中以及你们图书馆里供苏维埃学校和党校学员用的参考书中，一定能找到这些主要著作。不过起初也许有人会因为难懂而感到害怕，所以要再次提醒你们不要因此懊丧，第一次阅读时不明白的地方，下次再读的时候，或者后来从另一方面来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会明白的，因为，我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极其复杂而又被资产阶级的学者和作家弄得混乱不堪的问题，每个想认真思考和独立领会这个问题的人，都必须再三研究，反复探讨，从各方面思考，才能获得明白透彻的了解。你们反复探讨这个问题的机会很多，因为这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不仅在我们现时所处的这样一个革命风暴时期，就是在最平静的时期，你们也会每天在任何一份报纸上涉及任何一个经济问题或政治问题的材料中碰到这个问题：什么是国家，国家的实质怎样，国家的意义怎样，我们这个为推翻资本主义而斗争的党即共产党对国家的态度怎样。

列宁：《论国家》（一九一九年七月），《列宁选集》第4卷第41—42页。

（原载1975年2月22日《人民日报》）

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讲学习的部分）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

下面我说一点意见。都已经差不多了。我看了简报，大家讨论也差不多了。我还是说一些关于学习的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主席对这次学习抓得很紧。语录中特别选了马克思的一段话："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我们在选这段语录的时候觉得，除了上面这句话以外，马克思的这段话本来用不着选入了，就是为了这一句。因为那段话当中，别的意思在其它选入的语录中已经有了，比如要把生产资料转为劳动者所有，以消灭现存的压迫条件等等，别的地方已经说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这句话，我们特别要选入。因为在讨论中同志们说，以前光想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是国内反动派和国外的敌人。当然，这两条是主要的。主席说，中国资产阶级难于造反，就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帝国主义现在不敢动手，也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所以，把我们军队的工作搞好，这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最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要动摇。而过去我们部队在任何运动里面，都是走在前面的。马克思也说过，过去新的生产方式，许多新事物，都是从军队里面出现的。不管地主阶级的武装，或者资产阶级的武装，不是讲儒法斗争

史吗？奴隶社会新兴地主阶级要建立自己的武装、军队，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我们中国今天有强大的无产阶级的武装。因为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办法夺取政权。我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是在什么条件下改造的呢？是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政权以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产生，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才能出现。这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面不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道理一样。今天我不讲社会发展史，同志们可以翻一翻《国家的起源》一书。从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没得出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不能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非要夺取政权，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我们打碎了蒋介石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所有制的改造。这里我为什么要多说几句呀？因为就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这个问题讲清楚。其实，这个问题，主席曾多次发表过指示。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军队的学习，过去走在前面，我们军队工作非常重要，现在这次学习，我希望还走在前面。按学习的条件，比工厂、农村都好。工厂，八个小时，机器开动，工人就要管机器。而我们的时间安排就容易得多。其实，现在也不需要很多很多的时间，不用占训练和其它工作的时间。我觉得还是屁股坐得住坐不住的问题。认真读书不要搞很多时间。还是主席说的，"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现在有的人把那股劲用在打扑克和跳舞上了。现在我觉得这股劲要用在多花时间学习。我们主席这样高龄，《参考资料》两大本，天天都要读，文件批得很多。

下面我把主席关于学习问题的几次指示念给同志们听。一个是《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中的。主席在五九年庐山会议上讲的这段话，曾印过多次，不知道同志们记得记不得。主席写于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庐山会议时印发了，会议以后各地作了传达，在批陈整风、批林整风中都印了。主席要我们重视学习理论。主席说："各位同志：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书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延安整风当中，主要批教条主义。全国解放以后，也批了教条主义，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接着，主席说："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主席把经验主义的问题提出来了。主席说："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下面一段话很重要。主席说："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思想上正确与错误，决定于理论，理论主要是讲思想问题。比如，对唯心论和唯物论搞不懂、分不清，林彪一说天才，大家就跟着说天才。主席指示以后，确实读了一阵，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也办了一些读书班。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志当时怎么样。后来，克服经验主义的问题克服得好一点吧，那一阵有些效果，后来林彪也犯经验主义，因为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林彪搞经验主义，不学习理论，说是自己有经验，可以上升为理论。他不但反对学习马列，也反对学习主席著作，说学习主席著作是"捷径"。林彪高举是假的。五九年以后，对主席这段话，他再也不说了。主席当时是作为主要危险提出来的，林彪不传达学习。据我看，主席的话现在仍然有效。不重视

理论学习问题，我这个军区，就让政治部搞一个班子，学习以后，写一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一登，理论工作就算有成绩了，而不是感到，我们在革命工作中，必须学习；不学习就不行。是不是有这个问题？不是非常重视的。这方面，我不想多发挥。主席多次地讲，要学习理论的问题。庐山会议以后，七O年又学了一阵。"九·一三"以后，又学了。但已经变成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主席说，首先是中央委员，以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干部。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很感动人的。群众中传达主席的指示比较晚，北京、上海的工人传达得早一些，我们也传达得早，他们学习认真，动脑筋，联系实际问题学习马列。我觉得，学习问题，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你说学习了，但没有用，主要是领导干部不是抓得很紧。现在，我们要以主席的指示当作纲，联系我们部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这些问题摆在面前，要解决。这些问题解决得好，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但能够纠正一些错误，而且还会有新的前进和进步。如果不好好学习，再往前进，阻力会相当大。

这里我再读一段，为了证明，主席说了多次，就是不听，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也是传达到支部、向党外群众念了的主席的指示，林彪一伙是不会执行的。后来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几乎把主席的指示忘了。主席说："我们几个老同志，在工厂里头看了一个时期，希望你们以后有机会，还得下去看，还得去研究各个工厂里的问题。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修改宪法的报告里面不是说了这句话吗？这是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的，不是我的发明。在讨论那个报告的时候，提出说那句话的范围要限制一下，说"一小部分"，我说，不改。主席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这是主席在六九年讲的。接着，主席讲："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这是主席在六九年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问题，有一阵又恢复了，主席的话讲了，没有作用，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奖金，等等，七一年、七二年都有。不要以为主席说过了，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它有它的基础，到处都有。如果理论上不搞清楚，以为这些都是好的，正如主席所说的，分不清楚，他就跟着刘少奇那条路线走。

我还给同志们念一段，主席讲要谨慎小心。主席说："大家要谨慎小心，……不要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忘乎所以，从马克思以来，从来不讲什么计较功劳大小。你是共产党员，是整个人民群众中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是无产阶级里面比较更觉悟的一部分人。所以，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赞成那样的口号：'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这个口号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立的，你看我们过去死了多少人，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些老同志，是幸存者，偶然存在下来的。……经过战争有很大的牺牲，老人存下的就不多了，那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个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这些地方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主席的这些话，当时林彪是不会去传播的，但印了中央文件。许多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话主席早就说过了。我看了武汉的一些材料，很感动人。他们说，进城的时候，看到地毯，觉得脚踩上去很可惜。可是后来变了，如果看到房里没有地

毯就要，说明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我觉得这里不是有没有地毯的问题，而是我们在生活上、思想感情上是否脱离了群众。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是一些退休的老同志、回忆革命战争时期的生活，深有感慨。他们回忆打土豪时，搞到了一匹布，首先不是想到自己，而是想到我这个连队那个战士衣服破了，应该给他做衣服，现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有了变化。

我念主席的这几段话的意思，是为了说明，主席的指示不是今天才偶然提出来的，而是多年来主席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是主席一九五八年在北戴河会议上讲的。主席还有很多有关这方面的指示，希望同志们回去翻一下，我们还准备选编一些主席的语录，不知道主席同意不同意发。

对马列主义的主要著作，从理论上真正弄通弄懂，我们是有条件的。绝大多数同志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对马列的指示，不是处于对立状态。有的人很难说，对马列的指示，他都同意，不见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违背了主席说的党员一部分，工人一部分，他们不会接受马列主义的指示的。我觉得不下决心好好地学，搞一阵子是可以的，甚至于你可以把主席的话都背下来了，但没有真正理解、懂得。那样学下去，除了领导干部学不好，而且也没有办法领导下面的学习。下面会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我看到中国人民银行，他们在学习中钻的问题比较深，他们研究银行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作用，他们仔细研究了，在经济领域中，银行怎样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那些地方没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银行是主要的环节。当然，有些问题究竟怎样办，以后还要研究。比如对公社的流动资金，他们管起来行不行？他们研究列宁当时是怎样做的。你不很好学习，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你就不懂得呀，对他们提出的正确意见，可能一下子给否定了；或者他们提出的意见是错误的，我们支持了。因为，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我觉得我们有这样多老同志、有很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学习理论，并且能反对现状作比较系统的调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主席的指示能够加深理解。其它问题比较好解决。有些问题在学习中就能够解决。有些问题，要等到将来逐步解决。当然，象新生的资产阶级问题，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增长的问题，也象毒草一样，你年年除，它年年长，不可能一下子解决问题。

我个人还有个意见。四届人大提出了一个很宏伟的目标，在本世纪内，也就是本世纪末，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但是，如果我们把理论问题搞不清楚，就会重复斯大林的错误。当时他们有几千万吨钢，粮食没有我们这么多，他们是卫星上天，斯大林的旗帜落地。我们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国家，修正主义几次上台，都垮了。如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他们都完蛋了。如果我们学习得好，政策正确，主席的路线被我们充分理解、那么，我们的国家就非常有希望。这一点，我们非常有信心。

我就说这一点。其它的具体意见、用不着多说，因为你们已经解决了。不对的，你们可能反驳，我们商量商量。

〔附〕 “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一九七五年春天，正当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把反修防修伟大斗争推向前进的时候，王张江姚“四人帮”兴风作浪，掀起了一股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逆流。

“四人帮”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势，大反什么“经验主义”，这是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推行“打倒一切”、“三箭齐发”一类黑货的继续，是他们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精心策划的又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他八十一岁诞辰的日子里，想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彻夜未眠，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光辉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过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特别告诫全党：**“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又一次阐明了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危险，阐明了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它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王张江姚“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的种种表现，毛主席早已觉察，一九七四年就多次揭露和批判了他们，警告他们要悬崖勒马。但是，“四人帮”不仅毫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四届人大前夕，他们甚至狂妄地要“组阁”，取代敬爱的周总理。毛主席正是在击破了他们的“组阁”阴谋的情况下，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的。

接过革命的口号，篡改斗争的方向，是“四人帮”惯用的反革命伎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是这样干的；在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们又是这样干的。学习运动开始不久，他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很快就扯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黑旗，继续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四人帮”演出的这场反“经验主义”丑剧一开场，狗头军师张春桥就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赤膊上阵，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并要按照这个“纲”来“联系实际”，解决全党全军存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煽风点火，反动文痞姚文元又指使《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公开叫嚣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社论发表的当天，姚文元就急急忙忙向新华社发出指令说：“社论说到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你们要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效果好。”他们炮制的《红旗》杂志短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也出笼了，短评耸人听闻地大谈“经验主义的危害性”。一心想当女皇的大野心家江青，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更是忙得象疯了一样，到处送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材料，扯破嗓门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使出浑

身解数来蛊惑人心。

在"四人帮"操纵下，反"经验主义"的鼓噪一阵紧似一阵。一时间，这类文章和新闻报道塞进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有的甚至整个头版的篇幅都在大反"经验主义"。反"经验主义"的专栏也在有的报上出现了。许多报道的脑袋上顶着反"经验主义"的醒目标题，有时甚至是通栏大字。反"经验主义"的典型也炮制了出来，其中"四人帮"在上海一个工厂里搞的一个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就被他们当成宝贝到处招摇。他们还指使有的地方召开什么经验交流大会，为反对"经验主义"大造反革命声势。

"四人帮"祭起反"经验主义"的妖风，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要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当时，在他们的煽动下，有的地方果然开始揪"经验主义分子"了，有的领导干部被迫检查"经验主义错误"。不过，"四人帮"知道，他们大反"经验主义"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的。不把反"经验主义"的黑货塞进某种正式文件，不假中央之名，他们是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反"经验主义"的浪潮的。于是，他们又继续玩弄新的阴谋。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写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报道意见。这个文件因为没有提什么反"经验主义"，姚文元把它一压就是一个多月，没有下文。到三月底，反"经验主义"的反革命舆论已经造成一定声势的时候，姚文元忽然要新华社修改那个文件了。怎样改法？那就是按他的要求把反"经验主义"写进去。这个反动文痞满怀鬼胎地把这个文件送给毛主席批阅，妄想通过这种办法制造一个反"经验主义"的正式文件，用以令行全国，大干一场。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时地察觉了"四人帮"的这个阴谋。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就在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这个文件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一伙的假马列主义政治骗子的反动面目，以及他们大搞修正主义、大搞阴谋诡计的反动实质。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照出了"四人帮"的原形，这些家伙可慌了手脚。此时此刻，他们实在狼狈得很哪！连平时装出来的那副宣传、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假面具也顾不上带了，耍尽了阴谋要把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封锁起来。新华社得知毛主席有批示后一再要求进行传达，姚文元怎么也不批准，连只传达批示的前半部分也不批准。不准向新华社的干部传达毛主席对新华社请示报告的批示，总该讲出个理由来吧？可是这个平时摇唇鼓舌的姚文元，这回被将住了军，结结巴巴什么道理也讲不出来。不过，他还有点小聪明。他搬出了那个窃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硬要新华社就传达问题再写报告"请示"王洪文。这等于一个人把球从左手转到右手，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果然，王洪文装模作样地批了个"暂不传达"，姚文元立即附和了一个"同意暂不传达"。他们就是这样一唱一和地演了一出拙劣透顶的双簧戏。

不准传达，这反映了他们这帮反革命公然对抗毛主席的狰狞面目，也暴露了他们的虚弱本质。他们对待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如临大敌，不但不许传达一句原文，甚至不准人提及毛主席曾有过这样一个批示。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华社凡是在有关文件、材料上提到毛主席这一批示时，那怕只是几个字，他们也统统砍光；有人谈到毛主席这一批示，他们就兴师问罪，诬蔑为"传播政治谣言"。真是反动透顶。

"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遭到毛主席批判后，姚文元一肚子不满，曾嘟嘟囔囔地说："这仅仅是一个提法问题，问题就那么大嘛！"事情果真如此吗？不，这里掩盖着"四人帮"背叛马克思

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害问题，掩盖着他们背叛党的九大、十大所规定的基本路线的极右派本相，掩盖着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大阴谋。

让我们看看"四人帮"在反"经验主义"丑剧中抛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吧。在这些说法的背后，不难看出他们那一套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

第一，他们说我国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反对"经验主义"是解决各种问题的"纲"。在一九七五年春天，中国出现了经验主义这个危险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臆造！谁都知道，毛主席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就一直反复强调指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正是为了反修防修。而姚文元却造谣说，毛主席十几年来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姚文元之流当然不是健忘，而是居心险恶的无耻篡改。他们就是妄图借此反掉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为他们篡权复辟制造舆论根据。

第二，他们故意混淆经验和经验主义的区别，妄图制造罪名，把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他们喋喋不休地叫嚷反对"经验主义"的用意何在呢？"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了一句画龙点睛的"帮话"："老家伙都是经验主义"！这真是一句绝妙的自供。在他们看来，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不但不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反而成了罪过；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他们恶狠狠地称之为"老家伙"的、统统成了"罪人"，非一棍子打死不可。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的需要，极端仇视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极端仇视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切切实实干革命的各级领导干部。大野心家江青就蛊惑人心地叫嚷要"对经验主义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帮凶"、"大敌"，"必须打倒"。他们这样恶狠狠地咒骂，目的就是要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特别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心腹在阴暗的角落里大放厥词的时候，就毫不掩饰地说，周总理"是经验主义代表"。这句"帮话"在道破"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罪恶用心方面，是何等"坦率"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四·二三批示"一下子就批到了"四人帮"的要害，剥下了他们的假面具。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让这块他们自己搬起的石头砸在自己的脚上。他们随时准备反扑。果然，到一九七六年三月，江青在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大翻其案，叫嚷"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直到"四人帮"覆灭的前夕，江青还留到一些单位继续送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材料，并且指令"梁效"继续炮制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真可谓死到临头不回头。

从"四人帮"上演的反"经验主义"丑剧以及其它类似的丑剧可以看出，他们谈论"经验主义"也好，谈论"民主派"或其他什么也好，统统都是为篡党夺权服务的。他们明明是在搞阴谋诡计，却硬把自己打扮成"理论权威"。其实，他们根本不懂也不愿意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不过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要制造特定的舆论，就臆造出特定的"理论"。他们的"理论"，同革命的辩证唯物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火不相容，只是他们用来打倒一切、用来篡党夺权，用来杀人的武器。这就是他们大反"经验主义"的反动实质。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砸烂"四人帮"，彻底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黑货和其他种种黑货，也连同他们自己一起统统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无情地作出了结论。

（新华社北京1977年3月2日电）

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

（一九七五年三月）

姚 文 元

毛主席在讲到必须搞清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时明确地指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这就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林彪一类"的阶级本质是什么？林彪反党集团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对于坚定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一步一步地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同一切修正主义者和修正主义思潮一样，林彪及其修正主义路线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林彪及其死党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是极其孤立的，但产生出这一伙极端孤立的"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人物，却有它深刻的社会阶级基础。

林彪反党集团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表了被打倒的反动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愿望，这一点、是比较清楚的。林彪反党集团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咒骂为"当代的秦始皇"。他们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即在政治上经济上变无产阶级专政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制度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我们看到了林彪在政治上、思想上破产以后，怎样象一个亡命的赌徒一样想把无产阶级"吃掉"，孤注一掷，直到叛国投敌，毛主席、党中央非常耐心的教育、等待、挽救也丝毫不能改变他的反革命本性。这都反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这种斗争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期。只要还存在被打倒的反动阶级，党内（以及社会上）就有可能出现把复辟愿望变为复辟行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此，要提高警惕，要警觉和粉碎国内外反动派的种种阴谋，切不可麻痹大意。但是，这样认识还不是事物的全部。林彪反党集团不但代表了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他们身上具有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某些特点，他们当中若干人本身就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某些口号适应和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和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正是这后一个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分析。

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反党集团中的某些人物就是这种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代表。其中如林立果及其小"舰队"，就完全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

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

列宁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的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这就决定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列宁和毛主席的分析都告诉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分配和交换方面不可避免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应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以便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缩小等级差别，逐步创造消灭这种差别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条件。如果不是这样，相反地，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盗窃行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到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完全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工人同志说得好："你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就要限制社会主义的发展，助长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全盘改变社会主义所有制，公开地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林彪反党集团如何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如何穷奢极欲地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何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为自己干种种见不得人的阴险丑恶的勾当，人们已揭发批判了很多。但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这个计划中，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者说，这个计划中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除了老的资产阶级之外，正是一部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少数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发展资本主义的人。因而它攻击的矛头便对准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它特别仇恨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通过社会主义革命对资产阶级法权进行的某些限制。

对于机关干部参加五·七干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失业"；精简机构，接近群众，被他们攻击为打击干部。他们认为干部应当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所以一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变成"失业"。这是挑动机关工作人员中一部分想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做官当老爷、有严重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人，反对党的路线，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对于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上山下乡，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等于变相劳改"。一批又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青年生气勃勃地奔赴农村，这是对缩小三大差别、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深远意义的伟大事业，一切革命的人们都热情赞扬它，而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特别是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束缚的人则反对它。能不能坚持知识青年同工农结合，直接联系到大学教育革命能不能坚持走上海机床厂道路，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林彪反党集团对此特别仇恨，不但表现了他们同劳动人民的对立，而且也暴露了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法权向党进攻，妄图煽动一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他们的纲领是扩大城市同农村之间、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把知识青年变成新的贵族阶层，想以此来争取某些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对他们反革命政变的支持。

对于工人阶级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批判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林彪反党集团诬蔑为"变相受剥削"。林彪是"物质刺激"狂热的鼓吹者，他在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物质刺激还是必要的"、"唯物主义 物质刺激"、"诱：以官，禄，德"之类的修正主义黑话。林彪反党集团的一个主要成员也在黑笔记中写道："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是发展生产的"决定动力"。他们表面上是主张用钞票去"刺激"工人，实际上是想无限止地扩大工人的等级差别，在工人阶级中培养和收买一小部分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也背叛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阶层，分裂工人阶级的团结。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腐蚀工人，又妄图把工人阶级中一小部分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作为支持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之一。林彪一伙"特别"注意用"工资"来引诱"青年工人"，所谓"诱：以官，禄，德"就是他们的阴谋诡计，这从反面告诉我们，青年工人特别是当了干部的青年工人，必须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和各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捧场，要保持和发扬共产主义的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要努力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武装自己，切不可被商品、货币交换、庸俗的捧场、阿谀奉承、宗派主义之类的花花世界弄昏了头脑，以致上了林彪一类政治骗子或社会上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当。他们以"关心"为名，实则"刺激"青年工人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政治上的"教唆犯"。缺少经验的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前面违法乱纪，老奸巨猾的老资产阶级分子躲在后面出谋划策，这是今天社会阶级斗争中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处理被腐蚀的青少年罪犯时特别着重打击幕后教唆犯，这个方针要坚持下去。在现实斗争中已经涌现出了一批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斗争的青年工人，应当支持他们，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

林彪反党集团还诬蔑农民"缺吃少穿"，诬蔑部队干部"生活水平下降"，诬蔑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资产阶级那种敢想、敢说、敢闯、敢做、敢革命的精神是"被利用"……这一切，无不是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群众路线、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诬蔑农民"缺吃少穿"，其目的是煽动农民搞"吃光分光"，瓦解和取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果照这条路线去做，其结果，是少数人上升为新资产阶级，绝大多数人受资本主义剥削，这是地主、富农和农村中一部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富裕中农所盼望的那样一种局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

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林彪一类人物则是他们的政治代表。林彪反党集团在《"571 工程"纪要》中提出的这些纲领，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们自封为"超天才"的头脑中所固有的，而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确切地说，从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出发，他们反映了只占人口百分之几的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要求，反映了少数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想利用资产阶级法权上升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要求，而反对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人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要求。他们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然而他们本身反革命思想的形成却必须用唯物论的反映论来说明。

为什么林彪一类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呢？就因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为了逐步减少这种土壤和条件，直到最后消灭它，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经过好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才能完成的任务。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八月至九月巡视各地的谈话中说过："**我们唱了五十年国际歌了，我们党有人搞了十次分裂。我看还可能搞十次、二十次、三十次，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也不行，也是站不住的。**"列宁说过："**是的，我们推翻了地主和资产阶级，扫清了道路，但是我们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大厦。旧的一代被清除了，而在这块土壤上还会不断产生新的一代，因为这块土壤过去产生过、现在还在产生许许多多资产者。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可见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产生新的一代资产者的根源。**"列宁说的是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毛主席说的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党内而形成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我们必须经过这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战胜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行动，才能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而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代要完成的伟大事业。

由于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资产阶级法权存在而产生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般都具有两面派和暴发户的政治特点。为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资本主义活动，他们总是要打着某种社会主义的招牌；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恨不得一下子把属于全国人民所有或集体所有的财富吞下肚子里去，化为私有制。林彪反党集团即具有这种政治特点。"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这是《红楼梦》刻画"应酬权变"而又野蛮毒辣的孙绍祖的两句诗，用来移赠林彪反党集团，是颇为适合的。当林彪在"得志"即掌握一部分政治经济大权之前，他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段欺骗党、欺骗群众，并利用群众运动的力量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为此他可以打出革命

的招牌或喊出革命的口号，同时又加以歪曲。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写的一封信中分析林彪一伙的内心世界时指出：**“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是很能说明这种现象的。“借助”，就是敲门砖，等到他们的目的达到之后，便不要这个“借助”，而要反过头来恶狠狠地搞掉这个“借助”了。反革命两面派也好，打着红旗反红旗也好，“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也好，或者用林彪反党集团自己招供的话，”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也好，都是同一类做法的不同说法。等到林彪反党集团如他们自己刻画的那样，自以为“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时，他们就要猖狂起来了。他们在自己把持、控制的单位、部门，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林彪反党集团私有制，他们暴露出越来越露骨的政治野心、这种野心会随着他们“得志”的程度而膨胀，正同资产阶级的贪欲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发展一样，永不会有止境。马克思分析资产阶级时说过：**“当作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便是资本的灵魂。”**林彪作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的灵魂也只是已被打倒而梦想复辟以及正在产生而妄想统治的老的和新的资产阶级的灵魂。从阶级分析出发，林彪一伙那些倒行逆施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根源便很清楚了：他们鼓吹孔孟之道，他们背叛党、背叛中国人民而投靠社会帝国主义，正是尊孔卖国的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干过的勾当，而他们狂热地策划反革命政变，也不过重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使用过无数次并至今还在使用的手段罢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逐步地削弱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产生的土壤；另一方面，当林彪一类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或正在产生的时候能及时地识别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就在这里。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不可能完成上述两个方面的任务；而且当修正主义思潮出来时还会由于自己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或分辨不清而上当受骗，甚至糊里糊涂地上了贼船。不然，为什么一条修正主义路线出来会有人跟着走呢？为什么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可以用唯心论加起哄来骗人呢？为什么林彪反党集团那些赤裸裸的分裂党、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话会在少数干部中找到市场呢？为什么大、小“舰队”可以明目张胆地把请客送礼、封官许愿之类作为拉山头、搞宗派、耍阴谋的手段呢？为什么他们在黑笔记中要把“用技术掩盖政治”之类作为自己反革命活动的策略呢？这当中有深刻的教训。一九五九年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时，毛主席曾经指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因此要认真读书，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这个意见，毛主席强调党的高中级干部首先是中央委员，**“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又再次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最近讲无产阶级专政时又再一次强调了这一条。这些语重心长的谆谆教导，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把这件事当作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来抓，对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关论述和主要著作，首先要自己学好，搞清楚，力求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说明问题，力求从思想和行动上打掉那些脱离群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促进派，善于分辨和敢于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我们党几十年来形成的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一定要发扬和继承下去。要了解情况，研究政策，包括经济政策。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行之有效，必须坚持。要注意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准确而有力地打击极少数坏人，对群众中的资本主义影响，要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主要采取学习和提高觉悟的方法，支持坚决抵制资本主义的先进事物的方法，回忆对比的方法，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批判资本主义倾向要形成舆论，争取多数，启发自觉，积

极引导。对个别陷在资本主义泥坑里很深的人，要向他猛喝一声："同志，赶快回头！"

我们在文章开头时曾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为了分析它产生的阶级根源，我们指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在讲了这一面之后，我们还必须指出：林彪反党集团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而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二十五年以来的历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坚持毛主席给我们规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我们就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反抗，一步一步地减少这些痕迹，不断夺取新的胜利。我们今天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内部四分五裂、内外交困，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一次毛主席提出的理论问题，必将从理论和实践上使我们进一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的方法，大大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中国的共产党人是有信心的，中国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是有信心的，他们正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意气风发地投入反修防修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是革命人民经过曲折斗争走向胜利的历史，也是反动派经过反复较量走向灭亡的历史。正如毛主席总结的那样："**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让我们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和道路奋勇前进吧！

（原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3期）

〔附〕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都是篡党夺权的阴谋家野心家

——姚文元的反党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反革命吹鼓手姚文元抛出了臭名昭著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这是一篇大毒草。它首先发难，篡改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指示，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妄图把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负责干部统统当作经验主义者打

倒，以实现“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野心。对这篇大毒草，必须彻底批判。

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罪行的怒潮，正在汹涌澎湃地向前发展。大量事实证明，“四人帮”同林彪完全是一丘之貉。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同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继续。毛主席指出的“林彪一类”就包括“四人帮”，“四人帮”就属于“林彪一类”。把“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串起来深入揭批，对于进一步揭露和认清“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很有好处。多年来，王张江姚“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反林”的英雄、“批林”的好汉，现在，是彻底剥掉他们的画皮，还其“假革命的反革命”的真面目的时候了。

有比较才能鉴别。言行对照就是一种比较，它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好办法。反革命修正主义者惯用的手法，是以革命词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只要把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篇反党文章中的一些革命词句和“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稍加对照，这些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的真面目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篡党夺权“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

〔姚文〕：“作为力图复辟的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林彪反党集团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直到搞特务组织和策划反革命武装政变。”

这段话是揭发林彪的，实际上“四人帮”自己不就是这样的吗？“四人帮”正是同林彪一样，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

他们都疯狂地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当年，林彪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把设国家主席作为反党的政治纲领，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王张江姚“四人帮”也是想利用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组织他们的“内阁”，迫不及待地要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夺到手中。江青说什么某某人能当总理，某某人能当副总理，某某人能当副委员长，她把自己早就放在国家元首的地位，要当党的主席。“四人帮”还大量选拔培植亲信，阴谋篡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权。就在四届人大前夕，王洪文对其亲信下达黑指示，要准备把他们控制的中委都调上来，“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他们搞了一个部长备选对象名单，要把这些人安插到中央各部门。他们甚至背着中央政治局，私派王洪文到毛主席那里告阴状，诬蔑和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痛斥了王洪文对周总理的诬告。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及时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利用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的阴谋。

为了篡党夺权，他们都狂热吹嘘自己。林彪把自己吹成“活学活用”的“光辉典范”，“非凡的天才”，把法西斯分子林立果的一个“讲用报告”吹成是什么“第四个里程碑”。“四人帮”也突出宣扬他们自己。反党分子王洪文为了给自己树碑立传，要人把他在上海呆过的一个办公室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还组织人去“参观”，搞所谓“传统教育”。他狗胆包天地听着别人向他用英语狂呼“万岁”。他们竟然狂妄鼓吹什么“张春桥思想”，无耻地吹捧张春桥“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什么“第四个里程碑”。大野心家江青更是到处游说，自比则天武后，叫嚷“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为了篡党夺权，他们都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炮制《“571工程”纪要》，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四人帮”对毛主席也是极端仇恨。今年一月，周总理逝世以后，毛主席

亲自提议由华国锋同志代理总理，主持政治局工作。大野心家张春桥马上亲笔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用胡风式的恶毒语言，发泄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刻骨仇恨。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百般干扰和破坏对毛主席的治疗。每当轮到王洪文去毛主席那里值班守护时，他竟去钓鱼、打鸟，寻欢作乐。江青在毛主席病危期间，跑出去游山玩水，大吃大喝。她还不顾医生一再反对和警告，残酷折磨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又在保存毛主席遗体问题上，大搞阴谋诡计，妄图不让我国人民千秋万代瞻仰毛主席遗容。

为了篡党夺权，他们都疯狂策划反革命暴乱。林彪组织大小“舰队”，阴谋发动武装政变。“四人帮”搞宗派，结死党，私设秘密联络点，网罗党羽，培植亲信。他们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光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他们对解放军，又怕又恨，又拉又打，同时，千方百计篡夺对民兵的领导权，搞“第二武装”，妄图把民兵变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当“四人帮”行将灭亡的时候，他们的亲信还炮制反革命口号，滥发枪支弹药，组织暴乱武装，建立暴乱指挥所，制定行动方案，妄图负隅顽抗，作垂死挣扎，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从上面这些粗略的言行对照，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在篡党夺权问题上，都是达到了很疯狂的程度。他们的野心极为广大，阴谋由来已久，手段非常毒辣。他们这样干，到底是为了什么？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篡党夺权目的是“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姚文〕：“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林彪所谓‘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什么东西了。这就是在社会主义招牌下扩大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某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派别和集团，同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相勾结，‘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林彪反党集团要篡党夺权，目的是要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四人帮”之所以要疯狂地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也同样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他们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偷窃国家财产，过资产阶级糜烂腐朽的生活。

林彪是极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急先锋；“四人帮”这伙暴发户，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法权狂。早已蜕变成了工人贵族的反党分子王洪文，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他吃的是山珍海味，喝的是各地名酒，看的是西方黄色影片。去年，他在上海住了两个多月，大摆宴席，请客送礼，挥霍了国家两万三千多元。他非法占有了大量的照相机、电视机、录音机、手表，甚至连慈禧的一些老古董也搬到他家里，占为己有。张春桥嘴上高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可是他却依仗权势，把自己的女儿先是送进部队，接着又上了大学，还送到外国留学。张春桥为了掩人耳目，竟授意别人写材料证明其女儿参军、上大学都是符合条件的，不是走的“后门”。“四人帮”还授意设计一所造价达三千万元的“春园”别墅，里面要拥有四幢春夏秋冬四季装置的洋房，供王张江姚享乐。白骨精江青不但过着极其腐朽的生活，她还利用职权，从国家文物管理单位强行拿走古瓷器、古玩四百多件，字画、字帖一百多册，中外古书四千多册。“四人帮”口头上也叫喊要限制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资产阶级法权，其实他们是一伙残酷迫害身边工作人员的虐待狂，轻则训斥，重则处罚、关押，打成反革命。“四人帮”这伙“得

志更猖狂"的暴发户，完全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大恶霸。

叛徒林彪曾经著文肉麻地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并对他的死党说"要学蒋介石"；"四人帮"也是蒋介石的狂热吹鼓手。彼此彼此。四届人大前夕，正当江青要王洪文出来当委员长的时候，野心勃勃的王洪文就秘密放映了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等反动影片，他对蒋介石的举止穿戴，十分欣赏。原来王洪文要当的"委员长"，是以中国人民的死敌蒋介石为模特儿的。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曾发表反动文章《韩复榘》，把蒋介石装扮成抗日救国的"领袖"、叫嚷要把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在内的一切抗日武装"改造"成由蒋介石来统一指挥的"统一的国防军"，鼓吹向国民党反动派全面投降。当时名叫蓝苹的江青，在国民党反动派官办制片厂里拍过所谓"优秀国防影片"，蒋介石五十岁的时候，也是这个蓝苹，卖力地参加为蒋介石"购机祝寿"的演出，对蒋介石献媚表忠。

林彪是叛国投敌的卖国贼，他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甘愿做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一样，大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反革命吹鼓手姚文元，就利用他把持的舆论工具，横蛮地扼杀揭露和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重要文章。野心家江青里通外国、崇洋媚外，更是罪行累累。一九七二年，江青同一个外国特务作了长时间谈话，出卖了党和国家的大量重要机密。在一些外事活动中，江青一会儿要"比美"，一会儿又"尝宴"，奴颜婢膝，丑态百出。狗头军师张春桥早在一九三五年就发表反动文章，公开鼓吹与日本帝国主义"共存共荣"，充分暴露出他的汉奸卖国贼嘴脸。当他混入革命队伍，窃取高位之后，又利用职权大搞崇洋媚外活动。他借口"了解国际创作动态"，"艺术上和技术上有借鉴作用。"大批进口黄色影片，供"四人帮"取乐。今年五月，一次就批准进口影片五百五十部，耗费国家一千五百多万元。还是这个张春桥，大笔一挥，竟批准动用上百万美元，进口国内已经能够生产的电影摄影和录音设备。"四人帮"连钓鱼竿、扑克牌都从外国进口。对"四人帮"来说，真是月亮也是外国的圆。这不是十足的洋奴是什么?!

略摆以上事实，使我们更加懂得一个道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一旦得逞，那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上台，马列主义的党就要变为修正主义的党、法西斯党，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中国就要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被重新推入苦难的沉渊。"四人帮"的梦是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

"四人帮"同林彪一样，篡党夺权的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

〔姚文〕："林彪反党集团在全国人民中是很孤立的。……在本质上是很虚弱的，同一切反动派一样，不过是纸老虎。林彪反党集团的一切反革命活动，只不过记录了它的失败和困境，而不是记录它的胜利。"

这段文字，恰恰是"四人帮"的自我写照。

林彪反党集团极端虚弱，只能靠谣言和诡辩过日子；"四人帮"手中没有真理，同样求助于耍阴谋，搞诡计。毛主席对"四人帮"分裂党的宗派活动早有察觉，一再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同他们作了坚决的斗争。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照主席指示办"，背着毛主席，

仍然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疯狂地进行反党活动。反党分子张春桥还恶狠狠地对他的亲信说：“人家已经讲我们是‘四人帮’了”，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四人帮”还公然伪造毛主席的指示，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但是，谣言是不能持久的，华国锋同志戳穿了他们的伪造，揭露了“四人帮”说假话、造谣言的政治骗子的嘴脸。

林彪反党集团敌视群众，色厉内荏；“四人帮”心怀鬼胎，做贼心虚。大野心家江青到广州一个美术陶瓷厂游逛，把工人当作敌人一样，一进工厂，就责令地面设岗、房顶加哨，工人不准走动，不准说话，不准站起来，不准抬头看。她在榆林游泳，身上起了几个红点，硬说“海水有毒”，有人要害死她，逼着两个防化连给她化验海水成分。“九·一三”前夕，江青窜到青岛鬼混，臆造了一个所谓有人陷害她的反革命事件，受牵连的竟达二百多人，有的同志受审查三年之久。

林彪反党集团罪恶滔天，极为孤立；“四人帮”恶毒满盈，人心丧尽。广大群众对“四人帮”对祸国殃民的罪行，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对他们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张春桥、姚文元为了砍倒大庆红旗，一唱一和，一个恶毒攻击“铁人”王进喜是没有革命要求的“既得利益者”，一个百般压制对大庆的宣传，在张、姚的煽动下，刮起了一股攻击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工人阶级的黑风。但是，大庆工人阶级泰山压顶不弯腰，顶住了这股黑风。英雄的大寨贫下中农同反党分子江青展开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更加说明了“四人帮”极端虚弱，极为孤立。江青把她的照片，放得大大的，到处送人，但大寨人拒不陈列。江青在虎头山上挖了一个所谓防空壕，妄图在这里给自己树一个“流芳千古”的“功德碑”，但是大寨人不买她的账，为了修建养猪场，就把她那个防空壕彻底平毁。江青第二次窜到大寨，见到这一情况，气急败坏地说：你们就是不听我的话，就是听修正主义的话。郭凤莲同志斩钉截铁地回击说：“我们大寨从来是听毛主席的话的，是同修正主义作针锋相对斗争的！”驳得江青哑口无言。

林彪阴谋篡党夺权，落得个折戟沉沙，葬身荒漠。“四人帮”由于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不可能从林彪的下场吸取教训。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四人帮”从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错误地估计形势，大作复辟美梦。他们有的忙着照“标准像”，有的叫嚷“一定会出领袖”，有的授意写刘邦死后吕后专政的文章，有的抄录了“永立新天朝”、“江山图已到”的古诗。“四人帮”众口一词，发出变天复辟的嚎叫，真是紧锣密鼓，得意忘形。春雷一声震天响。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实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人心大快，万众欢腾。声讨“四人帮”滔天罪行的怒吼声，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四人帮”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现出了纸老虎的原形，终于没有逃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个历史规律。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林彪反党集团不过是一小撮，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极为孤立，无碍大局。林彪反党集团，不但没有也不可能挡住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奔腾前进，反而进一步激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周总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的这一深刻分析，完全适用于我们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历史性胜利，雄辩地证明：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是当之无愧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威力无穷，一切搞修正主义，搞

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阴谋家、野心家绝没有好下场！

（原载1976年12月4日《解放军报》）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经过铁路部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铁路的运输、生产和建设都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铁路运输当前仍然是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为了迅速改变这种状况，中央特作如下决定：

一、全国所有的铁路单位，都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方针，认真学好毛主席最近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弄清楚无产阶级为什么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落实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各项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并且帮助广大职工学好。要把这个学习同批林批孔紧密结合起来。认真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二、实行全国铁路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毛主席曾经指出：**"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跨越省区，贯通全国，各个环节紧密联系。铁路又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半军事性质。我们党对铁路工作的领导，历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铁路实行全面军事管制，对运输畅通起了重要保证作用。现在，中央重申：全国铁路必须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路运输必须由铁道部集中指挥，铁路职工必须由铁道部统一调配，铁路的政治工作和运输指挥工作必须统一起来。

成立铁道部党委，加强铁道部政治部。铁道部所属各铁路局、工程局、设计院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铁道部党委和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以铁道部党委领导为主。没有设铁路局的省、市、自治区内的铁路分局，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由铁路局党委和所在地的省、市、自治区党委双重领导，以铁路局党委领导为主。

铁道部所属各企业、事业单位的干部，由铁路部门的党委实行分级管理。这些单位领导干部的任免调动，由铁道部党委与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协商后负责办理。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其任免调动由铁道部党委报中央审批。

三、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加强对铁路工作的领导。改进铁路管理体制，地方的任务并没有减轻，大量工作还要地方党委去做。各铁路单位的政治运动和地区性的社会活动，仍由有关省、市、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各铁路单位的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省、市、自治区党委要继续抓紧抓好。对于当前极少数问题较多、严重影响全国铁路运输的单位，有关的

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采取有力措施，限期加以解决，不能再拖。要组织好铁路部门同当地厂矿企业和港口的协作配合，组织好装卸和短途运输，并在人力物力等方面给铁路以积极的支援。

铁路部门要更好地依靠地方党委，牢固树立**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搞好同沿线群众的关系。铁路部门的运输生产，要在保证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注意地方的利益，主动支援地方，积极承担地方的运输和生产协作任务。

四、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确保运输安全正点。要发动群众，首先把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等建立和健全起来。这些制度，是搞好铁路运输，搞好生产建设，保障国家财产和客货运输安全所必需。没有不行。有了不执行是不允许的。要坚持政治挂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加以改革。

所有铁路职工，都要做好本职工作，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一切行动听指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对在抓革命、促生产中表现好的职工和单位，要给予表扬。表现不好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于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和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应该及时调离，不宜拖延不决，妨害大局。对严重违法乱纪的要给予处分。

五、整顿铁路运输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铁路运输是否畅通，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和加强战备的全局。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妨碍正在进行指挥、调度和各种勤务的工作人员的正常工作。阻拦火车、中断运输、损坏列车和铁路设施，都是违法的，必须坚决制止。情节严重的，要严肃处理。对少数职工利用职权，内外勾结，搞资本主义的行为，必须坚决反对，严肃批判。要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制造事故、杀人抢劫、煽动停工停产、煽动哄抢物资、盗窃铁路器材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各地党委要认真掌握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充分发动群众，并组织当地驻军、公安机关和路社联防组织，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保障运输安全畅通。

中央号召，全国铁路职工要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坚持**“鞍钢宪法”**，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九七五年四月）

张　春　桥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号召全国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也正是为了使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搞马克思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经过二十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

建设，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欣欣向荣。当前，全国人民斗志昂扬，下定决心，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在这个过程中，以及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能不能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关系我国发展前途的头等大事。现实的阶级斗争也要求我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少数人搞清楚不行，一定“**要使全国知道**”。搞好这次学习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意义，怎样估计也不会过高。

早在一九二〇年，列宁根据领导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实践经验，尖锐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指出，这个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列宁反复地强调说，不对资产阶级实行长期的全面的专政，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列宁的这些话，特别是列宁自己加了着重号的那些话，已经为后来的实践所证实。新的资产阶级果然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这些人的出身一般都很好，几乎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在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又经过大学培养，成了所谓红色专家。但是，他们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新毒草，他们背叛了自己的阶级，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权力，复辟了资本主义，成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做了希特勒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在决心建设强大国家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应当清醒地看到，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因为不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念念不忘侵略和颠覆我们，不但老的地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且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正象列宁讲的那样每日每时地在**产生着**。有些同志说：列宁讲的是合作化以前的情况。这显然是不对的。列宁的话并没有过时。这些同志可以读一读毛主席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具体地分析了我国包括合作化在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十八年来的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为了加深对毛主席指示的理解，让我们看一看我国所有制变更的情况，看一看一九七三年各种经济成份在我国工、农、商业中的比重。

先说工业。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部工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九十七，工业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六。集体所有制工业占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三，人数的百分之

三十六点二，总产值的百分之十四。此外，还有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

再说农业。在农业生产资料中，耕地、排灌机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拖拉机、大牲畜的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集体所有的。全民所有制的比重很小。因此，全国的粮食和各种经济作物，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集体经济生产的。国营农场所占比重很小。此外，还保留着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

再说商业。国营商业占商品零售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五，集体所有制商业占百分之七点三，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

以上数字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在我国确实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不但全民所有制的优势有很大的增长，而且在人民公社经济中，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比重也有一些变化。以上海市郊区为例，一九七四年公社一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由上一年的百分之二十八点一，上升为三十点五，大队由百分之十五点二，上升为十七点二，生产队由百分之五十六点七，下降为五十二点三，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由于这二十五年来，我们逐步地消灭了帝国主义所有制、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封建主义所有制，逐步地改造了民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逐步地代替了这五种私有制，可以自豪地说，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变更，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经基本上挣脱了私有制的锁链，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逐步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四届人大通过的宪法，已经明确地记载了我们取得的这些伟大胜利。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所有制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常说所有制"基本解决"，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也没有完全取消。从以上数字就可以看出，在工、农、商业中都还有部分的私有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并不都是全民所有制，而是两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在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方面还很薄弱。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范围内已经不存在了，是指的全部生产资料已经归整个社会所有。我们显然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不要忽视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方面还有很艰难的任务。

我们还必须看到，不论是全民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都有一个领导权问题，就是说，不是名义上而是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的问题。

毛主席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说过："**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支部书记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种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但是，工厂里确有坏人。**""**就是说明革命没有完**"。毛主席的这段话，不仅说明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而且使我们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所有制问题，如同其他问题一样，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人们重视所有制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完全对的。但是，如果不重视所有制是形式上还是实际上解决了，不重视生产关系的另外两个方面，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形式又反作用于所有制，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且它们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则是不对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决定了这些工厂实际上归哪个阶级所有。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个官僚资本或者民族资本的企业，怎样变成社会主义企业的呢？还不是我们派了一个军管代表或者公方代表到那里，按照党的路线

和政策加以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所有制的大变更，不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还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都是先夺取政权，再运用政权的力量大规模地改变所有制，巩固和发展新的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专政下产生，更是只能如此。占旧中国工业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只有在人民解放军打败了蒋介石以后，才可能加以改造，归全民所有。同样，资本主义的复辟，也必然的先夺取领导权，改变党的路线和政策。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不就是这样改变了苏联的所有制吗？刘少奇、林彪不就是这样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们一批工厂企业的性质吗？

还必须看到，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指出的这种情况，短期内还改变不了。以公社、大队两级经济发展较快的上海郊区人民公社为例，就三级所有的固定资产来看，公社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二，大队只占百分之十五点一、生产队仍占百分之五十点七。因此，由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到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再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单就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来说，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就是过渡到以公社为核算单位，也仍然是集体所有制。因此，在短时间内，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不会有根本改变。而只要有这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就是不可避免的。由于"**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出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因此，我们决不能因为我们在所有制改造方面取得了伟大胜利，决不能因为进行了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放松警惕。必须看到，我们的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随着城乡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新资产阶级分子一批又一批地产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还是很激烈的。就是老一代的地主资产阶级都死光了，这种阶级斗争也决不会停止，林彪一类人物上台，资产阶级的复辟，仍然可能发生。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方针》这篇讲话中说过，一九三六年，党中央所在地保安附近，有一个土围子，里面住着一小股反革命武装就是死不投降，直到红军打进去才解决了问题。这个故事具有普遍意义，它告诉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现在，资产阶级的土围子还很多，打掉一个还会长出一个，就是将来被消灭得只剩一个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不到，它也不会自己跑掉。列宁说得完全对："**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中国会不会变修正主义，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什么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简单的概括，就是我们大家正在学习的马克思一八五二年给魏德迈信中的那段话。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 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 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3) **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列宁说，马克思的这一段精彩论述，极其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国家学说同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表达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这里，应当注意，马克思把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那句话分了三点，这三点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不能只要其中的一点，不要其他两点。因为这句话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O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说，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在这里，马克思讲的是**一切**，四个都是**一切**！不是一部分，不是大部分，也不是绝大部分，而是全部！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地球上消灭这四个**一切**，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决不能在**过渡**的路上停下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理解，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请同志们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限制、割裂、歪曲马克思主义，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句空话，把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变成残缺不全，只在某些领域专政，不在一切领域专政，只在某个阶段（比如所有制改造以前）专政、不在一切阶段专政，也就是说，不是全部地打掉资产阶级的一切土围子，而是留下一些，让它再扩大队伍，那岂不是为资产阶级复辟准备条件吗？那岂不是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保护资产阶级特别是保护新产生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吗？一切不愿吃两遍苦、受二茬罪的工人、贫农、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一切决心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一切不愿中国变修的同志们，都要牢记马克思主义的这条基本原理：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决不能半途而废。不能否认，我们有些同志组织上加入了共产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他们的世界观，还没有跳出小生产的圈子，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的圈子。他们对于无产阶级在某个阶段、某个领域的专政是赞成的，对于无产阶级的某些胜利是高兴的，因为这可以给他带来某种利益，而只要这种利益到手，他就觉得可以安营扎寨，经营经营他的安乐窝了。什么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什么万里长征第一步，对不起，让别人去干吧，我已经到站了，该下车了。我们劝这些同志：半路上停下来，危险！资产阶级在向你招手，还是跟上大队，继续前进吧！

历史经验又告诉我们，随着无产阶级专政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资产阶级表面上也会装作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而实际上干的仍然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干的。他们一不改变苏维埃的名字，二不改变列宁党的名字，三不改变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名字，而是用承认这些名字作掩护，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际内容改掉，使它变成反苏维埃的、反列宁党的、反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样的公开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但是，当着苏联人民起来反抗他们的法西斯专政的时候，他们又打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来镇压群众。在我们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刘少奇、林彪不只是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当他们镇压革命的时候，也是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林彪不是有四个“念念不忘”吗？其中之一就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确实念念不忘，只是要加“推翻”两个字，叫作“念念不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用他们自己的供词，就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他们有时候“顺”着无产阶级，甚至装得比谁都革命，提一些“左”的口号，制造混乱，进行破坏，经常地则是针锋相对地同无产阶级斗。你要搞社会主义改造吗？他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你要搞合作化、公社化吗？他说太早

了。你说文艺要革命，他说演点鬼戏也无害。你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他说这可是好东西，应当扩大。他们是一批维护旧事物的专家，象一群苍蝇，一天围着马克思说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和“弊病”嗡嗡叫。他们特别热心于利用我们的青少年没有经验，向孩子们鼓吹什么物质刺激象臭豆腐，闻闻很臭，吃起来很香。而他们干这些丑事的时候，又总是打着社会主义旗号。有些搞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的坏蛋，不是说他在搞社会主义协作吗？有些毒害青少年的教唆犯不是打着关心爱护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旗号吗？我们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总结我们的经验，以便更有效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你们要刮‘共产’风吗？”用提出这种问题的方式制造谣言，是某些人最近使用的一种策略。我们可以明确回答：刘少奇、陈伯达刮的那种“共产”风，决不允许再刮。我们从来认为，我们国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够丰富。只要公社还没有多少东西可以拿出来同生产大队、生产队“共产”，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极为丰富的产品来对八亿人口实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继续搞商品生产、货币交换、按劳分配。对它带来的危害，我们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适当办法加以限制。无产阶级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我们相信，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是有力量、有本领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并且最后地战胜他们的。旧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象汪洋大海一样的国家。对几亿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几亿农民中，贫下中农占多数，他们从实践中知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他们的光明大道。我们党依靠他们团结中农，一步一步地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走到人民公社，我们也一定能够引导他们继续前进。

我们倒是请同志们注意，现在刮的是另一种风，叫“资产”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就是那几个“一部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的妖风。在这几个“一部分”中，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刮的“资产”风，对我们的危害最大。受这种妖风的毒害，有的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的人已经发展到把一切都当作商品，包括他们自己在内。他们加入共产党，为无产阶级办事，不过是为了抬高自己这个商品的等级，不过是为了向无产阶级卖高价。那种名曰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人，表现了整个资产阶级处于腐朽垂死状态的特点。在历史上，当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时候，他们还为人类作些好事。现在这种新资产阶级分子，完全走向他们祖宗的反面，对人类只有破坏作用，完全是一堆“新”垃圾。那种造谣要刮“共产”风的人，其中就有一些是把公共财产占为私有，怕人民再“共”这些“产”的新资产阶级分子或者想乘机捞一把的人。这种人比我们许多同志敏感。我们有的同志说学习是软任务，他们却本能地感觉到了这次学习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都是硬任务。他们也可能真的刮点“共产”风，或者接过我们的某一个口号，故意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搞点什么名堂，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亿万群众组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大军正在迈动着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了二十五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经验，又有巴黎公社以来的国际经验，只要我们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高级干部带头，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认真读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实现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这个无限光明的远景必将继续鼓舞越来越多的觉悟的工人、劳动人民和他们的先锋队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灭亡，共产主义的

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4期）

〔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

——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红旗》杂志特约评论员

一九七五年四月，张春桥发表了一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的反党文章。这篇文章的要害，在于全面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它从“全面专政”立论，竭力否定我们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否定社会主义民主，鼓吹在我国实行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把这种专政的矛头指向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指向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骨干。

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和他的同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念念不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就恶狠狠地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现在的国家机器要彻底砸烂，另起炉灶。”在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紧张地进行了组阁夺权的阴谋活动。《论全面专政》就是“四人帮”多年来力图篡党窃国、实行法西斯专政在理论上的反映，是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发动猖狂进攻的新的信号。

《论全面专政》出笼以后，曾经欺骗过一些人，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材料。它可以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看清当代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怎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旗号，特别是打着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旗号，去制造反革命舆论的。

一

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有一个大前提，这就是首先肯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这是分析中国一切政治经济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分析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论全面专政》恰恰就否定了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前提。它打着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幌子，借口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胡说中国和苏联类似。不错，刘少奇、林彪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是修正主义头子。但是，这里有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区别：在苏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篡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从而改变了党和国家的性质；在中国，刘少奇、林彪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没有能够得逞，我们党和国家保持了自己的无产阶级的性质。《论全面专政》这篇文章在抹杀了我国和苏联之间存在着的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之后，用了很大的篇幅极力歪曲我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得和旧社会一样，并且隐晦地表示我们国家的领导权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手里。

张春桥否定了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大前提，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

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和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继续进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使之适应经济基础，继续进行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继续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以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的继续。两个革命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及其实现任务的方法是根本不同的。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一样，都是为了解决社会存在的阶级矛盾。不同的是，无产阶级已经由被统治阶级变为统治阶级，革命的任务由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变为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执政的无产阶级不仅要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而且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但是，只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领导核心手中，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就会被不断揭露和清除。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不是要推翻现存的阶级统治，不能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相反地，无产阶级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要不断强化已经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国家机器，并且运用这个机器的力量，去保证革命的顺利进行。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一样，都是为了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的社会基本矛盾，以推进社会向前发展。但是，两个革命所要解决的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社会性质和解决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既要不断发展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些部分，又要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些部分。还要进行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迅速发展生产力本身，以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和变革。因此，这个革命不能推翻现存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只能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进行调节，不断地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并为将来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制度创造条件。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比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更长，任务更艰巨，内容更深刻，目标更伟大。它肩负着消灭阶级，铲除一切剥削现象和阶级差别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的宏伟任务。要进行范围这样广阔、内容这样深刻的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凭借暴力来镇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和其它一切剥削阶级的反抗、防御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以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人民内部的范围内，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可以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某些对抗性矛盾）方面，它又不是凭借暴力，而是依靠民主的方法来进行。在重新教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领导思想文化工作，组织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小生产等方面，都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伟大的创举》，《列宁选集》第 4 卷第 9 页）毛主席也指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毛主席还说："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用的方法

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华主席指示我们：现在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一部分属于敌我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反抗社会主义的敌人总是一小撮，对于它们，当然必须坚决实行专政。而在人民内部，对于那些即使是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性质的矛盾，也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能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

这一切说明，社会主义民主，包括整风，包括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因为这种形式，适合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适合最充分地发挥广大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张春桥在否定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大前提下，大谈"继续革命"，而又绝口不谈社会主义民主，完全是为了革无产阶级专政的命。他是在继续革命旗号的掩盖下，把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他的所谓用铁扫帚打"土围子"，就是要打倒我们党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他的所谓"改朝换代"，彻底砸烂现在的国家机器，就是要用"四人帮"那一套封资修大杂烩的"新天朝"，来代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他的所谓"全面专政"，就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民主、推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二

张春桥装腔作势地声明，马克思和列宁都多次论证过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他说，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他又说，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4卷第200页）就是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这真是厚颜无耻的篡改。在这里，张春桥采用了偷天换日的手法，一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宏伟历史任务，歪曲为无产阶级对"一切"实行专政；二是把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各种方式，歪曲为统统是专政的方法。

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历史任务是消灭阶级。马克思凭借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详尽地论述了要消灭阶级必须做到的一切有关方面，指出只有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以及同阶级差别有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改变由这种社会关系产生的观念，才能最终消灭阶级。马克思的教导，就是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列宁选集》第4卷第89页)"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98页）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8页）但是，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提出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根本没有论述消灭阶级究竟是用军事的、暴力的方法，

还是用经济的、教育的方法去实现。张春桥硬说马克思讲的是对"一切"都要实行专政，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蓄意篡改。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为了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自然要对资产阶级以及其它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实行专政，这就是镇压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反抗和破坏的活动，剥夺没有改造好的反动资本家、地主和富农的政治权利，惩办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反革命分子、实行阶级报复的地富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了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还要在政治战线上、经济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同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和政治代表进行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其中包括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习惯和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这种斗争，不限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还在很大范围内和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涉及到社会上各个阶级和阶层。劳动人民内部同旧社会的习惯和传统的斗争，也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它规定和影响着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各种矛盾，它决定着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受到旧社会传统、习惯和旧的思想意识的侵袭，它决定着在工人阶级内部、在各个劳动阶级内部、在国家工作人员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也都存在着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和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如上所说，只有一部分属于敌我矛盾，大量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同旧社会习惯和传统的斗争，必然采取多种方法。由于各个领域的不同特点以及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斗争可以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方法。不论斗争方法如何多种多样，从根本性质上说，不外乎专政和民主两种方法。专政的方法用来对付敌人，民主的方法用于人民内部，二者绝对不能混淆。张春桥的"全面专政"，故意抹杀无产阶级专政两种方法的区别，把无产阶级在各个领域进行阶级斗争的各种方式歪曲为一律实行专政的方法，也就根本改变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张春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了卑劣的篡改以后，他的所谓"全面专政"也就不成其为对资产阶级专政，而变成了对一切阶级差别和一切同阶级差别有关系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观念的专政。

所谓对一切阶级差别的专政，就是对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其他劳动者实行法西斯专政。谁都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所要消灭的阶级差别，除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之外，还有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多年来，"四人帮"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就是把专政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指向党内，任意生杀予夺，制造了许多冤案、错案和假案，使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利受到严重摧残。

无产阶级国家绝对不能对人民实行专政。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国家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只能是诚诚恳恳地倾听意见，全心全意地服务。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绝对不能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党是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党的领导的任何削弱和动摇，立即就会使无产阶级专政受到削弱和动摇。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不是靠杀人来实行统治的。只是对于罪大恶极的阶级敌人，才必须捕

一点、杀一点，但是一定不要轻于捕人和轻于杀人，一定不要错捕错杀。

毛主席指出："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转引自1968年6月2日《人民日报》）"四人帮"把专政矛头指向广大人民群众和我们党，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私设公堂，横施酷刑，滥捕滥杀，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最野蛮最黑暗的国民党专政。

所谓对一切同阶级差别有关系的生产关系的专政，就是把专政矛头指向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基本完成，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早已全面建立。"四人帮"硬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说成是"走资派所有制"，叫嚷什么"破坏一个工厂，搞乱一个企业，就是给走资派脖子上增加一条绞索"，千方百计破坏生产。在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区和部门，则推行什么"用法家的手段管理工厂"，"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完全是明火执仗地破坏社会主义企业，公开推行法西斯式的奴隶劳动。

无产阶级国家不能用暴力来对待自己的企业。恰恰相反，无产阶级国家要保障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要保障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不受任何侵犯，要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危害公共利益。"四人帮"采用暴力来对待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甚至采用了在夺取政权的革命过程中都不允许采用的暴力手段，这充分反映出"四人帮"作为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

无产阶级国家不能用暴力来对待小生产。我们现在已经把广大的农民从小生产的地位引导到人民公社为组织形式的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的道路上来。将来，还要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现在存在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必要的补充。实践证明，对待小生产只能采取说服教育、实例示范和国家帮助等民主方法来进行改造。在没有过渡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前，决不允许无偿占有和调拨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劳动力、生产工具和产品。对于农民的小生产特点以及人民中间的资本主义倾向，只能采取耐心教育的办法。"四人帮"叫嚣什么"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改造小生产"、"对小生产要二十四小时专政"，都是破坏工农联盟、挖掘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主要基石的极其反动的行为。

这里还必须指出，张春桥在文章中引用毛主席在九届一中全会关于企业领导权问题的一段讲话，当作他把专政矛头指向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据"，这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歪曲和篡改。毛主席的讲话，十分正确地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工厂企业，不是大多数，而是相当的多数，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是说，我们企业的领导人员，不是大多数，也不是个别，而是相当一些同志，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同时，毛主席又十分正确地指出，那些执行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员，包括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支部书记，也有好人。这是说，这些企业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员，多数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一贯的基本估计。毛主席在这里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我们企业的领导权问题。这是毛主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政党从整个革命事业的利益出发，从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着想，不能不关心自己的领导权问题。只有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掌握在工人群众手里，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企业办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经过同"四

人帮"的斗争，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的极端重要性。当前我们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调整工厂企业的领导班子，也就是要解决领导权问题。实践证明，在我们的工厂企业里，确实不是大多数，也不是个别，而是有相当一些领导人员，执行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属于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这些领导人员中，坏人只是极少数，多数是犯错误的好人，他们在经过教育、提高路线觉悟之后是可以改过来的。张春桥把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企业领导人员统统都作为坏人，列为专政的对象，同阶级敌人划等号，这完全是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无耻篡改，是"四人帮"搞乱社会主义企业，破坏社会主义生产、乱中夺权的一条毒计。

所谓对一切社会关系的专政，矛头首先是指向我国的政治制度，指向我国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在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生活等各种社会关系中，占首要地位的是政治关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统治地位这样一种社会关系。"四人帮"叫嚣要"新桃换旧符"、"彻底砸烂公检法"、"揪军内一小撮"，就是要推翻无产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统治地位，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

无产阶级绝对不能削弱自己手里的国家机器。相反地，还要继续强化它。对于任何妄图反抗和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器的反动派，都要毫不犹豫地实行专政。人民的国家机器是人民手中的出鞘的宝剑，锋利的刀刃，它总是对准那一小撮反抗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做到有效地震慑敌人，保护人民，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所谓对一切观念的专政，就是推行文化专制主义，不许人民发表任何反对意见，对劳动人民的思想和言论实行专政。在思想文化领域，真理和谬误，美和丑，善和恶、香花和毒草，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则是在这个斗争当中建立起来的。"四人帮"手中无真理，他们是一伙扼杀社会主义文化的刽子手。他们实行文化专制主义，不许革命人民说话，压制文化界的百花齐放和学术界的自由讨论。"四人帮"严密控制和操纵的那些文化部门和思想阵地，被他们搅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造成了一片百花凋零、万马齐暗的可悲局面。这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服务的。

无产阶级不能用压服的方法来对待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人民中间的思想问题，不能采用，也不需要采用粗暴的、压制的办法。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只要不是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坏分子的反动言论，都要采取批评的方法，说服的方法，教育的方法。无产阶级的国家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一定能够使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大繁荣和兴旺起来。

张春桥叫嚷要把人民内部一切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人，都当作资产阶级"土围子"来打，这是蓄意颠倒敌我关系。实际上这是为"四人帮"对革命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而制造的一种借口，因为他所说的"土围子"是诬指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领导骨干。

由此看来，张春桥在他的反党文章中提出的所谓对一切过程、一切领域的专政，其实质就是对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实行专政。这种所谓"全面专政"，只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专政。这充分反映"四人帮"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最有力地证明"四人帮"是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和一切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政治代表。

三

“四人帮”的所谓“全面专政”，从根本上颠倒了专政和民主的关系，严重地侵害了人民民主，动摇着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对于我们是极为深刻的教训。我们一定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来认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学会正确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以利于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从本世纪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算起，人类经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只有六十年。我国无产阶级专政还只有二十九年。即便把巴黎公社短暂的七十二天算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也还是一个新的事业。在这短短几十年中，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专政积累了丰富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历史经验证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能不能正确处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对于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在总结经验时，既严厉地批评了对反革命的专政不够有力，又十分重视刚产生的工人阶级民主。他从理论上给予最大关心的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并且找到用什么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马克思一下子就抓住了巴黎公社实行的民主措施，高度赞扬了公社实行的对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实施全面选举制度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降低到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的办法。这些简单的民主措施的意义，在于这种民主能够防止国家工作人员去追求升官发财，防止他们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从而实现了由资产阶级民主向无产阶级民主的转变，保证了公社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

列宁根据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一方面强调指出，专政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不镇压剥削者的反抗，革命就不能成功。一方面又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最广泛的民主，它和以往剥削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是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资产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的专政，它只有靠暴力才能维持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的专政，它是依靠广大群众的信任，依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持的。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既依靠对敌人的镇压，又依靠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镇压敌人的权力和人民的民主权利，都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对立起来。不能认为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就要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削弱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能够战胜国内外的一切敌人而负起消灭阶级的伟大历史任务，正因为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任何资产阶级民主所不能实现的民主。任何缩小人民民主的作法都是有害的，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利的。“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使处在阶级斗争尖锐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也必须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阶级斗争愈是紧张，无产阶级愈是需要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依靠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去战胜反革命势力。

无产阶级国家实行最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信任群众的基础之上。必须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大多数，首先是相信工农基本群众的大多数，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出发点。要坚定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大多数是好人。在全国总人口中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赞成社会主义，经济工作，可能争取到百分之九十八；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大概是百分之五，其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有百分之二。

我们的党和军队有民主的光荣传统。在长期的革命战争时期，没有人给我们发饷，没有制造枪炮的工厂，我们就是依靠战士，依靠人民，有事同群众商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仍然是依靠人民群众。什么时候很好地依靠了人民，革命的事业就胜利，就前进，什么时候脱离了人民，革命的事业就受挫折，就失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依靠了亿万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才胜利地进行了三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粉碎了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回忆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过程时说过，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是不能解决问题。关键在于要最广泛地发动群众。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亿万人民参加的大民主。只有最充分地发动了群众，才能使广大群众关心国家大事、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维护社会主义民主的革命觉悟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的这种觉悟性和识别力，在反对“四人帮”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得到了最生动有力的证明。

现在我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鉴于“四人帮”颠倒敌我所造成的严重混乱，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为了促进安定团结，实现天下大治的局面，在继续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要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一定要打破“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论全面专政》这篇反党文章的流毒。要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重新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继续大力恢复和发扬党的民主传统，逐步建立起一整套保证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制度，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加强人民对于国家机关的监督，发展人民参加国家管理和企业管理的民主方法，密切国家机关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只要我们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发展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有步骤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一定能够保证新时期总任务的胜利实现。

（原载《红旗》1978 年第 10 期）

迟群传达江青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的电话“指示”

我昨天接见工人同志们的讲话中，可能有不全面、不适合的地方，请同志们充分地讨论提出意见。因为完全没有睡好觉。

另外，我讲了春桥同志关于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文章的重点。我还要补充另一个重点，

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要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这个问题进城以后就屡次提出过，在全党没有提起应有的警惕。现在我们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性，擦亮眼睛，要认识清楚，保持高度警惕。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不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识别经验主义的鉴别力，否则就会变修。

毛泽东对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

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关于贺诚任职请示报告上的批语

（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
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印发中央同志。

傅连暲被迫死，
亟应予以昭雪。

贺诚幸存，
傅已人土。
呜呼哀哉！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

（一九七五年六月四日）

中央同意冶金工业部的报告，现转发给你们。

当前钢铁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的情况，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前一个时期，有些人总是说，钢铁上不去，是由于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跟不上。这只是问题的一面。他们对于钢铁工业内部的问题，则往往认识不足，重视不够，而这恰恰是问题的主要方面。

现在，在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重要指示的推动下，在中央今年九号文件发出以后，整个工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尤其令人十分高兴的是，石油工业一直是领先高速度地发展着，近两个月煤炭生产也上去了，铁路运输也上去了，都达到或超过了国家计划水平。钢铁生产虽然也有所进步，但上升缓慢，至今还没有改变月月欠产的状况。如果说，过去钢铁上不去是受了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的某些影响，那么，现在外部条件已经大为改善，再拿这些作为上不去的理由，那就更加说不过去了。

应当看到，大多数钢铁企业的情况还是好的。北京、上海、天津、唐山、本溪、马鞍山、大连、大冶、抚顺、西安、西宁、邯邢等地的钢铁厂和矿山，以及一批中小钢铁企业，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直很好。欠产多的，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几个大钢厂。就在这几个大型钢铁企业里头，太钢最近大张旗鼓地贯彻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群众发动起来了，在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三、四月份都完成了国家计划。太钢的例子，把有些企业被外部条件掩盖着的内部问题，揭示得更加清楚了。

那些至今钢铁生产还上不去的企业，有关的领导同志应当认真地检查一下：你们那里思想政治路线是不是端正了，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是不是真正开展起来了，群众是不是充分发动起来了，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是不是建立起来了，资产阶级派性是不是克服了，党的政策是不是认真落实了，对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是不是有力地打击了？总之一句话，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不是真正落实到基层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毛主席早就指出，发展工业**以钢为纲**，**“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这个思想，必须牢牢确立，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毛主席一九七〇年在谈到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时候还说过：**我们这几年一直总在一千万吨到一千八百万吨钢之间往来徘徊，徘徊了十年左右，还是上不去。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许多人觉悟了，今后十年有可能上去**。事实完全证明，我们许多人觉悟了，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群众手里了，按照**鞍钢宪法**办事了，钢铁生产就上去了。如果与此相反，仍然不觉悟，还有可能上不去，甚至还会出现新的徘徊。这一点，必须引起全党各级领导同志的充分注意。钢铁工业没有一个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业、

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就会严重地影响战备，就会不利于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必须加强对钢铁工业的领导。辽宁、湖北、内蒙、山西、四川等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动手，对问题多的单位进行调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不要久拖不决，贻误大局。冶金工业部要主动依靠和帮助各地党委，抓好重点企业的革命和生产建设，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搞好生产指挥调度，搞好地质、矿山和科学技术工作。国务院应即充实和加强冶金工业部的领导班子，要他们像石油化工部、煤炭部、铁道部那样，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敢于负责，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发展钢铁工业，要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地方要加强全局观点，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国家要在产品分配上照顾地方的需要，给地方以好处。

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各项国民经济计划必须保证胜利完成。我们要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继续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继续贯彻中央今年九号文件的精神，认真落实党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坚决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上半年快过去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计划完成得好的要争取多超产，欠产的要千方百计完成计划。不仅要完成数量计划，而且要提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消耗，实现安全生产。

中央相信，钢铁战线上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广大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一定能够发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增产，厉行节约，全面完成国家的钢铁生产任务，不辜负党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各钢铁企业党委，要放手发动群众，制订抓革命促生产的具体措施，并于六月中旬将讨论结果报告中央。

（此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工矿企业的群众。）

附：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

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
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工业战线上，铁路运输、煤炭生产和其他一些行业上得很快，已经达到和超过了国家计划水平。钢铁生产也有增长，但上升缓慢，到五月上半月比计划欠产钢二百零二万吨。前一段我们总是强调煤炭、运输跟不上，现在被外部条件掩盖着的内部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了。如不抓紧解决，迅速扭转被动局面，今年钢铁生产计划就有完不成的危险，就会出现新的徘徊。这不但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发展工业**以钢为纲**，钢铁工业关系全局。我们现在生产的钢，数量和品种都还太少，同

八亿人口的需要，同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钢铁上不去，影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近几年，除地方小钢铁外，国家每年用于支农的钢材只有二百多万吨，很不适应农业机械化的需要。工业建设需要的钢板、钢管等关键品种，产量严重不足，每年要进口三百多万吨。钢铁上不去，影响国防建设，影响战备。当前美苏两霸的争夺日益激烈，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我们必须准备打仗，如不抓紧时间多搞些钢铁，一旦有事，就会影响大局。钢铁上不去，物质基础不强大，还会影响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我们要使广大干部和群众，充分认识扭转钢铁工业落后局面的迫切性、重要性。

钢铁生产上得慢，主要在于我们内部工作没有做好。关键是部核心小组抓路线、抓大事很不得力，冶金基本建设歼灭战打得不好，抓典型、推广先进经验很差。特别是对一些大企业的革命和生产没有切实抓紧。如包、武、鞍、太几个大钢厂，由于领导上的思想政治路线不端正，班子不团结，有的政策不落实，少数人闹资产阶级派性，阶级敌人乘机捣乱，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去年欠产很多，今年头四个半月欠产的钢，将近占全国欠产的总数的一半。对这些企业的问题，有的我们缺乏深入调查研究，没抓住症结所在，有的我们基本上了解，但有怕字，犹豫等待，未及时下决心会同有关省、区党委加以解决。中央今年九号文件下达后，我们没有像铁道部那样大张旗鼓地传达贯彻，放手发动群众，密切联系实际，解决存在的问题，不少单位走了过场，贻误了时机。这些教训，应当深刻记取。

今年是“四五”最后一年，钢铁生产计划必须坚决完成，也是有条件完成的。毛主席对发展钢铁工业有一系列重要指示。全党对办好钢铁很关心。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钢的年产能力已有三千万吨左右，潜力很大。广大职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觉悟有很大提高，有改变钢铁工业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煤炭、运输等外部条件日益好转。只要路线对头，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就能把生产促上去。从重点企业来看，首钢、本钢、大连、大冶、抚顺等钢厂和邯邢矿山局，革命抓得好，生产不断提高。上海、天津、唐山等钢厂，革命、生产形势一直很好，群众干劲很大，增加生铁供应，钢可以多搞。少数问题多的单位，只要认真去抓，也不难解决。太钢党委从三月份以来，广泛深入地宣传、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贯彻中央九号文件和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精神，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坚决整顿公司和厂矿两级领导班子，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形势显著好转。二月份日产钢只有六百吨，四月份就提高到二千多吨。这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那种认为这也不可能、那也办不到的保守思想和畏难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我们一定要认清形势，下定决心，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全面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并为明年更大发展做好准备。

（一）认真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要努力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弄清楚为什么无产阶级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提高继续革命的自觉性，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反对资产阶级派性，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促进安定团结。要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更好地执行鞍钢宪法，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

（二）加强各级党委对钢铁工业的一元化领导。要把钢铁搞上去，没有各级党委强有力的领导，不充分发挥两个积极性，是不可能的。对全国的重点钢铁企业，要坚持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的管理体制。希望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进一步加强对钢铁企业的领导。建议鞍

山、本溪、包头、马鞍山、渡口市委，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大钢厂上。冶金部一定积极努力，做好工作，发挥"条条"应有的作用。首先要共同努力，下大力量，抓好关系全局的重点企业，特别是十二个大钢厂（鞍山、武汉、包头、太原、上海、首钢、本溪、马鞍山、攀枝花、重庆、天津、唐山）和邯邢、海南两个铁矿。这十四个单位的钢、生铁、铁矿石产量，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主要的钢材品种也大都出在这里。他们上去了，全局就活了。对中小钢铁企业也要抓紧，提供必要的条件，发挥现有能力，完成生产计划，做到两条腿走路。

（三）采取坚决措施，整顿那些问题多的重点钢铁企业的领导班子，使领导权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有矛盾就得解决，该充实的就要充实，该调整的就要调整，不能回避问题，拖延不决。根据中央九号文件的指示精神，对少数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经过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领导干部和头头，要坚决调离。对严重违法乱纪、破坏捣乱的，要严肃处理。对一些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沾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的要适当处理。要按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选拔一批有觉悟、有朝气、有实践经验的中青年干部到主要领导岗位上来，同时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使企业的领导班子精干有力。大企业，不但要搞好公司的班子，还要抓好厂矿的班子，一直抓到支部。

(四) 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要把钢铁生产的现状、全党全国人民对钢铁工业的期望和完成今年计划的重要意义，原原本本地告诉群众，发动群众充分讨论，使大家了解全局，增强主人翁的责任感，团结起来，群策群力，订出具体措施，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搞技术革新，挖掘企业潜力。要大力表彰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单位和先进人物，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大鼓革命干劲，大树无产阶级的正气。

（五）落实生产建设中的具体措施。要狠抓矿山、轧钢两个薄弱环节。继续下苦功夫大打矿山之仗，搞好选矿、烧结，以矿保铁、以铁保钢。要求鞍钢、首钢、邯邢、海南、武钢等矿山，发挥潜力，实现超产；攀枝花、本溪、马鞍山、包头等矿山，确保完成今年计划；各地中小企业所需要的矿石，除了原来由国家部分调剂的九个省以外，都要自力更生解决。要通过革新挖潜、提高轧机作业率，多开坯、多轧材，特别要努力增产国家急需的短线品种。除了要把今年生产的钢锭全部轧成材以外，还要积极处理过去积压的钢锭。有色金属生产也要切实抓紧。

要加强设备维护检修，提高设备完好率，防止拚设备。自力更生多搞备件，凡是自己能干的，决不向外伸手。

基本建设要集中力量打好歼灭战，狠抓收尾配套，优先完成对今年生产任务有重要关系的竣工投产项目。

要坚持**生产与节约并重**的方针，发动群众采取有效措施，回收利用废钢铁，节煤、节电、节油，节约钢铁料。重点企业炼铁焦比要降到六百公斤以下，低于六百公斤的，要创历史最好水平；非炼铁用焦要比原计划减少四十万吨。

（六）加强企业管理，整顿企业秩序。钢铁生产的环节多、综合性和连续性强，从上到下都要有强有力的统一的生产指挥调度，保证各个环节协同动作。所有企业都要按照中央九号文件的要求，依靠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并严格执行，做到优质、高产、低消耗、安全生产，改变目前事故多的严重情况。要教育群众加强组织纪律性，**一切行动听指挥**，自觉遵守规章制度。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有领导、有步骤地加以改革。

干部要深入第一线、参加劳动，调查研究，敢于抓阶级斗争、敢于抓生产管理，及时解

决革命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要爱护群众的积极性，关心群众生活。

要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同各种破坏企业革命、生产秩序的行为作斗争。对于杀人抢劫、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于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

我们相信，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全党动手、发挥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钢铁生产是一定能够很快搞上去的。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中共冶金工业部核心小组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二日

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发表几点意见，明天叶副主席作总结。共讲六点意见。

一、讲一讲局势。（略）

二、分析一下我们军队的状况。

我有这样一个看法，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军队总的是好的。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军队始终是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的军队是经得起考验的。不讲抗美援朝这些大仗，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反击战虽然仗不大，但不管派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一个团也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成绩是主要的。有的同志告诉我，说现在部队团以下情况都不错，个别的有些问题。这一点，我们是高兴的。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感到军队有相当多的问题。总之，我们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还不少。我想了一下，如果从报忧方面或者叫缺点、毛病来说，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的总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

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一个师的部队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有点"散"。所谓"散"，主要是有资产阶级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形成、结合起来的，有点山头主义。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通过延安整风，应该说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那种山头主义是客观存在、客观形成的。在延安整风时解决得比较好，当然

不是说很容易。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经过延安整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那一股劲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当中出现的新问题。我们说支左有功，但是，在支左当中，因为那时群众分成两派，是革命队伍中的两派，不是资产阶级两派，这是斗争中自然形成的。部队支左，自己也卷到里面去了。军队支左，正确的办法，应该按照毛主席的方针，支持两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但是，军队不少人卷到派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后台，卷到地方派性里去。同时，把派性带回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两派。军队里面的派性，同地方上的性质一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它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也不应该容忍。现在，军队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任人唯亲，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其实，那些常常喜欢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却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所谓垒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的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导同志，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所谓派性，这就是最大的派性。毛主席、党中央讲，要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与资产阶级派性这个问题有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是在地方支左中形成的，带回部队，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好多派性问题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现在还有影响，少一点就是了。

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部队组织纪律性差，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个人服从组织呀，都不管这些。我很赞成荣臻同志在会上讲的意见，过去命令一下就动嘛，二话不说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对抗命令。派性同组织纪律性差有关。他们考虑的利益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那一派的利益，我们说它是资产阶级派性，就在于这一点。他们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现在，要调动个人可不容易。有的人说是由于某某人把他整了，受了错误的处分。有的人是这种情况，但有的人不是这种情况。原来对他的处分和批判是对的，他也说不对。现在都喜欢到大城市，特别是喜欢北京，要调到别的地方去，特别困难。说什么身体不好，要调到外地就说有心脏病，到那里去肯定要复发，可是在北京，心脏病就好了。总之，理由多得很。

所谓纪律性差，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毛主席、党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比如，军队同志要帮助地方消灭资产阶级派性，使群众团结起来。可是有些军队同志就是不执行这个方针。这又是组织纪律、又是政治纪律问题。

军队的领导班子，也有"懒"、"散"、"软"的问题。中央九号、十三号文件都是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嘛。因为有的领导班子是"懒"班子、"散"班子、"软"班子。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三种班子地方有，军队也有。这段时间，地方上克服这些问题比较好，地方走得快一点，军队慢一点。

有点"骄"。"骄"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军队本身就容易骄。战争年代打仗，出力

大，牌子硬，名誉好。过去历来存在这个问题，经过克服，比较好了。文化大革命支左有功，带来了另外的问题。在支左中，不只是支左的人，连同支左的部队，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什么时候我们军队干部有过那么大的权力啊！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就有这样的干部，不讲团结，不守纪律。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军内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军民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团结好的传统丧失了。浙江洞头守备二十六团，听说这个部队过去很好，在那里还受过表扬的。这次和群众关系搞得很坏，本身也不团结，还打仗，带领地方一派群众打仗。那里有两派群众组织，一个是民兵指挥部，还有个叫什么团，军队在那里带头打仗。因此，现在军民关系很值得注意，如果不注意，带坏部队战士，丧失我军的传统作风。最近，总参发了关于整顿军容风纪的指示，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们妇女抱着娃娃，他根本不理，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这个事情，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有的人还认为这无关重要，如不警觉，是很危险的，要坚决纠正。学习理论、反修防修，这些问题不自觉改正怎么行呢？有的人喜欢指手划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总之，有点“骄”，有的人甚至发展到骄横。

有点“奢”。刚才上面讲到有人搞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部队请客送礼，搞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比如，有一个团开支的招待费有六万多元，招待什么人呢？我看无非是招待师、军、军区的首长们。这个团的干部这样就搞坏了。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犯政策的。钱是哪里来的？执行毛主席“五·七”指示，办了不少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精神。有些人违法，东西从地方上随便拿来，有的连个手续都没有，或者低价购买。赚了钱，个人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说什么，为什么他有批条子的权力，我就没有？主席指出的“五·七”道路要走，但怎么走呢？要真正按“五·七”指示的原则走。这个问题要整顿。地方企业还要上交利润，资金的积累也是国家积累嘛。我们批判苏修就是这样，特权阶层是哪里来的？如果那样搞，我们军队不是也在培养特权阶层吗？还不是和苏修一样的！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应该还嘛。有的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有的是霸占的。现在，我们不是反霸吗？这就是霸，不讲理。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去讲了。

有点“惰”。惰性，不只是个人存在，甚至有些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惰性。地方存在“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部队也有的是。毛主席最近讲资产阶级法权问题，说条件太好了，所以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种同志相当有一些，特别是有些高级干部，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个人也好、一个领导机关也好，就是有些人革命意志衰退，不搞继续革命，而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不是保持革命晚节，而是保持别的什么“晚节”。这有思想原因。还有组织原因。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上级对下级支持不够，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

助。"散"班子、"懒"班子"、"软"班子这种现象应该纠正。中央有责任帮助各个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不要讲句话都怕犯错误，怕被人家抓住不得了。你写出来照着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而且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那不是"八股"？过去整风就是批判"八股"，干瘪无味。这个怕字，是为自己。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自己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

总之，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我讲的重点是报忧。部队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个方面说的不多，只讲了这一句话，但这一句话很重要。问题是部分的。

三、军队要整顿。

整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这个，同时还要注意解决"散"、"骄"、"奢"、"惰"的问题。要联系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克服"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确实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克服"散"字、"惰"字，解决"懒"班子、"软"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些都要联系起来解决。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总不能象过去那样随便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吧！规定一个秘书，你就不要用多了嘛。秘书少一点有好处，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一点脑子，对自己好处多啊！可以联系解决这些问题。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了。对干部要好好了解一下。健全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注意。要加强干部的学习，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这也是军队的整顿问题。明天，叶副主席还要讲这个问题。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党性，反对派性。要注意提高纪律性。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这几句话都不用解释了。总之，这次整编，不只是解决"肿"的问题，五个方面的问题都要解决。要健全各级领导班子。要加强干部学习、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要加强党性，反对派性。要提高纪律性。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四、军委的工作。(略)

五、整编中的干部问题。(略)

六、高级干部的责任。

首先是我们到会的同志，扩大一点，到军以上的主要成员。这些人把部队带得好，毛主席给我们树立起来的完整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是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的。如果搞得不好，也会把部队带得很不好，存在的那些问题就会发展。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尽管是一部分现象，担忧是有理由的。所谓传、帮、带，培养我们的接班人，使他们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就是要靠我们这些老家伙。过去几十年，军队总的是很好的，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份的。现在部队这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真正把几十年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发扬起来，靠我们。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我相信这一点。最近我们军队有些工作落在地方后面，但是军队真正抓起来，会比地方快。军队作风要紧张。毛主席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个**紧张**，现在不那么灵了，拖拖拉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要带头努力解决。只要把问题讲清楚，我看也不难解决。我们军队在这方面向来是搞得快的、也搞得坚决，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

以上几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毛主席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叶剑英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节录）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五日）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在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下召开的。会议从六月二十四日开始，到今天为止，开了二十二天。

这次会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遵照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等指示，集中讨论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在军队建设上首先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是毛主席、党中央根据当前形势和我军现实情况作出的英明决策，是非常适时的，是十分必要的。

到会同志一致拥护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的英明决策；认为三总部提出的方案是可行的，并提了一些具体意见。同时，还对军委领导和军队建设其他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进一步批判林彪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充分讨论了会议的两个议题，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政策，明确了作法。会议是开得好的，对我军建设必将产生重大影响。

小平同志昨天在会议上的讲话，体现了毛主席最后一系列重要指示的精神，提出了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符合当前部队的实际，讲得很好，讲得很深刻，我完全同意。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关于国际形势问题

（略）

二、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问题

……在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执行西沙自卫反击作战和辽南抗震救灾等任务中，以及在最近部队的调防中，充分证明，我军不愧是一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

但是，必须看到，部队建设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党的领导受到削弱，许多党委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怕字当头，不敢负责，有些领导班子存在着“软”、“懒”、“散”的严重现象；政治思想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教育不严，组织纪律差，事故多，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影响和腐蚀；有些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闹不团结，政策不落实，有些干部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作战思想不够统一，战备工作、军事训练和民兵建设都存在一些问题。

部队臃肿庞大、干部超编、装备落后的情况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主要是林彪路线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也有我们工作上的问题。我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有责任的。我们必须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并从各方面采取有力措施，抓住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军队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当前首先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这两个问题，然后再解决其他问题，使毛主席关于整顿军队的指示真正落实。

要准备打仗，又要压缩军队定额，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有个正确的理解。

三、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

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是当前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三者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整体，缺一不可。学习好贯彻好毛主席的指示，是我军建设的根本，是做好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工作的根本保证。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列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在学习理论时，除联系苏联变修、我党两条路线斗争和当前社会上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实际外，还必须紧密联系部队的实际，加强调查研究，有效地解决军队内部现存的问题，把军队的建设和工作搞好。联系军内实际，当前要注重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彻底批判和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它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部队思想，干扰破坏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落实。资产阶级派性不消除，就不能贯彻落实安定团结的方针，也不能把军队工作搞好。军队需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

第二，要坚持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抓紧专案处理和复查工作。问题查清了的，要尽快作出结论，妥善处理。一时查不清的，要根据现有材料作出结论，不能老拖下去。过去搞错了的一定要甄别平反。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被迫死的应予昭雪，恢复名誉。但对有些人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也要批评教育，不能迁就。

第三，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影响和腐蚀，自觉地改造世界观。现在有些人斗志衰退，贪图安逸享受，小病大养，无病呻吟；有些人骄傲自大、蛮横霸道，公开伸手要名、要利、要权；有些人利用职权，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特殊化，搞不正之风；有的人生活奢侈，道德败坏，违法乱纪。要通过学习理论，提高认识，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坚决地和这些不良倾向作斗争。

第四，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和各种规章制度。要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保守国防机密，接触机密的面要严加限制。现在有些人没有党的观念，目无组织纪律，对上级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公开对抗；有些人以各种借口，不服从组织分配。这些破坏组织纪律的现象是不能允许的，必须加强教育，进行整顿，坚决纠正。

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部队现实问题，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带头学习，带头联系实际，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对不良倾向，要敢于批

评，敢于斗争，敢于摸老虎屁股。上级党委要支持下级党委的正确意见，要帮助下级党委建立威信，党委成员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部队经常性的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好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真正把政治思想工作提到纲上。要扶持正气，表扬先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努力奋斗，迅速地把部队工作搞上去。

这次会议，对解决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和安排超编干部两个问题的方针、政策、原则，已经定下来了，各单位要抓紧时间，把会议精神传达好，贯彻落实好。具体做法不作统一规定，由各单位自行安排。当前首先要抓好领导班子特别是军以上主要领导干部的配备，落实好政策。大家对军队建设其他方面提出的问题，三总部要认真研究，军委也要研究，逐步加以解决。各军区、军兵种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主动解决，不要等。军委下一步在继续抓好这次会议精神落实的同时，准备着手解决装备、战略和政治工作方面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要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这是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我们要紧紧跟上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步伐，把军队各项工作做好，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要向全国人民学习，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全军同志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附〕 丹心向党 功炳千秋（节录）

杨成武

敬爱的叶剑英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噩耗传来，悲痛万分。

我从一九三二年认识叶剑英同志，战争年代有过多次的接触。一九四八年以后，好长一段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教诲下工作。透过革命斗争岁月的烟云，回顾老首长在艰难险阻中走过来的经历，我深切感受到，叶剑英同志的革命精神最可贵之处，是他对党赤胆忠心，对祖国和人民无限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无比坚定和献身精神。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的、民族的和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日常工作中，他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好学深思，任劳任怨；而在革命斗争在关键时刻，他又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非凡的革命胆略，深谋远虑，机智灵活，急流勇进，屡建奇功。他不愧为党的一位忠诚的战士，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

一

叶剑英同志于一八九七年出生于广东梅县。他所处的青少年时代，中华民族正承受着历史上最难堪的屈辱和欺凌。他十八岁时，就写下了“放眼高歌气吐虹，也曾拔剑角群雄，我来无限兴感志，慰祝苍生乐大同”的豪迈诗篇。十九岁那年，叶剑英同志到马来西亚谋生，但他身在异国，心向故土。那里的亲友和同学，有的拉他做生意，有的邀他教书，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说：“而今国难当头，我要学点本领，将来救国救民。”他心怀革命宏图大志，回国后考进了云南陆军讲武堂。三年毕业后，他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主义革命，成

为北伐军的著名将领。

叶剑英同志同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是在同旧社会黑暗势力的搏击中探索革命真理，在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交往和斗争中寻找真理的革命领路人。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全国卷入了白色恐怖的血泊中。而叶剑英同志则在这个严重关头，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走上了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光明而艰辛的征程。

叶剑英同志入党后，就竭尽全力为党的事业进行不屈不挠的战斗。一九二七年，面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的严重形势，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以革命的武装斗争挽救革命。当时党在南昌方面所能掌握的武装力量，有由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等。那时，叶剑英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不动声色地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的第四军中当"参座"，随张发奎从武汉南下九江。汪精卫出于反革命的目的，从武汉来到庐山，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企图诱骗叶挺、贺龙上庐山，加以扣押，并命令叶、贺两部集结于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以图谋合围聚歼，一举扑灭军队中的革命火焰。这个罪恶的阴谋被叶剑英同志察觉。叶剑英同志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秘密邀请叶挺、贺龙到九江的甘棠湖上划船，把汪精卫的阴谋告诉叶、贺，并一起商讨对策。叶挺、贺龙决定不上庐山，部队也不集结德安，而按照党的指示，兵进南昌、举行起义。

南昌起义后，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撤离南昌，开往广东。汪精卫为扑灭革命力量，令张发奎追击起义军。在起义军面临追兵威胁的情况下，叶剑英同志胸怀大义，又巧妙地劝阻了张发奎，放弃追击起义军，直趋广州，从而使南昌起义军免遭追兵之危，保护了革命武装。与此同时，叶剑英同志还保护了另外一支革命武装力量。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部分学生组成了一支由我们党掌握的革命武装队伍，原来打算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赶上，到九江时被张发奎缴了枪。在汪精卫清共政策的威胁下，这支队伍屡遭厄运，出现了瓦解的征兆。为使这支队伍得以保存，叶剑英同志足智多谋，向张发奎建议，把这支队伍改编成教导团，并"毛遂自荐"担任教导团团长。就这样，在叶剑英同志的巧妙掩护下，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了下来，并由叶剑英同志带领到了广州。这支武装力量后来成了广州暴动中奋勇当先的一支主要力量。

叶剑英同志在大革命时期是那样忠贞对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在长征中，更加闪耀着他那对党对革命一颗赤诚的心。这一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和红军学校校长，对红军的建设和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在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斗争中，叶剑英同志及时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在关键时刻立了大功"。到延安后，叶剑英同志不仅担任军委的高级职务，协助毛主席和统帅部运筹帷幄，指挥作战，充分表现出他的良将之才，而且协助周恩来同志在"西安事变"后为促成国共两党再度合作中，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和美国代表三方的调处谈判斗争中，充分表现出他的聪明才智。叶剑英同志这种出将入相、文武双全的才能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树立了卓著的功绩。

二

建国以来，叶剑英同志担任过党、政、军和国家的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特别是对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对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叶剑英同志对军事科学研究、全军军事训练和参与制定战略方针及一系列的条令、条例等，给总参谋部都有很多指示。叶剑英同志深入基层，如：一九六三年发现了“郭兴福教学法”，专门给毛主席发了电报，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毛主席就找了贺龙、罗瑞卿同志和我，到他那里，当面指示要向全军推广。

“文化大革命”期间，叶剑英同志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条件下，遇逆流而不退，临大节而不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他和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出于忧党忧国忧民的心情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义愤，对“文革”的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强烈谴责了林彪、江青一伙乱党乱军、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

一九七一年，林彪反革命分子自我爆炸，由于党的“十大”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致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得以加强。“四人帮”在台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被推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列。我是一九七四年底被“解放”出来，直接在邓小平同志、叶剑英同志的领导下工作的。那时小平同志和叶帅同“四人帮”的坚决而英勇的斗争，至今仍历历在目。一九七五年，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同志受命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在这期间，叶剑英同志则负责主持军委工作。面对祖国严重危难的局面，邓小平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召开了一系列的重要会议，着手进行全面的整顿。邓小平同志和叶剑英同志主持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军队要整顿》的重要讲话，对“四人帮”作了坚决有力的回击。叶剑英同志针对“四人帮”煽动派性，把全国搞得乌烟瘴气的问题，作了重要的发言，叶帅尖锐地指出：“现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又说：“军队要高度的集中统一，决不允许有资产阶级派性存在。要使广大干部战士认识资产阶级派性的反动性和危害性。警惕阶级敌人混水摸鱼，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叶帅在发言中，还非常气愤地脱稿讲话，揭露了反革命分子江青插手军队，妄图把军队搞乱的阴谋诡计。他对大家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的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以后没有军委的同意，任何人不得这么做。会上，徐帅、聂帅也都作了重要的讲话，一致赞同小平同志、剑英同志的意见。

接着，叶帅亲自给各大军区、军种的领导同志打招呼，他一个军区一个军区、一个军种一个军种地分别找司令员、政委谈话，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他跟同志们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上海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

紧接着，叶剑英同志就全力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头一项重要工作是根据毛泽东同志和军委的部署，调整配备全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这是为粉碎“四人帮”采取的强有力的组织措施。叶剑英同志亲自拟定了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的“六人小组”人员，亲任组长。他还亲笔写了这个名单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批准后，叶帅就带领“六人小组”紧张地进行工作，很快地对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

一九七六年，周总理、朱委员长、毛主席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时机已到，加紧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在这前后的日子里，邓小平同志又遭到了诬陷和迫害。叶剑英同志也被“四人帮”看成眼中钉。江青一伙突然不达通知，诡称叶帅有病、不再主持军委工作。实际是借故让叶帅“靠边站”。面对这种严重形势，叶帅、其他老帅和老一辈的革命家坚信党有希望，革命不会亡，共产主义必定会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叶帅尽管被宣布“靠边站”了，但他仍在为国家的前途、党的命运，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日夜操劳，筹谋帷幄。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叶帅曾多次和我见面通电话，叶帅严厉斥责“四人帮”倒行逆施、妄图乱党乱军、抢班夺权的阴谋。指示我们要机敏地

对“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进行抵制和斗争。特别是“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不断施加压力，力图从总部“开刀”，搞乱搞垮军队，我们面临严重的局面。七六年六月间，皮定钧同志因公殉职。叶帅抓住时机。指派三总部我、梁必业和张震等同志、飞赴闽赣，调查处理此事、并检查沿海战备情况。从而阻止和抵制了“四人帮”急欲搞垮总参、总政的阴谋活动。在七、八月的抗震救灾期间，叶帅再三指示我们要掌握好部队情况，防备“四人帮”搞鬼。九月毛主席逝世，江青就迫不及待地索要主席的手稿、文件和材料。叶帅当即指示有关人员：要顶住、要看好，一份也不给。有一天，张春桥指使人给叶帅秘书打电话，说他要来看叶帅，当秘书告诉叶帅时，叶帅很生气地说：“我没有病，他来看我干什么。”硬是对张春桥不予理睬。王洪文居然搬到叶帅寓所旁边居住，直接监视叶帅的行动。对“四人帮”的罪恶行径，叶剑英同志、李先念同志、聂帅、徐帅等一批老同志看在眼里，怒在胸膛，拭目以待。一天，叶帅对我说：“成武啊，王洪文是专来对付我的，我得搬家。记得以前我对你讲过，得给我准备几个地方，你现在明白了吧？”当天下午，叶帅就搬到一处新的寓所去了。九月二十一日，我到聂帅那里去，聂帅问我叶帅的近况，我把叶帅的情况报告了他，并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这时，聂帅郑重地对我说了一段话，要我立即转报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同志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我把聂帅的意见立即报告了叶帅。叶帅胸有成竹地说：聂帅的想法和我的想法一样。每隔二、三天叶帅和聂帅就要我去报告情况，并转达他们两位的意见。他们都明确指出，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一天，叶帅对我说，先念等同志也来过了，我们的意见都一致。十月五日，叶帅找我去，要我告诉聂帅，已经商量好了，请他放心。接着叶帅又问：军队怎样？我说，没问题。他又说：你们要掌握好三总部、陆空军和海边防，只要军队不出问题就不怕！我说，军队永远听党的话，请叶帅放心。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中央政治局执行了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在这场严峻的斗争中，中央许多老同志都是有功之臣，而叶剑英同志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愧是中流砥柱。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干部问题时曾经说过，我们的干部和领袖应当“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叶剑英同志身上完全体现了这种“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在长期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叶帅把一颗赤诚的心奉献给党，奉献给人民，表现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高洁的心灵，坚定的党性。

(原载 1986 年 11 月 5 日《光明日报》)

毛 主 席 已 圈 阅。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七日)

现将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转发给你们，望即认真讨论，并迅速传达到所有工矿企业的干部和群众。报告中提出的各项要求，要切实付诸实施。特别是要抓紧解决那些至今革命和生产都还没有搞好的单位，使他们很快赶上来。

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

毛主席、党中央:

今年上半年，传达贯彻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关于**还是安定团结为好**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重要指示和中央九号、十二号、十三号文件，工业交通战线的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看书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努力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各级党委狠抓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政策，促进了安定团结。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先进企业和先进人物不断涌现，不少后进单位向先进转化。工业交通中的薄弱环节有了加强，生产全面上升。

三月以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

从行业看，大体分为三类:

第一类，石油工业、森林采伐和海上运输，从年初到现在，一直稳产高产，持续上升。原油，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九点八，全国十二个油田有大庆、玉门等八个油田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木材，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三，其中东北林区完成百分之六十二点三，超过往年同期水平。交通部直属航运单位的货运量，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二点八。

第二类，煤炭工业和铁路运输，一年多以来一直上不去，电力、化工、机械、建材、轻工等行业年初生产一度下降，中央九号文件下达后，都很快赶上来了。原煤产量，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五十二，全国八十二个统配煤矿中，有开滦、大同、阳泉、潞安、鸡西、通化、阜新、义马、莱芜、窑街等四十七个煤矿，完成全年计划百分之五十以上。铁路货运量，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八点九，全国二十个铁路局中，有哈尔滨、成都、西安、柳州、锦州、吉林等十个路局，完成全年计划百分之五十以上。发电量、水泥、

浓硝酸、石油化工设备、汽车、手扶拖拉机、卷烟、洗衣粉等，都接近完成或超过全年计划的一半。烧碱、纯碱、化肥、拖拉机、拖拉机和内燃机配件、棉纱、棉布、自行车，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

第三类，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中央十三号文件下达后，开始有了起色，但上得比较慢。上半年，全国钢产量仅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二，有色金属仅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九点五。在这两个行业中，完成计划比较好的有：首钢、上海、天津、唐山、攀枝花、大冶、大连、抚顺、西宁、长城、齐齐哈尔等钢厂和邯邢矿山局，白银有色公司、兰州铝厂、上海冶炼厂、红透山铜矿、易门铜矿、金堆城钼矿、盘石镍矿、西华山钨矿和青城子铅锌矿等。

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七点四。从各地区完成的百分比看，高于全国平均数的有北京、上海、天津、河北、吉林、黑龙江、甘肃、陕西、广东等十二个省、市、区。其他省、区，也正在赶上来。基本建设进度比去年快，除辽阳化纤厂问题较多、计划完成不好之外，上海、北京石油化工厂和各大化肥厂的建设以及港口建设，都抓得比较好，进展很快。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有一批重点企业，革命问题没有解决好，或正在解决，生产还没有搞上去。这类企业，为数不多，但长期欠产，影响全局。有关地区、行业和企业的领导，应当对中央十三号文件提出的七个"是不是"，认真对照检查，作出明确的回答，并向所属上级作出报告。

生产和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一是有些企业不严格执行国家计划，不听从集中统一调度，任意中断生产协作关系，擅自动用国家统一分配的产品，拿计划内物资乱搞以物易物。二是有些主要产品上半年欠帐较多，影响全年计划的完成。三是企业管理薄弱，劳动生产率低，消耗高，事故多，设备完好状况差，产品质量不稳定，乱拉乱用资金，亏损还在扩大。

为什么有的地区和企业能够持续稳产高产，有的下降后能很快赶上来，而有的却上得又慢又不稳定，有的还在原地踏步，根本问题是怎样对待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是真正扎扎实实地贯彻落实，还是走过场。事实证明，只要坚决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去做，把革命问题解决好，路线搞端正，领导班子坚强有力，群众发动起来，生产就一定能够上去。凡是在那里空喊解决问题，实际上回避和掩盖矛盾，没有很好地按照中央指示采取果断措施的，革命和生产落后的局面就不可能真正改变过来。

为了巩固和发展当前的大好形势，各地区、各部门要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中央九号、十二号、十三号文件，以及中央领导同志在解决全国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和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指示。要抓紧解决重点企业的领导班子问题，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对那些问题多的企业，要一个一个分析，一个一个的解决。对革命和生产形势好的企业，要提醒他们防止自满松劲，要更深入、更踏实地做好工作，为国家作出更多贡献。

要认真做好生产的指挥和组织工作。首先把钢铁生产很快抓上去，继续抓好煤炭生产和铁路运输，同时坚持不挤不让的原则，认真抓好轻工市场。要严格按照国家要求的品种、规格和质量组织生产，全面完成各项经济技术指标，不要片面追求产值和数量，不要拼设备，并要注意安全生产，关心群众生活。要加强设备的维护检修，切实安排好维修配件的生产。要加快重点基本建设工程的进度，保证按计划建成投产。要发动群众，狠抓增产节约，坚持计划用电、节约用电，降低原材料和燃料消耗。要认真搞好综合平衡。根据需要和可能，有

计划地控制长线产品的生产，以腾出燃料、电力和原材料，增加急需的短线产品的生产。要狠抓财政收入，严格控制财政支出，坚决制止乱拉乱用企业资金，制止违反财政制度的开支。严重违反财经纪律的，要加以惩处。九月底以前，各级财政不要追加新的开支。短收较多的地区，更要严格节约支出。要组织好商品供应，增加货币回笼。

要切实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很快建立健全起来。要加强纪律性，加强全局观念。

所有地区、部门和企业都要对上半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认真的检查总结，对下半年的各项生产建设工作做出切实可行的部署。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认真执行"**鞍钢宪法**"，继续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一九七五年计划和第四个五年计划，为实行第五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国务院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二日

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作者张天民来信的批语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

全国铁路一九七五年上半年货运量创历史同期最高水平

(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新华社记者述评

当前，我国铁路运输部门革命和生产的形势越来越好，十分令人振奋。日夜战斗在铁路线上的广大职工，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不断发展，全国东西南北的铁路干线畅通无阻，运输效率不断提高。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的货运量与历史上同期相比，创造了最高水平。

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先行官"的前进步伐加快了，

对于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有重大的意义。

我国铁路运输大好形势的不断发展，又一次证明，毛主席指出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是一个真理。铁路运输的大好形势，是广大铁路职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结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

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从三月份以来，全国铁路职工及其家属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毛主席、党中央有关指示的热潮。他们认真看书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努力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广大干部和群众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武器，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各级党委狠抓企业领导班子的建设，克服资产阶级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大家讲路线，讲党性，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有力地促进了安定团结，发展了大好形势。上半年全国客货运输列车的正点率逐步上升，服务质量逐步提高，支援农业、支援钢铁生产和对外贸易等方面重点物资的运输任务都完成得很好。全国二十个铁路局中，有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锦州、北京、太原、柳州、成都、西安和乌鲁木齐等十个局，做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铁路基本建设工程的进度也比去年同期加快。机车车辆的产量逐月上升，质量提高。工人们加快了机车、客车的整修工作，过去积压下来的待修机车车辆，迅速修好出厂，为全国增加了运行的机车车辆。这一切都说明，整个铁路运输部门的形势发展，势如破竹，革命和生产面貌日新月异，处处一派新气象。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全国铁路运输部门发展大好形势的经验告诉人们，要使党的基本路线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得到认真贯彻，关键是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使各级领导班子成为本单位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强有力的指挥部。最近几个月来，全国铁路系统从路局到站、段的领导班子，都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联系本单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检查和讨论，从中找出差距，采取了改进措施，从而大大加强了领导班子的战斗力。成都铁路局党委一个一个地研究了全局站段一级的领导班子，帮助他们进一步搞好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同时，对二十个急需加强的单位所存在的问题，采取了有力措施，予以解决。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有的在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方面表现软弱的领导班子，提高了路线觉悟，带头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在团结方面表现松散的领导班子，加强了无产阶级党性，增强了革命团结；有的安于现状的领导班子，批判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振奋了革命精神，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大步前进了。由于加强了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一些先进的单位更加先进；一些原来满足于自己“贡献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的单位，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一些后进的单位迅速改变了面貌，有的已经进入先进行列。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工厂由于加强领导班子的建设和其它工作，今年上半年出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全厂提前完成了今年修理蒸汽机车的计划，结束了修理蒸汽机车七十四年的历史，开始制造内燃机车。北京铁路局原来十五个比较后进单位的领导班子，目前已经有十三个摘掉了后进的帽子，大步赶了上来。徐州铁路分局在四月份以前，革命和生产还处于后进局面。由于这个分局和所属单位的领导班子联系实际，认真学习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促进了安定团结，推动了生产。在短短的一两个月之内，全分局的面貌就为之一新，革命和生产蒸蒸日上，快步进入了先进行列。这个分局学理论，抓路线，讲团结，迅速变后进为先进，为全国铁路部门提供了有益

的经验。

许多单位的经验说明，领导班子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坚持唯物辩证法，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问题，各项工作就会做得更好，革命和生产面貌就会迅速改观。

只有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大搞群众运动，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迅速解决企业里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这是今年以来铁路运输系统发展大好形势的又一重要经验。几个月来，全国铁路部门大张旗鼓地宣传毛主席、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教育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使之成为广大职工的行动准绳。许多单位在加强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过程中，实行"开门整风"，发动广大党员和群众提意见，出主意，帮助领导班子端正路线，改进工作。有的单位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收效甚大，也主要是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调动了群众中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工人群众最听毛主席的话，群众知道了真理就会齐心去做。广大职工学习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更加认清了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当家做主人的责任感。在各个站段、工厂和工地上，"批修、批资、促生产"的无产阶级正气，"出满勤、干满点，各尽所能比贡献"的共产主义思想，大大发扬。有些角落里的资产阶级派性以及一切资产阶级歪风邪气就象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处处受到抵制。许多单位的职工群众自觉地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出现了反对违章，遵守纪律，团结协作，多拉快跑，努力提高运输效率的新局面。许多单位还放手发动群众，加强企业的基础工作，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要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必须从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高度提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我国，工人是企业的主人。是依靠工人群众办企业，还是靠少数人办企业，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根本区别。要把社会主义企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阵地，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只要把形势和任务交给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新华社 1975 年 7 月 28 日讯，载 7 月 29 日《人民日报》)

毛泽东关于《水浒》的谈话[①]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

① 这是毛泽东同芦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员）的谈话。谈话的当日，姚文元给毛泽东写信说："关于《水浒》的评论"这个问题很重要"，"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要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提出将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和他的信，"印发政治局在京同志，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同志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看了姚文元的信后批："同意"。

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

重视对《水浒》的评论

（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红旗》杂志短评

为了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本刊这期发表了鲁迅对《水浒》的一段评语，希望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个评语，完全正确。它指出了《水浒》的要害是"受招安"，即投降。原因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使它可以用来作为一部有意义的反面教材。

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

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阶级分析，《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同高俅的斗争，其实质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个派别的代表人物，他不反对皇帝这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他反对贪官，不过是为了效忠于皇帝，维护反动的

封建统治，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而已。认清宋江这一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能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记取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关于《水浒》的许多评论，几乎都违背了鲁迅的论述。不少文章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肯定的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其中一个基本的论点就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了"农民的局限性"。于是，投降派变成了英雄，农民起义的结果必然走向投降，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统统被抹煞了。请问：斗争不屈而失败，同宋江为追求"官爵升迁"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往往陷于失败，但投降绝不是它的必然结果。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实质上是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这是必须加以讨论和澄清的。

这里，重温一下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很有必要的。毛主席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毛主席还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的这些深刻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讨论和批判，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是完全适用的。《水浒》这部小说中的宋江，同《武训传》中的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我们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学习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道路，加强革命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原载《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9 期)

评 《水 浒》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竺 方 明

《水浒》是一部"歌颂农民革命斗争"的小说吗? 否。它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小说。

《水浒》是一部"革命教科书"吗? 否。它是一部反面教材。

鲁迅说得好："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于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写了投降，宣扬了投降主义路线，可以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一切共产党人，一切革命人民，要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请读《水浒》，请看《水浒》中的宋江。

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水浒》是以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为题材的古典小说。毛主席指出："**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断激化，"政日以堕，民日以闲"，封建制度已经走下坡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向地主阶级的统治进行了猛烈冲击。可是，曾经被誉为"农民革命史诗"的《水浒》，是怎样描写农民起义的呢？

《水浒》这部书，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贪官是坏的，皇帝是好的——这个思想，贯穿全书。小说中这样写道："到今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致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书中的梁山泊首领宋江，每当俘获朝廷将领的时候，再三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宋江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安营扎寨，招兵买马，攻高唐，闹华州，打大名府，主要的打击对象就是高知府、贺太守、梁中书这类的贪官。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是最高的统治者，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是一切封建官吏的总后台。农民阶级要反对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非反皇帝不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不能动摇地主阶级统治的。中国历史上，北宋以前的黄巾起义，北宋时的方腊起义，就都是反皇帝的，都把斗争的锋芒直指以"天子"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

《水浒》中的宋江一伙，是不反皇帝的，是忠于皇帝的。他们最害怕反皇帝的"黑旋风"。李逵不是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么？那可万万不行，"你这厮胡说"，"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以警后人"！宋江临死，还要对李逵下毒手，不扑灭这颗反皇帝的火种，他死不瞑目。宋江标榜的是"替天行道"。天国的上帝，乃是地上君王的再现。宋江的"天"，其实就是宋朝乾坤，赵家社稷，徽宗天子。宋江的"道"，就是孔孟之道，封建阶级的统治之道。一句话，"替天行道"就是要"尽忠报国"，为大宋王朝效劳。

在《水浒》中，反对贪官和忠于皇帝，是一致的。"忠为君王恨贼臣"，这句诗道出了其中奥妙。宋江等人"恨贼臣"，反贪官，不过是表明他们一片忠心为君王，要为"至圣至明"的皇帝"整顿朝纲"，除掉"贼臣"，修补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他们之间，在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农民革命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的矛盾，主要是"当道"与不"当道"，"专权"与不"专权"的矛盾。围绕这个矛盾，他们展开了争权夺利的激烈斗争。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正是由于宋江不反皇帝，终于让人招安了。

反动的地主阶级政权，对于农民起义，历来采取反革命的两手：征剿和招安。打得垮的就征剿，打不垮的就招安。小说中的朝廷，交替使用了这两手，最后搞了招安这一手。

书中的宋江，恰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把受招安作为

农民起义的奋斗目标。起义，就是革命；受招安，就是投降。两者本来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可是、《水浒》竟然把这两者统一了起来，炮制了一个“造反为招安”的标本。

反对招安还是接受招安，这是梁山泊农民起义中革命路线和投降路线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在小说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居于统治地位，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则处在下风。尤其是，小说嘲笑和否定了李逵等人的反投降路线，把它写成是愚蠢莽撞的行动，用来反衬宋江投降路线的正确性。可见，小说所要肯定和宣扬的恰恰是宋江那条投降主义路线。招安好，投降好！——这就是《水浒》的主题歌。

《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在受招安之后，就走上了镇压农民起义的道路。

原来是“替天行道”的“强盗”，如今成为“官兵”了。做“强盗”的时候，“替天行道”是反贪官；当了“官兵”，“替天行道”要干什么呢？宋江等人主动从朝廷讨来“圣旨”，去打方腊这个不“替天行道”的“强盗”了。方腊的起义军，占据八州二十五县，改建年号，“南面为君”，确实是一支不“替天行道”的反皇帝的农民起义队伍。在这支农民起义队伍面前，宋江一反他当年在“官兵”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常态，摆出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自称“天兵到此”，恶狠狠地叫嚷“我若不把你杀尽，誓不回军！”对于俘获的方腊起义军将领，“剖腹剜心”，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反革命立场是何等鲜明，他那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嘴脸是何等狰狞！此时此地，宋江之流“替天行道”的反动本质，也就暴露无遗了！

打方腊，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行为。对于这样的反革命行为，《水浒》竟然为之歌“功”颂“德”，高唱“名标青史千年在，功播清时万古传”的赞美诗。然而，“终于是奴才”。在奴才的脸上涂了一层发光的油彩，只能使革命人民更加憎恨和厌恶。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镇压农民起义，这就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的三部曲。

有一种曾经颇为流行的论调，说什么宋江投降是“农民的局限性”。这种论点，抹煞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对立阶级、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实质上是为投降派辩护。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前仆后继，不屈不挠，向地主阶级的统治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显示了中国农民阶级的革命硬骨头精神。只是由于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最后总是陷于失败。但是，失败不等于投降。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那是叛徒和奴才的勾当，跟“农民的局限性”风马牛不相及。斗争不屈而失败，同追求升官发财而投降，怎么能说成一回事！？农民阶级尽管也有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决没有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这种“局限性”！

一个投降派的典型

宋江是《水浒》的主人公。在文学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水浒》为了鼓吹投降主义，用浓笔酣墨刻画和歌颂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典型。

“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这两句话是宋江反革命一生的自供状，维妙维肖地勾画出他这个投降派的反动嘴脸。宋江混进梁山泊农民起义的“烟水寨”，就是为了叛卖农民革命事业，去换取朝廷招安、升官发财的“凤城春色”。

《水浒》中的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是一个满脑子装着儒学秕糠的孔孟之徒。他把农民起义看作是“犯了迷天大罪”，参加起义就是“不忠不孝”，因

而几次拒绝上山。宋江不得不上梁山后，"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左一个声明"宋江等本无异心"，右一个表白自己"忠肝盖地"，要"尽忠报国，死而后已"。接受招安后，他就更加死心塌地替封建统治阶级卖命，去镇压别的农民起义军。直到临死，他还念念有词，说什么"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甚至宋江死了，《水浒》还要让他的幽灵进入宋徽宗的梦境，向皇帝"垂泪启奏"，真可谓忠君报国，死而不已。总括宋江一生，他一直以"忠君"作为自己言行的最高准则，根本不是什么"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而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也，大宋皇帝的忠实奴才。

正是由于"忠君"，宋江一贯热中于受招安。早在他上梁山之前，当武松被逼投奔二龙山的时候，宋江就劝武松："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宋江本人，如果能够在仕途上爬得上去，他是决不会上山的。但是，杀惜、刺配、被判死刑，弄得他"名又不成，功又不就"，甚至连命都保不住了，只好"权借水泊"、"随时避难"。宋江上了梁山，就起劲地鼓吹招安，等待招安，乞求招安，推行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两面三刀，小恩小惠，笼络人心，篡夺领导权。晁盖一死，他就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换成"忠义"，一字之差，篡改了梁山泊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

为了受招安，他不敢"侵占州府"，不去扩大农民起义军的地盘，故意放走朝廷的残兵败将，留下日后投降的后路。

为了受招安，他软硬兼施，排挤革命派，压制革命派；同时招降纳叛，网罗世袭贵族、朝廷将领和豪绅地主，委以重任、组成一支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骨干队伍。

为了受招安，他在一百零八人大聚会时，当众宣布"惟愿朝廷早降恩光，赦色逆天大罪"，公开抛出了乞降的纲领。接着，在菊花会上，他又赋词明志，"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为了受招安，他亲自出马，打通皇帝宠妓李师师的"枕头上关节"；派人向殿前太尉宿元景行贿，求宿太尉在皇帝面前说情；在梁山泊的死对头高俅被俘后，他竟奴颜婢膝地"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乞求"慈悯"。其行径之卑劣，令人作呕。

小说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又让他在宋江上山不久，中箭身亡，及早"归天"，正是为了突出宋江这个投降派，为他受招安扫除障碍。晁盖是梁山泊农民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他有意"托胆称王"，立志"要和大宋皇帝作对"，坚持了一条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宋江钻进农民起义队伍以后，以革命者的姿态，干反革命的勾当，用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修正"了晁盖的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农民起义，就是这样葬送在宋江一伙投降派之手。宋江根本不是什么革命的"同路人"，而是一个把农民起义引向毁灭道路的叛徒。他对农民起义也谈不上什么"有功"，而是一个出卖农民革命的大罪人。

有的评论文章说什么宋江这个人物具有双重性格，既有妥协性，又有革命性。这个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自始至终坚持投降主义路线。他一贯忠于封建王朝，一贯反对农民革命，是钻到革命队伍里来破坏革命的，根本没有什么革命性可言。宋江的性格是统一的，统一就统一在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典型。

一套投降主义哲学

《水浒》这部书，为了宣扬投降主义路线，歌颂宋江一伙投降派，极力兜售腐朽透顶的

孔孟之道，鼓吹一整套投降主义哲学。

"天命论"是剥削阶级维护其反动统治，毒害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总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这一反动的精神枷锁。而《水浒》却在第一回，开宗明义，就说人间的治乱祸福都是"天命"。不仅宋朝的历代皇帝是上天差遣的神仙下凡来统治人间，而且《水浒》的一百零八人也是天遣的"魔君"来世上历劫，退净"魔心"，以成"正果"。这一来，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关系，就不再是两个敌对阶级的关系，而是同样奉"天命"而来，为行"天道"而生的了。一部《水浒》就建筑在这块"天命"的基石之上。书中两处"石碣天文"的描写，两次"九天玄女"的出现，两番"龙君"的显灵，都是在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强调"天命"的无上权威和主宰力量。例如，宋江刚刚上山，"九天玄女"就给他传下"法旨"；"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因此，农民起义队伍向地主阶级投降便是"顺天"；为皇帝尽忠，护地主阶级之国便是"替天行道"。《水浒》就这样把可耻的投降行为蒙上了一层神圣的灵光，把"天命论"当成了宣扬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

"忠义"是封建宗法思想的核心，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教条。《水浒》极力歌颂宋江为代表的投降派"忠义双全"，宣扬投降就是"忠义"，"忠义"必须投降。地主阶级中的有些人正是在这一点上看出了《水浒》宣扬"忠义"的妙用。有的人说："《水浒》而忠义也，忠义而《水浒》也"，简直把《水浒》当成了"忠义"的代名词；有的人则干脆把《水浒》书名改为《忠义水浒传》。《水浒》这部书确实是以"忠义"为中心来设置矛盾，展开情节，塑造人物的。"忠义者"和不"忠义者"的矛盾是统贯全书的基本矛盾。小说中，反面人物高俅，"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正面人物宋江，则是"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水浒》写宋江的"造反"，不是"官逼民反"，而是"奸"逼"忠"反。他权居水泊，积聚力量，专等招安，报效朝廷，可以说是曲线"尽忠"。在对待农民起义的问题上，《水浒》向地主阶级提供了比暴力镇压更加毒辣的思想和策略，即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队伍拉向投降。

升官发财是一切剥削阶级的人生哲学，功名利禄是一切反动统治阶级网罗奴才的诱饵。《水浒》通过描写宋江的一生——从"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开始，到被迫上山，接受招安，去打方腊，终于功成名就结束，宣扬了反动腐朽的人生哲学。宋江认为人生在世，就要求得"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青史留名"。这个"凌云志"，促使他自己大搞投降活动；他引诱别人投降的时候，也常常使用这一套。宋江可耻地死了，他手下的大部分头领也都在打方腊的过程中做了牺牲品。但《水浒》写的宋江等人的下场，并不象有人所说的"招安后的悲剧结局本身就带有批判性，告诉读者——此路不通"。恰恰相反，《水浒》的整个结局，不是批判性的，而是歌颂性的。你看，死了的，"各授名爵"，有子孙者"承袭官爵"，无子孙者"敕赐立庙"；活着的"管军管民，护境为官"。宋江死后，天子还"敕封宋江为忠烈义济灵应侯"并命于梁山泊"起盖庙宇，大建祠堂"，"御笔亲书'靖忠之庙'"，"年年享祭，岁岁朝参，万民顶礼"。在地主阶级眼里，还有比这更大的荣耀么？"生当鼎食死封侯，男子生平志已酬"。《水浒》全书结尾中的这两句诗，也就是宣扬投降主义哲学最后完成的一笔。

* * *

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宋江，是古代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一类，推行修正主

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

在当前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运动中，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揭露《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划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这不但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对于整个文艺评论和文艺工作，而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

(原载1975年8月31日《人民日报》)

江青在接见大寨大队干部和社员时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

首先向同志们报告一个好消息，咱们的主席身体很健康。最近在接见西哈努克亲王他们的时候，主席的眼睛都能够看见西哈努克的白头发，听觉比我好。脑力清晰，记忆力强，吃饭好，睡觉好，心脏好。我是到这儿来向同志们学习的，是经过主席和政治局批准来的。看！你们还是欢迎我这个学生，还喜欢教我。我做庄稼活不行，比不上同志们。现在天天学一点，不过我先告诉你们这些老师，我手上已经打了一个泡了。大寨是咱们毛主席树立的全国性的榜样，我到这儿来，好象到了休养所。我真的比在北京吃得也好，睡得也好，精神好多了。所以大寨不可以不来。同志们要原谅，我早就想来了，但是一来工作忙，老是身体差、带病工作，走不开，那就拖啊，拖啊，拖到今年。我来只做了三天的准备，怕发烧，因为我有低体温。我说：发烧我就走，我不给你们增加负担。结果我没有发烧。同志们，我吃得好，我老觉得饿，我睡得好。所以要感谢同志们，收留我这个学生啊！我是来学习的，学习同志们这种革命干劲，苦干、巧干、大干。我看了你们的科教片，那是很感动人的。我缺少发言权，因为我种庄稼不行，我只能剪剪花椒啊，什么掰掰棒子啊，这还可以。其它庄稼活儿啊，都不太懂。我只开过半年荒。在这个问题上，我不要献丑啦！

现在我随便讲一点学习的问题。还没有进城以前，为了反修防修，咱们的主席就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警告，要当心敌人裹着糖衣的炮弹，要是被这个炮弹打中了，就很难爬起来啊！进城前后有一系列指示。在旧社会工人失业，挨饿受冻，现在我们刚解放，工人能够有饭吃就好了，不要乱提加薪的口号。毛主席还说，军队和我们的党政机关搞供给制好。结果，主席的意见遭到抵制，五二年全部冲垮了，全部抄苏修，弄得现在咱们还挺被动的。大寨是大队核算制，而且整个昔阳都是大队核算制。同志们想一想，大寨、昔阳，旧社会是穷乡僻壤，荒山恶水呀！现在都能够搞成这个样子，亩产过千斤，有的至少也是五、六百

斤。现在最好的地方有的还抓不好，为公家干活少，为他自己的自留地呀，自由市场干去了。有的即使搞公家的，因为领导班子不带头，也搞的不怎么样。另外中央也派了人做了三个公社的调查研究。大寨、昔阳能够做到的，全国为什么不能够做到呢?全国有的地方比咱们这儿好。我们中国，苏修、美帝都瞪着眼睛看着。那是最富啊!我们是最大的石油国之一，人家的眼睛都瞪着咱们哪！去年，杨振宁回国。我接见了他一下。他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山东诸城人。他说，哎呀!资本主义国家搞石油化工的人，都瞅着你那个家乡呐！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地下都是石油啊！你看，不仅是咱们的大庆，不仅是天津的大港油田，多啦！现在我们的大陆架全有油。美帝国主义狡猾，他有的资本家跟南朝鲜、台湾订了合同，钻探石油，美国政府就警告他的资本家说，你不能去。因为他怕和中国的关系搞坏，要留一招儿。这是很重要的。苏修你别看他张牙舞爪，他也不敢大弄。因为他们都是纸老虎。当然，咱们不能说世界上没有疯子。纸老虎里边有疯子，它们会发疯的。不然，搞那么多原子弹当饭吃啊?搞那么多坦克、飞机是当饭吃啊?是要打仗。所以我们主席常讲“备战、备荒、为人民。”现在讲“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你们这儿深挖洞恐怕有些问题，我昨天去挖了一条防空壕。我还想在田边地头为你们挖一些一两人的掩体。你们可以去瞧一瞧，我那个挖得不标准。我手上那个泡就是在那儿打的。

主席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进城的前后一些电报，都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但是被一些同志抵制了。有的地方好一些，有的地方就破坏的厉害。不过，全国搞得这么复杂的级别、工资，那是全国性的。搞单干也带有普遍性质。全民所有制也有所突破。但是，主要的还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集体所有制也主要是主席这条革命路线。就有那么些地方，象浙江，那么好的地方，那么好的气候，那么好的水，那么好的土壤，它搞得一塌糊涂。它从刘少奇时候起，有些地方一直就是搞单干，砍掉了几十万合作社嘛!并不是浙江全省，就是浙南有那么一小部分，我老收到群众的来信。进城后土改反霸，这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革命，但是，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完成的。不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那就更早了。《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胡风分子、对一九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的反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海瑞罢官》、京剧会演；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还有哲学方面的“合二而一”，历史学方面的“让步政策”，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孙冶方(比苏修的利别尔曼还厉害哩！)叫“利润原则”，你们过去叫“工分挂帅”吧？那是叫“奖金挂帅”啦！经过了一系列政治运动，到五七年右派猖狂进攻。我们的主席说“放”，让他们跳出来，不怕。我们都在报纸上先登他们的文章。他们放够了，然后主席率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反攻，一下子就把他们打退了。但是刚一打退，新的斗争又来了。五八年大跃进，刘少奇、陈伯达那伙人又搞什么“一平二调”，同志们知道吗?“一平二调”，不要货币，还有几样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我害病，知道的不多。就是说东西都不要货币啦，我到你那儿去调，搞绝对平均主义。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到了五九年，彭德怀就又跳出来了。彭德怀是苏修的人，把大跃进说得一无是处，把大跃进的成果破坏了很多。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撤退专家、撕毁合同、逼债。其实我们只欠他们三亿美元。我们欠的主要是抗美援朝的钱哪！我们就勒紧肚带嘛！我们的主席很长的时间带头不吃猪肉，为了出口还债。苏修这个社会帝国主义，那个狰狞的面孔，在中国表演的是足够了。他在中国的代理人彭德怀就跳出来上万言书(他那个万言书我是看过的)。后来就打退了。好，到了六十年代初期，又来了。叫做什么“摘冠加冕，赔礼道歉。”叫我们工人、贫下中农，向资产阶级，向地、富、反、坏、右赔礼道歉。摘冠，就是摘掉帽子；加冕，冕是皇帝戴的帽子，可漂亮了！就是在广州开的会嘛！而且搞了许多

名堂的高薪，高薪到一千、二千元。上海有一个唱京剧的叫周信芳，每月二千元，国家还要给他两个秘书，一个汽车司机，一个厨师，两个服务员，这些都要国家报销。他原来是黄金荣大戏院的老板。他老婆是银行家的女儿。那时候刘少奇这个集团把他捧到天上去了，他成了我们“唯一的艺术家”啦！而他呢，就搞《海瑞上疏》。还没有弄出来《海瑞罢官》就出来了。批判《海瑞罢官》大家知道吧？这已经是序幕了。进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然后就是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修整风，批林整风，批林批孔，学习理论。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的毛主席在中国进行的伟大的实验。我们的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要跟资产阶级搏斗，公与私也要搏斗。我们总要战胜地主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社会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这两霸，还有其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影响。这一系列的运动，都是我们主席本着马列主义教导的发展。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只有两个多月的经验，即一八七一年三月巴黎公社的经验。他总结了这个经验，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列宁从一九一七到一九二四年，有七年的实践经验。他的实践经验比马克思就多了。但是，他退了几次薪水，退了多少次礼物，也阻挡不住。列宁去世得早，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他对这个问题，提得也是非常尖锐的。我们的主席，除了采取这一系列的运动以外，也是退过、降低自己的工资多次，没有用。所以主席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特意提出要读三十本书，就是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干部，都要读这三埂本书；还对《简明哲学小辞典》写了按语。《简明哲学小辞典》第三版是毛主席同苏修斗争的结果。其中还有错误，我们的主席在按语中说了，我最近又复习了一遍，就更明确的看出它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物质刺激。它那里头有那么好几条不敢讲阶级斗争，不敢讲国内矛盾。列昂节夫(这个人现在是个修正主义者)他写了一本《政治经济学简明教程》。在三五年以前，这个版本是好的，基本上是按马克思主义写的。我们在延安就是读的这个版本。如果没有这两本小书作基础，读马列比较难；并且还得读一点历史。我希望大寨人，除了生产上带头，学习政治带头，学理论也应该是带头的！要不要啊?我学得不好，学得也很少，记忆力也不好。主席在听取四届人大汇报时的指示，其中有的我过去学过的。我对《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没有读完，就是选了那么多少本读了。主席这次指示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第一段就说，“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最重要的是后边这句话。我们的主席最相信全国的广大人民，全党的广大党员、干部，全军的广大指战员。使每一个人懂得这是个什么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不搞清楚，就会变成修正主义。因为有资产阶级法权嘛！所以底下那一段，主席就讲，我们跟旧社会没有什么不同。所不同的就是所有制变了。其实现在所有制也有问题啦。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调查了几个点，有问题。比方说，有一个电影厂，它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制，它是现代化的厂啊，但是它搞“三大自由一中心”，什么叫“三大自由”呢?就是自由创作、自由结合、自负盈亏；导演中心制。什么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把我们党完全不放在眼下。他们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过问，尽出毒草!你们看过毒草片没有?批过吧?主席在第二段里头又讲了我们现在还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现在实行的还是商品制度。你们这儿有商品啊?我们那个钓鱼台也有商品，因为我们种了中草药，我们得把它卖给公家，是我和我身边工作的同志们种的。我们种了一些经济价值比较高的中草药，又可以美化庭院，又可以为国家增加财富。我们种的菜也很多。主席说怎么办呢?对这个问题，你总不能空想吧?不能一步登天就到了共产主义。我们也不能跟旧社会截然划开嘛！怎么办?这么长的历史阶段，两个阶级搏斗，两条路线在我们党内搏斗，怎么办?主席

指出，"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我认为，这是对马列主义的贡献，是发展。就要不断地搞运动，告诉全国人民，告诉广大干部、党员，告诉广大指战员，擦亮眼睛。

最近评《水浒》是我们主席亲自批的。《人民日报》引了一段。我把全文念给同志们听听。这个非常重要，要结合学习理论，结合批林批孔，都可以结合起来学。当然你们前面两小段已经知道了。看过《人民日报》啦?学习了一次吧?我再读给你们听:"《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晁就是晁盖，是真正的领袖。前头还有一个"呀呀呜"的领袖，叫什么白衣秀士王伦。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你们看到的就是这一段吧?我把底下的都读给你们听: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宋江的"替天行道"，是替天子行道。不替天行道的是那个方腊。宋江去打方腊了，是奴才，刽子手。他自己变成奴才，还带着广大劳动人民都变成奴才了，死的死，伤的伤了，最后宋江连李逵也给毒死了。你们有没有《鲁迅全集》呀?这篇文章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

第四段:"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人，这是个坏蛋，杀了头，杀得冤枉。杀头冤枉，不是说别的，他是个很坏的文人，反而被杀，故说冤枉。

第五段(这是主席下达的具体措施):"《水浒》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种都要出。把鲁迅的那段评语印在前面。"这是个什么研究呢?同志们，一百回、一百二十回都是全的，写了宋江投降。七十一回是咱们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搞的、五四年搞的。砍掉了后头还不说，还伪造了一回，又把前头的楔子改为第一回，后头搞了个排座位。反正是没写到投降;里头把一些太露骨的还稍微改了。我最近查了一下，还有一个专门给儿童少年读的六十五回本，一九七三年出的。你看，用心何其毒也!毒不毒啊?不仅毒害我们大人，还要毒害儿童少年啊!小朋友，你们看到六十五回的那个本子没有?现在要改，增加到八十几回。你们可以看到宋江那个奴才、阴谋家、两面派的丑恶面貌。

所以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同志们，不能那么讲。不是，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对历史，对当代也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宋江这个家伙，我今天看了两篇文章，它们作了一点分析。我推荐给你们。它根本上是好的，有一些小毛病。宋江这个家伙死也不肯上梁山。为什么梁山对他那么好呢?原因是梁山好汉被捉，他是刀笔吏、大地主，收买他好救梁山好汉。这个，我们过去在白区工作时也有这个经验，我们自己的同志如果是在租界被捕，可以请律师，可以出点钱买出来。宋江他是受贿，他对什么人都受贿。贿赂啊!我的语言懂不懂?他死也不肯上梁山的。他杀了阎婆惜，阎婆惜是他的小老婆。犯了罪，杀了人，关起来了。关起来，他也不肯上梁山。他说，我是忠臣，是孝子，我犯了法，犯了不赦之罪，我宁愿刺配江州(就是江西，江州在江西)。到了江州，他所谓题了一首反诗。那是什么反诗?碰鬼!他那四句诗是这样说:"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漫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

夫”。这哪儿是什么造反的诗呢?黄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呢?黄巢自号“冲天大将军”。黄巢，同志们知道吧?是唐朝农民起义的领袖。几十万农民大军。他自号“冲天大将军”，冲天子啊！他最后打败了，宁死不屈。宋江是笑话他的。宋江那个时候刺配江州，不得意，所以他“心在山东身在吴”，很感慨呀!他是感慨他个人。“他时”，他说另外的时候，我要是得了凌云志啊！上天了，上了他那个皇帝的身边儿啦!“敢笑黄巢不丈夫”，黄巢冲天，所以不是大丈夫。这样子的诗，那些昏庸的官吏还是捉起他来了，要杀头呢!晁盖他们去把他救出来。他还曾说晁盖造反上梁山是灭九族的勾当，要灭九族啊！他批评晁盖，他说于法度是饶不得的，犯了弥天大罪啦！就是说造反无理。这是《北京日报》的文章上说的。他说他自己很可怜，不忠不孝。晁盖他们要给他开枷锁。他说，这不能，这是国家的法律，不敢随便动。他自己哀叹他自己，年已三旬(大约三十几岁)、名又不成、功又不就。说穿了，就是他的个人野心没有实现，所以就要打个主意，钻到革命队伍里，抓住这支军队，你皇帝老儿就不能不招安，不能不封我大官。就是这个意思。他这是什么反诗啊！你们看，隋末农民起义的时候，我们山东流传过一个歌儿，叫《王铁匠歌》。说:“要抗兵(要抵抗官兵)，要抗选(要抵抗皇帝选妃子)，家家要把铁器敛(家家要把铁器收敛起来)，敛起铁来做成枪，昏君脏官杀个光。”这才是造反嘛!宋江那是什么反诗啊！你们找一本一百二十回看一看。有没有啊?没有，我有一部送给你们。今后还要出呐！不过你们现在没有东西学，就拿一部每个队传着看。把我的都给你们。黄巢作什么诗呢?黄巢有一首《冲天诗》。冲天啊!就是冲天子啊!”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时百花杀”。他说，我的花开的时候，百花都杀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是黄金甲”。他要杀到京城去，满城都是他的队伍。所以黄巢才是英雄呢!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英雄领袖多得很哪！我只举有名的：反对秦二世胡亥人的陈胜、吴广。刘邦也算一个(刘邦做了皇帝就是了)。到了汉朝，就是赤眉、铜马。赤眉就是把眉毛染成红的，作为标志；它的领袖叫樊崇。铜马的领袖我一下子记不起啦，忘记了。唐朝，那些小的我就不去说了。对了，陈胜、吴广同时还有英布又叫鲸布。鲸布就是修骊山的那个脸上刺了字的囚徒，奴隶呀，带着锁的奴隶呀，作苦工的。鲸布是农民暴动的领袖。不过他后来作了官，叫刘邦杀了。唐朝有好几股，最有名的是黄巢，还有王仙芝、好几个人。几十万、几百万的起义军。宋朝，最著名的是方腊，洞庭湖的杨么。方腊是在浙江。还有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独独是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他怎么篡夺的领导权呢?同志们，他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这是他的组织路线。他在思想上，阴阴阳阳地说要忠啊，要孝啊。他那个忠啊，就是要忠于宋朝的皇帝老儿，就是宋徽宗、叫赵佶。这个家伙是个俘虏，叫金国(咱们的少数民族)俘虏走了。这些起义的领袖，被杀的被杀，自杀的自杀。黄巢是自杀的、不屈服。明朝最大的是李闯王。李闯王，知道吧?还有张献忠；还包括朱元璋。他后来是做了皇帝就是了，他是个小和尚。满清的就多了，小的什么三元里、平英团就不去说了，我讲大的。象义和团、捻子，特别是太平天国，那都是几百万人哪!从广西一直打到南京，建立了政权十年左右。他的队伍已经打到河北省了。后来，内讧，出了叛徒，先是石达开(石达开是个大地主)闹分裂叛变，后是叛徒李秀成。洪秀全是自杀的。满清勾结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同志们，火药是中国发明的；据一个外国科学家研究，火炮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连马镫也是中国人发明的。这个科学家说，欧洲人的现代科学是建立在中国的古代科学基础之上的。我们应该有一点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们不搞大国沙文主义。噢，这个外国科学家是英国人，叫李约瑟。他的书

已经出版了几部。我要送给你们一部分。你们看一看，他在社会科学这方面不通，什么儒，法呀，他弄不清楚；在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比我们还系统一些。因为我们没有人那样研究过。这个满清啊，勾结洋枪队，来镇压太平天国。那时我们只有冷兵器。洋枪队就是热兵器。于是就被镇压下去了；再加上叛徒投降。噢，宁死不屈的还有一个英王陈玉成。他是被人骗了。他只有二十几岁，被人骗了。他很会打仗，后来没有粮食了。一个叛徒骗他说，我这个县里有粮食，你来吧！一去就被捉起来了，让他投降。那个僧格林沁(满清的一个蒙族的亲王大将)可怕他啦，他不肯投降。他说，你满洲王朝是妖，他就骂妖。这就砍了头。这是多么勇敢壮烈呀！我们这个出版社、出版口，还有一些所谓学了马列主义的文艺评论家，说什么宋江是有农民的局限性。我问问大寨的农民同志们，你们革命有局限性吗?气人哪！咱们是要打倒帝、修、反。是不是啊?但是，有这么一小撮坏蛋，混到咱们的队伍里，吹捧这部美化叛徒的书。这部书在明朝就是官书，在清朝成了官戏。皇帝下命令排成连台本戏，水浒戏多的很哪!这为了什么呢?为了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封建统治阶级是有经验的，单杀不行，还要有软的一手。蒋介石嘛!"四·一二"事变就杀了我们好多人啊！到二十年代末期，三十年代初期，他总结了经验。他不杀了；他搞自首政策；他搞反省院。有的人就自首叛变了，不少。王明，就是混进我们队伍里、里应外合，配合国民党，一来就是要去游行示威，游行示威不行，发行集会，飞行集会不行，还不就是杀头。我说是飞脑袋去。我是有点经验；我是一个王明路线的受害者；我是王明路线中期入党的。那个所谓的示威游行啊，到后来只是剩下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放放鞭炮就跑了，还要捉人。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宋江的政治路线，他先是用思想来腐蚀，讲义气呀，搞什么小恩小惠呀。他哪来的钱啊?还不是剥削来的！受贿赂来的！收买人心。然后他的政治路线摆出来了，这就是说，要招安，要替国家、替皇帝效劳；就是贪官污吏不好；他同那些人有矛盾。其实他还不是贪的很！你看，他连晁盖、农民暴动领袖的贿赂都收嘛，这书上都有。把这个看一看。你看那个，我现在记不起在哪一回了，他有一个"潜"字，潜藏他的爪牙。他说，上梁山是要潜伏，象一头老虎，潜伏起来，躲起来，藏起来，就是把他那个凶恶的面貌藏起来，一有时机他就要出来。唉，这个跟林彪不是一样吗！你们看过林彪的那个《"571工程"纪要》吗?还有那个批林批孔材料之一，其中有一条。我到林彪家里去，他那个现场破坏了，我让他们恢复了。他那个床的对面的墙上，挂着这么两幅东西。一幅就是"克己复礼，唯此为大"，另外一幅，叫做"勉从虎穴暂栖身"。这是《三国演义》上的。他说勉强在老虎洞里头，暂且藏着。他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这样好的地方叫做老虎洞啊！"暂栖身"，就是暂且住一下。这个材料你们都有，找来看一看。也许他是从宋江那儿学来的。这首诗是写刘备对付曹操的。他改了一个字。宋江这个我记不牢了。他就是说潜伏起来，把爪牙收敛起来，一句话，伪装起来。外国人叫"木马计"，咱们中国叫(鲁迅也说过，咱们的主席也说过)堡垒最怕从内部攻破。总而言之，我们党内的投降派、修正主义者，干的事情是公开的敌人做不到的。宋江干的事情，现在有些工人同志，有的地方贫下中农也批了，批到这一点上了。说公开的敌人干不到的事情，打着革命的招牌，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在我们党内做公开敌人做不到的坏事。你看，不远嘛，林彪嘛！林彪不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嘛！是不是啊?跟宋江比一比看。赫鲁晓夫一上台，就搞和平过渡。他说我们中国是"黄祸"。过去帝国主义说咱们黄种人是"黄祸"，是祸害，是对他们白种人来说。赫鲁晓夫上台就同阿登纳(西德的那个总理)就讲这个。那个人不

同意。那个人厉害，那个人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是政客。勃列日涅夫天天喊缓和，缓和，缓和个屁！他自己内部就缓和不了。他那个民族问题可大了。他那个地方自由市场可不得了啦！凡是干部，家家盖小别墅。盗窃集团可多啦，可大啦！苦了老百姓啦！不象咱们这儿。我到你们家里去吃了两顿饭了。我准备每家都去，能够轮流去吃派饭。你们欢不欢迎我?要跟国内的修正主义对比。要跟古代中国历史上那些真正的创造历史的英雄(就是农民起义及其领袖)对比。

工人阶级是我们党领导的，这是二十世纪的事。这以前都是农民革命的问题。二十世纪初，"五·四"运动是一九一九年，替我们党作了思想准备、组织准备。我们党的成立是一九二一年。我们党自从成立就存在两条路线。先是陈独秀。那个时候我还在桌子底下爬呢，所以我说不清楚。到了王明时候就知道一些了。王明以后这些我就知道了。王明先是"左"，骨子里头是右。后来又从莫斯科回来，在抗日战争中又搞了一次极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叫做"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把我们当时的根据地也叫人割掉了一些。要学一点历史，学一点党史。小朋友们也要学。不学就不能够识别坏人嘛!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坏人也可以伪装好人。林彪就学冯玉祥啊！我就从来不知道他家里那么阔气、不得了啊！而且他是个大盗窃犯、大贪污犯；工业，农业，全国一平二调。他那个院子前头，就有这么两个小房间，什么都没有，有个门洞。我们只能到他那个小房间。墙上什么也没有，只挂了一张主席像。他的吹鼓手，就说他怎么样苦啦，怎么艰苦啦，他是睡硬板床啦，什么烧煤球炉啦，什么一块馍馍干吃不完留着下次吃啦。才见鬼哟!我去看了。他那个床头上有很宽很大的一块大板。上头尽写着吃什么，吃什么有营养价值；其中还有很滑稽的事情，说什么吃茶叶膀胱出汗。请问，膀胱出汗谁知道?还说吃杏脯，吃一个不出汗，吃两个出汗。我说好，我来试验试验，结果我吃多少也不出汗。我不吃反而拚命出汗。我有出汗的毛病，就是汗腺不平衡，因为做过放射治疗。那个家伙他是造谣。林彪那个家伙，他一走就是多少里路；他不是走不动；他不象我这样，每天要坚持锻炼。我每天要打拳哪!"闻鸡起舞"、"枕戈待旦"嘛!所以，不要把学评《水浒》看成是文艺界的事。不是啊，不是那么回事。你看嘛，主席对学马列的指示这篇讲话，有人就不提了。我刚才讲的主席对马列主义的贡献、发展，有的人就胆敢删掉。这个，你们就可以识别了嘛!你看，宋江怎么处心积虑地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最后，晁盖第一天死，第二天他就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晁盖那个厅叫聚大义。晁盖托胆称王啊，他是造皇帝的反的。他是聚义，象咱们这样，聚在一块商量大事啊。宋江一下子改成忠义堂，要招安。反对招安的他就要杀。李逵差一点就给他杀了(大概在七十回上，记的不太清楚)。最后还是被他毒死了。为什么呢?皇帝老儿还是不相信宋江，最后赐给他毒酒。他吃下去了。他想，糟糕了！留下李逵，还是要造皇帝的反，这不好。他就把李逵叫了去，劝李逵吃酒。李逵就吃了。吃了以后，宋江就告诉他，你吃了毒药了，我跟你一块死，我们要忠于天子，我怕你造反。你看，多歹毒啊！宋江这个人啊，两面派的手法可多得很哪！要好好地读一读。然后，把主席在今年四届人大要我们学理论的指示联系起来，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这样可以使理论学习深人。没有理论的的指导，革命不能成功。没有实践的理论，那也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理论。总是有人要搞破坏的。我们不要作"阶级斗争熄灭论"者。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发明的，无产阶级专政才是他发明的。那么我们不仅承认阶级斗争，不是熄灭了，而且要看到我们党内有两条路线的激烈的斗争。所以有人说，哎呀!学理论怎么困难啊，理论不怎么样啊。有人他就不批林，不批孔。原因是什么?怕批到他们自己头上。他们跟他们划不清界线，或者就是上了贼船，潜伏在咱们党内的，所以

破坏批林批孔，破坏理论学习。现在我们批《水浒》，看看宋江如何排斥晁盖，架空晁盖。他把那些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不然，他那么容易得逞?晁盖一死，第二天全部实现了。所以主席说，搞修正主义很容易。怎么办?就是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对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几年的经验，哪儿批林整风好、批林批孔好，那儿的工作就好，那儿的生产就好，那儿的战备就好。今年以来，哪儿的理论学习好，那儿的生产就翻几番。你们今年就翻了，我知道。究竟翻到什么程度，我可不知道，因为还没有最后落实，这就说明问题嘛！可是，有的人就不以为然啊，因为群众都在学啦，能够鉴别两面派、投降派、修正主义是个什么玩意儿，他藏不住了。同志们明白吧？我们的毛主席最相信广大群众，广大的党员、干部、广大的指战员，要大家都懂。我们都应该好好地学习。我现在年纪虽然大了，脑力也不好，被迫害的，身体也差，但是，我努力学习，我向同志们学习。我看我的话就这样完了吧!

〔附〕 “评《水浒》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 《人民日报》文艺部

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际，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落实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革命和生产的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冒出了一场所谓“评《水浒》运动”。从一九七五年八月开始，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秋“四人帮”覆亡之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及其他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刊出梁效、柏青、罗思鼎、竺方明、方岩梁等的黑文，从含沙射影，牵强比附到指名道姓，恶毒攻击，大肆诬蔑毛主席，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疯狂叫嚷党内出了“投降派”，在各地掀起层层揪宋江的恶浪。当时，革命的人民怀着深深的迷惑和忧虑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从心底发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四人帮”被粉碎以后，随着揭批运动的深入开展，疑团终于解开了。现在让我们看看“四人帮”怎样肆意歪曲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于《水浒》的评论，搞了哪些为善良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阴谋活动?其罪恶目的的究竟是什么?

精心策划的政治大骗局

“四人帮”策划的“评《水浒》运动”，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的。“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的社论中说:“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本报和其他报刊开始了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他们故意蛊惑人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

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呢?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有一个教师向毛主席请教关于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毛主席先讲了《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作品，然后又谈到《水浒》。毛主席针对这个教师提出的“《水浒》一书的好处在哪里”的问题，对《水浒》作了精辟的评论。据当事人回忆，毛主

席讲到《水浒》时，完全是作为学术问题进行探讨的。在讲述过程中，他老人家旁征博引，谈笑风生。很显然，毛主席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那番话，丝毫没有要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掀起批判《水浒》、揪现实生活中宋江的运动的意思。

八月十四日，"四人帮"把经过记录整理的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谈话内容弄到手之后，不到三个小时，就提出了所谓"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办法"。姚文元袭用林彪的老谱，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卑劣手法，歪曲毛主席谈话的原意，别有用心地大谈这次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有着什么什么意义。当日深夜，姚文元打电话把这件事告给了"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要他作好准备。同时，姚文元又召见出版局负责人，命令赶印出书。

第二天，八月十五日，姚文元把毛主席对《水浒》评论的整理记录稿，同他炮制的所谓"贯彻"毛主席指示的信印在一起，送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其在上海市委、北京市委内的亲信，要他们立即组织人马，加紧炮制黑文。这一切活动，都是背着党中央，违反党的组织原则，鬼鬼祟祟地干的。

"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接到姚文元的令箭以后，立即报挂上阵。他急如星火地把当天正在一个工厂参加劳动的文艺部全体编辑人员立刻叫回报社，听他的"传达"和"布置"。他连夜将人力配置情况和所拟文章题目呈报"四人帮"，又亲自打电话向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四人帮"余党约稿，放下电话就十万火急地命人赶紧飞往上海。就这样，在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四人帮"控制的宣传机器全速开动，兴风作浪的各路兵马也日夜兼程地上阵了。

经过"四人帮"及其亲信的秘密策划和紧锣密鼓的活动，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以一版头条位置和二版的整版篇幅，刊登了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杂志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和署名"竺方明"、实为"四人帮"控制下的《人民日报》御用班子撰写的长篇文章《评〈水浒〉》，敲起了"四人帮"利用评《水浒》进行反党活动的开场锣鼓。这两篇黑文，秉承"四人帮"的旨意，不敢发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水浒》评论的谈话原文，不敢公布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是在什么情况下作的，却盗取其中的片言只语，溶人文中，而对姚文元的那封黑信却大段引述，同毛主席的指示摆在一起，鱼目混珠，以假乱真，欺骗群众，混淆视听。经姚文元亲笔修改的《红旗》短评中，别有用心地引用毛主席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话，以暗示评论《水浒》的政治性质。在九月四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更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号召专业和业余的理论工作者、广大干部和群众都要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讨论和评论，以此来掀起一个全国性的"评《水浒》运动"。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个要在全国普遍开展的"运动"，一无党中央正式文件，二不正式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致使各地党委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完全是突然袭击，是搞政治骗局，是林彪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故伎的重演。

人们一定要问：在同一个时候，同一个文艺领域，为什么"四人帮"对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的批示是那样讳莫如深，滴水不漏，严密封锁，拒不传达，而对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却这般迫不及待地抢旗子，并借此掀起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呢?他们这样干要达到什么目的?

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这个精心策划的"评《水浒》运动"，完全是"四人帮"为摆脱困境而

采取的以攻为守的反革命策略，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四人帮"是一个以篡党夺权为目标的反革命阴谋集团。他们与林彪相勾结，使用种种阴谋手段，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打倒从周总理起的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同"四人帮"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特别是一九七四年以来，毛主席一再对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和警告，批评他们违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揭露了他们的野心，挫败了他们的组阁阴谋。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明确提出"四人帮"的问题要解决，"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斗争。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发出了关于影片《创业》的批示，两次揭露了"四人帮"对无产阶级文艺实行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和批示，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了"四人帮"的恶霸作风和反党阴谋，亿万人民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四人帮"的责问和声讨，"四人帮"陷于四面楚歌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但是，正如毛主席曾指出的："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和反革命两面派正是这样。他们把毛主席关于《水浒》的评论弄到手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抢旗子，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策划一场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以此来对抗毛主席对他们的历次严厉批评，特别是对抗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姚文元更是赤膊上阵，他给《人民日报》那个心腹下令：一定要压住关于《创业》的宣传，给"评《水浒》"让路；农业学大寨的版面不要搞得太"突出"，"冲淡了评《水浒》不好"。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的真面目。

无耻的歪曲和篡改

"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在一系列黑文中声称，他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的。事实上，他们根本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毛主席的指示完全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他们肆意歪曲、阉割和篡改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这一次对《水浒》的评论，是他对这部作品所作全部评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针对过去在《水浒》评论中的一些不正确观点，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让人招安了"，分析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同时还分析了这支起义队伍内部投降的和不愿投降的各种人物。全面地、正确地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准确地运用这些观点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对于澄清《水浒》评论中的问题，纠正《水浒》评价上的错误观点，有重大的意义。

但是，"四人帮"完全背离了毛主席的指示。他们策划的所谓评《水浒》，没有一点文艺评论的影子，而是胸藏杀机，借评《水浒》贩卖他们的反党黑货。他们的御用文人也心领神会，纷纷挥动秃笔，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关于这些，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作了一些揭露和批判。现在我们还想着重指出两点：

第一，他们只字不提毛主席过去的《水浒》的评价，把毛主席这次对《水浒》的评论同毛主席历来对《水浒》的评价割裂开来，对立起来。

大家知道，毛主席对我国文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古典文学作品作过许多评论，其中包括对《水浒》的评论。毛主席在他的光辉著作中，曾从不同的角度多次赞扬过这部著名古典小说。例如：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主席引用《水浒传》里林冲一脚踢翻洪教头的故事，说明战略退却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在《矛盾论》中，毛主席引用了《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例子，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又如：一九四四年，毛主席看了京剧《逼上梁山》(根据《水浒》中有关林冲的故事改编而成)之后，在给延安平剧院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很明显，毛主席对《水浒》，既肯定其中积极的、有价值的一面，又指出它"作为反面教材"的致命的弱点。毛主席关于《水浒》的多次指示，为我们对《水浒》这部小说作出科学评价提供了武器。但是，"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怀着不可告人的反革命目的，却只字不提毛主席的这些论述，只许按照他们公布的片言只语去"发挥"，为适应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需要而信口开河。"四人帮"利用他们窃据的舆论工具，把一次正常的学术讨论硬搞成了一场搅乱人心的反革命的政治运动。

第二，他们肆意歪曲毛主席这次对《水浒》的评论，用掐头去尾的手法，摘取片言只语，为帮所用，大作文章。

"四人帮"居心叵测地提出了一个《水浒》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盖"的反革命口号。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的信中，用偷换概念的卑劣手法，把毛主席谈话中说《水浒》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偷偷篡改成"宋江排斥晁盖是为了投降的需要"。到了九月间，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叛徒江青更进一步胡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她还无理要求在会议上放她的讲话录音，印发她的讲稿。华国锋同志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及时报告党中央。毛主席得知此事，怒斥江青"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气焰。

但是，"四人帮"继续抗拒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变本加厉地在"架空"两字上大做文章。一九七六年，姚文元还在《红旗》第一期发表的《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明目张胆地加上"'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并把"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这层意思强加给毛主席。

这完全是对毛主席指示的歪曲和篡改，也不符合《水浒》所描写的客观事实。本来，"屏晁盖于一百O八人之外"这句话的意思是十分清楚的。它说的是《水浒》的作者安排晁盖中箭身亡，"归天及早"的情节，并在"石碣天文"中将晁盖排除于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外。《水浒》作者所作的这些艺术处理，是为了突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但是，"四人帮"这伙反革命的实用主义者，为了达到其反革命的政治目的，睁着眼睛说瞎话，硬是连《水浒》描写的基本事实也不顾了。

“评《水浒》运动”的要害是为了夺权

“四人帮”为什么要利用毛主席关于《水浒》评价问题的一次谈话，掀起一场全国性的恶浪呢?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七日晚，江青在大寨的谈话中说:“评《水浒》要联系实际。评《水浒》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又诬蔑国务院“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政府!”江青还叫喊:“他(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对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史，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岗位。”这样的话，哪里是在评《水浒》?

“四人帮”评《水浒》，的确“是有所指的”。他们首先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副主席。

早在批林批孔的时候，“四人帮”不批林，假批孔，猖狂地大批“周公”，批所谓“现代大儒”，批所谓“孔老二的徒子徒孙”，妄图打倒敬爱的周总理和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由他们上台。毛主席识破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确定四届人大和国务院的人事安排由周总理负责，提议邓小平同志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随后又委托邓小平同志在周总理病重期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四人帮”的组阁阴谋化为南柯一梦，他们咬牙切齿，伺机反扑。他们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大反所谓经验主义。他们抓到了评《水浒》这根稻草，立即红了眼睛，几乎把一切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反革命伎俩都施展出来了。什么“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什么“弄了一些土豪劣绅进了国务院”等等，对当时党中央所下达的一系列文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落实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明目张胆的影射攻击。原来“四人帮”口中的晁盖、宋江、卢俊义等等，都不过是代名词，是为了发泄他们对组阁阴谋失败的不满和对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的仇恨，是为了诬蔑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其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天下大乱，由他们取而代之。

如果说，“四人帮”在一九七五年秋天“评《水浒》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只是指桑骂槐，牵强比附的话，那么，到了一九七六年春天，他们就撕掉了伪装，变成指名道姓的恶毒攻击了。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他们策划的“评《水浒》运动”也随之升级了。他们处心积虑要攫取总理的职位，加紧攻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抛出江青直接控制的所谓“点”——某部六连理论小组的文章，第一个指名道姓诬蔑邓小平同志为宋江。五月十日，《人民日报》又抛出黑文，再次诬蔑邓小平同志为宋江式的投降派，说什么“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就竭力网罗反革命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为其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扫清道路”。在经姚文元精心修改的《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黑文中，有意把邓小平同志同陈独秀、王明、×××、林彪之类机会主义头子并提，恶毒攻击党中央关于整顿领导班子的指示。“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联系实际，评论《水浒》”的幌子下，到处狂叫“揪宋江式的走资派”，并且由揪一人到揪一层，再到层层揪。他们拿着“投降派宋江”的帽子到处乱扣，打击和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在“四人帮”的煽动下，许多地方刮起了一股揪“投降派”、抓“活宋江”的妖风，“宋江”一时成了“四人帮”及其爪牙们要打倒的干部的代名词，真是荒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历史经常嘲弄那些自以为得计的蠢人。"四人帮"本想利用评《水浒》为他们篡党夺权铺路，但是，就在他们踌躇满志，自以为快要登台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接着又提议华国锋同志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的英明决断，给"四人帮"以致命的一击。这时，"四人帮"就象输红了眼的政治赌徒，孤注一掷了。他们的"评《水浒》又升了一级，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张春桥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二月三日有感》、《人民日报》抛出《再论孔丘其人》之后，"四人帮"在《光明日报》刊登了署名"高路"实为"梁效"炮制的黑文《宋江一上山就……》，在宋江"一上山"上大做文章，胡说什么"宋江一上山就搞分裂，造谣言，贬低和架空晁盖的领导"，说什么他"刚进聚义厅，便迫不及待地要翻原来排座次的案"，对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第一副主席的安排发泄不满。在三月十日《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姚文元又亲笔加上一句："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从而把揪宋江式的投降派"变成了揪"党内资产阶级"，妄图借此打倒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被粉碎前夕，"四人帮"的御用文人炮制"评《水浒》"的毒草，仍在狂叫要"按既定方针办"，要人们做好"思想准备"，"同党内资产阶级""长期作战"。

与人民为敌，必然被人民打倒，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谁也逃不脱。就在这个"四人帮"的喉舌得意忘形地发出"继续深入"，"乘胜前进"的叫喊之后不久，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清除"四害"。"四人帮"借以兴风作浪的所谓"评《水浒》运动"这场丑剧，也就随着主角的垮台而宣告结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四人帮"垮台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策划的"评《水浒》运动"，澄清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非常必要。把"四人帮"精心策划的这场喧嚣一时的反革命丑剧作为反面教材，可以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怎样打着"红旗"反红旗，是怎样以极"左"的口号掩盖其极右的实质，是怎样肆意混淆政治同学术的原则界限，是怎样歪曲篡改毛主席指示，大搞形而上学，是怎样践踏党的方针政策，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我们通过对这场政治大骗局的揭露，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可以进一步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

(原载 1978 年 8 月 11 日《人民日报》)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昔阳隆重开幕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九月十五日在山西省昔阳县隆重开幕。

这次会议，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四年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以来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将总结交流全国各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经验，总结交流农业机械化的经验，

研究普及大寨式的县、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地把我国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大会会场设在新建的拖拉机厂的宽阔厂房内。主席台上方，高挂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会场四周，悬挂着一条条巨幅标语，上面写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业学大寨"、"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上午九时，当邓小平、江青、姚文元、陈锡联、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走上主席台就座时，会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在大会主席台就座的有：农林部长沙风、水利电力部长钱正英、财政部长张劲夫、文化部长于会泳以及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有关单位负责人杨立功、马仪、顾秀莲、谢北一、叶志强、李艺林、王丙乾、高修、程宏毅、杨珏、卓琳。在主席台上就座的还有：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中共昔阳县委副书记王金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革委会的负责人以及有关单位的代表：尤太忠、王庭栋、李顺达、贾俊、吕玉兰、王金山、王磊、王宪、冯勤、刘盛田、胡亦民、阮泊生、冯占武、张士英、张林池、杨易辰、关舟、周丽琴、黄金海、郭宏杰、王光宇、穆林、秦和珍、厉日耐、马兴元、罗毅、莫显耀、黄知真、吴山、陈烈、姜一、饶兴礼、李夫全、李衍授、王利滨、丁凤英、毛致用、黄炳秀、刘春樵、王治国、杜易、张根生、李子元、刘应祥、薛喜梅、王黎之、李立、李文、七林旺丹、朱克家、高圣轩、热地、霍士廉、章泽、禹贵民、王国瑞、申效曾、冀春光、刘蒲辰、王志强、张世功、宋致和、肉孜·吐尔迪、彭飞、刘邦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宣布大会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致开幕词。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致以热烈的祝贺，转达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对到会所有同志殷切的期望，并且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场上不断响起热烈的掌声。

陈永贵副总理在开幕词中说，这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是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伟大号召以来的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将参观大寨和昔阳抓革命、促生产的成就，学习大寨和昔阳的经验，总结交流各地十一年来，特别是一九七〇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建设大寨县的经验，研究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尽快普及大寨县的问题。同时，总结交流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讨论一九八〇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这次会议是农业战线的一件大事，对广大农民群众，对林业、渔业和国营农牧场职工、农机职工、水利职工和农业科学技术人员，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开好这次会议，全国人民都高兴，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陈永贵副总理指出。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党中央最近发出的有关文件精神。人们讲路线、讲团结、讲大局、讲纪律，落实政策，振奋精神。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在胜利前进。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特别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来，农业学大寨已经成为农村中最广泛、最深刻的革命群众运动。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以改土治水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规模越来越大，农田抗灾能力显著提高，工业支援农业的力量日益增强，农业技术改革的步伐正在加快。广大贫下中农用机器，讲科学，涌现了一批自力更生办农业机械化、科学种田创高产的好典型。我国农业生产连续十三年丰收，

农、林、牧、副、渔各业都有较大的发展。现在，大寨式的社队已经遍布全国，学大寨的先进县成批涌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干部群众在实践中取得了经验，增长了才干。我国的农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更坚定地相信大寨的道路就是自己的方向。这是一种不可估量的伟大力量。

陈永贵副总理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在充分估计成绩的时候，又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新的矛盾和新的任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稳步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农业，基本上保证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但是，还必须看到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速度还不够快。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伟大战略方针，适应国民经济大发展的需要，必须加快农业发展的速度，这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陈永贵副总理着重指出，加快农业的发展速度，要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靠亿万农民的积极性，靠大寨精神。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现在已经十一年了；但是，省与省比、县与县比，运动发展还不平衡，农业生产的差距还很大。应该很好地分析一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应该统一认识，真正把农业当作国民经济的基础，全党动员，打一场硬仗。这次会议，对于一些重大的生产措施要研究，但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到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上来，认真讨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加强领导班子革命化的问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使我国农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陈永贵副总理最后强调说，我们相信，在这次大会之后，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农业学大寨运动一定会更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农业机械化一定会大踏步地前进，农业生产一定会大幅度地增长，为实现四届人大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做出新的贡献。

陈永贵副总理讲话结束时，会场上再一次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也在今天的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中共山西省晋中地委第一副书记贾俊，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王谦，分别代表大寨大队贫下中农、晋中地区人民、山西省人民，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出席今天大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各地区、各县和国营农牧场的负责人，农业、农业机械企业、事业和科教单位的代表，财贸系统的代表，来自革命和生产第一线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代表，大庆油田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代表，国务院有关单位的代表，共三千七百多人。代表们表示，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学理论、讲路线、鼓干劲、促生产的会议。在大会精神的指引下，更加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尽快把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促进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

(新华社昔阳1975年9月15日电，载9月16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大力发展养猪业的通知（节录）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六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养猪业有了很大发展。最近一个时期，除了一些地方持续上升外，也有的地方徘徊不前，个别省还有所下降。这种状况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很不适应。各级领导必须足够重视，以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为纲，切实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发扬大寨精神，使养猪业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纪念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九日）

《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

今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纪念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第二年十月，红二方面军会同红四方面军也到达陕北。至此，三支主力红军先后结束了战略大转移，同先期到达的红二十五军，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了。红军长征，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走过人迹罕至的草地，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是一部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毛主席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红军长征的历史功勋，永远铭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心中。红军长征的英雄事迹，永远鼓舞我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一代一代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长征的历史，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个英明的论断。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没有军队建立了军队，没有根据地建立了红色根据地，粉碎了敌人多次"围剿"，发展了革命的大好形势。一九三一年，由于王明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权，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在红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在白区几乎损失了百

分之百，使红军被迫转移，进行长征。在党和红军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从军事上和组织上纠正了王明路线，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才保存和锻炼了红军的骨干，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胜利结束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回顾长征的历史，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不论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执行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胜利，就向前发展；离开了毛主席的路线，革命就受挫折，就失败。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自称"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完全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先"左"后右，最后叛国投敌，当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张国焘反对北上抗日，主张南下逃跑，最后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当了可耻的叛徒。刘少奇、林彪走的也是这样一条路。这就告诉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斗争，就要反对投降派。

长征是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材。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贯穿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一个是社会主义、一个是资本主义，现在还是这两个可能。今后五十年或一百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一万年还有两条路线斗争。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荣传统，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积极参加对《水浒》的评论，进一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通过学习和批判，使全国人民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这是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最可靠保证。

搞团结还是搞分裂，是长征中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王明搞宗派，"以我为核心"；张国焘恃仗人多枪多，另立中央。他们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不得人心，不可能不垮台。毛主席提倡要搞"五湖四海"，不管是那个山头、那个方面军的，不管是北方、南方的，都要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团结起来。正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了各路红军，长征才以敌人的失败和我们的胜利而告结束。要继承和发扬红军团结战斗的光荣传统，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促进安定团结。

长征途中遇到的困难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红军所表现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是史无前例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红军英雄们的这种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中国的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正象毛主席教导的，"**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象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现在，我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比之红军长征时候不知好了多少倍，但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不能丢。**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以崇敬的心情，怀念在长征中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向继续战斗在各条战线的老红军，致以亲切的问候。当前，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准备打仗而努力奋斗。形势喜人，形势逼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继承和发扬红军长征的革命传统，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普 及 大 寨 县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了。会议总结交流了经验，提出了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号召，并确定要在一九八O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次会议对于加快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促进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农业学大寨”，是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发出的伟大号召。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一九七O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来，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不仅大寨式的社队遍及全国，而且涌现出三百多个学大寨的先进县。农村人民公社更加巩固，农业生产连续多年丰收，粮、棉亩产跨《纲要》的省、市、县不断增加，南粮北调的局面开始扭转。我国粮食和大部分农副产品基本上保证了国需民用，八亿人民有吃有穿。广大农村欣欣向荣，我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前程似锦。这一点，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是无法否认的。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从明年开始，我们将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未来的五年，对我们国家极为重要。我们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要对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有所准备。在这段时间内，把更多的县建成象昔阳那样的大寨县，对于实现毛主席为我们规划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宏图，进一步落实**“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具有重大意义。有了坚强的农村社会主义阵地、有了稳固的农业基础，我们国家就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

建成大寨县，县委是关键。县委既是领导机关，又是执行机关。有一个好的县委领导班子，能够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就能把公社、大队都带动起来，使学大寨运动遍及每个角落。每一个县委都要认清形势，看到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重要阶段，都要加强自身的革命化建设，担当起建成大寨县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要象大寨和昔阳那样，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始终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要**“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大寨的同志说得好:“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我们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认识大寨的经验，象他们那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抓住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放，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寨的这个经验，是带根本性的。不学这一条，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敢批，不敢斗，要建成大寨县，是不可能的。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执行党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要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发扬革命加拚命的精神，大干社会主义。学大寨，既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一场伟大的改天换地的斗争。进行这样一场艰巨的斗争，没有干劲，不行；干劲不大，也不行。毛主席为我们制订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没有干劲，干劲足不足，也是路线觉悟问题。有的同志“年年喊大干，就是怕流汗”，在他们那里，年复一年，山河依旧。有的同志满足于“贡献不大年年有”，在他

们那里，粮食产量徘徊不前，增长很慢。不改变这种精神状态，要建成大寨县，也是不可能的。

要象大寨和昔阳那样，在领导班子里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经常进行整风。要结合本县实际，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照大寨县的标准，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改变懦夫懒汉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的错误思想，揭露矛盾，找出差距。要经常查一查：对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认真批了没有？大干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真正树立起来了没有？领导深入基层蹲点，带头革命、带头劳动，真正做到了没有？总之，学大寨真学假学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整风搞好了，思想政治路线端正了，建成大寨县就有希望。

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都要关心和支持这个运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进一步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把农业真正放在第一位，切实加强对农业学大寨运动的领导。越是工业发达的地区，越要抓好农业。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省都解决了。在一个省、一个地区，能不能尽快普及大寨县，省委、地委的领导是起决定作用的。省、地都要有普及大寨县，加快农业发展的全面规划，并且订出切实有效的措施。对那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县，要一个一个地摸清情况，解决问题。对先进的县，也要帮助他们找差距，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学大寨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形势大好，形势逼人。全党同志，全体贫下中农和公社社员，国营农场职工，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全国各行各业的同志，让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作出新贡献！

结合评论《水浒》　深入学习理论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一日)

池　恒

毛主席在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中教导我们：“**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这里，毛主席既向我们提出了学习的深度——“**要搞清楚**”，又提出了学习的广度——“**要使全国知道**”。经过这一时期的学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增强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促进了安定团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收效是很大的。但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求来衡量，无论从深度和广度来说，都还需要作长期的努力。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给理论学习以新的推动。我们要结合评论《水浒》，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坚持下去。

半年多来学习运动的经验证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具有动员群众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强大威力；学好理论，端正路线，是促进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根本保证。无论那个地方，那条战线，要发展大好形势，夺取革命和建设的新胜利，都要把学习理论作为关系路线、关系全局的大事，继续抓好。当前，在毛主席关于“**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下，正在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我们要引导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取

得更大的胜利，也必须抓好理论学习，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武器，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以进一步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革命化，充分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学大寨是这样，其他工作也不例外。越是工作忙、任务重，越是困难多、阻力大，越需要抓好学习，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强大威力。

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一个重要内容。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使人民都知道**"同"**要使全国知道**"一样，都是要求我们向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地进行教育。毛主席历来重视反面教员和反面教材的作用，在正面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开展对《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评论，可以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照中，更深刻地认识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原则的重要性。通过评论《水浒》，认清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看一看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何破坏革命斗争、瓦解起义队伍、葬送革命事业，总结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种种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的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很有教益。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历史上有，现代有，今后还会有，这对革命事业是最危险的东西。刘少奇、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者，就是现代的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的。评论《水浒》，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识别革命派和投降派，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从而在今后的斗争中更好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修防修，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

长期以来，在对《水浒》的评论中有不少错误观点，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看问题，划不清革命路线和投降主义路线的界限，甚至为投降主义路线作辩护。《水浒》评论中这种错误倾向的存在，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它说明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完全占领阵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任务还需要继续落实。《水浒》所宣扬、歌颂的，是孔孟之道；宋江搞投降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弄清楚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澄清种种错误观点，这不仅有利于在文学方面扩大马克思主义阵地，而且有利于在哲学、历史、教育以至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各个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批判某些从旧时代流传下来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所以，评论《水浒》，同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一致的，应该恰当地结合起来。掌握好理论武器，才能彻底揭露和深刻批判《水浒》所颂扬的投降派、投降主义路线及其指导思想孔孟之道；而通过评论《水浒》，又会推动理论学习进一步深入。许多地方对学理论与评《水浒》统一部署，统一安排，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分析《水浒》，通过分析和批判又深刻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收到较好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提倡的。

为了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引向深入，我们要很好地总结前一段认真看书学习、密切联系实际、学习和应用相结合等行之有效的经验，进一步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和领导。

现在，我们仍然需要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上下功夫。就是说，不仅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有关著作，全面地领会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精神实质，而且要根据现实斗争中迫切需要弄清楚的一些重要问题，包括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有系统地读一些书，以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理解，更好地划清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提高运用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注意掌握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以便在各方面的工作中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和抵制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

继续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坚持学习和应用相结合，是把理论学习引向深入的关键。联系实际，主要是联系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联系如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各条战线、每个基层。党的基本路线是我们的生命线，离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离开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就会脱离我国革命最基本的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根本不可能把学习搞好。实际斗争中提出了许多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予以正确回答。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广大课堂。许多地方学习搞得生动、扎实，效果较好，就是把学习同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结合起来，同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际斗争，又在实际斗争中学习理论。这样，既推动了工作的发展，又促进了学习的深入。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建设，是一项重要任务。有些地方把学习理论同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结合起来，同改造世界观结合起来，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这方面的经验需要加以总结。

自满情绪和松劲情绪是深入学习的障碍，要不断克服。要经常分析学习运动的发展形势，定期总结交流经验，抓好典型，推动全般。对那些长期比较落后的地区和单位，要大力帮助，积极促进，使其尽快赶上来。要继续办好读书班。要加强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设，不但要用，而且要帮，即从政治思想上、理论水平上、工作作风上帮助和培养这支队伍，肯定成绩，克服缺点，发挥他们在群众学习中的骨干作用。全党和全国人民把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深入下去，坚持下去，必将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大好形势，向着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大踏步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 1975 年第 11 期)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一九七五年八月、十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十一月三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议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附〕刘冰等给毛主席写信符合党章内容属实清华大学党委公开纠正这一错案

新华社记者刘佩珩报道，清华大学党委经过深入、全面的调查研究，已经证明：一九七五年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位同志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完全合理合法，信中内容属实，根本不是什么"诬告信"。他们向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报告实际情况，完全符合党章的规定，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民主权利。清华大学党委实事求是地公开纠正了这一错案。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三日和十月十三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位同志，先后给毛主席写了两封信。信中报告了"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和另一个女黑干将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揭露了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跋扈专横，在清华大学大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行；特别是大胆揭发了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与此同时，刘冰等同志还给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写了两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并且向市委科教组负责同志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

刘冰等同志的行动光明正大，但是"四人帮"和他们的男女两个黑干将却大搞阴谋诡计。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三日，迟群主持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开始对刘冰等同志进行了有组织的围攻。同时，他们还调遣"两校大批判组"（即臭名昭著的"梁效"）的一个头头来清华搞简报，整材料，封锁真相，歪曲事实，进一步玩弄欺上瞒下的罪恶勾当。在连续召开了围攻刘冰等同志的常委扩大会议以后，又于同年十一月十八日召开全校大会，由迟群和那

个女黑干将指使的十五个人上台作证，对刘冰等同志揭发的问题，作了完全颠倒黑白的所谓“澄清”，把两封揭发信打成了“诬告信”，并且叫嚷要“揪后台”。此后，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一方面打着“大辩论”的旗号，对刘冰等同志进行全校性的批斗，把他们打成“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急先锋”，非法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他们的党组织生活，并且先后把他们送到清华大学农场等地监督劳动；另一方面借题发挥，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掀起一股反革命逆流。“四人帮”及其两个黑干将制造的所谓刘冰等人写“诬告信”的事件，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

大量事实说明，“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制造的所谓刘冰等人写“诬告信”的事件，严重地践踏了党章，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他们不仅肆意侵犯刘冰等同志给党中央主席写信报告情况的民主权力，而且明目张胆地剥夺刘冰等同志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迟群等人在当时炮制的假报告中声称：“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予充分的发言机会，让他们把话讲完”，“始终坚持平心静气地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迟群等人控制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不准刘冰等同志把两封原信连续念完，更不准他们讲话。只要他们一申辩，便立刻遭到围攻、批判。迟群等人对刘冰等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搞逼供信，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对他们进行摧残。短短几个月内，对刘冰等四同志的批斗多达二百二十多次。群众说，这明明是法西斯专政，那里是什么辩论！

粉碎“四人帮”以后，清华大学的师生和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对刘冰等四同志写信的问题非常关心，刘冰等四同志也提出了申诉。一九七七年五月，清华大学党委改组后，立即组织专门调查小组，认真听取刘冰等同志的申诉和党内外各方面的意见，查清了有关事实。一九七五年出场作证的十五个证人，有的是追随迟群一伙干坏事的人，有的是政治品质恶劣的人，也有的是上当受骗或被逼上台作证的。这十五个人都推翻了自己当时的证词，有些证人还揭发了迟群一伙采取威胁、利诱等卑鄙手段指使他们出场作证的丑恶罪行。清华大学党委查清刘冰等同志写信的真相后，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落实党的政策，对刘冰等同志作出了正确的结论。校党委把强加给刘冰等同志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推倒，恢复他们的名誉，并且报经上级同意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刘冰同志已经担任兰州大学的领导职务。

（原载1978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当前，全国人民认真学习并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指示，进一步推动了各项工作。同全国一样，教育战线的形势也一派大好。从上海“七·二一”工人大学到辽宁朝阳农学院，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大寨学校，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朵朵教育革命的鲜花竞相开放。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学校以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在毛主席革

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广大工农兵学员迅速成长，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一）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明明是首先针对理工科大学怎么办而讲的，然而教育界的怪论却偏在这个问题上唱反调，强调理科“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请看，这不是明明要脱离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另搞一套吗？

学校究竟向谁开门，招收什么样的学生，直接关系到教育的阶级性质。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但在以往几千年的阶级社会里，却被剥夺了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解放后，工农群众成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主人。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广大工农兵竟被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破了这种状况。遵照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千百年来的愿望，劳动人民进了清华、北大和其他高等院校，培养出自己的第一代大学生。从工农兵中间选拔大学生，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一项重大的成果，是教育史上的革命。这个根本方向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从工农兵中选拔大学生，这一新生事物经过近几年来的实践，已显示出它明显的优越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大学面貌焕然一新。工农兵学员在工厂、农村参加过几年生产劳动，取得了一定的实践经验，这对于他们上大学是很有好处的。他们通过学习社会，学习工农，提高了觉悟，充实了头脑，逐步明确了方向，这为进一步解决为什么人学习的问题打下了一个较好的思想基础。同时，由于他们有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经验，无论学文科，还是学理工科，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他们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教育革命的一支生力军。这是过去那种从家门到校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根本做不到的。我们深深感到，只有坚持从工农兵中招生，才能使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从阶级路线上得到保证。

要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中学生“直接上大学”的招生制度，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毛主席“七·二一”指示对教育革命的普遍意义。照此下去，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就会一步一步地被篡改，被屏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会被攻击，被否定。这样做，就是要“扭”回到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上去，搞什么“拔尖子”的资产阶级教育、引诱学生去爬那个“小宝塔”即通向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阶梯。与此同时，广大工农兵就要重新被赶出高等学校的大门。文化大革命前，清华、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工农子

弟曾被诬蔑为"粗瓷茶碗雕不成细花"，用"泻肚子"的办法将他们赶出校门。那种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的历史，决不容许重演。如果有人要从理科开刀，重演这样的历史，那么，我们有权质问：这样搞，不也是要用"泻肚子"的办法将工农兵赶出大学校门吗？

(二)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集中表现为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工农兵学员来自工农兵，在学习期间还要不要与工农相结合？有了一定的实践经验，学理论，学技术，学文化，还要不要和三大革命运动相结合？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还要不要不断改造思想？这是关系到工农兵学员沿着哪个方向提高，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重大原则问题。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而教育界那种怪论却把开门办学歪曲成"不讲学文化"、"实践——实践——实践"，这完全是对《五·七指示》道路的诬蔑。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主义大学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学校有各种工作，一切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学生要进行多方面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生要上这样那样的课程，首先要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所有这些，都是不能离开三大革命运动的。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

社会主义大学应当不断提高无产阶级的教育质量，引导学生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业务，为革命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对技术精益求精**"，掌握为人民服务的真本领。在这个问题上，正如列宁指出的，"**全部关键**"在于"**把青年的学习，组织和训练的事业加以根本改造**"。而坚持走《五·七指示》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正是为了实现这个"**根本改造**"。学生只有积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与工农相结合，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正确目的，才能产生真正强大的学习动力，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科学文化堡垒。只有立足于教育革命，批判封、资、修的学科体系，彻底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认识——实践"的认识路线组织教学，才能使学生既学到有用的书本知识，又掌握丰富的实际知识，"**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离开了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还谈得上什么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正确道路"？

几年来，清华、北大发动广大师生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坚持"**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在开门办学过程中，努力做到师生与工农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北大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紧密结合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及最近评论《水浒》来组织教学，推动了哲学、经济、文学、历史等各个学科的改造。以"史"的课程而论，过去宣扬"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现在努力阐述劳动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过去尊儒反法，现在努力正确评价法家，深入批判儒家；过去厚古薄今，现在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斗争服务。清华大学打破了基础课——技术基础课——专业课的"老三段"旧体系，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把学

生的学习同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联系在一起。这几年共完成近千项生产、科研任务。水利系以万里黄河为课堂，坚持为治黄服务，为农业服务。治河泥沙专业十二名学员和三名教师，到山东某地结合“引黄放淤”的科研任务进行教学。他们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向贫下中农学习，打破书本上的老框框，完成了放淤工程设计。经过广大群众的奋战和有关部门的支持，这项工程今年一次就淤出五万一千七百亩良田。学员既为农业学大寨贡献了力量，又学到了丰富的实际知识，并在理论上有新的创见。化工系二年级，在完成了一项填补我国技术空白的化工设计以后，师生共同编写了《化工车间设计》等两本教材和两篇科技论文，总结了工人的实践经验，并把设计中有创见的六项革新从理论上加以阐发。由此可见，开门办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的过程，就是始终贯彻“**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原则，使学员在实践的基础上着重向理论方面学习的过程。那种把开门办学歪曲为“实践——实践——实践”的论调，完全是不顾客观事实的一种捏造。

开门办学，出去以后，也仍然有一个端正思想路线的问题。我们两校注意引导师生在三大革命运动中与工农兵一起战斗，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虚心学习工农兵的思想感情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办教育，并且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积极改造旧教学体系。如果在下厂下乡过程中不与工农结合，不认真参加到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中去锻炼思想，而把旧的一套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照搬下去，不花气力去切实组织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那就不是真心实意地实行开门办学。我们两校始终坚持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原则，努力使学生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

实践证明，实行开门办学，就可以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培养学员，使他们在政治与业务两方面都得到锻炼，在斗争中提高觉悟，既懂得坚持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极端重要性，又能够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刻苦钻研业务，善于学习国内外的先进科学技术，又不迷信书本，敢于创新，成为又红又专的战士。把开门办学诬蔑为“不学文化”，实际上就是要走资产阶级关门办学的老路，把学生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三）

资产阶级攻击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总是在教育质量问题上大做文章。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就必须正确看待教育质量，批判“**智育第一**”。

对于教育质量，不同阶级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因此，看质量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要看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即使就业务学习来说，也决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而必须看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旧北大、清华号称什么“最高学府”、“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可是，摇来摇去，许多学生被摇得晕头转向，追求个人名利，理论脱离实际。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工科的既不会开机器，也不会修机器，学理科的只能关在高楼深院里纸上谈兵。有的人怕苦怕死，不服从党和国家的分配，有的甚至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而现在工农兵学员经过几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有提高，业务学习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有的人并有发明创造，在校期间就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贡献。清华大学机械系焊接专业一个学员小组，与北京建筑安装公司的工人、技术人员共同

努力，打破了外国焊接工艺规范，成功地进行负一百度低温用钢的焊接。电子系控制专业的五名学员和两名教师，同精密仪器系几名工人一起，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研制成功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关键设备图形发生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员投身于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写出了充满革命激情的长诗《理想之歌》，出版之后，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地球物理系和地质地理系的学员一听到云南昭通和辽宁营口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就立即奔赴灾区。在余震未平，山石还在滚动的情况下，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阶级弟兄和人民财产，并在现场进行科学考察，取得了可贵的资料。

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丰硕成果，更是有力地驳斥了那种所谓"质量低"的谬论。清华大学的两届毕业学员完成了五百六十四项专题研究、生产任务和重大技术革新，具有国内先进水平的或填补国家空白的项目占三分之一以上。电子系七二届学员担负的十二个项目，全部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其中九项填补了国家空白。北大文科毕业学员结合战斗任务，编写了五十五本书，在报刊上发表了七百多篇文章；外语系的学员共翻译了十六种文字、二百五十万字的材料，为反帝反修斗争服务；理科学员完成了三百九十三项科研课题，七十九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还有一些项目，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两条路线，两种结果，事实俱在，不容抹杀。试问，现在的大学教育质量究竟是"不如过去的中技高"，还是旧大学所根本不能比拟的？

成绩是这样显著，对比是如此鲜明，为什么还出现了对质量问题颠倒是非的种种怪论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作怪。毛主席说：**"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人却采取折衷主义的手法加以歪曲，实际上是去掉两头，光要中间，把"有社会主义觉悟"和当"劳动者"扔到九霄云外，眼睛只盯住"文化"。我们必须警惕有的人故意混淆重视智育和"智育第一"的界限，企图利用人民要把科学文化搞上去的迫切心情，重新搬出"智育第一"的一套陈旧货色。所谓"不要不加分析地批判智育第一"，说穿了，就是反对批判"智育第一"。"智育第一"从来就是资产阶级政治第一，难道还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吗？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旧教育早已作了深刻的批判，尖锐指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搞"智育第一"，就是要继续让旧教学制度重新来摧残人材，摧残我们的青少年，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人们知道，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大都是经过大学培养的所谓"红色专家"，正是他们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我们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特别不能忘记。

（四）

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清华、北大在文化大革命前为什么封、资、修的势力盘根错节，攻也攻不动？为什么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校之前，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而这几年学校却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就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教育战线的反革命专政，粉碎了林彪一伙对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阻挠和破坏。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权。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保证。

资产阶级每次搞翻案、复辟活动，总要跳出来猖狂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所谓"要有热

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实质就是用抽掉阶级内容的手法，篡改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为什么羞羞答答、不敢和盘托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货色呢？无非是这种货色太臭了，拿不出手。于是，接过“外行能够领导内行”的口号，对外行加上“热心科学”的限制词，妄图以“不热心科学”的莫须有的罪名，把工人阶级的领导一举反掉，让那些“热心”搞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来把持教育领域。这就是他们要“解决”教育问题的根本办法。

但是，对这套办法，我们并不陌生。在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叫嚣“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决不是想发展什么科学，而是要共产党退出学校。搞什么“教授治校”，即由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党曾派出一批批干部来到清华、北大。他们先是被资产阶级诬蔑为不懂科学的“土包子”，但后来其中一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的压力和腐蚀，对阶级斗争越来越不关心，把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基本路线置诸脑后，却跟在资产阶级后面对修正主义那一套越来越“热心”。结果呢，不但科学没有搞上去，自己倒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这种历史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现在，有人竟妄图把历史的车轮拖回到资产阶级右派梦寐以求的境地，这未免走得太远了吧！

学校是阶级斗争的重要阵地，决不是单纯传授知识和为科学而科学的场所。清华、北大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正反面经验，都证明了“**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伟大真理。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又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工人阶级牢固地占领教育阵地，才能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才能使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一切工作沿着正确的路线蓬勃发展。许多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教育阵地上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复杂、尖锐的，必须要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决同修正主义作斗争，要警惕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这样，才能把教育革命的光荣任务坚持下去。

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最近几年才开始。它不是过了头，而是刚起头。令人高兴的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正在茁壮成长。它一出现，就显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展现出光辉灿烂的未来。自然，它同一切革命的新生事物一样，总要经历一个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我们的工作也有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我们的教育质量决不是到此为止了，而是还在发展、提高。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首先要看本质，看主流。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当然也不能忽略，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如果抓住新生事物的某些不完善的地方，利用一些同志暂时不理解、不适应的状况，否定教育革命的主流和方向，广大革命群众是决不会答应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毛主席亲自派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又亲自抓教育革命。教育革命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教育界的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教育战线上的这场争论，是当前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组成部分。把路线是非弄清楚了，就能真正促进安定团结。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件大事，要经过几代人坚韧不拔的努力。大、中、小学学生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我们的青少年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的百年大计。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在

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1975年第12期)

〔附〕 一株反党乱校的大毒草

——批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

教育部大批判组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炮制了一篇毒汁四溅的黑文:《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以下简称《篡改》)。文章先在《红旗》杂志上抛出来，《人民日报》和许多报刊立即转载。这篇文章把原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的正确讲话诬蔑为“奇谈怪论”，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四人帮”及其干将、爪牙们一时得意忘形，手舞足蹈。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却从这“以笔杀人”的刀光剑影中，预感到一场激烈的斗争即将到来。

蓄谋已久的反革命阴谋

这场斗争的发生不是偶然的。

党的十大以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大权，架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们阴谋组织自己的“内阁”，妄图打倒周总理。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识破并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毛主席决心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并且进行了部署。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七月，毛主席又作了关于电影《创业》的光辉批示，提出了“**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的英明决策，痛斥了“四人帮”摧残文化教育事业的严重罪行。

这样，“四人帮”及其一伙陷入空前被动的困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躲到上海，在阴暗角落里发泄不满：“过十年以后再看!”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提心吊胆地说：“我很苦闷，不知什么时候丢掉脑袋!”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也预感到末日不远，悻悻地说：“我现在上上干校，挤挤公共汽车还可以。”就连最爱“露峥嵘”的叛徒江青，也几个月不敢出头露面。

一九七五年秋，针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发出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的重要指示。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亲自抓了中国科学院的整顿工作，就科技和教育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当时的教育部长周荣鑫同志，遵照党

中央的指示，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严肃地指出：这些年教育上的问题，"根子不在教师，恐怕也不在学校领导，根子在教育部门领导，在管教育的。"斗争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在教育界的黑干将迟群。

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教育战线进行整顿，就是对"四人帮"及迟群之流的大清算。因为群众一旦发动起来，他们破坏教育革命的罪行就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妄图利用教育阵地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面目就要彻底戳穿，他们自封的教育革命的"功臣"、"旗手"之类的桂冠，就会一顶顶落地。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进行全面反扑。

且看他们手忙脚乱的丑恶表演：

在北京，"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一面将周荣鑫同志的讲话经过歪曲、篡改后向姚文元密报、一面指使"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一个黑爪牙给毛主席写诬告信，捏造事实，诬陷周荣鑫同志。与此同时，迟群还指使他安插在教育部的坐探，溜门撬锁，鼠窃狗偷，通宵达旦地偷抄国家机密，收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

在外地，他们把两校与辽宁、上海的死党、亲信、余党连成一线，昼夜不停地搜集、编印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同志以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

经过一番阴谋筹划，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姚文元指使他们在《红旗》杂志的一个亲信，授意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一大批领导同志的反党大毒草：《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并反复强调，文字"份量要重一些"，"这是一个信号"！《篡改》一经抛出，两校大批判组、"初澜"、"茵雨"等纷纷上阵，呼风唤雨，推涛助澜，大肆鼓噪。在"四人帮"的指使下，他们陆续从科技、文艺、卫生等各条战线发动疯狂进攻，密切配合。这一切充分说明，《篡改》在"四人帮"整个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中，占有首先发难的重要地位。

射向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毒箭

《篡改》首先在大学招生问题上大做文章，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诬蔑为"奇谈怪论"，横加批判，妄图对不明真相的群众进行煽动，用心极其险恶。

一九七二年，美籍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华时，建议我们采取措施，从小培养基础科学人材，进大学后，一边学习，一边劳动，以培养一批年龄较青的科学工作者。敬爱的周总理赞成这个建议，并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明确指示：现在的教育革命还在试验阶段，可以从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生中选拔好的，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对社会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并指出：这个办法，和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大学生是平行的。周总理的指示，"四人帮"和迟群明明知道，却拒不执行。

一九七四年，美籍中国科学家再次来华，重提上述建议。五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接见他们时，明确表示，对该建议是赞成的。张春桥一时慌了手脚，竟然大耍无赖，胡说什么"毛主席接见时的谈话，记录记错了。"再次进行抗拒。

特别恶毒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迟群竟把周总理的指示掐头去尾编进所谓"右倾翻案言论"。在炮制《篡改》这篇大毒草的过程中，炮制者生怕过于露骨，提醒迟群：这是周总理的指示。迟群阴险狡诈地说："引一些代表性的言论，抓住两三句话，展开分析批判，一看就知道是谁说的。"

大家知道，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了不少学生脱离实际、脱离生产、脱离劳动的现象，身体也搞坏了。为了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各级各类学校走《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过去那种“关门读书”、“三脱离”的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学校在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招生的同时，也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生，就成为教育革命深入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毛主席非常重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但是，从来没有反对过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指出：河南长葛县有的中学实行勤工俭学，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可见，只要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学生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得到发展，这样的高中生上大学，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在毛主席的教育思想体系指引下，根据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事业，教育才能兴旺发达，国家急需的各种人材才能得到及时培养。就大学说，可以有重点大学，也可以有一般大学，可以有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大学，也可以有各种形式的业余大学。就大学生来源说，既可以从上山下乡和回乡的中学生中选拔，也可以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又可以不受学历的限制，广泛地从各行各业的知识青年中选拔，为国所用，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以来，艺术、外语、体育等专业，都从中学生中选拔过一些人材，直接上大学，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针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比较薄弱的现实，选拔一批有研究才能的中学生直接升大学，在大学学习期间也参加一定的对口劳动，这样既解决了知识学习的连贯性问题，又坚持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而且培养出来的人年纪较青，这正是从根本上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四人帮”妄想从这里捞点稻草做文章，完全是痴心妄想！

打着反纂改旗号的疯狂纂改

“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帮”的喊叫不可谓不吓人。然而，究竟是谁篡改了教育革命的方向呢？

教育为那个阶级的政治服务，是关系到教育革命方向的首要问题。在《篡改》中，“四人帮”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坚强战士。”然而，这是放烟幕：且看，在他们所控制的大学里，谁安排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教学，就被诬蔑为“苏修的框框”，“学党史是给走资派脸上贴金”。他们要学生“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把“十分之九的精力放在同走资派作斗争上”，而且“能和走资派斗，就可以打九十九分”。这难道是培养学生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吗？否，这是教唆、诱骗学生去削弱、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教育学生反修防修吗？否，这是打着反修的旗号，妄图把青年学生拴到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战车上，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卖命。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坚持不坚持这一条，是关系到教育革命方向的一个重要问题。“四人帮”接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口号叫得震天响，《篡改》也写道：“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毛主席《五·七指示》的道路，实行开门办学，把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起来，才是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根本途径。”说得多么好听！但是，我们看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吧！毛主席指示要“**以学为主**”。他们却说什么：“大学没有专

业”、“只有一个专业，就是斗走资派的专业”，“铁锹就是专业”。他们砸毁实验室，荒废图书馆，给勤于教学、肯于钻研的师生扣上“智育第一”、“白专道路”的帽子。既然如此，还有什么以学为主呢？在他们控制的大学里，有的班级的专业学习时间全年只有八个星期，仅占全年学时的百分之二十。为了制造反对以学为主的“理论”根据，张春桥公然篡改马克思原著，把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保护童工而提出的不得超过的劳动时间，篡改为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学生劳动时间的“设想”，胡说什么马克思主张十六到十七岁的学生每天劳动六小时。如果照此办理，我们的学生还能以学为主吗？提高劳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是毛主席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反对以学为主就是阉割了这样一项重要内容。毛主席指示要“**兼学别样**”。可是，在“四人帮”的统治下，一些学校的学工学农，竟被他们纳入“开门捣乱”、“开门夺权”的轨道。反党电影《反击》不就是用反动的艺术形式，毫不掩饰地宣扬迟群的“开门办学＝开门夺权”的谬论吗？

“四人帮”和《篡改》的作者还把清华大学“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当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先进经验大肆吹嘘。本来，如果从理论联系实际上改革教学，在一定条件下结合生产任务是可以的。但是，“四人帮”大搞绝对化，把它当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唯一形式，强行推广到整个教学的全过程，根本否认人的认识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规律，否认基础理论和基础知识的重要性，否认知识的系统性，迟群一伙极力鼓吹学员一进校就“打硬仗”、“受锻炼”，宣扬典型任务上得越早、越大越好。有的专业，学员入学就交给和当时高班毕业实践一样的任务，结果只能是教师出方案，学员跟着转，简直是对广大工农兵学员的坑害！“四人帮”所谓的“结合典型任务进行教学”，就是不要基础理论，不要系统知识，搞的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

教育由谁来领导，这是关系到能不能坚持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的一个根本问题。“**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四人帮”以“帮”篡党，以“帮”代党，拚命反对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他们在学校中煽动无政府主义，鼓吹“和党委对着干”，“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挑拨工宣队和学校党委的关系，成立凌驾于党委之上的“上管改委员会”，制造三权鼎立的局面。他们到处挥舞“走资派”、“投降派”的大帽子，疯狂打击学校的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对学校中党的领导干部能打倒的就打倒，不能打倒的就打病、打跑，这还谈得上什么教育革命的正确方向？

“四人帮”和《篡改》的作者还抓住“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这句话大批特批，甚至挥舞起“右派”的大帽子定人罪名。他们的矛头，表面上指向周荣鑫同志，实际上是指向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一九七五年，在国务院领导同志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提出外行的同志要热心于变成内行。这有什么不对呢？毛主席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为无产阶级办教育必须热心教育，热心科学。学校的党组织要有专人主管教学。这样的同志应当是内行，至少应当是接近内行的外行。只有这样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教育工作尽快搞上去。“四人帮”破坏党对学校的领导，反对学校党的领导干部又红又专，这只能证明他们口谈教育革命的方向，干的是破坏教育革命的勾当。

从上所述，不难看出：“四人帮”及其御用“北门学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所炮制的反党乱校大毒草，贯穿着这样一条黑线：从教育上发难，诬陷周荣鑫同志，为打倒

支持周荣鑫同志工作的邓小平同志造舆论，罪恶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英明领袖华主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篡改》在全国造成的恶果是很严重的。它直接涉及的虽然只是教育上的几个问题，但起的破坏作用和恶劣影响极大。在它的煽动下，一大批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负责同志遭受迫害，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横遭打击，整个教育革命几乎被断送。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领导我们胜利地进行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斗争，不仅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毛主席亲手开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这使我们更加明确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必胜的。任何妄图篡改历史的人，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原载1977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九日）

梁　效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全党动员，大办农业，普及大寨县的伟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在各条战线上，新生事物茁壮成长。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无产阶级专政日益巩固。

这样一派大好形势的出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它有力地证实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七年前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亿万人民参加的反修防修的伟大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对于梦想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批判了资产阶级，批判了修正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加强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强大推动力，它进一步焕发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欣欣向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亿万群众经受了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锻炼，使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空前广泛地深入人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供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经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必须指出，这一切并不意味着经过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存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了。我们今天的社会还是具有这样两种可能性：或者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直至

共产主义；或者倒退复辟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需要我们时刻加以警惕。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社会变革，总是要经过反复曲折的斗争，才能得到完全的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广大人民正在以高昂的革命斗志，进一步发扬成绩，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人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质、意义和必要性都已经有了真正的理解，对于这样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都有了正确的估计。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批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思想的时候，曾经说过："**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新的条件下重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一定要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决不能只看到支流，看不到主流，更不能夸大支流，否则，就会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

能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是一个能不能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原则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只有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认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和伟大意义，才能真正懂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如果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那就不可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对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采取积极支持、热情扶植的态度。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老、中、青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深入开展的教育革命，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生气勃勃的五·七干校，茁壮成长的上百万赤脚医生和遍布农村社队的合作医疗，上千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等等，都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们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光辉的前途，代表着我们的未来和希望。它们必然要经历一个从不完善到完善、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对新生事物百般挑剔，利用它们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某些不完善之处，加以歪曲夸大，以此反对和否定它们，这种态度，正如列宁所说："**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第十五页）。鲁迅在揭露那些反对一切改革的顽固派的丑恶面目的时候，指出这些人"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些人的逻辑就是："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极乐世界，或者，至少能够给我（！）有更多的好处，就万万不要动！"历史反复证明，新生事物的成长虽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但它的最终胜利则是毫无疑义的。在这一革命的辩证法面前，任何阻挡新生事物的成长的企图，必然会到处碰壁。

正确对待群众，是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方面。"**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根本原理出发，坚信工人阶级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始终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一边。当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一爆发，马克思就满腔热情地参加了这一斗争，赞扬这次革命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高度地评价了巴黎工人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自我牺牲精神**"（《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二——三九四页），并亲自对他们的斗争经验作了科学的总结。对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采取热情支持、积极引导的态度，而修正主义者普列汉诺夫以老爷式的口吻责难和训斥群众的武装起义，散布悲观失望情绪，胡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列宁立即对普列汉诺夫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指出他是一个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总是“**无情地打击那些傲然批评‘革命的混乱状态’和‘群众的胡闹行为’的人**”（斯大林：《论列宁》），不倦地教导布尔什维克要向群众学习，要理解群众的行动，要细心研究群众斗争的实际经验。

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要坚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主席就批判了反动派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诬蔑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农民运动“好得很”的马克思主义结论。一九五九年，修正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抓住鸡毛蒜皮，否定事物本质和主流的手法，恶毒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什么“‘左’倾冒险主义”，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伟大群众运动诬蔑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及时领导全党对这股右倾机会主义逆流给予迎头痛击，尖锐地指出：“**请你们看看马克思和列宁怎样评论巴黎公社，列宁又怎样评论俄国革命的情况吧！**”“**你们看见列宁怎样批判叛徒普列汉诺夫，批判那些‘资本家老爷及其走狗’，‘垂死的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猪狗们’吗？如未看见，请看一看，好吗？**”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概，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满腔热情地赞扬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和革命精神，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半个多世纪以来，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观点提到路线高度，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完整的群众路线，一切共产党员都应该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永远和群众打成一片，老老实实地做群众的小学生。那种高踞于群众之上，轻视群众的实践和首创精神，诬蔑革命群众运动的贵族老爷态度，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观点，同党的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往往是同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这一点相联系的。人贵有自知之明。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严于解剖自己，对自己一分为二。如果把自己和革命事业的关系、个人和广大群众的关系摆得不正确，对群众的正确批评产生怨气和抵触情绪，就会站到广大群众的对立面，走上错误的道路。只有正确对待自己，才能虚心学习，自觉地改造世界观，使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适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形势发展的要求。只有正确对待自己，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珍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自己的深刻教育，朝气蓬勃地继续革命。

教育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它本身也是一个广泛、深人的群众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教育革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开门办学，工农兵上大学，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朝阳农学院经验，等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大量涌现。应当看到，由于教育阵地几千年来一直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受到的阻力也就特别大。现在，在教育战线上有那么一些奇谈怪论，说什么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啦，“破了不立”啦，“不讲学文化”啦，等等，想把教育拉回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老路上去。这实际上是否定这几年教育战线执行的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其目的是反对“**教育要革命**”的方向，企图复辟封资修的

教育制度。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这些事实恰恰证明了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对于这些事关路线的重大问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经过摆事实、讲道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使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胜利前进。二十年前，毛主席曾经严肃地指出，**“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联系教育战线上出现的种种谬论，重温毛主席的这段教导，不是发人深醒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证明：哪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成果，哪里就能充分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干社会主义，使革命和生产出现新的局面。在当前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认识和总结这场亿万群众反修防修伟大革命运动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原载1975年12月9日《人民日报》)

路线正确　破浪前进

——喜看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人民日报》记者述评

前不久，记者到朝阳农学院采访，所见所闻，很受鼓舞。这里工人阶级对学校的领导不断加强，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作用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师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请看：第三届即将毕业的“社来社去”大学生，正在利用离校前的一段时间，为这个社会主义新型大学的建设增砖添瓦；新入学的六百多名学员，在大寨精神鼓舞下，已经在大凌河畔，建起五百亩教学基地；将要去农村科研教学基点的干部、教师正在办学习班，研究如何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伟大运动中发挥作用；前两届毕业生陆续返校，向学校汇报他们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战斗的收获；今年新开设的文艺班已经开学……。这里是一派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

朝阳农学院是在斗争中胜利前进的。早在八月份，朝阳农学院党委，就举办了有院系两级负责人、工宣队、教师、学生代表参加的学习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誓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广大师生在学院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他们精神振奋，团结一致，决心沿着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一）

“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实行“社来社去”，是朝阳农学院办学的主要经验，是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伟大指示在农业大学的具体体现。这个新生事物，虽然只有几年时间，但是方向对头，生机勃勃，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关注和爱护。

事实胜于雄辩。教育界那种对“社来社去”横加指责的奇谈怪论，什么“不周到”呀，“不全面”呀，“国家大，行不通”呀，等等，已被大量事实驳得体无完肤。朝阳农学院创办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新鲜经验，在报纸上介绍后，受到广大干部、贫下中农、教育战线的革命师生、成千成万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不到一年，从四面八方、各行各业到朝阳农学院来参观学习的就有八万多人。负责今年招生的同志说，朝阳农学院招生的消息一传开，农村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争先恐后地向学校推荐学员，学校只能招六百名，争着报名的贫下中农、回乡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就有一万多人，占朝阳地区适龄青年人数的四分之一。这种情况，是农业院校从来没有过的。

为什么人民群众这样热烈地欢迎“社来社去”呢？一位在农村工作多年的新学员做了很好的回答。他说，旧沈阳农学院办在城里，名为农学院，可是贫下中农难得迈进学校的大门。那时候从中学直接招收学生，进农学院的学生，学农不爱农，毕业不务农，农业生产中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这正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鼓吹“读书做官”，不断扩大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断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结果。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多做贡献，贫下中农多么需要学习呀！但是，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从来没有办过这样的农业大学。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朝阳农学院办在农村，从贫下中农中招收学生，到学校学习几年，又回到农业生产第一线去，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贡献力量。这样的学校，办在广大贫下中农的心坎上了。这段话概括说明了旧学校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按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办学，就能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朝阳农学院已有两届“社来社去”的大学生，毕业后豪情满怀地回到自己家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果林系毕业生贾瑞，回到建平县奎德素公社，被派到一个后进的生产队蹲点。他和当地干部一起，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群众，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大调动了贫下中农的革命积极性。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生产队的面貌就发生了显著变化，结束了多年来吃返销粮的历史，今年向国家卖余粮五万多斤。

朝阳地区贫下中农迫切需要解决耕作改制的问题，以增加复种面积，发展粮食生产。然而这个愿望很长时间没有实现。朝阳农学院农学系学生杨景龙，在校学习期间，就试验成功一地三收（即小麦套种玉米、麦茬后移栽高粱或谷子），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一茬变两茬的问题，为朝阳地区迅速发展粮食生产开拓了新路。

朝阳地区能不能种花生，是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农业技术人员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朝阳农学院农学系学生刘广义，在校第一年就使花生亩产达到五百多斤。他总结和研究了花生的病虫害的防治，今年，花生亩产达到六百多斤。现在朝阳地区，花生种植面积在迅速扩大。

朝阳北部山区，发展果林业很有潜力。然而由于高寒、干旱，春季造林幼苗不易成活，

影响果林业的发展。朝阳农学院果林系学生孔显亭，毕业回到家乡，利用在学校学得的理论知识，研究在秋季不灌水的条件下栽种苹果树。经过两年的刻苦钻研，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解决了问题，为迅速发展朝阳北部山区的果林业做出了贡献。

奉劝教育界那些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到农村去，听听广大贫下中农的声音，看看事实吧，"社来社去"有什么"行不通"的呢？

（二）

一个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革命群众运动正在朝阳地区蓬勃展开。朝阳农学院党委自觉地使学校的教学、生产、科学研究与三大革命运动紧密结合，为农业学大寨做出贡献。可是有人却攻击朝阳农学院，说什么：建设大寨县，朝阳农学院的水平，行吗？行不行，还得看事实。

朝阳农学院的实践说明，农业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要能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做出贡献，首先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战士。院党委组织师生不断批判"学校是传授知识的场所"这一资产阶级教育的骗人谎言。批判"智育第一"，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转变学员思想放在学校一切工作的首位。他们抓住各个教育环节，使学员明确认识到，普及大寨县，必须抓阶级斗争，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把大寨发展史、农业合作化两条路线斗争史、农民运动史、党在农村各个历史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等作为基础课，要求学员必须学好。这样的水平，不正是普及大寨县所需要的吗？

朝阳农学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组织师生积极参加农村三大革命运动，在总结过去办科研教学基点经验的基础上，今年，又办了七个科研教学基点。这些基点，既是学校的一个基层单位，又是学校联系广大贫下中农的纽带。师生、干部轮流到基点，一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面在那里开展科学研究，举办短训班，培养农村急需的多种人材；和贫下中农一起解决农业学大寨的科学技术问题。三年级的学生，到科研教学基点进行锻炼，从事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为回社队发挥更大作用创造条件。这种科研教学基点，在农业学大寨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例如，朝阳县西大营子公社饮马池大队科研教学基点的师生，和当地干部一起，办政治夜校，办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班，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搞科学实验，饮马池大队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今年粮食总产比一九七三年翻了一番，亩产过"黄河"，受到贫下中农的好评。建平县万寿公社扎塞营子大队科研教学基点，试种十一亩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九百三十斤，大开了群众的眼界，为当地低产变高产，粗粮变细粮闯出了路子。这样的水平，不正是普及大寨县所需要的吗？

在校内，朝阳农学院对专业设置、课程内容也进行了改革，彻底破除了旧的教学体制，建立了以科研、生产带动教学的三结合课题组。课题组的科研项目，主要根据朝阳地区农业学大寨的需要确定。如朝阳地区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需要解决新造出如何熟化当年创高产的问题。土肥课题组的同志就在学校的生地上进行试验。从整地、灌水、深翻、压肥、改土、中耕、各种肥料试验等亲手做起，理论结合实践，取得经验，学生在回队实践时就迅速地推广到本队和周围的社队。这样的水平，不正是普及大寨县所需要的吗？

朝阳农学院师生根据农业学大寨的需要，改革教学；紧密结合我国农业生产发展的实际

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在农业科学研究中，走与广大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这一切，深受广大贫下中农的欢迎。那种想否定朝阳农学院的经验，否定教育革命成果的怪论，统统是站不住脚的。

(三)

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以关心知识分子为名，说什么现在“教师无所适从”。事实是，在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广大教师正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朝阳农学院坚持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组织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广大教师到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经受锻炼，坚持参加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社会主义积极性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贫下中农的教育，使教师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波澜壮阔的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使教师为普及大寨县，实现我国农业的现代化，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用武之地。老教授龚畿道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精神焕发。他理论结合实践，注意向贫下中农学习，总结出高粱的一些遗传规律，写出了《亲缘关系与配合力》、《亲本丰产性遗传和配合力的关系》、《果皮、种皮遗传和米质的关系》等科学论文，并用这些来进一步指导育种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农学系谷子课题组青年教师王恩波，几年来自觉改造世界观，为革命刻苦钻研业务，进步很快。他了解到培育早熟高产的夏茬作物品种，是解决朝阳地区一茬变两茬，发展粮食生产的一个重要问题，就不怕苦，不怕累，进行试验，虚心向贫下中农请教，很快就培育出生长期只有六七十天的早熟耐旱高产的朝谷四号。现在这个新品种已经在辽宁、河北、陕西、甘肃等地推广，很受群众欢迎。他知道谷草是牲口的重要饲料，就又培育出谷穗大，谷草多的新品种朝谷六号，很受群众的称赞。棉花课题组一位教师，看到棉区群众为棉花整枝打杈，既费劳力又辛苦，就认真研究不需要打围尖的新品种棉花。经过试验，已初步培育出一种新的棉花品种，可以大大减少棉农的劳动强度，节省大量劳力，产量又比较高。农学系的十一名女教师，自动组织起“三八妇女创业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参加科学实验，除搞好自己担负的教学工作外，还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积肥、种地。今年她们把一块沙滩改造成良田，取得了亩产一千一百多斤的好收成。

教师们深有感受地说：这一切，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是不可能有的。他们所以有进步，根本原因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比较长的时间和广大贫下中农生活战斗在一起，从思想上找到了和贫下中农的差距，认识到过去为社会主义做的贡献太少；从业务上讲，方向对头了，知道了农村需要什么，自己应当搞什么，怎么搞。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是大有所为的。那里是什么“无所适从”？

* * * *

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从来就是在斗争中诞生，在斗争中发展的。朝阳农学院广大师生、干部回顾五年来的办学过程，深刻认识到：要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每前进一步，都要战斗。现在，“**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一九七六年元旦社论

一九七六年来到了。今天发表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写的词二首：《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两篇光辉的作品，以高度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形象，描绘了国内外**"天地翻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歌颂了革命人民**"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勇气概，揭示了马列主义必胜，修正主义必败的历史规律。毛主席这两首词的公开发表，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对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在跨入新的一年的时候，吟诵毛主席的诗词，放眼祖国万里河山，纵观世界革命风云，我们心潮澎湃，豪情满怀，对夺取新的胜利，更加充满信心。

看吧，**"到处莺歌燕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我们的党朝气蓬勃，我们的人民意气风发，我们的国家欣欣向荣，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绚丽的鲜花，开遍了祖国大地。各族人民广泛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认识逐步加深，提高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老、中、青三结合，使各级领导班子生气勃勃，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正在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锻炼成长。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日益繁荣。教育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在斗争中前进，努力把学校改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卫生革命改变着农村缺医少药的面貌，赤脚医生不断成长，合作医疗更加巩固。广大干部进五·七干校，下放劳动，重新学习，提高了继续革命的觉悟，焕发了革命青春。千余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坚持乡村干革命，在农村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工人阶级进驻大、中、小学等上层建筑机构，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工农兵理论队伍的建立和发展，推动了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蓬勃开展，亿万群众发动起来了，百万干部奔赴农业第一线，普及大寨县的革命洪流滚滚向前。我国农业连续十四年丰收。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深入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工业生产达到新的水平。专业科技人员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科研，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地面，科学事业有了新的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工农业总产值指标，已经胜利完成。我国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逐步提高。

这一切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今不如昔"的谬论。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

在新的一年里，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促进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的农业、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为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

毛主席最近又教导我们："**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毛主席二十多年来领导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正如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时再次指出的："**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要走到斜路上去。**"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否定或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必然会犯错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最近教育战线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这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列宁在批判那种把政治同经济平列起来的折中主义观点时说："**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什么是政治，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党的"九大"、"十大"都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了总结。肯定还是否定这场大革命，实质上是继续革命还是复辟倒退的斗争。这种斗争将会长期进行下去。我们的广大干部，要继续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重温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深刻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认识这两个阶级和它们之间的阶级斗争，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自觉地掌握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样，才能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问题。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崭新成果，是亿万群众生气勃勃的伟大创造，它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反映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趋势。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者，都要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要看到新生事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会有某些不足之处，应该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态度和措施，使之更加完善。切不可象资产阶级贵族老爷那样，横加责难，大泼冷水。更不能跟着一小撮心怀敌意、别有用心的人扼杀新生事物。我们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搞好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卫生革命和各条战线的斗批改。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今年是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要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继续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要继续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全党动手，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要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走我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搞工业也好，搞农业也好，搞其它工作也好，都要围绕阶级斗争这个纲，都要依靠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抓好典型。

党的领导是我们事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抓紧学习，教育和训练干部，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教育战线的大辩论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战斗队。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要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界限。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按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继续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当前国际形势大好，天下大乱。世界各种基本矛盾日益激化，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明显增长。“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彻底破产，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反帝、反殖和反对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苏美两霸的争夺愈演愈烈，争夺的战略重点在欧洲。搞“声东击西”，玩弄“缓和”骗局最起劲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正是今天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我们要提高警惕，准备打仗。要继续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人民解放军和广大民兵，要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加强战备，严格训练，严格要求，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毛主席的光辉词句，指出了我们无限光明灿烂的前途和前进道路上所必须经历的曲折斗争，指引我们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披荆斩棘，奋勇向前。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航向，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有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我们一定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在新的一年里，夺取更大的胜利。

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

(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

尹　铭

自从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发表以来，从工厂到农村，从机关到部队，从商店到学校，都广泛地开展了评《水浒》的活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广大干部和群众通过联系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进行评论，认清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和投降派宋江的真面貌，进一步认识到刘少奇、林彪一类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罪恶阴谋。随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发展，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也就越来越清楚了。

毛主席指出：“**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搞修正主义，古代有，现代有，将来还会有。毛主席在这里概括了宋江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全过程。梁山在晁盖的正确路线领导下，各路英雄闻风而来，“共聚大义”，“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然而，风云突变，梁山上出了宋江这个投降派。他一上台，就篡改了晁盖既反贪官，也反皇帝，坚持农民起义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接受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路线一变，一切都变：聚义厅变成了忠义堂，“托胆称王”变成了“替天行道”。结果是让人招安，去打方腊，人头落地，毁灭了整个梁山革命事业。从宋江投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篡改革命路线，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对于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多么

严重啊！批判《水浒》所歌颂的这一条投降主义路线，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修正主义的危害性，不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吗？

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毛主席曾经指出："**如果说，法国资产阶级的国民议会里至今还有保皇党的代表人物的话，那末，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同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尚且要继续这样长的时间，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就更是长时期的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开始到现在不过九年多，如果认为不会有人再搞修正主义，没有人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前一个时期，教育界出现的一些奇谈怪论，就直接关系到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毛主席提出的"**教育要革命**"，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一项重要任务。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开门办学"不讲学文化"，大学生的水平"不如过去中技高"，集中到一点，就是现在应该"扭"回到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老路上去。如果让这种修正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那么，就象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样，学校就会由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复辟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革命的成果就会被断送掉。

我们联系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就会认识到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现实意义是很深刻的。宋江搞修正主义，有其特定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在改变革命路线、篡夺领导权、否定革命成果、危害革命事业等方面，却是古往今来一切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前一时期，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攻击教育革命的谬论，就是修正主义这一共同特征的具体表现。对这种引导人们去投降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能不能识别？认识不认识它的本质？敢不敢同它进行斗争？这就考验着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投降派**"。把历史的经验和这一现实的斗争结合起来，就能使《水浒》的评论评得生动深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开展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批判的必要性，从而认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普遍规律。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特别强调了领导权的重要性。"**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水浒》这部反面教材所歌颂的宋江改变晁盖的革命路线的过程，是从篡夺领导权开始的。这个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的代理人一上台，就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路线，很快改变了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颜色。这个事实说明，领导权掌握在什么阶级的手里，对于革命的成败至关重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有些部门和单位由于领导权没有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因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不到贯彻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受不到抵制和批判，资本主义到处泛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进一步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指出："要特别警惕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和两面派，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保证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家手里"。那里的领导权如果不是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阶级手里，那里就会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为修正主义路线翻案。工人、贫下中农给我们的权力，应当用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而利用这种权力搞修正主义，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背叛。只有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强党的一元化

领，搞好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才能保证各级领导权真正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

《水浒》"做反面教材"能够从反面教育人民，一切修正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也是这样的反面教材。批判《水浒》所产生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当前围绕着教育革命问题开展大辩论的意义。正确路线是同错误路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这场大辩论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重大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通过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就能教育干部和群众辨别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路线，什么是修正主义路线，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教育战线的这场大辩论，对于其他各条战线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把这场大辩论坚持进行下去，搞深搞透。解放二十多年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曾经进行过多次较量，都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失败而告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批林批孔的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谁要搞修正主义，谁要开历史的倒车，必然在群众中受到孤立，受到抵制和批判。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广大人民群众必将沿着毛主席开辟的航道，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历史方向。

阶级斗争是纲，其他一切工作都是目。评论《水浒》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抓紧阶级斗争的一个具体内容，轻视或贬低评论《水浒》的现实意义都是错误的。我们要密切联系当前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通过对《水浒》的评论，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1976年第1期）

张铁生的新"答卷"

——对教育界某刊物上奇谈怪论的批判

（一九七六年一月六日）

正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辽宁铁岭农学院工农兵学员张铁生又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针对这些奇谈怪论，写了一篇批判文章。

张铁生的批判文章是针对教育界一个刊物第十期的内容而写的。在这期刊物上，散布了种种否定教育革命的奇谈怪论。它一出笼，有些人高兴地把它称之为"教育战线重新调整政策的红色信号。"张铁生在批判文章的开头，就尖锐地指出：这"不是什么红色信号，而是修正主义复辟的绿色指示灯，必须认真加以批判，一点也不能放过"。

这是张铁生上大学以后，在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阶级斗争主课中写的一份新"答卷"。

早在两年前，张铁生在大学招生的"考场"上，曾经写过一篇发人深省的答卷，在招生问

题上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上大学以后，张铁生深感这场斗争并没有结束，一直警惕着斗争的反复。他牢记党的基本路线，为了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积极参加了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斗争。

一九七四年三月，张铁生所在的牧医系同学和部分教师在党总支和工宣队的支持下，首先奔赴农村，踏上了开门办学的征途。可是回校后，在总结会上，有人却否定开门办学的方向，硬说什么下乡"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面对这场斗争，张铁生坚持教育革命，寸步不让。他和同学们以开门办学中取得的丰硕成果，回答了这种种的责难。下乡四个月来，他们积极投入农村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发动群众斗倒了混进兽医队伍的阶级敌人。他们不但全心全意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工农兵学员们在农村上了生动的阶级斗争主课，学到了真知，基本上掌握了牲畜常见病的防治，学会了作多种手术。张铁生说："这怎么能说下乡开门办学'下糟了'呢！"由于张铁生和师生们坚持斗争，终于推动了铁岭农学院的开门办学。

铁岭农学院和朝阳农学院一样，都是从旧沈阳农学院分出来的。朝阳农学院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创造了办好社会主义农业大学的新鲜经验。而铁岭农学院有的领导人却说什么"朝农是普及，咱们是提高；朝农是地区分配，咱们是国家分配"等等。一句话，就是不想学朝农。张铁生感到，要把铁岭农学院办成朝农式的农业大学，关键在学院的领导。他对这种不服气，不想学，还想走老路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七四年十月，他和同学一起，给院领导写了一张《学朝农，抓根本》的大字报。但是院领导某些人却拒绝接受批评，反而责难这张大字报。这使张铁生联想到入学两年来，校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更加感到学院领导班子路线不端正，是个"缺煤、少水的火车头"，怎么能领导全院师生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呢！正当张铁生和同学们坚持斗争的时刻，一九七五年八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被选拔为这个新的领导班子的副组长。

新的领导班子成立以后，立即带领师生学习朝阳农学院，把铁岭农学院办成朝农式的农业大学，推动了全院教育革命蓬勃发展。就在这个时候，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也刮到了铁岭农学院。特别是教育界的一个刊物寄到学院后，一些对教育革命抱消极观望态度的人，突然活跃起来，有的公开把这期刊物的"评论"拿出来，说它是什么教育战线重新调整政策的红色信号。

亲身参加教育革命的战士，对教育革命这一新生事物最有感情。在那些日子里，张铁生心情十分沉重。他和同班同学邵传明，迎着寒风，走在大道上。他们越交谈，越感到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回想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我国教育革命的高潮蓬勃兴起，一九五九年便被刘少奇一伙疯狂地反扑下去了；一九七二年资产阶级责骂我们"质量低"、"不正规"，而我们有的同志却在"提高质量"的压力下，低头"认错"……。回顾历史，面对现实，张铁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教育战线上的继续前进还是从此倒退的一场新的斗争。"他对同学邵传明说："在这场斗争面前，我们不能等闲视之，不然我们取得的教育革命成果就要全被否定。"他俩共同商定要坚决进行回击。第二天下午上政治课时，铁岭农学院牧医系三年一班工农兵学员开会。会上，邵传明对那篇鼓吹右倾翻案风的"评论"进行了批判，与那些奇谈怪论大唱对台戏。由此在牧医系、在全院点燃了批判教育界奇谈怪论的革命烈火。

在激烈的辩论中，张铁生挥笔写了这份新"答卷"。他在这篇批判文章中回击教育界的右

倾翻案风，对教育战线一些大是大非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主要危险是什么？"我们认为，当前的主要矛盾，不是'飞速发展的大好形势与落后的教育的矛盾'，而正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不是什么'教育质量低'，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教育战线上的主要危险，不是什么'拖四个现代化的后腿"，而仍然是'学而优则仕'，仍然是'智育第一'，仍然是修正主义。"

对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怎么看？他说："形势是喜人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用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对朝阳农学院的经验怎么看？张铁生说："朝农的教育体系是与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针锋相对的，朝农的路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路、是毛主席完全赞成的路，任何人、任何时候也是否定不了的。不管风吹浪打，我们将沿着它的办学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这份新"答卷"，尖锐地批驳了教育界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它再一次生动地显示了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生力军作用。

《辽宁青年》杂志记者
新　华　社　记　者

(原载1976年1月6日《人民日报》)

北　大　校　园　风　雷　动（节录）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教育革命大辩论
提高北京大学师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

在全国人民满怀革命豪情跨入一九七六年的时候，战斗的北京大学校园里，人人意气风发，处处凯歌激荡。一场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击教育界的奇谈怪论，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教育革命大辩论，在学校党委统一领导下，正沿着毛主席指示的方向蓬蓬勃勃地向前发展。

去年七、八、九三个月，资产阶级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广大工宣队员和教育革命积极分子，憋了一肚子气，他们在校党委坚强有力的领导下，用将近两个月时间，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总结一九七0年大批工农兵学员入学以来教育革命的成绩和经验，满怀信心地沿着"**教育要革命**"的方向前进。有的工农兵学员用"不畏严寒风霜苦，不怕暴风骤雨狂，一颗红心永向党，披

荆斩棘向前闯”的诗句，表达了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广大师生员工扬眉吐气，斗志昂扬，迅速投入了这场大辩论。在大辩论的推动下，北大的教学、科研、生产、后勤等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新的面貌。

北京大学党委充分地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不断地提高广大师生员工对这场斗争重要意义的认识。在引导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深入领会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的基础上，校党委让大家围绕教育革命的方向和路线问题，摆事实，讲道理，展开大辩论。通过辩论，大家认识到，当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攻击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几年来教育战线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美化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目的就是妄图在教育领域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在北大也有很大影响。通过大辩论弄清思想，分清路线是非，这对于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展教育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重大的深远的意义。从工宣队员到学校干部，从年青的工农兵学员到学校的老工人，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附中、附小的红卫兵、红小兵，都积极投入这场大辩论。在半工半读基地大兴分校的工宣队员董立功坚定地表示：“从七·二七毛主席派我们开进学校第一天起，我们就下定决心，要把教育阵地占领下来，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历史赋予工人阶级的使命。十二级台风吹不走，天塌下来也顶得住。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哲学系三年级八十一名工农兵学员写的《右倾翻案风的十种表现》、《错误思潮手法剖析》等大字报，在师生中都很有影响。他们还结合教学，每人写了一篇理论性较强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批判奇谈怪论的唯心论。中文系魏建功等十二名教授，除了在辩论会上踊跃发言，每人还写了大字报，用自己几十年来的亲身经历，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歌颂教育革命的丰硕成果，驳斥奇谈怪论制造者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诬蔑。有个教授在大字报中写道：“奇谈怪论摆出一副为知识分子‘请命’的架势，目的是挑拨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妄图拉着我们倒退。但是，**倒退是没有出路的**。我们绝不上当，一定要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正确方向，继续前进。”

（原载1976年1月7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周恩来同志逝世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八

岁。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二年得病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周恩来同志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周恩来同志终于和我们永别了。他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

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消息，将在我国人民的心中引起深切的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 1976 年 1 月 8 日讯，载 1 月 9 日《人民日报》)

〔附〕在最后的日子里

——记病重住院期间的周恩来同志

高 文 谦

1974 年 6 月 1 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在最后环顾凝视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后，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 25 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中度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最后的一年零六个月。

周恩来是在 1972 年 5 月间一次常规的检查中发现患有癌症的。这时，“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在党和国家遭受危难的年代里，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

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地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然而不久，周恩来提出的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全国的中心工作改为批判林彪的“极右实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一形势，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周恩来的病情急剧恶化，每日大量便血，有时多达上百CC。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除了在政治上借“批林批孔”运动之机，把矛头公开指向周恩来外，还常常借故打着“商量工作”的幌子，无端干扰周恩来的治疗工作，并且迫使周恩来承担了频繁的迎送外宾的礼节性工作，经常要从城里到首都机场往返数十公里。这对一个已经身患重病的古稀老人来说，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分昼夜地抱病操劳。直到1974年4、5月间连续四次发生缺氧症状后，才同意住院动手术，但仍坚持妥善办完最后一件公务。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之后，他才交待了工作，向秘书口授“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作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又进行第二次手术。当周恩来住院这一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后，人们的心头无不笼罩上一层阴影。在“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性的历史灾难中，人民从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呕心沥血的努力中，认识到他是人民意志和愿望的体现者，因而更加赢得了人民的衷心爱戴，把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寄托在他的身上。

1974年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人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十余次之多。它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党心、军心、民心所向。

国庆节过后，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江青反革命集团认为夺权时机已到。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有预谋地围攻邓小平，意在闹掉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的提议。邓小平坚决顶了他们。江青集团经过密谋后，派王洪文紧急赶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诡称“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家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在医院的周恩来得知“风庆轮事件”后，10月19日，在找了邓小平等同志了解了事情经过后，把当时毛泽东的联络员找到医院，向他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象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他还表示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10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了“风庆轮事件”的汇报后，愤愤地表示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并再次提议邓小平

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在这关系到由谁来掌握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关键时刻，周恩来不顾自己两次大手术后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毅然再度担负起处理党和国家全面工作的重担。从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周恩来连续十多天在医院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以及王洪文、江青谈话，并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解决"风庆轮事件"问题，研究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11月6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各项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并汇报了自己的身体情况。信尾表示:"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这一过渡时期，只有主席健在，才能领导好"。

12月间，周恩来在医院中紧张地展开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这是一个异常繁重而棘手的工作。为了做好这一工作，周恩来事必躬亲，通宵达旦地工作着。他在审阅四届人大各界代表的名额分配名单后，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要增加老干部的名额。他在审阅了政府工作报告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在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反复考虑，煞费苦心。针对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要将他们的亲信安插在文化、教育、体委等部委的情况，周恩来约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几次研究、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关系重大，不能让，以周荣鑫掌管为宜；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随后，他在医院分批召集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候选人名单的三个方案。

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隐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经过慎重考虑，叶剑英表示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因为目前正是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在长沙，周恩来逗留了五天。毛泽东在谈话中劝周恩来安心养病，并再次称赞了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两人还谈到了"四人帮"的问题，毛泽东批评了江青、王洪文搞宗派，指出:"江青有野心"。就这样，周恩来以坚决而有策略的斗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通过组阁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这一集中反映全国亿万人民迫切愿望的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这是他生前留给我们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后，由于过度劳累，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在作肠胃镜检查时，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月底又再次作了手术。对于自己病情的一再恶化，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很显然，死神在向自己一步步逼近。作为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于任何人也无法抗拒的自然法则——生老病死，周恩来的内心是坦然和无畏的。在同侄女周秉德通电话时，周恩来专门谈到了生死问题，说:"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早在十几年前，周恩来就同邓颖超共同商定，相约死后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这回，在得知自己的病已经不能挽救时，他又一再叮嘱说，不要保留他的骨灰。他坚信唯物主义的观点，物质不灭、生息不已。但是另一方面，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周恩来十分清楚自己责任的重大，自己的一进一退，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特别是在目前党和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更是如此。党和人民迫切地需要自己坚守岗位。5月7日，周恩来到北京医院看望了谭震林等同志，并专门接见了曾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医务人员。他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并表示"你们一

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3月到9月间，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以重病之身与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望人4次。下面，举一些例子：

4月3日，在刚刚动完手术，病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因对方的再三恳求，躺在病床上会见了突尼斯总理努伊拉。

4月19日，得知金日成来访后，坚持下床会见，因脚肿穿不了皮鞋，特地赶制了一双圆口布鞋会见了金日成。

5月3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会后，经毛泽东与周恩来共同商定，由邓小平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次会议使得江青集团的活动稍有收敛，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6月9日，不顾医生的劝阻，前往八宝山参加"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并亲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周恩来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自己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歉疚之情。贺龙同志的家属见他病容满面，十分消瘦，劝他保重自己的身体时，周恩来表示自己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在场的人听到这句话无不心如刀绞，悲咽失声。

8月26日，会见西哈努克、宾努、乔森潘、在讲话中希望他们加强团结，巩固胜利。

9月7日，不顾病情的严重恶化和医务人员的再三劝阻，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谈到自己的病情时，周恩来坦然而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并请客人转告齐奥塞斯库，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在旁陪见的同志解释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周恩来最后预言性地表示：具有50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这是周恩来一生中难以计算的会见外宾中的最后一次。

在医院的这些日子里，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也不允许他安心治病。他必须时时注视着政治风云的变幻，提防着在一旁虎视眈眈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举一动。四届人大后，始终把周恩来视为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最大障碍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并不甘心企图组阁的失败，他们先是以反对经验主义为名，声称"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指责政治局"不抓大事"、"不抓政治忙于业务"，攻击周恩来。继而又利用毛泽东评论《水浒》一事，大批"投降派"，宣称"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已经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在这种形势下，一生曾经历过无数次惊涛骇浪的周恩来，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心情十分沉重和悲愤，不得不为捍卫作为一个革命者高于一切的政治生命而奋起抗争。1975年7月1日，他在同泰国总理克立·巴莫签署完中泰两国建交公报后，一部分工作人员趁摄影记者还在，围住了周恩来，要求同他合影留念。周恩来答应了，但表示："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划××。"一句话说得大家心情沉重得都抬不起头来。他们曾跟随周恩来多年，深知他的为人，不论在怎样险恶的环境里，也不论在怎样沉重的心情下，都很少谈论到个人的安危，今天突然吐露出来的这句话又意味着什么呢？

1975年9月间，周恩来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癌症的消耗，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几十斤。在病痛的折磨下，他连散步4分钟的力气也没有了。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对

他进行了手术。手术前，周恩来或许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来了自己于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已经颤抖的手，签上自己的名字，并注明了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就在这次手术中，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为此，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就在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的同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区、各部门。10月下旬，医生们对周恩来再次进行了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推车上的周恩来询问邓小平来了没有？当邓小平靠近手推车时，他握住邓小平伸过来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有能够起来。作为一个已经战斗了数十年、饱经风霜的政治家，周恩来虽然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十分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担忧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开始他还可以强撑着自己看报，后来便只能依靠医护人员读报了。形势在一天天恶化，但是在这种悲剧面前，周恩来又能表示些什么呢？医务人员常常看到他睁着眼睛，望着天花板，不时地摇头叹息……

癌症的晚期是十分痛苦的。周恩来以极大的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每当难以忍受的病痛袭来的时候，他就紧紧地握住医务人员的手，一声不吭，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每咽一口饭，他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为了党和国家的大局，他决意要顽强地活下去，哪怕是多坚持一天也好。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们多吃几口，来，给我数数。”当费力地咽下一口后，他念叨着：“一！”又咽下一口：“二！”……“三！”……12月中旬，周恩来已经不能进食了，完全靠输液来维持生命。癌细胞广泛扩散，剧烈的疼痛常常使得他晕了过去。为了减少他的痛苦，医生不得已动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

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周恩来想到的仍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仍是工作和他人，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75年12月间，周恩来对前来看望他的老一辈革命家叶剑英等人嘱咐说：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手里。在同王洪文谈话时，他一再告诫王要记住毛泽东1974年底在长沙同他们两人谈话中关于“江青有野心”的那段话。12月20日这一天，周恩来的体温三十八度七，但他仍然在病榻上，吊着输液瓶子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他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他抱歉地说：“我实在疲倦了，让我休息十分钟再谈。”随后，便昏迷过去。

12月底，当周恩来得知曾给自己理了二十多年发的北京饭店朱师傅几次捎信要来给自己理发后，便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老朱给我理了二十几年发，看到我病成这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吧，谢谢他了！

1976年元旦过后，尽管医务人员进行了全力抢救治疗，但周恩来的病情仍在继续恶化。处于病痛极度折磨之中的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低声吟唱起国际歌，并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1月7日晚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医生，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在与病魔的搏斗中耗尽了生命的最后一丝精力，怀着许许多多造福于人民的美好设想，怀着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深深的关切，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离开了人世。

一九八六年一月八日
(原载《中华英烈》创刊号)

〔附〕批判极左思潮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读《周恩来选集》下卷

文 谦

批判极左思潮，是周恩来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贯思想，也是他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焦点之一。收入《周恩来选集》下卷这一时期的三组文稿，从不同的侧面展现了这一点，反映了他在风雨如晦的十年动乱期间，费尽心血地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和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所作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

周恩来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同极左思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一斗争大体可以1971年林彪叛国事件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中，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批判极左思潮这一思想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展开，而是更多地体现在他独撑危局、力挽狂澜的努力之中。比较充分地反映这一思想则是在后一阶段。

1971年9月发生的林彪叛国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以此为契机，推动了时局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一定限度内调整了自己的某些政策，并支持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出于对人民和历史负责的政治责任感，周恩来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以极大的努力，全面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教育和科技政策，医治"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各方面生活所造成的创伤。这一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
保护并且解放了一大批领导干部

为了扫除极左思潮这一思想障碍，从全局上推动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1972年4月，周恩来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一篇从正面阐述党在干部问题上的历来政策和优良传统的社论，并亲自审阅了这篇题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指出：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必须批判林彪错误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排除"左"的干扰。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这篇社论在当时影响很大，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干部工作的进行。

在解决老干部医疗保健问题上，1972年4月，周恩来抓住陈正人、曾山两同志因无处投医、救治不力而相继去世一事，指示卫生部一定要尽快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叮咛周

至，并亲自作了布置。根据他的指示，卫生部组织北京十个大医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对近五百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作了体检。其中有不少老同志是从外地五七干校赶回来体检的，并在这个名义下获得了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此外，不少老同志还在周恩来的亲自干预下，获得了自由，住院检查身体，并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如李葆华的妻子田映萱在1972年冬天写信给周恩来，反映仍在囚禁中的丈夫的身体情况。这封信经胡耀邦、王震同志辗转送至。周恩来亲自给当时安徽省委的负责人打电话，责令其立即将李葆华放出来住院检查身体。三天后又再次打电话催问落实情况。在他的干预下，李葆华获释，不久担任了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由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百般阻挠，解放干部这一工作步履艰难，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其间充满了周恩来与江青集团的斗争。1973年春天，身患癌症的周恩来同志大量便血，需要手术治疗。术前，他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提出先易后难的方案，送政治局讨论。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名单后，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江青、张春桥等人百般阻扰，设置种种障碍，从中作梗。为此，叶剑英同志愤然做了一首《过桥》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诗中不仅表达了对江青等人阻挠解放干部的愤慨，而且表达了对解放干部工作的"牵骡人"周恩来的敬佩感激之情。

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

"文化大革命"中，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林彪事件之后，这一灾难性的后果充分地显示出来了。同时，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经济工作的许多问题是非颠倒，被搞得混乱不堪：抓生产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抓业务被指责为"冲击政治"；抓企业管理被说成是"管卡压"；抓盈利被攻击为"利润挂帅"；讲按劳分配被攻击为"物质刺激"；等等。很显然，不批判极左思潮，就难以扭转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

周恩来从1971年底开始，在相继召开的一系列全国性的专业会议上，始终坚持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工作的破坏性后果。他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林彪鼓吹的"突出政治"的影响而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1年12月周恩来提出，要认真整顿，加强企业管理，恢复和健全被极左思潮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根据他的这一意见，国务院主持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规定各级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经济核算制等七项制度和品种、质量、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指标。经过整顿，各级企业的面貌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在企业整顿取得一定成效后，周恩来又立即转入解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的问题。1973年2月，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即《经济工作十条》）时，强调一定要"消除林彪一伙对经济的破坏性后果"，"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切实纠正生产建设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他提出要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必要的奖励制度"，以打破"四个一样"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状况。他充分肯定了《经济工作十条》所提出的具体措施，批准把它拿到1973年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

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
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周恩来指出："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并提出了"革命激情要和革命抒情结合"的原则(《极左思潮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他在另一次谈话中更详尽地论述了这一问题，说：现在只提革命激情，不敢提革命抒情，是一种偏向！革命激情与革命抒情，是对立的统一，都要有，要有激有抒，有张有弛，抑扬顿挫。就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痛心于社会主义的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的局面，鲜明地提出："现在要提倡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也许平平常常，但在当时却给正在苦闷中彷徨思索的文艺工作者以极大的鼓舞，为他们指明了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

教育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学生无心读书，学校秩序十分混乱，教学质量严重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周恩来同志在 1972 年 9 月会见李政道博士的谈话中提出 "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立刻不胫而走，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反响。后来尽管由于形势的变化未能实行，但在实际工作中对于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对于科研工作，周恩来在长期领导国家建设的实践中，曾多次阐述过这一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科研工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加大了本来与世界先进水平正在缩小的距离。周恩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1972 年 7 月，他在会见美籍中国学者的谈话中提出了要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意见。9 月，他在给张文裕、朱光亚的信中又提出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随后，根据他的建议，召开了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提出了加强科学研究，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号召。但张春桥却说"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右倾回潮"，并要追后台。周恩来与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不能在会议纪要中写入"黑线专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科技战线免遭教育战线那样的破坏。

周恩来在各个领域里批判极左思潮所做出的努力，引起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极大恐慌。从 1972 年 9 月下旬起，批"左"与反批"左"的斗争日趋尖锐。这场斗争的实质在于，是尽快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把党和国家从这场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还是延续以至加剧"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继续制造动乱，祸国殃民。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又一次重大较量。非常不幸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批判极左思潮这一过程后来被打断了。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它所代表的历史前进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后来的事实发展证明，"历史最终会把一切都纳入正轨" (恩格斯语)。如果把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看的话，那么可以说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先导，而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十二大，在指导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全面地拨乱反正，则是这一过程的完成。正因为如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周恩来批判极左思潮，使各方面工作出现了转机给予充分的肯定，把这件事同 1967 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二月抗争"和 1975 年邓小平同志抓全面整顿这两件事并列起来，作为十年内乱期间，党内的健康力量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三件大事。这是历

史所给予的公正评价。

（原载1984年12月18日《文汇报》）

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

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邓小平　朱　德　张春桥　韦国清　刘伯承　江　青（女）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宋庆龄（女）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　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　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邓颖超（女）　曹轶欧（女）　粟　裕
王　震　余秋里　谷　牧　孙　健　沈雁冰　帕巴拉·格列朗杰　江　华　张耀祠
郭玉峰　耿　飚　罗青长　李大章　鲁　瑛　许健生　莫　艾　朱穆之　邓　岗　武傣华
金祖敏　谢静宜（女）　杨坡兰（女）　乔冠华　施义之　李　强　方　毅　沙　风
陈绍昆　周子健　刘西尧　李际泰　王　诤　李成芳　边　疆　汪　洋　徐今强　康世恩
钱正英（女）　钱之光　万　里　叶　飞　钟夫翔　张劲夫　范子瑜　于会泳　周荣鑫
刘湘屏（女）　庄则栋　吴庆彤　苏　静　方　强　陈国栋　杨成武　梁必业　张宗逊
林丽韫（女）　蔡　啸　朱蕴山　刘文辉　史　良（女）　胡愈之　沙千里　季　方
黄鼎臣　周培源　田富达

（新华社1976年1月8日讯，载1月9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
隆重追悼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

为深切悼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同志，中共中央、国务院通知，于一月十日、十一日向周恩来同志遗体告别。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举行吊唁仪式。十五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自发表讣告之日起至十五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新华社1976年1月9日讯，载1月10日《人民日报》）

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一九七六年一月九日）

治丧委员会获悉有些国家的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吊唁活动，对此表示深切的感谢。按照我国的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吊唁活动。特此公告

（新华社 1976 年 1 月 9 日讯，载 1 月 10 日《人民日报》）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群众代表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

在全国各族人民深切哀悼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时候，十日、十一日两天，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代表一万多人，怀着敬爱和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周恩来同志安卧在鲜花丛中，遗体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置放着长青松柏。

向周恩来同志遗体告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他们在周恩来同志遗体前静默致哀，并向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表示亲切的慰问。

两天来，自早至晚，一队接着一队的群众来到医院，瞻仰敬爱的总理的遗容，满怀哀痛地向总理告别。同志们深切地表示，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周恩来同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十一日下午四时四十五分，周恩来同志的遗体由王洪文同志、汪东兴同志、邓颖超同志，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和总理生前友好，隆重地护送到八宝山火化。

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的，还有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国防科委、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他们当中有：粟裕、张耀祠、郭玉峰、耿飚、罗青长、李大章、鲁瑛、许健生、莫艾、朱穆之、邓岗、武葆华、金祖敏、谢静宜、杨坡兰、乔冠华、施义之、李强、方毅、沙风、陈绍昆、周子健、刘西尧、李际泰、王净、李成芳、边疆、汪洋、徐今强、康世恩、钱正英、钱之光、万里、叶飞、钟夫翔、张劲夫、范子瑜、于会泳、周荣鑫、刘湘屏、庄则栋、吴庆彤、苏静、方强、陈国栋、杨成武、梁必业、张宗逊、林丽韫、蔡啸、朱蕴山、刘文辉、史良、胡愈之、沙千里、季方、黄鼎臣、周培源、田富达。

专程前来北京的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谭启龙、彭冲等，也前往医院向周恩来同志的遗体告别。

（新华社 1976 年 1 月 11 日讯，载 1 月 12 日《人民日报》）

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四万多人，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片庄严肃穆气氛。吊唁大厅的中央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了鲜花和常青松柏。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肃立守卫在两旁。大厅正门上方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送了花圈，花圈上写着："悼念周恩来同志"。

吊唁大厅里还陈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领导同志是：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献了花圈，上面写着："悼念恩来战友"。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

各群众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台湾省爱国同胞，以及上海市总工会、广州、南昌、武汉、南京、重庆、西安、延安等市的党委和革委会，送了花圈。一些华侨和港澳同胞也送了花圈。

吊唁大厅还摆着金日成同志派人专程送来的花圈，恩维尔·霍查同志送的花圈，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送的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许多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许多国家驻中国大使、大使馆，正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其中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罗马尼亚政府，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拉圭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文铭权，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恩斯特·奥斯特，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中央委员会，意大利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组织中央领导机构，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奈温，法国总统，法国总理，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政府和人民，革命最高负责人塞古·杜尔总统和几内亚人民，日本国总理大臣三木武夫，马里全国解放军事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及马里共和国全国，巴基斯坦总统，巴基斯坦总理，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暨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和家属，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突尼斯共和国总结哈比卜·布尔吉巴，突尼斯共和国总理赫迪·努伊拉，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英国首相，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政府和全体扎伊尔人民，阿根廷共和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暨人民，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丹麦王国政府，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荷兰王国，新西兰政府和人民，挪威王国政府，秘鲁政府和人民，泰王国政府和人民，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日本国前总理大臣田中角荣，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外交部长阿·布特弗利卡，菲律宾外交部长，菲律宾代理外长，日本众议员大平正芳，日本众议员保利茂，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成田知已等。

正在北京访问和常驻北京的外国朋友二千多人，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恩来总理。他们当中有：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德钦巴登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龙素福·阿吉托罗普，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递信部长金学燮为团长的朝鲜邮电代表团，以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贾玛尔·阿卜杜尔·卡迪尔为团长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卫生代表团，日本众议员、前邮电大臣久野忠治，以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众议员下平正一为团长，副委员长、参议员田英夫为副团长的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访华团，美国朋友柯弗兰、柯如思、爱德乐，英国朋友帕特，以及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等。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代表，也前往吊唁。

党和国家领导人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吴德、陈永贵、吴桂贤、乌兰夫、李素文、

姚连蔚、王震、谷牧、孙健，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在大厅里分别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宾，并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感谢。

三天来，首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和各界各族群众，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他们臂带黑纱，胸佩白花，在军乐队演奏的哀乐声中，含着眼泪，缓步走进吊唁大厅，向总理遗像默哀致敬。他们表示：一定要学习周恩来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学习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革命品质，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前来参加吊唁的人们，代表着坚守在各个岗位上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学生等各条战线的群众。连日来，广大群众把悼念总理的深厚感情倾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首都钢铁公司的工人说，周总理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是坚持同阶级敌人斗争的一生。我们学习总理，就要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松，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年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的北京铁路分局"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学习总理的革命精神，永开革命车，永走革命路，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永当革命的火车头，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京西矿务局的工人表示，要以总理忘我革命的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为提前完成总理在四届人大代表党中央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这个局几天来全局原煤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决心用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几天来，不少车间创造了今年以来日产量最高纪录。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大白楼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回顾了总理生前对他们的指示和关怀，心情无比激动。他们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的社员在悼念总理的日子里，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了农田基本建设。商业部门职工表示，要以总理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广大指战员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总理为建设和发展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革命警惕，紧握手中枪，严守战斗岗位，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清华大学广大师生，连日来，纷纷集会，决心学习总理坚决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精神，继续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新华社1976年1月14日讯，载1月15日《人民日报》）

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节录)

——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出现新面貌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

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清华大学有那么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配合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制度本来很好，教育革命搞糟了，现在就是要“扭”回去。究竟应该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我们的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在这些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广大干部、群众同极少数几个人产生了根本的对立和尖锐的斗争。

从十一月三日起，在毛主席、党中央一系列重要指示的指引下，清华大学展开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对这股右倾翻案风发动了猛烈回击。

(一)

清华大学的革命大辩论，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的。

几年来，围绕着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持还是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次斗争。在这些斗争中，资产阶级总是企图从教育战线打开缺口。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坚决同修正主义进行斗争，一次又一次打退了资产阶级的反扑。目前这股右倾翻案风，妄图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进而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它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同它的斗争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反映，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

认清了这场斗争的实质，校党委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

十一月十八日，校党委召开全校大会，开辟了大字报区，广大革命群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高昂的战斗姿态投入大辩论。

在领导这场运动中，清华大学党委特别强调，把大辩论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同评论《水浒》紧密结合起来

(二)

革命大辩论是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通过辩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短短两个月，清华大学涌现出大批新人、新事物。

广大干部、群众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怎样当好一名反修防修的战士？毕业班的学员首先作出响亮的回答：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旧的传统观念决裂，同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对着干，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党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他们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封信，以激情洋溢的语言，表达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充分反映了这一代新人的新风貌。

工农兵学员争当反修防修的战士，教师怎么办？他们说："我们也要上好阶级斗争的主课，把反修防修的课题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许多正在搞设计工作的教师提出倡议：打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界限，设计人员下工厂、工地劳动，吸收工人参加设计工作。工程物理系土建设计室的教师主动到土建队的工人当中去，经过党委批准，把两个单位合并为一个。这个系还有二十多名教师，担任了直流锅炉的设计工作，他们要求到锅炉厂去搞设计，并且立即行动起来，利用元旦的休息时间，轮流到锅炉房去劳动。

清华大学有一百八十多名教授、副教授，大辩论也给他们的思想带来很大的变化，使他们感到改造世界观、反修防修的迫切性。

（三）

革命的大辩论，以阶级斗争为纲，促进了全校的安定团结，推动了教育革命和各项工作的发展。

毛主席指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清华大学的事实正是这样。前一段时间，右倾翻案的奇谈怪论制造了思想混乱，那种状况如不及时改变，势必造成分裂，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经过这场大辩论，路线是非分清楚了，人们的思想统一了。几个月前产生过思想分歧的同志，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战斗。他们说："我们又在同一战壕里战斗了。"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革命大辩论，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好各项工作，看作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实际行动。群众的革命热情，造成了各项工作热气腾腾的局面。

清华大学这场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支持。连日来，大批热情洋溢的信件纷纷寄来。广大工农兵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支持清华的革命斗争，支持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许多大、中、小学的革命师生表示，要在自己工作、学习的岗位上，同清华的战友们一起奋斗，反击这股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

〔附〕　磨不灭的光辉　砍不断的怀念

——新华社记者对姚文元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的控诉

去年一月八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出，神州悲恸，举世哀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怀着无比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缅怀周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学习周总理伟大的革命精神。那些永世难忘的日子，那些感人至深的情景，

至今仍历历在目：天安门广场上，日日夜夜汇集着悼念周总理的人流；千千万万朵白花系满了苍松翠柏，密密层层的花圈陈放在纪念碑周围。多少鬓发苍苍的革命老战士，深深地鞠躬致敬；多少父母叮嘱偎在身边的孩子们，要做老一代革命家的接班人。宽阔的广场，处处浸染着人们的热泪；低垂的红旗，倾诉着人们无尽的哀思。从首都到全国的每一个工厂、农村、营房、机关、学校和院落，在天津、广州、上海、南昌、重庆、延安、南京，在周总理工作、战斗过的每一个地方，在我们共和国的每一个角落，人们都在同心哀悼，同声宣誓，决心把周总理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

然而，在我们的报刊上，在电视、广播中，所有这一切情景都不见了。人民的感情被蹂躏了，人民的意愿被践踏了。是记者没有采写吗？不！那几天，广大新闻工作者和全国人民一样，他们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悲痛，流着眼泪写下了多少悲壮的场景啊！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就是不许发表，不许登报，不许广播！他们利用窃取的权力，千方百计地压制和破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从一月八日到"四人帮"垮台的九个月当中，多少人只能是饮泪吞声地怀念周总理，多少人积压在心头的怒火在燃烧。直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夺回了被"四人帮"篡夺的宣传大权，人民才取得了在报刊、电台上表达自己怀念周总理的自由。

"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早就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恨之入骨。有周总理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他们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搞修正主义；有周总理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团结，他们就不能肆无忌惮地搞分裂；有周总理光明磊落的崇高榜样，就照出了他们搞阴谋诡计的丑恶嘴脸。一句话，周总理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也就是对"四人帮"的无情鞭挞。"四人帮"害怕人民悼念周总理，把人民对周总理的崇敬和怀念视为洪水猛兽，必欲压之、砍之、除之而后快。

一月九日，新华社向姚文元反映了首都新闻单位和许多省、市、自治区报社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怎样组织亿万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发表悼念周总理的文章？姚文元的回答是："悼词尚未发表，现在不组织。悼词发表后是不是组织反应，仍应再请示。"什么"悼词尚未发表"?！这是借口，"不组织"才是要害。根据治丧委员会的规定，全国的悼念活动都是在追悼大会以前举行的。"现在不组织"人民悼念活动的报道，更待何时?！这真是岂有此理！姚文元手中没有真理，但是有权。在他的禁令下，从一月九日到十五日追悼大会以前的六天当中，总共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同周总理遗体告别和举行吊唁的两条消息。这是他们不能不发表的。除此以外，首都和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情况的报道就根本没有了，被"四人帮"控制的《红旗》杂志，竟连讣告、悼词都不刊登。

追悼大会开了以后，又如何呢？新华社不得不"再请示"姚文元。这次他不再藏头露尾了："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好家伙，这是挥向全国人民多么凶狠的一刀，新华社原定十六日要发布的全国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的综合消息，就被他这一刀砍掉了！从此以后，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中国人民怀念中国自己的总理的消息。可是，全世界的报刊，却还在大量地、持续地刊载各国人民深情怀念、高度赞颂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的报道和文章。"四人帮"的刀，砍杀八亿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意志，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多大的屈辱啊！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即使悼念活动的消息已经少得可怜，姚文元仍然嫌多，嫌长，还要大砍大杀；而且报纸登在头版显著地位，也使他火冒三丈。姚文元一月十三日一天当中三次向新华社下达黑令。黑令之一是："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

道挤掉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一向破坏生产，到处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反对大干社会主义。如今姚文元居然大唱起"促生产"的调子来了。这岂不是一大奇闻！然而，说奇也不奇，原来姚文元的文章是做在"挤掉"上，他正是要从报纸版面上"挤掉"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报道。

姚文元的黑令之二是："这几天报纸登（外国的）唁电数量多，太集中，并且刊登在第一版上。"他急令各报，把"唁电版面往后放，从三版四版开始"，而且不准用大字号标题。与此同时，姚文元还强令新华社削减世界各国吊唁活动的消息，把原来每个国家发一条吊唁消息的计划压缩成把一个洲的许多国家的吊唁活动综合发一条消息。至于各国人民的悼念活动，各国报刊、电台发表的赞颂周总理的文章，更是一个字也不许发。这样，姚文元的砍刀就不仅砍向八亿中国人民，而且也砍向全世界怀念和敬仰周总理的革命人民。

姚文元的黑令之三是："采写吊唁消息时，要有工农兵学商几方面化悲痛为力量的内容，如学生化悲痛为力量反击右倾翻案风，在消息中要反映出来。"姚文元哪里是要什么化悲痛为力量，他明明是要把人民群众的悲痛"化"掉。"化"到哪里去呢？就是"化"到他们那一套批"右倾翻案风"的方向上去，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就是姚文元的罪恶用心之所在。事实上，姚文元这条诡计早已经布置给清华大学的那两个黑干将了。清华大学《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黑文章早已炮制出来了。一月十四日，也就是追悼大会的前一天，《人民日报》根据姚文元的指令，突然在头版头条的地位登出了这篇长达五千字的黑文，新华社也根据他的指令发向全国。这篇黑文劈头第一句就胡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这不明明是强奸民意，蹂躏民心党心吗？文章发出：群情激怒。有些读者气得把这页报纸撕个粉碎。读者撕得对啊！该撕！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撕无产阶级自己的报纸，这是中国自有无产阶级党报以来从没有过的事，这是人民对党内资产阶级夺走党报大权的愤怒抗争！许多读者纷纷打电话质问："当前全国人民注视的、关心的大事是周总理逝世、是悼念周总理，怎能说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的大辩论呢？""为什么不宣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为什么不宣传周总理的丰功伟绩？登这篇文章究竟安的是什么心？"读者质问得好啊！这一问击中了"四人帮"的要害。他们的要害，就是要用这篇黑文压住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事实上，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早就向首都新闻单位扬言："要发一个压得住的东西"。而这个"压得住的东西"，指的就是《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这篇黑文。

姚文元不仅下令新闻单位要"压住"、"挤掉"悼念周总理的报道，而且他自己亲自动手砍杀。他最凶狠的一刀，是砍在新华社一月十一日所发的首都人民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这篇报道上的。这篇报道记述了一月十一日首都百万人民扶老携幼，泪洒数十里长街，为周总理灵车送行的情景。我们永远忘记不了这个情景。那天下午，我们总理的遗体要送往八宝山去火化了。灰暗的天空压着沉沉的云层，整个北京城是那样肃穆宁静。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人们伫立在几十里大街的两旁，冒着严寒等候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傍晚，悲壮的哀乐送来了总理的灵车。人民抑制不住悲痛，在寒风中哭泣着，从心底里呼喊着："周总理啊，我们离不开您啊！"总理灵车在泪雨纷纷的行列中缓缓行驶。灵车啊，你停一停，让我们再看一眼周总理亲切慈祥的面容！司机啊，你刹住车，让我们再向总理诉一诉衷肠！夜深了，风紧了，总理的灵车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伫立在数十里长街两旁的人群，依然在默默地等待着，等待归来的灵车。但是，只见灵车回，不见总理归。止不住的滚滚热泪再一次洒满几十里长街……。这是古今中外从没见到过的送灵场景啊！我们含着眼泪写呀，写呀，总想快写出来，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的人民对周总理是多么爱戴，多么崇敬！可是，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竟然

看不到有一句有关送灵场景的描写，在电台的广播中，也听不到一句有关这一场景的声音。人民怒不可遏。我们心如刀绞。是谁，如此心毒？是谁，如此手狠？是万恶的“四人帮”不许我们写出这个场景，是姚文元这只黑手亲自把已经压缩得很短了的这段报道砍了个一干二净、只字不留！对于全国上下同心敬仰、衷心爱戴的周总理，他们就是这样的仇恨，这样恶毒地反对！对于广大人民热爱周总理的感情，他们就是这样害怕，这样肆意地践踏！“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卑劣行径，只能激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恨，化作汹涌奔腾的怒涛，对他们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

姚文元砍杀新华社有关悼念周总理的报道，不过是“四人帮”在治丧期间妄图磨灭周总理伟大形象的罪恶活动的一部分。他们还在图片、电视、新闻纪录电影、出版以及各种杂志、刊物上施展许许多多卑劣伎俩，下了许许多多的罪恶的禁令。凡是违背他们禁令的，就要被打成“反革命”。江苏省《工农兵评论》编辑组写了《敬爱的周总理在梅园新村》这篇文章，“四人帮”就要追查“背景”，把它列为“反革命专案”。《上海少年》月刊发表了有关周总理视察少年宫、关怀祖国下一代的悼念文章，也遭到责难。甚至在新华社向全国发行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刊载了全国各地悼念周总理、回忆周总理伟大历史功勋的材料，也遭到姚文元指责，以至强令停止刊载。

“四人帮”处心积虑地压制有关人民悼念周总理的宣传报道，是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继续。周总理健在，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他们要“清君侧”；周总理逝世后，他的光辉形象，他在人民中留下的巨大影响，仍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此，他们毒液四溅地说：“死了也要批”。这就是这帮恶人狠毒之处，也是他们虚弱之处。

“四人帮”恶毒攻击周总理犹如狂犬吠日，蚍蜉撼树。他们越是猖狂反对周总理，人民就更加热爱周总理，尊敬周总理。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五十多年来，周总理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对敌斗争中所表现的坚定性。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那光明磊落的革命胸怀，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周总理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敬爱的周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一年了。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年啊！今天，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粉碎了“四人帮”，实现了毛主席生前的战略部署。举国欢庆，形势大好，万紫千红都是春！敬爱的周总理，安息吧！您的革命遗志一定要实现。受到“四人帮”压制、不能畅所欲言地怀念周总理的阶级兄弟姐妹们，倾诉吧，把声讨“四人帮”的战鼓擂得更响吧！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更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迎接更加灿烂的明天！

（原载 1977 年 1 月 6 日《人民日报》）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隆重举行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节录）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一月十五日下午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这一天，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场庄严肃穆。会场入口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会场正中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冬青和鲜花。会场四周挂着黑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的花圈放在周恩来同志遗像两侧。

会场里还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领导人是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面。

会场里还摆着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以及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群众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台湾省爱国同胞，以及上海市总工会、广州、南昌、武汉、南京、重庆、西安、延安等市的党委和革委会送的花圈。

参加追悼会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吴德、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

下午三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参加追悼大会的全体同志在哀乐声中肃立默哀。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邓小平同志致悼词后，全体同志向周恩来同志的遗像三鞠躬。

邓颖超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向邓颖超同志致以亲切的慰问。

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

几天以来，全国亿万人民怀着巨大的悲痛哀悼敬爱的周总理。在祖国广大的城市，辽阔的农村，遥远的边疆，在战士的哨所和营房，在行进的列车上，在航行于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的远洋货轮上，坚守在自己工作岗位上的我国各族人民，通过各种形式悼念周总理，寄托自己的哀思。他们说，总理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总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总理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好地完成党的各项任务，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参加当天追悼会的还有：

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丁国钰、马宁、于桑、于会泳、王诤、王宏坤、巴桑、方毅、孔照年、冯铉、田维新、刘伟、刘湘屏、刘锡昌、朱穆之、庄则栋、乔冠华、陈康、陈士榘、陈奇涵、陈慕华、李达、李强、李大章、苏静、张才千、张达志、张池明、张宗逊、张维民、张翼翔、肖劲光、周宏宝、林丽韫、罗青长、金祖敏、祝家耀、耿飚、钱之光、钱正英、郭玉峰、秦基伟、陶鲁笳、姬鹏飞、黄镇、尉凤英、曹里怀、曹轶欧、粟裕、傅传作、彭绍辉、谢静宜、蔡啸、廖承志、马明、马小六、王六生、叶飞、央宗、石少华、刘西尧、向仲华、朱光亚、肖克、吴忠、杨贵、杨坡兰、杨俊生、杨富珍、张令彬、张世忠、张国权、张积慧、宋时轮、胡炜、姚依林、唐亮、唐闻生、钱学森、高淑兰、诸惠芬、康林、黄文明、黄作珍、谢振华、裴周玉；

人大常委会委员马成杰、马纯古、王观澜、王冶秋、王淦昌、王道义、邓初民、区棠亮、贝时璋、史良、白寿彝、刘大年、刘斐、朱蕴山、华罗庚、庄希泉、严济慈、杨东莼、杨佩莲、吴有训、吴冷西、吴德峰、沙千里、沙马力汗、陈玉娘、陈此生、陈逸松、李延禄、李聚奎、张文裕、武新宇、茅以升、林巧稚、罗叔章、季方、赵忠尧、赵俊祯、荣毅仁、胡子昂、胡绳、胡愈之、殷诚忠、郭映福、浩亮、康克清、梁吉泉、董加耕、董其武、傅玉芳、傅秋涛、童第周、曾生、曾志、解力夫；

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子纲、王芸生、王学文、王雪莹、王维纲、王照华、孙起孟、孙晓村、汪金祥、苏子蘅、李国伟、李昌、李淑英、杨奇清、何长工、张子意、张孝骞、陈维稷、林修德、金如柏、周士观、周士第、周培源、屈武、赵朴初、赵宗燠、胡克实、俞大绂、钟惠澜、贺诚、闻家驷、郭化若、唐天际、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章蕴、萨空了、曹菊如、曾宪植、楚图南、赖际发、谭冠三；

中共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张耀祠、毛维忠、龙许、赖奎、曹全夫、宇光、刘剑、陈健、肖光、李树槐、张振良、李鉴、薛应钧、王常柏、郑屏年、屈清华、陈焕彬、李步新、张长庚、孙中范、赵振东、张香山、申健、李一氓、张上明、毛宝忠、朱达成、王箴西、熊向晖、李力殷、杨耀南、王涛江、刘志汉、于洪葆、刘友法、李金德、童小鹏、武葆华、郑长安、成仿吾、鲁瑛、潘非、肖泽曜、胡绩伟、肖木、杨列慎、安岗、刘治平、郭渭、孙鸿志、王家洲、张玉兰、张潮、许健生、林兆木、余征、孟兵山、缪海棱、穆青、李剑秋、赵棣生、李琴、郭全有、莫艾、师海云、马沛文、汪波清、张常海、张文才、邓岗、张振东、王寿仁、董林、顾文化、李哲夫、毛德厚、嵇书佩、章壮沂、金照、王惠德、叶直新、张仲实、金丰、李春明、陈相文、李宝光、胡乔木、贾步彬、李鑫、周启才、范化民、杨世荣、苏健、黄庆熙、苏宇涵、沈秉镇；

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曾汉周、何兰阶、韩念龙、仲曦东、王海容、马文波、何英、余湛、杨琪良、王明修、陈德和、林乎加、袁宝华、顾明、邓东哲、顾秀莲、段云、李人俊、赵仁生、陆江、韩光、宋养初、刘让腾、彭敏、李人林、谢北一、张百发、任朴斋、陈祯、李景昭、施义之、严佑民、凌云、张其瑞、林海云、柴树藩、周化民、郑义山、高立兴、石林、李克、魏玉明、程飞、张韵之、陈茂、王伏林、曹言行、沙风、杨立功、梁昌武、肖鹏、郝中士、罗玉川、温仲由、张振秀、陈绍昆、唐克、叶志强、钱传钧、林泽生、张振江、赵岚、严尚林、周子健、徐斌洲、马仪、郭力、孙友余、杨铿、纪兆全、刘昂、李本海、张爱莲、江泽民、牛书申、沈文章、李际泰、张孔修、肖友明、段子俊、赵绍昌、范英、彭尚有、齐一丁、刘寅、高峻、王殿甫、张海东、李成芳、肖剑光、杨殿奎、李玉堂、王立、王川、唐仲文、吴学、边疆、阎济民、刘放、张有萱、罗坦、李登嵩、王谊、潘月英、徐国庆、汪洋、强晓初、王星、陆平、程连昌、张怀忠、张凡、张钧、任新民、彭官娣、谷广善、徐今强、肖寒、钟子云、邹桐、贾慧生、许在廉、康世恩、宋振明、孙敬文、张珍、焦力人、孙晓风、李艺林、张文彬、李国才、陶涛、杨义邦、刘祺瑞、李法兰、杜星垣、张彬、李锡铭、郑代雨、姚成庆、刘向三、张季农、林一山、曹鲁、李学实、谢鑫鹤、夏之栩、焦善民、王毅之、朱致平、黄小珊、韩锡贞、应章元、万里、刘建章、郭鲁、邓存伦、苏杰、李新、于眉、彭德清、潘琪、马耀骥、陶琦、钟夫翔、申光、朱春和、李玉奎、刘澄清、彭洪志、罗淑珍、韩国忠、杨杰、白潄新、王乐亭、张劲夫、陈希愈、王丙乾、乔培新、姚进、杨普文、宋桂兰、范子瑜、高修、赵发生、张永励、任泉生、王化民、乔淑华、林永清、刘庆棠、周荣鑫、迟群、李琦、刘皑风、姚力、钱信忠、黄树则、张之强、粟秀真、黄文、魏福凯、王桂珍、林佳楣、赵正洪、尹忠尉、田文惠、李青川、路金栋、李梦华、倪志钦、尹锡南、范叔援、宋中、黄中、胡耀邦、王光伟、武衡、王建中、王屏、刘华清、柳忠阳、党文林、肖剑秋、倪弄畔、钱三强、陈国栋、牛荫冠、郭世荣、程宏毅、李其凡、耿守瑞、马敬夫、喻福高、阎颖、董振山、方强、邹家华、叶正大、郑汉涛、周一萍、李如洪、乔治、刘正栋、张炯、怀国模、李长伐、刘思立、吴庆彤、李梦夫、刘毅、朱礼泉、孙岳、高富有、刘冰清、王守贤、卓琳、贾鲁峰、焦素芬、熊复、于光远、邓力群、刘仰峤、宋一平、沈竹、吴仲超、杨振亚、刘季平、刘存信、李世安、沈振东、李长如、石西民、徐光霄、赵承丰、孙大光、李轩、李开信、刘炳华、康永和、白向银、孙洪敏、王大钧、鲁突、饶兴、张乃召、刘英勇、苏展、岳志坚、刘达、刘秉彦、刘星、王之义、侯春怀、肖彭、王炳南、丁雪松、王耀庭、肖方洲、叶籁士、吕东；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杨成武、王尚荣、何正文、伍修权、梁必业、徐立清、傅钟、黄玉昆、张震、张元培、李元、封永顺、张汝光、孙洪珍、曹思明、李真、白相国、罗瑞卿、谭政、陈再道、王建安、饶正锡、张贤约、李耀、李雪三、喻缦云、阎捷三、张爱萍、陈彬、李光军、张震寰、马捷、胥光义、肖向荣、栗在山、朱卿云、罗元发、张贻祥、彭方复、刘道生、周仁杰、周希汉、马忠全、梅嘉生、王万林、高振家、杜义德、卢仁灿、王昕、杨国宇、潘焱、曾克林、郑国仲、张汉丞、彭林、张廷发、余立金、成钧、邹炎、吴富善、何延一、旷伏兆、高厚良、黄立清、王定烈、刘世昌、邝任农、薛少卿、周彪、宋承志、高存信、孔从洲、苏进、吴信泉、欧阳毅、钟辉、谢良、李元明、廖鼎祥、匡裕民、李信、丁本淳、陈锐霆、向守志、陈鹤桥、廖成美、符先辉、严家安、李懋之、刘友光、于敬山、王宗槐、贺进恒、刘立封、查国祯、黄新廷、莫文骅、贺晋年、程世才、宋庆生、林彬、赵杰、姚国民、杨昆

山、于丁、严振衡、邱相田、张文舟、顿星云、黄祖华、孙三、谭善和、武宏、唐凯、廖述云、刘月生、严庆堤、徐光友、李恩宝、江民风、胡奇才、王耀南、曾旭清、吴克华、吕正操、兰庭辉、郭维城、何辉燕、别祖后、卢谦斋、訾修林、郭延林、李际祥、龙桂林、徐诚之、崔田民、刘金轩、肖春先、王贵德、肖华、高锐、贺光华、高体乾、韩双亭、王新亭、阎揆要、王蕴瑞、陈漫远、段苏权、陶汉章、李夫克、阳霞、孙泊、谢明、聂济峰、何德庆、林谦、鲍奇辰、傅崇碧、刘海清、肖选进、黄振棠、吴岱、迟浩田、徐信、吴先恩、肖文玖、杜文达、徐深吉、张南生、陈祥、李钟奇、杨森、曾绍东、李刚、潘永堤、邱巍高、邹平光、王以智、陈杰、刘福、钟辉琨、杨昆、谭旌樵、孔原、杨银声、戴镜元、彭富九、陈福初、钱江、彭清云、姜钟、王永浚、冯维精、范理、曹振志、江文、叶运高、黎东汉、龙振彪、周涌、陈挽澜、崔伦、黄萍、颜吉连、屈培壅、范阳春、吴钊统、王善甫、金治、李炎、曹宇光、杜屏、张乃更、李伟、丁莱夫、黄有凤、宋登华、柴成文、孟平、梁锡昌、杨杰、王迪康、张伯祥、梁济民、李曼村、史进前、陈亚丁、杨斯德、李平、华楠、杜越凯、薛真、曹广化、李贞、魏传统、刘白羽、袁光、颜青云、殷承祯、李其华、崔怀之、成学俞、董志常、沈润生；

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刘绍文、王磊、杨寿山、刘传新、贾汀、徐运北、赵鹏飞；

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江苏省委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的代表谭启龙、陈伟达、蒋宝娣、彭冲、许家屯、赵桂香。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工农兵及各界代表白树茂、邬纪秀、陈景泰、陈福汉、莫荣柏、王凤云、王玉茹、宗化背、陈起念、罗玉凤、赵璧辉、于洪杰、马桂堂、常润存、陈净、傅焕芝、崔素琴、陈建平、高杏娣、李国亮、王殿华、胡秀亭、成大明、邓汝芝、黄卫东、周秀良、张凤信、李俊林、张才文、王焕文、王学礼、康仲芳、万其祥、张洪顺、丁建基、李宝志、韩双林、邓忠田、白淑敏、李廷文、张秉贵、朱殿华、曹树梅、杜宝荣、韩秀兰、刘秋萍、李登志、赵清水、孔秀英、吕跃全、陈永祥、殷维臣、邢春华、韩兴连、刘巩、李金、王亚兰、朱宗义、王德修、赵志玺、郭丽云、余量、王成奎、阎保江、赵文臣、彭德生、李俊国、张连泽、王淑芝、张和、张秀兰、王丽荣、徐贵一、王明如、张炳义、张旺、兰秀成、王俊娥、王仕斌、白建军、董文杰、沈运全、潘桂荣、李代相、张越男、丁志辉、李兰丁、宋福萱、肖德万、钟少珍、刘玉堤、陈辉亭、沈志宏、赵占国、张桥松、王传喜、姚珍、阎发仓、沈荣国、岳忠义、苏德茂、李建社、郑定富、贾吉祥、陈伯悦、汪增辉、李敏、柳惠敏、王前、陈虹、范荣康、黄振中、杜秀威、吕相友、王文卿、于民生、许兆焕、王士英、李华、周海婴、曹禺、钱伟长、冯友兰、谢冰心、叶圣陶、顾颉刚、魏建功、尹赞勋、张[illegible]、赵炳南、吕淑湘、张含英、王历耕、韦悫、许杰、陆达、刘大铮、吴纪、何广乾、周光召、彭士录、杨秀乾、沈季良、冯寅、何诚志、侯祥麟、魏鸣一、张万福、屠守锷、陈怀瑾、王希季、张文治、茅以新、姚永炀、谷德振、顾滨源、陈景润、何其芳、丁声树、袁水拍、袁世海、薛菁华、杨春霞、崔嵬、张均、郭兰英、古元、马可、李德伦、钱筱璋、董守义、钟师统、张燮林、林慧卿、潘多、戴伯韬、楼史进、德吉、王益、王璟、李季、陈信、柳枝英、黄翠芬、陈芳允、胡兰、董寿莘、王庆云、挥仁祥、温宗嫄、陈其通、石磊、胡德风、王淑慧、马玉涛、王苹、曾挺、李莉、马法冉、高帆、张凤瑞、胡健、魏银秋、史树芬、王强、郑麟蕃、王德功、张致一、洪雪端、宋金兰、黄帅、浩然、梁厚民、杜金玺、张颖杰、阎田玉、

吴浮山、张立华、樊亢、贾书田、王苗；

爱国人士陈丁茂、庄明理、浦洁修、胡子婴、田富达、韩权华、刘芸生、查夷平、华凤翔、张志让、阿沛·才旦卓噶、钱昌照、王昆仑、侯镜如、王葆真、李平衡、李俊龙、覃异之、张学铭、章元善、孙承佩、王克俊、宋希濂、杜聿明、郑洞国、翁独健、赵君迈、吴羹梅、葛志成、冯和法、经叔平、费孝通、沈谦、李纯青、周嘉彬、米暂沉、董竹君、黄鼎臣、曹谷冰、秦德君、陈建晨、甘祠森、刘仲容、李文宜、严信民、程思远、沈兹九、杨扶青、谷春帆、郭翼青、洪希厚、罗西欧、黄晚霞、郭秀仪、傅学文、沈性元、赵子立、溥杰、黄维、陈修和、李奇中、李一平、余湛邦、叶道英、章友江、方荣欣、张可曾、张知行、谭惕吾、张伯驹、丁佑曾、章可；

医务工作人员吴阶平、卞志强、张佐良、吴蔚然、方圻、吴德诚、陶寿淇、陈在嘉、熊汝成、虞颂庭、于惠元、高辉远、黄宛、王星明、孙茜英、万九云、李玉良、谢荣、尚德延、曹锐章、姜培芳、董方中、潘铨、曾宪九、陆惟善、陈士葆、许奉生、马正中、陈康年、王斌、胡懋华、陈敏章、吴咸中、叶朗清、柳纯安、张心莉、潘屏南、李冰、吴桓兴、谷铣之、邵美珍、韩宗琦、林钧才、秦月兰、秦秀兰，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张树迎、钱嘉东、高振普、赵炜。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李卓然、李质忠、邓典桃、宋任穷、欧阳钦、程子华、丹彤、郭述申、杨士杰、何连芝、陈琮英、马文端、齐燕铭、许涤新、薛暮桥、郭洪涛、吴亮平、曾涌泉、陈忠经、陈志方、贾石、卢绪章、江一真、姜齐贤、何基澧、张克侠、朱涤新、王士光、王化云、曾传六、贺彪、马海德、张稼夫，高登榜、马仁辉、杨秀峰、于立群、连贯、于文兰、彭明治、张天云、李寿轩、李天焕、钟期光、汪荣华、林月琴、薛明、孙毅、陈昊苏。

(新华社 1976 年 1 月 15 日讯，载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

邓小平副主席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掉了我们的总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

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

周恩来同志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一九一九年，他积极参加五四

运动，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二O年到一九二四年，他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对推翻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一九二六年冬，他到上海党中央工作，接着，担任中共江浙区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九二七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挽救革命，周恩来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在起义中他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还在上海坚持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担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等职务。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他继续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党中央的代表和南方局书记，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我党组织的工作。他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一九四五年八月，他跟随毛主席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他继续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重庆和南京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周恩来同志从南京回到延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阶段，周恩来同志从建国以来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担任过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他还被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同志从党的五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一九二七年“八七”中央会议上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从党的六大以后，被选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九届和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党的八届、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

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他衷心爱戴和崇敬伟大领袖毛主席，坚决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反修防修，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的、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

我们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不论白色恐怖多么残酷，武装斗争多么激烈，同敌人面对面的谈判多么尖锐，他总是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他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他广泛地密切联系群众，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他坚决贯彻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满腔热情地支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

我们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学习他坚持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反对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

我们要学习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他在病中不断地研究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就是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时候，他还一再聆听今年元旦发表的毛主席的两首光辉诗篇。这充分表现了他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76 年 1 月 15 日讯，载 1 月 16 日《人民日报》）

毛主席批示：同意。　　　　　　　　　　二月二日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

经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

〔附〕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张　春　桥

又是一个一号文件。

去年发了一个一号文件。

真是得志更猖狂。

来得快，来得凶，垮得也快。

错误路线总是行不通的。可以得意于一时，似乎天下就是他的了，要开始一个什么新“时代”了。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

人民是决定性的因素。

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就是胜利。反之，必然失败。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节录）

——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

（一九七六年二月六日）

当前教育界、科技界开展的革命大辩论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今年的头一个月，清华

大学的干部和群众以丰富的斗争成果告诉我们，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我们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毛主席的两首词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的发展，极大地鼓舞了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员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革命斗志，进一步提高了他们对这场斗争实质的认识。他们回顾了这场大辩论的进程：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跳出了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攻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当前阶级斗争的动向，及时抓住战机，亲自发动了这场革命大辩论。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大干部和群众对修正主义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随后，他们又对整个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斗争中揭露的大量事实越来越充分地说明，这场斗争不是孤立的，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教育界、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突出表现。在学习毛主席词二首和元旦社论中，许多同志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在同一时间里，教育、科技等战线为什么都有那么极少数几个人跳出来刮右倾翻案风？他们为什么那样疯狂，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为什么敢于如此放手大干，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为什么那样有恃无恐，把希望寄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复辟势力上？这股右倾翻案风是从哪里刮起来的？

在这些问题的面前，清华大学党委引导广大师生员工，把教育界的修正主义奇谈怪论跟社会上出现的怪现象联系起来，把现实斗争同马克思主义反对机会主义的历史加以比较。答案很清楚，这场斗争不只是教育质量高低的争论，不只是怎样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争论，不只是几个单位的领导权问题。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猖狂地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他们这也要"扭"，那也要"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从而扭转我们整个国家的马列主义方向和社会主义道路，改变我们整个国家的颜色。工农兵学员说得好："右倾翻案风得逞，就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不但我们要被赶出校门，千百万阶级兄弟还要人头落地。"

清华大学党委组织广大师生员工，重温了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以来的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作了阶级分析。在大辩论开始的时候，清华大学就贴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把斗争的重点放在整党内一小撮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上。随着大辩论的进一步深入，阶级阵线越来越清楚了。刮右倾翻案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主要就是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被揭发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有的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就翻案，有的根本就没有认过输。他们中间，有的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有的在民主革命时期是积极的，到了社会主义时期，却处处跟无产阶级对抗。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步步深入，我们必须掌握阶级关系的变化。有的人过去是党的同路人，但从来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世界观是个资产阶级的王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越来越深入的今天，他们站在敌对阶级一边去了，也就是说，站到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他们一上台，就顽固地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愿望，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就是这样无情地告诉我们：走资派还在走，投降派确实有。这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那些坚持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通过这样的分析、研究，广大干部、群众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

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最危险的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清华大学党委掌握了运动发展的趋势，迅速作了大辩论深入开展的部署。各级党委成员深入到班组中去，把基层党支部建设成为同资产阶级斗，同修正主义斗的坚强堡垒，以班组为基点开展大学习、大批判，既加强了党对运动的领导，又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广大干部、群众，同仇敌忾，在前一段大辩论的基础上，紧紧抓住右倾翻案风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实质，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其他方面的修正主义谬论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的、深入的大批判。

《人民日报》记者

(原载 1976 年 2 月 6 日《人民日报》)

孔 丘 之 忧 (节录)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

高 路

孔丘之忧，还另有奥妙。你看他忧这忧那，多象“忧国忧民”！这“不修”，那“不讲”，岂非“今不如昔”？以后的孔孟之徒，不少人就在“忧”字上大做文章。他们一方面袭用“忧国忧民”的老谱，装成人民的代言人和救世主，似乎比谁都关心国计民生和道德文化，实际却同孔丘一样，他们的“忧国忧民”，完全为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地地道道的“祸国殃民”！另一方面，他们散布“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观论调和“杞国无事忧天倾”一类的无穷忧虑，妄图使人们对新生事物发生怀疑，对革命大好形势和光明前途丧失信心。这种瓦解士气的“忧”杀，往往比血淋淋的刀杀更为阴险毒辣。

鲁迅曾经尖锐批判了那些宣传中国文坛“悲观论”的“特别善于下泪”的人物。他深刻指出：“历史决不倒退，文坛是无须悲观的。悲观的由来，是在置身事外不辨是非，而偏要关心于文坛，或者竟是自己坐在没落的营盘里。”今天，我们把这段话移赠给那些大刮右倾翻案风，鼓吹教育“危机”论的人们，岂不更为合适！

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我们伟大的祖国“**到处莺歌燕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正在胜利前进！

(原载 1976 年 2 月 13 日《光明日报》)

要 继 续 批 孔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三日）

李　成

当前，在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上，一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大搏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它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把教育界、科技界以及社会上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就不难看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推行的是一条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这条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之点是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的新生事物，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一句话，他们又要"克已复礼"，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孔孟之道是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根源。孔孟之道是复辟之道。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包括妄图灭亡中国的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从孔孟之道那里寻找毒害人民、破坏革命的思想武器。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刘少奇、林彪，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都乞灵于孔孟之道。在我国，从第一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没落以来阶级斗争的历史反复证明，凡是搞复辟倒退的，搞投降卖国的，搞修正主义的，都要鼓吹孔孟之道，都是尊孔派。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搞复辟倒退，搞反攻倒算，同样要效法孔老二，取儒家之经，学孔孟之道。

孔老二在奴隶制度日趋崩溃的时候提出："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说：他要复兴被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恢复奴隶主贵族丧失了的统治权力，让那些已经没落的奴隶主贵族重新出来当政。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正是在干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事业。他们一上台，就否定和修改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翻已被党的九大、十大肯定了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在用人问题上，不讲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不讲老、中、青三结合，不问这个人的政治历史状况如何，不问这个人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如何，统统搜罗起来。他们妄图"兴灭继绝"的正是刘少奇、林彪相继推行，并且接连破产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他们原来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孔老二对于从奴隶制到封建制的社会大变革时代出现的"礼崩乐坏"的局面，皇皇不可终日。甚至连喝酒的杯子不象老祖宗的时候那样制出棱角，也要惊呼：酒杯，酒杯，不象酒杯了呀！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也总是看着不顺眼，想着不顺心，总认为：学校，学校，不象学校了啊！现今的科研单位，那里象个科研单位的样子呢！他们同孔老二念念不忘"克已复礼"一样，日日夜夜妄想恢复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旧事物。

"学而优则仕"，集中地概括了孔老二为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教育思想。千百年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都把"学而优则仕"奉为千古不变的信条。刘少奇、林彪鼓吹的"读书做官

论”是孔孟之道的“学而优则仕”的翻版。教育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为了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为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培养“人才”、又拣起了“学而优则仕”这个孔家店的破烂货。什么“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啦，什么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啦，等等，说穿了，就是把大学当作猎取高官厚禄的敲门砖，当作爬上精神贵族楼阁的阶梯，想要引诱青年跟他们走进复辟倒退的死胡同。一句话，他们要把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大学变成封建王朝的“大学”，变成资产阶级培养奴才的“最高学府”。

科技界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反对在科技战线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对科技工作的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反对专业科技人员同工农相结合，反对开门办科研。他们故意歪曲党的政策，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说在科技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什么把知识分子“变成专政的对象了”。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必改造世界观，说“许多政治工作、思想工作是妨碍科研、破坏科研”；他们鼓吹早已被革命群众批判过的由业务上的“专家”“权威”领导科研单位的制度，并且公然用孔老二的话说，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在他们看来，工农兵是大老粗，“文化水平太低”，不配搞科研，妄图把广大群众摒弃在科研大门之外。至于工人阶级派出代表参加科研单位的领导工作，那就更为他们所不容了。他们所说所做的这一套，同孔孟宣扬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究竟有什么两样呢？

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们从保护没落反动阶级的切身利益出发，反对新兴阶级对没落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新生力量取代反动力量的社会变革，便百般地鼓吹“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的中庸之道。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顽固地反对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反对以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代替资产阶级腐朽事物，因此也用折中主义的诡辩论、叫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的陈旧货色。他们象林彪一样挥舞“中庸之道……合理”的大棒，“大胆反对”所谓“极左”，实际上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革命的群众运动。正象孔老二一样，无非是用“中庸”的面纱掩盖向革命群众反扑的狰狞嘴脸。

列宁指出：**“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〇七页）为复辟奴隶制奔走呼号的孔老二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孔孟之道一整套反动思想并没有自行消失，而且至今仍然在继续腐蚀、毒害人们的灵魂，仍然被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用来搞复辟倒退。要在思想根源上把刮右倾翻案风的人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必须继续批孔。

（原载 1976 年 2 月 13 日《人民日报》）

再 论 孔 丘 其 人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在春秋末期社会大变革中，作为反动腐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和政治代表孔丘，不

仅是一个顽固的守旧复古派，而且一旦得到权势，还是一个十足的翻案复辟狂。他曾在一个不太长的期间在鲁国当过大官。虽然掌权时间不长，却疯狂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新兴地主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充分表现出他把没落奴隶主的复辟希望变为复辟行动的反动本质。孔丘这一套，为后世一切搞复辟倒退的人所效法。在去年夏季前后那股右倾翻案风中，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孔丘的幽灵还在游荡吗？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其所作所为，与孔老二的行径何其相似乃尔！

孔丘生活的时代，奴隶制度已经腐朽，奴隶起义、平民暴动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夺权斗争此伏彼起，奴隶主贵族的统治风雨飘摇，处于全面瓦解的过程中，封建制取代奴隶制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孔丘上台之际，鲁国革命形势蓬勃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们分占奴隶主头子鲁国国君的土地和奴隶，发展了封建生产关系，掌握了国家大部分权力。“三桓”敢于蔑视奴隶主的权威，把维护奴隶制的周礼踩在脚下。革新派代表人物少正卯办起了教育，宣传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思想，批判腐朽的奴隶制度，影响很大，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总之，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革命潮流势不可当，把腐朽的奴隶制度冲击得七零八落，四分五裂。

孔丘顽固地站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立场，对这场社会大变革恨得咬牙切齿。他把一切腐朽的旧事物视为至宝，一丁点也不准改动；他对一切新生事物，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百般挑剔，横加指责。新兴地主阶级革除了奴隶社会野蛮残酷的人殉制度，他咒骂革新者断子绝孙。你要把“三年之丧”改为一年吗？他说这可改不得。你要去掉每月初一祭祖庙用的活羊吗？他说那可动不得。甚至连一只酒杯在形体上有了一点改变，他也暴跳如雷。对于代表奴隶制度的陈旧的东西，他沉迷留恋，如醉如痴。在齐国宫廷里听到古老的《韶》乐，竟然“三月不知肉味”。他主张用夏朝的历法，坐殷朝的车子，戴周朝的礼帽，听歌颂舜的《韶》乐和歌颂周武王的《舞》乐。“率由旧章”，这就是他的方针。“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把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发展比较早的齐国，变成新兴地主阶级势力正在发展中的鲁国的样子；再把鲁国改回到“先王之道”的西周奴隶制），这就是他梦寐以求的政治“模式图”。他曾经明确地对子路说：“如果有人用着我，我就在东方把奴隶制恢复起来。”他还宣称：“我一年便可以搞出个样子来，三年就一定有成就。”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孔丘一上台，就心急火燎地着手改变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路线。他凭借窃踞的地位，利用各种场合，大造“天下无道”的舆论。在他眼里，鲁国的社会变革简直是一场灾难，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圣人”、“善人”已不再能见到[1]，就连古人的“狂”“矜”“愚”这些缺点也比今人好[2]。你看，什么都搞乱了，不象个样子，一团糟，政权竟落在新兴势力的大夫手里，老百姓也要议论朝政，“礼坏乐崩”，气得孔丘又是摇头，又是跺脚，狂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有一次，他问刚从季氏那里回来的冉求：“为啥回来这么晚？”冉求说：“处理政事。”孔丘轻蔑地说：“普通事务罢咧。”他压根不承认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是“政”事。按照他的复辟经，“政者正也”，季氏政权必须“正”到奴隶制的轨道上去。他一旦当上“大官”，就大张旗鼓地“正名”了，也就是要把社会历史从发展变革的趋势中扭回去，实现他“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他横下一条心，大胆干，拚命干，说复旧就复旧，就是

1 《论语·述而》：“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2 《论语·阳货》：“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荡；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而已矣。”

要开倒车，就是要"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嘛！

孔丘的"正名"，就是向新生事物和新兴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是颇带一些血腥气的。新生事物是在社会大变革中涌现的，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它的成长和发展，宣判了旧事物的死刑。因此，拚死保护旧事物的孔丘就要"纠之以猛"。他对新生事物的摧残、扼杀，可谓大刀阔斧，无所顾忌。按照周礼的规定，大夫"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就是说大夫不能有军队，不能有周围达三百丈的城。可是，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三桓"无视周礼，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建立了各自的都城——费、郈、成。三都的建立，表明新兴地主阶级力量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壮大，是对奴隶主头子鲁君的严重威胁。这还了得，非削平不可！孔丘派子路打入季氏内部相策应，并亲自调兵，先后平掉了郈都、费都。只是由于孟孙氏的坚决反抗以及季孙氏、叔孙氏对孟孙氏的积极支援，使他损兵折将，才没有平掉成都。

对于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孔丘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一棍子打死而后快。子贡问他："您看现在的执政者怎么样？"他摆出十足的贵族老爷的架势，牙缝里嘘了一声说："那伙卑微低贱的小人，算什么玩艺儿！"[1] 看，孔丘对登上政治舞台的新兴势力，怀着多么深刻的仇恨！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朝气勃勃的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孔丘眼里，既没有奴隶主贵族那样的身分，又没有什么知识和修养，怎么能让他们执掌政事呢？不把他们打下去，就不能随心所欲地推行复辟倒退的路线。他上台不久，就残酷地杀害了少正卯。少正卯不但在教育上同孔丘对着干，是一个进步理论的宣传家，而且作为鲁国的"乱政"大夫，又是一个新兴地主阶级政治革新的参与者。孔丘杀害少正卯是蓄谋已久的。他大权在握，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就给少正卯加上五条罪名。少正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坚持革新路线，批判奴隶制度，宣传进步理论，这些都成了十恶不赦的罪状。孔丘把他杀害之后，还暴尸示众三日。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对新兴地主阶级血腥的阶级报复。孔丘对付新兴力量，绝不讲什么"温、良、恭、俭、让"，他杀气腾腾，一不做，二不休，确有那么一股"猛"劲。直到他四处碰壁，倒床奄奄一息的时候，听说齐国新兴地主阶级代表陈恒夺取了政权，他还挣扎着爬起来，请求鲁国国君派兵去镇压。这说明，复辟势力上台，革命者就必然要人头落地。反动的阶级与革命的阶级、复辟倒退的路线与前进革新的路线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的斗争是何等的尖锐激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孔丘的"正名"，也就是搞翻案、"举逸民"。他急不可待地把那些没落奴隶主贵族扶植起来，拼凑起一个复辟班子。当初，鲁国没落奴隶主的头号代表人物鲁昭公妄图复辟，向"三桓"反夺权，失败后逃亡，死在晋国。季孙氏认为他罪有应得，把他埋在墓道之南，不让他与祖宗葬在一起；还想给他一个坏的谥号，以便后代子孙知道他的罪恶。孔丘却利用窃取的权力，把鲁昭公的墓迁入祖茔，替他恢复名誉，借助这个奴隶主贵族头子的僵尸为复辟鸣锣开道。孔丘十分懂得，不给那些臭不可闻的复辟派翻案，不对他们作一番洗刷，没落奴隶主阶级就扶不起来，新兴地主阶级就打不下去。所以孔丘一面翻案，就一面大搞"举逸民"。他不断吹嘘自己的门徒：这个大胆果断，那个通情达理，还有那个精通业务[2]，企图让他们去篡夺新兴地主阶级各方面的大权。他安插子路、仲弓等人做季氏家臣，当内探，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仲弓向他请教如何管理政事，他面授机宜，要仲弓特别注意"举贤才"。门徒子游作了武城宰，孔丘首先关注他的也是发现"人才"。的确，为要"举逸民"，孔丘四处

---

[1] 《论语·子路》："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2] 《论语·雍也》："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插手，布置心腹，竭力网罗腐朽没落势力，要做到“故旧不遗”。这些“故旧”，孔丘美其名曰“贤才”。“贤才”者，善于搞复辟的骨干分子也。

孔丘搞复辟翻案活动，是不得人心的。为了掩人耳目，他装出一副关心民生疾苦的姿态，声称要让老百姓生活富裕，年老的获得安适，年少的受到关怀。还提出“使民以时”，不要影响农业生产。俨然一个“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其实，孔丘是一个极端鄙弃和仇视劳动人民的大恶霸，他诬蔑劳动人民是“难养”的“小人”。郑国奴隶主有一次把萑苻起义的奴隶全部屠杀，他听说后连连拍手称快，说是人民侮慢无礼就该狠狠镇压。他陪着鲁定公与齐景公在夹谷会盟，还以违反“周礼”的罪名，亲自指挥杀死了许多歌舞奴隶。这个劳动人民的死对头，怎么会关心、照顾起人民群众来了呢？所谓关心民众、发展生产云云，统统是幌子，其目的无非是给新兴地主阶级政权抹黑：人民生活水平低了，生产上不去了，实在不行了！当时，“三桓”实行一系列以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变革，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连晋国的大夫都称赞他们得到了人们的拥护。对于这些，孔丘一概视而不见，故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他话里话外，把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变革说成是祸国殃民。既然如此，要提高生活，发展生产，就一切恢复老样子吧！如果依了他的主张，那就只能是奴隶制复辟，解放了的生产力又被束缚起来。孔家店的二老板孟轲对孔丘这一绝招是颇得心传的。他提出“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就是说要人们得到好处、过幸福生活，必须从恢复奴隶社会的井田制入手。显而易见，孔丘之流抓生活、抓生产是假，搞复辟、搞倒退是真。

孔丘一掌权就搞复辟，绝不是偶然的。他过去就紧跟鲁国头号复辟派鲁昭公大反新兴地主阶级。鲁昭公失败，他也跟在鲁昭公的屁股后面窜到齐国。孔丘这类反动没落阶级的代表人物，立场不改变，除了复辟，再也搞不出别的名堂来。有时即使来一下赌咒发誓，那也是从不算数的。孔丘在匡城被围，与匡人订了盟约，立下保证，不是一转身就全推翻了吗？他一贯坚持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立场，从来不是象有人说的那样，是什么顺乎时代的潮流，同情人民的解放，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级的前驱者。

孔丘虽然早已完蛋了，但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一切妄图拉着历史车轮倒退的反动没落阶级，都把他奉为“至圣先师”。他那种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性，拚死反攻倒算的疯狂性，玩弄鬼蜮伎俩进行反扑的欺骗性，是古今复辟派所共有的。今天，党内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不正是亦步亦趋地踩着孔老二脚印走的吗？他们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用折中主义的手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的新生事物，就是要沿着孔老二“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老路，开历史倒车，复辟资本主义。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当前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我们必须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孔，充分发挥孔丘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彻底揭露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真面目，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夺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更大胜利。

（原载 1976 年 2 月 24 日《人民日报》）

评“三项指示为纲”（节录）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九日）

梁 效 任 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三项指示为纲”，是党内那个坚持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来的。它的出笼，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

“三项指示为纲”，是直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干什么的？就是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全国亿万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发扬**“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革命精神，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但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极端仇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群众的批判，口头上大表“悔过”之意，实际上心怀复辟之志。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三项指示为纲”，是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直接对抗的。一九七四年底，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毛主席的光辉指示，进一步提高了全国人民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自觉性。这就更加引起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恐惧。他们对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深入进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非常反感。因此，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

这个修正主义纲领，修就修在它完全背叛了我们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指导我们各项工作的纲只能有一个，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即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所决定的。

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谈三项指示“互相联系，不能分割”，“是一个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句”，说得振振有词，似乎很全面，其实是在玩弄折中主义的鬼把戏。他们故意把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这些属于“目”的东西，摆进“纲”里，就是为了以目乱纲，以目代纲。经他们这样一摆，安定和不安定、团结和不团结的矛盾，还有科研落后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矛盾，等等，统统成了主要矛盾。他们就是这样用混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手法，淹没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一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项指示为纲”的炮制者明明是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看不见阶级矛盾了。这完全是欺人之谈。今天，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在，资产阶级还在，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和

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都还在，小生产仍然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些明摆着的事实，难道都看不见了吗？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一次又一次的两条路线斗争，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列宁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矛盾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在这个时期**"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没有阶级斗争？**"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战争的就不会熄灭。"**所谓阶级斗争熄灭论，从来都是骗人的。刘少奇和林彪都讲阶级斗争熄灭，他们自己就根本没有熄灭。刘少奇围剿革命派，保护他那一小撮叛徒、死党。林彪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哪里是什么熄灭？现在，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是为复辟资本主义施放烟幕，掩护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实行反攻倒算。

一个纲领**"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右倾翻案势力就迅速地聚集在这面修正主义旗帜下，大搞复辟活动。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是什么"今不如昔"呀，"问题相当多"呀，"积重难返"呀，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要由他们来扭转局势，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概。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同当年的孔老二一样，公然以复辟派自居，说什么"无非有人讲'还乡团'回来了，复辟了"、"不管它那一套，他说他的。"于是，一股右颂翻案风就刮了起来，越刮越凶。有些人奔走串连，弹冠相庆，或做演说，或拟提纲，或写黑信，或造谣言，教育界、科技界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其矛头对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吗？现在人们明白了："这股右倾翻案风，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从上边刮下来的，是存在着一个"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纲领、存在着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追根溯源，盖出于此。

提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人，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采取了一个很有欺骗性的、容易使人丧失警惕的手法。他们讲的三项指示，看起来都是毛主席的话，但由于纳入了那个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之中，毛主席指示的革命灵魂就完全被阉割了。

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那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善于识破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手法，警惕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花招，防止他们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的阴谋。要执行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 1976 年 2 月 29 日《人民日报》)

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节录）

（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

池　恒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教育、科技、文艺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健康地发展，批判的锋芒，直指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那个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政治思想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又一次大较量。

革命大辩论的深入发展，向人们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有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过别人的命，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总是同革命唱反调，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有的走资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批判之后，发誓"永不翻案"，可是重新工作没多久就大刮右倾翻案风，对文化大革命又是翻案又是算帐，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公然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同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基本路线相对抗？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曾经深刻地指出，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跑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践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却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

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性质、对象、任务都有本质区别的两个革命阶段。前者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它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所以它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的任务，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把革命引向社会主义。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不仅存在于社会上，而且反映到党内。我们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革命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资产阶级，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它的任务是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并在长期的阶级斗争中逐步造成资产阶级既

不能存在又不能产生的条件，最后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还远远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革命转变了，向前发展了，要求人们的思想也要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如果思想还停止在旧阶级，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成为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广大党员、干部没有停顿，而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但是党内有一些人的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想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继续革命了。不前进，就会倒退，不革命，就会搞复辟，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列宁曾经指出："**有些人象小私有者一样看待对资本家的胜利，他们说："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害怕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触动私有制，触动他们所喜欢的资产阶级法权，触动他们要维护的传统观念，触动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表。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同革命的矛盾，同坚持继续革命的工人、贫下中农的矛盾，也就越尖锐。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他们后退了，反对革命了。就是那个作为右倾翻案风"风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曾经反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支持包产到户，鼓吹"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谬论，后来又反对文化大革命，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现在又闹翻案、搞复辟。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实际走过的道路吗？

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斗争都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会搞修正主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从思想体系和阶级根源来看，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和修正主义是一致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工人运动中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派别和思想，它的特征是叛卖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投降。修正主义者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阶级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总是用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从伯恩施坦、考茨基到托洛茨基、布哈林，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林彪，都是这么干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也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以此来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相对抗；并用它来干扰、破坏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运动和评论《水浒》；用它在各个领域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去年在教育、科技、文艺以及其他战线出现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各种奇谈怪论，就是根据"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派生出来的。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必然要搞修正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刮起的右倾翻案风，又一次说明了这一点。

毛主席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是对"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的深刻批判。

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是把革命停止在旧阶段不再前进，还是坚持搞社会主义革命，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也就是说要不要坚持不懈地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的一个根本分歧。社会主义时期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因为他们自己代表资产阶级，都反对革资产阶级的命，特别反对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对文化大革命那么反感？为什么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整"掉，而对文化大革命批判过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货，又那么舍不得，总想把它们恢复过来？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整了党内走资派，革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教育、文艺及其他上层建筑进行了改革。所有这些，同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所顽固坚持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是相对抗的，同他们极力要走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充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人们还清楚地记得，就是那个带头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同刘少奇一起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企图把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并没有能够扭转革命车轮的前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仍然代表资产阶级，用修正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场大革命，把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大好形势看成一团漆黑，总认为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不翻案、不复辟就不舒服。"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这个自白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代表资产阶级搞复辟的反动立场暴露得清清楚楚了。

要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就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对社会主义社会各方面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这也是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人不能接受而要加以反对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什么那样仇视从各个方面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生事物？为什么对批判物质刺激、知识私有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提出种种责难？为什么那样害怕提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并千方百计加以反对？为什么竟然明目张胆地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胡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就是因为他代表资产阶级，他要维护并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并扩大资产阶级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础。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由于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因而同社会主义革命相抵触甚至相反对，这是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内反复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内还会有一些人思想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用资产阶级的立场、世界观看待事物，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由于我们党在过去长时期内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包括加入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中有许多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已经逐步抛弃了资产阶级世界观，接受或树立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但也还有少数人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而又没有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他们的立场、世界观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它的思想也必然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先锋队中某些人，使他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修正

主义者。这些人的世界观总是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出来，要他们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于这种要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社会的企图，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犯有错误的同志，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当前这场斗争中，我们要继续执行这个方针，耐心地帮助犯有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以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顽固地要把车子停下来、向后拉的人，总是会有的，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不正是从这方面在给我们上课吗？但是，他们总是少数，真理不在他们手里，群众不在他们一边。群众要求革命，翻案不得人心。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在全世界实现，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原载《红旗》杂志1976年第3期)

江青在打招呼会议期间擅自召集的十二省、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

同志们好！我看望同志们。我昨天来了，同志们都睡了。我又犯了错误，没有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大楼房子里头太热，所以我不敢也没法去看同志们。我昨天来晚了，正好散会了。我那时还没吃饭，就跟他们一块吃饭，然后去看唐（岐山）师傅，恐怕很多同志都没有看见，也没有机会都能看见。上次五省会议和十二省、市、区会议，我和大家扯了一下。楼上温度高，过堂风很大，很容易感冒，我就不到楼上去看同志们了，到这儿看看同志们。另外，我也想跟同志们讲一点事。

邓小平这种事，恐怕很多同志不知道内幕，当然我知道的也不太多。不过，我是一个首当其冲的人物。他在去年四月底，不请示主席，擅自斗争一个政治局委员，四月底一直斗我到六月。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的谣言散布的很多，据说去年查谣言，有的省查，有的省根本不查，还扩散，一查就查到北京，就查不下去。最近，我们才开了窍门，人家揭发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政治研究室，胡乔木，这是一个坏人。这个政治研究室不仅凌驾在国务院之上，而且邓小平他们耍了一个花招，把原来的毛选委员会干掉了。他把胡乔木这样的人也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了，主席不同意的，不赞成的。这可是一个相当大的谣言店。反正意识形态方面的多了，还有什么科学院啊，多了，你们大家陆续都会知道。我看到一个材料，说文艺也是邓小平授意胡乔木负责，有的问题还未弄出来。有个叫李季的人，怕了，躲到医院去了，他们授意叫他写文章，这是有文件的。印了没有？连《创业》也是他授意，信确确实实是邓小平转的。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伟大，主席并没有看这个电影。《创业》这个题材是我推荐的，拍的粗糙一点，当然也有一些问题。主席的批示无比的英明就在于保护

了我们一系列的电影、戏剧，很多东西，不然都是毒草。人家揭发邓小平看电影《青苗》，看了几本，就说，大毒草。他们就是重视那个《海霞》，而且为了《海霞》，那可是开创我们党的纪录，历史上没有过的，下命令让中南海的放映员去抄文化部的主要负责同志的家，而且下命令让所有政治局委员都要去看《海霞》。我那时正在给主席、给政治局写一个报告，也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我就请假。我说，小平同志，请原谅，我可能赶不上，但我一定看。后来我知道了这个情形，他是什么样呢？把文化部长、中央委员于会咏同志赶到后头去，还把春桥同志也赶到旁边。他和导演谢铁骊、钱江坐到一块儿。这两个人我还是保护他们，他们过去是专门拍毒草片的。后来我拉着他们拍样板戏，失败了三次，有一个戏失败了两次。那时我说，替他们付学费。这个《海霞》有两部底片，最主要的底片还有一出戏。画面片和声带片还没有合成的原始片，就拿去看了。后来丢了，丢了两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丢一本就等于一百万元。我怎么知道呢？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海霞》，那个电影我到现在还记不清楚名字。我去年一整年为了主席，也为了推陈出新，抓词曲、古典唱腔音乐，就是把各种流派的音乐变为曲乐。我正在排曲目录，开会，文化部的人老是很紧张，把我叫到旁边去说，江青同志，不得了啦，丢了两个底片，工作底片丢了就完了。我说，怎么回事啊？他说，不知道，都是中央首长，这个转那个，那个再转那个，就那么丢了。这个事很多同志都有责任，将来在政治局我要讲一讲，因为我知道这个利害关系，不能看双片。我就看拷贝，不看双片，看了就得负责，看了，他就认为你负了责了。看双片，在外国就是有这样的权威。往下剪容易，改就难了。比方说，一块布已经裁成西装了，你能改成中装吗？我是一个比较单薄一点的人，我现在比进城初期胖了一点，裁成我这样身材的衣服，你能穿吗？已经裁成小孩的了，你能改成大人的吗？大概中央的同志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就是要看电影，就那个样子弄来弄去就丢了。我说，报告春桥同志，春桥同志主管文教，后来不晓得怎么找回来了。后来我也调来原始的底片看，画面上已经坏了很多，可见看的那个程度。因为我怕他们销毁那个底片，我说，那不行啊，都得保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情形，命令整个政治局看《海霞》，不只是《海霞》。《海霞》的原始底片统统看，一共二十四本，看多少时间？一小时看六本，四个小时，看那么长时间呀！目的是什么，就是保护《海霞》。你不许说话，那我保留评论权。在这儿，咱们不展开，这是个枝节问题。只有一个外国人，敢于讲话，就是斯诺的夫人。她说，《海霞》不怎么样，冲着它这样讲究服装，讲究布景，讲究美人，不大符合实际情况。在我们全国还没有人敢批，因为政治局看了这个电影，谁敢批啊！就是一分为二也不许。什么叫粗暴，这才叫粗暴，抄人家的家。中央有两个部倒霉，都是新人。文化部主要负责人用了新人，其实底下老的解放了相当大一批。还有体委，整庄则栋整得很厉害，这都是在后头的。整我在前头。四月到主席那里告状，所谓请教，那个办法是告状。主席就批了一个文件出来。他就利用这个文件，说是学习主席的批示，不报告主席，就斗了我。五月三日，主席召集政治局会议，会上对双方都批了，内容暂时在这儿不说。但是他又是根本不讲主席批他们的，把对我们的夸大了，特别是对我。他在政治局是采取三种办法，一种是拉，拉得很紧的；一种是欺骗蒙蔽；一种是打。打中也有分化。首先打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他无组织无纪律，不报告主席，在四月底突然袭击。因为我怕影响团结，我就都扛起来。他还不甘心，还要弄。主席在五月三日批他们，建议要看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说列宁说，那是一群人啊，都是大知识分子，大反革命，要坑人。这个他绝口不

提。说军队要谨慎，中央委员要谨慎，这个也不提。说是广东帮不要湖南帮的人，说是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还有很多了。这些都是批他们的。

我要给同志们讲，我不仅对你们作自我批评，我已经多次作自我批评，作记录的同志都可以证明的。我就想，在林彪问题上，我虽然是对的，但时机不对。我骂了林彪两次，骂了他，这干扰了主席的战略部署，因为那时还不是时机。我因为害重病了，控制不住了，这个我都作了自我批评。在天津，我给我身边的同志都作自我批评，坚决改。重犯怎么办呢，我再改。就是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前进的道路上很难免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有片面性。我同在座的同志有共性。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每分每秒就那么绝对的、百分之百的、正确的、完全的反映客观现实，这不可能吧。不可能，那就要出差错。我想，我们大多数同志都有这个问题。我们的主席对文化大革命都说了三七开嘛，我上一次讲了，就不重复了。我多想三，受过冲击的同志，你们多想那个七。三也要一分为二，主席说了。至于那个三，我以前想，那根本不是我的错误。打倒一切，怀疑一切，我有一个报告给主席，那是陶铸的，还有国务院也有一份文件，说要层层烧透。当时王、关、戚他们想拿出去，我报告了主席、主席说这个不能拿出去，要保护总理、副总理。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我总觉得在一个革命的进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错误，要看主流。这是我过去的想法。主席这一总结，我就想，虽然这两个错误不是我的，但是它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的，我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啊，这就要总结经验教训。邓小平不仅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是所有的都翻。主席的重要指示同志们都学了吧？他利用主席在抓落实各项政策之时进行挑拨，说什么历次运动都要伤害一批有经验的老工人，有经验的老干部。他的话我也背不下来。这也是我后来知道的。主席不是驳了嘛，陈独秀伤害了吗？一直数到刘、林。他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完全是个反革命的两面派，他暴露的比林彪还快。

我对刘少奇有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我是一九六四年才认清的。对林彪也有一个相当长的认识过程。因此，同志们要允许有认识过程啊。这里有受了气的青年同志、有受了冲击的老同志。不要发泄怨气，发到群众身上、发到青年同志身上，这是不对的。邓小平实际上对老中青都干。主席说了嘛，我是最老的。邓小平欺负主席呀，造谣诬蔑主席呀，残忍啊！法西斯啊！去年主席害感冒，他传那些东西。有一份东西实在不成话，我不能在这儿扩散，那个东西是应该锁起来的。在不惊动他的条件下，我掌握了一点，惊动他的，那是大量的。而且为了这个，我去求过他，他不见，最后第三次我说，你一定要排出一些时间来见我、我说属于我的事，政治局见，我错了，我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如果属于你们不理解，你邓小平同志不理解呀，我可以谅解、可以解释，解释以后你还不理解，我等待，再解释。我说你不要去干扰主席，要保护主席的健康啊。同志们，包括一些跟他的老同志，我就不相信同志们会跟他走，除了个别的坚决要跟他的。如果我说了这些，广大的干部、党员、广大的指战员，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答应邓小平吗？在座的同志能够答应邓小平这样欺负咱们的主席吗？我请问！在座的同志，包括我在内，都受主席保护啊！邓小平这样欺负主席，这样残忍，我不能说了。(抽泣，哽咽)我们都没有责任保护主席吗？我觉得应该想一想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下呀，不能想想自己的错误缺点，向造反派赔礼道歉。青年同志也不要紧紧地揪住自己的书记不放。我上次讲了，要共同对敌，对着邓小平。

我今天说的不仅是这个，他是个大汉奸，现在已经走得很远了。他要是上台，象我这样的人，那是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公开在政治局讲，我已经有精神准备，杀头、坐牢，我不过只有一个头吧，从入党的时候起，就作了精神准备。不过我这次也要保护自己一点、不能随

便叫他们杀头，搞死。向来我身上没有一点儿钱，现在带那么几十块。（从皮包中找钱）噢，这次又没带。弄不好，我就走。我对邓小平有个认识过程，原来不了解这个人，只知道主席批他搞独立王国，这我知道，别的我不知道。因为我那个时候正在作放射治疗，有两年完全不能工作，头脑失掉了平衡，老呕吐，怕声音，怕光，也不知道什么声音，什么光，别人一碰我的床，就象晕船一样，黄胆都吐出来了。这样有两年，以后我就锻炼，那两年我也刻苦锻炼，护士扶我在外头走一走，出出汗，一天出几十次。我今天舌苔得厚了，就是因为你们那个楼太热了。他欺骗同志，蒙蔽同志，甚至于政治局同志都不例外，都被他欺骗了，更何况同志们呢。我把这个认识过程讲一下，你们就会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据我知道的，在很早主席就跟我讲过，不要喊打倒刘邓路线了，要有区别，要把邓小平跟刘少奇区别开。我听招呼了，就不跟着喊了，因为大家都喊刘邓路线嘛。我们都一直是在顶着干呐，受伤都不下火线，他保护得好好的，养的那么健健康康的。我是确实对他满腔希望，因为我看到主席一番苦心，怎么样保护他，然后怎么调他回来，用什么方法来恢复他的名誉，来提高他的威信，这我都知道，都看在眼里。他回来，开始对我很好，两面派啊，我倒觉得邓小平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呐，能够谈心的人，我可找到了这么一个人，觉得他可以。那时总理病重，我原来比较忧虑总理这个位置，后来就不太忧虑了，我甚至觉得他可是一个安定团结的因素，这个话对在座的那个同志讲过。他才不是安定团结的因素呢，才是一个破坏、分裂的大阴谋家呢。“三要三不要”，他恰恰是要修正主义，要分裂，要阴谋诡计。他七五年一月出来，刚刚只有一年多嘛。不过我对他一直有警惕，有这么一个问号。这个人出来以后，从来不说一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什么伟大的成果，没说，对新生事物憎恨得很，恐怕对你们也没有说过吧。我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你是一个不团结安定的因素。不是讲经验主义嘛，他说把“主义”去掉，有经验就行了。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经验，据我现在粗浅的学习理解，有两种，一种是有实践的真正的科学的经验，那这是宝贵的，是唯物的。一种是唯心的。现在公开发行的主席批的叫《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有个按语，你们都有没有？是不是普遍都有？这本书有个内幕，我不晓得同志们知道不？是我们的主席和苏修斗争的结果。主席说，还有错误，不要紧，读的时候加以分析就是了。我去年全部复习了。哎呀，那个阶级斗争熄灭论，利润挂帅等等，都是那里头的，不保留一点不行啊。另外，主席在这儿说了（拿出来念），“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座的参加过庐山会议的老同志大概都知道吧。彭德怀事件那一次，是不是主席批的这个过时了呢？从中央政治局起，到地方上的高级干部，我认为没有过时。主席说，江青是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因为经验不多。主席说，江青不是王明，她没有写《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主席有一篇批示，他不学，搞突然袭击，斗了我四个月。这是怎么搞的呢？就是文元同志、还有春桥，当然春桥说罪魁祸首是他呀，五八年就争资产阶级法权这个问题呀。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去年三月中央发了一篇社论，记不清日子了，三月二十一日吧，这个社论大体上是说了这个（手举《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这件事对我印象比较深，我比较仔细地看了这个社论。这是个重要事情，我不过是在偶尔的一个场合，而且是在没有睡觉的情况下，说了批经验主义，所有的都弄到我的头上来，不听主席的。主席的批示是这样的，主席说，“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

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就不全读了，这一件没有公开。主席这个批示，他不学习。主席批示，经验主义还是放在前头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都是修正马列主义，这样讲的。而且把新华社的人也弄上去斗争我，我一看那个形势不对头，我想，我都承担吧，我还替新华社记者都承担了。五月三日，主席开了会，那天的记录我没有找到，就是批他们的这一些东西，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好，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批教条主义。我复习了主席的一系列批示，从七届二中全会起。我把邓小平六八年《我的自述》和修改党章的报告，统统研究了一下，他是个什么货色呢，过去不知道，现在才知道，原来他是个王明路线的支持者、拥护者。这些话你们自己去找。清华那个东西发了没有？太挖苦了，我的警卫员都有一份，到会的同志只有一个组长一份，要人手一本。那个整的还不完整，就是邓小平言论摘录。这个人就连在死人身上都要做工作。总理去世了，总理的自传上说他是巴黎支部，邓说是中国支部，欧洲，一定要这样。那时已经斗他，他还这样。这不是歪曲党史嘛！有很多这样的事。我想在座的有的同志可能比我熟悉他，我实在是不熟悉他，我对他不熟悉，在座的有没有他的部下，或者是老的，大概也不熟悉，因为他这个人啊，可是不接触人咪，不接触群众。他到大寨去，连一个中午都不住，到老百姓家里都不去，据这次揭发，他家里的常客是什么人呢？李井泉、胡乔木、胡耀邦，还有王海容、唐闻生，还有什么人，我搞不清了，那都是无话不说，交待任务的，别人不能去。不过据我们现在知道，去年开什么十二省委书记会，个别谈了话，有的是两个人，当然也可能有的没有谈。

邓小平在外事问题上走得相当远了，但是由于主席对外事抓得很紧，所以有一些抓回来了。比方，他投合三木，妥协，这个主席抓了，霸权问题不能妥协。这是个原则问题，妥协了苏修会高兴。关于台湾问题，邓小平拍布什的马屁，我就光看了外交部整的那个东西，其他的还不知道。我为什么敢在同志们面前讲他是个汉奸，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呢，有物为证。我全部带来了。我上面写的字就不印了，也没有修辞，有一份是我给主席的，这份是我最近打“土豪”得来的，这个“土豪”是好“土豪”，因为他这种材料太多了。这上头，我给同志们念一下，不印，我是请主席参阅。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出口原料和外国资本家订长期合同，等等。他还说过，要把杭州、苏州，还有广州，还有许多地方开放给外国人游览，吃喝玩乐，抓外汇。在政治局中，我们很多人抵制他。目前各大工矿企业，省、市，燃料吃紧，有的已经停产，包括北京，过去我以为只是卡上海，卡辽宁，北京也停产了，连我那儿也受影响。我说给我换灯泡吧，灯泡坏啦，老以为是灯泡不亮，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个事，是电不够。有的地方已经停产，形成混乱。这是邓小平破坏的结果。我每天都要选一点国际国内的东西给主席的，随便写了那么几句，所以我觉得不要印。上海马老揭发的材料，你们可以看一看。电气设备他要下马百分之四十以上，那么下马是不需要了或者怎么样了，并不是！而是不要中国自已造的，去进口外国洋人的。还有一个，最近我才听说一台美国的设备装在大庆，我说那可不行，大庆是主席树立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先进单位，可不能这样，要拿走。后来知道有两台美国货。同志们，这是个什么事？我不反对进口一点东西，但装在大庆丢中国人的脸，外国人去参观，装着美国人的设备，我说要拆掉。如果它有某些先进之处，那你先仿制，最好是迎头赶上。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我推荐科教片给同志们看，有一些我们都是先进水平啊。混到党内的这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当权派邓小平，他不看。为了“风庆轮”；前年就跟他斗了一场。为了“风庆轮”，他骂我，政治局会不欢而散，一个多月开不起会来。后来，他不得已到我那儿道歉，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我说话走火了。我说，没什么，邓小平同志。就这样，就算完了。这一次我说你是个原则问题，我

可能在方法上有某些缺点，你是个原则问题。"风庆轮"的问题，上次没说全，我把文件又调回来了。"风庆轮"是个什么事呢？就是我看了这份东西（手举材料），我愤恨，我在这个东西上批，我还正式写了一封信给政治局。"我看了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却有少数人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象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都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它斗争可以吗？李国堂是钻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沾满了一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他怎么能够做中华人民共和国'风庆轮'这艘万吨英雄轮船的副政委呢？政委、船长和广大船员抵制他是完全正确的，是值得赞扬的，应该鼓励的。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上一次因为记录的同志记不了，我的话也快，没整上。我得读一读其他同志的批示。

王洪文同志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我已在十月十二日告诉交通部、上海市委，先将李国堂留上海发动'风庆轮'职工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然后再搞回交通部进行揭发批判。交通部必须对李国堂进行严肃的处理，并将处理的情况报中央　洪文　十月十四日"

春桥同志："同意江青同志的批示意见。在造船工业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已经进行多年了。发生在'风庆'号上的事是这个斗争的继续。李国堂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是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建议国务院抓住这个事件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使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在各个战线上进一步确立起来。　张春桥　十月十四日"

文元同志："同意江青、洪文、春桥同志的意见。根本问题是路线问题，李国堂代表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他仇视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对抗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反对革命文艺、批林批孔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崇洋思想是由他买办资产阶级的立场决定的。建议交通部和其他经济部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这件事进行路线教育，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造船工业和整个社会主义工业能够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　姚文元　十月十四日"

后来，事情闹大了，邓小平大发雷霆，大骂我。（当时我批了不少材料，有个气浮陀螺，是一个工人发明的，比世界上的都先进，但就是压着他。有一个新华社记者报道了两三年，后来这个记者垂头丧气了，不敢报道了。批林批孔开始后，他又觉得应该报道。我看到这份报道，就建议，反正花不了几个钱，请他到北京来谈一谈。气浮陀螺是飞机、轮船上都要用的。我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我应该告诉同志们，我根本不知道有邓小平什么事，特别是我还挺迷信他，七四年啊，可不知道噢，他一直对我都比较讲理的，通情达理的，我说他能团结人，他是骗了我。那时，他急了，暴跳起来了，骂，脸上的肉都直哆嗦。喊，我要调查。后来他一个屁也不打了，那个李国堂是个坏人。这是我跟邓小平第一个回合，比较严重的回合。可是没有想到他就是李国堂的大后台，也没想到他为什么跳起来，完全想不到的。不过，后来他去挽救了，说，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块了，说话走火了，就算了。我这个认识过程是多长啊。到了"四大"（指四届人大）以前，商量名单，主席就告诉家里，要政治局讨论。我们的主席非常尊重政治局的。自从邓小平到了政治局，政治局就成了一个摆设，懂吗？象个花瓶。他不给思考时间，文件事前不发，发了也来不及看，到会上去一大堆，根本来不及看，他就说，政治局通过了，就送主席，强加给主席，然后就利用他陪外宾能见主席，又说，这是主席的，来镇压政治局。发展到去年斗

我，我讲话，他说我不听你的、我不听你的。就这个样子。你认识邓小平这个人吗？很早认识吗？他是个逃兵。

我这个认识过程很长啊，他作了这样不象样的自我批评，我就又觉得，我这个方法是有不妥当的地方、还照样迷信他。他采取什么方法？他利用会见外宾的机会、主动找我谈话，其中最突出的两次，一次，他说总理的病怎么样，出了多少血，不得了啊，我当时以为他是关心总理。另外一次、总理比较危险，可能动手术了，他就跑到我身边说，不得了了，怎么样危险，最重要的问题要有一个第一副总理呀。我说，那还不是你嘛。你们看我蠢不蠢哪。同志们，当时主席传话回来了，说是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不仅这个，连总参谋长、党的副主席都是主席提的。我觉得邓小平这个人连旧社会的那种所谓起码的做人道德都没有，更何况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员。主席这样对待他呀。

邓小平把咱们的原油，咱们的石油，连煤炭、棉布统统压价出售。这些都是去年冬天干的。如果给了第三世界缺油的国家，那还情有可原，他是卖给那些大资本主义国家呀。燃料我们自己缺呀。所以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叫他汉奸，正确不正确？我们的主席还在保着他啊，我说话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们最近还发现了高产的油田啊，都拿走了，都拿给外国人去了。煤炭、棉布压价出售，我们八亿人口啊，这不是出卖、不是汉奸行为？所以我说他连一个起码的爱国主义者都不是。有这么四份材料，同志们可以看。在座的同志，我也有点担忧，我担忧不是无缘无故的。青年同志、老年同志、只要能说话的，都要出来说话，先学下来再说嘛，除非他死不悔改，要做邓小平的殉葬品，那没有办法，自找的嘛，群众不答应，我们也没办法。他们想把我那个讲话拿去当上方宝剑，我说，那不行，不能传。能说话的要说话，但不能镇压群众，要顾大局，先把主席的重要指示学好，要把斗争的锋芒集中在邓小平身上，不然的话，就乱了，要总结经验嘛。主席教导我们，现在群众的觉悟比我们高得多。说老实话，我没有有些群众那么高的水平，主席批评得对，往往下级比上级高明。我没有背下来、大概意思吧。你们谁背下来了，谁带着主席最近的指示没有？而且这一次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刘少奇、林彪事件时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群众根本不惊奇，而且高兴、欢呼，觉得早就应该揪出他来，这是我看到的群众的材料是这样的，群众有很大的觉悟，可讲理了。我也去了清华，前天晚上去的。建议你们把文件带走一份，建议你们都去清华。我听说一个组长一份，那怎么行啊，我的警卫员都人手一份，搞得不对头。现在大字报选编第八期出来了，我收到了，你们有没有？我建议，大字报（一）到（八），应该每个省有一套，他们可以翻印，那是主席亲自抓的点啊，我们都得去学习。现在群众都去抄大字报，叫他们也到那去抄，这不对了吆，想得不周到。每个省，每个军区要有一套，从（一）到（八），要是出了（九），（九）也算上，要给别的省、别的军区补发、补齐，以前那个不够，只有增刊（一）、（二），没有别的，我说的（一）到（八）是大字报选编。增刊（二）那个形式是我出的主意，原来出了个《林彪与孔孟之道》，对照着批。看大字报的人太多，就看到一点、三张还没看完，就不得了了，出不来了。要取经啊，他们的经验，一个是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是对马列主义巨大的贡献，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革命这个问题，对于当前革命的性质、任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解决了，提到理论的高度，因为这个问题马克思有历史局限性，巴黎公社两个多月，他也没去，给限制了。列宁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指示、尖锐、精辟的讲话，但是很不幸，去

世界。斯大林，主席在这上头讲了，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我们的主席是总结了苏联的还有一些小修的主要是苏联的经验。现在的资产阶级不在于荣毅仁，那个谁都知道，而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官，在于咱们咪。我资产阶级法权挺多的，我虽然老是自己限制，还是有一些，有一些还必要，不然我就不能工作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那可厉害了，我曾经形象地说过，我是且战且走，打中了自己，擦干了血迹，包起来再上战场。要提高警惕，你看我们都住着楼房，我住宾馆，我没有住那个最好的，是因为怕爬楼梯，我住底下工作人员的房屋，有汽车、警卫员、秘书、护士。我有护士，因为我吃毒药——安眠药，我吃的量大，自己不能掌握。我没有服务员，我是女同志。护士、战士，还有司机。在座的恐怕有不少吧。所以咱们属于大官。我有这么两句话，"巡抚出朝，地动山摇。"确实要小心啊，确实有这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不要去要，人家就送上门来了，这里头有不少同志有我这种情况。我不需要走后门，别人就替我安排了。礼物给我送上门来，拒绝了。我到那儿去，吃饭都是别人陪着吃，我后来想了个办法，每人出一份，会餐，革命化。邓小平说的挂职下放，那完全是错误的，简直是浑不讲理了。但是我们主席总是希望，象我这样的人到群众中去。我只要天气好，我就到群众中去，不然就有暮气，就不革命，就反对革命了。主席说了，青年的同志，中年的同志，每年要有几个月时间劳动，主席是说每年三个月，要回本单位去劳动，接受工人、贫下中农的教育，参加集体劳动。呆在上面久了，就会成为官僚，成为小官僚，容易脱离群众，只在机关非常容易。邓小平到大寨，中午也不在那儿，上火车，群众都不见，这个样子，很少有的。他对干部也是这样。我对他的认识现在还在发展，对于他，因为还有些东西我没有弄出来，基本上认识他了。如果同志们看了这四份材料，他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就认识得差不多了。我也有这么一个认识过程，那么大多数同志应该有认识过程，要承认这个认识过程，不能一步登天。帐要算在邓小平身上，这不是替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来开脱，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得罪了群众，得罪了造反派，那他应该作自我批评，应该赔礼道歉。以后他要再犯错误，还可以再批，是不是？河南就应该向唐师傅赔礼道歉，整得他好苦啊。（唐岐山：我有错误，我有缺点。）那是另外一回事。群众的意见，恐怕不完全是对铁路。大家要认真对待。

邓小平这种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生产是历来的。他进口了好多外国设备，不晓得为什么都挤到今年上马。有的设备根本没有处理三废，现在毒害人啊。上海紧急呼吁。现在是救命呐。给了多少？十几万吨吧。那个数字我弄不清。又缺煤，又缺油，因为这都是从原油里出来的嘛。辽宁呢？生产石油，生产煤炭，缺，经常挨饿停产，从挨饿变成停产。就是这个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邓小平，他对第三世界是一点兴趣也没有，就是对美国、西德、第二世界有兴趣。那简直是一副奴才相，在我们面前可凶了。我曾认为他是一个团结的因素。

（对张平化同志）你对《园丁之歌》那样积极，造了许多谣，那个信说是你支持写的、搞的？（张答：是。）你能够造主席那么多谣，而且你安排了给主席看，是不妥当的。说初烂（初澜）就让他烂了吧。一个服务员那样造谣。我已经核实了，我对这个戏两点意见，有意见我没说，就是对内容有意见。那个戏是我们三个人审查的。它叫《园丁之歌》，我觉得园丁首先应该是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工人、贫下中农，怎么会成了知识分子了呢。意见多 深刻的是春桥同志。你愿意是反攻倒算，但是我们当时说也不要批什么，就压起来。后来你们湖南自己批的，那只好上演，批嘛。初澜的文章我没有看。初澜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文章没看，是因为那个字小，不看。但是我还有一条意见没有说，就是说作为湘剧音

乐，能演现代戏，我对它还是肯定的，我只不过是没有说。我还是讨厌它那个内容。我为什么对花鼓戏那样帮助呢？湖南花鼓戏《送货路上》还有一个《半篮花生》，这两种戏我都不熟悉，不熟悉的戏不敢随便说，音乐不敢随便说，但是我还是对它那个内容有意见，这个你们不知道，我也没有说。我也得去研究一下湘剧呀，这是我自己的本业。当时，好些内容很不好的电影也要出笼了，出笼很好。我觉得拍了的可以上映，让群众鉴别，这是主席的方针嘛。毒草锄掉还可以作肥料。《园丁之歌》可以上映，不是不可以，但要允许马克思主义的评论，来评它。（张平化：现在没有见谁有这个想法。）你是完全翻案，（张：不是。）你是好得不得了啊，我看你那封信了。那只是有缺点吗？那应当说是有错误。你就是独独没有登评《海瑞罢官》文章的。我今天提出来，就是你太积极了，告状告到主席那里，叫主席看，主席从来在这一类事上是超脱的。你叫服务员来探听，找了那么一大堆，然后说，这个戏好得不得了，好嘛，上映嘛，照原样上映嘛。你是要加工去，照原样映嘛，然后再改嘛。已经拍成了，国家花了很大的成本，在这方面上我觉得我还很有一点热心。他把园丁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拿原来的拷贝给同志们看一看，大家评论评论。我还是说那个《园》剧毕竟是演现在的人，过去是演才子佳人。你在那里翻案，你没有执行邓小平那一套？现在我都有份。他这个"三项指示为纲"因为我听得少，看得少，我九月初才听到，我说怎么弄这么个玩意啊，搞不清楚。我在湖南，主席嘱咐我回来传达要读点马列，张春桥、文元写文章。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没有听主席说过。把这三项连起来，我觉得很奇怪，也不敢用。主席曾给我打过招呼，叫我不要乱说话。我觉得有问题，这时候远新回来了，他也嘀咕，他说，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是怪。我是政治局委员，我都没听传达呀，也没有看到主席的批件。我说，你这次回来，要搞清楚一下这个东西。中央的文件都有啊，有三件吧，你那个湖南就不受影响？你看你气鼓鼓的，我平心地讲，你有问题，我在这儿跟你讲理呢。我就不信，你那个文件上没有啊？你说过没有？军委扩大会不传达怎么行呢？中央的文件不传达怎么行呢？一个错误路线来了，坑了多少同志啊，坑人呐，害人呐。不值得委屈，不要气鼓鼓的。这属于执行问题。有的执行得坚决，有的执行得不那么坚决。听说空军有个同志抵制了他一下，就把这个人干掉了。打电话让他们传达两位副主席的指示，他们传达不力，派了两个人去，臭批了一通。不能把自己说得那么高明，我到九月初听到，直接在政治局听到，觉得不对头，也不敢问，搞不清楚。因为有两个我是听到的，但不是在一块儿，后头这一个我没有听到。各地的同志都要对着邓小平，自己有错误、缺点，执行了，有的坚决执行了，有的执行得差一些，空军不那么坚决，把个政委给干掉了。这个话你们不要记，没有去核实，反正是有这么个事。上了中央的文件，我都没有看出来。在一个会上，临时念文件，他们要把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搞掉，我提出来了，说你这样是阉割主席的思想啊。这个文件就那么发了，不给人思考余地，来不及呀。但是后来我发现他当时反映很紧张。看起来，在哪儿？在邓。邓小平很紧张，他说照改照改。事先发文件，叫我们看，想一想嘛。不是，而是临时发，发一大堆。他这个时候，发军以上的照改了，军以下不是发全国嘛，还是删了。后来在我身边工作的同志有一份，我拿来看了。你们不信，回去看一看。发军以下的文件，把主席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弄掉了。你们注意了没有，恐怕也没有注意吧。所以这个事情啊，认识有差别。我和同志们有差别，我认识可能早一点，抵制他也早一点，斗争早一些。希望犯错误的同志尽快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学习马列主义，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最近这个，结合实际。还有个点在那里，同志们都去了。主席说开三天，你们来已经四天了，如果问题比较多，回去解决。回去解决，就是要双方都要学习主席的教导，各自作自我

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能讲话的要讲话。我就不相信有人就死心塌地跟邓小平走。林彪都没有带走一兵一将嘛，是不是？我不相信，所以要帮助。我今天看了，不能镇压群众。有些省有些问题。（对张平化）你自己要作深刻检查，你如果镇压了，你要作自我批评。来的同志，能说话的就要说话。我很不希望象廖志高那样，一下飞机就给抓起来。在座的同志，我不知道是不是每省都有。这是个大局，要回去先给造反派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你们现在自己在这儿学习了，回去找造反派先学。我忧虑这个。当然大多数省是可以学下去的，个别同志要有精神准备，回去就让人家给捉起来。廖志高就被捉起来了，我做了工作，陈佳忠做工作，群众听他的呀。中央候补委员陈佳忠同志做了工作，群众说三条，你廖志高都没答复，人已经放了。能说话的同志的是不是还有。你看人家清华。现在据说整个北京市都点名了，不上街，很听话的。去了很受教育。

我就是想说一点点这个斗争的内幕，邓小平他们不仅对青年干部，对老年干部。主席说我是最老的，邓小平对主席欺负，残忍。主席这样对待他，从头到尾保护他，又给他恢复名誉，提高威信。他觉得天下是他的了。现在是咱们的主席统帅咱们反击啊，还有什么错误不能丢掉呢？顶多是受了邓小平的影响嘛，执行了一些东西嘛，中央也有文件嘛。所以主席说中央负责。中央负责，主要是邓小平负责。有些老同志可能是比较厉害，有的不一定了。有的地方确实是比较厉害，比如七机部。

我占同志们时间很多了，觉得这么多问题，能说话的同志，不管老、中、青，有的省份不是所有的，得说说话。错误严重的同志都要下决心改过来，能够正确对待，还要有精神准备，不要叫人家捉起来。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指福建）太厉害了，有人说，"来、来、来，咱们复辟复辟"。邓小平说我是个勇敢分子，现在看来，全国的谣言都是邓小平弄的。说我一切职务撤销，下放劳动啊，说我已经自杀了。其他的，人家不给我看，说怕我看了生气。我还活着嘛，我还活的好好的嘛。我记忆力都要丧失掉了，这样残酷啊。两个省、七百多。他是一朝权在手，就这样干。他这个会，从去年十月底就开始了，是不是？从去年十月底到现在四个月了，光在政治局开会就三个来月，基本上解决战斗了，才请同志们来的呀。主席保护着你们，保护着咱们在座的，老中青都在内啊。我们没有职责保护主席吗？请问同志们，有没有这个职责？群众气大了嘛。我这个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看了材料，好象都有精神准备了，争取不要那样，因为有点经验了嘛。咱们都要总结经验教训，主席不是已经给我们总结了嘛。我们要好好学习主席的重要指示，要结合自己的实际，自己作自我批评嘛，当然青年同志有责任帮助。但另外一方面，也要顾大局。不要限期，不要把人揪起来，这不好。我总希望先学起来，先学主席这个指示，回去能说话的，老中青都应该说话，陈佳忠就出来说了话，群众给了三条，把廖放了。别的地方还没有。

我今天来，一个是告诉同志们一点内幕，说的也不完整，也可能说错话。我是经常说错话，做错事的，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是难免的，问题是改不改。我是只要认识到了，就改了，我今天说错了的，同志们都可以批判、批评，帮助我，我欢迎。我不能上那个大楼了，我原来想去看你们呀，那儿风大，我现在怕那个大楼，因为我有慢性上呼吸道炎。我来看看同志们。你们看看那些东西吧，看邓小平是什么人物。过去我还不知道是他搞的，他要把我们国家变成一个出卖原料的国家。另外，我希望跟着邓小平犯了错误的同志，没有什么舍不得丢掉，镇压了造反派的，我冒叫一声，应该赔礼道歉，应该解决。另一方面，造反派同志、青年同志也应该说话，不要一下子就抓起来，对大局不利。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不是说不要弄清是非，不是。原则问题、路线问题应该弄清是非，可是揪起来怎么能解决问题

呢？大家坐下来，学习主席的指示不可以吗？主席这个指示，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不在这儿废话。同志们学习的恐怕比我还好，政治局到现在只学了一次，还是最近才学的。邓小平从来不提批林批孔，他破坏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三十三条"政治局没有学完。同志们，邓小平破坏了，没有学完就斗我了。恐怕地方的同志"三十三条"都学了吧？政治局没学完，就斗起我来了，抓住一个枝节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啊，更何况我也有缺点错误。我愤慨的是他对着主席，对着许多跟主席走的、走主席这条革命路线的人，他呀，不管老中青，他都干，对着广大群众。这个事情要认真对待的。我还没给你们如实的讲，因为我不替他扩散那些玩意儿。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我说，在阶级问题上，我比她先进，但在才干上，我不及她。他们没有历史知识，就是想拿旧社会那个传统观念来对付这两位封建的大的女政治家。她们比男人还厉害，而且是法家。我才干不及她们，确实不及。我就是一个马前卒，过了河，不回头。我感到光荣，在这一盘棋上，我是个卒啊，我光荣。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刘邦临去世以前，吕后请示他说，"萧何以后是谁？"刘邦答："曹参。""曹参以后呢？"刘邦说，"周勃。"你们看了这一段历史没有？又问："周勃以后呢？"刘邦说，"那我就不知道了。""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此人也。"大概是这么个句子，你们可以查来看看。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个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武则天到晚年没有被杀掉，就是则天大圣皇帝取掉了，现在则天大圣皇太后是（未听清楚）下来，从李世民到李治的名臣，她都用，而且为她所用。她简单吗？但是那些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专门攻击这样的人。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个很厉害的女人，赵太后。同志们知道我讲过这个历史。齐威后，那都是很厉害的。他们就是用下流的东西诽谤武则天，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还有比这个还厉害的，我就不能说了。这个事情涉及到主席，你们也不要去扩散。我建议你们也看看这段历史，不要受孔老二徒子徒孙那些东西影响。真正的历史学家不是这样看的，比较正确的都是肯定她的。你看，一部《三国演义》，把曹操搞成什么样子了，咱们看戏，曹操是个奸臣，白脸，但是《三国志》是肯定他的。这个人是法家，而且还是个诗人。这个书还是挺难翻的。我们一下子也看不到曹操的戏了，就是这个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给翻过去了。陈寿的《三国志》不是这样。唐朝的诗人都是歌颂他的，李白有一首"古风"："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所以我们的主席要我们学一点哲学，读四本书，就是要我们懂点中国历史。冯天瑜的那本我快看完了。他这本书联系实际，比较容易懂。最近，他有一篇文章，我还没看。他这个书联系实际，只有个别的地方有点差错。象我这样的人，因为文化水平是不高的，我用工具书就可以看懂。在座在大学生也有了，有没有？我反正只是个高小学生，蹲图书馆的时间多，大概有的同志比我们还低一点儿。就这样吧！我占用同志们时间很多，我要讲错了，同志们批评我。

中共中央关于转发华国锋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讲话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三月三日）

为了更好地学习贯彻执行《毛主席重要指示》，现将华国锋同志于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召集的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同志会议上的讲话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传达学习。

华国锋同志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同志们：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找问题多点的五个省的同志来谈，后来又找了十二个省、市、自治区和一部分大军区的同志来开会。同志们学习了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大家体会到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进一步捍卫、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基本路线，意义非常巨大深远。会议期间还初步揭发、批判了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受了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错误的同志，表示回去要转好弯子。从会议的进程来看，开得是好的。我们这个会是打招呼的会，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会。所以，可以早点结束，早点回去，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展起来。

回去以后怎么办，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最重要的，是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希望同志们一定要把这个学习摆在首位，认认真真抓好。

回去后，首先要保证开好省委常委会。然后，按照中央部署逐步扩大，传达学习。

第二，在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各级领导，要站在运动的前列，特别是在右倾翻案风中，受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犯有错误的一些同志，要带头揭发、批判，在揭发批判过程中转好弯子，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会议打招呼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不转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帐。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

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

在邓小平同志错误路线影响下，前一阶段，有些地方和单位出现的这样那样问题，要逐步加以解决。

铁路的问题，在当地省、市、自治区党委领导下解决。

第四，对犯有错误的同志，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要揪住不放。不要一棍子打死。有错误的同志，要在认真学习毛主席指示、同干部、群众一起参加批判邓小平同志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基础上，提高认识，提高觉悟。有的，要在一定范围内做自我批评。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改了就好。

第五，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发展巩固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文汇报》删去了新华社关于向雷锋学习报道中的周恩来的题词

(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

据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六年三月四日电　今年三月五日，是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发表十三周年。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广大指战员结合回击右倾翻案风重温毛主席的光辉题词，回忆雷锋同志一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刻苦学习、努力作战的模范事迹，感到分外亲切。他们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大批雷锋式的战士茁壮成长，部队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大量事实，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散布的种种奇谈怪论，决心发扬雷锋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把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进行到底。指战员们说，雷锋同志虽然牺牲了，但是雷锋同志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人民解放军沈阳部队是雷锋同志生前所在的部队。这个部队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开展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每年三月五日，部队各级党委和连队党支部都要组织干部和战士重温毛主席的光辉题词，学习雷锋同志的模范事迹。每当新兵入伍和老兵退役时，都要给他们发《雷锋日记》和《雷锋的故事》，勉励他们以雷锋为榜样，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①] 当前，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指战员们对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意义，在认识上又有了新的提高。他们说，雷锋同志是一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向雷锋同志学习，就要象他那样，胸怀共产主义大目标，一刻也不忘记阶级斗争，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勇战斗。某部二连班长金学忠，在学校里就是一位学习雷锋的红卫兵小将。一九七三年入伍以后，他处处以雷锋为榜样，刻苦学习，努力锻炼。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回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始以后，他和连队理论小组一道，在党支部的领

---

① 此处原电还有一段话："不少部队还培训了雷锋故事讲解员，结合各项政治运动和部队工作，向干部和战士介绍雷锋同志爱憎分明的政治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引导大家走雷锋成长的道路，做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新人。"《文汇报》转发时被删去。

导下，积极投入这场斗争，紧紧抓住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展开深入的批判。某部后勤部副部长朱志惠，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雷锋同志的先进事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自愿回乡务农，做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二千多名即将退伍的老战士，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深入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的那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决心同剥削阶级的旧传统观念决裂，退伍后不回原籍，申请到西藏、新疆等艰苦的边疆去安家落户。

沈阳部队在重温毛主席光辉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过程中，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部队革命化建设的成就，表彰了一批象雷锋同志那样战斗、生活的共产主义新人。在这批共产主义新人的带动下，沈阳部队雷锋式战士大批涌现，雷锋精神到处开花结果。某部重炮连战士王树，乘车去长春动阑尾手术，在列车上遇到一位单身外出的老大娘，热情照顾了她一路，下车时又帮着大娘拎起几十斤重的提包。出站后，人多拥挤，把他和大娘挤散了。王树忍着阑尾发炎的疼痛，来到公安局请求帮助寻找大娘的下落，最后终于把提包送到了大娘的手里。大娘望着王树，激动地说："真是解放军里雷锋多啊！"去年二月，辽南驻军某部六连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部队领导机关了解到这个连队学习雷锋活动开展得比较好，决定让他们选派一名代表，参加沈阳部队召开的学习雷锋经验交流会。党支部发动全连推选，大家一下选出了二十多人。他们有的曾经在危险关头，多次舍己救人；有的长期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并肩战斗，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有的用自己的鲜血，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他们人人都可以作为全连的代表。今年，各部队向领导机关推荐的雷锋式的先进典型已经将近一百名。

(原载1976年3月5日《文汇报》)

〔附〕　走资派还在走　我们就要同他斗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同志认真学习三月十日《人民日报》社论《翻案不得人心》中所传达的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重要指示，围绕"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的专题展开了讨论。

为什么走资派还在走呢?仪表局党委中心学习小组的同志回顾了建国以来我党经历的几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看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每当革命的关键时刻，总是跳出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去年，他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教育、科技、文艺等领域向无产阶级全面进攻，竭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通过分析批判，大家进一步看清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反动本质。大家还从阶级根源上作了分析。他们学习了革命导师有关阶级、阶级矛

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提高了认识。局党委副书记王德佐说："我们党在解放前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此，有不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跑到革命队伍中来了。他们中有些人没有在革命斗争中改造世界观，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他们在接受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口号时，并没有把这些口号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整个斗争联系起来'**。他们只接受党的最低纲领、从来不懂得也不准备实践党的最高纲领。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由民主革命的同盟军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那部分顽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也由革命的'同路人'转变为革命的'对头人'。他们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一起，代表着新老资产阶级的利益，充当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他们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由其阶级立场和阶级利益所决定的。"局党委常委汤国权、委员乔根华说："过去我们看不清党内走资派与资产阶级的必然联系，一谈到资产阶级，往往只看到有资本、拿定息的资本家，把眼睛盯住老的资产阶级，而看不到党内的资产阶级。实际上那些'高高工资一幢楼，坐坐汽车开开口，大小事情不动手，朝着资本主义走'的党内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文化大革命前大搞修正主义。当他重新工作后，又大刮右倾翻案风，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这充分说明走资派还在走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存在的社会现象，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规律。

走资派还在走的思想根源在那里？这个局党委中心学习组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的教导，认识到党内走资派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由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是和他们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分不开的。局党委副书记戴梦鳌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他对没落的旧制度、旧思想、旧意识恋恋不舍，奉为至宝，而对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新思想、新文化却看不惯。他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迫不及待地刮起右倾翻案风；孔老二鼓吹'仁政'，党内那个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孔老二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大量事实说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孔老二唱的是一个调子，腐朽没落的孔孟之道、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是走资派还在走的思想根源。"

(原载 1976 年 3 月 25 日《文汇报》)

〔附〕 光明与黑暗的一场大搏斗

——追记万众声讨"四人帮"制造的《文汇报》

"三·五"、"三·二五"反革命事件

(一)

一九七六年一月，在我国人民永远难忘的日子，毛主席的久经考验的亲密战友、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不幸与世长辞了。

人民心痛欲碎。"四人帮"魔爪乱舞，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当时，中国人民同“四人帮”的斗争，毛主席革命路线同“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斗争的客观情势，已经使得对待周总理的态度，成为区分革命和反革命、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试金石。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妄图从人民心目中抹掉周总理的光辉形象，发出了一道道“禁令”：不准设灵堂，不准做花圈，不准戴黑纱，不准开追悼大会……

民心岂能容忍如此的蹂躏和践踏！周总理的丰碑屹立在人们的心田上。人民群众愤起抵制“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种种“禁令”，自己设灵堂、制花圈、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在毛主席领导下，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高度赞颂周总理的丰功伟绩，尽情表达对周总理的无比崇敬和深切哀悼，坚决学习周总理的光辉榜样。

“四人帮”及其余党加紧控制和操纵舆论工具。他们把反动的宣传报道“口径”迫不及待地下达给他们在《文汇报》扶植的那个亲信，使他掌握了“宣传周总理只能低、不能高”的反动“口径”。“四人帮”在上海主管文教工作的那个余党，在周总理逝世前后的几天内，亲自作出删改各种稿件的“示范”：

“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删掉；

“以周总理为榜样”，删掉；

“周总理对毛主席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忠实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删掉；

稿件中革命群众悲痛欲绝的语句，也被统统删掉，……

记者含着眼泪采写的上海人民深切悼念周总理的报道，统统被上海的余党和亲信扣压，一字不准见报。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迫不及待地导演了要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当总理”的“劝进”丑剧。

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又一次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阴谋。但是，“四人帮”贼心不死，张春桥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下了反革命《有感》，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仇恨，猛扑过来。他们用卑劣的手段，在上海炮制和散发了五百多万份黑材料，指名道姓地攻击和污蔑华国锋同志、邓小平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到处组织秘密批判。他们叫嚷要追所谓“风源”，查“更大的背景”，“要从根本路线上来攻”，把罪恶的矛头直指敬爱的周总理。

“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等在北京当面领受了张春桥的黑旨意，赶回上海，立即抛出他们炮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疯狂叫嚣“走资派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成为革命主要对象”，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四人帮”通过《文汇报》炮制的“三·五”、“三·二五”反革命事件，就是在这场两个阶级大搏斗中出笼的。

三月五日凌晨，新华社播发了沈阳部队指战员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报道。报道中有敬爱的周总理对雷锋同志的光辉题词：“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四人帮”在《文汇报》的那个亲信下令：第一版刊登“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初澜”的文章，而把学雷锋的报道塞到第四版，在这个版面上，还硬要刊登由“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亲手交给他的，吹捧“四人帮”在辽宁死党的两则电影广告，并悍然下令：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报道“放不下就删”。就这样，新闻报道中周总理的四句金光闪闪的题词被一刀砍掉，制造了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的“三·五”反革命事件。

人民群众立即发现了这个反革命信号，识破了“四人帮”的阴谋，责问和抗议的电话、信件，迅速地从本市，从全国各地涌向《文汇报》，群众义正词严地要求回答这是为什么？南京大学政治系、中文系、历史系学生在来信中愤怒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本报职工也强烈要求重新发表这个报道，原原本本地刊登周总理的光辉题词。但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文汇报》的那个亲信坚持反动立场，置广大群众的抗议于不顾，变本加厉地策划反革命阴谋。

“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等上窜下跳，煽风点火，竭力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指使《文汇报》的那个亲信要尽力宣传区、县、局干部所谓“站在斗争最前列”的事例，要报道所谓“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过程”。三月二十五日在《文汇报》第一版发表的题为《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新闻稿，就是在这一片反革命叫嚣中出笼的。《文汇报》的那个亲信拿到这篇新闻稿后，逐字逐句地推敲、修改，亲自加了“党内”等字样，悍然抛出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反动句子，又一次把罪恶的矛头赤裸裸地指向敬爱的周总理，造成了“三·二五”反革命事件。

“四人帮”导演的这场疯狂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妄图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反革命丑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二)

人民群众被深深地震怒了！

抗议电话，象急风暴雨一般，从本市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从祖国各地，从人民解放军部队，昼夜不停地打进《文汇报》。

抗议信件，抗议电报，象滚滚怒潮涌进《文汇报》。

“保卫周总理！”

“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

“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

“警惕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台！”

这些战斗的口号，在大学师生、铁路职工、解放军战士的协同下，用油漆牢牢地刷到列车车厢上，遮不住，抹不掉，与列车的轰鸣相融汇，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呼啸着，奔腾着，冲进“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上海。

人民群众义无反顾，他们不怕追查，不怕杀头，不怕坐牢，坚决战斗。短时间内，《文汇报》就接到了抗议信件四百二十多封，抗议电话一千多只。无锡市邮电局职工在电报中严正指出：“搞周国亡”！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长途电话中严厉警告：“《文汇报》胆敢炮打周总理，我们决不答应！”

“四人帮”及其余党疯狂反扑，他们一个个从幕后跳到前台。张春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气势汹汹地责问：“为什么唯独查文汇报？”王洪文恶毒地叫嚣：“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姚文元无耻地狡辩：“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在“四人帮”的直接授意下，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召开了全市区、县、局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下达黑指示，贼喊捉贼，倒打一耙，煽风点火，扩大事态。那个主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余党窜进《文汇报》，给他们的亲信打气撑腰，表示“慰问”，胡说什么“经受了斗争风浪的考验”。他居心叵测地调走了大批抗议信，亲自动手炮制了一份欺骗毛主席、党中央的假报告。根据“四人帮”的黑旨意，马天水等还从“四人帮”

的反革命炮队——原市委写作组调派了一个亲信到《文汇报》，进一步加强控制，把《文汇报》更加紧紧地绑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战车上。

"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在南京梅园、雨花台，在首都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斗争的火炬越举越高。

整个南京城，在街头，在车站，在码头，在公共汽车上，一群又一群为真理而战的群众高呼："我们怀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打倒《文汇报》的黑后台张春桥！"

首都天安门广场，卷起了革命的狂飚，成为一九七六年春天伟大革命运动的主体。人民群众横眉冷对"四人帮"，坚持真理，勇敢战斗。人民群众无限怀念周总理，天安门广场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花圈、花篮，挂在气球上的"学习总理"、"革命到底"的两条红色标语，在空中舞动。听吧！北京工人在反复朗读《怀念周总理》：

"……人民在想，在哭，在喊着您，更重要的是，人民已经挺身捍卫您了，不，是捍卫人民自己的利益，您和人民本身就是一体。"

听吧！多少革命者用战斗的诗篇怒斥《文汇报》，声讨"四人帮"：

三月二十五，
妖雾起黄浦，
《文汇》充当马前卒。
攻击总理真露骨，
当用开水煮！……

莫道《文汇》鬼火亮，
自有人民写春秋。
寄言魑魅慢猖狂，
勿学林贼把命休。……

革命的风暴席卷着黄浦江边，西子湖畔，珠江两岸，席卷全国各地，冲决了"四人帮"设置的一切罗网和壁障！

(三)

斗争在继续。

"四人帮"那个主管上海文教工作的余党和《文汇报》的两个亲信，暗中炮制了《强盗谒灵》的黑文。当年，鲁迅为了揭露独夫民贼蒋介石和卖国贼汪精卫等在孙中山先生灵前假装正经，心怀鬼胎的丑态，写了一首《南京民谣》："大家去谒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现在，他们竟然用来恶毒影射中央领导同志，疯狂污蔑广大革命群众。"四人帮"在上海的这个余党慑于群众斗争的威力，不得不把这篇十分露骨的黑文从大样上拉下来。但是，他按捺不住对革命群众的仇恨，竟丧心病狂地伙同马天水把一批革命群众的抗议信函的复印件作为"罪证"。"四人帮"凶恶地对革命群众进行残酷镇压，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投入监狱，惨遭迫害。

但是，人民的吼声是压不倒的，人民的怒火是扑不灭的！

在北京——青年共产党员贺延光被投入了监狱。有人责问他：

"你为什么攻击张春桥？"

贺延光严正反问:“对三月五日和三月二十五日的《文汇报》恶毒攻击周总理的事件,你们是怎么看的?”

在南京——南京大学数学系团总支书记李西宁,被审讯时,历数当时“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的罪状,愤怒地指斥:“我心目中赫鲁晓夫式人物,就是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

在上海——青年工人黄水生被“四人帮”的余党关进监狱。他大义凛然地申斥:

“悼念总理犯了什么罪?我要写信给毛主席告你们,你们是资产阶级专政!”

在广州——青年工人庄辛辛悲愤地说:

“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尸骨未寒,就有人要分裂党,我不能容忍!”

这是人民的怒吼!这是气壮山河的声音!

一九七六年十月,金色的十月,阳光灿烂,万众欢腾。万恶的“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们通过《文汇报》炮制的“三·五”、“三·二五”反革命事件,被紧紧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与人民为敌,必然被人民所打倒;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必然被历史的巨轮碾得粉碎。历史,终于作出了公正的判决,正义和真理闪发出更加鲜艳夺目的光辉!

以天安门事件为主体的亿万人民群众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革命运动,是人民与“四人帮”短兵相接的殊死大搏斗。人民是这样的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斗争是那样的波澜壮阔,尖锐深刻,它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斗争形式和斗争艺术,它形成了浩浩荡荡的英雄队伍,它增添了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它成为我国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壮举。

这场光明与黑暗的大搏斗,是一九七六年十月胜利的前奏曲。

本报记者

(原载1978年11月18日《文汇报》)

“克己复礼”再批判

(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

梁　效

在伟大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工农兵集中地批判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克己复礼”是孔老二维护、复辟奴隶制的纲领,也是后来一切反动派向革命人民进行反攻倒算,复辟旧制度的思想武器。当前,在回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们“就是要复辟”的反革命叫嚣,再批孔丘的“克己复礼”,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五三〇年,楚灵王兵驻乾谿,欲求鼎于周天子,称霸诸侯。楚灵王由于听不进右尹子革的劝告,“不能自克,以及于难”。孔老二对此事评论说:“古也有志(古人有记载),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昭公十

二年）看来，“克己复礼”之说古已有之，是很符合孔丘维护奴隶制的需要的。但是，把它明确地作为纲领，则始于孔丘。《论语·颜渊》记“颜渊问仁”，孔老二回答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接着颜渊又问：“请问其目”，孔老二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可见，孔老二的纲领是“克己复礼”，也就是维护和复辟奴隶制。

孔丘的“克己复礼”，“复礼”是目的，“克己”是手段。《论语》一书，集中了孔丘要“复礼”的言行，这是一部绝好的反面教材。“克己”，其实就是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反攻过去。这是反动阶级的政治代表当他们处在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惯用的一种反革命手法。林彪的“韬晦”之计，那些至今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派在风头上认输，风过后翻案，都是他们“克己”的妙用。他们没有真理，没有群众，不敢光明正大，只有靠“克己”过日子，尽量隐蔽自己的政治目的，以屈求伸。时机一到，他们就要亮出“复礼”的旗号，暴露复辟派的原形。孔老二这个搞复辟的祖师爷，是深通“克己”之术的，什么“小不忍则乱大谋”呀，“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呀，比比皆是，都不过是为了“复礼”所使用的手段罢了。

孔丘的一生是搞“克己复礼”的一生。到临死前还哀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他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和实践“克己复礼”这个反动理论。他在鲁国当政的那一段活动，最能说明他搞“克己复礼”的反动本质。

孔丘大约在四十三岁时，从齐国回到鲁国。为了实现复辟西周奴隶制的反动目的，他广招弟子，准备力量，大造舆论，蛊惑人心。把“克己复礼”作为复辟纲领，就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孔老二原来是死跟鲁昭公，公开反对鲁国新兴地主阶级的，这种办法，看来不利于达到复辟西周奴隶制的目的。于是他改变策略，大耍两面派。公元前五〇五年，鲁国新兴地主阶级内部发生了矛盾，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孔老二便想利用这种矛盾，改用“钻进去”的办法，篡夺权力，搞反革命复辟。在季氏的一个家臣叛变，另一个家臣公山弗扰在费邑响应，并且邀请孔丘去参加的时候，孔老二满口答应了。他的学生子路对他的这种策略上的转变大为不满。孔老二悄悄地告诉子路：“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孔老二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当时的形势借机上台，在鲁国复辟西周的一套旧制度，使“鲁一变至于道”，让鲁国变一变以达到西周奴隶制的标准。但是，公山弗扰的政变很快就失败了。孔丘的打算落了空，他隐瞒了自己准备参加这次政变的阴谋，摇身一变，回过头来又大骂政变者。孔老二继续大搞“克己”，靠这种政治骗术，终于蒙蔽了季氏，当上了鲁国的中都宰，三、四年间由中都宰而司空、司寇，最后并担任了三个月摄相的职务。三、四年的时间不算长，三个月的时间就更短了，但是这对复辟派的孔老二来说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一上台，就立刻大搞反攻倒算，把复辟的希望变成复辟的行动，大搞“复礼”了。一时妖雾重来，谣言四起，把鲁国搞得乱七八糟。在这一段时间里，孔老二攻击当时革命的大好形势，打击新生力量，扶植奴隶主贵族旧势力，恢复旧制度。联系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和整个社会的阶级斗争，对孔老二搞“克己复礼”的各个方面，作一些分析，将会看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

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攻击革命的大好形势。

孔老二大讲“今不如昔”，一上台就攻击季氏掌握政权是“天下无道”。他说什么“天下有道，国家政权就不会落在大夫手里。天下有道，老百姓也不会议论朝政”（“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他大骂新兴地主阶级是“有勇而无义”的“乱臣贼子”，犯上作乱的奴隶是“有勇而无义”的“强盗”。他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形势，忧虑万分，哀叹人们

不修仁义，不讲礼乐，甚至公然践踏周礼。对旧时代、旧制度，孔老二却无限怀恋、百般美化，说什么只有远古的帝尧才能效法老天爷，才是那么崇高伟大，才有那么光辉的典章制度。帝尧的时代太久远，已经不可追了，所以孔丘把恢复周朝的德政作为追求的目标。他说："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在孔老二看来，古代的一切都好，今天的一切都不好，抚今思昔，真是每况愈下，人心不古。孔老二就是这样大造反革命舆论，攻击当时的革命大好形势的。

用"今不如昔"的论调来反对社会变革，孔丘"发明"于前，孟轲宣扬于后。什么五霸不如三王，"今之诸侯"不如五霸，什么"不愆不忘，率由旧章"，说到底，不过是没落阶级的哀鸣。革命的风暴冲击着旧时代的一切方面，奴隶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新兴地主阶级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登上了历史舞台。奴隶主贵族只有过去，没有将来，昔日的天堂将要丧失殆尽，今天已不再属于他们。他们为自己的命运而悲伤，为挽救自己的死亡而挣扎。这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失败的阶级必然要诅咒革命的大好形势，为已经过去了的旧时代唱赞美诗。这就是一切复辟派为什么要鼓吹"今不如昔"的原因。

二、打击革命的新生力量，镇压劳动人民。

任何革命的时代，都会出现代表革命阶级的新人物，他们是这个阶级的先锋，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反映了新时代前进的方向。与孔丘同时的少正卯，就是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革命大转变时期代表地主阶级的新生力量。孔丘在鲁国代行宰相的三个月期间，杀了少正卯，还暴尸三天。可见复辟派对革命派的仇恨达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

历史上留下来有关少正卯的材料很少，只知道他当时与孔老二同时在鲁国讲学，由于他宣传的是革新的主张，所以非常吸引人。有几次，孔老二的学生除了颜渊以外都跑到少正卯那里去听讲，弄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这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人心的向背，反映了没落阶级的学说无法与新兴阶级思想相抗衡的事实。孔丘杀少正卯，给他定了五大罪状：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这五大罪状的中心意思就是：少正卯不遵守奴隶制的正道，而提出一套革新思想，惑乱人心，是"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但是，革命的潮流不可阻挡，革命的新生力量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孔老二杀少正卯，反而使他自己的反动面目暴露得更加充分，以至于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季氏掌权的鲁国呆不下去，不得不夹着尾巴离开鲁国，四出流亡。

孔老二杀少正卯这件事，说明一旦反动派的复辟得手，他们一定要镇压革命派和革新派人物。这样的事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唐朝王叔文、柳宗元等的革新运动，被反动势力镇压下去之后，凡是参加革新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宋朝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等保守派上台，王安石被贬。其他参加新法的许多人被贬或被罢官。至于对待起义农民，反动派的疯狂反攻倒算，就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方腊起义失败后，宋王朝的反动统治者仅在帮源洞就屠杀了起义军民七万余人；曾国藩攻下南京，杀害了太平天国军民十余万，鲜血染红了秦淮河水。蒋介石曾用"克己"骗得人的信任，然而时机一到，就大批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复辟"意味着千百万革命人民人头落地，意味着革命的新生力量被摧残，这是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给人们留下的深刻教训。

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扶植复辟势力。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春秋末期，奴隶主贵族要复辟奴隶制，首先就要夺回他们失去的政权，让奴隶主贵族的政治代表重新上

台。所以，“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是孔老二“克己复礼”政治纲领的重要内容。在孔老二当政期间，让门徒原宪作他的总管，并且给与大量的粟作俸禄，用以收买党徒，拼凑队伍，加强反革命力量。孔老二又让得意弟子、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代子路打入季氏门下，做季氏的邑宰，实行“堕三都”的计划，从内部破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力量。结果拆毁了叔孙氏的郈城和季孙氏的费城，还挑起了新兴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在我国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上，反动势力一上台总是要在镇压新生力量的同时，大批起用反动力量。秦始皇一死，赵高上台，一方面杀死了李斯、蒙恬等法家人物，另一方面又大搞“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反动路线，把六国旧贵族的后代重新扶植起来。在赵高的复辟过程中，李斯为了保全自己“富贵极矣”的地位，妥协退让，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致使秦始皇开创的封建的统一局面，暂时地被打断了。可见，对反动派的复辟是决不能妥协退让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宋朝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一上台，就把大批保守分子如吕公著、文彦博，反动理学家程颐等重用起来。还特别把御史台这个能够“纠察百官，进行弹击”的机关控制在他的死党手中，要他们对变法革新派不停地提出纠弹和论劾，进行迫害。在现代史上，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后，一手镇压革命人民，一手就把他原来口头上反对过的军阀、政客等等都重用起来。重温历史，将会使我们比较清楚地认识反动派搞复辟总是代表着某一个阶级或某种腐朽势力的，而不是一两个人的行为。他们一定要在各个部门各个地方安插旧势力，以控制局面。因此，“举逸民”是一切复辟派实现“克己复礼”纲领的组织路线。

四、扼杀新生事物，恢复旧的制度。

孔老二对于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反对“铸刑鼎”，反对田赋制，反对违礼僭越，甚至连小小酒杯式样的改变都反对。然而他对已经过时的奴隶制的“礼治”，却是无限深情。他赞美西周的制度说：“它多么丰富美好啊！我拥护周代的制度，”（“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鼓吹要捧着夏代的历书，乘坐殷代的车辆，戴上周代的帽子，演奏虞舜时代的音乐。真是一幅复古狂的自画象。因此，孔丘一上台就立刻忙着把新兴地主阶级的改革统统废除，来了一个反攻倒算，加紧恢复旧礼治，把什么老古董都抬了出来。《孔子家语·相鲁》大肆吹捧孔丘任中都宰时“克己复礼”的“政绩”。鲁国的奴隶主头子定公对这些十分欣赏，问孔老二：“用你这一套来治理鲁国怎么样！”孔老二大言不惭地说：“治理天下都可以，岂止是个鲁国！”孔丘的野心不可谓不大矣！复辟当然不止是在中都一地，也不止是在鲁国一国，而是要把奴隶制的旧制度在整个中国恢复起来。复辟派的反革命事业一旦开始，是一定要力图把新生事物砍掉，全面恢复旧制度的。

在我国历史上，每次大的社会变革或政治革新，都要遭到旧势力的拼死反对。商鞅在秦变法是如此，吴起在楚改革也是如此。商鞅变法取得了胜利，而他却被旧贵族杀害。由于这次变法比较彻底，推行的时间比较长，加之后继有人，变法的主要措施得到了施行。然而，吴起在楚国的改革结果就不一样了。楚国的反动势力发动政变杀害吴起，废除了吴起的变法，恢复了旧制度，使吴起的变法革新事业几乎前功尽弃。看来，吴起变法失败，是由于楚国的旧势力更为强大，变法革新不甚彻底，又后继无人，致使政权完全落入旧贵族昭、景、屈三家的手中。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反动派上台以后，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恢复旧制度也不乏事例。宋朝的司马光对王安石的新法恨之入骨。他说：“新法之祸卒至于横流而不可救”，其“受病之源”全在于王安石不知以“克己复礼为事”。于是在他上台以后短短几个月中，新法几乎被废除殆尽，旧的一套统统恢复。到第二年，仅仅只有免役、青苗等四法还没

有来得及废除，司马光在临死前还说："四患（指上四法）未除，吾死不瞑目矣。"复辟派对新生事物真是集中了百倍的仇恨!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斗争是我国历史上长期儒法斗争的一个回合，它是复辟倒退和变法革新两条路线的斗争。这场斗争具有典型的意义，它说明：复辟派一旦得逞，对新事物，决不只是废除一部分，而是要全部砍掉，连根拔除；至于对旧制度则要一概恢复，他们丝毫也不会含糊。

孔老二的思想在中国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历代反动统治者对这个思想体系不断补充和发挥，使它成为完整的系统的复辟之道。刘少奇、林彪都曾用这个思想体系来复辟资本主义。今天，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也是把它作为搞复辟的重要思想武器。历史上的复辟派和现代的复辟派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三项指示为纲"，实质上就是以复辟资本主义为纲，这和孔丘的"克己复礼"完全是一路货色。恩格斯说：**"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因此，深入地批判孔老二的反动思想体系，特别是他的"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分析复辟派利用它搞复辟的所作所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原载1976年3月6日《光明日报》）

翻 案 不 得 人 心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个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全国胜利发展。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指出：**"翻案不得人心。"**毛主席的话，充分表达了广大革命人民反对复辟倒退、坚持继续革命的强烈愿望，揭露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本质，鼓舞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更加积极地投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

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挑起来的。去年夏季前后，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刮这股风的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科技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否定老、中、青三结合，否定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他们的翻案活动，是有理论、有纲领、有组织的。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不回击这股右倾翻案风，岂不是容忍修正主义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吗?

从清华大学开始的革命大辩论，给右倾翻案风以迎头痛击，大得人心，赢得了全国各族广大人民热烈的支持和拥护。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学习清华大学的经验，在党的领导下，批判"三项指示为纲"，使刮翻案风的党内走资派完全陷入孤立的境地。事实证明：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即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是要革命的，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不喜欢搞修正主义的大人物压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他们的根本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要求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前进。搞修正主义、翻文化大革命的

案，人民群众是决不答应的。

毛主席最近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极其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我国二十多年来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反修防修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走资派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的资产阶级。从合作化到批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革命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抵抗。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总会在党内出现走资派。出现新的资产阶级的代表，"走资派还在走"的现象将长期存在。煽起右倾翻案风的那个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前追随刘少奇搞修正主义、对抗历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口头上说什么"永不翻案"，一旦重新工作，旧病复发，又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了。这种人，从来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毛主席曾经指出的思想至今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我们要记住，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历史上每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以后，总会有人象孔老二那样跳出来搞翻案，搞复辟。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伟大革命，也必然会出翻案派。这次翻案和反翻案、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继续和深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这样的斗争，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对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要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认清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领导干部要站在运动的前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团结起来，集中批判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路线。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都要记住毛主席关于"**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些教导。对少数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领导干部，要帮助他们转变立场，欢迎他们改正错误。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各项工作包括工农业生产都搞得更好，警惕阶级敌人的捣乱，警惕有人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要通过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促进安定团结，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成果。

让我们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批示：同意。 **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各地禁止来京上访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中共浙江省委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

最近，浙江有几批学生，强行登上火车，要求来京上访和到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经过劝阻，大部已经回去了。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影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中央要求各地要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的规定，对强行登车要求来京的人员，应做好思想工作，坚决劝阻。告诉他们，整个运动要根据毛主席指示，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在本地区、本单位搞好教育革命大辩论，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

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节录）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剖析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程　越

伟大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乘胜前进。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受到了毛主席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深刻批判。毛主席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的指示从根本上指明了“三项指示为纲”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

有少数人曾经认为，“三项指示为纲”只是一个“提法”问题。那么，好，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篇在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指使下炮制的文章。此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总纲》），它以更露骨的语言，彻底暴露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

（一）

《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接着就提出了“三项指示为纲”。文中写道：“三项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这样一个概括，尖锐地表明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毛主席关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

《总纲》在提出这个不讲阶级斗争、不讲社会主义革命的大前提后，笔锋一转，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不仅是当前，而且包括今后，是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样，它就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玩弄折中主义和诡辩术的人是反对辩证法的，是不讲辩证逻辑的，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总纲》却连形式逻辑都不讲，连个推理都没有，只是用“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为借口，硬搞出一个“三项指示为纲”，并立刻变成全党全国今后二十五年中“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不是强加于人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正是用这种手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炮制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对立的、与毛主席的指示毫不相干的修正主义纲领。

《总纲》全文从所谓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结束，这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中国今后的历史路程包括今后二十五年应该如何走?我们认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建设起更加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逐步迈向共产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老路？今后几十年必然是这样两条道路、两种前途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为实现第一种前途、反对第二种前途而斗争。而党的基本路线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生命线。

（二）

“三项指示为纲”难道真的是包括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吗？完全是假的，是骗人的。人们只要看看《总纲》是怎样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指示，就可以明白修正主义者所玩弄的把戏了。

前年年底，毛主席作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制度时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毛主席这些指示的主要内容，是强调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于反修防修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继续革命的方向。可是，《总纲》在谈到理论问题的指示时是怎么说的呢？它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主要内容，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完全抛在一边，甚至连一句

话都没有提到。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有关产生新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的问题，对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的问题、对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对走资派的问题，在《总纲》中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清楚地表明，所谓"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歪曲和取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歪曲和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际内容，表明了走资派的资产阶级本质。毛主席最近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深刻指出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犯的路线错误及其煽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事情是不是到此为止呢？不是。那些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火论的人，从来只是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从来不"熄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进攻。《总纲》在反对阶级斗争的同时，杀气腾腾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正是表明了阶级斗争的这个特点。

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告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总纲》却怎么说呢？它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说什么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有这么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他们"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甚至说"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总纲》在这里使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样一个名词，却故意掩盖它的阶级内容。这是指谁呢?是指党内走资派吗？不是。《总纲》对党内走资派这一概念，如同阿Q对自己头上的疮疤，不仅自己讳莫如深，也不喜欢别人提。是指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吗？也不是。因为《总纲》明确说明了这些人不在"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这个概念之内。其实，从他们认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违背了"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来看，这里所谓"把革命口号加以割裂"的"阶级敌人"，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革命的人们宣布为"阶级敌人"。他们在文章上这样写，在实践中也是这样做的。他们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极"左"，这样，就可以用"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类语言来攻击一切批判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的革命人民，攻击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而把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都当作宝贝供起来。什么"继承林彪的衣钵"（一点也不继承刘少奇的衣钵！）、什么"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这种胡风式的语言，对于地、富、反、坏、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以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和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的人来说，完全可以心领神会，为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而高兴。

《总纲》还攻击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说什么"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说过："对老工人、对有经验的干部，一定要落实好政策，因为运动一来往往伤害了这一部分人。"《总纲》说的那些话正是从这里抄来的。"运动一来"这句话，把我们党进行过的历次重大路线斗争都包括在内了、也就统统予以抹杀了。请问：从批判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罗章龙、王明、张国焘到批判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每次"运动一来"都"伤害了"有经验的老干部和老工人吗？都"把党的好

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了吗?这不是对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的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的歪曲和诬蔑吗?在这里,《总纲》完全暴露了它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反动面目。我们说,"运动一来"是要"伤害"人的,但决不是"往往伤害"有经验的老干部、老工人,而是要"伤害"那些"老"修正主义路线头子,"伤害"他们所推行的错误路线。如果不同他们的错误路线斗争,我们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带领全国人民从民主革命胜利地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到共产主义。正因为"运动一来"要"伤害"修正主义路线,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为此而感到悲伤,要为之翻案,要把我们党的历史倒过来写。但这只能是痴心梦想!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以他的"三项指示为纲"在各个领域进行复辟活动,是很猖狂的。他一再叫喊要"整顿"。怎么"整顿"呢?《总纲》说得很明确:要用"三项指示为纲"来"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好家伙,九大"整顿"!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党内到党外,从地方到中央,统统不行,统统要"整顿",点滴不漏,简直是天罗地网。我们也说某个方面的某些工作需要整顿,那是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把工作做得更好。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进行的这种包罗万象的"整顿"是什么呢?我们通过教育、科技、文艺、卫生等领域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已经看得很清楚,他就是要用"整顿"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回到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上去。他要搞全面"整顿",就是要全面反攻倒算,就是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如果象《总纲》说的,有人"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那么,这正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及其鼓吹"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的自画象。

(三)

在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问题上,《总纲》也是对毛主席的指示大肆歪曲和篡改。它根本不谈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把发展国民经济纳入了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轨道。

说我们"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试问:八亿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有饭吃,有衣穿,建立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民经济体系,粉碎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讹诈,这是"不讲经济"、"不讲生产"吗?吃着人民群众种出的粮食,穿着人民群众做成的衣服,坐在人民群众建造的房子里,发出这种所谓"不讲经济"、"不讲生产"的昏话,简直是对我们党,对长期战斗在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无耻诽谤!

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分歧,根本不在要不要抓生产、要不要搞好经济建设。马克思主义从来重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也从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改革,只有抓革命,才能促生产。生产关系调整好了,就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人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政治挂了帅,人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就必定能促使生产突飞猛进。而唯生产力论则是不要阶级斗争,不搞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把发展生产作为唯一的决定性的东西。这

才是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鼓吹的那样，埋头搞生产，搞建设，不讲阶级斗争，不讲革命，让修正主义上了台，资本主义复辟成功，那么发展起来的经济、生产和"四个现代化"，都会变成压迫、奴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力量。

（四）

"三项指示为纲"，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折中主义的手法炮制出来的。它是一个虚伪而又反动的修正主义纲领。作为宣扬"三项指示为纲"的《总纲》，也反映了这样的特征。它是一个在理论上十分贫乏，在手段上十分恶劣，支离破碎、东拼西凑、逻辑混乱、思想矛盾的大杂烩。但它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反动实质，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

（原载《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

批判洋奴哲学（节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方　海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崇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正在深入开展，我们必须继续批判洋奴哲学，揭露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推行的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反动本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是建立在坚定地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定地相信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的。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

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根据我们的经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个省、一个地区，直到一个工厂、一个公社都要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何况是一个国家？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旧中国二十多年，喊了二十多年“建设”，他们的所谓“建设”，不也是把眼睛盯在外国资本家身上，拿国家的资源和主权去换取洋设备的吗？他们换了二十多年，弄出个什么名堂呢？国家主权、经济命脉全都落到了帝国主义的手里，旧中国经济那种衰落破败的悲惨景象，人们不是记忆犹新吗？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〇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是否符合党的基本路线，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否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

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于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路线也就是资产阶级的路线。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批判修正主义，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

〔附〕　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洋奴

中共国家计委核心小组

计委电影电视工业办公室、财贸组的同志，愤怒地揭发批判了王、张、江、姚四人帮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破坏电影电视工业的罪行。同志们说，四人帮成天高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自己打扮成"最爱国""最恨崇洋媚外"，动不动就骂这个是"洋奴"、"买办"，那个是"汉奸"、"卖国"，甚至闹出"蜗牛事件"的大笑话，实际上，他们闻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看月亮也是外国比中国的好。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洋奴。

江青使用的照相器材、胶片、相纸，甚至连洗印药，都非要进口的不可。她为了搞到洋货，竟采取非法手段，从香港偷运进来。一九七二年，她亲自派中国电影公司的一个人，拿着她弄来的通行证，到香港买伊斯曼彩色底片，一次就买了六万米，偷偷地用麻袋背回来。江青对国产电影设备根本看不上眼。一九七三年元旦，在电影戏剧创作座谈会上，她把国产的电影设备一概贬低为"三十年代的"，强令"派一个班子出去，买一些先进的东西，各个电

影制片厂配一套。"她一句话，五百万美元就花掉了。电影工业战线广大工人气愤地说："每个电影制片厂都进口一套外国货，我国的电影工业还要不要了?"其实，他们买进来的东西，有许多并不比国内的先进。例如，录音用的混响器，国产的效果很好，有些技术指标超过西德，每台成本只有几百元，而从国外进口每台花近万美元。我国生产的钢琴，早已出口，国外反映较好，江青却说它是"低档货"，指令为殷诚忠进口美国钢琴，一架就得一万多美元。

四人帮崇洋媚外，横行霸道，要进口什么就得进什么，别人不能有半点异议，否则，不是骂你是"坏人"，就诬蔑你"同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系"。一九七五年五月，他们以录制传统节目为名，提出要从日本进口一套录象设备和全套录音设备，价值六十七万三千美元。张春桥批："这些设备是特殊需要，建议批准，不再传阅了。"事隔九个月，张春桥又批准录象设备改由西德进口，追加一百万美元。文化部在提货单时，又增加了彩色电视中心设备等项目。他们要增加进口的电视中心设备等，国内已经制造使用多年，有关部门专门开了会议，进行了研究，建议组织国内生产。文化部硬是不干，还向四人帮告黑状，说外贸部不肯给他们进口，耽误了时间，要追究责任。实际上，文化部提出的进口货单，超出了原来批准的范围，外贸部当时坚持按批准的货单进口，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四人帮蛮不讲理，质问国务院领导同志，"我们批点外汇，你们为什么就是不办。"有关部门敢怒不敢言，只好照办。一九七六年三月，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去博茨瓦纳拍一部新闻纪录片，张春桥就批准进口十二万美元的电影摄影设备，连电线、话筒等也要买外国的，又公然违背外贸规定，硬要由出国人员自带现汇跑到巴黎市场自由选购。有关部门和工人同志对他们到国外拍电影不用国产设备，很有意见。但他们根本听不进，以势压人，说什么"国产的不可靠，出了故障谁负责?!"

四人帮大肆进口黄色影片。仅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八日，张春桥打着"了解国际电影创作动态"，"艺术上和技术上有借鉴作用"的幌子，一次就批准进口影片五百五十部，其中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口三百五十部，香港二百部，加上其它器材费用，共合人民币一千五百多万元。为了进口这些影片，他们专门派出三个组到世界各地去选购。毛主席逝世后，我国驻香港的有关单位提出暂停进口，但四人帮不干，一再催逼加快进口。四人帮进口外国影片数量之多、内容之腐朽，是前所未有的，比旧文化部厉害得多。他们为了看外国片方便，张春桥还批准紧急从西德进口五套双片道放映机，供他们享用。

同志们说：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罪行累累，仅从上述事实，就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洋奴，是地地道道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

〔附〕 江青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一出丑剧

邵　兵

多年来，大野心家、叛徒江青，处处以"爱国英雄"自居，动辄给人扣上"投降"、"卖国"、"汉奸"、"洋奴"的帽子。然而，真正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恰恰是她自己。一九七二年，江青和一个外国"作家"的谈话，就是她自导自演的一出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丑剧。

百般阿谀奉承　一副洋奴本相

一九七二年八月，正当"四人帮"处心积虑地进行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时候，一个外国"作家"随同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江青出于反革命需要，不顾党纪国法，背叛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对这个"作家"主动约见，曲意奉承，连她自己的衣食住行到言谈举止也无不力求洋化。

每次谈话，江青都要同时占用几个大厅，谈一阵子就换一个，以显示她这个"女皇"的身份。谈话时，她上穿尼龙短衫，下着西式纱裙，足登白色凉鞋，手挎白色提包，左顾右盼，搔首弄姿。她拿的那把檀香扇本已臭气袭人，还要在扇柄上再拴一串茉莉花或白兰花。每当谈到兴起处，她时而纵声狂笑，时而大谈特谈风花雪月，虫鱼鸟兽，直至她豢养的猴子对她的"高级感情"。江青娓娓倾诉着对好莱坞电影的迷恋，肉麻地吹捧三十年代的外国影星，声称只有西方的轻音乐，才能送她进入梦乡。江青力图通过种种方式向这个外国"作家"表白，月亮也是外国的好。对于外国的一些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她更是称赞备至，就连这个外国"作家"也不得不承认，江青对外国资产阶级头面人物的印象"比我对他们的印象还深"，一语道破了江青洋奴本性。

肆意伪造历史　蛆虫妄想成圣

江青在这个外国"作家"面前如此奴颜婢膝，究竟意欲何为？原来，她是在进行一桩肮脏的政治交易。在这桩交易中，她力图借洋人之手，替自己树碑立传，为篡权登基作反革命舆论准备。江青同外国"作家"第一次见面，就恬不知耻地要人家"走斯诺的道路"，以《西行漫记》作"范本"，为她著书立传。对方对此心领神会，马上懂得了江青是要通过她的笔向全世界"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表明"她自己独立于毛主席的作用"，两人"合力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就形成了"。

为了塑造一个"红都女皇"的形象，江青在整个谈话中贪天之功为己功，蓄意贬低和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蓄意歪曲和捏造我国革命历史。她信口雌黄，吹牛撒谎，即便戈培尔复生，也要自叹弗如!

江青本是一个历史反革命，却把自己打扮成在青年时代就"对王明路线早有察觉和抵制"，是和鲁迅一样遭到了围剿与迫害。江青本是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田、三不会打仗，专搞阴谋诡计的野心家，却吹嘘自己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和毛主席一道转战陕北，"指挥全国战争"。江青本是破坏文艺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却标榜自己参加了文化战线上的历次重大交锋，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她一手搞起来的；评《红楼梦研究》的文章是她先看到后，才引起毛主席重视的；说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是早有认识，早有行动，一九六二年她"就全部投入了斗争"。江青与林彪本来是一丘之貉，但讲到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时，她却拚命洗刷自己，无耻地把自己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并列，说是"我们加了一滴酒精，他就完了"。江青这个大阴谋家、大野心家，把自己描绘成三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闯将"，四十年代同毛主席一道指挥全国战场的"统帅"，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历次路线斗争中的"正确路线代表"。不言自明，七十年代只有她这个白骨精才配充当中国的女皇。

历史不容伪造，蛆虫岂能成圣！毛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伟大统帅，是革命人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而江青这个中

华民族的败类，只不过是一条钻进革命营垒的蛀虫，是一条靠喝人血过日子的寄生虫。这个三十年代混迹十里洋场，大演“国防影片”的三流演员，又怎能与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相提并论！鲁迅是耸入云霄的高山，江青只不过是一杯粪土。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说过：**“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四九页）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江青有野心。”江青同外国“作家”的谈话，充分证明了她是一个完全靠着谎言过日子的大野心家。

透露政治野心　大搞卖国勾当

江青知道，单单依靠自我吹嘘，似乎还不足以表明自己的心愿，于是又袭用历史上一些野心家、复辟狂的故伎，以赠诗明志的手法，和盘托出她想当中国女皇的野心。

众所周知，臭名昭著的署名“琅琊台”的黑诗，是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江青要在国内公开发表而又未敢发表的一个篡党夺权的自白书。其实，早在一九七二年，江青就把它题在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赠送给这个外国“作家”了。江青自比“奇峰”，并一再向“作家”暗示毛主席、党中央是“锁”住她的“烟雾”，是她向上爬的最大障碍；她决不满足于“偶尔露峥嵘”的现状，不爬上“女皇”宝座的“峻岭”绝不肯善罢甘休。对此，“作家”和江青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当这个“作家”一离开中国，就通过报刊、谈话把江青描绘成“一个处于权力顶峰而感到不得志的女人”，一个“想大干一番事业”而“又要同偏见作斗争”的女人，一个想“实际上成为过渡时期的一个太后”的女人。

江青在向“作家”透露了她政治野心的同时，把她结帮的情况也交了底。谈话中，她把她的帮伙、死党相继介绍给外国“作家”，并竭尽美化之能事。狗头军师张春桥，被江青吹成是许多工作的组织者；政治文痞姚文元被吹成是专门批判所谓反动路线的金棍子；蜕化变质分子王洪文被吹成是跟着她冲锋陷阵的闯将。江青把她的“四人帮”和盘托出，以供帝修反欣赏。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没有后台老板，是成不了大气候的。过去彭德怀、林彪这些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都曾认贼作父，千方百计投靠洋老子；今天，一贯倒行逆施、为非作歹、在偌大的中国处境极为孤立的江青，也是走那些叛徒卖国贼的老路。她找洋人搭桥引线，冀求青睐，同样是费尽了心机！

出卖国家机密　一心投靠洋人

搭桥引线，请人著书，总要付出代价。江青为此对外国“作家”实行了破格接待，破格赠礼。江青每天亲自盛宴招待这个外国“作家”；把珍本《二十四史》、一九三八年版的《鲁迅全集》、《清史稿》、《古诗源》等奉送给了这个外国“作家”。这还不够，索性把党和国家的机密也拱手奉送出去。

对于接待工作原则，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有过明确指示，但大野心家江青背着毛主席，对抗周总理，竟敢一意孤行。她训斥传达周总理指示的同志“胆子真大，敢来围攻我！”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她自作主张，继在北京之后，又在外地一气谈了五十多个小时，在谈话中又是“零售”又是“批发”，大量出卖党和国家的政治、军事、外交、人事、资源等各方面的重要机密，连同许多没有公开发表的文件、地图、照片，一古脑儿地“惠赠”出去。特别令人愤慨的是，江青竟向这个外国“作家”提供了有关我军在解放战争时期

西北战场和三大战役的作战情况、总部番号等机密情况。

江青的这些罪恶行径，起到了帝修反一般的特务间谍所起不到的作用，活生生地勾划出江青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超级叛徒、特务的嘴脸，帝国主义分子对如此罕见、主动上门的超级情报员，真要感激涕零了。回顾大叛徒、大卖国贼林彪叛国投修时携带大量机密的情况，江青这种里通外国的罪恶行径与之何等相似。真是两个民族败类，一样卖国勾当！

寡廉鲜耻之尤　遗臭万年下场

毛主席早就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利用外国人写传记搞反党篡权活动，则是江青的一大发明，连这个外国"作家"也感到江青的行动是"经过考虑的冒险"。江青幻想有朝一日，成书轰动世界，自己能够大捞一把。没料到机关算尽、弄巧成拙。毛主席、党中央及时察觉了江青的罪恶活动。江青及其一帮，惊惶失措、疯狂对抗。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修补谈话内容，妄图掩盖事实真相；一方面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蛮横地扣压上报有关江青与外国"作家"谈话的材料，甚至以追查所谓"政治谣言"，打击和迫害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这方面情况的同志。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枉费心机，欲盖弥彰，江青的黑手早已被抓住，她那寡廉鲜耻、无耻之尤的卑鄙行径，遭到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严厉谴责。洋洋数十万言的谈话连同尚未出笼的传记，已成了遗臭万年的可耻记录。

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绝非偶然。她年轻时就千里迢迢跑到十里洋场的上海，顶礼膜拜外国资产阶级文艺，以后又沿着王明路线，干的尽是"通敌的鬼蜮行为"。她争演卖国求荣的汉奸妓女赛金花。她从狗洞爬出，又向人民公敌蒋介石献媚。"**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江青今天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不过是她那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罪恶生涯的恶性发展而已。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对于白骨精江青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滔天罪行，我们恨在心头，怒火满腔。我们决心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原载1977年1月16日《解放军报》）

〔附〕　满纸洋奴腔　一部伪造史

——评江青在广州对外国"作家"的一次谈话

广州部队大批判组

一九七二年盛夏的八月，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突然窜到地处亚热带的广州，会见了一个所谓"历史学者"的外国女人，在五天的时间里进行长达五十多个小时密谈。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事件，是江青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重要部署，是她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丑恶表演，而那份谈话记录，则是她卖国求荣的自供状。

一副奴颜婢膝的洋奴相

大野心家江青一出场就向这个外国"学者"、"作家"大献殷勤，说什么："我因为你要来，这个地方很热，给你定做了一把扇子，还没拿来"，于是便在一把声称她用了二十年的檀香扇上，亲手系上一串白兰花，先送给对方。西方有一句谚语："第一个印象永存不灭"。江青的第一个表演，果然使对方颇为"感动"。接着是阿谀奉承，拍马吹捧。江青说什么："出你这么一个女作家是好事情"呀，"你不仅是一个好的美国人，而且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革命的知识分子"呀，等等。然后是赠送礼物，除了特制的檀香扇，精心设计的象牙雕刻，宏篇巨著的《二十四史》，还有给对方孩子的玩具小熊猫。真是挖空了心思，竭尽讨好之能事。

经过这样一番"远铺垫""近铺垫"，又经过江青的左一个暗示，右一个启发，才进入了"主题"。请看下面一段对白：

江青：你是写一本普通的浮光掠影的书，还是想写一本有分量的书？

某外国"作家"：这本书要描述文艺和政治、文艺和文化大革命互相的关系。我也想在这本书里写一下江青同志作为个人是怎样在改造文艺方面起领导作用的。

江青：我的历史，谈起来就长了。一方面是艰苦的，另一方面是相当曲折的，也是相当"罗曼蒂克"的。……要把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背景，加上个人微小的作用。……能够反映中国革命，尽可能使它的分量重点。

某外国"作家"：我意识到了。

江青：知道你要写一部斯诺《西行漫记》那样的书，我就在为你这本书做钢筋水泥的基本建设。我现在提供给你的材料，连斯诺都没有，这就比他深入了。……你就不知道我和文元同志花了多少力量。很多人为你服务啊！

某外国"作家"：我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为了一个外国人服务。

江青：那不是白劳动啊，我相信你能写好书的。你最好集中写一本。你就知道我不是单搞文艺的了。

很明显，这是一心想当中国女皇的江青，要一个正在投其所好的国外来客，为她树碑立传。为达到这一可耻目的，她在接下去的长谈中不惜出卖党和国家的一切机密，包括从未公布过的党内斗争情况、军事地图、作战电报、我党和兄弟党的关系以及其他重要资料。江青这样的大拍卖，果然得到对方的赞赏。这个外国"学者"、"作家"宣称："在我对中国的了解中，江青同志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榜样的作用。……我想答谢的是，能够把你领导的作用、导师的作用告诉外界。"看，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已经成交了！

欺世盗名、寡廉鲜耻

江青在这次谈话中，从政治到经济、从文艺到军事，从她的所谓"革命"经历，到她的生活琐事……内容极其庞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无非是按照"四人帮"在文艺上那个"三突出"的原则，用"多侧面"的手法，塑造她这个未来中国女皇的"高大完美"形象。

江青先是给自己戴上了一顶"三十年代文化革命旗手"的桂冠。她一方面声称：在三十年代"他们要迫害鲁迅，我也是被迫害者之一"，把自己吹嘘成和鲁迅并驾齐驱；另一方面，又诬蔑鲁迅很长时期"是个观潮派"等等，妄图贬低鲁迅，把自己打扮成在三十年代就是唯一正

确的文化革命"旗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现在人们都已知道，这个自吹为"旗手"的江青，在三十年代积极推销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国防文学"，向国民党反动派献媚效劳。一九三六年她曾在反动影片《狼山喋血记》中担当重要角色。这部反动影片曾被"四条汉子"吹捧为"国防电影标本"、被国民党《中央日报》吹捧为"国产影片之中最有意义最杰出之作"。她还竭力争演歌颂汉奸妓女、鼓吹卖国主义的话剧《赛金花》的主角，踊跃参加国民党反动派搞的"庆祝"蒋介石"五十寿辰"的"献机祝寿"活动。就是这样一个旧上海十里洋场上的三流电影"明星"，居然胆敢攻击诬蔑鲁迅，妄想冒充三十年代"唯一"的文化革命的"旗手"；岂不是天大的笑话!

江青这个大野心家并不满足于"文艺旗手"之类的头衔，她再三向那个外国"作家"声明，"文艺只是我工作的一个侧面"。她借谈解放战争的情况，又大肆吹嘘她的另一个"侧面"——军事"天才"。她拿着别人提供的材料，指着别人画好的地图，大言不惭地宣称，了解解放战争全面情况的，"除了毛主席，就是周恩来总理，然后就是我!"居然把她自己同在解放战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功昭日月，光耀千秋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并列，真是《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一部伟大的解放战争史，是无数老一辈革命家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岂是骗子的谎言所能篡改得了的？江青在解放战争中只是担任留在陕北的中央直属机关大队政治协理员的工作，她自己在这次谈话中就曾抱怨过，说每当毛主席、周总理、任弼时同志等召开会议、商讨重大问题的时候，都要把她撵出窑洞，她只好钻进一个驴棚里去。既然如此，她怎么又会是掌握解放战争全局的"第三个人"？这不是自己又把自己吹的牛皮戳破了吗!

江青还吹嘘她在当时的西北战场上，是中央直属队中最拥护毛主席战略方针的"那一派的头头"。这也完全是颠倒是非的谎言。历史的真实是，由于她反对毛主席关于党中央坚持留在陕北战场指挥全局的英明决策，被毛主席痛斥为怕死的胆小鬼。为了篡改这个历史事实，她竟往别人头上栽赃，说是："有的好心的同志动员我跟主席讲一讲：留在这儿，这多危险。我就是傻瓜，我就去说。……我冤枉得很。"这真是只有江青其人能说得出口。

为了给自己这个所谓"军事家"找一点论据，江青还厚着脸皮宣称："我搞了那么多战争的样板戏，我没有一点经验就能写得了？并指导他们?"这真是可笑又可怜。江青盗窃了京剧改革的成果，把别人的劳动算到自己账上，现在又异想天开，想用别人创作的写战争题材的作品，来证明她有作战经验了！江青在延安，既没有直接参加过战役战斗，更谈不上指挥过战役战斗。就是在行军中，按照她自己供认，也是"因为我下了马以后，就要给同志们带来负担，因此就赖在马上不下来"，如此而已。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这位自封的"军事家"江青有一次曾跑到海南岛某炮兵阵地，一不准部队向上级报告，二不准通知友邻部队，就强令向公海开炮。她还指责"预备——放"的口令会"放跑了敌人"，要改为"打、打、打!"这既是无法无天，又足以表明她连半点军事常识也不懂。

江青给自己戴上的最大的一顶桂冠，要算是所谓"卓越的政治家"，"正确路线的代表"。卖国贼林彪为了想篡党夺权，曾经再三声明，他不是搞军事的，而是搞政治的。江青想当女皇，也三番五次地提醒那个外国"作家"："我不单搞文艺"、"我是搞政治的人"。

为了捞取"卓越的政治家"、"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资本，江青狗胆包天，把自己打扮成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而对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发动和领导这些政治运动中的伟大作用，只字不提。伪造刚刚过去不久的一段历史达到了如此惊人的程度，真是古今中外都极为罕见的。谁都知道，是毛主席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日，为《人民日报》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指出《武训传》的实

质是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击中了《武训传》的要害，教育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而江青却说是她首先发现《武训传》是"改良主义"的，是她首先发起了批判运动。把阶级投降主义说成是改良主义，至今连问题的实质都还没搞清楚，还想冒充领导这场斗争的英雄，实在是恬不知耻！谁都知道，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亲自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在全国深入展开了一场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伟大斗争。就在这封信上，毛主席指出《清宫秘史》**"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而江青却硬说这些也都是她的功绩。大约她也知道，那位外国"作家"，虽属"历史学者"，知道中国的一些情况，但既然钓上了她江青这条大鱼，也就未必有心思戳穿她的谎言。一个愿讲，一个愿听，政治交易早已拍板，她也就放开来胡扯了。果然，在江青口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也成了她江青发动的。这实在不值一驳。谁都知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而江青及其同伙，则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她在这次谈话中说："兵一来就是全面内战"，企图把"全面内战"的责任嫁祸于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归罪于毛主席号召的"三支两军"。真是令人愤慨！谁都知道，"全面内战"正是从江青那个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论开始的。而冲击军队，企图乱军夺权，毁我长城，也是由她那一伙提出的"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开始的。江青还颠倒黑白地胡说什么："我跟着主席坚决保护他们（革命老干部）"。实际情况也恰恰相反，她是处处破坏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她是企图打倒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的反革命组织"五·一六"的黑后台。她是有名的"帽子公司""钢铁公司"的总经理，是煽动"打倒一切"的罪魁祸首。

"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六四九页）江青偷天换日，吹牛撒谎，企图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文武双全、军政兼优、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八亿人民"当然领袖"的形象，罪恶目的是为她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但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大量揭发材料使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了江青其人，她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分子，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吹嘘："我是从反封建反帝，然后找到共产党的，我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的。"她有什么反帝反封建的历史？是什么马克思主义者？她的历史是极其反动丑恶的：二十年代她为成名成家而个人奋斗，东投西靠；三十年代，她是王明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革命队伍中的叛徒；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她采取"勉从虎穴暂栖身"、"潜伏爪牙忍受"的韬讳之计，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六十年代，趁文化大革命之机，伪装左派，爬上高位；七十年代，资产阶级野心恶性膨胀，与王张姚结成"四人帮"反党集团，梦想当二十世纪的中国女皇，最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从争当"头牌明星"，到梦想当中国女皇，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江青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一生走过的可耻道路。

篡党夺权的重要步骤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五十年前就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事实正是如此。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为实现其政治野心，奴役中国人民，都极力投靠洋大人，甘当帝国主义的附庸。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党内外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由于他们十分虚弱，要变天复辟，也要极力寻求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拜倒在洋主子的脚下。林彪、江青之所以投靠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都是他们资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在国际范围内为

自己制造反革命舆论，是江青及其一帮人蓄谋已久的篡党夺权阴谋的重要步骤。用江青自己对某外国"作家"的话说，就是："要把这段历史说一下，也是我好久以来想搞的。这次你来成了一个动力。"真是早也盼，晚也盼、终于盼来了这个"动力"，好得很，于是，江青一把抓住那天外飞来的外国"来客"，把炮制她这个"女皇传"的宿愿变成了实际行动。

江青这个"满纸洋奴腔，一部伪造史"的谈话的出笼，是同当时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紧密相关的。一九七二年夏秋之际，林彪反党集团被彻底揭露和粉碎了。这个同"四人帮"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的反党集团的毁灭，客观上为"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去掉了一个竞争的伙伴，进一步使江青一伙的反党野心膨胀起来。此时，又处于召开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的前夕，他们认为这正是他们排挤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打击真正优秀的年轻一代革命干部，进行大力抓权的大好时机。于是他们象疯狗一样四面出击，枪炮齐鸣，喇叭尽吹，从国内到国际，搞得个乌烟瘴气。这就是这个野心家的自供状出笼的政治背景。然而，**"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列宁全集》第九卷第二八一页）。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果断地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大野心家江青的女皇梦彻底破产，他们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这篇卖国求荣的自供状，则是刻在耻辱柱上的一份永远洗刷不掉的罪行录，将遗臭万年。

(原载 1977 年 3 月 26 日《解放军报》)

《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 (节录)

(一九七六年四月)

康立　延风

《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是其中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这个《汇报提纲》，是邓小平亲自挂帅，密谋炮制的，是他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条重要罪证。剖析这个提纲及其炮制过程，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到他在去年夏季前后一手刮起的右倾翻案风的来龙去脉。

现在让我们顺藤摸瓜，看一看这个提纲炮制的"三部曲"吧。

第一步，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

七月十八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走马上任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起草《汇报提纲》。后来，他在给邓小平的信中洋洋自得地表白："这一个月我是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文件上的"、"是拚了一点老命的"。

"拚老命"，是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帐的走资派积压了将近十年的心声，今天总算从牙缝里迸出来了。

他们为什么要在科学院这个地方"拚命"？原来，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就故态复萌，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亮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他一手伸向经济领域，抓那个臭名昭著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手伸向上层建筑领域，抓这个《科学院工作汇报提

纲》。邓小平声称："这个文件很重要，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直言不讳地供认了他所想达到的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邓小平看来，这两个文件就象围棋上的两只眼，抓住了这两点，复辟资本主义的全局就都活起来了。对于这样重要的一步棋，他们怎么能不"拚命"力争呢？

八月十一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带着一份墨迹未干的提纲草稿，跑到邓小平那里念了一遍。邓小平连连声称"很好"。

经过修改后的草稿，就再也不拿出去了，甚至对科学院的党的核心小组都实行"保密"。他们把稿子送给邓小平的参谋班子中的那个"理论家"。那个"理论家"心领神会，提起笔来就在稿子上勾画了一通：什么"不搞技术，政治就无所谓挂帅"啦，什么"对理论研究不应任意加以贬低、指责甚至污辱"啦，什么"不能简单依靠摘引几句经典著作加以逻辑的引伸就算完事"啦。他还特别强调，必须"突出一个'扭'字"。

八月十七日，科学院那个走资派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修改后的提纲初稿，一起送到邓小平手中。信中说："这一稿在几个关键地方是按你的指点改过的"，"我怀着一种渴望的心情，祈望得到你的进一步指点"。话是说得够肉麻的，但同时也把邓小平对于提纲的"指点"作用和盘托出了。

值得注意的是信中提到的"关键地方"。究竟哪些是"关键"？信中没有明说，但是那个"理论家"要突出的一个"扭"字，倒是给我们提供了线索。

他们要突出一个"扭"字，就必须把形势说成到了非"扭"不可的地步。提纲开头虽然写了一句"成绩是主要的"，但这种话不过是欲擒先纵，起点障眼法的作用。在"成绩"的下面，他们把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到处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片"危机"。

他们突出一个"扭"字，就是要把党的基本路线"扭"到"三项指示为纲"上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提出"科研要走在前头"。科学院那个走资派立即按照这个调门，大谈科研搞上去是一切工作的中心，说什么"所有整顿，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服务，为科研搞上去扫清障碍"，一切都要"围绕把科研搞上去"，"围绕着这个转"。这些话都是唯生产力论的最典型的语言，因为它很"关键"，因而在提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们甚至耸人听闻地说，如果不按他们这一套办，"总有一天，我们大家全部完蛋！"这是一句大黑话。

科技界也要"扭"，当然更不在话下。提纲完全抹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对科学发展的决定作用，鼓吹"不宜"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提倡"一个人、几个人""钻研"。提纲竭力诬蔑从工农兵中培养的科技人员"科学理论知识不足，进一步发展受到限制"。提纲的炮制者对从工农兵中选拔的科技人员视同洪水猛兽，竟然大乎"危险"，连连叫嚷要"关上门"．站上岗"，完全说明他们处心积虑要把科研领域搞成对于资产阶级毫无"危险"的土围子。

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六日，是炮制提纲的第二步。

八月二十六日，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亲自下令把修改提纲的任务交给了那个"理论家"。第二天，他就找那个"理论家"与科学院那个走资派面授机宜。他说："提纲要缩短，原则都保留，棱角磨掉一些，写得平稳一些。"本来是气势汹汹，唯恐"扭"字突出得不够，为什么突然要"磨掉"一点"棱角"呢？这里有鬼。

改动最大的是提纲第二部分。他精心编纂了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十条论述，并且加上"坚决地、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的标题。看起来很有"文化大革命后写文

件那些语言”，实际上却耍弄了不少阴谋诡计。

在这十条中，他根本不引毛主席的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关于深入开展上层建筑领域革命，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指示，不引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指示，这难道是偶然的疏忽吗？决不是。不然为什么你们口口声声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贯彻毛主席的路线，恰恰把最重要的指示给遗忘了呢？为什么对毛主席根本没讲过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么感兴趣，非把它塞进去不可呢？

他们确实也引了一些毛主席的指示，但是他们究竟是怎样引用的呢？断章取义、阉割灵魂，折中调和、偷换重点，歪曲原意、为我所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其余部分的修改，也都是精心体现着“原则保留，棱角磨掉”这个狡猾的进攻策略。提纲初稿中一根根棍子的“棱角”是磨掉一些了，而且煞有介事地加上了“修正主义仍然是我院的主要危险”的话，但这恰恰是一根更为刁恶的棍子。

就在这段话后面，他们来了一个“但书”，写了一大段文章：

“但是，同这种修正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或者夸夸其谈，以感想代替政策，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作随心所欲的片面解释，势必带来思想混乱、造成工作损失，甚至导致科技工作的严重削弱或取消，……这就仍然会陷入修正主义

原来，他们词典中的“修正主义”有其独特的含义。用他们的话来说，这种成为“主要危险”的“修正主义”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不同”甚至“相反”。看，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竟然就会出现“思想混乱”，导致“取消”科技工作，“陷入修正主义”。结论：批判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难道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奇妙的逻辑吗？很清楚，他们口中的“修正主义”，原来是强加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名。他们不是攻击文化大革命“理论不抓，科技不提”吗？他们不是声称“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存在着危机”吗？他们不是说“特别要强调干扰很大”吗？而这一切，据说都是在同刘少奇修正主义“作斗争”以后带来的。其实，邓小平本来就是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同伙，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他当然要痛彻心肺，恨之入骨。在这个提纲上，他们就是这样恶毒地给毛主席革命路线扣上一个“修正主义”的帽子。你看，既写上了“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这类冠冕堂皇的话，又把棍子打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这就叫“原则保留，棱角磨掉”！

与此同时，他们还赶编了一份革命导师论所谓“哲学不能代替自然科学”的语录，作为提纲附录。到九月下旬，经过反复琢磨，修改稿基本定稿。此时邓小平一伙是何等踌躇满志，洋洋得意啊！

于是，提纲的炮制工作进入了第三步。

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汇报提纲终于拿出来汇报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听取汇报的时候，对提纲的修改又进一步作了“关键”性的“指点”。

他们名曰“汇报”“科学院工作规划”，但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汇报到科学院所属科技队伍人数时，邓小平立即打断他的话头，强调要把不属于科学院管辖的科技队伍人数加进去，他说：“如果不算上，怎能说明重要性呢？”再一次点穿了提纲要管“全国科技队伍”，要以此作为

突破口、加紧全面地刮起右倾翻案风的"重要性"。

邓小平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哼哼哈哈地发了一大通议论。他反对工人阶级进驻上层建筑，叫嚷"强调依靠工农兵是相对的"。他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请命"，说："这些人是劳动者，科研是生产力。"积极参与炮制提纲的那个"理论家"赶紧为他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科学院的那个走资派汇报时说到，"现在不敢讲红专"，邓小平立即画龙点睛地作了发挥："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应该爱护、赞扬。""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坑不拉屎的好"。当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有余悸地汇报到怕抓辫子时，邓小平就给他打气壮胆："辫子也确实有一点，比我强一点，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要他放手大干。

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经一再强调："国家嘛，科研要走在前头。"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科技界应该打头阵。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心领神会，立即加紧了复辟活动。

九月二十八日，科学院的另一个走资派用十分明确的语言，点出了汇报提纲的主旨："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那当然只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了。

科学院那个走资派则忙着巡视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传达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指示"。他窜到半导体所，叫嚷："名不正，言不顺，首先要正名"、"说复旧就复旧，那是为工作嘛！不要以名词吓唬人。"他效法孔老二的"克己复礼"，甚至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批判过的孔老二黑话也搬出来当作宝贝，这不是很能发人深思的吗？

十月六日、七日，他继续奔走于心理所，电子所，进一步鼓吹业务挂帅，专家治所。他说："党委书记业务不懂，可以老实说：'所长，听你的'"、"敢不敢刮业务台风？搞业务的台风要刮起来，八级不够就刮十二级。"什么"业务台风"？不过是否定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党的领导的一股妖风！

四天后，即十月十一日，他又作了充分的表演，针对有人批评他是"大右派"，作了自我辩解："我看也是先验论"。是"先验论"吗？不见得。就在这次会上，他传达了邓小平的一段黑话：二十五年来我们的发展是不快的，工业发展不快，农业发展不快，科学技术发展不快，国防建设发展也不快。然后，话锋一转，胡说"形势大好"的一类话"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大概不可靠吧！讲疲了，讲的大家不相信了，你看损失多大！"这还不解恨，他又进一步用煽动性的语言说："很多同志对中央的决心抱怀疑态度。我经常说，过去几年有些同志讲了些不好听的话，怀疑政治，究竟算什么分子？什么言论？算资产阶级分子？右派言论？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确是一段妙不可言的独白。将这个走资派的"具体问题"作一"具体分析"，结论当然很清楚：你们炮制的这个提纲，同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纲领，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的那些公开的和大量秘密的把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言论和行动，同前几天在天安门广场上煽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亡命之徒，没有本质区别。你们"究竟算什么分子"呢？你们不是早已自己给自己做出了最恰当的政治鉴定吗？

教育界那个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也不甘落后。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曾两次指名道姓地点了他的将，要他出来说话："现在读书都成了问题了，你还不发表演说？"于是，他加紧行动，到外"发表"右倾翻案的"演说"。他叫嚷，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思想上混乱"。几天里，他一连几次提出要"追根"的问题，并且直截了当地说："根子在路线"。矛头所向，直指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据邓小平的授意，他准备依照科学院的汇报提纲，也如法炮制一个教育界的汇报提纲。他说："中央能批下来，问题好

办了"，"要不日子不好混"。为什么如此急不可待地也要炮制提纲呢？十月八日，他在研究炮制提纲的会上说："科学院得后继有人，中心问题是教育部门的问题。"这句话，总算把科技界和教育界的两股右倾翻案风扭在一起了。科技界"走在前头"，教育界保证"后继有人"，就象二胡上的两根弦，缺一不可，他们的配合是多么紧密啊！

上面提到的那个"理论家"也异常活跃。邓小平不是疯狂叫嚣"思想整顿是个关键"、"思想整顿量很大"吗？这个"量很大"的"关键"任务，自然落在那个"理论家"身上了。十月六日，这个"理论家"发表谈话，胡说"毛主席的指示在刊物上得不到反映"，因此要办一个"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狂妄地要夺党的理论宣传工作的领导权。与此同时，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大毒草炮制成功，准备在那个未出娘胎便夭折的刊物上发表。这篇奇文，把各种奇谈怪论都上升成为"理论"，提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

在这段日子里，邓小平以抑制不住的狂热心情，为资本主义复辟呼风唤雨。他肆无忌惮地叫嚷："半年来，我们讲的中心是'敢'字当头。"头子一声呼唤，喽罗跟着起哄。有的说：要"高举骨头"；有的说："看破红尘"，"打倒我也不怕"；有的说："我就是复辟派"；有的说："我是还乡团队长，今天又回来了。"有的甚至公然学着还乡团头子胡汉三的口吻，声称"历史的帐要冷冷静静地加以分析。"在邓小平的偏袒下，清华大学里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少数几个人，再次跳出来，把矛头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写黑信，造谣言，气焰十分嚣张。提纲的炮制者公然叫嚷："如果说他们（指清华那几个坚持修正主义路线的人）是打开一个小缺口，那么汇报提纲就是打开一个大缺口，全面铺开！"这伙人利令智昏，迫不及待地"全面"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了。

"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刮右倾翻案风的走资派颇喜欢谈论"历史"，那么让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历史吧。十年前，即一九六六年二月，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之际，刘少奇一伙也炮制过一个《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从思想体系上说，今天的这个《汇报提纲》，同当年的那个《汇报提纲》完全一脉相承，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有趣的是，在今天这个《汇报提纲》的主持者和炮制者中，有些人在当年"二月提纲"中也有着他们的一分"贡献"。两个"提纲"，一条黑线，表明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条规律——**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十年前炮制的那个"提纲"，是为了阻挠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他们今天搞的那个"提纲"，则是为了砍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然而，历史是无情的，那些坚持复辟倒退的顽固派，都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原载《学习与批判》1976年第4期）

毛主席已圈阅。

中共中央关于南京大字报问题的电话通知

(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

(一) 据了解，最近几天，南京出现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的大字报、大标语，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转移批邓大方向的政治事件。你们必须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全部复盖这类大字报、大标语。对有关群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借机扩大事态，进行捣乱、破坏。

(二) 对这次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要彻底追查。

(三) 所谓总理遗言，完全是反革命谣言，必须辟谣，并追查谣言制造者。

(四) 任何人不准冲击铁路。

吴德在天安门广场广播讲话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

同志们!

近几天来，正当我们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之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利用清明节，蓄意制造政治事件，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党中央，妄图扭转批判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提高革命警惕，不要上当。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立即行动起来，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大好形势。让我们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争取更大的胜利!

今天，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

(新华社 1976 年 4 月 7 日讯，载 4 月 8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载4月8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新华社1976年4月7日讯，载4月8日《人民日报》）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

《人民日报》工农兵通讯员　《人民日报》记者

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

四月五日，这种反革命活动达到了高潮。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九点以后，人民大会堂门口围了一万多人。广场

上人最多时，估计近十万人。这当中除极少数制造事端的坏人外，绝大多数是过路围观的群众。一部分人在纪念碑周围，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场西边、人民大会堂东门处。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他们头上都被打起了几个大血包，脸浮肿，流着血。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一个警卫战士出来劝阻几句，立刻被闹事的坏人把领章、帽徽全扯撕掉，衣服被撕开，打得满脸是血。这些坏人还猖狂说："这个场面谁镇得了，中央没一个人治得住，他要是来今天也就回不去了！"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许多群众极为气愤地说："从解放以来，天安门广场一直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革命群众的地方，绝不容许发生这样的反革命事件！"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被闹事的坏人阻割成几段。这帮坏家伙还不断狂呼反动口号，人群中谁要反对他们，就被这帮家伙乱拳猛揍，打得头破血流。有的人被打后还拉到纪念碑前罚跪、"认罪"。

十一时五分，许多人又涌向天安门广场东边的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前一个女同志出来劝阻，马上被拉去打了一顿。这时，有一帮坏人围着广场东南角、钟楼旁边的一座解放军营房，砸了门，占了房子。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拿着半导体话筒，轮着用嘶哑了的声音煽动。将近十二点，有的闹事的人还宣布成立什么"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一个戴眼镜的坏人扬言限公安局十分钟答复，不答应条件就砸烂公安部门。

十二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排队向营房走去。闹事的坏人竟煽动地高呼："人民子弟兵与人民站在一起！""受蒙蔽无罪！"继后，一辆上海牌小轿车被他们推翻在地，点火烧毁。被派去的消防人员、警卫战士都被阻，一辆消防车被破坏。这些坏家伙说灭火就是"镇压群众运动"，好几个消防队员被打出血。

十二时四十五分，一队人民警察赶来支援，也被轰被阻。好几个人民警察的帽子被闹事的人摘下抛向空中。还有人向人民警察队伍中扔小刀、匕首之类的凶器，有几个民警被围打。

当日下午，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加猖狂。他们烧毁了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和公安部门的汽车，一共四辆。五点左右，这伙坏人又冲进那座营房，带走和殴打了门口的警卫战士，砸开底楼的窗门，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收音机、被子、床单、衣服、书籍等全部都被这帮反革命分子扔进火堆，还烧毁和砸烂了首都工人民兵的自行车数十辆。现场黑烟冲天，一片反革命喧嚣声。营房的玻璃几乎全被砸碎，接着他们就放火烧着了这座营房。

广大革命群众对这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极为仇恨。但这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这就是群众的力量。"还狂妄地说："现在谁也管不了，来一个团一个军也不顶用"等等，反动气焰极为嚣张。

请看，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以极其腐朽没落的反动语言，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的。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伙反革命分子所谓反对"秦皇"，要"真正的马列主义"，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这伙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吹捧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暴

露了他们要在中国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这几天里，这帮家伙不仅写反动诗词，而且贴出反动传单。他们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他们胡说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还恶毒地攻击诬蔑说："最近所谓的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的翻案活动。"这些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反革命气焰嚣张至极。

但是，反革命分子猖獗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他们非常孤立，不得人心。就在这伙坏家伙制造事端、行凶作恶、捣乱破坏的时候，许多革命群众勇敢地站出来斥责他们的反革命行径，同他们斗争。广场上执行任务的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和在场的革命群众，紧密配合，英勇战斗，用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

下午五时，这一小撮坏人再次放火烧那座营房时，警卫战士冒着生命危险，进行救火。为了保护人民大会堂的安全，首都工人民兵一百多人被打伤，重伤十余人。警卫战士被抓走六人，多人受伤。人民警察始终冒着危险在战斗。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的领导同志，在营房被困、火烧到二层楼的危急情况下，仍在三层楼坚持斗争。电话员在紧急时刻，沉着机智地向有关领导部门报告了消息。

晚上六点半，吴德同志的讲话广播后，广场上过路围观和受蒙骗的群众绝大部分都很快离开。但是，还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继续顽抗，他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周围又贴出了一些反动诗词。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英雄的首都民兵士气大振，雄赳赳、气昂昂地排着队伍，开进天安门广场，进行有力的反击。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广大革命群众拍手称快，全市人民热烈拥护，一致赞扬首都工人民兵、人民警察、警卫战士的革命行动。

(原载 1976 年 4 月 8 日《人民日报》)

〔附〕 天安门事件真相

——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人民日报》记者

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天安门事件昭雪平反了！

天安门事件根本不是什么"反革命政治事件"，而完全是革命行动。这是人民的结论，历史的结论。真理战胜了邪恶，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我们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的伟大胜利，是坚持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伟大胜利。

人民日报社曾经被"四人帮"篡夺了领导权，成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个重要工具。天安门事件前后，"四人帮"及其心腹利用《人民日报》搞了许多假情况，造了许多谣言，上欺中央，下骗群众，对导致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们在四月八日抛出的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歪曲事实，诬蔑群众、陷害邓小平副主席；其后又利用这一事件，大作文章，疯狂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犯下了大罪。人民日报广大职工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揭发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犯下的大量罪行。现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了，人民日报职工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同时也深感有责任把被颠倒的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公之于众。

一、事出有因　绝非偶然

天安门事件绝不是偶然的，它的发生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背景。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林彪、"四人帮"就结成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搞得我们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八亿人民早已积怒在胸，忍无可忍。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更加疯狂反对周总理和其他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一九七五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四人帮"展开斗争，在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工作，给遭受林彪、"四人帮"灾害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可是，为时不久，这一线生机，又被"四人帮"假借"评《水浒》"所刮起的乌云遮盖了。冬天，邓小平同志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为什么好人总是挨整，坏人如此猖狂？为什么我们的国家灾难如此深重？人们心里的问号越来越多，疑团越来越大。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中国人民失去了擎天巨柱。人们眼泪流成河，忧虑堆成山：国家怎么办？民族怎么办？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不准人们佩黑纱，不准戴白花，不准开追悼会，人们无处寄托自己的哀思，也无法抑制心头的怒火。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深切怀念，抗议那些无理的禁令，首都人民伫立在十里长街，哭送自己的好总理；把自己制作的花圈献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自己撰写的祭文。周总理的光辉鼓舞亿万人民，把他们汇合在一起，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人们擦干伤心的眼泪，咬紧愤恨的牙根，注视着斗争的动向。

三月五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一篇报道中公然删去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三月二十五日，《文汇报》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马上看出来，这射向周总理的两支毒箭，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危险信号。

《文汇报》制造的这两起反对周总理的事件，成了天安门事件的导火线。三月二十九日，英勇的南京人民在街头贴出了"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等革命标语，并纷纷走向雨花台，向周总理敬献花圈。当上海开往北京的列车路经南京时，南京人民又把标语刷在车厢外面。这辆列车飞过长江、越过黄河，把南京人民斗争的信息传遍了津浦路，传到了北京。北京人民对于《文汇报》的这种反革命行径，早就义愤填膺了。工厂里、学校里、机关里、部队里，到处议论纷纷。捍卫周总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斗争，再一次把人们吸引到天安门广场。一场惊天动地的斗争开始了。

二、悼念总理　讨伐“四害”

这是一场用花圈和诗歌为武器，向窃踞高位的“四人帮”猛烈开火的特殊的战斗！

三月三十日，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的曹志杰等二十九位同志，第一个把悼念周总理、决心同资产阶级“血战到底”的悼词，贴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的五四运动浮雕下面。一个一个献给周总理的花圈送来了，一份一份歌颂周总理丰功伟绩的诗词贴出来了。到四月三日，花圈已达几千个。送花圈的单位有中央机关、国家机关、解放军总部机关、北京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人民公社，还有天津、湖北、沈阳、陕西等外地来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队伍有的几十人，有的几百人，有的几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组成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高唱《国际歌》：“起来……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看吧：这是中国科学院一O九厂的队伍。他们举着大幅诗牌，穿过王府井大街等闹市区，走进天安门广场。那四块诗牌上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人们看到这反映亿万人民心愿的诗句，心情是多么激动啊！许多群众跟着队伍边走边抄。不到半天工夫，这火与剑一般的诗句传遍了全北京城。

这是国营曙光电机厂三千多名职工的队伍。一清早，他们就汇集在东长安街上，抬着三十四个大花圈，组成八路纵队，以周总理的遗像为先导，在哀乐声中缓步从东单来到天安门广场。一路上，交通民警为他们开放绿灯，鬓发斑白身穿军装的老战士肃立敬礼。进入广场，队伍绕场一周，许多前来悼念的群众自动参加到这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队伍中。

这是北京广播器材厂一千多名职工的队伍。他们胸戴白花、臂缠黑纱，冒着蒙蒙的细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许多职工边走边哭。过路的解放军战士，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商店里的顾客，纷纷走上前去，向他们表示敬意。

四月四日，是清明节，星期天，天安门广场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虽然“四人帮”下了这是“鬼节”，不许悼念的禁令，但是首都人民不怕跟踪盯梢，不怕打击陷害，扶老携幼，争先恐后，象狂流巨涛一般涌向天安门广场。仅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群众就达二百万人次以上。整个广场淹没在人潮花海之中，各式各样精致的花圈从广场的北侧一直排到纪念碑的南端。“敬爱的周总理我们永远怀念您”的方框大匾，悬挂在纪念碑前的十三根旗杆上，横贯整个天安门广场。在蔚蓝的天空中，飘着两只黄色大气球，白色飘带上一边写着“怀念总理”，一边写着“革命到底”。天安门广场的气氛更加肃穆，更加悲壮，更加激动人心。

这是一个诗的海洋。整个纪念碑周围贴满了诗词，广场贴不开了，就向南面的松树林发展。人们在树林中拉起一根根绳子，上面挂满诗词和条幅，形成一条条峰回路转的“诗廊”。一首首铿锵有力的诗词，表达了人们心头的爱和憎。这些充满激情的战斗诗篇，燃烧着千千万万赤诚的心，表达了八亿中国人民热爱周总理、痛恨“四人帮”的阶级感情。人们高声朗读，俯首抄写。

听吧，这是一首七言诗：“揭竿淞沪震亚东，八一南昌军旗红。万里长征献赤胆，弹雨枪林一心忠。滚滚延河育劲草，巍巍宝塔育青松。龙潭虎穴斗山城，舌剑唇枪战顽凶。艰苦卓绝三山移，碧血凝染五星红。反帝反修创伟业，为国为民立奇功。人生自古谁无死，独留丹心化大公。”

这是一篇散文诗：“他没有遗产，他没有嗣息，他没有坟墓，他也没有留下骨灰。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富有全国，他儿孙好几亿。遍地黄土

都是坟，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他也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他是谁？他是谁？他是总理！……

在广场的人群中，北京铁路分局青年工人王海力，双手举起在白绸上写的血书“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许多人看了血书，热泪夺眶而出，争相和他握手。

这是声讨“四人帮”的战场。人人义愤填膺，人人口诛笔伐。北京崇文区化学纤维厂孙正懿同志写的一首诗：“翻案图穷匕首见，攻击总理罪滔天。青江摇桥闪鬼影，反罢河妖红霞现”，用“谐音”点了张、江、姚的名。诗一贴出去后，围抄的群众水泄不通，还写了许多“好！”“妙极！”“真好！”等批语。在纪念碑前，还贴了一首署名“新人”的诗《清明节呐喊》，诗中说：“今朝扫墓，变本加厉。言称破旧，用心何毒！‘电话通知’，诬人造假。‘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辽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裹挟天子，以令万家。宁左勿右，一如林家。”这首诗把“四人帮”的野心和手法，揭露得淋漓尽致。传颂传抄者，络绎不绝。

在纪念碑东侧，有一首诗署名“心明眼亮细读诗，真名实姓一工人”，引人注目。这首诗写道：“三人只是一小撮，八亿人民才成众。赫秃清江掀逆浪，敢反潮流碎资梦。”当念到“三人”时，群众自问：“是谁？”又自答：“不问自明！”念到“一小撮”时，朗诵者解释：“撮字，就是提手边加一个最坏的最字。”人们正是从这反问、哄笑声中，发出了对“四人帮”的嘲弄和蔑视。

天安门广场是历史的见证。这里曾经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曾经是中国人民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现在，这里又成了声讨“四人帮”的雄伟战场。为了把这历史的画卷留下来、为了把这时代的呐喊录下来、许多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拍了很多珍贵的照片，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刘万勇夫妇，甘肃有色金属公司的任世明兄弟藏着录音机、穿行在人群中进行录音。遗憾的是，当时没有可能拍摄影片。但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这壮丽的篇章，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史上这光辉的一幕，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

三、王张江姚　密谋策划

从南京的雨花台，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人民革命的波涛，汹涌澎湃，王张江姚濒临灭顶之灾，终于举起屠刀，向人民下毒手了。

他们一开始，就把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定为反革命活动。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就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四月二日，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的革命烈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姚文元对那个心腹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同日，他在给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清明节是旧习惯”，“现在天安门前纪念碑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四月四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告诉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这就说明，定性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不是什么因为四月五日发生的烧、打，而是“四人帮”早有预谋，早已定性的。所谓烧、打，不过是他们的借口，其实罪名早已定下，罗网早已张开，对革命群众的一场血腥镇压早已策划好了。

他们下令对到天安门广场去的人要用法西斯特务手段，跟踪盯梢进行迫害。王洪文亲自给他们在公安部的一个党羽打电话说："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那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破案嘛！"张春桥提出要派便衣，说："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十分嚣张，三月三十一日他就派出便衣，以"群众的面目出现，观察情况，注意动态，把念的小字报、贴的诗词都记录下来，全部报告。"四月二日，这个黑干将连续召开三次紧急会议，部署"还要准备三千人"，作为"随时出动的机动力量"，"监视跟踪，查明下落"，"当场扭获"，"不便扭获的，就跟出广场扭获。"四月四日，这个黑干将又部署："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要作好准备，组织好"。四月三日到四日，他们就抓了北京市自行车一厂工人魏海涛、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等二十六名悼念周总理的群众。

为了进一步镇压群众，姚文元竟拿蒋介石死日作借口。（编者按："人民公敌蒋介石是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死的）他在四月四日说什么："（送花圈）这个行动不是不理解了，国民党和我们捣乱。有些群众要求延长到六号，六号是国民党的日子，要坚决制止。"北京市公安局那个黑干将也叫嚣："移走花圈，不给阶级敌人继续活动的场所。"人民群众向自己的总理献花圈，竟成了配合国民党，成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天深夜，他们调集了二百辆卡车，把花圈扫荡一空。

人民群众含着泪水精心制作的花圈，被任意践踏，镶嵌总理遗像的玻璃镜框被砸碎了。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自己的战友的悼念周总理而被一个个押上警车，关进牢房，怎能不难过，不气愤？中国人民难道能够被这种气势汹汹的鬼蜮行为吓倒吗？难道能够不起来保卫周总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吗？不，英雄的人民群众是不会屈服的。这样，四月五日的激烈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四、还我花圈　还我战友

四月五日清晨，群众走到天安门广场，竟看到这样一幅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条幅都不见了，地上是一滩滩的水，纪念碑周围是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人们心里骤然一冷。

北京一七二中的三十多个同学，抬着花圈，迈着沉重的步伐，走近纪念碑。人们让开路，鼓掌支持。守卫人员把他们拦住，花圈献不上。

"为什么不让我们上纪念碑？"

"要修理。"守卫人员按规定的口径回答。

"为什么早不修晚不修，偏偏今天修？"

守卫人员无言对答。

群众又追问："为什么不让我们献花圈？"

就在争辩的时候，北京整流器厂工人吕德俊，听到一个穿蓝制服的人说："大家不要受反革命分子挑动。别再闹了。别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这篇阵话也被北京化工学院陈子明等人听到了。群众说这人是在攻击周总理，就追上去打。这时，有两名公安人员上来解围，群众发现他们是便衣，怒火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其中一个飞步跑向人民大会堂，群众从后边追，一直追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

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已经有上万名群众聚集在那里。他们以为花圈被收在大会堂的地下室，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设在广场东南角小楼里的指挥部诬说群众要冲人民大会堂，马上给东观礼台下的交通指挥所打电话："赶快出去宣传、讲清时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当时接受任务的北京市公安局交通处的乔厚传同志，将喊话内容记在本子上，由广播员照念。广播车沿着大会堂东侧由北向南来回行驶，连续广播。当广播车转第三圈时，群众围上去，纷纷质问：

"你们说悼念活动已经过去，是谁组织过我们悼念总理？悼念活动从什么时候算起？"

"阶级敌人指谁？是谁在破坏捣乱？"愤怒的群众把车推翻，把车顶上的喇叭砸了。人们看乔厚传是个干部，就把他从车里拉出来说："你们不叫我们悼念周总理，还有一点良心没有？""如果你不反对周总理，那你就喊'谁反对周总理我们就打倒谁'，'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

乔厚传同志尽管受到群众的围攻，但他内心同情支持群众的行动，此时就呼了这些口号。群众说："他们也是执行者，放他们回去。"这就是所谓砸广播宣传车的原委。乔厚传同志因此被"四人帮"在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认为是经不起考验、斗争不坚决的人。

九点左右，还有很多人在大会堂东门口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并高呼"人民万岁"等口号。这时一个身材不高、身穿工衣的人跳出来说："人民万岁的口号不对，人民也分阶级"，"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在场的北京市西城区棉纺织厂工人王维衍、北京大明眼镜行工人李金生等同志听到这些鬼话，非常气愤，上去教训他。群众主动拉起保护圈，把他围在中间教育。北京铁路局工人岳存寿质问他是那个单位的，他拒不回答，后来从他兜里找出了一张清华大学机械系的听课证。群众见他很顽固，就拉到纪念碑前责问。北京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问："你为什么要攻击总理？"这个人说是上海《文汇报》上说的。接着，群众就把他押到中山公园派出所，要求严肃处理。

十点左右，汇集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群众已达数万人，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这时，指挥部的头头指示，派民兵和部队围住大会堂。当部队、民兵同群众对峙时，水电部工程二局工人侯玉良等人，朗诵了《敬告工农子弟兵》的诗："人民子弟兵，你们聆耳听。今天人民悼总理，不许你们胡乱行。你们的军装是周总理长征吃过的草根来染成，你们的枪刺是我们工人的机器来制造，你们的身体是我们农民的粮食来铸成，你们的父兄姐妹盼望你们猛冲在和敌人的斗争中……"这诗，深深地感动了解放军战士。他们纷纷说："我们和大家一样心情"。许多工人民兵感动得流下泪，纷纷扯掉袖标，撤了下去。侯玉良还拿出他起草的成立"首都人民悼念总理委员会"的倡议，宣读后，群众振臂欢呼。

十一点多，一个青年拿着半导体话筒说："大家看那座小楼，那是联合指挥部，昨天夜里收花圈、抓人，都是他们指挥的。现在我们去同他们交涉，要花圈要人！"然后，他宣布，排好队，遵守纪律。接着，人们手挽手，唱着《国际歌》，横穿天安门广场。知识青年刘迪（就是被"四人帮"一伙称为小平头的一个同志）看到那个青年已受人注意，为了掩护他，就主动拿过话筒，指挥队伍来到小楼前。群众提出派代表进楼谈判，侯玉良和北京特艺机修厂工人赵世坚、北京八十六中学生孙庆柱、北京化工学院学生陈子明等站了出来。当谈判代表进楼后，刘迪等同志在楼外领呼口号："毛主席万岁！""给人民以纪念总理和先烈的权利！"他们还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许打人；二不许破坏公物；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十分钟过去了，代表们没有出来，群众很着急。刘迪又把三条纪律重复念了几遍。不一会，代表们出来了，说楼内根本找不到负责人。是指挥部的头头不在吗？不！他们乘的上海牌小轿车、"212"

吉普车，明明停在小楼外边。他们是避而不见，是在捉弄群众。群众的感情受到压制，遭到捉弄，更加激起了愤怒的火焰。在人民的天安门广场上，为什么有收花圈的自由，没有献花圈的自由？有攻击总理的自由，没有捍卫总理的自由？

下午一点五分，当愤怒的群众知道停在小楼外面那辆上海牌小轿车是指挥部的头头坐的，就把它推翻烧着了。

二点四十分，指挥部两辆吉普车被烧。

二点五十五分，一辆面包车给工人民兵送饭来了，群众说："我们从清晨到现在什么也没吃，倒让他们吃饱肚子镇压我们！"于是一气把车推翻，烧着。

五点零四分，指挥部小楼也被群众烧着了。

当时，在场的有几万名群众，他们不去救火，这是为什么？难道人们不知道疼爱国家财产吗？难道人们不知道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吗？人们当然知道。但是，群众却从内心支持这种行动，因为这个行动是对"四人帮"法西斯暴行的反击，是对白色恐怖的抗议！

五、四五之夜 一片恐怖

当小楼起火后，指挥部的领导们接到撤退的命令，在"首长先走"的嚷嚷声中，一个个从窗户爬出去。晚上七点，公安局的黑干将下达命令："今晚搞统一行动，组织要严密，准备武器、可以带棍棒，铐子。"

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就要开始了，数万名群众的心灵蒙上一层阴谋。人们又涌向纪念碑，向总理的英灵告别。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我们永远怀念周总理"的口号，用呜咽的声音朗诵北京电视机厂工人景晓东新贴出的怀念总理的抒情诗《告别》："我多想，多想生出凌云的翅膀——飞上九霄，把您的忠魂探望；再听听您那深情的教导，再看看您那慈祥的目光。我多愿，多愿是那月里的吴刚——把最醇的美酒、为您捧上……但我只有悲痛的歌声能向那九霄轻扬；我只有这哀悼的诗句能在您的灵前献上。"

当群众不断离开广场时，指挥部的一个头头正在四处打电话："队伍集合得怎么样？要快、动作要快，再晚人都走光了。"九点三十五分，广场的灯一下都亮了，对人民的镇压开始了。

请听听那些受害者的控诉吧：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共产党员孟连说：我正在纪念碑南侧抄诗，看见有人追打四散的群众。我心想不好，赶紧收起笔记本，绕到纪念碑北侧。只见北面也涌来好多人。我急忙跑下台阶，想冲出包围圈，但已来不及了。他们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舞着棍棒劈头盖脑打来。猛然一脚，我被踢倒在地，十多个人围着我，连打带踢，直打得我头晕目眩，不能动弹。等到我慢慢清醒了一些，才感觉还有一个人压着我的腿，胳膊旁边也躺着另一个人。不远处传来有人挨打的惨叫声。我想：你们打我们手无寸铁的群众，算什么能耐?！后来，他们发现我有抄诗的本子，便把我连夜押到监狱。

北京汽车二厂工人阮南南说：我看着四、五个人追打一个青年，其中一个照着那青年的后脑勺狠狠击了一棒，那青年一声惨叫，倒在地上。我跑到广场东南角，只见一些人从纪念碑那里走来，恐吓驱赶群众。有一个还叫着："革命的同志快离开广场，反革命的留在广场……"。我气愤地说："好！我们走，我们是革命的，留下的可是反革命的。"那个人大吼："抓住他！"其他几个人冲过来，拳头、皮鞋照我头部、胸部、腹部猛烈袭来。我被打倒在地，扣子

被扯掉，棉衣、衬衣被撕破、裤子也给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他们连踢带打，把我拖到纪念碑下。一个人过来搜我的身，还用皮鞋猛踢我的脸，踢得我口鼻流血，休克过去，等我醒过来，只见一个人用皮鞋把我流在纪念碑上的血迹擦掉。大约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被押到中山公园，在凛冽的寒风中站了几小时。后来，我被关进牢房。……

那天晚上，二百多名革命同志，在天安门广场被拘捕了。"四人帮"的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蔓延到全国。

六、造假情况　欺骗中央

天安门事件被"四人帮"诬陷为反革命政治事件，同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社的《情况汇编》有直接的关系。所谓"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这种提法，最早是在《情况汇编》上出现的。

从四月一日到六日，"四人帮"通过其在人民日报社的心腹指挥记者突击采写、编发了十多期关于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情况汇编》。有时一昼夜出三期，有时搞"不宜印发"的手抄件。这些《情况》完全是按照"四人帮"事前定的调子采写、编辑，经他们的心腹挑选炮制，再送姚文元修改审定印发的。

他们把悼念周总理诬蔑为"借悼念总理为名，恶毒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他们竭力歪曲、掩盖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即使记者写的情况中涉及一些悼念的内容，姚文元也千方百计地砍掉，或者加以歪曲、诬蔑。四月三日《情况》中提到在纪念碑北侧的栏杆上，贴着不署名的标语，"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姚文元气势汹汹地加了一句批语："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完全一样。"四月四日的《情况》，登了一首署名"敬周试作"的《满江红》："千古华土，脱蛹几只新苍蝇，嗡嗡叫。得宝成精，自鸣得意。伟人光辉形象在，岂容小虫来下蛆。激起我满腔怒火燃，拍案起。志同者，团结紧，捍卫咱，周总理。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把"捍卫咱，周总理"以上的句子删去，在末尾加上："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有一张署名"青年工人杨光明"的悼念总理的小字报，写道："历史将无情地宣判那些竟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翻总理的案，损毁磨灭总理伟大光辉形象的人不得人心。这些人民的败类，社会的渣滓，必将成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千古罪人和公敌。"姚文元加了"从这里可以看出，这股猖狂的逆流，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政治行动。"

四月三日《情况》清样里登了署名"青年工人丁亮"写的一份《倡议书》，充分揭露了"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面目，结尾指出："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明明是斥责"四人帮"的，但是，姚文元却把《倡议书》全文删去，恶毒地将"说共产主义空话"篡改为"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姚文元还就科学院一〇九厂写的那有名的"碧血再开革命花"的诗句，凭空加上一句"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广场上贴过一张题为《某公三哭新谱》的散曲，从全诗的内容来看，是反对刘少奇、林彪和江青的。姚文元及其心腹为了加人以罪，在四月四日的《情况》中，没有引用一句原文，就说它是"以极其恶毒的语言，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这种卑劣的做法，充分暴露了他们千方百计把天安门事件打

成反革命事件的险恶用心。

他们蓄意歪曲天安门广场烧打真相。四月五日的《情况》中登的那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开头就说："今天清晨七点多钟，有人看见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没了，便聚众抗议"。这里，姚文元把"有人"改为"一小撮坏人"，"聚众"改为"煽动一伙人"。文中接着说："八点左右，一辆市公安局的广播宣传车被砸，车子被推翻在地，车身和喇叭都被砸扁了。"可是，群众为什么砸广播车，《情况》只字不提。在谈到打人时，《情况》原来写道："有十来个小伙子，分别被闹事的人围打。据闹事的人说，其中两个是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一个是解放军。他们公开说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但是，姚文元公然把恶毒攻击周总理的这句话砍掉了。这样，打人的起因再看不出来，事实真相完全被歪曲了，事情的性质根本改变了。结果，捍卫总理的革命群众变成了"一小撮坏人"，攻击总理的人竟成了受害者。在烧汽车、烧楼房问题上，他们也采用同样卑鄙的手法。提到烧汽车的《情况》，原稿写有"现场黑烟冲天，一股橡皮气味……"被改为"一片反革命喧嚣声。"原稿还有一句："现场指挥部楼前都是青年人"，被改为"参加这次反革命事件打先锋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姚文元及其心腹就是这样歪曲、颠倒事实真相的。

"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这样不择手段地编造假《情况》，为"四人帮"疯狂镇压群众立下了汗马功劳，难怪江青、姚文元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接见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等人时，连连赞赏说这个"小报"（指《情况》）"有时比几百万张（报）的作用大"；人民日报那个心腹也曾经那样得意地说，他们搞的《情况》"起了重大作用"。

七、拼凑黑文　流毒全国

在这些歪曲事实的《情况》的基础上，由"四人帮"亲自指挥，炮制了那篇臭名昭著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假报道。

那是四月七日上午的事。七时左右，姚文元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你和写天安门广场情况的记者马上到人大会堂来，带着那几期刊登广场事件的《情况汇编》来。"

"四人帮"这个心腹带着他手下的几个人到了人大会堂，一见面，姚文元就洋洋得意地对这个心腹说："大好事，大好事！你们把反映天安门事件的几期情况，编成一篇公开报道！"快到中午时，姚文元把他的心腹等人带到东大厅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见面，把这些"有功人员"一一介绍给他们。

姚文元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说："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并煞有介事地安慰说："你们挨打了没有呀？"

王张江姚及其心腹欣喜若狂。王洪文首先举杯说："都干一杯！"江青也一一敬酒表示祝贺。

张春桥对如何写报道作黑指示。他杀气腾腾地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

姚文元接着说："有的坏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就是为邓小平歌功颂德。"

"四人帮"的心腹立即带着那几个记者将这几期情况改编为报道。

姚文元又授意他们："春桥不是说了吗？这些家伙就是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事件的头子纳

吉。要把这些话写上去。还要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引进去，这样更有力量。"姚文元还对报道的每个细节和提法都作了黑指示，他们都一一照办。

在编写这篇报道的过程中，王张江姚一直在直接指挥、亲笔修改，姚文元还对他的心腹说："要快，写好一页送一页回去排印，用我的警卫车去送稿子。"从上午开始到下午掌灯时分，在这帮"刀笔吏"的黑手下，一篇制造大冤案的黑文出笼了。

这篇报道把天安门事件诬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根据，是一首所谓"反革命"诗。我们先把当时登载的这首诗抄录如下：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血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这篇报道把这首诗说成"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完全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等等。罪名大得很呀！当时许多读者心里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一首诗前后格调完全不同？前四句是五言旧体诗，后边是自由体诗，哪有这样不伦不类的东西呢？现在查清，果然不对。它根本不是一首诗，而是两首拼凑起来的。当初拼凑时，有人曾提出把前四句删掉。姚文元说："有剑出鞘，不能删。"姚文元们所以要拼凑这首诗，就是为了要把"剑"和"秦皇"联起来，借以诬蔑作者是在影射攻击毛主席。作这种东拼西凑的办法栽赃陷害，是罕见的。

"扬眉剑出鞘"的剑，不是指向毛主席的，而是指向"四人帮"的。那么，"秦皇的封建社会"是不是影射毛主席的呢？去年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这首诗在天安门广场重新张贴出来，使我们得以看到了它的全貌。它的题目是《清明悼周总理》，现在我们把全文发表：

敬爱的周总理，
您的儿女对不起您，
您的英灵至今不能安息。
掏尽红心，
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
挥尽血泪，

难倾满腔悲愤思绪。
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
功高日月，声震环宇。
国际史上，
永载您的音容笑貌；
革命路上，
踏遍您的稳健足迹。
风云涌，鬼神泣，
巨星一陨天地哀，
四海五洲下半旗。
可笑群魔不自量，
妄想重翻腥风血雨。
鼓唇摇舌，捧裙牵裾，
猿猴沐冠，什么东西！
蚂蚁缘槐夸大国，
蚍蜉撼树谈何易。
让那些家伙看看吧：
天安门前花似雪，
纪念碑下泪如雨。
你们不念我们念，
你们不祭我们祭。
总理精神万代传，
子子孙孙举红旗。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我们信仰马列主义。
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见鬼去吧！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
我们不怕抛头洒血，
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
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
四个现代化日，
我们一定设酒重祭。
安息吧，
敬爱的周总理。

这首诗完全是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诗中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对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今天读起来，我们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作者也怀着满

腔的愤怒，声讨“四人帮”。读着那犀利的诗句，心中又是多么痛快、多么解恨啊！但是，这首诗选登在《情况》上时，“四人帮”的那个心腹，先把“四海五洲下半旗”以上的诗句删去了，到了姚文元手里，他又把“可笑群魔不自量”到“蚍蜉撼树谈何易”删去了，而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时，张春桥、姚文元又把“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等句子删去了。这样，原诗就面貌全非了。至于诗中“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也是针对“四人帮”的，是对他们结帮营私，控制舆论工具，搞“帮天下”的那种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控诉。紧接着这句诗的后面，作者明白地表示：“我们信仰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不怕抛头洒血”，“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走毛主席的革命道路，这怎么能扯得上反毛主席呢?! 怎么能同林彪《“571工程”纪要》硬联系在一起呢?! 真是荒谬绝伦。这是姚文元对这首诗的作者的陷害，也是对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广大群众的陷害。

在编写这篇报道时，张春桥、姚文元还出了一些歹毒的主意。为了把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打成有“幕后策划者”指挥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姚文元说，要把“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的反革命的政治事件”这句话写上，为他们打倒一大批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制造反革命舆论。在所谓“冲人大会堂”、烧楼房问题上，张春桥看了稿子说：“几百个民兵排着队走上大会堂干什么？去参观？目的性没有说清楚”，结果在报道中改成“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造成似乎有人要冲人民大会堂的假象。他还说：“把烧楼房改为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结果将楼房改为“解放军营房”。经他们这一连串的篡改，捍卫周总理光辉形象的革命人民竟变成了“暴徒”，无辜的群众变成了冲击人民大会堂的罪人。张春桥、姚文元就是这样造谣欺骗、蛊惑人心，进行反革命煽动的。

四月八日报道发表后，广大读者纷纷来信来电话提出强烈抗议。四天之后，报社收到一位署名“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一封信。信封的正面写道：“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戈培尔编辑收”。信里装着四月八日《人民日报》的一、二版。这位民兵同志在报上批了很长一段话，现摘录几句：“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与（予）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得住吧？事实能歪曲吗?”“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诡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明明是你们编造的诗词拿来说是天安门广场的，谁人不知是江家小朝廷的?”“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这就是革命人民对这篇假报道，对“四人帮”的最有力的回击。

八、揪总后台　陷害忠良

天安门事件期间，邓小平同志完全处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跟事件毫无关系。“四人帮”为了将邓小平同志置于死地，竟说他是事件的总后台。

群众对“四人帮”疯狂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尽管愤愤不平，但在天安门广场活动的最初几天，在诗词、传单中，未见提到邓小平同志，“四人帮”及其心腹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有一次，人民日报的《情况》登了一期所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的罪证照片，姚文

元看后大发雷霆，立即打电话给他的心腹说："为什么用这些照片？杂乱无章，有打破头的，没有一张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为了搞"与邓小平有关系的"，他们就搬出封建社会株连九族的卑劣手法，从邓小平同志的亲属身上打主意。邓小平同志有个女儿在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该所送了两个花圈到天安门广场。"四人帮"及其心腹得知此事，喜出望外，要记者快写情况。其实，邓小平同志的女儿当时生病在家，既未参与做花圈，也未到天安门广场。即使这样，记者还是写了情况，用了"邓小平女儿所在的科技处做的花圈上写着"这种别有用心的句子，说明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的活动，同邓小平同志有关系。"四人帮"的帮派骨干得意洋洋地说："不要以为只一二百字，可重要啦！"

四月四日晚上九点，"四人帮"的心腹派的记者在纪念碑西南角看见几千人围着听《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全文是：

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一、七四年一月，江青扭转批林批孔大方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二、七四年十二月，江青背着中央接见外国传记记者，诬蔑中央领导同志，在四届人大争当总理。

三、七五年一月，主席识破了江青，按周总理的意图召开了四届人大，取得了斗争的初步胜利。

四、七五年七月，毛主席批评江青，停止其在中央的工作。在周总理患病期间，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全国人民大快人心。

五、最近所谓反右倾斗争，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翻案复辟活动。毛主席说："翻案不得人心。"这些人翻历史的案成了过街老鼠。

这张传单引起广大群众的注目和拥护。记者马上赶回报社汇报这一情况。"四人帮"的心腹如获至宝，抓起铅笔记在日历上，立即把传单的内容打电话报告姚文元。姚文元听了，大声叫好。这个心腹还要汇报群众反映，姚文元说："够了！下面的不要说了，我正开会，快散会了，我要到会上说一下。"这个心腹马上让人把传单抄下来，火速送姚文元，题目叫《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

在炮制《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时，姚文元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尔后，凡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评论、文章就把什么"邓纳吉"啦，什么"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啦，什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根子"啦，种种诬陷不实之词，加在邓小平同志的头上。特别是"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作组与梁效合写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那篇黑文，竟胡说什么"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还嫌这话不够，又亲笔把"一手造成的"改为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邓小平同志就这样被定性了。

邓小平同志被打倒后，"四人帮"继续利用天安门事件大做文章，指使他们的心腹连续炮制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续）》和《不许纳吉式的人物上台》两篇文章，准备出笼，露骨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这时，王洪文狂妄地说："去年反革命谣言没有好好追。我们要追，天皇老子也要追，不要以为是老干部就不敢追。涉及到国务院、党中央系统也要追"，妄图打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负责同志。

九、生命不息 斗争不止

"四人帮"四月五日对天安门广场的革命群众进行血腥镇压，不仅没有吓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反而彻底暴露了这伙政治匪徒的法西斯嘴脸，更加激起了强烈的反抗。

一夜的腥风血雨刚刚过去，第二天，仍然有许多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有人激昂慷慨地发表演说，揭露昨天晚上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痛斥"四人帮"的反革命暴行。有人提出静坐示威，有人提出请愿，有人提出游行。

北京东城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被群众的热情所鼓舞，大声说："静坐有什么用？请愿有什么用？游行又有什么用？不是全没有用吗？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他建议成立"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向全国人民说明真相，揭露这伙野心家的阴谋。他的建议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

四月七日夜，"四人帮"炮制的所谓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消息刚刚广播完毕，中央广播事业局技术处干部李景春立即写了两条大标语："要反周总理的江张姚（恶狼）决没有好下场，不得好死！""打倒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多么勇敢的行为啊！

革命群众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诗词、祭文、悼词，在清明时节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天安门事件被镇压后，怎样保存这些革命文物，便成为革命群众在新的情况下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的一种方式。人们想尽一切办法，巧妙地保护和珍藏。象轻工业部一名干部，把抄录的革命诗词，按照只有他自己才看得懂的排列顺序，重新抄在纸上，外面绕上很厚的棉线，好象一个线团。公安局的一位民警同志，把抄录的革命诗词移到他在河南农村的家乡，埋在地下。一位在秦皇岛工作的同志，清明时节恰在北京，他抄录了大量革命诗词，用塑料布包起来，埋在香山。有的同志把诗词埋在花盆里，藏在炉膛夹壁内。人们这样做，是因为怀有一个坚强的信念：坚信"四人帮"总有一天要完蛋，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十六位同志，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冒着入狱的危险，四出搜集、整理，以童怀周的名字油印出版这些珍贵的天安门诗抄。他们中的一位成员白效朗被捕了，但他们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七机部五O二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的同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搜集、出版名为《革命诗抄》的集子，赵朴初同志为它题了字。

在狱中，那些被捕的同志，把牢狱变成反对"四人帮"的新战场。

"四人帮"的党羽施展种种手段，妄图胁迫那些同志就范。他们把曙光电机厂中层以上干部的名单，摆在该厂党委委员元海章面前，要他划出参加悼念周总理活动的人的名字，元海章拒绝了。他们要刘迪出卖同志，写诬蔑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刘迪痛加驳斥。他们三次要李舟生写叶副主席的材料，李舟生严词拒绝。他们让北京市第七机床厂工人王英斌承认天安门诗词是反动的，他据理驳斥。北京钢铁学院进修生王雷在狱中和韩志雄互相鼓舞，为迎接出狱后的斗争而努力学习。在这些同志面前，"四人帮"及其党羽的阴谋均告破产。

这是新生的一代，英雄的一代。他们同天安门广场的广大群众一起，肩挑祖国命运的重担，为粉碎"四人帮"大声疾呼，在前进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多么难能可贵啊！

十、四五运动 光照千秋

天安门事件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四五运动。它以鲜明的旗帜，磅礴的革命气势，史无前例

的巨大规模，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不是“四人帮”的；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决定中国的命运，只有人民才能推动历史前进。

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经过天安门事件，化为气壮山河的巨画，深深地铭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谁是天安门事件的组织者？人民。谁是天安门事件的指挥者？人民。百万人民群众表现了这样高的政治觉悟、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在天安门广场演出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史剧，是历史上少有的壮举。它极其深刻地说明：人民革命运动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都阻挡不了的。四五运动虽然遭到“四人帮”的镇压，但是真理的火种已经撒遍神州大地。人民觉醒了，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开阔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斗争的才干，增强了胜利的信心。四月的斗争敲响了“四人帮”的丧钟，为华主席领导的十月的胜利准备了最重要的条件——亿万觉醒了的人民。

四五运动的革命精神光照千秋，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前进！

（原载1978年11月21—22日《人民日报》）

〔附〕揭露“四人帮”及其心腹炮制天安门事件报道的阴谋

《新闻战线》记者

天安门事件过去两年又七个月了。人们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如潮似海的人流，如山似雪的花篮花圈，充分表达了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崇敬和怀念；那数不尽的诗词、祭文、悼词、标语和传单，深情歌颂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愤怒控诉了“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这是一幅多么悲壮激昂的革命情景啊！

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事件的发生有它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背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一条假左真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全国人民早已积怒在胸。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疯狂地反对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特别是在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压低悼念周总理的宣传规格，残酷蹂躏人民对周总理深切怀念的感情，全国人民更加义愤填膺。“四人帮”控制的《文汇报》，在一九七六年三月五日的新闻中删去周总理给雷锋的光辉题词，接着又在三月二十五日抛出“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的攻击周总理的新闻报道，制造了“三·五”、“三·二五”反革命事件，长期压抑在革命人民心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三月二十九日，英勇的南京人民纷纷走向雨花台，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很快，声讨“四人帮”的革命烈火，在全国许多地方燃烧起来。英雄的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行动，就是这种斗争的高潮。

“四人帮”凭着反革命的嗅觉，从南京事件起，就预感到大火必将烧到自己身上。他们顾不得再掩饰自己的狰狞面目，公然向人民举起了屠刀。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就对他们在人民

日报的那个心腹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即'四人帮'）的"。四月二日，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开始不久，"四人帮"就把这种活动定为反革命性质。这天，姚文元连续两次打电话给那个心腹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这股反革命逆流这样猖狂，是没落阶级的表现，因为有个资产阶级，他们是要跳的。"四月三日，姚文元从人民日报内部情况中看到："在纪念碑北侧的栏杆上，贴着不署名的标语'我们想念周总理，我们怀念杨开慧'"，就在这话后面恶毒地加了这么一句："这同外地的煽动性的反动口号完全一样。"四月四日，姚文元再次打电话告诉那个心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四人帮"不仅事前给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活动定了性，还亲自到现场指挥。四月五日凌晨，王洪文就到了广场东南的一个小楼上亲自指挥。他布置说："跟着最坏的，离开天安门再抓，四日抓了三个。你们盯住，不仅社会上的，要看党内资产阶级，民兵要参加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前后，"四人帮"及其在人民日报的心腹一伙，在内部讲话、内部情况和公开报道中，一再叫嚣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幕后策划者"，要抓"总根子"、"总后台"，等等，为镇压革命群众和打倒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造反革命舆论。

事实是无情的。"四人帮"把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活动，诬蔑为"反革命政治事件"，不对！制造天安门广场流血事件的正是"四人帮"，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新老反革命。"四人帮"把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革命活动，诬蔑为"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幕后策划者"搞起来的，不对！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搞反革命的，正是"四人帮"，他们是镇压群众革命行动的真正的幕后组织者和策划者。

毛主席指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在天安门事件中，"四人帮"是这两种武器兼用的杀人犯。他们利用窃取的一部分权力，动用国家机器镇压革命干部和群众，人们有目共睹。他们如何用笔杀人，让我们列举数例，予以揭露。

"四人帮"利用他们控制的人民日报大造反革命舆论，陷害广大群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通过内部情况，大整黑材料。他们派到天安门广场的人，完全按照"四人帮"事前定的框框搞情况。请看"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一伙当时是怎样说的：南京问题"我们立即报中央（即'四人帮'），上面叫注意观察，我们心里有底了。""几个省、区清明都闹了，口号是一致的，天安门事件我们有了思想准备。"那个心腹说："洪文五日六点起来，到广场小楼上观察；但远处看不清，文元叫派记者到纪念碑前看"。天安门"是前线，到前线去，你们去吧。要盯住，观察情况发展。""我们编的天安门广场情况，就提出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党中央（即'四人帮'）对我们关怀，指示及时，我们明确。"这些话，是当年他们得意忘形时讲的。今天已成为"四人帮"一伙与人民为敌的铁证。

从四月一日到六日，"四人帮"及其心腹指挥记者突击采写、编发的关于天安门广场活动的内部情况，是事先经过"精选"，然后又经姚文元亲自修改、审定付印的。为了掩盖天安门事件的真相，姚文元在修改、审定内部情况时，极尽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能事。这个反动文痞对于广大群众深切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大量诗词祭文，以及广场的活动等情况，有些扣压不发，有些则断章取义，恶意歪曲拼凑，再给群众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什么"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首长"、"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啦，什么"阶级敌人"、"坏人"、"坏家伙"、"暴徒"、"反革命分子"啦，什么"半文半白，丑恶不堪"、完全是腐朽、没落、死亡的反动阶级的语言"啦，等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四月三日的内部情况中，提到一个署名“青年工人丁亮”写的《倡议书》。作者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尖锐泼辣的语言，揭露“四人帮”是“从内部分裂党，分裂革命队伍”、“要篡夺领导权，改变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会议书》指出：“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这种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人历史的垃圾堆。”姚文元却把内部情况上的这份《倡议书》原文删去，在提了作者的名字和《倡议书》后，说作者“公然提出‘反对共产主义空话’的反革命口号。”姚文元这个刀笔吏，真是捣鬼有术。明明是作者骂“四人帮”为“说共产主义空话”的修正主义者，经姚文元这么一改，作者竟成了反对共产主义的反革命了。

当时到过天安门广场的许多同志，都看到过中国科学院一O九厂职工在四块牌子上用大字书写的四句诗：“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妖魔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姚文元在四月三日的内部情况上看到这诗后，竟在后面加上：“所谓‘再开革命花’，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这首诗，明明是颂扬周总理的功绩、反对“四人帮”的，怎么是“推翻社会主义革命”呢？但是，姚文元硬把这个罪名加在一O九厂革命同志的头上。这个六百多人的工厂，三人抓进监牢，十多人隔离审查，厂领导打成“走资派”。姚文元就是这样杀人不见血的。

四月四日内部情况上登了一首署名“新人”写的《清明节呐喊》，后面几句是：“‘遥瞧’无罪，总理有瑕？桩桩件件，有目共察。追根寻源，海江两家。名利熏心，欲立自家。裹挟天子，以令万家。宁左勿右，一如林家。浩荡洪流，冲毁厮家。”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四人帮”不正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披着“左派”的伪装，妄图“改朝换代”的林彪一伙吗?! 今天，革命人民不正是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彻底摧毁、清算“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以及他们苦心经营的黑据点吗?!

四月四日内部情况上还登了“敬周试作”的《满江红》。这首词是捍卫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但是，姚文元把这首词的大部分砍去，只留了末尾几句：“拿起火与铁，准备决战。任凭熊罴掀恶浪，摆开架势对着干，揪出藏尾巴的恶狼，斗到底！”接着，姚文元恶毒地加了一句：“这类反革命言论表明，幕后策划者是在言论之后还想搞行动的”。这里，姚文元不仅把革命群众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诬蔑为“反革命煽动”，而且无中生有地把群众的言论和行动，胡说成是“幕后策划者”“还想搞行动的”。姚文元就是这样栽赃害人的。

“四人帮”及其心腹一伙在内部情况上搞了大量的鬼，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举。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公开报道中，是怎样捣鬼害人的吧！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这是在“四人帮”亲自主持下，在内部情况的基础上改编的，许多陷害群众的恶毒语言，都是“四人帮”授意的，或是由他们亲自写进去的。四月七日上午，那个心腹奉他的上司之命，带着他手下的几个人急急忙忙赶到人民大会堂。姚文元见了他们，洋洋得意地说：“大好事，大好事！”接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也都接见了他们。张春桥说：“在情况的基础上写，不要另写。”姚文元说：“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他们说秦始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题目也不要变。……要快。”“粗点没关系”。于是，那个心腹就和他手下的几个人急忙改编。其间，姚文元不断催促快点编，陆续发排，来往送稿车不够，可以用他的汽车。就这样，他们改完一页，马上送回报社排字打样，几部小汽车轮着送稿送样。看！“四人帮”为大造杀人的反革命舆论，真是急如星火啊。

“四人帮”又是怎样在这篇报道中施展反革命伎俩，造谣惑众的呢！

一、报道中引用了一首诗。报道中是这样写的："欲悲闹（原是闻字）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原是泪字）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我们信仰马列主义；让那些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见鬼去吧！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为了真正的马列主义，我们不怕抛头洒血，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四人帮"一伙别有用心地用了这首诗。在报道中，把诗说成"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含沙射影地、恶毒地攻击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完全是同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571 工程"纪要》中的语言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煽动"，等等。"四人帮"及其心腹一伙，把这首倾吐全国人民心声的革命诗，作为天安门事件中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反动诗词的代表作，这是他们给天安门广场群众的革命行动定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根据"。

真相是怎样的呢？"四人帮"及其心腹用的这首诗，本来是两首，他们出于反革命的需要，把两首拼凑在一起。从"欲悲闹鬼叫"到"扬眉剑出鞘"原是一首。另一首，本来是悼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的长诗。这首诗，去年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又重新张贴了出来，使我们得以看到全貌。这首诗的题目是《清明悼周总理》。诗中表达了对周总理的无限怀念，赞颂了周总理的丰功伟绩。诗中说："敬爱的周总理，您的儿女对不起您，您的英灵至今不能安息。掏尽红心，难表我们对您的深切怀念；挥尽血泪，难倾满腔悲愤思绪。您的一生历史已作出最高的评价。功高日月，声震环宇。国际史上，永载您的音容笑貌；革命路上，踏遍您的稳健足迹。风云涌，鬼神泣，巨星一陨天地哀，四海五洲下半旗。"这些诗句是多么感人啊！今天我们读起来，仍然抑制不住激动的感情。接着，作者笔锋一转，向"四人帮"发出了愤怒的声讨。诗中说"可笑群魔不自量，妄想重翻腥风血雨。鼓唇摇舌，捧裙牵裾，猿猴沐冠，什么东西！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让那些家伙看看吧，天安门前花似雪，纪念碑下泪如雨。你们不念我们念，你们不祭我们祭。"这些诗句，骂"四人帮"骂得多么痛快啊！姚文元等在刊登内部情况时，用他们的黑手把这些诗句都砍去了。而在见报时，张春桥、姚文元把"总理精神万代传，子子孙孙举红旗"、"我们不惜重上井冈举义旗"、"总理的遗志我们继承"等句子，又都删去，仅剩下十一句。他们为什么要把两首诗拼凑在一起呢？用姚文元的话说，就是"有'剑出鞘'"。姚文元借此诬陷诗中写的"剑"是对着"秦始皇"，是影射攻击毛主席，他们的用心狠毒无耻到了极点。

二、关于所谓"打人"、"冲人大会堂"的问题。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有十来个青年被闹事的坏人围打，……闹事的暴徒叫着：'打死他！打死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有一个穿蓝制服的人，当群众和守卫人员争辩时，他在一边说什么："别为走资派卖命了，现在报上都快把走资派点出来了。"群众说这人是在攻击周总理，就追上去打。有两名公安人员来解围，群众发现他们是便衣，怒火都集中到他们身上。其中一个人往大会堂跑，愤怒的群众在大会堂东门的台阶上追上了他。这时，几百个民兵也赶到大会堂前。在内部情况中，这段情节被隐瞒，删节为"几百个工人民兵排着队走上大会堂走廊"。在改编报道时，张春桥说，"几百个民兵排着队走上大会堂干什么？去参观？目的性没有说清楚"，结果就改成"坏人围打"、"几百个工人民兵，为了保卫人民大会堂"。这样一改，捍卫周总理的革命人民变成了"暴徒"，无辜的群众变成了冲击人民大会堂的罪人！

三、关于烧汽车、军营的情况。四月五日，广场上有一辆上海牌小汽车被烧，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一伙指使人写情况，说："这很重要，马上写情况"。这个人说，他没有采访任务，不了解是怎么烧的，只看见冒烟，无法写，他们说："没有采访任务也可以写，只要写几

点几分烧汽车，证明此事就行了。"硬要这人捕风捉影地写了一个情况。所谓烧军营，他们并没有搞清房子是因为什么烧的，是什么人干的，就武断地说是阶级敌人搞的。内部情况原稿写有"现场黑烟冲天，一股橡皮气味……"的字样，他们大笔一挥，将"一股橡皮气味"改为"一片反革命喧嚣声"；另一个地方说："还有一些人得意洋洋地说……"，被改为"一小撮坏人竟得意洋洋地说……"；有一句"现场指挥部楼前都是青年人"，被改为"参加这次反革命事件打先锋的，大都是一些青年人"，等等，把这么多的人，竟然一古脑儿都打成了"坏人"、"反革命"。在编写这篇报道时，张春桥出了个更歹毒的主意，他说："把烧楼房改为烧解放军营房，全国人民一听这帮坏人砸了、烧了解放军营房，就会愤慨！"结果将"有一队百余人的值勤警卫战士排队走向那座大楼"，改为"天安门广场值勤警卫战士为了保卫解放军营房，向营房走去"。请看，张春桥就是这样造谣欺骗、蛊惑人心，进行反革命煽动的。

"四人帮"及其心腹绞尽脑汁，在这篇报道里搞了那么多卑鄙龌龊、见不得人的东西。但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是骗不了，吓不倒的。这篇报道发表后的第四天，报社就收到署名为"一名现场的工人民兵"的信。信封的正面写的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写的是"戈培尔编辑收"。信里装的是四月八日人民日报一、二版报纸。这位民兵同志在报上批了很长一段话，其中几句是："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明明是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操纵《文汇报》《学习与批判》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引起群众气愤予以反击，你们胡说八道说指向毛主席！""明明是十来个青年进行挑衅攻击周总理，并得到大会堂里的人保护，你们说是冲大会堂打了人，真理能封锁的住吗？事实能歪曲吗？""明明是你们耍阴谋使鬼计收了花圈扣了人，还说有人闹事"，"你们演的这场'国会纵火案'实在不高明，一篇混淆视听的假报道就能骗得了人民群众吗？从今日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这就是革命人民对这篇假报道，对"四人帮"及其心腹最有力的回击。

"四人帮"为了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硬说邓小平同志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

四月四日，"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有关邓小平同志的传单。这天晚上九点，他们派的一个人在纪念碑西南角发现几千人的围着听《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传单。当时，传单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据他们派的这个人交代，他大约在晚上十时回到报社，立即向那个心腹汇报。那个心腹一听传单里提到邓小平，立即抓起铅笔在日历上记，并要他快把传单的内容写出来。写好后，那个心腹又让他再去天安门广场看看。十点多，他混到广场人群中，在混乱之中，抢到了那张传单。这中间，那个心腹将传单的内容打电话报告姚文元。另一个人还亲自把传单的内容，恭恭正正地抄了一份送姚文元，题目叫《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四人帮"拿到这个材料，就断章取义，歪曲篡改，疯狂地诬陷攻击邓小平同志。

四月七日，在改编《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报道时，姚文元说："这些家伙说，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就是为邓小平歌功颂德。""要把'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全国人心大快'这些话引进去，这样更有力量。"张春桥说："这帮家伙写那些反动诗，就是要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姚文元接着说：要把张春桥说的这些话"写上去"。后来，张、姚的这些黑话，统统都塞进了四月八日的那篇报道中。姚文元还指使那个心腹编了个纳吉的资料。张春桥在审查《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社论时，公然诬蔑广大群众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矛头所向和罪恶目的，同邓小平是完全一致的"，诬蔑邓小平同志是苏修叛徒集团的"健康力量"。这真是一箭双雕，既把邓小平同志打成后台，又把群众整成反革命。

后来，凡是有关天安门事件的报道、评论、文章，什么“邓纳吉”啦，什么“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啦，什么“天安门广场事件的总根子”啦，种种诬陷不实之词，都加在邓小平同志的头上。“四人帮”控制的人民日报写作组与梁效合写的《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黑文中，竟胡说什么“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广场事件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还嫌这话不够，又亲笔把“一手造成的”改为邓小平“就是这次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四月五日，王洪文在广场的小楼上说了一段话，充分地暴露了他们的野心。王洪文说：出现天安门广场事件，就是因为“去年反革命谣言没有好好追。我们要追，天皇老子也要追不要以为是老干部就不敢追。涉及到国务院、党中央系统地要追”。他们究竟要干什么？他们就是要把矛头指向国务院，指向华国锋同志，以至指向毛主席。在天安门事件追谣言、查“后台”的过程中，上了北京市公安局追查名单的，竟有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

天安门事件之后，毛主席、党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总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四人帮”极为不满。他们千方百计地贬低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任第一副主席，他们不让报纸作通栏新闻标题；华国锋同志的照片，他们不准登大。六月八日人民日报一版刊登华国锋同志会见外宾的照片，姚文元嫌突出了，就横加指责：“今天一版的照片，你们做的大了，……要适当掌握。”

为了继续利用天安门事件大做文章，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一伙，又连续炮制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续)》和《不许纳吉式的人物上台》两篇文章，准备出笼。那个心腹在看到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时，恶狠狠地说“什么上台？赶下台去!”他们炮制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要从组织上说明走资派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说明“一条是社会上确有反革命，一条是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以上这些，都围绕着一个反革命目的，就是要篡党夺权，把华国锋同志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赶下台去”。

“四人帮”在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期间，造了那么多反革命舆论，是要干什么？就是要杀人。四月三日，姚文元在他的反革命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隔了一天，在他亲自出题和口授提纲的《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社论中，他亲自加上“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社论发表的头天晚上，姚文元又特意嘱咐那个心腹：“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今天晚上你要把这件事办好，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那篇未出笼的文章公然说：“不镇压这些反革命，不足以快人心”。“四人帮”阴谋策划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镇压，影响所及，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干部群众因此遭到迫害、受到审查。“四人帮”要镇压的“反革命”，正是反对他们的革命群众和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老干部。

“四人帮”残酷镇压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广大革命群众之后，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就在四月七日改写那篇报道的时候，王洪文兴高采烈地对那个心腹说：“你们有功劳呀”，“都干一杯”。江青也对他们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张春桥在十八日给他儿子的信中说：“四月五日，我是中午到的大会堂，如同亲眼看到匈牙利事件一样。我有幸看到这个纳吉的丑恶末日”。寥寥数语，充分暴露了这帮新老反革命的凶恶面目。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天安门事件以后，姚文元对那个心腹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报道，这对无产阶级新闻史是很重要的材料。"又说"这样尖锐的斗争，在新闻工作方面是很重要的，写出来"、"新闻工作上有何新的经验，好好总结。"什么"无产阶级新闻史"的"很重要的材料?"这是无产阶级新闻史上极端反动极端恶劣的反面教材！什么"新闻工作方面"的"新的经验"？这是戈培尔之流用笔杀人的反革命的老"经验"！请看人民群众是怎样看待他们的造谣宣传的：署名"四万四千零一个"的读者给"戈培尔编辑（即那个心腹）的信中说"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被你贬低为'两校'的校刊，你受主子的利诱，无恶不作，罪该万死。你们做的丑事，才真是'不得人心'。""你们一小撮盗用'本报记者'名义，胡作非为，八亿人民都痛恨你们。""你们对周总理制造反革命言论，你们到底是国民党，还是混进共产党的阶级异己分子!!""你这个人根本没有党心、党员之心，甚至没有人心、良心。只想作官，跟着你主子作威作福，你们的末日快到了。全国八亿人民，全党三千万党员要审判你们。"这封信写得多好啊!

现在，天安门事件已宣布完全是革命行动，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这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是人民力量的伟大胜利。"四人帮"及其心腹在"新闻工作方面"的这一套反革命"经验"，还没有来得及"总结"，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他们就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我们要彻底清算"四人帮"及其心腹在天安门事件报道中欠下的债！我们要揭开这报刊史上黑暗的一页，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原载《新闻战线》1978年第1期）

〔附〕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被捕的人没有一个反革命分子

本社记者报道：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一九七六年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多名干部、群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被捕的同志现在已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四人帮"及其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个黑干将为了达到他们的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当时就指令公安人员，在抓捕中要追"后台"，要把重点放在高级干部的子女和与党政军负责人有关系的人身上。被捕的干部、群众十分清楚"四人帮"搞的这个反革命的政治大阴谋。他们被捕后顽强地坚持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从今年五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只有三人因当时犯有偷盗等罪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为这些因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捕的同志进行平反时，都在结论

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新华社1978年11月18讯，载11月19日《解放军报》)

〔附〕 四五运动日志[1]

一九七六年

1月8日　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

1月9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举国沉浸在哀痛之中。

1月10日　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以及首都群众一万多人，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总理的遗体告别。

1月11日　向周恩来总理遗体告别仪式继续举行。下午首都百万群众自动集聚在通往八宝山的十里长街两侧，静默肃立，等待总理灵车通过。

1月12日—14日　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四万多人，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

▲未能参加正式追悼仪式的人民群众，连日来自发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表示哀悼。纪念碑前人如潮水，花圈相迭。

▲《人民日报》以头版大字标题刊出《大辩论带来大变化》的长篇报道。强奸民意，开头就胡说："近来，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全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纷纷打电话，写信怒斥这篇报道。

1月15日　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致悼词。

1月16日　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

▲姚文元下令：关于周总理的"治丧报道要立即结束"。

2月6日　《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不指名地对邓小平同志进行攻击和诬陷。

2月16日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以"高路"为笔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孔丘之忧》。文章说："让旧制度的'哭丧妇'抱着孔丘的骷髅去忧心如焚，呼天号地吧。"攻击诬陷周总理和悼念总理的亿万人民。

2月23日　福建省刘宗利在福州市贴出大字报：《"阿斗"的呼声》，历数"四人帮"罪状，震动了福州。三月八日王洪文亲自下令追查。

2月26日　福州大学机械系教师厉海清在福州市东街口贴出《天仙子·葬志》词一首，

---

[1] 原为《四五运动纪实》的附录。

表达了对林彪、“四人帮”的切齿痛恨。

3月2日　武汉市街头出现“继承总理志，实现四个化”等大标语。署名“寒城牛”。

3月5日　《文汇报》在一篇新华社发的消息报道中，将周总理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去。

3月9日　贵阳制药厂李洪刚等七名青年工人，在贵阳市贴出：《对目前形势和新的任务的几点看法》的大字报，并油印八十余份，自费前往郑州、长沙等地散发、张贴。

3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翻案不得人心》。更加露骨地攻击邓小平同志。

3月11日　福建三明市农机公司赵大中在三明市贴出题为：《论扩大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春桥》的大字报，数日后又贴出了续篇。

3月14日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第三期出版。本期《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一文，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

3月19日　北京市朝阳区牛坊小学红小兵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从此，悼念总理的人流首尾相接川流不息；献给周总理的花圈越来越多。

3月20日　广东顺德县大良轧钢厂工人杨振汉写信给毛主席，批判张春桥的谬论。三月二十六日又发了一封。

3月24日　南京江苏新医学院师生员工抬着献给周总理的花圈到雨花台，隆重举行悼念活动。

3月25日　《文汇报》在第一版发表了一篇新闻稿《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其中讲：“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武汉市出现了《绝不对资产阶级野心家卑躬屈膝》的油印传单。署名“寒城牛”。

3月26日　武汉锅炉厂有二百余人集会，指名批判江青、张春桥。

▲“四人帮”在北京京公安局的干将，指示天安门派出所把三月十九日以来送花圈的单位、人数、花圈数汇总上报。

3月28日　上午八时，南京大学数学系四百余人在李西宁同志带领下，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绕道新街口到梅园新村。沿途许多群众纷纷加人，成为南京市民反对“四人帮”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示威。

3月29日　南京大学数学系学生贴出大标语，指出要警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要用鲜血来保卫红色江山。下午南大有三百多名学生分成二十多个小组，在全市主要街道张贴大标语。当晚去火车站，把大标语刷在过往南京的列车上。

3月30日　南京大学学生在车站工作人员帮助下，用柏油和油漆在车厢上刷了：“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等大字标语。

▲王洪文对“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说：“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

中央的。”并说:“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

▲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曹志杰等二十九位同志，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侧贴出了第一张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悼词。

3月31日　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四周放满了花圈，数不清的悼词、小字报、诗词，出现在纪念碑上，花圈丛中。许许多多的单位和个人自发到广场举行悼念仪式。

▲“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派出“便衣”观察动态、记录小字报、诗词。

▲南京汽车厂制泵分厂王运德、张精美、殷辉在南京中山东路贴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的大标语。

4月1日　天安门广场的万千花圈中，有一个巨大的长型花圈，黑底上用白字写着:“深切怀念敬爱的周总理”。

▲“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在公安局的会议上说，清明扫墓是“旧传统、旧习惯”，要阻止群众送花圈。还说:“现在反革命破坏活动相当嚣张”，“凡是纪念碑前反动的东西，要坚决搞掉。”“要追查幕后操纵者。”

4月1日　山西坞城路三局机电队共青团员王立山在纪念碑上贴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一诗，被“四人帮”列为“OO一号反革命案件”重点追查。

4月2日　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一个铁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

▲中国科学院一O九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立起四块巨型诗牌。上写:“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十分引人注目。

▲北京市各个单位传达关于“南京事件的电话通知”，通知中说，南京贴出的大字报、大标语“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同志，是分裂党中央”的。

▲首都民兵、警察、卫戍部队的“联合指挥部”成立。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三层小灰楼内。指挥部决定抽调民兵、公安干警各三千人以及部分卫戍部队组成机动力量，随时准备出动镇压群众。

▲姚文元对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要分析一下这股反革命逆流，看来有个司令部。”同日，他在打给广播事业局的电话中说:“现在天安门纪念碑前送花圈悼念总理，是针对中央的，是破坏批邓的。”

▲下午，“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主持召开公安局常委会，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了具体镇压群众的措施。

▲“四人帮”以及在江苏的代理人开始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南京大学某教学楼的课桌上出现了署名“万万千作词，千千万抄写”的《捉妖战歌》。这首战歌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想当封建皇帝”。南京市街头仍有人贴批判《文汇报》的大字报、大标语。抬着花圈游行的队伍仍然不断。

4月3日　凌晨四点四十分，王洪文到天安门广场，打着手电筒看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圈和悼词。回去后，他打电话给他在公安部的党羽说:“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否则，到那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

它拍下来，要考虑将来破案。”

▲天色阴沉，下着小雨。纪念碑上已被花圈堆满，但冒雨送花圈的队伍仍陆续不断。花圈向纪念碑周围的广场上扩展。参加悼念的人群估计有几十万。

▲纪念碑东侧贴出一篇署名“北京工人”的长篇悼词。这篇悼词道出了人们的心声，在这一天当中被朗诵了几十遍；纪念碑北侧的一排旗杆上悬挂了一个几十米长的黑布横幅，上面用白字写着：“誓死继承总理志，深学马列识方向，若有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署名“北京西郊烟灰制品厂部分同志”。

▲纪念碑第二层台阶的西北侧贴出了一张《关于建立周总理纪念馆的建议》的大字报。许多群众当即表示支持并自动献款。一二四中学学生还提出要求参加建馆义务劳动。

▲国务院政工小组向国务院所属部门发出电话通知，要求大家不要去天安门前送花圈。

▲姚文元看了《人民日报》编写的《情况汇编》，把革命群众的许多大标语定为“反动口号”。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晚上花圈比白天增加了几倍。九时半左右广场中央聚集了几千人，反复朗诵着清华大学几个工农兵学员写的一篇悼词《献上一朵素洁的白花》。

▲有人把悼念周总理的诗词谱成歌曲，在天安门广场教唱，出现了万人大合唱的动人场面。

▲北京房修二公司工人韩志雄在纪念碑上贴出了《悲情悼总理，怒吼斩妖魔》的小字报。遭到“便衣”人员跟踪，晚十点多钟，在取自行车准备回家时被捕。至此，于天安门广场被抓捕的群众已达二十六人。

4月4日 清明节。天安门广场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上空两束气球挂着“怀念总理”“革命到底”的巨幅挽联。地上花圈摆满了广场。这一天到广场人数可达二百万人次。

4月4日前后 ▲杭州市人民大会堂和延安路、解放路等闹市区里，汇集了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张贴标语、诗词，送来精心制作的花圈。许多单位的群众列队游行，高呼“坚决揪出化妆成美女的毒蛇！”“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人民的公敌！”等革命口号。这次活动被“四人帮”打成“杭州四四反革命事件”

▲河南郑州市广大群众在郑州二七广场等地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后被“四人帮”定为“反革命破坏活动”。与此同时，在山西太原、古城西安等许多地方的革命群众都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上午，北京铁路分局的青年工人王海力在天安门广场展示血书，壮怀激烈。

▲上午七时，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列纵队，共二百七十五排抬着三十四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后，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三千多名职工的队伍也浩浩荡荡从东单开进广场。北京重型电机厂工人制作的第二个铁花圈运到了广场。

▲上午十一时，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

▲“四人帮”在公安部的党羽亲自去广场布置“取证”和侦察。姚文元再次打电话

给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

▲纪念碑东侧接连贴出《清明节呐喊》、《叫人怎么办?》等诗词。用"三人十只眼"来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晚九时许，纪念碑东南角出现《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的传单，有人在高声朗诵，吸引着许多人。这份传单公开点了江青的名。"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心腹，马上以《一个极为重要的情况》把传单抄报"四人帮"。

▲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进行紧急部署，要求做到"车辆准备好，拘留所、收容所做好准备"。

4月5日 凌晨——二时，广场上花圈惨遭洗劫。北京卫戍区和汽车运输公司出动二百辆汽车将花圈运往八宝山销毁，小部分放到中山公园留下当做"罪证"。在清理广场时，五十七名在场群众均遭审查，其中七人因抄诗或可疑被捕。

▲五时十分，王洪文到联合指挥部小楼向头头们面授机宜。

▲通往广场的路口已派人把守，不准送花圈的群众进入，还设了劝阻站。纪念碑由军队、警察、民兵组成封锁线层层围住。

▲六时左右，北京一七二中三十几名学生在群众支持下，冲破了封锁线把花圈送到了纪念碑上。

▲七时半，一个军人发表反对群众送花圈的讲话，受到群众斥责。过了一会儿，有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攻击周总理，引起众怒。两个"便衣"上前解围被群众认出，其中一个向大会堂方向逃去，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外。

▲一辆广播车因诬蔑群众悼念活动，被群众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车。

▲九时许又一个持有清华大学机械系听课证的人攻击周总理，被群众惩罚后，扭送派出所。

▲几十万人在大会堂东门口高呼:"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同工人民兵和警卫战士发生冲突。

▲中午，群众包围了联合指挥部（小灰楼），群众派出四名代表向指挥部交涉，提出归还花圈、释放被捕群众、保障群众有悼念总理的权利等三项要求，由于指挥部毫无诚意，谈判无结果。十二时五十八分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头头乘坐的上海牌轿车一辆。

▲下午三时许，又烧了指挥部的面包车一辆、吉普车两辆。

▲联合指挥部先后调集卫戍部队一个营，警察八十人、民兵二百人、加强了小灰楼的警戒。

▲部分群众冲入楼内。五点零四分小灰楼被群众点燃起火。下午五点十五分指挥部全体人员从楼南面窗户爬出，撤离了指挥部。

▲联合指挥部头头们研究"反击"部署，决定在中山公园成立一个新的指挥点。下令晚上"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棒子、铐子"。

▲晚六时二十五分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开始播放《广播讲话》。七时许，民兵五万、公安干警三千、卫戍部队五个营分别在中山公园、午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历史博物馆、二十八中学等地待命。

▲晚九时三十五分，广场上灯火通明。在《广播讲话》和《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的广播声中，对广场上未及撤出的群众进行包围、毒打。二百余人被捕，投进监狱。

4月6日　九时十分北京海淀区感光材料厂几十名同志送来这天的第一个花圈。人们看着广场上的滩滩血迹，怒火中烧。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叫嚷对制造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要严加追查，坚决打击。

▲晚六时，几十辆卡车载着工人民兵开进天安门广场。广场一片沉寂，有百余群众在纪念碑前徘徊，没有人发出声音。纪念碑北侧那个唯一的花圈，不屈地在寒风中挺立。

▲夜里广场戒严，调动警察冲洗地上的血迹。

4月7日　昆明市云南重机厂工人方策，在本厂附近的墙壁、电线杆上，贴出"打倒林、张、江贼!"等大标语。

▲上午，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他们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和爪牙们，要他们赶写一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姚文元点出："要鲜明地点出邓小平"，"要快"，"粗点没有关系"。

▲天安门广场继续戒严。有二十余辆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紧闭，门外放着："因修理内部，暂停开放"的大木牌。

▲北京市各单位传达市革委会于四月五日发出的《紧急通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晚，电台播发了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同时广播了《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报道。

▲听完广播之后，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将一张题为《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的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十字路口的一棵白杨树上。他指出"张江等"是"假马列"，"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四人帮"在公安局的干将在市公安局会议上狂叫："已抓到的还不是大鲨鱼，要深下去，捞一大批"，"重点在党政军、党内走资派。"市公安局电话通知各分、县局，在照相馆查到凡有涉及天安门事件的胶卷和冲洗的照片，要没收并登记姓名、住址或工作单位。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庄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喊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为此，被司法机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4月8日—10日　连日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解放军部队被迫举行游行，以资庆祝"胜利"。

4月8日　▲清晨，上海市人民广场中心的旗杆上飘扬着一面白色绸旗，旗上一张周总理遗像，下书"沉痛悼念，恩来总理"。这一壮举吓坏了上海"四人帮"的余党，当即将升起旗帜的青年工人黄水生逮捕。

4月12日　《人民日报》社收到一封署名"一个现场的工人民兵"的来信。信封正面是"人民日报总编辑收"，背面是："龙培尔编辑收"。信封里装着一份四月八日《人

民日报》的一、二版。上面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阴谋家的传声筒！"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党机关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

▲文化部举行文艺晚会和组织慰问团对天安门事件中的工人民兵、警察、警卫战士进行慰问。

4月24日　《人民日报》登载了新华社消息：首都工人民兵指挥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卫戍区分别召开大会，表彰在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斗争中立了功的先进集体和个人。

6月17日　经过"四人帮"在北京市公安局干将的努力追查，共搜集了诗词、悼文原件五百八十三件；强迫群众交出的诗词、悼文照片和现场照片十万零八千多件；从中选出重点六百余件编成《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罪证集》，加上其他"重点线索"，总计立案追查的共一千九百八十四件。连同天安门事件当时在内共拘捕群众三百八十八人。至于以隔离、办班、谈话等方式审查的数量更大，全北京市被触及的群众数以万计。

7月6日　朱德委员长在北京逝世。

7月28日　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天津、北京。

9月9日　零时十分毛泽东主席在北京逝世。

10月24日　首都一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七年

1月8日前后　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天安门前、金水桥畔和观礼台上，又摆满了花圈和周总理遗像。同时有许多诗词、祭文贴出。纪念堂工地的木板围墙上、王府井南口等处的大字报、大标语，吸引着千千万万的群众。

▲《四五精神万岁！》、《天安门运动的回顾和展望》、《四五运动亲历记》、《人民万岁》、《历史的要求》等大字报和大标语先后贴出，越来越多。内容大体是：怀念总理；欢庆胜利；声讨"四人帮"；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有的点名斥责某些负责人伙同"四人帮"镇压群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童怀周和七机部五O二所贴出《天安门革命诗抄》油印本。

▲仍被"四人帮"爪牙控制的北京市公安局，在天安门管理处设立指挥部，派"便衣"六、七百名，重操旧业，到广场跟踪盯梢，取证抓人。

1月8日—14日　▲北京市公安局，在这期间共撕取诗词、拍摄照片二百余件。定为"反革命案"的八十六起，逮捕一人，拘留六人，受追查的十六人。

一九七八年

1月8日　周总理逝世两周年纪念日。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人民又献上了许多悼念总理的花圈。也有不少悼念周总理和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诗词和悼文。

4月5日前后　北京市西单贴出了"控诉法西斯"的长篇大字报，揭露"四人帮"以及在北京市公安局的干将，对被捕的四五战士的迫害。人民英雄纪念碑上也有不少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诗词和小字报。

8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了共青团北京市委举行首都青年与"四人帮"斗争英雄事迹报告会，为两位参加天安门广场事件而被捕的青年（贺延光和韩志雄）彻底平反。

9月11日　《中国青年》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一期出版。该刊第一个公开发表了七六年清明节期间天安门广场上的部分诗词——《青年革命诗抄》，童怀周编选。广大群众争相抢购。

11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北京市委在最近举行的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11月16日　据新华社南京电，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会决议：南京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11月18日　华国锋同志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

11月21日—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本报记者写的长篇文章《天安门事件真相》，对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该报发表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进行了批驳，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12月22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会议公报。会议指出："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全国亿万人民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愤怒声讨'四人帮'的伟大群众运动，为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

伟 大 的 胜 利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日）

《人民日报》社论

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是毛主席、党中央采取的反修防修、保证我们党和国家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大措施，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

喜讯传来，大快人心。首都沸腾了，全国沸腾了。亿万军民游行庆祝，锣鼓喧天、欢声雷动。各地纷纷举行盛大的集会，致电毛主席、党中央，热烈拥护、坚决支持这两项英明决策。全国出现了一派团结战斗，把反击右倾翻案风伟大斗争进行到底的革命景象。

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长期以来，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群众批判，他表示愿意悔改，"永不翻案"。毛主席挽救他，给他重新工作的机会。但是，他辜负了毛主席对他的教育和帮助，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炮制"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继续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带头煽起了右倾翻案风。

毛主席高瞻远瞩，洞察邓小平的翻案活动，从去年十月开始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领导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毛主席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毛主席的指示击中了邓小平的要害，揭露了他的反动阶级本质。

正当全国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照毛主席指示，批判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反革命的政治事件，一小撮阶级敌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这绝不是偶然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这就很清楚地说明了邓小平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就是这样联系在一起的。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对一小撮阶级敌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赞扬，党中央根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决定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阶级敌人的反动气焰。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从反面给我们上了极其深刻的阶级斗争课。它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多么尖锐。一是在首都，二是在天安门，三是烧汽车，烧房子，打工人民兵，打人民警察，打人民解放军，打革命群众，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它还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又是多么复杂。这些反革命分子不择手段，有预谋，有计划，有组

织、制造政治谣言，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词，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集团，欺骗群众，制造事端，何等阴险恶毒！它也告诉我们：广大人民是要革命的，对这些反革命分子是深恶痛绝的。不管一小撮阶级敌人多么猖狂，在革命群众面前，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终究不堪一击，顷刻瓦解！

党中央的两项决议，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必将推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出现一个新的高潮。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集中火力批邓，批判他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他翻文化大革命案、算文化大革命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要提高革命警惕，随时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看到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还会进行垂死挣扎，对阶级敌人的一切阴谋破坏活动，要坚决打击。要注意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上当受骗的人要进行教育，做好思想工作。

让我们团结起来，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更大胜利，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八日)

《人民日报》社论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英雄的首都人民一举粉碎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天安门广场更加雄伟壮丽。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人民大会堂巍然屹立，人民英雄纪念碑顶天立地。举国上下热烈拥护党中央两项决议，严厉声讨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愤怒批判邓小平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人心、党心、党员之心，如葵花向阳，向着毛主席、向着党中央。亿万军民坚持继续革命，反对复辟倒退的革命洪流，势不可当。阶级敌人胆颤心惊。受蒙蔽的少数人迅速觉悟。形势一片大好。

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它尖锐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反面教材向全国人民进行一次活生生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育。

第一，它进一步说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

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如果以前有人还不理解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那么，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应该使他们明白过来了。为什么这些反革命分子把邓小平抬出来，妄图要他当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就因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因此，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回想去年夏季

前后，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这些人多么兴高采烈。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开始，批判了邓小平，这些人又为他鸣冤叫屈，以至公开搞反革命破坏活动。这就说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击中了资产阶级的要害，触到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痛处，他们必然垂死挣扎，疯狂反扑。象邓小平这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

毛主席洞察一切。去年清华大学少数几个人，写诬告信，矛头对着毛主席。毛主席立即看出背后是邓小平，看出邓小平正在全面地向无产阶级进攻，一针见血地指出："**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阶级斗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毛主席的论断。从清华少数人的诬告信，到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都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和阶级根源，其源盖出于邓小平。我们同邓小平的斗争，就是这样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

第二，它充分说明反革命分子确实有，而且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是同党内走资派搞复辟倒退的阴谋紧密相联的。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蓄谋已久，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舞文弄墨的反动文人，行凶作恶的亡命之徒，都作了充分表演。早在去年七、八、九月，他们就散布政治谣言、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清明前后，又跳出来进行种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有的四处串连，密谋上书中央，要邓"当总理"；有的吹捧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为他张目；有的暗中策划，为闹事的人撑腰打气；有的公开活动，张贴反动标语、诗词，发表反动讲演，狂喷反革命的毒汁。他们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是一群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的矛头所向和罪恶目的，同邓小平是完全一致的。邓小平是这些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只要党内有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就会兴风作浪，向无产阶级进攻，帝、修、反就会同它们呼应。这一次，苏修叛徒集团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它所谓的"健康力量"要搞出点名堂来了，没料到邓小平失败得这么快，还没有来得及鼓掌，就垂头丧气了。一切善良的人们，应该从这次事件中提高认识，擦亮自己的眼睛。

第三，它又一次说明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没有什么了不起；广大人民群众是要革命的，绝不会容忍他们的反革命活动。

十年前，毛主席曾明确指出："**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这次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表面上气焰嚣张，其实虚弱得很。他们的孤注一掷，正说明了他们是失败的、垂死的、绝望的没落阶级。人民群众对他们的倒行逆施义愤填膺，坚决要求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拿起武器同他们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曾几何时，这些张牙舞爪的家伙，在人民的铁拳之下，一触即溃，顷刻瓦解，一个个都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今后，如果还有人敢重演诸如此类的事件，肯定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可耻下场。

毒草可以变肥料。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它暴露了敌人、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对攻击毛主席、分裂党中央和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张贴反革命标语、散发反革命传单、制造反革命政治谣言、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打、砸、抢者，必须实行镇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少数听信谣

言，上当受骗的群众，要继续做好思想工作，提高他们的觉悟，划清界线，肃清流毒。

一切革命同志，让我们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

(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梁 效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完全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它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党内资产阶级反革命狰狞面目的一次大暴露，是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极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结果，是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一场表演。一小撮阶级敌人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发动反革命暴乱，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正是邓小平梦寐以求的如意算盘，正是邓小平去年大刮右倾翻案风的目的，也正是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阶级实质。

列宁指出："**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Ｏ页）正因为如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总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领袖。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就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进而叫嚣"要下台，要让位"，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邓小平进行了批判，他表示"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是，一旦重新掌握一部分权力，就极力网罗走资派，拼凑复辟势力，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他污蔑说"宣传毛泽东思想混乱"，把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和群众，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授意炮制的那篇《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居心险恶地提出要打倒"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恶狠狠地叫嚣要把"领导权夺回来"他们一会儿兴高采烈地说"文章发表后，就是一个拳头打出去了"；一会儿又心虚胆怯地说"批判的语调，不好"，太刺激人。欲盖弥彰，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们所谓"阶级敌人"是有特定含义的。邓小平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对此是心领神会的。他们和邓小平紧密呼应，极其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革命群众是"豺狼"，咒骂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是"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共同的反动阶级的利益和反革命复辟的愿望，把他们和邓小平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小撮阶级敌人在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同时，大肆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向邓小平大表"忠"心。什么"老革命、爱国爱民"呀！什么"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斗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呀！如此等等。他们把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篡党夺权的愿望变成复辟的行动。

这次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以邓小平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为旗帜的。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

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三项指示为纲”，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纲。邓小平授意炮制的那篇所谓《论总纲》的文章，就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开头，又以实现“四个现代化”煞尾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反革命分子也狂呼“四个现代化日”。邓小平和这些反革命分子异口同声地鼓吹“现代化”，不过是以这作为骗人的幌子。其实，“**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

天安门广场上闹事的一小撮暴徒，在叫嚣“四个现代化日”的同时，不仅放火行凶，狂呼“剑出鞘”，而且竟然气势汹汹地要天安门前的警卫战士降下五星红旗。这就以他们的反革命暴行，为邓小平的“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作了最清楚的注释。原来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可以设想，如果他们祈求的那一“日”到来了，革命人民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祖国的山河就会顿时改变颜色。

“**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有长期的舆论准备的。一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一些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文人，一些在无产阶级革命威力下有末日之感的亡命之徒，早就按捺不住了。去年七、八、九月，他们就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四出串连，八方呼唤，到处散布攻击和分裂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而这个反革命舆论制造公司的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他重新工作的一段日子里，他不仅亲自出马，游说四方，作“报告”，发“指示”，摇唇鼓舌，大肆放毒；而且唆使别人散布种种奇谈怪论，授意炮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文章。他一方面造谣言，放暗箭，公然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另一方面，却自我吹嘘，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样子；并且大肆吹捧一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他们捏造“海青天”式的神话。党内外资产阶级也大肆攻击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吹捧邓小平和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一贬一褒，一骂一捧，充分暴露了党内外资产阶级总代表邓小平反革命阴谋家的丑恶嘴脸。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的一小撮阶级敌人，预感到他们的总后台、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末日的来临，孤注一掷，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发表反革命演说，张贴反革命诗词，散发反革命传单、搞反革命暴乱。这既是去年右倾翻案风中出笼的种种谣言的进一步扩散，也有新的“创造”。

列宁指出：“**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七十九页。）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和一小撮阶级敌人，都属于反动没落阶级。他们逆历史潮流而动，搞复辟，搞倒退，手中没有真理，就只好靠谣言和诡辩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妄图把人的思想搞乱，以便混水摸鱼，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然而，这种盗贼的伎俩，鬼蜮的手段，是见不得阳光的。在声势浩大的革命舆论面前，形形色色的反革命舆论一定会彻底破产。

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有其深刻的社会阶级根源。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社会上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样的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因此，一小撮阶级敌人妄图抬出邓小平充当匈牙利反革命政变的头子纳吉。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所

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在这次事件中，一些反动文人胡诌的反革命诗词，明目张胆地为走资派鸣冤叫屈，说什么："老革命，老革命，……只落个'走资派'、'牛鬼蛇神'。"请注意：这即是没落阶级的哀鸣，又是反革命的煽动。他们在走资派头上，戴上一顶"老革命"的桂冠，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把水搅混，欺骗群众，对抗毛主席关于对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指示；岂不知，这样一来，恰恰暴露了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与党内资产阶级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邓小平代表的资产阶级，已经是日薄西山的腐朽力量。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们狗急跳墙，疯狂反扑，公然制造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妄图用反革命暴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这只不过是垂死挣扎，在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铜墙铁壁面前，只能碰得头破血流，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这个反革命事件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一条真理：**"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这个事件同时也更加证明了，**"翻案不得人心"**，一切反革命都是短命的，而广大人民群众和革命干部是要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我们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高举反修防修的大旗，集中火力批判邓小平的反动罪行及其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入追查反革命活动，坚决镇压一切反革命，披荆斩棘、乘胜前进！

（原载 1976 年 4 月 28 日《人民日报》）

社会主义大集好（节录）

——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改造农村集市的调查

（一九七六年五月九日）

去年，正当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辽宁省彰武县哈尔套公社党委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紧紧依靠贫下中农，改造农村旧的集市贸易，创办了一种新型集市——社会主义大集，有力地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

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

哈尔套公社靠近辽宁和吉林两省交界。这里土地瘠薄，气候干旱，过去粮食产量很低。一九七四年冬季，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广大干部、群众打破"猫冬"习惯，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出勤人数逐渐减少，接近过年时，参加农田基本建设的人更少了。人都到哪里去了呢？经公社党委了解，原来是集市贸易的一股习惯势力在吸引着他们。

哈尔套的集市贸易已有多年的历史，每到"逢五排十"的集日，四邻八乡，甚至几十里外

的人都来赶集。多时四、五千人，少时也有两、三千人。少数投机倒把分子利用集市倒买倒卖，弄虚作假，搞资本主义活动。这种集市对一部分没有摆脱私有心理的富裕农民，有着很大的诱惑力。由于这种集市的影响，这个公社的集体经济受到削弱，学大寨运动开展不起来，农业生产一直处于落后状态。

哈尔套公社党委对农村集市进行了调查研究，弄清了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与集市贸易的联系，感到对这样的一个集市，如不加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就会通过这个缺口自由泛滥起来，使越来越多的人离开社会主义轨道。怎么改造农村集市？有两种办法：一种是象过去那样，用行政命令简单关闭，或者进行一般管理，结果，关，关不住，管，又管不好。另一种办法是，根据农村现阶级还保留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情况，创办"社会主义大集"，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发动群众把过去投入集市贸易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同时，组织供销部门打破常规，扩大购销范围，积极组织群众间的交换活动，有计划地占领农村商业阵地。公社党委研究，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改造现有的集市贸易。

新型集市出现了

哈尔套公社在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过程中，首先组织干部、群众大办政治夜校，学习大寨的根本经验，对农村集市贸易中的资本主义倾向展开深刻的批判。同时，进行细致的思想教育，进一步提高了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批判和思想教育工作，很多社员主动提出，把准备赶集的个人的农副产品卖给国家，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公社党委决定，因势利导，组织社会主义大集。

一九七五年元旦，这种新型的集市在哈尔套公社出现了。这一天，各大队的社员群众由干部带领，挑着自家的农副产品，敲锣打鼓，红旗招展，从四面八方赶到哈尔套街里，参加社会主义大集。他们把自用有余的农副产品交售给供销社，然后，再到供销社的门市摊床选购自己需要的各种农具和其它日用品。市场上购销两旺，一片喜气洋洋的景象。过去那种呼买叫卖、讨价还价的资本主义习气一扫而光。在这个集市上，公社和各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还演出了各种文艺节目，宣传新人新事新风尚。群众既来赶集，又受到社会主义教育。在这种集市上，还有城市工厂组织的各种支援农业的活动。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工农联盟、城乡交流的生动景象，听到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和学习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先进事迹。他们高兴地说，赶社会主义大集，越赶对资本主义越恨，心和社会主义贴得越紧，社会主义大集就是好。

这种集市是在两条道路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它一出现就把资本主义势力给压下去了。在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下，这种社会主义大集越办越好。现在，除了定期举办的综合性大集之外，还根据农时季节和群众需要举办单一商品的交流大集。这种集是综合性大集的补充，它在指定时间、地点和范围之内，严格遵守预先议定的价格，把供销社目前还不便于经营的仔猪、鸡鸭雏、秧苗等农副产品，由供销社组织群众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调剂余缺，互通有无。这样，就把过去自由交易的猪禽、编织、柴草等九类一百二十八种农副产品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在农村集市阵地上树立了社会主义优势。在一般的农副产品购销之外，公社还利用赶大集的机会，组织各队向国家交售粮食、生猪等统购统销、计划收购的产品。实际上，这种社会主义大集已经成了农村经济交流活动的主要形式。

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不久，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发表了。

“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哈尔套公社的干部和群众学习了毛主席的这些教导，运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总结分析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实践，更加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学大寨出现了新局面

社会主义大集的出现，是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改变了哈尔套农村商业的面貌，而且教育了人，改造了人，使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过去，在这个公社的一些队里，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资本主义泛滥，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社会主义大集创办以后，这种局面很快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正气压住了资本主义的邪气，形成了“干社会主义光荣，搞资本主义可耻”的革命风气，农业学大寨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取得了人变、地变、产量变的可喜成果。

社会主义大集的创办和发展，充满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去年，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时，社会上也出现一些奇谈怪论，攻击社会主义大集这个新生事物。哈尔套公社党委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开展革命大批判，针锋相对地予以批驳，以实际行动回击了右倾翻案风。现在，公社党委正带领广大群众，深入批判邓小平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决心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办好社会主义大集，推动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发展。

哈尔套公社创办社会主义大集的经验，受到中共辽宁省委的重视和支持，去年全省先后三次在这里召开现场会加以推广，进一步发展了农村的大好形势。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讯，载1976年5月9日《人民日报》）

〔附〕哈尔套经验“出笼的前前后后（节录）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炮制“哈尔套经验”真相之一

一九七四年末到一九七五年初，“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两次窜到彰武县哈尔套公社，一手炮制了祸国殃民、臭名昭著的所谓“哈尔套经验”。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炮制“哈尔套经验”，是同“四人帮”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紧密相联的。四届人大召开前夕，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不顾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和教育，变本加厉地上窜下跳，到处煽风点火，加紧策划“组阁”。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在辽宁那个死党紧步江青窜到小靳庄招摇撞骗的后尘，急不可耐地闯进哈尔套，也要搞出一个和大

寨唱对台戏的"典型"，疯狂对抗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大寨红旗，捞取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群众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个死党"树哈尔套是虚，砍大寨红旗是实；名曰树哈尔套，其实是树他自己！"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初，"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窜进了彰武县。当时的哈尔套公社形势很好。一九七四年粮食总产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产百分之三十多。入秋以来，全社男女老少大干五十天，修梯田一万多亩。入冬后，公社党委按照陈永贵副总理年初来辽宁的指示，大破"猫冬"旧习，又制定了冬季生产建设的具体措施。"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听到阜新市委和彰武县委介绍了哈尔套公社情况后，看到有机可乘，可以在哈尔套炮制出所谓"落后变先进"的典型，便立刻赶到哈尔套公社。"巡抚出朝，地动山摇"，他一到达，哈尔套的干部群众可就遭殃了。

哈尔套公社形势大好，他却要抓"落后变先进"的典型，岂不是矛盾吗？然而，"四人帮"的那个死党正是要利用这一点。他采取的手法是，先把哈尔套贬下去，然后再把它捧起来。因此，他进了哈尔套境内，一不听汇报，二不作调查，下车伊始，就大骂特骂。他胡说什么："这个地方，怎么到处看不见人，只看见几头小驴在那里啃草皮子，坟丘子站岗"；"这里资本主义东西相当多，农业相当落后"，"和解放初期差不多"，"看不出人民公社优越性"，"看不到文化大革命好在哪儿"。他说这里的干部"对社会主义动动摇摇"，"言不及义、好行小惠"，"公开替资本主义倾向说话"，给资本主义"输血供氧"，执行路线"偏到右边去了"。他污蔑群众满脑子"个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跑自由市场"有能耐"。他把大干之后短暂休整的干部群众说成是"温其久"式的人物，把打井、修集、采石、筑坝、积肥等冬季生产建设项目，说成只是伸出个"猫爪子"，还不算解决了破"猫冬"问题，"只有揭冻盖，修水平梯田才是破'猫冬'"。他就是这样对干部和群众棍棒交加，把哈尔套骂得一无是处。

接着，"救世主"就开始施展"妙手回春"的法术了。他第一次来哈尔套的当天晚上，就查问哪个大队农田基本建设搞得好，哪块地产量高。当他知道敖汉大队当时梯田修的多，有一块头年亩产高达六百斤的梯田时，便决定在这个大队"揭猫冬盖子"、修梯田。第三天，敖汉大队干部社员已经劳动了两个小时后，他才乘小车前呼后拥地来到地里。他大衣未脱，手套未摘，戴着口罩，只搬了两个土块，拍了个照片，就溜走了。然后就大吹特吹，说他"刨了第一镐"，"揭开了猫冬盖子"；第四天就召开了两个地区、一个市和七个县领导同志参加的现场会，推广哈尔套所谓"破猫冬"的经验。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知道，"破猫冬"是陈永贵副总理一九七四年初到辽宁检查工作时提出来的，不是他的发明，不可能以这个旗号来达到他对抗大寨的目的；要想炮制出一个能够取代大寨这面红旗的"典型"，还必须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都另搞一套。为此，他指使一个人继续留在哈尔套再作安排，十二月二十八日晚，那个人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连夜返回沈阳向"四人帮"的那个死党汇报。次日，那个死党便第二次窜到哈尔套公社。这次，他越发摆出一副太上皇的架式，从公社党委一直训到县委、市委。他们抓住公社党委书记思想作风上存在的一些缺点、错误，以"反走后门"为幌子，百般挖苦辱骂，逼令"开刀"。当这位同志"开"了给女儿安排工作等五刀后，那个死党正中下怀，便一反常态，改变了要撤这位同志职的打算，并派人帮助这位同志上"纲""提高认识"，准备在全省现场会上介绍"经验"。这就是"开刀"经验的由来。与此同时，受他指使的那个人，在柳树大队利用社员积极向国家卖黄烟的事例，大搞名堂。那个死党马上把它抓过来大作文章，巧立名目，强迫命令，炮制所谓的"社会主义大集"。至此，"哈尔套经验"便成套出笼了。

"哈尔套经验"一出笼，"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立即开始大肆兜售。他利用手中的权力，于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在哈尔套召开了前所未有的全省各市、地、县委书记现场会。他亲自出马，恬不知耻地吹嘘：哈尔套"现在出现了社会主义蓬蓬勃勃的新气象"，"这个新气象就是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出现的"；有了"哈尔套经验"，"农业方向、路线问题解决了"，"全省就要按哈尔套的路子搞"。在他的指使下，一时间否定大寨红旗、吹捧"哈尔套经验"的噪音四起：什么"哈尔套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大寨经验"呀，"它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呀，越吹越玄。为了造舆论，左一个"现场会"，右一个"报告会"，报纸、电台、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全面有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志被骗到这里来"取经"，使这个祸国殃民的所谓"经验"危害全省，流毒全国。

"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炮制所谓"哈尔套经验"，完全适应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白骨精江青指令将"社会主义大集"拍成电影，反革命文痞姚文元给加上"新生事物"的桂冠。就连那个死党在阜新市风沙研究所弄了点这个所引种成功的油莎豆送给江青后，江青也如获至宝，到处炫耀，到处送礼，还下令拍成电影。江青窜到大寨时，竟用这小小油莎豆压大寨，他们为了捞取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互相吹捧，达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中共阜新市委调查组
《阜新日报》记者
阜新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本　报　记　者

(原载 1977 年 1 月 21 日《辽宁日报》)

文化大革命永放兴芒(节录)

——纪念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十周年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

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这个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照亮了这场革命的胜利航程。今天，在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热烈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重新学习《通知》，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场革命的必要性和它的深远意义，对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加充满信心。

《通知》是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它深刻地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揭露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驳斥了党内走资派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谬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武装全党，号召我们揭露和批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领导权。《通知》的制定，宣告了《二月提纲》的破产。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十年来，我们同刘少奇斗，同林彪斗，同邓小平斗，这一次一次的斗争都证明：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力量。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是混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掌握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他们可以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搞起复辟来，比党外的资产阶级还厉害。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次大刮右倾翻案风，直至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文化大革命前，他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头目。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受到群众的批判，说了一大堆"悔过自新"、"永不翻案"的话。可是，一旦重新工作，大权在握，他就扔下伪装，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进攻，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功勋，就在于及时而坚决地粉碎了党内资产阶级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我们国家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前进；就在于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亿万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要非常及时的**"。他们热烈欢呼："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只有邓小平这样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才对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

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还必须深入进行下去。我们千万不可松懈自己的斗志。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不会甘心认输。他们正在从自己的失败中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和手法。对此，革命人民必须有清醒地认识。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只要这种状况还存在，只要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还存在，"**走资派还在走**"，将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早在《通知》一周年的时候，毛主席就告诫我们："**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毛主席又指出："**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因此，我们对于同走资派的斗争，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一定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说过："**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我们在斗争中前进的十年，是我们国家发生巨大变化的十年。

我们要乘胜前进，发展大好形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坚持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要深刻认识文化

大革命的辉煌胜利和伟大意义，满腔热情地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要在批判邓小平的总目标下把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团结起来，继续搞好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们相信辩证法。我们坚信，"**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 不管革命的道路多么曲折，要经历多少反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是不可抗拒的，占人口总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总是要革命的。革命必然战胜反动，新生必然战胜腐朽，这是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诞生一百多年，旧世界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今天，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更是"西风残照"，衰败没落。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跳梁小丑，可能得势于一时，到头来只能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断言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在纪念《通知》十周年的时候，回顾文化大革命的战斗历程，放眼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展望天地翻覆的光辉前程，我们充满革命的豪情，决心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无不胜，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阻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

迟群、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机械系学员和干部学习一九七六年五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座谈会上的讲话 (节录)

一、关于学习问题

重要的问题是用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没有这一条不行。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查查老祖宗的书 (马列的书)，在那里找不到。所以必须很好地学习、理解。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我们要理论联系实际，不理解就难以联系实际。

比如，走资派可不可以改悔，该怎么理解？邓小平彻底暴露之前"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以后他的矛盾性质变了，走到对抗性方面去了。如刘少奇、林彪那样。"该怎么理解？毛主席说过，机会主义头子为首的，改也难。

阶级斗争是纲，马克思、恩格斯一百多年前就讲，毛主席几十年来一直讲，但是我们要从理论上彻底地承认它，在实践中清醒地坚持它，却并不容易。历史上有许多事情有惊人地相似之处，但形式却变化多端，敌人不会愚蠢到至今还讲那个"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

产力的矛盾"、也不会说布哈林那样的话或是林彪的那个最最最，连邓小平的话如今也不会讲了，因为这些都被人们批判过了、声名狼藉了。他们就要用令人不易察觉的形式出现，让你上当受骗。他们越是失败，就越是要疯狂地反抗，不然，路线斗争岂不是到了邓小平这里就停止了?! 不会的! 仍然要有斗争，还会有别的机会主义头子，别的挂帅人物跳出来。为此，首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学习马列，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

二、学习的重点

学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这篇文章要有个重点。重点搞清楚了、其它问题也就豁然开朗了。重点就是：走资派的问题，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从这个问题看到了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是什么；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到它是怎样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篇文章批邓，从几个方面加以剖析，也还是说明资产阶级在党内的问题。文章讲到斗争没有结束，同样是因为资产阶级仍在党内，走资派还在走。

文章最后讲形势和任务，还是围绕对走资派斗争这个问题。所以抓住这个重点，搞清楚走资派的本来面目，阶级实质、他们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比资本家还厉害，走资派还在走是长期的历史现象。搞清楚这些问题、其它问题就容易弄懂了。有人问，是不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要害是把走资派问题搞清楚。邓小平是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继续。资产阶级司令部问题，文章讲得很清楚了，自上而下制定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那不是一个人，是一个黑班子。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二号人物是邓小平，还有一大串人物，直到吴晗、廖沫沙，挂帅人物是刘少奇。林彪的下边有陈迫达，黄、吴、叶、李、邱，大小舰队、死党，林彪挂帅。这次邓小平，下边已经点了好几个，作为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光这几个人还成不了气候，但挂帅人物是邓小平。批判的大方向、重点，是批邓，偏离大方向就是没有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一定要坚持批邓的大方向，深入下去，进行到底。包括搞好清查。

三、关于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性

"和平演变"是相对而言，本身也包括不和平的一面。苏修对革命群众血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也说明这个问题。复辟的行动并不是不知不觉、舒舒服服地过去的，只是没动用飞机大炮就是了。镇压革命群众也是他们的一个拳头，看一看有的省市对革命造反派的镇压就知道了。

四、关于走资派的面目

一个时期攻击毛主席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四起，同时又大肆吹捧邓小平。刘冰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邓小平的讲话搞到学校来，并且急于要传达。我们告诉他们，需要请示市委后再决定传达不传达。下午回来告诉他们没有传达的任务，但他们已经传达下去了，就半天时间。"老九不能走"，一开始我们就认为是错误的，毛主席不会这样说。这句话有两个错误：一个，"老九"不是我们的语言；第二，"不能走"，怎么走了？文化革命几年走到哪里去了？从他们几个人到目前为止的交待，已经充分暴露出党内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狗屎不如。

有些人，总有一天人民要清算的。别看他们现在好象挺“左”的，领导这个，领导那个，不交待不检查总是过不了关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但不能犯了罪就不算了！有的人他还在布置清查呢，恶毒的政治谣言不就是从他嘴里出来的！有的同志说，干脆把那几个人的交待公布于众。我们说现在公布不策略，讲原则性还有个灵活性呢，不能只求一时痛快，不能那样干，说那些人犯了滔天罪行，一点也不夸大。对他们的疯狂性、危险性、顽固性、斗争的长期性，都要有充分的认识，否则不可能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路线斗争没有调和余地，有你就没有我、你死我活的斗争一点都不能含糊。但处理上还要有正确的政策和方法，无产阶级应当团结绝大多数的干部和群众。要把学校的斗争讲一讲，特别是在干部里边讲一讲。那时候刘冰几个就是同我们对着干，但是双方谁也没挑开，象演戏一样。他到处讲跟线不跟人。其实他连起码的马列主义都不懂。人和线是分不开的。怎么不跟人呢？共产党不跟马克思、列宁，不跟毛主席行吗？不崇拜马列、毛主席行吗？那还是共产党！？他们的话是经不起推敲的，他们根本不懂马列。

五、关于斗争策略问题

我们出去开门办学，有一条原则，不介入。就是说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搞运动。由于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我们考虑到全局上的复杂情况才这样规定的。有的同志说：“毛主席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但斗争要有策略。我们过去已有些同志上过一些当，和人家一块贴大字报。今年，有个县要开常委扩大会，有两派，要求我们参加。两派怎么参加啊，即便是一派也不参加。他们开的是常委扩大会，引到历史问题上来，我们不能参加，因为有人会利用清华的影响造成很复杂的情况。如果是开批邓大会，要我们发个言，贴出大字报，那是可以的。

六、目前形势下斗争的特点

走资派现在怎样走的问题。目前还有没有正在走的走资派？谁也不会说没有。既然有，怎么在走？当前形势下很值得我们研究。那种公开抵触的是一类，有的人并不是这样，他相当积极，有干劲，追查反革命和谣言，他还亲自挂帅追，但不是真追，是假追，为了保护自己，以“左派”的面目出现。还有的追谁呢？追的不是反革命，而是追查运动中的积极分子，批林批孔中的积极分子，文化大革命中的积极分子。

有个地方，邓小平一声令下就行动起来了。那些文化大革命前就已年老体弱，有病不能工作的人，去年都被请出来，提起来，当第一把手，他们在干什么呢？首先组织班子，你们想他能组织什么班子？他们也讲话，讲的是什么话？他们能执行什么路线？这些人心里不仅是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路线阴魂不散，还有文化大革命十年来积下的怨仇不解。他们那里的县委书记平均年龄 52.4 岁，地委书记 54.7 岁，省一级干部 40 岁以下的只有一个。有一次提干，统统提的是 60 岁以上的。我们不是说老的不行，毛主席说我就是最老的，问题是坚持什么路线。这些人文化革命前推行错误路线，文化革命中有气没出完，所以去年邓小平一声令下就杀气腾腾地出来了，有的人带着氧气袋来整革命派。而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包括老、中、青的。

七、关于斗争的长期性和无产阶级必胜的信念

毛主席讲，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又讲到斗争、矛盾，讲到一万年还有矛盾。主席这样讲，广大人民群众就可以监督“大官”们了。

走资派保护“大官”们的利益，就是主席早就讲过的保护既得利益，甚至讲过既得利益集团。当然，不是说让中央、省委的领导都去住平房，那样也要犯错误。但有的人连儿子、孙子的小楼也盖起来了。这些人在考虑什么？所以问题是路线。资产阶级的欲望越来越高，没有止境，他们对广大群众的剥削也越来越多，贪得无厌。一座小楼，还有两座小楼，这是他的“根据地”；设备还要最好的，差一点也不行。高薪还是纸面上的，不在纸面上的远远超过他的高薪。我们清华职工借家俱还要扣点钱，走资派那里沙发、地毯、风调设备，你从“高薪”里扣？他才不干呢！

八、关于批邓联系实际问题

批陈整风，批林整风，批邓要不要整风，要不要联系实际，我们在批邓的大前提下，抓阶级斗争，解决一些实际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呢？有人会说，这是矛头向下，我们就是要下到你这个人的头上，解决你的问题，当然把问题搞清了，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你这些问题不解决行吗？我们就是要整这些问题。

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节录)

——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吕　达

去年夏秋，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背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背着党中央，授意炮制了一个修正主义的工业管理条例，名曰《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条例》)。邓小平搞这个《条例》是干什么的？是真的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吗？否！《条例》就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在工交战线大搞翻案复辟。

邓小平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就必然把各行各业、各项工作统统纳入他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轨道。《条例》的“前言”和“工作总纲”声称：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把“三项指示为纲”作为今后二十五年“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这样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从而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引向歧途。

《条例》极力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反对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两个方面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一贯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教导，**说什么**："阶级斗争哪能天天讲。"《条例》按照邓小平的旨意，不讲阶级斗争这个纲，否认工交战线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否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企业的根本任务，把发展国民经济摆在纲的位置上，把社会主义企业说成仅仅是"生产的企业"。《条例》竭力攻击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开展的革命，"闹得企业不得安宁"，"破坏生产"；攻击用革命统帅生产的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借口"整顿"劳动组织，反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硬要把企业中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一律撤销"。《条例》不准人们批判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用"只注意生产""是很不对的"，"不注意生产""也是很不对的"这种折中主义手法，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否定无产阶级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

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基本完成，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仍然被资产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很顽强。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改造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那一部分上层建筑，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那一部分生产关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毛主席在批判邓小平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打着"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想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让人们埋头抓生产、搞建设，不关心国家大事，以便党内外资产阶级乘虚而入，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最近，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地暴露了邓小平"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真的险恶用心。

《条例》否认文化大革命以来工交战线出现的大好形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要走资派重新篡夺和把持企业领导权，改变社会主义企业的性质。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重新工作后，把工交战线的大好形势描绘成漆黑一团，迫不及待地要在包括工交战线在内的各条战线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首先把眼睛紧紧盯在领导权上。在他授意炮制的《条例》中，贯穿了一条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条例》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反对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什么"危害甚大"的是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他拿出当年搞独立王国的资产阶级老爷派头，挥舞"整顿"的大棒，要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中、青干部，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革命新生力量统统打下去。同时，要把那些所谓"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统统提到重要领导岗位上加以重用。什么"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什么"勇敢分子"，这里所指的正是那些同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什么"党性强"、"最有经验"的人，无非是指那些对文化大革命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一褒一贬，邓小平搞翻案复辟的立场何等分明!

一个"加快工业发展"的《条例》，只字不提反对走资派，不提工交战线的主要危险仍然

是修正主义，决不是偶然的疏忽。这正说明邓小平做贼心虚。他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挂帅人物，他授意炮制的《条例》怎么会提到走资派的问题呢?!

“翻案不得人心”。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这样一个《条例》，在工交战线上大搞翻案复辟，必然激起广大干部和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条例》是一份极好的反面教材。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深入批判邓小平及其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把它批深批透，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胜利，抓革命，促生产，把**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一浪高一浪地推向前进!

(原载 1976 年 5 月 31 日《人民日报》)

人民解放军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节录）

——批判邓小平在军队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六月四日)

斌　音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军指战员正和全国人民一道，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党中央的两项英明决议，掀起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新高潮。我们要努力作战，乘胜前进。

毛主席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缔造、领导和指挥的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一切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从他们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需要出发，总要拚命抓军权。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为了实现其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在军队竭力推行“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推行为其修正主义政治路线服务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去年夏季，正当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他在军队一次会议上抛出的那篇讲话，就是一大罪证。他全篇讲话，贯串一条黑线，就是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搞翻案复辟。他在讲话中，对抗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破坏我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污蔑我军大好形势，攻击文化大革命，为翻案大造反革命舆论；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否定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抛出抓班子的黑标准；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贩卖唯武器论等资产阶级军事观点。其要害，是妄图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对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必须彻底批判。

一

那次会议是在全国全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热潮中召开的。邓小平在讲话中竟然根本不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伟大意义，根本不讲我军学习理论的大好形势，而是兜售“三项指示为纲”，对这一学习运动极力加以干扰和破坏，妄图抽掉军队建设的灵魂，扭转我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被我军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群众运动吓得丧魂落魄，感到大难临头。他害怕我军掌握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高识别林彪一类党内资产阶级的能力，革他的命；他害怕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铲除资产阶级存在和产生的土壤；他害怕我军学习理论，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他搞复辟倒退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他拚命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疯狂地破坏我军学习理论。他玩弄折中主义的诡辩论，叫喊“三项指示”“是不可分割的，不能丢掉那一条”，否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抽掉了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指示的核心。邓小平鼓吹“不可分割论”，包藏着祸心。谁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放在首位，他就给谁扣上一顶“分割毛主席指示”帽子，就可以用捏造的罪名进行打击迫害。这里，他采用了林彪反党集团“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毛主席的力量”的反革命策略，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中央，指向广大革命群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根本目的，是要抓紧阶级斗争这个纲，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无产阶级军队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武装，才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自觉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做好各项工作，加强部队建设，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作用。而邓小平鼓吹“不可分割论”的同时，却在嚷着学习理论要落实在“加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这就充分暴露了他那个“学习理论”，纯粹是一个幌子。邓小平把学习理论篡改成为“加紧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的东西，就是回到他和刘少奇那个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的老路上去。在这个讲话中，他露骨地叫喊军队工作要以“整顿”、“准备打仗”为纲，连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影子都没有了，把骗人的幌子也扔掉了。这就充分说明，“不能丢掉”是假的，要丢掉、完全取消理论学习，才是真的。

我军指战员在学习理论运动中，努力搞清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积极创造**“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四九八页），坚持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两个方面的革命。邓小平则把资产阶级法权当作命根子，别有用心地说：“过去几十年，……我们是出了力的，是有分的”。邓小平把参加革命当作入股，充分暴露他投身革命队伍不过是一个投机商，是为了捞一把。他在另外一次会上还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极力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反对我军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反对我军铲除滋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土壤，反对我军继续革命。

二

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作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贯彻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行动部署就是“全面整顿”，包括“整顿”军队。他在这篇讲话中，散布种种奇谈怪论，污蔑我军大好形势，耸人听闻地把“整顿”提到“纲”上，大叫大嚷抓班子的“整顿”，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妄图篡夺领导权，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

一九七一年，伟大领袖毛主席作了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指示，强调指出：抓军队工作、无

非就是路线学习，纠正不正之风，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讲团结。这就告诉我们，军队整顿，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们的流毒和影响，发扬对资产阶级勇敢战斗的精神，坚持继续革命，更好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加强部队建设。邓小平竟然接过军队要整顿的革命口号，干反革命的勾当。他讲"整顿"，一不讲阶级斗争，二不讲路线学习，三不讲批林批孔、批资批修，完全阉割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他以"报忧"为名，污蔑我军"今不如昔"、"问题成堆"，什么存在"五个字"、"三种班子"呀，什么"传统作风丢掉了"，"雷锋叔叔不在了"，等等。更恶毒的是，他把这些说成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这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矛头对着文化大革命，对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反动到了极点。

曾经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二号头目的邓小平，一想起当年我军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造他们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就满腹仇恨，火冒三丈，一看到我军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崭新面貌，就惊恐不安，不寒而栗。因此，邓小平杀气腾腾，挥舞"整顿"大棒，要整掉阶级斗争这个纲，要整掉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整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继续推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改造我们的军队。邓小平所谓的"整顿"，不过是妄图改变我军性质，以便他翻案复辟的旗号。

列宁说："**什么叫做复辟?复辟就是国家政权落到旧制度的政治代表手里。**"(《列宁全集》第十三卷第三O三——三O四页）邓小平抓班子的"整顿"，就是翻案复辟的组织措施。他在这篇讲话中，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提出所谓"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选拔干部的三条标准，鼓吹要靠"老家伙"。他的"三条"，根本不讲搞马克思主义，根本不讲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不讲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这同林彪的"高举"、"突出"、"干劲"三条黑标准是一路货色。邓小平不是宣扬"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吗？这就是对他的"三条"最好的自我注解。他所说的靠"老家伙"，不是指靠广大的革命老干部，而是靠跟他搞翻案复辟的那种人，革命的老、中、青，他是不靠的，统统要"滚"开。为了兜售这套黑货，邓小平还嚣张地说，管干部"要不信邪"。他这个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视修正主义为"正"，视马列主义为"邪"。他"不信邪"，就是不信马列，不信毛主席关于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翻案不得人心**。邓小平妄图推行翻案复辟的这一套控制军队领导权，是绝不能得逞的。我们要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保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保证我们党和国家不变颜色，保证我们军队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永远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三

邓小平这篇讲话，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党的基本路线，不谈修正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却侈谈什么"准备打仗"为纲，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使我军背离党的基本路线，取消我军对内反复辟倒退、对外反侵略颠覆的神圣职责。

邓小平极力反对毛主席为我军规定的任务，歪曲我军建设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撇开反复辟这个重要问题去讲"加强战备"，蛊惑人心地提出"准备打仗"为纲的口号，这是十分反动的。要准备打仗，是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我们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

国、解放我国神圣领土台湾，是我军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的重大任务。特别是在当前苏美两霸明争暗斗越来越激烈，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到处侵略扩张的情况下，广大指战员正百倍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入侵之敌。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军一分钟也没有忘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任务。最近，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大危险。我们要镇压已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反抗，更要重视对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警惕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邓小平鼓吹“准备打仗”为纲，就是妄图使我军忘记反复辟的任务，听任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听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的军队，松懈我们的斗志。这是他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玩弄的阴谋诡计。

邓小平还声称照他的一套办，“有什么风吹草动，军队就可以掌握住”。这句极其反动的黑话，暴露了他妄图利用军队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野心，说明他取消我军反复辟的任务正是为了搞复辟。

邓小平的“准备打仗”为纲，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实际上就是林彪鼓吹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翻版。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大肆散布唯武器论，只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公然反对“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第二三二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胡说什么“打仗就是要钢铁，就是要有色金属。”真是典型的唯武器论。战争胜负不能用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是由战争的性质、路线是否正确和人的觉悟来决定的。我军打仗历来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靠人民的支援和广大民兵的配合，靠革命战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用劣势装备战胜国内外优势装备的敌人。如果按照邓小平“打钢铁”的荒谬逻辑，苏修、美帝的钢铁最多，那就只能允许它们侵略别人，而被侵略者只有束手就擒，跪倒在两霸脚下任其宰割。这样，反霸斗争、民族解放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岂不统统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吗？这是十足的叛徒哲学！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武器的作用。毛主席、党中央一贯关心我军武器装备的改善，重视战备训练，强调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战争的准备，要有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只有提高广大指战员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才能有最好的基础去发挥武器的作用和技术、战术的效力，才能完成我军肩负的对内反复辟倒退、对外反侵略颠覆的神圣任务。

毛主席在今年年初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斗争在继续进行。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批孔和评论《水浒》，树立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要针锋相对，寸步不让，进一步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要提高警惕，加强战备、密切注视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动向。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胜利成果，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英勇战斗。

（原载 1976 年 6 月 4 日《解放军报》）

〔附〕 军事战线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解放军报》编辑部

围绕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我们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展开了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这是一场维护还是反对毛主席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的斗争，是坚持把我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还是变军队为资产阶级野心家篡党夺权工具的斗争。军事战线上这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我们党第十一次重大路线斗争的深刻和激烈。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决定性战斗，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蓄谋已久。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一再地严厉批判"四人帮"，亲自领导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反复的斗争。一九七五年年初，四届人大的胜利召开，挫败了"四人帮"妄图组阁夺权的阴谋。"四人帮"不甘心失败，继续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党中央根据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采取有力措施，召开了铁路、冶金等一系列会议，逐步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着手解决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问题。一九七五年六、七月的军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为全军所盼望，为全国所瞩目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前，我们党我们军队同这个反党集团作斗争的一个突出表现。

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是一次什么样的会议呢？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领导下举行的。会议的议题和文件是经过毛主席看过、同意的。这次会议，是针对林彪干扰破坏军队建设和"四人帮""放火烧荒"反军乱军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而召开的，是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而召开的。会议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深入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也批判了"四人帮"鼓吹的一套谬论，同他们进行了斗争。叶剑英副主席、邓小平副主席在会上作的重要讲话，贯彻了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恰当地估量了军队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是军队工作的纲，规定了加强军队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这次会议，运用毛主席思想解决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是正确的，会上的两个重要讲话是正确的，反映了全军指战员的心愿，得到了毛主席的赞成和批准。这是一次批判和清算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会议，是一次给"四人帮"反军乱军篡党夺权阴谋以沉重打击的会议，是一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会议。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开得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会议对我军的成绩和主流作了充分肯定，针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问题，例如不同程度的肿、散、骄、奢、惰现象和有些单位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状态，提出要选好干部，整顿和健全各级领导班子；针对林彪、"四人帮"分裂革命队伍，破坏党的团结，搞乱人们思想，提出要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批判资产阶级派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提出要贯彻安定团结的方针，认真落实党的政策；针对林彪、"四人帮"争名夺利，抢班夺权，对一些干部和群众"诱以官、禄、德"，败坏党的作风，提出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作风

的影响和腐蚀，坚决同不良倾向作斗争；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革命纪律，鼓吹"踢开党委闹革命"，煽动无政府主义、提出加强党的领导，增强党的观念，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针对林彪、"四人帮"破坏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提出要加强政治工作，改善武器装备，搞好战备，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等等。总之，一句话，号召全军**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会议针对"四人帮"反军乱军，严肃指出，不允许任何野心家插手军队，搞阴谋活动。会议期间，还在一部分同志中传达了毛主席对"上海帮"即"四人帮"的多次严厉批评。所有这些，在"四人帮"窃取一部分权力、身居高位的时候提出来，是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和抵制"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支持和鼓舞。因而全军拥护，人民高兴。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问题，采取的方针、政策、措施，有着普遍的意义。人们自然要想到：军队要消除林彪、"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别的战线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吗？军队要整顿，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贸易、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文学艺术、包括党，不是也应该整顿吗？事实上，军委扩大会议的文件经毛主席批发后，对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也发生了重大影响。人民解放军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整顿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巨大威胁。按照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进行整顿，必然会要整到"四人帮"头上。正因为这样，"四人帮"极端害怕，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纠集党羽亲信，开动宣传机器，恶毒攻击和全盘否定这次会议。

"四人帮"及其党羽鼓噪而起，歪曲、篡改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给军委扩大会议戴上"不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唯武器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等等大帽子。什么是纲？纲就是主题，就是主要矛盾。阶级斗争这个纲，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是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的。只有坚持既抓好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阶级斗争这个纲，又抓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纲，才是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主席关于抓纲的思想。毛主席指出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讲的是阶级矛盾和其他各种矛盾的关系，决不是说，在其他方面就不能有纲，不许有纲。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把"**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作为军队工作一个时期的纲，抓住了军队建设的主题，抓住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军事战线上的具体表现，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纲的思想的。关于人和武器的关系，毛主席强调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同时又指出武器是重要因素；毛主席讲过，原子弹是纸老虎，也讲过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这个东西。为什么一讲改善武器装备就成了"唯武器论"呢？关于政治和军事的关系，毛主席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同时也一再强调必须提高军事艺术。怎么能说抓军事训练就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呢？"四人帮"给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捏造的种种罪名，不仅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其手段也十分卑劣。邓副主席在讲话中讲到打仗要有钢铁和有色金属，而工业上打钢仗，如同军队打硬仗一样，把钢铁搞上去不容易。"四人帮"玩了个把戏，一变就成了"打仗就是打钢仗"，然后把它歪曲为唯武器论肆意攻击。"四人帮"惯于断章取义，篡改伪造，制造靶子，扣帽子，打棍子，到处整人。他们对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诬蔑攻击，就是这类"杰作"的一个典型！

"四人帮"攻击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谬论必须批判，被他们搞乱了的是非问题必须澄清。究竟整顿是革命还是复辟？究竟要不要准备打仗？究竟要不要加速军队革命化现代化建设？把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影响整顿掉，究竟是不是"否定大好形势"，是不是"翻案"、"算帐"？这些问题不搞清楚不行。粉碎"四人帮"以来，遵照华主席、叶副主席指示，在部队广泛进行的十个"应该不应该"的教育，就是做的这项工作，就是为了分清是非，拨乱反正。

这个工作要继续做，反复做，要抓紧抓好。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围绕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这场大是大非的斗争，根本之点，在于我们这支军队的领导权必须紧紧掌握在党和人民的手里，而决不允许被“四人帮”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所篡夺。

“四人帮”全盘否定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会议所以使“四人帮”既恨又怕，说到底，就是因为妨碍了他们夺权。“四人帮”从一九七五年冬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他们覆亡之前，施展种种阴谋诡计，给这次会议罗织那么多的罪名，就是要通过破坏这次会议，诬陷和打倒军委领导同志，把毛主席为我军建设所规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掉，把毛主席为我军培育的光荣传统否定掉，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班子否定掉，从而篡夺军权，进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为我军五十年战斗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在“四害”横行、我们党和国家面临巨大困难的情况下，使我们这支军队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不被“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所篡夺，充分地发挥了无产阶级专政坚强柱石的伟大作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对粉碎“四人帮”和稳定全国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我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深扎了根，毛主席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同时，也应该说，这跟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召开和会议精神的贯彻分不开。会议精神一经贯彻，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明显效果，部队工作大有起色。后来，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会议精神的贯彻被迫中断，但是，广大指战员的心始终向着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路线。会议的主要精神，实际上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推动着部队的工作，这个因素一直在起作用。尤其是根据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精神，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调整配备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使我军在一九七六年那样的惊涛骇浪中顶住了“四人帮”，并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新功。

粉碎了“四人帮”，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得以继续贯彻。现在进一步肯定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有着重大的意义。“四人帮”对会议的种种攻击诬蔑，矛头是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充分肯定这次会议，就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就是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

抓纲治军，准备打仗，就是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继续、深化和发展。抓纲，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把揭批“四人帮”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抓的纲。对军队工作来说，还要继续坚持抓好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这个纲。整顿是为了准备打仗，准备打仗主要是抓好整顿。搞好整顿，就是要在贯彻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一步，在抓纲治国、抓纲治军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乘胜前进，把“四人帮”连同他们包庇和掩盖的林彪那一套极右的货色全部扫除掉。我们既有贯彻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经验，又总结了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给抓纲治军规定了明确的方针、任务、政策、措施，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恢复或者制定出了章程。有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军事路线作指针，有党的十一大路线的指引，军队建设各方面的工作又有章程可循，我们全军同志一定能够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紧密地团结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实现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各项任务。

（原载 1978 年 1 月 30 日《解放军报》）

〔附〕 十年来围绕军权问题同林彪、“四人帮”的激烈斗争

(一九七八年四月三日)

军事科学院批判组

从一九六七年林彪伙同江青炮制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动口号起，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垮台之日止，十年来的大量事实证明，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是一贯反军乱军篡军，妄图毁我长城的罪魁。现在，我们回顾一下他们进行的反军乱军篡军的阴谋活动，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这对于我们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加强我军建设，是很有必要的。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军权问题上，十年来同我们党进行了多次激烈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江青授意起草一个“宣传要点”，提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动口号，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人民解放军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军委一些负责同志，并且特意嘱咐速送林彪，林彪当即批示“完全同意”。不久，他们又合伙策划了一个批判“带枪的反动路线”的阴谋，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反军乱军的妖风。江青还伙同陈伯达之流煽动冲击国防部和驻京军事领导机关，制造反军乱军的轩然大波。紧接着，林彪又策划造总政的反，叫嚣“要砸烂阎王殿”，江青则派其心腹去“战斗”、去“突击”，要撵走“阎王”，赶跑“小鬼”，妄图搞垮总部的一些领导机关。他们制造种种耸人听闻的什么“兵变”、“逆流”、“冲击事件”等政治谣言，恶毒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狂吠什么：“带枪的反动路线不打倒，不带枪的就打不倒！”张春桥也乘机跳出来抓军权，嚎叫“有人说我不能管军队，为什么不能管，我就是要管！”毛主席及时察觉了他们的阴谋，痛斥“揪军内一小撮”、“带枪的反动路线”的反动口号，严厉指出这是“毁我长城”。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多次发布命令、通知，三令五申“不准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不准冲击军队和军事领导机关，不准到部队抓人。周总理忠实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无微不至地关怀革命老干部，保护了一大批治党治军的骨干，使林彪和江青、张春桥一伙的反革命阴谋未能得逞。

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一伙利用窃取的部分权力和特殊身分，继续进行反军乱军活动，打着拥护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妄图篡夺军队最高统帅权。林彪“大树特树”自己，肆意篡改党史军史，冒充建军“创始人”；大搞“清君侧”，“借用毛主席的力量打击毛主席”；拼凑大、小“舰队”，策划武装暴乱。陈伯达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却以“太上皇”自居，到部队乱跑乱说。江青肉麻地吹捧林彪，帮助林彪搞“架空术”，炮制“缔造者不能指挥”的谬论，为林彪篡夺军队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搞突然袭击，公开发难，妄图抢班夺权。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江青与张春桥则哀叹：“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阴谋加紧篡军夺权。毛主席英明果断地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策划的未遂的反革命政变，采取“甩石头，掺沙子，挖墙脚”等项办法，改组了被林彪一伙严密控制的军队领导机关，领导全党全军进行了“批陈整风”运动，又一次挫败了他们反军乱军的罪恶阴谋。

林彪反党集团覆灭后，"四人帮"一方面赶紧指使迟群和那个女黑干将钻进林彪黑窝、控制黑材料，企图毁灭他们与林彪相互勾结、为非作歹的罪证。另一方面，又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反林英雄"，直接插手军队。他们借"批林批孔"，施展了种种鬼蜮伎俩，掀起一个反军乱军的新高潮。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抵制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要军权，毛主席就是不把军权交给他们，亲自提议邓小平同志兼任总参谋长，并予以高度的评价，又一次粉碎了他们篡军的阴谋。

但是，"四人帮"篡军夺权的野心并未因此收敛，反而恶性膨胀，到了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更加充分地暴露出来。围绕这次会议，我们同"四人帮"展开了一场大搏斗。这次会议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举行的。会议的议题和文件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根据毛主席建军思想所作的重要讲话，是对林彪、"四人帮"多年来破坏军队建设罪行的有力批判，是捍卫毛主席军事思想和路线的光辉文献，对加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整军备战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四人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既恨又怕，极力进行破坏，会前会后大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七月十一日，军委领导同志讨论会议总结讲话稿时，张春桥假惺惺地表示，总结讲话说得好，讲得很全面。对邓副主席的讲话，张春桥也说，讲得好，要放开讲。七月十七日下午，军委领导同志讨论将会议讲话和文件呈送毛主席、党中央审批时，王洪文、张春桥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七月十八日晚，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党中央名义转发军委扩大会议文件时，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也都表示同意。但是，会议刚刚开过不久，他们就来了个全盘否定。王洪文、张春桥恶毒攻击叶副主席、邓副主席，大肆诬蔑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多着呢"，"要批判的不只是这两个讲话"。王洪文私调会议文件、记录和一些大单位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的有关材料，阴谋"秋后算帐"。他们还强令推广由他们的亲信一手炮制的一个连队"批判"军委扩大会议的"经验"，指使心腹撰写大量恶毒攻击"两个讲话"的反军乱军黑文，千方百计地干扰和破坏这次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四人帮"对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主席批准的我军各大单位的领导班子特别不满，诬蔑为"复辟班子"、"翻案风的产物"，王洪文气势汹汹地提出要重新"解决"，"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甚至咬牙切齿的叫嚷："刮上去的要刮下来，刮下来的要刮上去，刮进去的要刮出去，刮出去的要刮进来"，并且无耻地说："只有反大的，才能当大的"。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全军广大指战员无比忿慨，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自以为篡党夺权的时机日趋成熟，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公开发难。他们继叫嚣"揪党内资产阶级"之后，又抛出了"揪军内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作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竭力推行这个反动口号，江青、张春桥指使亲信到处开黑会，在全军大肆鼓吹写揪"军内走资派"的文艺作品；擅自向军队散发黑材料，煽动搞"大辩论"、"层层揪"，无故制造事端，诬陷革命领导干部。"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马天水等人伙同在南京部队的那个代理人，指使他们的亲信，在某连强行讨论"军内资产阶级"问题，炮制了一个上报下发的"理论讨论会的情况报告"。他们还搞什么"倒蹲点""上调查"，调查所谓"军内资产阶级是如何吸战士血的?"千方百计进行反革命煽动，妄图在全军再次掀起反军乱军的恶浪。他们还趁毛主席病重之际，加紧搞他们的"第二武装"，妄图夺权于危难之间。直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还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负隅顽抗，进行垂死挣扎。但这一切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终于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宣告彻底破产。

十年来，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围绕兵权问题展开

的阶级大搏斗。它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每当这伙反党集团在党里、政府里阴谋夺权最猖狂的时候，也是他们反军乱军最猖狂的时候。每当毛主席、党中央率领我们进行反击，他们就变换策略，窥测方向，等待时机，重新反扑过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斗争时起时伏，直至他们彻底完蛋。从这个斗争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为了搞垮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真是费尽了心机，耍尽了阴谋，但他们这一套罪恶勾当总离不开"反、乱、篡"三个字。正象叶副主席所概括的，林彪、"四人帮"对于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就是要"搞乱它，篡夺它、毁掉它"。

（一）枪杆子掌握在谁手里，这是历次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毛主席一贯强调，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枪杆子必须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而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总是要篡夺军权。林彪声称："要学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兵力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叫嚷"我们不仅要管军权，还要管党权、政权、财权"。"四人帮"由于在军队里没有林彪那样经营多年的"资本"，加之名声又臭得很，不能象林彪那样明目张胆地搞"枪指挥党"。因此，另耍花招，接过"党指挥枪"的口号，图谋搞"帮指挥枪"，公然标榜"我就是党"，叫嚷"我要管军队"，"我们要掌握军权"。他们鼓吹"取消论"，要"踢开党委闹革命"；鼓吹"代替论"，要成立帮派体系的"第二党委"、"运动办"来取代党委领导；制造"对立论"，把各级党委同党中央、中央军委对立起来，把所谓"路线领导"与组织领导对立起来，否定各级党委。更有甚者，他们的那些"帮员"有的在军内没有任何职务，却借口"一元化领导"，伸手要求当军队的"政委"，拚命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林彪、"四人帮"在进行一系列篡军的阴谋活动中，又特别把打倒军队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事情很清楚，如果说，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民解放军，是他们篡党篡国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我军经过革命战争和政治风浪考验的广大革命干部，则又是他们妄图篡军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也就是林彪所以发出"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的反动叫嚣，"四人帮"所以要当"吃掉老帅"的"过河卒子"，要"揪军内一小撮""揪军内资产阶级"的根本原因。然而，第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严重较量的结果反复证明，我军广大革命干部不愧是反修防修的主心骨，治党治军的骨干。毛主席早就谆谆告诫全党，再也不要学张国焘，决不能争个人的兵权。历史上，凡与党争兵权的，绝没有好下场。张国焘自恃枪多人多，与党闹分裂，要篡军夺权，结果落得个单枪匹马，叛变投敌。高岗搞"军党论"，……也都要篡军篡党，结果全都垮了台。林彪搞"军队中心论"，要"调动一切""指挥一切"，南面称王，不可一世，结果是折戟沉沙，摔死于异国荒丘。"四人帮"篡军篡党心切，硬要踩着历史上这些反党分子的脚印走，同样遭到历史的惩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毛主席在揭露林彪反党集团篡军篡党的阴谋时，曾经说过，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党和人民掌握的兵权，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任何野心家、阴谋家篡夺不了的。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夺军权，还大肆叫嚣要"改造"解放军，妄图改变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使我军成为他们实现个人野心、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改造"什么呢？他们要改变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疯狂地反对和破坏学习雷锋的群众运动，污蔑雷锋式的战士是"不长角的老黄牛"、"没有头脑的螺丝钉"，鼓吹"闹而优则仕"，诱人以"官、禄、德"。他们要篡改我军的三大任务，别有用心地提出我军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根本职能"是"批判党内资产阶级"，军队的"主攻方向"是"革党内走资派的命"。他们要"改造"我军革命的政治工作，"纠正"政治工作的所谓"方向偏差"，诬蔑军队政治思想工作是"五十年代水平"，妄图用

他们的那套"赛诗会""学唱戏"充当"军队政治思想建设的主要工作"，用所谓"儒法军事思想斗争教育"等封资修的黑货来取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他们诬蔑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过时"了，大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败坏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很明显，"四人帮"的所谓"改造"，正是要改掉毛主席为我军制定的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改掉我军的生命线，改掉我军的革命灵魂，也就是要从根本上把我军"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军队，成为林彪、"四人帮"御用的"舰队"和"炮队"。这当然是痴心妄想！我军从诞生起就是在毛主席建军思想和路线指引下，成为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新型军队，五十多年来，我军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各种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抵制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腐蚀，始终"如松柏，傲霜雪"，保持和发扬了毛主席亲手创立的优良传统，保持着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本色。

（二）在两个阶级的大搏斗中，是保持部队稳定，还是把部队搞乱，这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我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柱石不稳，房子就会摇晃；长城被毁，敌人就会乘虚而入。林彪、"四人帮"懂得，篡党必须篡军，篡军必须乱军，因此，唯恐军队不乱，拚命从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制造混乱，越乱越好。张春桥叫喊："乱要乱透，不光肉要煮烂，连骨头也要煮烂。"这句话最集中地刻画了林彪、"四人帮"乱军乱党的狠毒心肠。他们混淆两种乱子观，鼓吹"乱军有理"、"乱军有功"，要"乱的你睡不着觉"；歪曲斗争哲学，鼓吹"斗争就是政策"，煽动"坏人斗好人，好人斗好人"；篡改民主集中制，胡说部队不搞"四大"就是"压制民主"；破坏革命纪律，扬言"错误领导要抵制"，煽动无政府主义，制造官兵对立。为了搞乱军队，他们采取"上下夹攻，里应外合"的反革命策略，一是拿统帅机关开刀，鼓吹"上层下层，上层最危险"，歇斯底里地叫嚣要"揭"、要"砸"、要"炸"。二是点火于基层，煽动基层"给军区送大字报"，"造军委的反"，唆使一些人到处砸"土围子"，拔"据点"，扫除"顽固势力"。三是炮制所谓"开门建军"的"新鲜经验"，实行内外勾结，借助军外所谓"反潮流"的"英雄"，传播捣乱诀窍，大刮乱军阴风。但是，他们的这一套阴谋统统破了产。我军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岿然不动，稳如泰山。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一再强调军队要稳定，不准冲击军队，不准未受中央委托管军队工作的人插手军队；还多次规定，军队要坚持正面教育，军以下单位不要搞"四大"，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这些规定和措施是十分英明和正确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军队稳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阶级斗争的需要，是保证我军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需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粉碎×××、林彪、"四人帮"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保持全国局势的稳定，是与人民解放军保持稳定，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作用分不开的。

（三）林彪、"四人帮"，特别是"四人帮"，在篡军无望、乱军不成的情况下，便加紧了全面反军的罪恶活动，恨不得从我们的国家机器中，从地球上，根本抹掉我军这样一支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他们利用窃取的职权，纠集御用写作班子，动用各种宣传工具，大造反军舆论，极力丑化、贬低解放军，以便推倒这支伟大的军队。他们大肆攻击"军队靠不住"的同时，给我军罗织了许多条"罪状"。什么军队"资产阶级化了"，是"资产阶级常备军"，"和旧军队差不多"，"当官"的是"军阀"，当兵的是"兵痞"、"刁小三"；什么军队资产阶级权利"最厉害"，是"正统"，是林彪一类搞"以军治党"的"基础"，是"走资派的防空洞"；什么军队"等级森严"，"军内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战士"比地主还厉害"；什么军队整顿是"复辟倒退"，加强

战备是"备而不战"，抓武器装备是"唯武器论"，"打钢仗"；什么解放军战斗力"不如民兵"，"打起仗来只能起放哨作用"。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既然解放军"靠不住"，他们信不过，当然就可设法取消这支军队了。按照"四人帮"的如意算盘，那就是用他们"改造"好了的"民兵"取而代之，另立他们的"第二武装"。为了经营"第二武装"，他们不仅耗费了许多心血，极力破坏"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而且把它吹得神乎其神，说他们"犹如哥白尼发现太阳一样"发现了这个"新生事物"，说民兵能够"管党管政管民"，一直到共产主义，"寿命最长"。然而，解放军是骂不垮、推不倒的，而"四人帮"搞的"帮家军"恰恰是"寿命最短"，还没有来得及出娘肚子就夭折了。它的唯一"功绩"，就是作为反军罪证而被列入万恶的"四人帮"的"罪行录"。

林彪、"四人帮"这伙妄图毁我长城的罪魁，虽然曾经猖獗一时，但终于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林彪、"四人帮"的篡军夺权的罪恶活动始终贯穿着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十年一线穿，"两家"是"一家人"。他们一直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他们这样拚命地反军乱军，篡军夺权，有着共同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他们都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集中反映了国内阶级敌人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愿望。他们是一伙极端的主观唯心论者，信奉的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至上的法西斯哲学，他们把追求"统治和奴役的权力"看得高于一切。他们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一贯倒行逆施，根本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因此，必然被历史前进的车轮所粉碎。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不可战胜的，永远是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不可动摇的伟大长城。"撼山易，撼解放军难"，这个颠扑不破的伟大真理，必将在我党我军的史册上永远闪耀灿烂的光辉。

(原载 1978 年 4 月 3 日《解放军报》)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讣告
朱 德 同 志 逝 世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讣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沉痛宣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

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

朱德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巨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学习朱德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

（新华社1976年7月6日讯，载7月7日《人民日报》）

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

毛泽东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韦国清　刘伯承　江　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宋庆龄（女）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　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　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邓颖超（女）　曹轶欧（女）　康克清（女）　粟　裕
王　震　余秋里　谷　牧　孙　健　沈雁冰　江　华　金祖敏　谢静宜（女）
杨坡兰（女）　杨成武　梁必业　张宗逊　肖劲光　马　宁　张耀祠　姬鹏飞　吴庆彤
胡　炜　林丽韫（女）　蔡　啸　朱蕴山　史　良（女）　胡愈之　沙千里　季　方
黄鼎臣　周培源　田富达

（新华社1976年7月6日讯，载7月7日《人民日报》）

朱德同志治丧委员会公告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

一、为深切悼念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会委员、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定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九日、十日举行吊唁仪式。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自发表讣告之日起至十一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二、按照我国的惯例和礼宾改革，决定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参加吊唁活动。

特此公告。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

（新华社 1976 年 7 月 6 日讯，载 7 月 7 日《人民日报》）

首都隆重举行朱德同志追悼大会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七月十一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朱德同志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哀悼。当天，全国下半旗志哀。

追悼大会会场庄严肃穆，四周挂着黑纱。会场入口的横幅上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永垂不朽！"会场里悬挂着朱德同志的遗像，安放着朱德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了兰草和鲜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也送了花圈，他们是：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也送了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群众团体，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台湾省爱国同胞，以及南昌市、井冈山地区、延安市、晋东南地区、四川省仪陇县的党委和革委会。

人大常委会委员、朱德同志的老战友、夫人康克清同志献的花圈，放在骨灰盒前面。

参加追悼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韦国清、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以及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

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首都工农兵代表和爱国人士，在朱德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员和医务工作人员，共五千人。

康克清同志参加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向康克清同志和亲属表示亲切的慰问。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追悼会。追悼会开始，奏哀乐，全体肃立默哀。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致悼词。

华国锋同志说："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

他说："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华国锋同志说，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学习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

华国锋同志说："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追悼会结束后，朱德同志的骨灰盒，由陈锡联、吴德、李素文同志等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

朱德同志患病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前往医院探望。

朱德同志逝世讣告发布以后，首都新华门、天安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

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和首都群众三千多人于七月八日前往北京医院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向朱德同志遗体告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韦国清、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九日和十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朱德同志逝世举行了隆重的吊唁仪式。首都工人、农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学生一万五千人，怀着敬爱和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他们一致表示要学习朱德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

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大厅里摆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共中央送的花圈，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以及党、政、军各机关和群众团体，台湾省爱同胞，港澳同胞和一些华侨送的花圈。

许多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外国友好团体和组织，外国驻中国大使、大使馆，正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实习生送了花圈。其中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文铭权，巴西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中央委员会，意大利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组织，美国十月同盟（马列）中央委员会；

比利时国王，乍得国家元首、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部长会议主席，丹麦女王玛尔格蕾特二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统，塞古·杜尔总统，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总理、政府和人民，意大利共和国总统，日本国天皇，日本国总理大臣三木武夫，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马里全国解放军事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挪威国王奥拉夫五世，巴基斯坦总统，巴基斯坦总理，菲律宾共和国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总统和夫人，瑞典摄政王，多哥共和国总统埃亚德马将军，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土耳其共和国总统，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扎伊尔共和国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和人民，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加拿大政府和人民，希腊共和国政府，荷兰王国政府、新西兰政府和人民，秘鲁人民和政府，瑞士联邦委员会，以及日本外务大臣和菲律宾外交部长。

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的有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德钦巴登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尤素福·阿吉托罗普，以及正在北京访问和常驻北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代表，也前往吊唁。

党和国家领导人姚文元、陈锡联、吴德、陈永贵、吴桂贤、乌兰夫、李素文、姚连蔚，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姬鹏飞，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在大厅里分别接待外国朋友，向他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新华社1976年7月11日讯，载7月12日《人民日报》）

华国锋第一副主席在朱德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一日)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朱德同志。

朱德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一分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朱德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朱德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朱德同志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建设和壮大革命根据地，对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建设我国的革命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感到深切的悲痛。

朱德同志是四川省仪陇县人。他早年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从事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活动。一九一五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在斗争中，他逐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在党的领导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朱德同志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一九二八年，他率领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发动了湘南起义，然后上井冈山，同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部队会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他担任军长。从此，朱德同志就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建军路线的指引下，为人民军队的建设和发展，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壮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九三〇年起，他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华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四年，他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他对叛徒张国焘的分裂红军和叛党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担任八路军总司令。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朱德同志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一九五四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并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朱德同志均当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朱德同志在一九三〇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从一九三四年党的六届五中全会起，被选为历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党的七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党的八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

席。党的十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几十年来，朱德同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在反对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英勇斗争，不屈不挠，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在悼念朱德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不断革命的精神，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终生。

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勇敢地对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凶狠的阶级敌人面前，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英勇战斗，奋不顾身，充满着胜利的信心。

我们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处处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我们要学习他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密切联系群众，谦虚谨慎，平易近人，艰苦朴素，以身作则，坚决反对一切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同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朱德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深人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76 年 7 月 11 日讯，载 7 月 12《人民日报》)

〔附〕 最 后 的 十 年

——康克清谈朱德同志

尽管十年前的 7 月 6 日，朱德同志就怀着深重的忧虑，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终身而又正处在劫乱中的人民，但他和蔼的形象，他光辉的业迹，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里。对康克清同志来说，自然更是如此。

朱总诞辰百周年前夕，我又一次见到令人尊敬的康克清大姐。我曾有幸听她讲过她和朱总一起走过的战斗历程，知道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始终相随相依。然而，在康大姐的心目中，他们最后十年的共同生活，却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因为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朱总和我们的许多老革命家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她，最了解朱总在十年逆境中所表现出来的鲜为人知的高风亮节。

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朱老总，康大姐说：“运动刚开始时，朱总很少说话，常常一个人独坐默想，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是十分苦闷的。”

显然，对于那历史性灾难的突然降临，朱总虽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也不能理解。但由于种种复杂的政治原因，他只能默默地思考，无言之中偶尔

流露出心中的怀疑。一次，他突然问道："戚本禹怎么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还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而这次却不屑一提。他这种卑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

当林彪和江青相互勾结，煽动造反，点名批判、关押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领导同志，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及彭德怀、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帅的大字报帖上街头的时候，朱总坐不住了。他拄着手杖，在中南海里看大字报，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面对那些造谣和诬陷，他要么脸上露出一丝冷笑，要么无言地愤懑，实在气愤极了，才说："心怀叵测、心怀叵测呀!"

1966年12月的一天，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开会布置揪斗朱老总。就在这天晚上，一伙人闯到朱总住处。正巧这晚朱总不在家，那些人就在门前和墙上帖满"朱德是黑司令"、"朱德是大军阀"、"炮轰朱德"等大字报。接着，北京街头也出现"打倒朱德"的大标语，还成立了"揪朱联络站"，策划召开"批斗朱德大会"。对此，朱总一笑置之。当有人问他时，他坦然地说："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是最公正的!"

有一天，康大姐回到家里，见朱总正看一张传单，传单上说：成立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在一个地方开过会，朱总当了中央书记，还有其他负责人的名单。朱总看过后笑了。康大姐问他笑什么，他说："根本没有这回事，这是造谣嘛！让他们造去，将来一定会弄清楚的。"康大姐还是有些不安，说："现在，你成了'黑司令'，我成了'走资派'，往后不知还会怎么样呢?"朱总充满信心地说："只要有主席、恩来在，就没有关系，他们最了解我。你不要怕，'走资派'多了也好。都成了'走资派'，就都不是'走资派'了。形势不会总这样下去的。"

不久，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军委的一次碰头会说：朱德还是要保。但林彪和江青一伙仍把朱总上纲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一天，康大姐在外边开会回到家里，拿这个问题问朱总。朱总不慌不忙地说："这是党内的事情，我不能给你说。"康大姐着急了，大声说："人家说你是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到底是不是?"朱总看着康大姐着急的样子，笑了笑说："急啥子嘛！做什么事总有个代表，是就是，不是想代表也代表不了。"又接着说："当时不少部队刚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资产阶级军事思想是存在的，他们要找我代表，那就找吧。"从容的态度，显示出坦荡的胸怀。

1969年4月，党召开"九大"，八十三岁的朱总抱病参加，那几天，他正患气管炎，喘得很厉害。林彪、江青一伙仍然不肯放过他，在会上多次对朱总进行围攻，逼他作检讨。康大姐回忆当时的情景说："一次朱总开会回来，问我认识不认识吴法宪、邱会作。我说不认识。他又说，你总该认识李作鹏吧。我想了想说，就是过去在你警卫班里当战士的那个李作鹏吧？他'嗯'了一声。我感到他突然提起这几个人必有原因，就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叹了一口气，说：'这几个人，都左得不可收拾罗!'"

"九大"闭幕不久，朱总就接到一个"勒令"，要他和董必武、李富春、聂荣臻、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等人交代反党罪行。朱总说："不要理它!"到10月，林彪擅自发出所谓"第一个号令"，扬言"要准备打仗"。康大姐怀疑地问朱总："真的要打仗吗?"朱总淡然一笑，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战争不是凭空就能打起来的，打仗之前会有很多预兆，不是小孩子打架。现在看不到这种预兆、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康大姐告诉我，"文革"开始不久，她就听说要把朱总赶出中南海。她当时问朱总会不会

这样，朱总说，有这个可能。他不幸而言中了。

根据林彪的“第一个号令”，朱总要被“疏散”离开北京。当时，他身边没有人，就对康大姐说：“你得跟我一起走啊！”正在被“专政”的康大姐为难地说：“对呀，我是该跟你一起走。可是，军代表要是不点头，我想走也走不了啊”。朱总沉思一会，无奈地说：“那我只好打电话给恩来，让恩来去跟他们说了。”

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让妻子跟自己一起到外地去，竟然需要一个小小军代表的批准。那是怎样一个是非颠倒的年月呵！

就这样，朱总由康大姐陪同到了广东（朱总从广东回来，再没有住进中南海）。关于在那里的生活，康大姐不愿多说。但我看到过一个材料上是这样记载的：当朱总坐了三个多小时飞机到达广州时，连广州市也不许进，被直接送到了从化。从化虽然风景优美，但朱总在那里实际上是被软禁的。不准他到附近的工厂、农村去，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终日陪伴他的，只有康大姐。但即使在这样的境遇中，朱总仍然对前途充满信心，坚信那些为非作歹的人不会长久。他最担心的，还是工农业生产。

是的，人民的生活疾苦，时时萦绕在朱总的心头。从“文革”一开始，他就在中央的一些会议上说，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我们应该使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的增长。他反复强调，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要注意解决。后来，虽然他的活动受到限制，仍时时关心着生产，担心生产受到破坏。1972 年 9 月以后，他以八十六岁的高龄，先后视察了七机部，一些工厂和农村。针对“四人帮”一伙把抓生产当成是“唯生产力论”的观点，他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好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康大姐说：“1974 年 1 月，我到首都体育馆参加‘批林批孔’会，回到家对朱总说，我刚才听了江青的讲话，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她把手伸到军队里去了。朱总沉思一会说：“你不要害怕。军队的大多数是好的，地方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群众也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以来，军队里虽然出了几个败类，但从整个军队来说，他们是拉不走的。干部中，也有少数人被他们拉了过去。但广大干部战士是不会跟着他们跑的。江青这人是打旗子、又有一部分人捧她。她的本事有多大，你不知道吗？去问问工人、农民、战士和知识分子，谁愿回到那种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去？”

周总理逝世后，朱总万分悲痛，经常两眼直直地望着天空，热泪一滴滴顺着脸颊往下流，不时地念叨：“恩来，恩来在哪里？”康大姐说：“我和他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看到他掉泪。”

从周总理患病住院后，朱总就经常向身边的人询问周总理的身体状况，亲自到医院里去看望。那一晚，人们从电视屏幕上看到扶着手杖的朱老总，举起颤抖的右手，向周总理的遗体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可是人们没有看到，在向遗体告别往返的路上，朱总一直在流泪。那些天，朱总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健康状况进一步下降，但仍然执著地投入国事活动。别人劝阻时，他说：“总理去世了，毛主席身体也不大好，我应该更多地做些工作。”他以九十岁的高龄，带着病开会，看文件，找人谈话，会见外宾，处理日常事务。当“四人帮”大肆诬陷和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说，在毛主席领导下，由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很好，这个班子不要变动。一天，他收到揭发“四人帮”的一封群众来信，毫不迟疑地转呈毛泽东同志并郑重附笔：“收到人民来信一件，事关重大，请主席酌处。”他接到成仿吾同

志寄来的新校译的《共产党宣言》，急忙把老译本找出来，对照着阅读了一遍……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总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想的还是人民，还是革命。

6月12日，朱总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迪迪埃·拉齐拉卡。

6月21日，朱总病重了。按照原来安排，他要会见外宾。人们劝他休息，改由其他中央首长代替会见。他没有同意，坚持会见了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由于这次会见时间的改变，朱总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等得太久，加重了他的病情。

6月25日，医生会诊后，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总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说："不要紧嘛，等到明天我见完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

6月26日，病情突然恶化，朱总才不得不住医院治疗。

7月1日，除肺炎之外，又并发了肠胃炎和肾病，高烧一直不退。这天，朱总把秘书叫到床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7月初的一天，朱总对到医院看他的李先念同志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弥留之际，朱总对周围人员断断续续地说："革——命——到底!"……

"他是抱着深深的遗憾和不安离开人世的。因为他没有看到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因为他希望看到第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可是都没有能够如愿……"

说到这些的时候，康大姐的语调更加沉痛。这不难理解，失去亲密伴侣的创伤，是时间无法平复的。但大姐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她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语重心长地说："对先行者最好的怀念，不能只是泪水，只是誓言，而是把他们的事业推向前进，把他们的理想变为现实!"

你说得对，大姐！朱总和其他所有先行者一样，永远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将长久激励我们朝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奋勇前进!

(原载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

河北省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七点五级，震中在北纬三十九点四度，东经一百一十八点一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国务院对地震灾区人民群众十分关怀。地震发生后，中共河北省委，天津、北京市委和震区各级党组织，已经采取紧急措施，领导群众迅即投入防震抗灾斗争。中共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已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赶到灾区指挥防震救灾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有关省、市卫生系统，已组织大批医疗队赶赴现场。大量医药、食品、衣物、建筑材料等救灾物资正源源运往灾区。国家地震局和河北省地震局已组织专业人员赶赴现

场，监视震情。受灾地区人民群众已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展开抗灾斗争。他们决心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发扬人定胜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团结起来，奋发图强，夺取这场抗灾斗争的胜利。

（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讯，载7月29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向灾区人民发出慰问电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河北省、天津、北京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北京卫戍区、天津市警备区并转唐山及其附近遭受地震灾害地区的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并波及到天津市、北京市，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很大损失，尤其是唐山市遭到的破坏和损失极其严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极为关怀，向受到地震灾害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致以亲切的慰问。

中央相信，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各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定会在省、市党委、革命委员会和部队党委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

中央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干部、工人、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批判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团结起来，向严重的自然灾害进行斗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新华社1976年7月28日讯，载7月29日《人民日报》）

《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前言

（一九七六年七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亲自策划炮制的。邓小平疯狂反对“鞍钢宪法”，推行一整套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就是妄图改变我国社会

主义企业的性质。这是一个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彻底批判这个《条例》，有助于进一步认清邓小平修正主义经济思想的反动实质，揭露他洋奴买办的丑恶嘴脸。

我们选编了几篇文章，供批判《条例》时参考。《条例》，我们选了一种，附在后面。邓小平关于一个“大政策”的讲话同这个条例是一个整体，也附在后面，供批判用。

〔附〕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讨论稿目录）

一、工作总纲
二、党的领导
三、依靠工人阶级
四、整顿企业管理
五、两个积极性
六、统一计划
七、以农业为基础
八、大打矿山之仗
九、挖潜、革新、改造
十、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
十一、采用先进技术
十二、增加工矿产品出口
十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十四、关心职工生活
十五、又红又专
十六、纪律
十七、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十八、思想方法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

（讨论稿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

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我们要在毛主席革

命路线指引下，奋发图强，使国民经济有一个新的飞跃。

社会主义工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只有加快工业的发展，才能有力地支援农业，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有力地增强国防，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才能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更好地支援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当前国际上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世界大战总有一天要打起来，苏修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始终想要向我们动手，我们要在争取到的时间内，紧张地扎实地工作，不要把时间浪费掉了，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全党全民都要在努力发展农业的同时，为加快工业的发展速度而斗争。

一、工 作 总 纲

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全党、全军、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牢牢抓住这个总纲。

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内外勾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少数企业资本主义倾向严重，破坏国家计划，从事自由生产，自由交换的非法活动，党员一部分，干部一部分，工人一部分，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有些企业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有些同志对于这种情况熟视无睹，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在一边，不抓这个主要矛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没有完了，少数搞资产阶级派别活动的头头、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阶级敌人趁机混水摸鱼，大捞一把，有的甚至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打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这些地方，这些企业，管理混乱，生产长期上不去，有的已经变了质。

所有地区、部门和企业，都要深入地、全面地、持久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指示，要组织干部和群众，认真读书，联系实际，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复杂情况。通过现象，揭露本质，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要注意抓好工业的整顿工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解决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存在的某些乱和散的问题，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把生产建设搞上去。

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紧密联系的，是一个整体，执行三项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必须把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放在首要地位，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只注意产生，忘记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的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建设。不注意生产，不努力搞好生产，把生产放在可有可无，可重可轻的地位，也是要不得的，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我们要把"**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落实到一切工作中去，做出显著效果。

二、党 的 领 导

能不能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关键在于党的领导。

目前企业党委的领导，大体有四种状况：

一、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敢于领导，敢于负责，团结一致，革命和生产都抓得好。

二、领导班子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软、散、懒”的问题，这些单位的领导，有的怕字当头，不敢坚持原则，好的不敢表扬，坏的不敢批评，使党组织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有的闹不团结，搞资产阶级派性，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形不成核心，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得过且过，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工作因循守旧，无所作为。

三、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这些人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却指手划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一类帽子，压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

四、坏人掌权。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们利用职权，胡作非为，一方面拉拢、腐蚀一部分人，培植自己的权势，另一方面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搞资产阶级专政，搞复辟倒退。

第三种，第四种是少数，但危害甚大，这些单位的严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变，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

整顿企业，首先要整顿党的领导。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对所属企业一个一个地进行分析，区别不同情况，分若干步骤，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把所有企业、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领导班子整顿好，先抓关系全局的重点企业，然后再抓一般企业。特别要配备好企业党委的第一、二把手，这些同志要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

经过整顿，要改变那些“软、散、赖”的领导班子，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使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

所有企业，都要贯彻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一个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有力的而不是松散软弱的，能打硬仗的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企业是作战的第一线，所有领导干部都必须能上前线指挥作战，有经验的年老体弱的领导干部，可以留在企业或到工业领导机关当顾问。

企业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要由党委统一领导，革委会、工会、青年团，都要在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委之上，要同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上级党委要支持企业党委的工作。

三、依靠工人阶级

依靠谁办企业，这是一个阶级路线问题。

毛主席早就指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并不是这样。他们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不作阶级分析，盲目地跟着“造反派”和“反潮流分子”跑，结果，分裂了工人阶级队伍，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

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还在工人群众中划分什么保守派、造反派，是错误的，应当根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表现，区别先进、中间、落后，要以先进分子为骨干，带动中间的，帮助和教育落后的，不断地加强整个工人阶级队伍的革命团结。

对于造反，对于反潮流，都应当进行具体分析。要看造那个阶级的反，看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评。反动的要坚决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

要划分造反派、反潮流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界限，不能说参加过反潮流，参加过造反的人，都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凡是以"造反"和"反潮流"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当党员、要作官的，一律不给，不但不给，而且要批评。

要坚决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针锋相对，寸步不让。现在还在搞资产阶级派性，就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屡教不改的，要严肃处理。党员决不允许搞派别活动，坚持不改的，要开除党籍。

要落实党的政策。工人、技术员、一般干部，凡是被戴上"保守派"、"站错队"等帽子的，一律摘掉，有关档案要退还给本人或者予以销毁。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工人群众的干劲、智慧和创造性，搞好企业的革命和生产。

四、整顿企业管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企业坚持**"鞍钢宪法"**，放手发动群众，改善了企业管理，各项工作生气勃勃。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软弱无力，管理混乱，劳动生产率低，产品质量差，消耗大，成本高，事故多，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损失。这些企业，必须在整顿和加强领导班子的同时，整顿企业管理，严格规章制度。

必须继续深入批判修正主义办企业的路线，不能丝毫放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万年也要，问题是遵循什么路线，依靠谁来实行。一概反对企业管理，反对规章制度，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所有企业，都要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要抓好基层党支部的建设和班子建设，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结合实际，搞好职工的理论学习，搞好阶级教育，形势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企业的各项政治运动，都必须在坚持生产的情况下进行，不能停产闹革命。

企业的各项工作，都要坚持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放手发动群众去办，不能由少数人冷冷清清去办，要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企业各级干部，必须坚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和群众打成一片，不搞特殊化。工人要参加企业管理。要广泛实行领导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

所有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能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管理指挥企业的日常生产活动，及时处理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要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精兵简政的原则、建立

精干的职能机构。这些机构，必须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生产第一线，同群众管理密切结合起来，搞好计划管理、技术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

所有企业、都要把下列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抓起来：(1) 产量指标；(2) 品种指标；(3) 质量指标；(4) 原料、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指标；(5) 劳动生产率指标；(6) 成本指标；(7) 利润指标；(8) 流动资金占用指标等等。不完成这些指标，不按质、按量、按时地完成供货合同，就不算全面完成国家计划，长期完不成国家计划，要追究领导责任，所有企业都要以产量多、质量好、消耗低、积累多为光荣，以产量低、质量坏、消耗大、有亏损(政策允许的亏损在外) 为耻辱，凡是没有达到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较好水平的，要尽快达到；已经达到的，要赶超国内和国外的先进水平。

要把质量、品种、规格放在第一位，凡是质量不合格的产品，不准出厂，不能用的东西，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有权拒绝收购。已经出厂的要包修、包换、包赔。

要生产和节约并重，努力降低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消耗定额，消除跑、冒、滴、漏，要清仓查库，减少积压，减少损耗。要反对铺张浪费，减少非生产性开支，不合财政制度的开支，财务部门有权拒绝支付和报销。不该进入成本的费用，不得乱挤成本，对于擅自向企业摊派任务，调出产品，抽掉资金、劳力、设备、材料的，企业有权抵制。

要改善劳动组织，做好编制定员和劳动定额工作，减少非生产人员和脱产人员，提高工时利用率，凡是应当业余进行的各种活动，都不准占用生产时间。现在有些企业，设立了一大堆脱产的体育队、文艺宣传队、民兵、写作班子等等，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差事，使许多年青力壮的工人脱离生产第一线，使企业非生产人员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所有这些脱产的专业队伍一律撤销。凡是不应当脱产的人员，一律回到生产岗位。

所有企业都要依靠群众，从实际出发建立和健全下列主要的生产管理制度：(1) 岗位责任制；(2) 考勤制度；(3) 技术操作规程；(4) 质量检查制；(5) 设备管理和维修制；(6) 安全生产制；(7) 经济核算制；等等。这些制度的具体内容，应当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不断改革，逐步完善，但是这些制度是一定要有的，必须严格执行，随意地废除或者削弱这些制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允许的。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没有严格的责任制，生产只能打乱仗，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一件工作，每一个岗位，都要有人负责；每个干部，每个工人，每个技术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要把制度和群众运动很好结合起来，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五、两个积极性

一九七O年以来，实行工业管理体制改造，把绝大多数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加强了地方党委对经济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对工业的发展和工业支援农业起了显著的作用。事实完全证明**"有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必须把体制改革工作坚持下去。

该下放的企业，要坚持下放给地方管理，除了跨省、市的铁路、邮电、长江航运、民航、输油管和远洋航运，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关键建设项目和专业施工队伍，由中央各部为主管理以外，其余的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还没有下放的或者由中央部代管的，都应当根据条件，逐步地下放给地方管理，或实行中央、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

地方党委要加强对工业的领导。中央下放企业和地方原有的大中型企业，原则上由省、

市、自治区和省辖市领导和管理，主要由省辖市来领导和管理，不能再往下放。现在，许多地方的工业管理机构不健全，业务人员太少，不能适应下放后的形势，许多事情没有人管，生产调度工作抓不起来，影响生产的发展，这些地方，要迅速建立和健全必要的管理机构、切实地把生产管好。

中央各部要和地方一道做好下放企业的交接和管理，不能撒手不管，我们当前的任务，是建成全国的工业体系，并且逐步建成×个协作区的工业体系，还不能各省、区自成体系。因此对于那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双重领导、以地主为主的大企业，中央有关部门不仅要管方针、政策，管统一计划，而且要管产品的调出，管当地不能解决的重要物资的供应，这些企业的主要领导干部的调动，地主要同中央有关部门商量，地方要首先保证这些企业计划的完成。

企业下放，实行分级管理，决不能削弱中央的集中统一，该集中的，必须集中，不能分散。(1) 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2) 工农业的主要生产指标；(3) 基本建设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4) 重要物资的分配；(5) 主要商品的收购和调拨；(6) 国家财政预算和货币发行；(7) 新增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8) 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必须集中到中央，任何地区、任何部门都不能各行其事。现在有些地区和单位不顾全局的利益和中央的统一规定，任意制定政策，违反国家计划，随意改变下放企业的生产方向，中断原有的协作关系，不完成上调任务，乱上基本建设项目和扩大建设规模，乱拉乱用物资和资金。随意增加职工和扩大工资总额，擅自改变物价，这是不能允许的。

六、统 一 计 划

要保证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高速度按比例地发展，实现今后十年的奋斗目标，必须加强国家的统一计划，不论中央单位或地方单位，全民所有制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它的生产、建设和其他一切主要经济活动，包括劳动、工资、物资、财务等，都要经过逐级审查和平衡，纳入国家统一计划，实行全国一盘棋。不搞统一计划，或者破坏统一计划，就会出现盲目性，就会给资本主义泛滥造成可乘之机。其结果，是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对集体所有制企业，要加强领导，发挥它的积极性，防止自发性。

要根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根据发展国民经济的任务和主攻方向，根据实现的可能性，搞好计划的综合平衡。着重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生产维修和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设备的比例关系，以及“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等等。

计划的制订，要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经过逐级平衡，订出全国的统一计划。

计划的制订，要有客观依据，做到积极可靠，留有充分的余地。

计划要有严肃性。经中央批准下达的计划，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都必须坚决执行。要反对不顾大局，不执行国家计划，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错误作法。调整计划，必须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充实和健全各级计划机构和统计机构，加强计划和统计工作，统计数学必须反映实际情况、反对瞒报虚报。

七、以农业为基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大发展，所有工业部门，都要牢固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巩固工农联盟。

国民经济计划，不论是全国的，还是地方的，必须坚持按农、轻、重的次序进行安排，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工业越发展，工业比重越增大，越要重视农业。这是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证明了的一条重要规律。

各个工业部门都要了解农业的需要，把支援农业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尽最大努力为农业提供机械、化肥、燃料、动力、建筑材料、运输工具等等，帮助农民掌握现代的科学技术，为在一九八〇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为更大地增加农业生产贡献力量。同时，积极增加对农村的轻工业品供应，扩大城乡物资交流。

城市要带动农村。每个工业城市，要根据自己的力量，带动一个到几个县，帮助他们发展农、林、牧、副、渔各业，举办小型工业，增加社队收入，改善城市供应。这件事，要纳入各工业城市的计划，并有专门机构管理。

有条件的工矿企业，要象大庆那样，实行工农结合，城乡结合，从事农副业生产，逐步提高粮食和副食品的自给水平。没有可开垦土地而又临近农村的，可以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安排下，划一两个公社归企业领导，帮助他们发展农副业生产，成为向工矿企业提供蔬菜、肉类和其他副食品的基地。

要对职工进行工农联盟教育，主动搞好工农关系。

八、大打矿山之仗

当前工业中突出的问题，是原料、燃料和动力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落后，在钢铁工业和整个原料工业中，矿山又是薄弱环节。要加快工业的发展，必须坚决贯彻"以钢为纲"的方针，并且把主攻方向放在矿山。"没有原料，光搞加工工业，就叫做只搞无米之炊"。

…………

各级领导要把矿山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派出得力干部抓矿山，集中优势兵力，下力量解决铁矿的采掘、选矿和烧结问题。在铁矿资源丰富的地区，成立独立的矿山公司。

机械制造部门要积极发展先进的大型的采掘设备，运输设备和其他矿山机械。同时，引进一些关键性的技术先进的矿山设备。

实行矿山资源的综合开发、综合利用，反对"单打一"，各级计划委员会要把这样工作管起来。

在大力开发矿山的同时，要解决好冶炼和加工的问题，相应地安排好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

九、挖潜、革新、改造

我国工业已经有了相应的基础，布局已经展开。……当前的任务，就是要把已有的工业基础充分利用起来，通过技术革新、技术改造，通过合理组织，分工协作，使它们不断地发展壮大。这样做，比建设新项目的投资省，见效快，收效大，今后工业生产的增长，应当主

要靠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而不是靠新建。这是一条必须遵循的重要方针。

各行各业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在现有企业中打一场挖潜、革新、改造的人民战争。要批判那种不愿意利用现有基础、不肯在挖潜上下功夫，动不动就搞新建的错误思想和做法。

要打破行业界限，地区界限，搞好社会主义协作。各级工业主管部门要切实把这项工作抓起来。

要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要反对把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看作是部门所有，地区所有，企业所有、宁肯设备闲置也不愿意承担协作任务的错误倾向。要反对都想自搞一套，万事不求人的错误思想。

革新、改造和组织协作，都要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重点应当放在增加原材料、燃料和短线产品方面，放在提高成套水平和综合利用方面。生产能力有富余的加工行业，要组织一部分企业改产短线产品。已有的更新改造资金，要列入计划，切实用好，工业计划的安排和材料、设备、资金的分配，要优先保证革新、改造的需要。

十、基本建设要打歼灭战

要采取果断措施，定出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解决这个问题。

1.不论中央部门和地方，安排基本建设投资和基本建设项目，都要围绕今后五年和十年的奋斗目标，不能离开这个总目标，各搞一套。都要按照国家的物力、财力和人力的可能，不能超越这种可能，不分轻重缓急，齐头并进，都要贯彻执行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方针，不能违反这个方针，什么都追求又大又洋又全。

2.从一九七六年起，每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严格控制在××项以下，每年竣工投产的项目确保××项到××项，把平均建设周期从现在的×年多，缩短为×年。新上项目，要严格控制，正在施工的项目，要一个一个审查和清理，不急需的，或者条件不具备的，坚决停建缓建。

3.所有基本建设，包括地方和部门的自筹资金在内，都要纳入国家统一计划。大中型项目由国家批准，小型项目由省、市、自治区批准。任何地区、部门和单位，都不准擅自上基本建设项目，不准擅自扩大工程规模和提高建设标准，不准任意改变施工进度，任何人都无权挪用国家重点项目的材料、设备和资金，去搞别的工程。

4.整顿资金渠道。不准挪用大修基金和生产流动资金，不准动用企业留成的基本折旧，不准动用企业应当上缴的利润和税收，不准挪用银行贷款，不准向企业、社队摊派资金，搞基本建设。责成基本建设银行把所有基本建设拨款统一管起来，并做好监督工作，违反国家规定的工程和开支，一律拒绝拨付。

5.所有建设工程，都要严格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没有设计，没有安排好设备，不能列入年度计划，不能施工，大中型项目都要做好设备成套安排，按照施工进度及时供应，这项工作要有专门的机构负责。

6.整顿基本建设管理。从地质勘探、设计、施工到验收，都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和责任制，努力提高建筑安装队伍的劳动生产率，加快建设进度，确保工程质量，降低工程造价，提高投资效果，克服严重浪费现象。

十一、采用先进技术

世界上工业落后的国家赶上工业先进的国家，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我们也要这样做。每个部门，每个行业都要了解世界上的先进水平，订出赶超的规划和措施。

要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科学实验活动，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注意总结、提高、推广群众革新创造的成果，要发挥专业研究机构和队伍的骨干作用，使他们同群众密切结合，研究和解决重大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科学院和国务院各部系统的科研单位，凡是担负全国性任务的，必须实行以科学院和国务院各部领导为主的体制，已经下放了的要收回，工矿企业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管理工作要加强。大中型企业要有自己的研究试验机构，有的企业还要设立中间试验厂、试验车间；小企业要在市的范围内，或者几个企业联合起来，成立必要的研究试验机构。企业的技术人员，应作为生产人员，不能把他们列入脱产干部和非生产人员编制。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要充分运用起来，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科学技术。

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必须虚心地学习外国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有计划重点地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为我所有，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所有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单位，都要抓紧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胜利为我们创造的有利时机，尽快地把我们急需的新技术学到手。

对于引进的外国的先进技术，要培训必要的技术力量，迅速地把它掌握起来。要根据"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的原则，在用中熟悉它，改造它，发展它，要反对一概照抄照搬，也要反对没有学会就乱改乱动。

新技术、新发明创造，要有一定的保密制度，但是部门之间，企业之间不能互相封锁。

十二、增加工矿产品出口

要多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就必须增加出口，必须尽快提高工矿产品在出口物资中的比例。

每个工业部门，都要研究国际市场的需要，积极增产能够出口而换率高的产品。要尽快地发展生产，尽可能地多出口，不能只考虑进口的要求，不考虑增加出口货源。我们国家以国内市场为主，国外市场为辅，但国外市场很重要，不能忽视。

为了加快我国煤炭、石油开发，可以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按照国际贸易中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等通行作法，同国外签订长期合同，固定几个生产点，由他们供应适合需要的现代化的成套设备，然后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石油偿还。

十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在工资问题上，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既反对高低悬殊，也反对平均主义。

我们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扩大差别，反对物质刺激。不这样，就会助长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

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不仅现在不行，将来也是行不通的。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是社会主义原则。在现阶段，它是基本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必须坚决实行。不分劳动轻重，能力强弱，贡献大小，在分配上都一样，不利于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要逐步提高低工资职工的工资，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

要实行正常的升级制度，按照职工的劳动态度，技术业务能力，劳动和工作中的贡献，根据国家计划规定的升级面，经过群众评议和领导批准，每一两年提高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待遇。

要对高温、高空、井下、野外、有毒、有害等劳动条件差、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实行岗位津贴。

要在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改革现行的工资制度。

所有企业，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教育职工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支援世界革命而勤奋地劳动，树立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不能把按劳分配和各尽所能分开。要向广大群众说明，我们还是发展中的国家，生活只能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十四、关心职工生活

各级领导要生产、生活同时抓，要把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进行讨论。凡是能够解决的都要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积极去解决，对群众生活中的困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根本要不得的，企业党委要有一位主要负责同志抓生活。

要有计划的增加职工宿舍和城市公用事业的建设，国家分配给这方面的资金，不能挪用。地方要把自筹资金较多地用于这一方面。

积极办好食堂、托儿所、医疗卫生等社会集体福利事业，组织好业余教育和文娱体育活动，搞好计划生育。

努力改善城市和工矿企业的副食品供应，大中城市要建立副食品基地，逐步举办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养猪场，养鸡场。

要有步骤地解决职工夫妻长期二地分居的问题。

工人退休、死亡后，可以允许招收他们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参加工作。

要搞好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做到安全生产。要注意女工保护工作。

要坚决消除“三废”，保护环境，保护职工身体健康。新建项目不安排好处理“三废”的措施，不准施工。老城市和现有企业，要有计划地解决污染问题。

注意劳逸结合。

十五、又红又专

要实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没有大批政治觉悟高而又精通技术、精通业务的人材，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早就指出：“**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成为内行，使自己又红又专。**”所有的干部，都要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并且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带领广大工人，科学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广大工人，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努力学习和掌握生产技术，使自己成为阶级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技术熟练的劳动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科学技术人员，要坚持同工农相结合。努力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钻研科学技术，精通业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都应当给予信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对他们的成绩，要加以肯定。对他们的缺点，要热情帮助，科技人员不适当地改了行的，要加以调查。有些单位不重视科学技术人员，不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完全错误的。

各级党委要表扬那些又红又专的先进人物，批评和教育那些不问政治、不钻研技术和业务的人员、造成一个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时努力钻研技术和业务的空气。特别要注意使两者互相结合而又不是互相对立。要积极地为广大职工又红又专创造条件。

十六、纪　　律

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许多方面纪律松弛，影响很坏，危害甚大，必须加强纪律性，同一切违反政策、违反制度、违反统一计划、违反财经纪律、违反劳动纪律的现象作斗争。

广大职工都要自觉地遵守纪律。

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

要支持和表扬那些认真执行政策、制度和敢于坚持原则的同志，严禁打击报复。

对违反纪律的行为，要严肃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分。要按照党纪国法制裁那些违法乱纪的人，决不能姑息纵容。

十七、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这是我党早已行之有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工业要搞好，也必须采取这种方法。

各地、各部门都有好的典型，好的经验，有大量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各级领导要深入群众，用心寻找群众中的先进经验，加以总结，使之推广，鼓舞群众前进，把生产不断推向新的水平。许多地方和部门坚持这样做，工作很有生气，很有成绩。但是，还有许多单位，不善于这样做，习惯于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胸中无全局，手中无典型，他们必须改变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

在抓先进的同时，要注意做好后进单位的转化工作。

要遵照毛主席：**"在总路线指导下，制定一整套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指示，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办法，制订出工业管理章程，企业管理条例和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

要扎扎实实，力戒空谈，减少会议，开短会，讲短话，不能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反对浅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要发扬大庆油田"三老四严"的

作风。要敢于负责，反对互相推诿，敷衍了事。要讲求效率，反对疲疲沓沓，拖拖拉拉，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能讲。

十八、思　想　方　法

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努力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对任何事物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保护正确的东西，批判错误的东西，不可以不明青红皂白，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

要实事求是，加强调查研究，使思想符合客观实际，不断地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要重视正面的经验,也要重视反面的经验。通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使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识。

〔附〕　一场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

——评“四人帮”对《二十条》的“批判”

国家计委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在一九七六年夏季前后演出了一出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丑剧。这是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一个重大步骤，是一个政治大阴谋。现在“四人帮”打倒了，他们表演的这出丑剧，也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本文就“四人帮”对所谓的“三株大毒草”之一，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简称《二十条》，亦即“四人帮”所说的《条例》）的“批判”，作一些剖析。“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不是说《二十条》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吗？其实，把他们攻击《二十条》的话，把他们写的所谓“批判”文章集中起来，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倒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人们可以从中看出，“四人帮”这伙魑魅魍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怎样刻骨仇恨、疯狂反对；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怎样造谣污蔑、打击陷害；对我们党、我国人民为之英勇奋斗的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是怎样横加阻挠、百般破坏。人们还可以从中看出，他们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使用的手段又是怎样卑鄙无耻。

一、《二十条》“毒”在哪里？

“四人帮”给《二十条》加的罪名之多，扣的帽子之大，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什么“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工业战线上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修正主义路线的活标本”、“有计划、有预谋、有组织地向无产阶级进攻的铁证”、“主张出卖国家主权，竭力推行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路线”，等等，在他们看来，《二十条》真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四人帮”为什么对《二十条》如此仇恨，非要把它置之死地不可呢？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二十条》在他们这些“太岁”头上动了土，揭了他们的疮疤，戳了他们的痛处。

《二十条》是一九七五年七月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下开始起草的。起草这个文件的背景是什么呢？第一，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重要指示。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重申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宏伟设想，号召全党、全国人民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第二，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九七四年许多地方和企业的党组织陷于瘫痪，资本主义泛滥，生产停顿，工业发展速度下降，钢产量大幅度减少。凡是革命者，凡有爱国心的人，哪一个不为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四届人大提出的宏伟任务所鼓舞，哪一个不痛恨“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迫切希望改变这种状况呢？在党中央领导下，一九七五年春先后召开了铁路工作会议和钢铁工业会议，解决这两个部门在革命和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取得了显著效果。大家要求，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对整个工业中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作出一些必要的规定。适应这种需要，为着加快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二十条》遵照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了“四人帮”一伙散布的若干谬论，提出了整顿工业和整顿企业的具体办法和具体措施。

“四人帮”最恼火的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一九七五年九月二日稿（即《十八条》）。他们编的三个小册子中选的也是这个稿子。这个稿子说了一些什么使他们火冒三丈呢？不妨摘引几段看一看。

1.“他们口头上也讲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放在一边，不抓这个主要矛盾，而是成天闹人民内部的这一派同那一派的矛盾，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没完没少，少数搞资产阶级派别活动的头头，争权夺利，拉山头，搞分裂，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

2.“他们打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破坏革命、破坏生产，把党的好干部，把先进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打下了台，坏人当道，好人受气。”

3.少数企业“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这些人政治上一窍不通，生产上毫无经验，却指手划脚，一味整人，只唱高调，不干实事，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复旧’‘倒退’、‘保守势力’、‘只拉车不看路’一类的帽子，压制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些企业“坏人掌权。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有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他们利用窃取的职权，胡作非为，一方面拉拢、腐蚀一部分人，培植自己的权势，另一方面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搞资产阶级专政，搞复辟倒退”。“这些单位的严重情况长期得不到改变，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要“调整那些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当权的领导班子，把坏人篡夺了的权力夺回来”。

4.“对于造反、对于反潮流，都应当进行具体分析。要看造哪个阶级的反，看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正确的要支持，错误的要批评。反动的，要坚决顶住，然后加以考察，进行批判。要特别警惕少数坏人利用‘造反’和‘反潮流’的名义，搞破坏活动。领导干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原则，决不可以随风倒，决不能为漂亮的词句所迷惑，为吓人的帽子所压倒，解除思想武装，甚至把权让给人家。”“凡是以‘造反’和‘反潮流’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当党员、要作官的，一律不给。不但不给，而且要批评。”

5.“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强大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充分巩固的，决不能把在革命统帅下搞好生产当作‘唯生产力论’和‘业务挂帅’来批判。”

6.“生产管理和规章制度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万年也要，问题是遵循什么路线，依靠谁

来实行。一概反对企业管理，反对规章制度，势必造成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7.“不搞统一计划，或者破坏统一计划，就会出现盲目性，就会给资本主义泛滥造成可乘之机。其结果，是瓦解和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8.“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反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但是不能夜郎自大，闭关自守，拒绝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9.“我们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反对扩大差别，反对物质刺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否定按劳分配，不承认必要的差别，搞平均主义。”“对群众生活中的困难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是根本要不得的。”

10.“提倡唯物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对任何事物都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保护正确的东西，批判错误的东西。不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肯定或者一概否定。”

上面这些话，是前年九月间写的。它的针对性是不言自明的。“四人帮”散布了那么多的谬论，干了那样多的坏事，造成了那样严重的恶果，难道不许人们进行一点批判、发一点议论吗？试问：这些话哪一点不是事实，哪一点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呢？不批判他们的谬论，不解决由于他们的破坏造成的问题，无产阶级专政怎么能够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怎么能够前进呢？当然，现在看来，这些话讲得很不够，而且有些提法也不准确。例如，讲两派的矛盾，“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没完没了”，只揭露了“四人帮”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问题，没有指明他们颠倒敌我，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这个实质。又例如，“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的提法，没有把“四人帮”所依靠的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所谓“先进分子”的面貌刻划出来。这些人也并不是“政治上一窍不通”，他们搞反革命政治是颇为能干的。

“四人帮”及其爪牙的反革命嗅觉是很灵的。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是对着他们说的，而且他们也自认不讳。他们说，“《条例》好厉害”，“《十八条》的字里行间，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他们说，“批判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是矛头指向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他们说，“要整没有得到改造的小知识分子和‘勇敢分子’，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对造反和反潮流进行阶级分析，是妄图把那些敢于造反、敢于反潮流的先进分子从工人阶级队伍中划分出去。”他们说，“《十八条》中讲的有些人所以能闹得企业、地方和党三个不得安宁，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这些话，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同志”，如此等等。

“四人帮”及其爪牙自封为“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文化大革命的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造修正主义路线反的先进分子”，这是他们的一贯伎俩，是不足为奇的。这里可爱的地方，是他们自我招供他们这个司令部，他们这伙“革命派”和“先进分子”，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搞复旧，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反动势力；就是破坏革命，破坏生产，闹得企业不得安宁、地方不得安宁、党不得安宁的根子和后台；就是利用窃取的职权，胡作非为，打击、陷害好的革命干部和工人，搞资产阶级专政的坏人；就是以“造反”、“反潮流”作为资本，向党伸手，要当官的大大小小野心家。如果把他们给自己头上戴的那些桂冠摘下来，把“无产阶级司令部”换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把“文化大革命的代表”换成“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把“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先进分子”换成“正在走的走资派和新生反革命分子”，那就再也确切不过了。

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回答。《二十条》

对于革命人民来说，它是香花。对于"四人帮"来说，它确实是株毒草，毒就毒在它触及了"四人帮"推行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四人帮"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祸国殃民的勾当，他们最怕揭。他们生怕一爪落网，全身被缚，所以，任何人只要触犯了他们一点，那怕是说了几句话，写了一封信、一张大字报、一首诗、一篇文章，他们就要残酷镇压，把人打成"反革命"，把作品打成"大毒草"。《二十条》批了他们的逆鳞，他们暴跳如雷，横加攻击，当然就毫不奇怪了。

二、"四人帮"反对的是什么？

"四人帮"动员了他们所控制的全部舆论工具，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台，采取各种形式，对《二十条》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他们到底"批判"了些什么，反对了些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这里，择其要者，拿出来示众。

其一，反对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一系列指示

《二十条》的初期稿子，曾经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说成是"工作总纲"。"四人帮"抓住这一点，说《二十条》"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复辟资本主义"，这完全是无耻的诽谤，恶意的陷害。把三项指示说成工作总纲，这个提法是个原则性错误。但是，《二十条》的内容，贯穿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它列举了阶级斗争存在的大量事实，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形势，指出"工业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并且指出要抓住"这个主要矛盾"，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批判修正主义路线，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在阐述毛主席三项指示的时候，明确指出"必须把搞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学习放在首要地位，促进安定团结，促进生产发展"。这些话写得清清楚楚，难道"四人帮"这伙"批判家"们都是瞎子吗？不是。他们的用意是打着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三项指示。

这里，且不说他们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污蔑为"大资产阶级批小资产阶级"；且不说他们把讲安定团结污蔑为搞"中庸之道"；且不说他们污蔑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修正主义的口号"，我们只举一个例子，说明他们批判的就是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二十条》在十月八日以后的稿子中，已经把"三项指示是工作总纲"的提法改为"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但是"四人帮"并没有因此放弃攻击。他们在上海的写作班子宫效闻写了一篇批判《二十条》的文章，登在《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六期上，就公然说：

> "'三项指示为纲'从前台消失了，却又从后门塞了进来。在删去'工作总纲'、说了一通'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之类的话以后，在最后一个条目'全党动员，为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而奋斗'中，却写上了'三项指示''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必须全面贯彻执行'的老调。这不是在玩弄'原则保留，棱角磨掉'的障眼法吗？"

这段文字，讲了什么"前台"、"后门"，什么"障眼法"等等，写得颇为俏皮。"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在落笔的时候，大概是很得意的吧。可是，就在他们飘飘然的时候却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原来，他们认为，删掉"三项指示为纲"不过是"磨掉棱角"，只有把"全面贯彻执行三项指示"都砍掉，才算改变了"原则"，才称他们的心意。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四人帮"

批判“三项指示为纲”才真是一个障眼法，他们实际干的是疯狂反对毛主席的三项指示。

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针对着“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指明了我们党的迫切任务。“四人帮”竭力反对毛主席这三项指示，他们或者任意篡改，或者公然取消。他们的一个卑劣手法，是把三项指示截然对立起来，谁要说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是紧密联系的，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促进安定团结，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他们就骂谁搞“折衷主义”，是“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阶级斗争”。似乎只有不学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破坏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下去，才算坚持了阶级斗争。他们高唱的这种阶级斗争，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他们把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好干部打成“走资派”，说成是革命的对象；而把那些紧跟他们跑的流氓、阿飞、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封为“革命派”。他们搞的这种阶级斗争，目的就是要搅乱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瓦解社会主义经济，以便他们“乱中取胜”，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基于这个反革命纲领，他们拚命反对把毛主席的三项指示紧密联系起来、全面贯彻执行，是很自然的了。这就恰好说明，混淆主要矛盾，颠倒敌我关系，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一伙。这也恰好说明，《二十条》指出把三项指示紧密联系起来，全面贯彻执行，是有的放矢，是完全必要的。

其二，反对毛主席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号召

《二十条》在序言中提出，要响应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号召，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并且指出，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尖锐的政治问题。“四人帮”竟对此大兴问罪之师，说什么《二十条》“讲现代化不讲革命化，讲发展生产力不讲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搞现代化是假，反对革命化是真”，“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等等，等等。他们真不愧为帽子公司的老板，一扣就是一大串。《二十条》讲了那么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贯彻执行“鞍钢宪法”的内容，不都是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加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吗？“四人帮”一伙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是要给他们反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披上一件迷人的外衣，似乎他们并不反对现代化。而是反对不用革命化统帅现代化。让我们举几件事情来戳穿他们的画皮。

一九七五年春，四届人大刚刚重申了毛主席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宏伟设想，张春桥就跳出来说什么实现四个现代化，“无非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影射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姚文元说的更露骨。被他们污蔑为“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论总纲》中说，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姚文元在这段话下面划了线，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请看，这哪里是在批判什么“不讲革命化的现代化”呢？分明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二十世纪中国人民的伟大历史使命污蔑为“复辟”，是根本不能实现的“痴心梦想”。他们到底在攻击什么，不是一清二楚吗？主唱奴随。“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竟然狂叫“什么现代化，真是法西斯化”。上海《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甚至说：“所谓‘四个现代化’，其源盖出于李鸿章之流所创始的‘洋’字号药铺。”这不是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毛主席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号召，又是什么呢？

毛主席多次指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无产阶级还必须坚持进行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革不适应生产力的那部分生产

关系，改革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那部分上层建筑，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进行生产技术的革命，实现四个现代化，为社会主义制度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四人帮"拼命咒骂四个现代化，反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搞垮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最害怕我们国家富强起来，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四人帮"反对四个现代化，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需要。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和帮凶。

其三，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企业管理

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国家的集中领导下，按照统一的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点。列宁指出，"**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整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放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第455页）列宁还指出，"**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列宁选集》第3卷第506–507页）"四人帮"拼命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企业管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肆意攻击。

《二十条》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为了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指出"无论地方和部门，都要强调全局观念，维护集中统一"，不能"任意制定政策，违反国家计划"，不能"乱拉乱用物资和资金"、"乱上基本建设项目"，不能"擅自改变物价"。"四人帮"胡说《二十条》的这些规定，是千方百计"卡死"、"扼杀"地方积极性，"为条条专政翻案"。真是荒谬绝伦。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加强国家统一计划就是"条条专政"，只有违反国家计划才能发挥"积极性"。这就暴露了他们所要的"积极性"，是破坏国家统一计划的资本主义盲目性。让这种"积极性"泛滥起来，势必导致资本主义自由化。对这种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我们就是要"卡死"。卡死这种"积极性"，是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发挥两个积极性所必需的，这同"条条专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条条专政"必须反对，但决不能取消社会主义的统一计划。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国家的统一计划，《二十条》提出要依靠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建立和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四人帮"却污蔑这是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他们把依靠群众同执行规章制度截然对立起来，把工人群众当家作主人同建立责任制截然对立起来，用这种手法竭力煽动无政府主义。究竟什么叫工人群众成为企业的主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企业里，工人群众为了自己的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利益，坚持执行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积极地参加企业的管理，自觉地执行规章制度，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自觉地搞好本岗位的工作和生产，这才真正是把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当作自己的事业，才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象"四人帮"鼓吹的那样，不要领导，不要制度，不遵守纪律，不做好本职工作，那就会把社会主义企业搞垮，还谈得上什么工人群众当家作主？他们宣扬这套无政府主义的货色，就是要制造混乱，让他们那伙亲信、爪牙在混乱中爬上去，骑在广大工人群众头上作威作福，实行法西斯专政。

其四，反对又红又专，反对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技术队伍

又红又专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提倡的，几年来"四人帮"不准讲了。《二十条》违反他们的"帮禁"，写了一条又红又专，讲了要提倡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对于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科技人员，应当给予信任，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四人帮"就又扣帽子，又

打棍子，谩骂这是鼓吹“白专道路”，宣扬“专家路线”。他们攻击的矛头是指向谁呢？

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多次教导我们，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要战胜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必须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搞好科学研究；必须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且要造就一支宏大的无产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早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就说过，**“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4页）毛主席又说：**“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4页）毛主席还特别强调无产阶级要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过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并且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3页）“四人帮”大肆攻击《二十条》宣传的毛主席的这些思想，他们公然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也是清清楚楚的吗？

其五，反对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先进技术

“四人帮”使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二十条》关于采用、引进先进技术的章节，说什么“把我国工业的命运系在外国资本家的裤腰带上”，什么要把矿山“租让给外国”，“是对国家主权的大拍卖”，是“引狼入室”，“走“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的老路”。到底《二十条》说了些什么，竟引起“四人帮”如此狂吠呢？无非是两点：第一、《二十条》说要坚持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的方针，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为我所用；第二、《二十条》提出，为了引进一点国外的先进技术，必须增加出口，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可以按照国际贸易中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等通行做法，由外国供应成套设备，然后用我们生产出来的煤炭和原油偿还。这两条有什么不对呢？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同时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把学习与独创结合起来，洋为中用。在《论十大关系》中，毛主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85、286页）科学技术的领域极为广阔。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由于各自的条件不同，在科学技术方面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应当吸取别国、别民族的长处，来补自己的不足，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一切都自己从头搞起。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上，学习和引进一些外国的先进技术，有利于加速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四人帮”把这个叫做“爬行主义”、“洋奴哲学”，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蓄意歪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出口工矿产品、换取成套设备的政策，是一个好政策，它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列宁就曾经指出：**“我们的根本利益要求我们尽快地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机车、机器、电气器材等等生产资料，……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巩固起来，最终站立起来、在经济上战胜资本主义。”**（《列宁全集》第31卷第435页）毛主席也多次指出：我们有煤、盐、铁矿、大豆，可以同外国交换一些东西。这几年出口的重要工矿产品和进口成套设备，都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这样做，一没有附加政治条件，二没有让外国插手企业的经营管理，三没有把利润交给外国资本家，完全是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外国进行的一种正常贸易。至于

建立出口基地、固定生产点的设想，那是为了保证产品适合出口的需要和便于组织运输，这是对外贸易的一个方法问题，怎么能扯得上“租让”，扯得上“卖国”?“四人帮”把毛主席制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外贸政策同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投降卖国的政策相提并论，完全是对毛主席、对我们党、对我们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恶毒攻击。

“四人帮”借口批判《二十条》，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止表现在上述这些问题上，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全面的，而且许多地方他们就是直接攻击毛主席的指示。例如，制度一万年还是需要的；对资产阶级法权既要限制，又不能限制过急；要关心群众生活，领导机关要把群众生活中的问题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等等，这都是毛主席的教导。“四人帮”明明知道这些话是毛主席说的，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把这些统统骂作“修正主义”。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比之资产阶级右派，比之刘少奇、林彪反党集团，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对于“四人帮”这种公开的反革命行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呢？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他们的罪行，澄清被他们搞混乱了的路线是非，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

三、一个政治大阴谋

“四人帮”批判《二十条》，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完全是一个政治大阴谋。他们妄图制造罪名，打倒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和一批中央领导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起初，“四人帮”曾经竭力阻挠把《二十条》拿出来。在《二十条》的起草过程中，征求过二十个企业的负责同志和十二个在京开会的省委负责同志的意见，得到热烈赞扬，大家要求把这个文件搞好，并且尽快发下去。一九七五年十月间，国家计委在给中央的一个报告中，明确提出了正在起草一个《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交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讨论这个报告的时候，姚文元说，文件还没有成熟，他还没有看到这个文件，能不能拿得出去还是问题，在计委的报告中不提这个文件为好。其实，这个文件的草稿早在九月间他就看到了，征求意见的详细情况他也都知道。他这样说，不过是阻挠把文件拿出来讨论。他怕文件拿出来对他们不利。

但是，到了一九七六年初，他们忽然对《二十条》感起兴趣来了。他们也不管成熟不成熟了，也不管是不是正式的稿子，就把他们弄到的《二十条》的一个手抄稿在上海印发到基层，进行批判。不久，“四人帮”在福建的爪牙又把一个《十八条》的传抄本给了王洪文，他们如获至宝，马上大量翻印，把批《二十条》改成了批判《十八条》。与此同时，他们控制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把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错漏百出的《十八条》手抄本印发两校批判。从此，批判《二十条》的文章陆续在报刊上出现，“四人帮”搞的批判《二十条》的丑剧正式开场了。

这出反革命丑剧，完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进行的。它同“四人帮”整个篡党夺权阴谋紧密相连，自始至终贯穿着打倒一批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目的。

一开始，“四人帮”就把批判《二十条》，作为攻击中央同志的重磅炮弹。他们颠倒黑白，妄加罪名，把《二十条》打成“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把起草《二十条》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负责同志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为打倒其他中央同志制造根据。张春桥亲自给批判《二十条》定调子，污蔑《二十条》“提出了一整套的修正主义路线、方针、政策，大肆兜售

早已被批判过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条条专政、专家治厂等黑货，变本加厉地鼓吹'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在运用折中主义手法方面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批判《二十条》都是按照这个调子唱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以后，“四人帮”加紧了批判《二十条》的活动，更加猖狂地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亲信说得很清楚，批《二十条》是为了攻“台上的人”。他们当时的一篇代表作，是登在一九七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上署名吕达的文章《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这篇文章是经过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审阅定稿的。在这篇文章中，除了唱他们那套老调子外，还给《二十条》的起草捏造了一个新罪名，说《二十条》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的。他们这样干，是要把起草《二十条》这件事不仅仅说成是路线问题，而且说成是反党的阴谋活动，为打倒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制造新的根据。

六月以后，毛主席更加病重，“四人帮”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他们的阴谋活动一步紧似一步，斗争趋于白热化。在七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们亲自出马，指挥在上海和辽宁的亲信，南北呼应，同时发难，直接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进攻，污蔑他们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八月十一日，姚文元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攻击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组织抗震救灾斗争，是“以抗震压革命”，猖狂地说，“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妄图利用自然灾害造成暂时的困难，扭转革命方向，复辟资本主义”，明目张胆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八月十三日，他们就指令各地出版社出版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编写的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的小册子。八月二十三日，他们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掀起一个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八月二十四日，他们以新华社记者和本报记者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清华大学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报道，公然把《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比作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叫嚷批“三株大毒草”“对还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秦怀文的文章《论党内走资派》，更加嚣张地说：“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然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要密切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及时而坚决地粉碎走资派的进攻”，叫嚷“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一定能够建立起来”。真是紧锣密鼓，杀气腾腾。这些家伙四出奔走，绞尽脑汁，炮制“批判”文章，也算够辛苦的了。据统计，从八月十三日到十月六日五十几天的时间内，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文章、通讯，就有一百一十篇之多。应当指出，这里面的很多文章是在强迫和压力下写的，并不代表作者的原意，许多同志是反对批判《二十条》的。

“四人帮”公开出版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他们自以为得计了，在一段时间内兴高采烈，得意忘形。他们说，三个小册子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下发三个小册子，“是大好形势的表现，是毛主席、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无产阶级同走资派的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说，“三个小册子印出来，对正在走的走资派就是批判”，这是“全局的问题，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问题，不仅关系现在，还关系到未来”，“这是压倒一切的，统帅一切的”。请看，他们是何等趾高气扬，头脑膨胀到了什么程度，简直要主宰一切、指挥一切了。他们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纯系造谣。他们批“三株大毒草”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根本不是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是他们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战略部署。他们以为，掀起这样一个大的攻势，就可以把群众压倒，就可以诱骗一些人跟着他们跑，就可以造成一个既成事实，把支

持、炮制“三株大毒草”的罪名强加在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身上，罪案一定，就可以统统打倒，由他们取而代之。这就叫利令智昏。利者，权力也。智昏者，他们是一批蠢货，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总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过低地估计了我们党、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他们喧嚣一时的表演，彻底暴露了他们自己。人们原来还不知道他们说的“三株大毒草”是什么怪物，看了三个小册子，知道了真相。广大群众愤慨地说，三个文件根本不是什么“大毒草”，而是说了我们的心里话；“四人帮”的所谓批判，是毫无道理的，他们的“批判”，才真正是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有的工人说：“什么《二十条》是大毒草，我看是香花。”有的工人对新华社的人说：“为什么批《二十条》，不批判奸臣?”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不但没有把他们推上“皇帝”的宝座，而是加速了他们的灭亡。曾几何时，出版批判“三株大毒草”的小册子后不到两个月，这伙张牙舞爪、猖獗一时的反革命阴谋家、野心家，就被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所一举粉碎，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他们演出的这出丑剧，也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原载197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前言

(一九七六年七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编写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系列讲话。它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总纲》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邓小平把这篇文章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但是，这个“拳头”还来不及“打出去”，就被捉住了，成了他翻案复辟的罪证。现将这个反面教材公之于众。同时，选编了几篇文章，供批判时参考。在出版时，原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个别修改。

〔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

(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遵照毛主席的建议，提出了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第一步，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

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与此同时，毛主席提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促进安定团结的指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不仅是当前全党、全军和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而且也是实现今后二十五年宏伟目标的整个奋斗过程中的工作总纲。执行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就是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执行党的团结胜利路线，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现在国际上革命的因素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洪流。两个超级大国互相争夺，世界大战总有一天要打起来。苏修的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始终想要向我们动手。我们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我们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毛主席多年以来为我们制定了一条完整的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有把握地说，广大干部已经掌握了毛主席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许多工矿企业和基层单位的领导权已经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农群众手里。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提高，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大大增长，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总之，形势大好，形势逼人。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全面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实现今后二十五年的宏伟目标，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

（一）

毛主席在关于学习理论的指示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在三项重要指示中占首要地位。理论是行动的指南。学习理论，首先要认真看书学习，仔细阅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和原著，领会它们的精神实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成绩，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检验的唯一标志，就看我们是否应用这种理论，就看我们在应用中，是否有利于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是否有利于促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否有利于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地发展。

毛主席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为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制定了一条基本路线。毛主席在这次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条基本路线的理论基础。

在这次学习理论的运动中，很多同志联系实际，联系自己的切身经验，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的主要矛盾。只有紧紧地抓着这个主要矛盾，坚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才能真正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也还有不少同志由于对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认识不足，常常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

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刘少奇在我国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他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林彪打着反对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幌子，叫嚷"要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也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且表现得更为突出。拿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人民群众对他的揭露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和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剥开了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派的面目。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干部在这个斗争中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认识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他们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

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继承林彪的衣钵，总是把我们的革命口号接过去，加以歪曲，加以割裂，塞进私货，来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把我们一些同志、一些群众的思想搞乱，把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党组织搞乱，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分裂群众队伍。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把党的好干部和先进模范人物打下台，篡夺一些地方和一些单位的领导权，在这些地方和单位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的阶级基础，有的本来就是地、富、反、坏、老资产阶级分子，有的是从小生产者中、工人一部分中、干部一部分中、党员一部分中蜕变出来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内外勾结，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违法乱纪，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受到破坏，甚至使那里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变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斗争就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如果不把这些阶级敌人斗垮，不把他们篡夺了的领导权夺回来，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个基层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在那里，无产阶级要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就只是一句空话。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中，那些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撇在一边，把这个主要矛盾撇在一边。他们对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阶级敌人没有仇恨，对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受到损失毫不痛心，对社会主义制度遭到破坏无动于衷。他们热衷于拉山头，打派仗，长期纠缠于所谓这一派和那一派的斗争，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所谓新干部和老干部的斗争，所谓"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有的甚至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目的，不惜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同流合污，串通一气。在他们的脑子里，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不见了，社会主义不见了，甚至爱国主义也不见了。现在是到了向这些同志（我们现在还叫他们同志）大喝一声的时候了，应该悬崖勒马，立即回头！他们应该懂得，在他们面前只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条是改正错误，做一个好的党员；一条是堕落下去，甚至跌入反革命坑内。这后一条路是确实存在的，反革命分子可能正在那里招手呢！**"

一些地方、一些单位的上述问题，在省市、地县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示，有的已经得到解决，有的正在解决。由此我们应当得到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在阶级社会里，对一切社会现象都要进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例如，对"造反"，就要看他是

造哪一个阶级的反，是代表哪一个阶级在造反。又例如，对“反潮流”，就要看他是反什么性质的潮流，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潮流，还是反修正主义的潮流，是反正确的潮流，还是反错误的潮流。再例如，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它们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这些武器来反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来反对无产阶级。总之，要象毛主席所教导的那样：“**对于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者抵制它。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我们的同志还应当得到另一个深刻的教训，这就是要识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绝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而要看他们的实际行动。正如列宁所说的：“**判断一个人，不是根据他自己的表白或对自己的看法，而是根据他的行动。判断哲学家，不应当根据他们本人所挂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高举”、“顶峰”、“天才”、“绝对权威”等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在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毛主席又把林彪这个反面教员的反面教材公之于众，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进行批判，使大家看清了林彪是同国内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地富反坏和国外的帝修反携手并进的，是用“五七一工程纪要”这类反动透顶的东西教导他的死党和追随者的。这样，就进一步暴露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的丑恶面目。

鲁迅说过：“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的袭用。”林彪垮台了，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中，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又在袭用林彪的老谱。但是，正如毛主席早就指出的：“**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只要我们牢记同林彪反革命阴谋集团斗争的经验教训，牢记列宁和毛主席的教导，就不难识破林彪一类的鬼蜮伎俩。他们的垮台，同林彪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二）

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

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卖国贼，压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压迫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第二个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就是为了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这个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

人民内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通过毛主席所说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分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毛主席说：“**在这里，首先需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因为如果在主观上没有团结的愿望，一斗势必把事情斗乱，不可收拾，那还不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还有什么党的团结？**”

党的基本路线明确规定："**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必须遵照党的基本路线规定的这个总政策，去划分敌我界线和是非界线，"**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只有这样，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分化瓦解敌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

刘少奇、林彪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最恶毒的一手，就是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把敌人当同志，把同志当敌人。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说成是什么"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以掩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主要矛盾。他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大批干部而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林彪推行形左实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比刘少奇做得更为狡诈。他也是从歪曲党的基本路线、歪曲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入手，胡说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革原来革过命的命"，把斗争的矛头针对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群众一个时期内在某些问题上观点不一致，挑动群众斗群众，支持和纵容武斗，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都当作敌我矛盾，并且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甚至对敌斗争也不容许的方法，对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一个反革命阴谋集团，妄图实现反革命政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特别是在那些被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更要广泛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彻底揭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彻底揭露他们袭用林彪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把那些经过揭露、批判、斗争、教育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死不悔改的分子，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压倒他们，打垮他们，"**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政策，我们必须坚决落实这个政策。只有这样，这些地方和单位才能出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我们必须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全党的团结，爱护全军的团结，爱护全国人民的团结。毛主席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

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强党的团结。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就讲过："**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务。**"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后，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又一次强调加强党的团结，提醒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分裂党的危险。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和第十次代表大会，都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全党党员，无论老党员、新党员，全体干部，无论老干部、新干部，都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把团结看作党的生命，有利于团结的话就说，不利于团结的话就不说；有利于团结的事就做，不利于团结的事就不做。一切犯了或轻或重的资产阶级派性错误的同志，都要痛下决心，认真检查，切实改正。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要坚决遵循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要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政治纪律性，服从中央领导，服从上级领导，服从党组织的决议，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容许任何党员、任何干部拉山头、搞宗派，在组织

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把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和单位搞成独立王国。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光明正大，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谈。反对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的两面派行为。全体党员都要以大局为重，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忠诚履行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努力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

毛主席教导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同这条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完全对立，林彪实行反革命政变的纲领是：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危险性就在于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把他的反动纲领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说成是理论，使那些"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之徒获得精神武器，而我们的很多好同志却受到蒙蔽，对于他们篡党篡权的丑恶行径丧失警惕。我们必须把这个反动纲领批深、批透、批臭，彻底消灭它的市场。

工人阶级是我国的领导阶级。全体党员、全体干部都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指示："**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加强整个工人阶级的团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又指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绝大多数工矿企业和事业单位，早已遵照毛主席这些指示，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有的地方、有的单位，却有人还在分裂工人阶级，闹资产阶级派性。他们不是依靠整个工人阶级，而是依靠他们自己垒起来的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他们还在工人阶级内部搞什么"以我划线"，把那些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对了队"，封为"最革命的"，把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说成是"站错了队"，戴上"不革命"的帽子；甚至把老工人和模范人物都说成是"保守派"、"复辟势力"。他们公然反对"**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大搞形而上学，对自己全盘肯定，不做自我批评，对别人全盘否定，一意压倒，谁要是不赞成，就说谁是"和稀泥"、是"中庸之道"。他们这种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争权夺利，一派霸权。这一切都是完全错误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有群众的地方，大致都有比较积极的、中间状态的和比较落后的三部分人。**"在工人阶级内部，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区别。我们在工作中要以先进分子为骨干，带动中间的，帮助和教育落后的，团结起来、共同前进。工人阶级内部三部分人的区别，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必须不断地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了的分子。**"这样做的目的，是适应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发展的需要，不断提高整个工人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破坏工人阶级团结的做法，是根本对立的。

为了实现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必须进一步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包括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技术人员政策、民族政策、经济政策，以及有关解决工人阶级内部矛盾的政策。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促进安定团结，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三）

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促进全国的安定团结，是属于调整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任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是属于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任务。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革命和生产的关系，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就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诸种矛盾，在总的历史发展中，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但是，在一定条件之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处在国内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条件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放在首要地位；一再提醒全党注意，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如果我们忽视了理论学习，忽视了政治的统帅作用，我们的一切工作就一定要走到邪路上去。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又说：**“全部问题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

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我们批判了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所宣扬的唯生产力论。他们这种谬论的核心是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而是什么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任务，已经代替了革命的任务，成为首要任务。他们的险恶用心是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蒙住大家的眼睛，便于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批判这种唯生产力论是完成正确的，完全必要的。现在要批判，今后也还要继续批判。

林彪一类政治骗子表面上同刘少奇相反，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实际上同刘少奇殊途同归。他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割裂开来，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歪曲成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他在“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的词句掩盖下，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专政，冲击社会主义经济，冲击国家计划，冲击企业管理，冲击生产秩序，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在批判刘少奇的唯生产力论的同时，必须狠狠地批判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彻底肃清这种反动谬论的流毒。

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辩证地理解政治和经济的对立统一关系，既要认识政治的统帅作用，又要认识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可是我们一些同志至今还是用形而上学来对待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关系，总是把政治和经济互相割裂开来，把革命和生产互相割裂开来，只讲政治，不讲经济，只讲革命，不讲生产，一听到要抓好生产，搞好经济建设，就给人家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说人家搞修正主义。这种观

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这种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早就有人宣扬过。毛主席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他说：**“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这种认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毛主席都这样重视经济建设工作，这样重视增强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了进行和平建设的国内条件。而我们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颠覆和侵略的威胁，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争取时间，加倍努力，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吗。

在抗日战争末期，毛主席在总结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的经验时指出：**“一九四二和一九四三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他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当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正在展开的时候，毛主席就批判了那种把整风和生产两个环子分割开来，忽视生产，轻视经济工作的错误倾向。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错误倾向的思想根源是：**“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指出整风和生产**“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毛主席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说得多么准确、鲜明、生动啊！我们那些至今还轻视生产建设的同志，难道不应当对照毛主席的指示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言行吗？如果看了这些话还无动于衷，不是正好证明他们中孔孟之道的**“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很深吗！难道不应当把这种腐话之毒去掉得干干净净吗？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就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对革命负责，也要对生产负责。要从自己的头脑中清除那些“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革命非常重要，生产无关紧要”、“抓革命吃得开，抓生产活倒霉”的糊涂观念。要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决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把自己所在地区、所在单位的革命真正抓好，生产真正抓好。不信邪，不怕鬼，树雄心，立壮志，挺起腰板干。大庆人说得好：“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斗，同错误思想斗。”大寨人也说得好：“既要大讲革命，又要大干革命，只讲不干不是真革命。既要大讲社会主义，又要大干社会主义，只讲不干也不是真搞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从二十多年斗争实践中学懂了的一条真理。”我们要把大庆、大寨抓革命、促生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干劲，真正学到手。**“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真正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使本地区、

本单位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生产建设蒸蒸日上。

列宁说过："**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主席也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区别真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区别真干革命和假干革命，区别真干社会主义和假干社会主义，区别干部所做工作的成绩是坏是好，是大是小，归根结底，只能也只应按照列宁和毛主席所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

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那种认为抓好革命，生产自然会上去，用不着花气力去抓生产的看法，只有沉醉在点石成金一类童话中的人才会相信。

毛主席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三大革命运动是互相联系的，我们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开展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但是，这三大运动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各有自己的特殊矛盾需要我们去解决。即使我们真正掌握了阶级斗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阶级斗争中的特殊矛盾，也不等于掌握了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特点和规律，不等于解决了这两大革命运动中的特殊矛盾，也还需要我们进行艰苦的努力，进行一系列的工作，来研究和解决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特殊矛盾。

因此，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我们的干部既要学会搞阶级斗争，也要学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做到又懂政治，又懂业务。毛主席说："**政治和业务的关系，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成为内行，使自己又红又专。**"所有的干部，都要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以身作则，带领广大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就必须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用心研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安排好各个经济部门的比例关系，进行综合平衡，做出统一的国家计划，付之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年年月月都会出现新的矛盾、新的不平衡，都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调整，解决这些新的矛盾，求得新的平衡。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这是我们做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的辩证规律。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行业、各部门、各单位都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严格的规章制度。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是劳动人民和科学技术人员多年的实践经验凝结成的，其中有许多是付出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决不能把它看成可有可无的东西，更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一切规章制度看成是"管、卡、压"。遵守生产斗争日益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才能使人们在生产斗争中取得越来越多的自由，违反这种规章制度，必然会在生产斗争中碰得头破血流。

责任制，是企业规章制度的核心。要把建立责任制，作为整顿企业管理的重要一环。每件工作，每个岗位，都要有人负责；每个干部、工人、技术人员，都要有明确的职责。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责任心，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

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他的意思就是说，生产愈发展，科学技术愈发展，反映这种发展所需要的规章制度就会愈来愈严密，愈来愈要求人们严格地遵守这种规章制度；不符合这种发展需要的规章制度，则要求人们及时地加以改革。否则，就会妨碍生产的发展，妨碍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资本主义社会是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是这样，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是这样。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也好，改革旧的规章制度也好，都必须依靠群众，集中集体智慧，按照生产斗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来做出决定。如果主观随意地乱来一气，就会在生产管理中造成无人负责的状况，造成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各级领导要做到生产、生活同时抓。不仅要关心群众的政治生活，也要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群众的生活。要把群众生活上的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凡是能够解决的，都要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积极去解决。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要得到群众的拥护么？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工业愈发展，工业比重愈增加，就愈要重视农业的发展，这些话毛主席不知说过多少次了。可是，至今一些城市、一些工矿区的副食品供应仍不充足。这些地方的领导既不向大庆那样的先进单位学习，也不亲自动手，取得经验，发动群众，抓好农业。对这个关系群众生活的大事，长期不设法解决，一拖再拖，这同毛主席“**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的指示，究竟相距多远，请认真想一想吧！

（四）

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割裂的统一整体，不能丢掉任何一项，也不能孤立地只抓其中任何一项。我们必须以这三项重要指示为纲，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丰富经验，制定各项工作的具体政策，用这个工作总纲和各项政策来指导各方面的工作，整顿各方面的工作。工业要整顿，农业要整顿，交通运输要整顿，财政贸易要整顿，科学技术要整顿，文化教育卫生要整顿，文学艺术要整顿，军队要整顿，党也要整顿。这次整顿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为了迎接明年开始的第五个五年计划。

毛主席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的整顿中，党的整顿、党的工作的整顿是重点。“**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各个地方、各个单位的一切工作，一切政治运动，都要由党委遵照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进行统一领导。革委会、工会、青年团和民兵，都要在同级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工作。决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凌驾于党之上。决不允许任何党员、任何党的干部违反“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

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具体政策，关键在于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加强各

级党委的领导班子。这些领导班子，必须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和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由能够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性强、作风好、能团结人的同志组成。这些领导班子，要敢字当头，敢于领导，敢于斗争，敢于向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作斗争，敢于向顽固地搞资产阶级派性的头头作斗争，敢于向一切违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不懈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们的同志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为真理而斗争，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一定会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支持，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不应该怕被打倒，也不可能被打倒。我们应该有这样坚强的信念。工矿企业、农村党的基层组织的成员和党小组组长，在政治上应当是最先进的分子，在劳动中又应当是最积极的分子。对于某些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软、懒、散"的领导班子，应当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适当的调整。长期闹资产阶级派性、屡教不改的，要坚决调离，甚至给予党纪处分；混进来的个别坏人，要坚决清除。

要落实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和各项政策，还必须在全党范围内整顿党的作风。

要批判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坚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各级党委要经常地进行调查研究，如实地了解情况，具体地加以分析。要实事求是，反对报喜不报忧，提倡说真话，不要说假话。**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真正做到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我们应当懂得，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任何领导干部，如果浮在上面，脱离实际，就决不可能取得干社会主义的知识和才能。经验对于干部是必须的，经验是要经过多年的实践才能积累起来的，只要不把自己的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能够经常注意总结提高，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任何一个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的头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要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点会到处碰钉子。**"

要批判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当官作老爷、搞特殊化的坏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毛主席说："**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势必脱离广大劳动群众，势必出修正主义。**"我们的同志应当时刻警惕这种危险，按照党和国家的规定，自觉地参加集体劳动，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最经常的联系。

要批判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横跋扈、动辄训人的坏毛病，坚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优良作风。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严于解剖自己，任何时候对自己的工作都要一分为二，勇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不要只喜欢听奉承话，不喜欢听批评话。不要一听到批评就发火，更不应该对批评者打击报复。我们的同志都要懂得，只要做工作，就不能不犯错误；犯了错误，自己进行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自我批评，诚恳地而不是虚伪地接受人家的批评，这决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决不会损害同志们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信任，而只会增强这种信任，无论对自己对革命事业都是有益无害的。"**有错误不要紧，我们党有这么个规矩，错了就检讨，允许改正错误**"。一切有党性的同志，都应该按照这个规矩办事。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出来的优良的工作作风。正因为我们实行了这种作风，才使我们党成为一个"**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

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叛徒、卖国贼林彪曾经肆意破坏我们党这种优良作风，有一些同志也确实受到了这种破坏的影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遵循毛主席历来的指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有关指示，肃清林彪的影响，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同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已经渡过了光荣的二十六年。尽管帝国主义曾经长期封锁我们，社会帝国主义曾经多次妄图颠覆我们，尽管受到几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但是全国人民在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在他们所制造的困难面前后退，始终沿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

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只要我们以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为纲，做好各方面的整顿工作，继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

〔附〕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

向 群

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加快了他们的反革命步伐，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八月，他们趁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之际，倾巢出动，掀起一个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在江青直接主使下，他们指令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选辑所谓“批判文章”，并把这三个稿子作为“附录”（实则只有《论总纲》附了初稿的全文，《汇报提纲》》只附了第一稿的第三部分，《条例》只附了最初几个草稿中的一个稿子，而且不是原文，是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分别编成三个小册子，诡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印了数千万册，发到全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他们把这三个稿子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林彪的《“571 工程”纪要》，妄图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成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式的人物，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把这三个稿子打成“三株大毒草”，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说过这三个稿子是毒草，更没有说过要批判。他们给这三个稿子戴上如此吓人的大帽子；完全是欺骗舆论，制造混乱，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四人帮”把《论总纲》说成是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授意炮制”的。说他“把这篇文章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这些说法，纯属捏造。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先后作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反对和歪曲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这是当时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论总纲》这篇文章，正是从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出

发、宣传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宣传一九七五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农业学大寨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问题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阐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等方面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上旬的初稿中，有些提法不妥当，特别是用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十月中旬的二稿中，就已删去了这个提法，因而题目也已改了。

"四人帮"为了反对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诬蔑《论总纲》是"大毒草"，给它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他们攻击《论总纲》是"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是"翻案复辟的自供状"、"翻案复辟的铁证"等等。总之，在他们看来，《论总纲》是搞"复辟"，而他们则是"反复辟"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复辟？什么是反复辟？人民群众是最有鉴别能力的。《论总纲》虽然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全文揭露和痛斥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与"四人帮"的愿望正好相反，尽管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论总纲》实行反革命围剿，但是广大群众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是什么毒草，而认为那些攻击《论总纲》的文章，才是真正的毒草。

现已查明，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姚文元在一份《论总纲》的稿子上，写了四十七条批语，并"指示"他们的写作班子"程越"、"梁效"等炮制批判《论总纲》的黑文，恶毒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反革命的批语和文章，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从反面说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论总纲》，而是"四人帮"自已。

(一)

《论总纲》在阐述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坚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复杂性。文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如果对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就会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对于《论总纲》的这些论述，"四人帮"如芒在背，不能容忍。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一伙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反革命的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他们根本歪曲毛主席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中提出的**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别有用心地搞什么"全面专政"、"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妄图对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外的一切阶级、一切领域、一切人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为了推行这条极右路线，他们采用了种种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正如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

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虽然在自己脸上涂上了一层层"左派"、"革命派"的油彩，但是他们非常心虚，非常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姚文元一看到《论总纲》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按捺不住，在旁边批道："什么'复杂性'?""来了!"在看到《论总纲》中说"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时候，又批道："你们才是这样。自画像。"他们如此敏感，确是活灵活现地"自画"出了他们做贼心虚的心理状态。

《论总纲》在批判林彪时说，毛主席正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在旁边批道："'左'?"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文时，又无中生有地给《论总纲》加上了"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左'"的罪名。"四人帮"不仅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而且对人们戳穿林彪的伪装也很反感，这说明他们使用的反革命手法是袭用林彪的老谱，他们同林彪本来就是一伙。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用"左派"的假面具掩盖极右派的实质，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上、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党内外阶级敌人如果以赤裸裸的极右面目出现，就根本站不住脚，所以他们往往戴上"革命"、"左派"的假面具，用这种诡计来欺骗人民。林彪所说的"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就一语道出了这种诡计。正如列宁所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斯大林在讲到同联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等人作斗争的经验时也指出："**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托洛茨基主义是"**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4页）

由于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具有这种特征，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时就强调指出，识别阴谋集团的重要性。毛主席说："**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0—151页）毛主席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不仅要通过现象而且要通过假象去认识本质。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假象同一般现象的区别，在于它从反面反映本质，比现象反映本质要更加曲折。所以，通过假象认识本质更不容易，我们必须花气力去学会这种本领。随着革命的发展，毛主席又总结国际国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反复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且着重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不仅向我们提出了这个任务，而且为我们制定

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个著名的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派的基本原则。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论他们用怎样的革命词句来伪装自己，都是能够被识别的。他们既然事实上在搞反革命，就必然产生革命词句和反革命行为的矛盾，也就是革命的伪装和反革命的实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他们不可能克服的，因而他们不可能不露出破绽。人们抓住他们的破绽，就可以识破他们的伪装、认清他们的本质。我们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说明了这一点，同“四人帮”的斗争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四人帮”就是一伙用“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黑帮。当他们摆出“超级革命”的架势，把革命的口号歪曲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反革命的活动干得最凶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人民，就已经一步一步地识破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

《论总纲》在讲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说：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识破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很清楚，《论总纲》这段话只是对当时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一种分析，并没有具体地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是谁。但是，“四人帮”对此异常敏感，极为恼火。姚文元在他的批语中质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指谁?”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文章时，又亲笔写了这样一段奇文：《论总纲》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十分熟悉，这两个称号一向是“四人帮”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的幌子，因而也就是说指的是他们自己。姚文元在这段奇文中，既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打自招地供认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这种自供是合乎事实的。现在全国人民都已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确是一伙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二）

《论总纲》在论述安定团结问题时，一开头就写道：“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姚文元对此批道：“革命呢?”这条批语说明，在“四人帮”看来，谁要说实现安定团结，谁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反对实现安定团结，妄图要无休止地乱下去，搞乱无产阶级的天下。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大乱，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四人帮”的这些谬论，一笔抹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矛头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伟大战略思想。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把毛主席这个指示接过去，加以歪曲，千方百计地搞乱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种阶级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的乱。一种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去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

路当权派的反，打乱他们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修正主义统治，使他们土崩瓦解，**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另一种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制造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搅乱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这是他们从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前一种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前，是我们的斗争所需要的；后一种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必须加以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反对打倒一切。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和制止阶级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混乱。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并且反复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革命人民的团结，警惕阶级敌人的分裂活动。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针对社会上流行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复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警惕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搅乱我们的阶级队伍，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实际上都是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尖锐批判。

当我们党取得了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以后，毛主席及时地在党的九大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到一九七四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粉碎了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这时，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促进安定团结，以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准备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四人帮"不要安定团结，而要继续大乱，彻底大乱。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一笔抹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此作为还要继续乱下去的借口。他们把毛主席的批林批孔的指示接过去，利用评法批儒，掀起了一个攻击和陷害周总理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革命逆流。他们在全国不少地方继续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组织帮派体系，更加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他们要继续乱党、乱军、乱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安定团结**的指示。这是对"四人帮"的当头一棒。但是，"四人帮"悍然不顾毛主席的严重警告，继续坚持他们的"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

《论总纲》遵循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针对"四人帮"反对和拒不宣传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的严重情况，论述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论述了安定团结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文中指出，促进安定团结，才能在全国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局面，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但是，实现安定团结，必须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关系，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从这个情况出发，《论总纲》强调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要彻底揭露阶级敌人在"造反"、"反潮流"的革

命旗帜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那些被阶级敌人控制的地方和单位，要彻底揭露和坚决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定团结。这些论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四人帮"感到这些论述的锋芒是对着他们的，所以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不是讲的阶级斗争，都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革命。由此可见，"四人帮"所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就是保护和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等的力量，向无产阶级进攻。

阶级斗争和安定团结是纲和目的关系，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正确地处理阶级斗争和革命团结的辩证关系，坚持斗争和团结的统一。在同阶级敌人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总是强调团结对敌的重要性。毛主席指出，要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每当革命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以后，毛主席又总是进一步提出增强团结的任务，以便从政治上、思想上、物质上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这个一贯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及时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这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

（三）

《论总纲》为了阐述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一开头就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姚文元对此批道："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并且诬蔑《论总纲》"篡改党的纲领，否定基本路线"。"程越"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在《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文中写道："《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这是"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这里，姚文元的批语和"程越"的话，准确地表达了"四人帮"多年以来大肆宣扬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并不包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对立起来，甚至把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说成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四人帮"的这个"理论"，只能说明他们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四人帮"的"理论"相反，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本身就包含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

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首先必须夺取政权，改变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仅仅这样做还不能彻底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生产关系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断巩固，并且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才能取得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物质力量。

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真正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大力

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失去了目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充分巩固。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集第366页）毛主席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页）

所谓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归根结蒂，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比资本主义丰富得多的社会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优越性，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去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作出艰苦的努力，这种优越性是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毛主席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讲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6页）毛主席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包含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

“四人帮”一面高谈社会主义革命，高谈阶级斗争，一面却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中排除出去，把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对立起来，这就充分说明，他们的所谓“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其实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社会革命不是凭空发生的，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革命才会到来。按照“四人帮”的“理论”，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革命。他们的所谓“革命”，就是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革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命。

《论总纲》一开头就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姚文元在修改“程越”的文章时，把这句话偷换为“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他们这样做，本来是为了一箭双雕：既可以给《论总纲》加上“否定党的基本纲领”的罪名，又可以宣扬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的谬论。可是这样一来，恰好暴露了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早在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

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用这个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经过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

《论总纲》在讲到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时，引用了列宁关于“**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的教导，同时还引用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著名指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对此，姚文元批道：“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梁效”在《翻案复辟的自供状》一文中，根据姚文元的批语，攻击《论总纲》引用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是什么“公然歪曲”。他们的“理由”是，《论总纲》仅仅引用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而没有接着引用这个指示的后面一段话，即“**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他们根据这个“理由”，攻击《论总纲》“采取掐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故意删去毛主席那一段话的后半部”，是“抽掉革命来谈生产”，是“攻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姚文元的批语和“梁效”的谬论，是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这个著名指示，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后面的那段话，是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任务所作的说明。这段话明确指出，只有经过革命斗争的手段达到“**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的目的，“**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论总纲》引用这个指示，是为了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要用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引用这个指示时，没有引用后面那段话，根本不存在什么“歪曲”、“掐头去尾”的问题。姚文元直截了当地说《论总纲》引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就是“回到唯生产力论”，“梁效”稍加掩饰，说不接着引用后面那段话，就是“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四人帮”长期以来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原来矛头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不是别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程越”的文章，根据姚文元的“指示”，还诬蔑《论总纲》“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这段话很值得人们注意。它准确地表达了“四人帮”多年以来大量宣扬的又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上层建筑可以脱离基础，不为基础服务、政治可以脱离经济，不为经济服务。“四人帮”的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底背叛。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不能不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是不能不为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是由基础决定的，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一旦在一定的基础上产生以后，就对它的基础发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上层建筑基本适应它的基础，因而就会促进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一种是上层建筑不适应它的基础，阻碍和破坏基础的发展，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变革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会到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着不变革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不能巩固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

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基本道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反复阐述过。列宁指出：任何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毛主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上层建筑必须为基础服务，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常强调的政治是统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阶级斗争是纲等等，是不是有任何矛盾呢？完全没有，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以经常强调政治是统帅，政治占首位，阶级斗争是纲，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外阶级敌人经常准备向我们进攻。如果我们不能随时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复辟的阴谋，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稳固，也就谈不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无产阶级如果不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统帅经济工作，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就不能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也就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紧紧掌握自己的政治统治权，坚持阶级斗争为纲，采取正确的路线，去保证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发展。因此，很明显，政治对经济的统帅是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否则，就无所谓政治对经济的统帅。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正确有效地为经济服务，使经济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卓有成效地迅速前进。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给我们树立了解决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为经济服务问题的典范。《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是直接讨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方针政策的，又都是政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是直接的政治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又**“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就最清楚地表明了，政治是与经济统一的，是为经济服务的。

列宁说：**“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四人帮”鼓吹政治不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充分暴露出他们所说的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这种政治当然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只能对社会主义经济起阻碍和破坏作用。

“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论者。他们故意把政治描绘成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经济看成下等的东西，鄙视政治为经济服务。他们同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一样，颠倒地看待政治和经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看来，不是劳动者养活他们，而是他们养活劳动者。他们鄙视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进而鄙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根本否定**“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他们否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他们否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四人帮”眼里，他们是救世主，历史是由他们这伙搞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政治的人们创造的，而不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他们的这种“理论”旧得不能再旧了，它是几千年前极

端腐朽的奴隶主、封建主的"理论"，是董仲舒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类鬼话的翻版。

"四人帮"宣扬这套"理论，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毁灭社会主义经济，妄图篡党夺权，把我国重新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使社会生产力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以便维持他们的反革命统治。

姚文元对《论总纲》有一条骇人听闻的批语。《论总纲》在结尾讲到，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句话，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讲过的，是完全正确和无可怀疑的。可是，这个反革命文痞居然对此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什么叫复辟呢？在"四人帮"的心目中，"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复辟。可见，他们大喊大叫的所谓"反复辟"，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姚文元的这个批语、是写给他们的亲信们看的，是私房话，这里没有什么伪装，和盘托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这个批语，白纸黑字，无可争辩地说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自己。他们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怎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反革命复辟的，是怎样伪造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照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认真学习最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武器，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原载 1977 年 7 月 7 日《人民日报》)

《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前言

(一九七六年七月)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

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这是一篇难得的反面教材，必须彻底批判。

我们从报刊上选编了几篇批判文章，以供参考。附录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删节。邓小平在听取科学院负责人汇报时的插话，是他狂热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自白，一并附在后面，供批判用。

〔附〕 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节录）

（汇报提纲　讨论第一稿）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一日）

我们到科学院将近一个月，实际工作约二十天。查阅了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同院内外的一些同志进行了座谈，作了点调查。现对下面六个问题提出一些粗略的看法。

（一）关于充分肯定科技战线上的成绩问题（略）

（二）关于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略）

（三）关于力求弄通主席提出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问题

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过渡时期的基本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同时也制定了各条战线的具体路线。我们对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还刚刚接触，领会很不深，更谈不上弄懂弄通。经过初步学习和调查研究，觉得当前有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第一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抓科技工作，一定要政治统帅业务，抓革命，促科研。**“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忘记了党的总路线，就会迷失方向。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下，正确贯彻党的科技战线的具体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政策思想统一了，才能有统一的行动。

当前这个时期，就是要坚决贯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个指示。三个指示不能割裂开来。丢掉了反修防修，业务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生产、科技都不可能搞好。生产和科技搞不上去，物质基础不牢靠，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可能得到巩固。

在科技部门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做到既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又有切实具体的业务领导。党政领导干部，懂得很多的业务、技术是困难的，但是不学点业务和科学技术知识，不过问业务，也是不对的。应当朝又红又专的方向努力。

第二是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关系问题。

科学来源于生产，又指导生产、促进生产。怎么才能多快好省发展生产？决定的因素是人，一靠人们的高度政治觉悟、革命干劲，二靠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科研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石油工业的突飞猛进，就证明了这一点。

主席和中央提出了两步走的宏伟目标，如果我们在科学技术上没有一个大的飞跃，就难以实现。没有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也就不可能有工业、农业、国防的现代化。

有些同志认为搞科学研究“远水不解近渴”。其实，使科研走在前面，正是为了避免“临

渴掘井"。有些同志顾虑新技术不成熟、不定型，怕耽误生产。过去确实有过教训。但是，从这个教训应当得出的结论，不是不搞新技术，而是应当更加重视和加强科学研究。成熟总是从不成熟来的，定型也是从不定型来的，转化的条件就是顽强地进行科学实验。抓生产，一定要抓科学实验，抓新技术；不但要有产量指标的要求，一定还要有技术经济指标的要求。

第三是专业队伍与群众运动的关系。

我们发展科学技术要靠两支队伍，一支是专业队伍，一支是群众队伍。两条腿走路，发挥两个积极性。

只要专业队伍，不要群众队伍，不搞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培植精神贵族，不尊重甚至压制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做法。

如果不要专业队伍，则群众的积极性难以持久，群众性的科学实验运动难以提高。

正确的方针是专业队伍同群众运动结合。专业队伍要向工农群众学习，向生产实践学习。这种结合并不是要降低专业队伍的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专业队伍在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中的骨干作用。要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向生产推广科研成果。要把群众的生产实践经验、科学实验经验提高到科学理论水平，使科学得到发展，再回到群众中去，推广开来。国家还有许多重大的科学技术课题，也必须集中一批专业队伍来搞。

现在，专业队伍、群众队伍都要发展，都要提高。有些地方撤销了不少专业科研机构，科技人员长期下放劳动或在生产岗位顶班劳动。还有许多专业机构，多年来没有补充新生力量，平均年龄已近四十岁。这种状况必须迅速改变。当前急需从下放劳动多年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中，从群众性科学实验运动涌现出的具有一定科学文化知识的积极分子中，有计划地吸收一部分人充实和加强专业队伍；还必须逐步建设一批新的专业科研机构。

科学实验也是一种社会实践，生产斗争是不能代替它的。有许多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但又要注意把这种试验研究同实验室的试验研究密切结合起来。还有不少工作不可能到生产现场去试验研究，而必须是在实验室里进行试验研究的。决不能否定和取消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不能不加区别地要求任何科学研究工作都要实行"以工厂、农村为基地"的三结合。不宜笼统地提"开门办科研"这样的口号。

科学研究有的需要搞大协作，有的是小集体搞，有的只是一个人在那里钻研。把一个人、几个人搞的工作说成是"小生产"，是不确切的，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第四是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长处的关系。

实践证明，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干科学实验、干一切事业。我们的基点是放在自力更生上的。

讲自力更生，又不能变成闭关自守，变成排外。

主席讲过："**我们公开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学习外国的一切先进的优良的东西，而且永远学下去。**"

列宁学习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毛主席学习了十月革命的普遍经验，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学习是为了创造。善于学习，才能不断前进，后来居上。搞社会科学是这样，搞自然科学也是这样。

我们的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什么都是外国的好"，这是错误的。不敢介绍外国的长处，不去正视差距，也是不对的。承认差距是为了加紧努力，消灭差

距。

搞科技工作，必须注意调查研究国际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向，要收集、研究、分析外国的科技文献资料，大力加强科技情报工作，这才能做到知己知彼，在人家已有的基础上前进，避免别人走过的弯路，迎头赶上去。

为了争取时间、争取速度，我们有必要从国外引进一些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引进是为了借鉴，为了促进我们自己的创造而不是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

要改进和加强科技外事活动，要搞国际科学界的友好活动，又要争取利用各种机会，在学术上多搞到一些东西，少搞不搞那种一般性的观光活动。要象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把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为了更好地学习外国长处和扩大外事活动队伍，要提倡年青科技人员下功夫搞通一两门外文。

第五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我们党历来是重视自然科学理论研究的，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有过许多指示。我们既不要空洞的理论，也不要盲目的实践。

我们有不少生产技术过不了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理论研究和基础性工作。

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上还是仿的多，创的少，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做到“**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发展自己的创造，也要求加强理论研究。

我们在工农业生产中，在群众中，有丰富的实践，我们国家还有丰富的科学遗产，需要总结提高，把具体经验上升到一般规律、上升到理论，用以更广泛地指导实践。

还有一类理论研究，虽然暂时还看不到应用的途径，但是对于认识自然、发展科学有重要意义，有的在国际政治斗争和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中有重要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

因此，在搞好大量的应用研究的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把理论研究与“三脱离”等同起来。不能认为只有应用研究是国家的需要，理论研究同样也是国家的需要。许多理论研究往往不是短期内可以见效的，容易受到冲击，更需要各级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做好切实安排。

各部门情况不同，也就需要有所侧重。生产部门要着重解决生产中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也要注意理论研究。科学院的研究所和部分高等院校，有条件，也有责任更多地搞一些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统筹安排。

第六是关于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当前，在科技战线要大力加强学术活动，广泛开展学术交流，鼓励学术上不同意见的争鸣和讨论，改变学术空气不浓和简单地以行政方法处理学术问题的状况。

在科技工作中，遇有不同意见，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分清界限。有的是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有的是属于世界观方面的问题，有不少则是属于不同学术观点和具体方法的问题。既要看到相互之间的联系又要区别主次，分清性质，不能混淆。

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是好事不是坏事。这种是非要通过学术讨论的办法，通过科学实践来解决，不能用行政命令办法轻易下结论，支持一派，压制一派。更不能以多数还是少数，青年还是老年，政治表现如何来作为衡量学术是非的标准。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修正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的学术观点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随意加以否定。

要提倡学习主席的哲学思想，学习自然辩证法，善于正确地分析和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思潮的影响，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创立我们自己的学派，支持和扶植科学研究中的新生事物。要把《中国科学》办成一个用自然辩证法来研究自然科学重大课题的刊物，各种学术刊物要提高质量，使它们真正成为开展学术讨论和学术交流的阵地，充分地反映我国学术工作面貌和学术水平。

（四）关于科技战线知识分子政策问题（略）

（五）关于科技十年规划轮廓的初步设想问题（略）

（六）关于院部和直属单位的整顿问题（略）

〔附〕 要知松高洁 待到雪化时

——推翻“四人帮”对《汇报提纲》的诬陷

中国科学院理论组

被“四人帮”诬为“三株大毒草”之一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究竟是毒草，还是香花？尽管“四人帮”动用了他们控制的所有舆论工具，发动了一场势头不小的围剿，每两三天就发表一整版批判文章，而且还专门印发了批判小册子达几百万份，但在群众里面却硬是批不起来，而且“四人帮”越批，《汇报提纲》越香。“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那个爪牙无可奈何地嘟囔说：“阻力很大。”“四人帮”的围剿，为《汇报提纲》作了很好的宣传，这个尚在修改之中、没有公布的文件，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广大群众经过鉴别，认清《汇报提纲》是朵香花，因为它的内容是符合毛主席关于科技工作的指示精神和方针、政策的，它所讲的正是群众心里想讲的话，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实际存在着而必须解决的问题。

党 同 帮 的 决 战

为什么中国科学院的一个文件，而且尚未定稿，“四人帮”却要大动干戈，发动反革命围剿呢？《汇报提纲》触到了他们的痛处，是原因之一；他们想借此把科技大权篡夺过去，也是原因之一；但是更重要的，则是“四人帮”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顺藤摸瓜”，进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

我们都知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础上，为了着重解决有所不足的问题，清除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并着手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继续推向前进，从一九七四年底开始，毛主席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又指出：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毛主席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随后，中央派了几位领导干部到科学院工作。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向这几位领导干部指出，科学院要抓紧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并且着重指出，科学院思想整顿的任务很重，要求他们经过调查研究之

后，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汇报。要汇报就要有个文件，这就是《汇报提纲》的由来。

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根据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多次指示，《汇报提纲》力求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弄清楚关于科技工作的具体路线、方针和政策，针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途径。《汇报提纲》中指出要防止和克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偏离、割裂和曲解，就是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汇报提纲》在向国务院汇报后，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审阅了《汇报提纲》，指示了修改意见。

对于这样一个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工作，并根据毛主席指示正在进行修改的文件，"四人帮"竟敢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气势汹汹的围剿，这在我党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他们这样做，难道不是赤裸裸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党中央吗？

当时有几位副总理听取了汇报，并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四人帮"把几位副总理的讲话断章取义地歪曲以后，肆意攻击，他们分明是要借此把党中央和国务院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同志打下去。

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那个黑干将非法窃取了几位副总理听取汇报时的讲话材料后，偷偷送给"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上海印行数万份，发到基层"供批判用"，还流传全国各地。

"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明目张胆地指使他的同伙，要把几位副总理的讲话同《汇报提纲》串在一起批。

"四人帮"在科学院的爪牙一再公开声称，几位副总理的讲话"有问题"，"各有各的帐"，"是批右倾翻案风的阻力"。

"四人帮"及其爪牙竟然把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颠倒黑白，作为"右倾翻案言论"，编印成集，甚至把毛主席的指示也污蔑为"政治谣言"，编了进去。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春桥安在科学院工作的那个人抛出了他们定下的基调，胡说"《汇报提纲》就是《二月提纲》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按照那个人所定的这个调子和提供的"材料"，"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文章，说什么《汇报提纲》同《二月提纲》是"一条黑线"上"两个并蒂的毒瓜"，"四人帮"要把这条线联到那里？明眼人不难看出他们的险恶用心。

在华国锋同志主持国务院工作以后，"四人帮"更是借批判《汇报提纲》，把矛头集中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严肃地批判了"四人帮"把专业科技队伍说得一塌糊涂的错误做法，梁效竟在批判《汇报提纲》的黑文中猖狂提出："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果真是那么重视专业队伍吗？那不过是一个骗局。"华国锋同志多次说明中央下决心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四人帮"及其爪牙竟把华国锋同志的这一系列指示诬蔑为"妖雾重来"。华国锋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指出，科学院的整顿很有必要。"四人帮"在科学院的那个爪牙竟猖狂挑衅，当面向华国锋同志提出："我们认为全面整顿就是全面复辟，不知你们怎么看？"接着，就由"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那个心腹出题授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由科学院的这个爪牙署名的、题为《整顿就是复辟》的黑文，公然把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整顿"这个革命措施污蔑为"复辟"，猖狂地攻击毛主席和华国锋同志。华国锋同志批判了"四人帮"在科学院的爪牙推行翁森鹤炮制的"学习上海经验"、大搞"双突"的错误，这个爪牙竟一再狂叫"这是对上海的态度问题"，……如此等等。

“四人帮”的这套鬼蜮伎俩，当然遭到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干部的反对和广大群众的抵制。他们想在全国批判《汇报提纲》，中央没有批准。他们提出的“整顿就是复辟”的反动口号，遭到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批驳。他们想把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科学院领导干部打成了“反革命分子”的企图，没有能够得逞。广大群众对“四人帮”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时，科学院广大群众和全国人民一起，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强烈愤慨，表达了对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无比崇敬。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广大人民群众坚信真理必将战胜邪恶，对革命干部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必将推倒。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些愿望终于一一实现了。

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对抗

“四人帮”硬说《汇报提纲》是否定阶级斗争这个纲，是“不要无产阶级专政”，“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果真是这样吗？否！这一点，连“四人帮”自己实际上也是不相信的。他们对《汇报提纲》这样怕，这样恨，恰恰是因为它坚持了阶级斗争这个纲，而且斗争锋芒是直接指向“四人帮”一伙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但是，在林彪反党集团垮台以后，窃取了部分权力的“四人帮”，变本加厉，为非作歹。他们把黑手伸进科技界，抛出揪“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的口号，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篡夺党的领导权。他们肆意篡改、歪曲、割裂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分裂革命队伍，特别着重打击从事科研工作的广大知识分子。如果任凭他们为所欲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将被彻底破坏，那里还谈得上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以及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呢？

正是针对这些情况，《汇报提纲》提出，必须坚决地全面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科技路线，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整顿。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汇报提纲》严厉地对“四人帮”提出警告：“如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和作法、或者夸夸其谈，以感情代替政策，对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作随心所欲的片面解释，势必带来思想混乱，造成工作损失，甚至导致科技工作的严重削弱或取消，从而实际上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需要，脱离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脱离人民的需要。这就仍然会陷人修正主义。”

现在揭露出来的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可以使我们进一步认清：“四人帮”是破坏我国科技事业的罪魁祸首，而他们用来进行破坏的“理论基础”，正是那个反革命的专政论。

列宁一贯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并列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毛主席也一直是这样教导我们的。而“四人帮”却要把工人、农民，特别是知识分子，当作他们专政的对象。他们把所有为社会主义辛勤劳动的知识分子统统污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在科技事业中作出贡献的专家，都打成“反动权威”；把十七年来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科技人员、都说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把科技工作中的党员骨干说成是“戴红帽子的最难办”；王洪文还说什么在科研机构中，“特务象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张春桥更杀气腾腾地叫嚣什么“镇反始终未能触及到文教战线，该抓的就抓，应杀的就杀”，“要抓几个人，枪毙几个人才解恨。”谁要是和他们有点不同意见、不跟他们走，他们就采取专政手段，粗暴打击，残酷镇压。广大知识分子所受的种种迫害和虐待，不正是说明“四人帮”的专政就是法西斯专政吗？

《汇报提纲》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提出：要“在短期内采取有效措施”，“认真落实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把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在使用的同时，必须继续抓紧思想改造，坚持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的方向。”这些，都正是针对“四人帮”的破坏而讲的。只有这样做，才能真正实现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领导，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在科研机关真正落实。“四人帮”却诬蔑这样做就是要“恢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统天子”，真是胡说！

“四人帮”这种破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践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行径，理所当然地遭到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的强烈反对。一九七五年七月，科学院的一位领导干部在同个别地方科技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曾经讲过：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应当落实到基层，但在科技战线不要突出提什么“全面专政”，搞不好，会理解成对知识分子专政。“四人帮”却将这句话砍头去尾，造谣说这位同志说“科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他们批判《汇报提纲》的第一条大罪状，作为他们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发重型炮弹。其手段之卑鄙实在少见。

“四人帮”要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实行专政，而我们却是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对“四人帮”一伙新老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这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对抗。

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较量

在梁效写的批判《汇报提纲》的文章中，在“它的理论基础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这句话的后面。姚文元亲笔加上一句话，说“它的手段是折中主义”。从此，“折中主义”的帽子就满天飞了。他们攻击《汇报提纲》，说它“一连并列了五个‘一方面’‘是不对的’，五个‘另一方面‘也是不对的’”，这就成为“折中主义”了。是的，《汇报提纲》中列举了五点：不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要求、不鼓励科技人员为革命钻研科学技术，也是不对的。不认真推动科技人员同工农群众结合、向工农群众学习，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发挥专业科研机构和专家的作用，也是不对的。……这明明是辩证法，那里是什么“折中主义”？难道象“四人帮”那样，只讲一方面，不讲另一方面，倒是“辩证法”了？不！他们搞的，才是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的一点论。

以红与专的关系说，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又红又专**”“**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四人帮”却把交白卷的张铁生当作“红”的典型，把“专”同“白”绑在一起。谁要是钻研科学技术，钻研业务，他们就给扣上“白专”的帽子。凡是专家，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要当“无产阶级”，就只能是“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不只是形而上学猖獗，而且是“四人帮”对无产阶级的恶毒污蔑。无产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就要培养自己的专家；我们的专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在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才能说是“白”。至于拥护党，热爱祖国，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世界观还没有完全改造好，在思想上、作风上还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称为“白”的。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们应该一方面保护和发挥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引导他们继续改造自己，不断进步。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领导同志在听取科学院工作汇报时指出：对于那些不顾“四人帮”的帽子和棍子，“秘密”地专心致志搞科研，并取得成就的科研人员，应当爱护、表扬，要在政治上关心、帮助他们，工作上支持他们。这位领导同志义正辞严地指出，对于这种被污蔑为“白专”的人，只要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好处，比只占茅房不拉屎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这段话，是对"四人帮"搞的形而上学的痛斥，是为了澄清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真正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严正申明。

在专业科技队伍与群众的关系上，我们主张专、群结合，既不能否定群众的作用，也不能否定专业队伍的作用。专、群结合，组成浩浩荡荡的科学实验的群众运动，这才体现我们的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特点。这种结合，即使专业队伍有广泛、坚实的基础，又使群众的科学活动能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这样，既有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又有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因此，决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否定专业队伍的作用，把专业队伍的水平降低。我们要求专业队伍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推广科研成果，并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从群众中吸取营养，把科研工作往高里提。专业科技队伍的工作，有些是群众今天就需要的，有些是明天才需要的；有些是目前就应该同群众一道进行工作，有些则只能由专业队伍先去探索。对不同的情况要作具体的分析。比如，如果我们缺乏远见，不是在若干年前就采取果断措施，建立原子能、半导体等方面的专业机构，那就不会出现目前广泛使用同位素和半导体的群众运动。又如，如果今天就由广大群众来搞胰岛素人工合成等探索性工作，或是搞需要大型设备的高能物理研究，显然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汇报提纲》第一稿提出"不要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四人帮"又抓住这句话，无限上纲，什么"反对新生事物"，什么"极力抹杀工农兵的作用，完全是一副贵族老爷式的态度"。其实，"四人帮"要笼统地提"开门办所"，其罪恶目的正是要破坏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们提出所谓"三下"（把仪器、人员、课题都放下去），岂不是要专业机构"关门大吉"吗？他们要把研究所办成"派出所"（把人都派出去），办成"四不象"（不象研究所，不象工厂，不象技术推广站，不象机关），这种怪物到底是什么呢？总之，他们就是要反对科研机构以科研为主，要科研人员不敢、也不能搞科研，让我国的科学研究工作远远落在外国的后面，拖住国民经济发展的后腿，这样才能达到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

在科学与生产、理论与实际、中国与外国等等关系上，"四人帮"同样是一点论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他们那套东西，一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违背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三违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其失败的结局原是早已决定了的。

光明同黑暗的搏斗

《汇报提纲》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科学研究搞上去，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作出贡献。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毛主席制定的宏伟蓝图，是无数革命先烈为之流血牺牲的崇高理想，是全国亿万人民为之艰苦奋斗的共同愿望。而"四人帮"妄图通过扼杀科学，破坏生产，来毁掉这个蓝图。谁一说四个现代化，他们就诬为"资本主义化"。谁一提搞科学技术，他们就说是"科学决定论"、"科学至上论"、"科学救国论"。在"四人帮"眼里，科学技术非但不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一种革命力量，简直成了洪水猛兽、成了罪恶的渊薮。

这只是对待科学技术的两种不同态度吗？不！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斗争。

三十多年前，毛主席发表了《两个中国之命运》这篇光辉著作。毛主席向全党指出，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还是存在着两个前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

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就始终有着这样的任务。毛主席曾经严肃地告诫全党，如果我们不能以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速度发展我们的经济，我们就有被从地球上开除球籍的危险，而“四人帮”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其结果，必然是使我们的国家陷人贫穷落后愚昧黑暗的地步。

“四人帮”把革命、专政喊得震天价响。可是，革命是为了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什么？“四人帮”说，专政就是目的，专政就是一切。难道是这样吗？毛主席说得很清楚，革命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这个锐利武器，把“四人帮”假革命、反革命的真相揭露出来。

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因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六六四页）毛主席也曾指出，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跃进。而且，马克思还说过，“**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第三分册第三五O页)。“四人帮”拚命反对《汇报提纲》中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述，把它说成是“唯生产力论”，甚至疯狂叫嚣这是“从修正主义的武器库里拾起破刀烂枪，气势汹汹地朝革命人民杀来”。这不是活现出一副叛徒加流氓的嘴脸吗？

发展科学技术，从而促进生产的高速发展，还被“四人帮”斥为“科学救国论”。什么叫“科学救国论”？我们都知道，在旧中国，如果不首先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空谈“科学救国”，那是一种实际上维护反动统治的骗人口号。但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要振兴工农业，发展科学技术，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同“科学救国论”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如果按照“四人帮”的那套搞下去，把专业科技机构都取消，把实验室和中间试验厂都拆散，把科技人员都撵走，对科学技术实行专政，连知识也要“统统忘掉”，否则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那么，只有任何科学也不研究，什么知识也没有，回到穴居野处的时代，再从人回到猿，才合乎他们的“理想”。正如恩格斯揭露的蒲鲁东分子所主张的那样：即使“我们会丧失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生产能力，整个人类会陷于极可怕的劳动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那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不正是“四人帮”想给人民安排的“命运”、想使国家走的“前途”吗！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我们打倒了“四人帮”，驱散阴霾，消融冰雪，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对革命干部和革命事物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彻底推倒。在巍然挺立的青松面前，几个撼树的蚍蜉已经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去吧，虫豸们！

(原载 1977 年 6 月 30 日《人民日报》)

以华总理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到达地震灾区转达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一九七六年八月四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派出的以华国锋总理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已经到达七月二十八日强烈地震受灾地区，亲切慰问受灾群众，转达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的极大关怀，鼓舞灾区人民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革命精神。

中央慰问团总团副团长是陈永贵、乌兰夫、郭玉峰、范子瑜、张才千、黄玉昆、张宗逊、杨俊生、解学恭、许诚、刘子厚、马辉同志。总团下设唐山分团、天津分团、北京分团。

华国锋总理到达重灾区唐山以后，立即到开滦煤矿、唐山钢铁公司等厂矿慰问受灾群众。慰问团的三个分团七月三十日分别到达唐山、天津、北京等地的受灾地区后，迅速到工厂、矿山、农村、部队、机关、学校和医院看望受灾群众，向群众宣读中共中央的慰问电，转达毛主席，党中央对受灾地区人民的极大关怀和亲切慰问，鼓励灾区广大群众和干部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团结互助，艰苦奋斗，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投入抗震救灾斗争。

灾区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党中央派亲人来慰问他们十分感动。华国锋总理和慰问团成员每到一地，群众纷纷拥向前去，同他们热情握手。许多受灾群众含着热泪高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感谢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他们说："在我们受灾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党中央派解放军和医疗队来抢救我们，送大批物资来支援我们，现在又派慰问团来看望我们，真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毛主席的恩情深！"他们表示，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支援，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推动下，以阶级斗争为纲，奋发图强，团结战斗，自力更生，为早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新华社1976年8月4日讯，载8月5日《人民日报》）

〔附〕 "四人帮"破坏抗震救灾十恶不赦（节录）

——唐山、丰南地震灾区人民怒斥王张江姚反党集团阴谋篡党夺权，不顾人民死活的滔天罪行

今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丰南一带遭受严重的地震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其严重的损失。毛主席、党中央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地震当天，党中央就给灾区人民发来慰问

电、派出大批中国人民解放军，日夜兼程，奔赴唐山，抢救人民的生命财产。接着，以华国锋同志为总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亲自深入灾区，热情慰问受灾的人民群众。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派出大批医疗队、工作队，运出大批救灾物资，支援灾区人民的抗灾斗争。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鼓舞下，唐山、丰南地震灾区人民掀起了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可是，正是在唐山人民遭受这样严重灾害的时刻，在许多人失去了亲人的悲痛时刻，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病中还关心着灾区人民的时刻，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密谋策划篡党夺权。他们不顾灾区人民的死活，不仅不去唐山灾区，连唐山灾情汇报也不听。华国锋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当时日夜工作，采取各种有力措施，防震抗震，支援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四人帮"却在背后百般刁难，横加指责，吹冷风，放暗箭，肆意诬蔑党中央抓抗震救灾是"不抓阶级斗争"，"还是白猫黑猫那一套"，恶毒攻击这是"少数人拿抗震救灾压革命"、"压批邓"，别有用心地叫嚷什么"不管东震西震，不能冲淡批邓！"反革命的吹鼓手姚文元，对严重的震灾幸灾乐祸，抄录出太平天国时候的一首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一统江山图已到，胞们宽心任逍遥"，借题发挥、发出变天复辟的嚎叫，并下令别人写进一篇文章里，大造反革命舆论。地震发生后，开滦煤矿由于断电，许多矿井地下水迅速上升，人们要抓紧排水恢复生产，他们竟胡说这是搞"唯生产力论"，把许多干部提出的迅速排水的主张统统斥之为"走资派的论调"。全国人民怀着无限的阶级深情关怀唐山人民，大批救灾物资从祖国四面八方运往唐山，"四人帮"却不顾人民的死活，随意占用支援灾区的运输车辆，并且在火车上大吃大喝，寻欢作乐，还随意喝令火车开动和停站，打乱铁路调度，妨碍救灾物资的运输。特别使人不能容忍的是，"四人帮"竟然丧心病狂地叫嚷："整个唐山才一百万人口，全国有八亿人口，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明目张胆地同唐山灾区人民为敌，同全国八亿人民为敌。听到这些恶狼般的狂吠，唐山、丰南地区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一片怒吼，人们的肺都要气炸了。他们个个怒气冲天，万分愤慨地说，"四人帮"反党集团是一群披着羊皮的豺狼，是一些化装成美女的毒蛇，是"害人帮"、"狠心帮"，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一定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和这群反革命黑帮斗争到底！

在批判会、声讨会上，唐山、丰南人民回想起地震发生以后毛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的情景，对照"四人帮"的反动言行，无不心潮翻滚，热血沸腾。丰南县胥各庄镇共产党员李艳霞在批判会上，捧着华主席和她亲切握手的照片，激动地说，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华主席和我们亲又亲。毛主席在病中还惦念着我们灾区人民。华主席在地震发生后，冒着盛夏酷暑，亲临灾区慰问。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也都满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相继到唐山慰问。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这场斗争不仅毫不关心，相反还恶狠狠地说："抹掉个唐山算得了什么"，真是恶毒到了极点。在这场斗争中，对我们灾区人民的抗震斗争，谁关怀，谁支援、谁干扰，谁破坏，我们最清楚。地震发生后，帝修反曾经幸灾乐祸地说，唐山从地球上消失了。"四人帮"和帝修反唱的完全是一个调子。剥开他们的画皮，就可以看出他们是一些披着革命外衣的反革命。开滦唐山矿干部曹国成激动地说，地震发生的当天上午，唐山矿的李玉林、崔志良和他一起开车到北京向党中央汇报，中央负责同志一见面，就把他们紧紧抱住，急切地问："唐山人民怎么样？开滦的井下工人怎么样？你们是从灾区来的，最有发言权，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向中央领导同志说，急需解放军的支援。党中央领导同志就立即拿起电话，调派解放军，很快，亲人解放军就来到了唐山，投入了抢险救灾的战斗。曹国成说：只有无产阶级领导人才和我们这样亲。而"四人帮"满嘴唱高调，却一点也不

关心我们唐山人民，他们是一群藏着黑心肝的豺狼，是我们劳动人民的死对头。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不择手段地煽动群众，蛊惑人心，打击、陷害革命干部。王洪文专搞栽赃诬陷，公然诬蔑河北省委的领导同志是"破坏抗震救灾的罪魁祸首"；江青则诬蔑中央和河北省、唐山市的负责同志领导抗震救灾是"走资派惊慌失措"。灾区人民在声讨会、批判会上，对于"四人帮"的这种险恶用心和鬼蜮伎俩，一一痛加驳斥。唐山市的干部气愤地说，地震发生的当天上午，已经六十多岁的河北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就乘飞机赶到唐山，同部队的领导干部一起，日夜工作，和灾区人民同甘共苦，指挥抗震救灾，两个多月一直坚持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省委和部队的领导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华主席的指示，按照党中央的部署，把工作做到了灾区人民的心坎上，大家心里热呼呼的，感到有了方向，有了信心，有了劲头。人们异口同声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想到了，真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共产党好。就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四人帮"却给加上"破坏抗震救灾"罪名，扣上"罪魁祸首"的帽子。他们的用心和手段真是比蛇蝎还毒，比虎狼还狠。丰南县委副书记苗旺河在批判会上说："四人帮"迫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后来又攻击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诬陷河北省委的领导同志，他们就是企图打倒一大批在中央和地方工作的领导干部，以便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复辟资本主义。这个反党集团的吹鼓手姚文元，把发生地震、人民遭灾，看作是篡权的时机已到，手舞足蹈，欣喜若狂，采用借古喻今的手法，暗示"四人帮"的"新天朝"快要建立，"一统天下"就是要到手，这真是痴心妄想，白日作梦。搞阴谋诡计的人，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新华社记者

(原载 1976 年 11 月 12 日《解放军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

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尖锐复杂的斗争，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使我们党在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经过曲折的道路，发展成为今天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创造性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创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他领导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用人民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乘胜前进，夺取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胜利。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实践，提出了一系列科学论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给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毅力，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病中继续领导了全党全军和全国的工作，一直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中国人民、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他赢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衷心的热爱和无限的崇敬。

毛泽东主席的逝世，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他的逝世，定将在我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心

中，引起极大的悲痛。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要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按照培养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坚决执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批邓，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继续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加强军队建设，加强民兵建设，加强战备，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歼灭一切敢于入侵之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我们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我党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把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新华社北京1976年9月9日电）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公告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现决定：

（一）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七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机关和北京市等各方面的负责人、工农兵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群众代表参加吊唁，瞻仰遗容。

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的人员，可在本单位举行吊唁。

（二）九月十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三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转播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的实况，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一切基层单位，都要组织群众收听、收看，进行追悼。

全国县以上地区，要在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召开有工农兵以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先收听北京追悼大会的实况，然后由本地区党政军主要负责人致悼词。

（三）从九月九日至九月十八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

（四）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的以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志哀三分钟。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正，有汽笛的地方和单位，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笛三分钟志哀。

（五）对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要求来华吊唁，我驻外使领馆应表示深切的感谢，并转达我党中央和我国政府关于不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的决定。

特此公告。

（新华社北京 1976 年 9 月 9 日电）

毛泽东主席治丧委员会名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口）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　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宋庆龄（女）　郭沫若　徐向前　聂荣臻　陈　云　谭震林　李井泉　张鼎丞
蔡　畅（女）　乌兰夫　阿沛·阿旺晋美　周建人　许德珩　胡厥文　李素文（女）
姚连蔚　王　震　余秋里　谷　牧　孙　健　粟　裕　沈雁冰　帕巴拉·格列朗杰
江　华　丁　盛　丁可则　丁国钰　马　宁　马天水　于　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　诤
王必成　王宏坤　王秀珍（女）　王国藩　王首道　王淑珍（女）　王淮湘　王超柱
天　宝　巴　桑（女）　方　毅　邓颖超（女）　尤太忠　孔石泉　孔照年　冯　铉

司马义·艾买提　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刘　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女）　刘锡昌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吕玉兰（女）
安平生　庄则栋　华林森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邢燕子（女）　陈　康　陈士榘
陈先瑞　陈奇涵　陈慕华（女）　杜　平　李　达　李　强　李水清　李任之　李志民
李顺达　李葆华　李瑞山　杨　勇　杨春甫　杨得志　吴　涛　吴大胜　苏　静　张才千
张平化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延成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维民　张富贵
张福恒　张翼翔　肖劲光　岑国荣　宋佩璋　周宏宝　周丽琴（女）　周纯麟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林丽韫（女）　罗青长　罗锡康　冼恒汉　金祖敏　饶兴礼
段君毅　祝家耀　赵紫阳　耿　飚　耿起昌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郭玉峰　郭宏杰
徐景贤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笳　姬鹏飞　黄　华　黄　镇
尉凤英（女）　鹿田计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崔海龙　梁锦棠　韩　英　韩先楚
董明会　傅传作　焦林义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女）　鲁瑞林
解学恭　蔡　啸　蔡协斌　蔡树梅（女）　谭启龙　廖承志　潘世告　樊德玲　魏秉奎
卜谷香　七林旺丹　马　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女）　邓　华　王　体　王　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女）　王景升　王德山　文香兰（女）
叶　飞　央　宗（女）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江渭清　吕　和　吕存姐（女）　任　荣　达　洛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肖　克　吴　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　贵　杨大易　杨坡兰（女）　杨俊生　杨富珍（女）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佳忠　陈佩珍（女）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友　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汪湘君（女）　佘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罗春娣（女）　胡　炜　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　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依林
徐　驰　唐　亮　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铁　瑛　贾那布尔　钱学森
高淑兰（女）　诸惠芬（女）　郭耀卿　康　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女）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女）　彭　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女）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女）　廖志高　裴周玉　黎　原
樊孝菊（女）　薛金莲（女）　张耀词　毛远新　李　敏（女）　李　讷（女）
刘友法　武葆华　鲁　瑛　许建生　莫　艾　解力夫　邓　岗　李　鑫　施义之　沙　风
陈绍昆　周子健　李际泰　李成芳　边　疆　汪　洋　肖　寒　康世恩　郭　鲁　钟夫翔
张劲夫　范子瑜　陈国栋　吴庆彤　迟　群　杨成武　梁必业　张廷发　向守志　黄新廷
谭善和　吴克华　杨荣国　刘大杰　朱永嘉　冯天瑜　冯友兰　周一良　魏建功　夏霞霞
黄　昆　龚饿道　浩　亮　刘庆棠　浩　然　王桂珍（女）　陶寿祺　董加耕　柳忠阳
朱蕴山　史　良（女）　胡愈之　沙千里　季　方　黄鼎臣　周培源　田富达　刘　斐
董其武　陶峙岳　杜聿明　宋希濂　黄　维

（新华社北京1976年9月9日电）

张铁生、刘继业的反动言论[1]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至十四日)

(一) 张铁生、刘继业同志谈情况记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晚十一时三十分)

九月九日晚张铁生、刘继业同志专程从铁岭赶到沈阳，要求向团省委领导同志汇报情况，先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十一点三十分到团省委机关，德民同志接待了他们。现将谈话记录整理如下：

张铁生：

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全国人民都很悲痛，但是，光哭没有用，关键在于化悲痛为力量。从我个人的思想来说，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内心无比悲痛，但也确实担心。因为，我现在思想上想的是，目前，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政治局势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也可以说是一个严重时期。以前，毛主席健在，我们大树底下好乘凉，背靠大树，有靠头，以后靠谁呢？当然也可以说有靠头，有党中央的领导，有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这些人的脑袋都是生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要靠，就得靠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自从四届人大开过以来，我的想法一直很多。我认为四届人大开得很不好、开得很不成功，走了两个极端，强调代表性，却让一些走资派进了人大常委会。我是以工农兵的代表身份进人大常委会的，还是一个常委委员，却是和一些走资派进常委会的，和他们坐一起。我认为这样做，说明路线上各派政治力量作了让步，没有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当时，我感到这样做，气候不对。还有朱老怎死了，一没有拍电影，也没有拍电视，事情发生突然，事后不了了之，叫人不好理解。

去年七、八、九月时，就感到鼓吹奇谈怪论的不仅是邓小平，还有一些同志，有的还叫得挺凶。现在，我们的国家好象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的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着担心就在这里。我虽然是人大常委会委员，但没有起到作用，心里话不能到人大常委会上去讲，一直没有讲出来。现在邓纳吉是不是有人在支持它，邓纳吉会不会再上台？我认为这个人思想是右的，执行路线是保守的，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有真正认识，没有真正理解，对儒法斗争也有过研究，但发表的意见，观点是反动的。去年养猪会，他有个讲话，后来发了 20 号文件，他的讲话，其中许多话充满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今年，两个决议发表后，我以人大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一些意见，给华总理提了许多问题，但都没有最后答案。

远新政委长期以来，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真叫人不好理解。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我给党中央和人大写过信，没想到主席会去世这

---

[1] 下面三件材料，是张铁生、刘继业谈话的记录原件。

么早。他在计委会上的讲话，与洪文的讲话就不一样，不能说绝然不同，但起码是有差距。他在讲话中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深入批邓，不讲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不讲文化大革命，讲话是超阶级的观点。

总之一句话，目前，我对国家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很担心，尤其是对军队充满了担心。

当然，我们也相信，现在在毛主席身边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在精神上足以战胜保守势力，但是，今天在组织上没有保证。现在，一些问题发展苗头不对，如国家机关，就不是按巴黎公社精神去建立的，而是把党的一元化领导绝对化，神秘化，迷信化了。幸亏毛主席提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不然，有人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作借口，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对党的迷信。现在可以说，没有真正的民主，国家机关不是按巴黎公社原则去建设，搞什么任命制，党委可以代替一切，革委会可以名存实亡，这些东西，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相违背的，是反动的。我们今天要的是巴黎公社精神，要真正的民主，在锦州的大会上，我也讲过类似的话。

现在，说实在话，对许多问题，我充满着不信任，担心。今天听治丧委员会名单，最后才听到有远新政委的名字，才感到有某种安慰，算是幸运吧。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也许是我们坐井观天，有片面性。但我们认为担心是有根据的，态度是积极的，是认真的，是严肃的。我是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准备的，一定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省委的领导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浪，迎接党内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一定要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下去。

今天晚上，我们这么远来了，是想向团省委领导建议，把吴献忠、柴春泽等同志召集到一起，畅谈一下，在这个关键时刻，让我们这些人能在一起学习一下，交流一下思想，从而保持清醒的头脑。

刘继业：

担心和有信心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很同意今年八月初辽报发表省理论讨论会的情况时讲的"阶级斗争的反复性是不可避免的"的观点，说明，邓纳吉还可能上台。这一点，必须提醒全党和全国人民注意。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告全国人民书》的发表，在全国人民中必将产生很大震动。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青年战线，一定受震动更大。在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需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帅我们的思想。因此，我们建议团省委把青年战线的典型请上来，希望团省委给帮个忙，让我们这些人有条件在一起学习学习，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目的，是让我们的思想尽快适应这一重大变革。

张铁生：

最近我收到不少南方战友的来信，反映一类老爷、二类老爷、三类老爷没有被揭露，不少革命造反派同样在受压，受打击。以前，有的材料讲到福建、山西的情况，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山西把三、四号文件，也就是华的那个讲话，当作喜讯来传达，为什么抓一、二号文件的传达没有那么大的劲头，这是偶然的吗？我认为，这是呼应，是思想上合拍。

这些问题，我不想和更多的人讲，只对他（指刘继业同志）说了一些，以免引起人们的思想混乱。不过，一旦召开人大，在会上我是要讲的，我要当面提问题，要他当面回答。也

许有人要把"唯恐天下不乱"的大帽子给我扣上，但有党和人民的支持，有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我们什么也不怕，相信我们的事业是一定会胜利的。

我真担心，这样一个思想路线是右的，满脑子旧的东西，大搞唯生产力论的人，是不是在政治局也有一些他这样的人在支持拥护他。用毛主席提名来堵人们的嘴，何况当时主席是在生病期间呢？

（二）张铁生、刘继业同志同省知青办领导同志的谈话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

张铁生：

对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非常悲痛。我们要求把我省的知识青年典型尽快召集到一起，统一思想，统一意志。请献忠、春泽同志都来，有好处。

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后，有个感觉，主席不在了，靠谁？原则上讲，靠主席的路线，靠毛泽东思想，但也要组织路线的保证。这就是班子路线、班子建设问题。我们省委是信得过的。几年来，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践证明，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司令部。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上，步子是比较大的。虽然保守势力也是大的，但优势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无产阶级革命派。建议省委保持独立见解，象去年七、八、九三个月，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自己的见解，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我对主席不在的中央不放心。一年多感觉挺大。一般场合下不能讲。昨天同刘继业谈，应往最坏处着想，头脑中不应有绝对的概念。

人民委托我参加四届人大，会议开得很草率，很紧张，宣传搞得也很差一些。去年七、八、九出现那么多问题。中央两项决议发表后，大家都坚决拥护，我自己对新任总理说了一些话，是不放心的。这个人思想路线是右的，是糊涂的。对去年七、八、九月的言论不知是否认了帐，是否同邓划清界限？我看是没划清，感情是对路的。

最早，是在研究儒法斗争史时，他同中央、江青同志唱了反调。

去年，传达 20 号文件，关于养猪问题时，传达了他的讲话、他对文化大革命没感情，从满腹牢骚看，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促进派，是偏右的。

最近，在传达中央 13 号文件时，传达了他在全国计划会上的讲话，他的许多话不象党中央讲的话。没突出党的基本路线，没突出批邓。有一些超阶级的观点。他同王洪文同志的插话不一样。洪文同志强调同党内资产阶级斗。华的讲话对右的人是个鼓舞。有的省有人来信说，他们全省传达，而不是内部传达，反响很大，二老爷很猖狂。他可是国家的一把手了。

有话就讲，我可是坐不住了。想听听领导的意见。我对省委是从内心到外拥护的，愿跟省委干一辈子革命。希望同省委、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谈谈。我不能和别人讲，把自己担心的事情想和领导谈谈。自己无所顾虑，心怀坦白。没有顾虑、隐瞒自己的观点。

主席逝世有可能成为转折，但愿不能这样。这是一个严重时期。主席在世时，右倾翻案风还很猖狂，无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在政治、理论上占了上风，但在数量上还是被汪洋大海所包围。外省、北京都有不少大老爷。主席病逝后，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哭是没有用的，只能表达对毛主席的感情。化悲痛为力量，不只是一句口号，要把眼泪变成同走资派斗争的炮弹。要冷静地考虑一些问题。大哭是不对的。现在，冷静地考虑问题的不是大多数。理智

地考虑问题，用主席思想、指示指导行动的不是很多。这是好人，但是糊涂人，走资派不害怕。走资派最害怕的是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应把眼睛瞪大一点。

因而，想请青年们谈谈、统一思想，在省委领导下统一行动。

请将我们的意见转告省委领导同志，转告远新同志。

刘继业:

现在，担心大于悲痛。最好的悼念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不是杞子忧天倾。远新同志曾讲，邓纳吉有可能重新上台。这种担心总比麻木不仁好得多。

(三) 张铁生同志最近的一次谈话[①]

九月十四日，我们请张铁生同志谈谈毛主席逝世后的思想情况。现把他的谈话整理如下: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是建党建军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损失。我心里万分悲痛。主席讲过，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道理是这样，但从感情上过不去。

党中央号召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这决不是一句名词、概念。现在看，光悲痛是不行的，要做好思想准备，把问题想得严重一些，要比光悲伤强的多。

毛主席逝世前发表的重要指示和批示，都是遗言和忠告。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毛主席告诫我们全党要懂得路线斗争更加复杂激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的战部署，现在更使人容易理解了。这也是主席没有做完的事业，是主席的遗嘱。

资产阶级就在党内，邓小平还留在党内，邓小平还有非常大的社会基础，邓还是想纠集力量重新上台、乘机反扑的。他的社会基础尤其在国家机关"大老爷"、"二老爷"那里、有好多掌权的人、说了算的人，还是听他的话的。可怕的是咱们忘记毛主席的遗嘱，丢掉阶级斗争和党的基本路线。也可能邓小平错误的估计形势，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在一个时候冒出来重新上台，这是很有可能的。主席不在，但是主席思想是永存的，四卷宝书永放光芒。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现在不是五十年代的情况，也不是当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人民的情况，中国人民知道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有高度的觉悟，有革命理论的指导，所以走资派要重新上台又没那么容易和便宜。如果他们敢于冒险，很可能当即死亡，最多是个短命鬼（短命可能是几年或几十年)。复辟上台绝对不行，这是需要和邓纳吉讲清楚的。人民会相信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他们的。走资派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最害怕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的人，八亿人民掌握了毛泽东思想，这种精神力量就会变成革命力量和物质力量，如果他们反扑，那只能是鸡蛋碰石头!

主席逝世后，要把问题想得复杂一些、困难一些、艰巨一些，做好一切准备，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颠覆活动和突然袭击。当前特别要注意国内的问题，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所谓国内的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成果能不能保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能不能深人的问题。主席叫我们抓党的基本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到底，主席没有叫咱们哭，咱们

---

① 这篇谈话刊登在1976年9月22日，辽宁日报社调查研究部编的《记者汇报》上。

要冷静。

特别要警惕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表演。如果天安门再出现反革命事件，那将可能是全国性的复辟。我看主席逝世后光流眼泪而不去想这些问题的人，只能说是有朴素的阶级感情，没有路线觉悟。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党中央有没有，特别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主席把话说到家了。下边出了修正主义成不了气候，大老爷出修正主义影响全国。告人民书中一再强调要维护党的团结，服从党中央的领导。自己的理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正确领导。

对咱们这个党要坚持一分为二，对党中央、省委、国家都是这样。很可能将来有人强调一元化，借主席的威信，把自己装扮成党，自己就是党。如果你不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你只能是个两腿支着肚子的人，是修正主义的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最高原则。

在主席思想的哺育下，学会了辩证法，学会了阶级分析。我认为，主席逝世后，过极悲伤意义不大，应当把眼睛擦得更亮，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特别要注意邓的复辟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是化悲痛为力量，继承主席的遗志。有些人流完泪不想问题，该吃的吃，该喝的喝，照样打扑克下象棋，这是糊涂人，是路线觉悟不高的人。从学校看修正主义确有基础，对新生事物冷淡，使新生事物受压，老师就怕表扬，一表扬就孤立。这部分人主席掌权时说好，将来如果修正主义路线掌权、散布福利主义时，也就容易站过去。有很多人有不满情绪不说，克己到了修正主义上台时，屁股就难免坐到人家那边去。接触一个解放军学员，歪戴着帽，我说别这样，他说，你看，谁管？象去年哪!

过去，一直是主席为我们撑腰，靠这棵大树。主席逝世了，还去靠谁？当然不是说没有靠头，靠主席路线。毛主席革命路线是永存的、靠得住的。

总结一下自己从无知的孩子变成革命的青年、党员，时时刻刻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哺育，都是毛主席教导的结果。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上山下乡，扎根农村，当一个胸怀天下大事的最普通的农民，当一个能够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坚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作好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作好打仗的准备，牺牲的准备，把革命进行到底。

（孔　繁　文）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的逝世，对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八亿神州，无限悲痛。五洲四海，深切哀悼。我们沉痛的心情，是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最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经过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我们的党有今天，我们的国家有今天，我们的人民有今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毛主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永世长存的。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我们党制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党内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战胜了国内外凶恶的敌人，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迈开了巨人的步伐，贫困落后的、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了朝气蓬勃、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同全世界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革命人民一道，开展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毛主席深刻分析了当代世界形势，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为我国制定了革命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加强了我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战斗团结，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是毛主席，在同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敌人的长期斗争中，总结了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贡献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特别是贡献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解决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课题。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在沉痛哀悼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牢牢记住这个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坚定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同党内走资派作斗争。当前，要把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继续深入地开展下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只要我们按毛主席路线办，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生前谆谆教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一定要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文献，是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只有学好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才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更好

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亿万人民群众所掌握，是反修防修的根本保证，是夺取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是具有丰富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要按照毛主席的建党学说，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发扬毛主席倡导的党的优良作风。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批邓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我们有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毛主席亲自创建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英雄人民。我们决不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长期教导，一定能够战胜任何困难，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我们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着必胜的信念。**“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首都百万群众怀着极其沉痛和无限崇敬的心情隆重举行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节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无限崇敬的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的心中引起了无限的悲痛。今天，首都百万人民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实况同时转播全国。在辽阔的国土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举国上下，八亿人民沉痛悼念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国家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我国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

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连，他给我们国家带来了光明，给各族人民带来了幸福，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站立起来。毛主席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在这悲痛的时刻，八亿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誓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首都人民举行规模空前的追悼大会，表达了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衷心的爱戴，无限的信赖，无比的崇敬。党和国家领导人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江青、姚文元、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

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参加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军委负责人粟裕，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参加了追悼大会。

天安门广场庄严肃穆。横贯天安门城楼的黑底白字的横幅上写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七米高的巨幅遗像，竖立在城楼红墙中央。人民解放军战士持枪肃立，守护在遗像两旁。在城楼的前面，新筑起了追悼大会的红色高台，上面排列着翠绿的松柏和淡黄的秋菊，陈放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的花圈。江青同志敬献的新花圈放置在毛主席的遗像前，花圈由栩栩如生的葵花，嫩绿的玉米，金黄的麦穗、稻穗和谷穗，以及果实累累的白色文冠果花组成。城楼下东西两侧的红台上，长青的花木从中陈放着党政军各部门和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敬献的花圈。在广场南端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矗立着巨幅黑色挽幛，它以强有力的语句号召人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天安门广场中央、下半旗志哀。英雄的首都人民，党政军机关干部和群众，从厂矿、企业、商店、郊区人民公社，部队营房、机关、学校和街道，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秩序井然地肃立在整个广场和东西十里长街上。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是新中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永远站起来了的历史见证。二十七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里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二十多年来，毛主席在这里检阅过我们千百万英雄的人民和英雄的军队；举行过庆祝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辉煌胜利的盛大庆典；召开过支持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的大规模群众集会。在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戴红袖章，亲自检阅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小将，发动和领导全国人民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今年四月，在这里粉碎了以邓小平为罪魁祸首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在全国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高潮。这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是纪录全国解放后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地方。毛主席的丰功伟绩，与日月同光辉。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了我们，百万人民在广场上极其沉痛地哀悼，寄托哀思。

下午三时整，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同志宣布追悼大会开始。全场肃立，百万人默哀三分钟。由五百人组成的军乐团奏起悲壮的哀乐。大会实况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送到千家万户。悲壮的哀乐声传到祖国城乡，传到高山大川，传到辽阔的边疆，传到全国每一个角落。伟大祖国在静默，八亿人民含着眼泪，肃立志哀。

与此同时，在祖国的工厂矿山，在行进的列车上，在江河海洋的货轮和军舰上，汽笛长鸣，声震长空，响彻寰宇。

与此同时，在炼钢炉前，发电机旁，手术台上，以及一切不能中断工作的战斗岗位上，人们用滚滚的泪水的汗水，用辛勤劳动的成果，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八亿神州在悲痛，举国上下在哀悼。全国人民无限怀念毛主席。我们党有今天，国家有今天，人民有今天，都是毛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从苦难中走过来的人们，在红旗下长大的新一代，他们的一切胜利、成就和幸福，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希望和力量，他们对共产主义未来的无限追求和向往，都同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名字联系在一起，都是来自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千秋万代，永世长存，在人类历史上永远放射着灿烂的光辉。

八亿人民默哀毕，天安门广场上军乐团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雄壮的歌声激励和鼓舞人们去战斗。毛主席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永远活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永远照耀着我国亿万人

民前进的道路。

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华国锋同志致悼词以后，参加追悼大会的百万群众和全国八亿人民向伟大领袖毛主席遗像三鞠躬。

接着，天安门广场上响起了气势磅礴的《东方红》乐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高昂激越的伟大颂歌，激动着亿万人民的心，激发了人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思念。毛主席永远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颂歌在北京上空回响，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土地的上空回响。我国亿万人民将世世代代永远高唱这支颂歌，永远心向毛主席。人们决心牢记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向前。

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献花圈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有：华国锋、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宋庆龄、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也敬献了花圈。

敬献花圈的还有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各部门，国家机关各部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北京卫戍区，工、青、妇组织，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台湾省爱国同胞。毛主席曾经从事过伟大革命活动的地区和单位，以及大庆油田和大寨大队，也敬献了花圈。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

治丧委员会委员（包括在北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丁国钰、马宁、于桑、于会泳、王诤、王宏坤、方毅、邓颖超、孔照年、冯铉、田维新、刘伟、刘湘屏、刘锡昌、庄则栋、乔冠华、陈康、陈士榘、陈先瑞、陈慕华、李达、李强、苏静、张才千、张达志、张池明、张宗逊、张维民、张翼翔、肖劲光、周宏宝、林丽韫、罗青长、金祖敏、祝家耀、耿飚、钱之光、钱正英、郭玉峰、秦基伟、陶鲁笳、姬鹏飞、尉凤英、曹里怀、曹轶欧、韩先楚、傅传作、彭绍辉、谢静宜、蔡啸、蔡树梅、谭启龙、廖承志、马明、马小六、王六生、王景升、叶飞、央宗、石少华、刘西尧、刘振华、向仲华、朱光亚、肖克、吴忠、杨贵、杨坡兰、杨俊生、杨富珍、张令彬、张世忠、张国权、张积慧、宋时轮、胡炜、姚依林、唐亮、唐闻生、钱学森、高淑兰、诸惠芬、康林、黄文明、黄作珍、崔修范、谢振华、裴周玉、张耀词、毛远新、李敏、刘友法、武葆华、鲁瑛、许健生、莫艾、解力夫、邓岗、李鑫、施义之、沙风、陈绍昆、周子健、李际泰、李成芳、边疆、汪洋、肖寒、康世恩、郭鲁、钟夫翔、张劲夫、范子瑜、陈国栋、方强、吴庆彤、迟群、杨成武、梁必业、张廷发、向守志、黄新廷、谭善和、吴克华、杨荣国、刘大杰、朱永嘉、冯天瑜、冯友兰、周一良、魏建功、夏震寰、黄昆、龚畿道、浩亮、刘庆棠、浩然、王桂珍、陶寿淇、董加耕、柳忠阳、朱蕴山、史良、胡愈之、沙千里、季方、黄鼎臣、周培源、田富达、刘斐、董其武、陶峙岳、杜聿明、宋希濂、黄维；

在北京的人大常委会委员马成杰、马纯古、王观澜、王冶秋、王淦昌、王道义、邓初民、区棠亮、贝时璋、白寿彝、吕正操、刘大年、伍修权、华罗庚、庄希泉、严济慈、杨东纯、杨佩莲、吴有训、吴冷西、吴德峰、陈玉娘、陈此生、陈逸松、李延禄、李聚奎、张文裕、武新宇、茅以升、林巧稚、罗叔章、赵忠尧、赵俊祯、荣毅仁、胡子昂、胡绳、侯隽、殷诚忠、郭映福、康克清、梁吉泉、傅玉芳、傅秋涛、童第周、曾生、曾志；

在北京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于树德、王子纲、王芸生、王学文、王雪莹、王维纲、王照华、孙起孟、孙晓村、苏子衡、李国伟、李淑英、杨奇清、何长工、张子意、张孝骞、陈维稷、林修德、金如柏、周士观、周士第、屈武、闻家驷、赵朴初、赵宗燠、俞大绂、钟惠澜、贺诚、郭化若、唐天际、袁任远、徐伯昕、徐楚波、章蕴、萨空了、曹菊如、程坦、楚图南、谭冠三；

工人、农民、人民解放军指战员、赤脚医生、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红卫兵、红小兵的代表，以及科技、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界和服务行业的代表周占鳌、白树茂、徐克仿、王治国、张国泰、姚晓光、齐太旺、王凤卿、马义民、铁丽艳、邓汝芝、韩荣仙、李陆荣、朱吉瑞、季荣一、陈景泰、王国珍、李淑琴、莫荣相、张庙金、傅焕芝、陈福汉、任成水、李春田、黄卫东、陈启念、周秀良、孟庆和、张凤信、王学礼、刘祥、曾淑芬、李宝志，万其祥、张瑞祥、孙永全、刘长文、丁建基、任恒太、吕跃全、田阿桐、张秉贵、尹巨民、史兴洲、靳树芝、武旭昶、杜宝荣、张锡田、关爱萍、史京生、马士华、高家麟、王录、楚守华、范喜春、张希孔、李腊和、陈淑芳、阎连重、李书元、栗美霞、郭凤莲、陈永祥、杨希顺、谢劲红、张韫璞、贾凤英、史萃、郭福全、刁荣芬、王俊娥、郑银堂、白建军、单良玉、崔砚田、朱宗义、张连泽、张民秀、张凤英、朱伞、马广林、绳富、王成逵、石明、殷维臣、李德荣、陈富长、王德修、邢春华、吴春山、韩兴连、屈友、张志君、戴大喜、杨象春、刘晋华、张桥松、刘铁成、马俊英、牛乾一、刘松、齐朋珍、吕昭义、王秀清、胡卫东、刘振成、侯亚平、殷保顺、张丽娟、张汝水、曹建成、陈长江、白静媛、李许友、牛小林、张玉成、费继国、郑久长、吴开新、叶生元、熊兴明、杨立如、贾法贞、李仁军、康华清、刘宗仁、赵全有、陈柱深、张国安、王春兰、黄帅、李世荣、张红、连跃、曹庆红、李进、赵定航、林红、赵忆宁、郑小松、杨亚平、马静、杨永红、张庆兰、李克森、李东洲、石建辉、许苹、刘波、乔宝印、岳彤、赵春华、史明、陈芳允、聂淑琴、陈信、黄尚智、阎敦实、翟光明、蒋荣福、孙殿卿、张国民、曹咏清、李守全、施汝为、谷德振、艾国祥、顾滨源、张锋、左秋仙、林政炯、袁世海、刘长瑜、杨春霞、洪雪飞、薛菁华、张肃、李德伦、李文化、李秀明、袁水柏、张永枚、梁厚民、朱怀旭、王心刚、马玉涛、马季、童诗白、王连龙、王强、李云贵、斯岱、安玉爱、王其文、宋金兰、吴阶平、林钧才、赵锡武、赵炳南、杨润平、顾复生、潘多、董守义、郗恩庭、张立华、刘亚军、林榆廷、李亚敏、黎光煜、李华、王茂华、朱元胜、任照、白以骥、孙秉友、王东发、杨牧之、乌布利、吴钟璜、赵固培、赵国良、陈财、韩治郁、韩秀兰、陈炬、赵占玺、周继昌、吴昊、赵呈琴、任玉怜、王翠芝；

治丧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郑屏年、王迪康、赖奎、周启才、贾汀、宇光、朱礼泉、刘传新、武建华、邬吉成、李梦夫、刘剑、龙许、毛维忠、陈树林、黄树则；

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张玉凤、李连庆、吴旭君、王宇清、周福明、张正吉、朱德奎、吴连登、韩阿富、庞恩元、于存、竺雅琴、李志绥、周光裕、吴洁、陶桓乐、姜泗长、方圻、高日新、徐德隆、王新德、胡旭东、李春福、姜培芳、翟树职、朱水寿、

薛世文、潘屏南、俞雅菊、柳纯安、万儿云、唐丽亲、孙茜英、秦秀兰、吴庆年、刘文茹、赵世京、李培瑛、张玉萍、杨春英、冯树梅、孟锦云。

参加追悼会的还有赵纪彬、郑洞国。

追悼大会在下午三时半宣布结束。

全国各党政机关、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各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所有基层单位的广大党员和群众，普遍收听了首都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收听以后，全国县以上地区领导机关立即在本地区举行了有工农兵及其他各界代表参加的追悼会，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在会上致了悼词，沉痛悼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76 年 9 月 18 日讯，载 9 月 19 日《人民日报》）

在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致悼词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八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极其沉痛地悼念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

几天来，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都为毛泽东主席逝世感到无限的悲痛。伟大领袖毛主席毕生的事业，是同广大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长期受压迫受剥削的中国人民，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翻身作了主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衷心地爱戴毛主席，信赖毛主席，崇敬毛主席。国际无产阶级和进步人类，都为毛主席的逝世而深切哀悼。

毛泽东主席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英明领袖。

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党战胜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战胜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有三千多万党员的领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成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党，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育了我们的军队。毛主席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五十年来，毛主席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消灭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八百万蒋匪军，建国以后又胜利地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地反击了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国的武装挑衅，保卫了祖国的安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军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参加了“三支两军”，为人民立了新功。我军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野战军、地方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强大武装力量，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最根本的，就是毛主席为我军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军路线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武装力量面前，任何敢于入侵之敌，都必将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解决了在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确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转变等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我们党在这个历史时期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毛主席提出了我国武装夺取政权只能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而不能走别的道路。毛主席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共产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毛主席领导我们党依靠这三大法宝，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东方和世界的形势，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新的道路。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的历史时期，毛主席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毛主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毛主席一再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为我党制定了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作出了“**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毛主席代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继续革命的利益和愿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的复辟阴谋，批判了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他们篡夺的那一部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保证了我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在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断地战胜帝、修、反的颠覆和破坏，坚持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当代所作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贡献，同时为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新鲜经验。

毛泽东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毛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总结了国内国际革命斗争的经验，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泽东思想是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民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将永远照耀着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毛泽东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的光辉典范。毛主席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全部贡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给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象毛主席这样经历过种种革命风暴，战胜了种种艰难险阻，始终和工农劳动群众心连心，站在革命运动的前列，指导革命运动前进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上，是罕见的。毛主席在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上立下的丰功伟绩，是永存的。现在，毛主席与世长辞了。这对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对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国内，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深入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

在国际，我们一定要继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不称霸。我们要加强同国际无产阶级、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团结，加强同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的国家的团结，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我们要同全世界一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起，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共产主义，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

毛泽东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江青在清华大学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一日）

我们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七分成绩，三分缺点。三七开你们是不是都同意？文化大革命揪出了刘少奇、林彪、其实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邓小平也是自己跳出来的，四月四号他还参加了政治局会议。今年二月，他说洪文同志回来了，我就不干了，主席还是让他工作。天安门事件给他做了总结。主席是宽大为怀的。主席让我们选王明当中央委员，我们都不愿选他。主席做了很多工作，说当反面教员也要选。主席体格是非常好的，但刘少奇、林彪，特别是邓小平迫害主席。我在主席逝世后的第一次中央会上，就控诉了邓小平，要开除他的党籍，没有开除，要以观后效，还会有人要为他翻案。

主席非常英明，说文化大革命三七开，我是不属于有怨气的，是属于执行主席路线的，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嘛。我对三分不足，要有所认识，我这里只讲缺点，成绩让人家去讲，我这种态度，是否较好一点。

三分缺点你们也不清楚，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中央文革的。中央文革有坏人，自己端出来了。“怀疑一切”是陶铸的。他的一篇文章和一个文件，送给主席，我们签了名，不同意，签名的也有坏人。他说要层层烧透，高举红旗的人也要烧透，说是主席以下都可以怀疑，实质上是可以怀疑主席。

作为我是亲自参加领导文化革命的，更要注意总结经验，尽管不是我们干的，也要作为经验，你们也要好好总结。

王洪文在平谷县的讲话（节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打倒！别人搞修正主义我也打倒他，我搞修正主义，你们也来造反。最好是不出修正主义，但这只是个人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建国以来，中国就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不出是不可能的。今后还可能出什么唐小平、王小平之类，要警惕！不只是邓小平搞修正主义，出是可能的，不出是奇怪的。

我们要和贫下中农划等号，我们也要和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划等号，你们要在农村多呆一段时间，要把眼睛睁的大大的看着修正主义，包括我。我这个人又听人家的，又不听人家的。

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

梁　效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了！神州悲痛极，环宇齐悼念。在我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乌苏里江的北国前哨，到南海诸岛的椰林渔乡；从青藏高原的大寨式农田，到英雄的唐山开滦煤矿，悲壮的哀乐声，雄伟的《国际歌》，和高昂激越的《东方红》伟大颂歌，传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激动着八亿人民的心。

在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誓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庄严时刻，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赢得胜利的保证。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这是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我们的国家永不变色的战略措施。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发展，革命事业就胜利；违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就遭受挫折，革命事业就失败。当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葬送了生气蓬勃的第一次大革命，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革命进入低潮的严重关头，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清算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坚持井冈山斗争，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当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使我们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损失百分之百，红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危急时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力挽狂澜，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创了新的局面，迎接了伟大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新高潮的到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又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以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顶住了交枪投降的逆流，批判了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修正主义路线，敢于斗争，敢于胜利，运用**"三个法宝"**，领导我们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全面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深刻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作出了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解决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这个重大课题。当高岗、饶漱石、彭德

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总是伟大领袖毛主席驱散乌云和迷雾，拨正航向，使革命不断向前发展。正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国人民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空前提高，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我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永远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也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袖的时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从马克思逝世以后，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总是络终不渝地在‘矫正’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所歪曲的路线。”**（列宁：《约·菲·贝克尔、约·狄慈根、弗·恩格斯、卡·马克思等致弗·阿·左尔格等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选集》第1卷第699页）而当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之流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他们不但**“没有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嘱咐我们加以发展的科学推进一步”**（列宁：《我们的纲领》，《列宁选集》第2卷第203页），相反，却扯起修正主义的黑旗，终于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斯大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际上修正主义逆流猖獗一时，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动了批判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各国人民反帝反霸事业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前进。

要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列宁说过，修正主义的特征是**“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黑《修养》中，不是在装模作样地引用列宁的话时，居心险恶地删去了“无产阶级专政”吗？叛徒、卖国贼林彪不是把“讲马义［马克思主义］就要断章取义”的黑话奉为座右铭，公然抛出“称天才”的语录，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吗？自诩为“天才理论家”的政治骗子陈伯达，不是惯于动不动抬出什么“第三版”来吓唬人吗？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上台以后大刮右倾翻案风，从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中抽出三条，炮制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在他授意下炮制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论总纲》中，更是集卑劣手段之大成，肆意歪曲马列和毛主席的话，以达到其篡改毛主席既定方针的罪恶目的。我们只有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方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识破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鬼蜮伎俩，看清他们的实质，坚定地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要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必须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久经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毛主席

的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是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通过各级党组织来贯彻的。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全党服从中央，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任何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分裂的行为，都是违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的，都是三千万党员，八万万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按不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归根到底是搞马克思主义，还是搞修正主义；是团结，还是分裂；是光明正大，还是搞阴谋诡计的问题。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要求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因此，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必然要触犯修正主义大官们的利益，触犯他们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法权，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拚死抵抗。"**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同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施加各种影响，支持党内资产阶级，妄图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当前，在国内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抓住要害，深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在国际，要坚持反对苏美两霸的斗争。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我们必须提高百倍的警惕，坚决粉碎敢于入侵之敌。

前面的征途上尽管还会扑来阵阵邪风恶浪，还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坚定地执行毛主席既定的革命政策，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永远照耀着我们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为我们规划了未来的宏伟蓝图。过去，我们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后，我们继续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一定会夺得更伟大的胜利。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在领导我们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时候，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寄希望于人民群众。毛主席非常重视对群众进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谆谆告诫全党："**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革命群众都知道。**"在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中，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在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中，毛主席又一次强调要："**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经过不断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八亿中国人民，是毛主席在长期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用党的基本路线的思想亲自哺育起来的英雄人民。亿万人民学习、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毛主席和我们永别了，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我们所进行的共产主义事业，是亿万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事业。因此，它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极其深厚的基础，"**能够选拔很多人材来接替去世的伟大天才，继承他们的事业，沿着他们的道路前进，完成他们开始的事业**"（列宁："《悼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列宁全集》第29卷第72页）。

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贯十分重视培养革命接班人，亲自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各级领导班子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并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暴风雨中考察和锻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考验，大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正在茁壮成长。这是继续执行毛主席既定方针的有力保证。

一百多年前，当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只是两个青年的时候，面对着资本和王冠统治下的黑暗的欧洲大陆，他们就用《共产党宣言》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宣告了共产主义的必然到来。一九一八年，在那十四个帝国主义强盗妄图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的极端困难的日子里，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豪迈地指出："**资本的枷锁一定会被打得粉碎，社会主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今天，在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前，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哺育的英雄的中国人民面前，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我们亿万革命大军在党中央领导下，永远沿着毛主席既定方针指引的方向前进。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原载1976年10月4日《光明日报》)

〔附〕　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操纵舆论工具，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一些情况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为他们篡党夺权造舆论。

事实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在毛主席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全国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三条指示。一是"**慢慢来，不要招急**"，二是"**照过去方针办**"，三是"**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同志当即向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的前两条指示。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却别有用心地将"**照过去方针办**"篡改为"按既定方针办"，拿这个题目大做反党文章。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在乔冠华同志九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上的发言（稿）》上批示：文中"引用毛主席的嘱咐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华国锋同志的批示戳穿了他们的伪造。张春桥在文件上批了："国锋同志的批注，建议不下达，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圈阅后，划了一根线表示同意张春桥的意见。他们一面阻止下达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一面又用"梁效"的名义，炮制了题为《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十月四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为他们分裂党，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造舆论。

为了查清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利用报刊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情况，我们查阅了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到十月十二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

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等六种报刊，现将有关情况简要综合如下：

一、制造谣言，把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说成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首先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并在行文中给人造成一种是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印象。社论说：

“毛主席与世长辞了。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人心，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毛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在发给各省市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委的《内部参考》（第125期）上，在报道清华、北大学习两报一刊社论，决心按既定方针办时，公然造谣说，“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的临终嘱咐。报道说：清华大学“校党委副书记胡健说，社论传达了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按既定方针办’。”“学校政治理论组中年教师黄安森收听了重要社论，含泪再一次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表示决心：敬爱的毛主席，您临终教导我们‘按既定方针办’”。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各级干部和群众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对我们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检查对照自己的工作。工宣队员王玄元含着热泪说：‘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我们党不变修，国不变色考虑方针大计。毛主席的嘱咐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

二、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从九月十七日开始，特别是华国锋同志致悼词以后，到九月三十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学习与批判》等六种报刊，不突出宣传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不突出宣传悼词中强调的继承毛主席遗志，要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而是突出宣扬“按既定方针办”。

九月十九日，新华社关于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追悼大会的长篇报道中，都宣扬了“按既定方针办”，只有广东省、广州军区和广西自治区的报道提到了“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

从九月十七日到九月三十日，据初步统计，上述报刊发表悼念毛主席的报道和文章共三百九十八篇，其中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二百三十六篇，占百分之五十九，而引用“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只有二十一篇，占百分之五点三。

从九月二十二日到三十日，上述各报都把“按既定方针办”当作毛主席的语录登在报头上，其中有两、三天只用这一条。

从九月十七日到三十日，上述各报都多次出现“按既定方针办”的大字通栏标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九月十七日、十八两天，都出现有“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大标题。十七日两报的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坚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文汇报》从九月十七日到三十日，通栏大标题出现“按既定方针办”的共六次，其中九月二十日第五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坚决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化悲痛为力量，执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夺取更大胜利”。九月二十一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上海工人阶级坚决执行毛主

席的既定方针”。

《解放日报》九月二十一日报道上海市百万产业大军悼念毛主席逝世的活动，头版头条的通栏大标题是："按既定方针办，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九月二十二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上海郊区四百万人民坚决按既定方针办"。九月二十四日头版头条通栏大标题是："驻沪三军上海民兵坚决执行毛主席既定方针"。九月三十日的头版正中，还刊登了题为"按既定方针办"的大幅宣传画。

《解放日报》、《文汇报》九月十八日都在第三版以大字通栏标题提出："牢记毛主席的亲切嘱咐，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十期，刊登了本刊记者写的文章，标题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

国庆节以后，特别是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将"按既定方针办"删掉后，十月四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报头上的毛主席语录栏内，仍然刊用"按既定方针办"。直到十月十二日，《文汇报》在报道"一九七六年上海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的新闻中，还继续宣扬"按既定方针办"。十月九日，《文汇报》刊登中央两项重要决定的同一天，还在第四段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一组宣传画，总标题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按既定方针办"。

三、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对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作别有用心的解释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首先作了别有用心的解释，社论说：

"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125期刊登的驻清华大学记者组写的报道中说：

"自动化系党委书记邝守仁，留校工农兵学员、机械系党委副书记许凤琴，学习毛主席关于'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庄严地再一次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表决心"、"他们指出，'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斗争哲学，时刻准备迎接今后十次、二十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要永远发扬'五不怕'的反潮流精神，坚持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按既定方针办'，就要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彻底破除'路线斗争不可知论'，随时准备为坚持真理而战斗，让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永远高高飘扬；'按既定方针办'，就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走资派还在走'的科学论断，坚持继续革命。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带领我们进行反修防修的大演习，今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也要这么办。"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以"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中说：

"'按既定方针办'这一谆谆嘱咐，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

"学习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我们信心满怀，斗志更坚。毛主席的这一嘱咐，金光闪闪，字字万钧。它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赢得

胜利的保证。"

"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主义者的顾问和领袖的时候，他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而当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的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完全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解放日报》第五版，在"遵循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的通栏标题下，用四个醒目的标题宣扬：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与走资派作斗争"。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认真学习，深入批邓"。

"按既定方针办，就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文汇报》在"上海军民认真学习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的报道中，把"按既定方针办"和《悼词》别有用心地扯在一起，说：

华国锋同志代表党中央向我们发出了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用实际行动悼念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新的战斗号召，我们坚决拥护，坚决执行。我们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永远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文汇报》在"上海一千万军民热烈拥护中央两项重要决定"的报道中，硬把"按既定方针办"和中央的两项重要决定连在一起。如报道上海京剧团的反映说：

"自从毛主席逝世以来，我们一直惦记着这两件大事，我们是多么殷切地盼望能让广大人民群众世世代代瞻仰毛泽东主席的遗容呵！我们又是多么急切地希望早日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及以后各卷和《毛泽东全集》呵！现在中央已经作出了决定，这将进一步教育和鼓舞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学习毛泽东思想，遵照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

四、打着"按既定方针办"的旗号，把矛头指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125期刊登了上海分社写的《上海干部群众决心按毛主席既定方针办　为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努力奋斗》的报道，说：

上海钟表元件厂"四车间党支部书记丁长根说：毛主席的谆谆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是毛主席给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反修防修的强大武器，是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谁违背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谁就是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我们就要同他展开坚决的斗争。"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发表了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荣泳霖、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的文章《按既定方针办，同走资派斗争到底!》说：

"革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正是毛主席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制定的路线、方针的最主要之点。我们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牢记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刻苦学习、热情宣传、勇敢捍卫、坚决实践毛主席这一光辉思想，同一切妄

图改变既定方针的言论和行动作不调和的斗争。我们要始终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管是什么人物、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我们都要造他的反，坚决同走资派斗争到底!

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七日，新华社《内部参考》第125期刊登了驻清华大学记者组写的一篇报道，说:

"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们，还清醒地认识到，'按既定方针办'，必然要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疯狂反对，走资派是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的。建工系工宣队员吴庄根说，自从我们登上上层建筑政治舞台以来，和走资派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要按既定方针办，就必须把眼睛盯在党内，永远坚持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大方向，不断总结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随时准备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文汇报》发表中国钟厂工人理论小组写的《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的文章，说:

"我们只有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类党内走资派进行坚决的长期的斗争，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大方向，才能在各个领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实践毛主席'按既定方针办'的嘱咐，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以"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说:

"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

"'走资派还在走。'这个'走'的基本内容，就是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也就是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同时，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一定会采取各种方式，施加各种影响，支持党内资产阶级，妄图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的教导，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准备迎接二十次、三十次的路线斗争，在同党内资产阶级，同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要坚定地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基础上的。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要篡改这一既定方针，必然要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阉割它的革命灵魂，磨灭它的革命锋芒。""我们只有刻苦攻读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世世代代传下去，方能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识破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鬼蜮伎俩，看清他们的实质，坚定地贯彻和捍卫毛主席的既定方针。"

"亿万人民学习、执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是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必定胜利的根本保证。在这样的人民面前，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

〔附〕灭亡前的猖狂一跳

——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人民日报》编辑部

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是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一大阴谋。揭穿和粉碎这一阴谋，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

事情的发展出于反动派意料之外。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时刻，"四人帮"曾经是那样兴高采烈，以为时机已到，大大加快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步伐。伪造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就是他们加快步伐的一个突出标志。看一看一九七六年十月四日《光明日报》那篇"梁效"反党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吧：急于发难，杀气腾腾，迫切之情，溢于言表。但是他们捞到的不是别的什么，而恰恰是他们自己的最后大暴露。机关算尽，一朝覆亡，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到头来不过是"四人帮"灭亡前的猖狂一跳而已。

对于十月四日的"梁效"反党文章，人们已经作了许多批判，指出那是一个篡党夺权的动员令。现又查出，"四人帮"手中还有一篇同样性质而且更为狡诈的黑货，原题为《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经姚文元三次审改，预定于十月八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见报"，只是由于他们迅速垮台，未及出笼，呜呼哀哉了。事出有因，两篇黑文决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联系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中国天空"四人帮"乌云乱翻，大家看得清楚，这两篇东西正是他们阴谋罪恶活动走到顶点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他们进一步伸出黑手，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采取更严重的反革命复辟行动的信号。

（一）

马克思、恩格斯说得好："**要对付这一切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是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把这些阴谋诡计彻头彻尾地加以揭穿，就是使它们失去任何力量。**"（《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只要看一看"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活动的有关事实，看一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他们这一阴谋的有关事实，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

事情首先需要回溯到一九七六年四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四月三十日，毛主席会见外宾之后，华国锋同志向毛主席汇报了国内总的形势好，有几个省不大好的情况。毛主席当即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慢慢来，不要招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极为重要，表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沉毅、高瞻远瞩的雄伟气魄，重申了在解决各省的问题上要按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体现了对华国锋同志作为我们党和国家领袖的接班人的无限信任。这对于"四人帮"竭力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方针，批邓另搞一套，妄图打倒华国锋同志，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政治野心和阴谋活动，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华国锋同志当时就把毛主席的“**慢慢来、不要招急**”和“**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传达。“四人帮”在场，其中王洪文、江青作了笔录，有案可查，姚文元还直接看到了毛主席的亲笔原件。王、张、江、姚清清楚楚地知道，毛主席的指示是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针对什么问题作的。对于毛主席的指示，他们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不仅竭力对抗，并且在毛主席逝世之后，立即丧心病狂地有计划地篡改毛主席“**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临终嘱咐。

他们的伪造，首先见于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两报一刊社论。姚文元特别把社论原稿所说“毛主席在病中嘱咐我们”的“在病中”三字删掉，以便给人造成一种是“临终嘱咐”的印象。随即通过“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发到全国的内部刊物，直截了当地说成是“毛主席和我们永别前发出的伟大号召”，“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嘱咐”。大家看，明明是“**照过去方针办**”，在“四人帮”的手中变成了“按既定方针办”，明明是四个多月以前的指示，变成了“生命最后一刻”的“嘱咐”。这不是蓄意造谣，又是什么呢？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偷天换日，居然把他们伪造的这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说成是什么“对我们党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深刻总结”、“这一代和下一代、本世纪和下世纪，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永远是继续前进的指南”，还说什么恩格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的既定方针”，“列宁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既定方针”，等等，真是包举一切。这就是蓄意塑造一个赝品，妄图冒充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挥舞起来，作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绝妙武器。从九月十七日起，他们控制的各种宣传机器就开足马力，连篇累牍，大肆宣扬。他们叫嚷什么“宣传总的方针是六个字：‘按既定方针办’”，要让它“覆盖版面”！就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大谣言，弥天而起了。

他们选择在九月十六日见报，用心也是极为险恶的。就是说，恰恰是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发布之后，首都追悼大会即将召开，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前，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较他们原定发稿计划提前三天，抢先把所谓临终嘱咐抛出来。并以此作为宣传中心，极力排斥中央正式通过的告人民书和悼词。他们这种行径，使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确有这样一个毛主席“临终嘱咐”，又确如他们所说的这样重要，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向党中央提出极其庄重地加以公布呢？他们参加了告人民书和悼词的讨论，为什么不提出要在告人民书和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中写进去，而却由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单独加以公布呢？这样做，包藏着祸心。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捍卫者。这一个政治大阴谋，是对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陷害，是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制造舆论。

在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发表之后，报道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密令他们控制的喉舌工具要突出所谓临终嘱咐，“不要怕重复”、“凡有这句话的都摘入新闻，没有者，要有类似的话”！就是说，人家没有说这句话的，硬要给它添加上去！同时，对于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他们却竭力抵制，说什么“没有的也就算了”！至于群众悼念情况的报道，那就更加肆无忌惮。说什么，天安门国庆座谈会的“内容主要是”“按既定方针办”啊，说什么，“按既定方针办”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啊，等等。处心积虑，强奸民意，至于此极。

他们这一套，理所当然地受到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反击。九月底，有的中央负责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他们严正指出：你们突出宣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而不

宣传“三要三不要”，你们的宣传方针不对。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亲自在一个文件上删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指出：“我查对了一下，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这就一举戳穿了“四人帮”的伪造。我们的华国锋的同志，略予批驳，投一光辉，就打乱了“四人帮”的步伐，迫使这一小撮躲在阴暗角落里的政治骗子现出原形。他们很有一点狼狈了，且看他们怎样动作。

他们死不回头。老奸巨猾的张春桥，跑出来说什么华国锋同志的批示不要下达，“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江青立即表示支持她的这个伙伙。但是一转身，两天之后即十月四月，“四人帮”就抛出了“梁效”的反党文章，同时加紧炮制《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勇往直前》的黑文。两篇黑文，一个调门，大肆宣扬所谓临终嘱咐，并就所谓“篡改”（应该作揭穿他们伪造）“既定方针”的问题，恶毒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叫嚷“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要防止“邓小平一类走资派”“重演反革命的故伎”，“不管是什么人物，用什么方式搞修正主义，刮多大的阴风，我们都要造他的反”，还叫嚷“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等等等等，杀声一片。他们贼喊捉贼。他们要发难，要动刀，狗急跳墙了。请同志们注意，他们不是声称十分爱好和平，很不喜欢那个“不必要的纠纷”吗？原来，在他们那里，只有无产阶级的反击才是“不必要的”，而他们的反革命进攻却是绝对“必要”的。“以免纠纷”云云，不过是缓兵之计，以便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而对他们来说，却正是煽风点火，组织力量，施放毒箭，狠下毒手的大好时机。他们就是这样在最后挣扎中走到了顶点。

你看他们这个时候，忙得很呐！

毛主席刚逝世，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中央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权。他们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全国各地，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他们请示报告，妄图切断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联系，由他们发号施令、指挥全国。这是在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第一着。

九月十二日起，姚文元和“四人帮”在两校的黑干将，一次又一次地布置向江青写“效忠信”、“劝进书”。个别的坏家伙，公然反对毛主席生前的安排，提出要江青当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这是“四人帮”此时的一个最中心的主题。

他们实在情急。一封很有一点狂热劲头的“劝进书”说什么，要江青“立即出来担起这付重担，迅即宣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好一个“时乎不待”啊，等不及了。江青更等不及。她上窜下跳，四处游说，又是公开，又是秘密，又是会餐，又是照相，甚至还要别人把胶卷和苹果留着等她那个“特大喜讯”！还有王洪文，居然十月二日就私拍了准备上台时用的他的“标准像”，第二天又窜到平谷县，叫嚷什么“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公然煽动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他们很忙了一阵。也很乐了一阵。这就叫做利令智昏。

一面是乐，一面就要杀人。把死了两千多年的篡位夺权的大野心家吕后拉出来帮他们打起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黑旗，为他们的杀人事业壮胆，可谓江青此时的一大发明。什么《刘邦死后，吕后如何按刘邦的既定方针办》，奇文之奇，实属罕见。他们鼓吹“用西汉的历史多作文章”，什么文章呢？说是要看“那些对立面是怎么一个一个收拾掉的”！这就很清楚了：他们就要来“一个一个地收拾掉”他们的“对立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江青就要黄袍加身，做女皇了！果然，操纵“梁效”的那个黑干将，十月

三日深夜急令:"加快整理"早在九月中旬就已"精选"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的黑材料; 十月四日即"梁效"反党文章发表当天, 就急急忙忙地把这批黑材料拿走了。特别是那个诡计多端的张春桥, 绞尽脑汁, 阴谋策划, 赫然亲笔写下篡权复辟的提纲, 说什么:"怎样巩固政权, 杀人!"

图穷匕现。"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 就是这样同他们夺权和杀人的计划, 紧密交织在一起。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反党电影《反击》完工之后, 操纵"梁效"的黑干将派人向《反击》摄制组提出, 还要赶拍一部以围绕"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为主题的电影。摄制组的人们不懂, 他们阴阳怪气地说:"过两周就会清楚了。"大家看,"两周", 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四日"梁效"文章发表和八日预定发表另一篇黑文之时, 大约已经临近, 差不太多了吧。原来,"四人帮"篡党夺权是有一个日程表的。而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 就是这个日程表的一部分。这伙黑干将可爱之处, 就在他们较为坦白。但是,"两周", 未免高兴得太早了吧!

鲁迅有一句名言: 谣言世家的子弟, 是以谣言杀人, 也以谣言被杀的。"四人帮"就是一伙以谣言杀人的专家。伪造所谓临终嘱咐, 妄图以此打倒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 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复辟资本主义, 结果自取灭亡。这就是他们的谣言杀人术登峰造极的表演, 和最后的大破产。

(二)

"四人帮"如此大吹大擂地宣扬所谓"既定方针", 使人们不能不认真地来剖析一下他们的"既定方针"究竟是什么。

为了掩饰他们这条"既定方针"的反动实质,"四人帮"翻来复去地说什么, 所谓"按既定方针办", 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是按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办"。此类伪造的一个最新也是最后的伎俩, 就是姚文元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那篇未出笼的黑文十月三日送审稿上所作的颇为别致的滑稽表演。

十月三日, 姚文元同他在《人民日报》的心腹密谋,"要想个办法, 采取措施"来对付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揭露。有什么妙计呢? 这个不愧为文痞的角色笔杆枪一摇, 把送审稿上的"按既定方针办"、一下子改成"按照毛主席过去既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办"。你看他这个最新产品, 既有"按"、又有"照", 既有"既定"、又有"过去", 既有"路线"、又有"方针", 一应俱全。原来、他把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 同毛主席亲笔指示"**照过去方针办**", 以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字样, 分别拆开之后, 统统混在一句话里, 来了一个真假合璧, 合二而一。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他大概认为, 这样一改, 既可以保存他们的反革命原意, 又可以对付党的揭露, 他们可以放手大干了。

但是欲盖弥彰。姚文元这一手, 恰恰进一步地暴露了他们的真实意图。

"四人帮"的意图之一, 就是要用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 混淆和取代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

在这里, 难道仅仅是什么字面上的差别吗! 否, 这是根本对立的两种方针, 体现了根本对立的两条路线。

不错,"四人帮"确实是有一条"既定方针"的。这条"既定方针"的基本点, 就是篡党、夺

权、复辟。说得详细一点：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所谓“既定方针”，实质上也就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是“四人帮”反革命政变的政治纲领。或者用那个一手把持《光明日报》的“四人帮”喽罗的黑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国谋”。

大家知道，毛主席指示的“**照过去方针办**”，是针对一定问题讲的。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就是要照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办，照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讲话办。但是，“四人帮”却一反其道而行之。一个黑干将公然叫嚣，毛主席批示“**同意**”的华国锋同志的讲话，是同他们炮制的所谓清华大学的“经验”“唱对台戏”！他们拚命鼓吹揪“一层人”，甚至要揪什么“邓大平”、“邓二平”。他们由江青出马，在一九七六年二、三月间两次私自召集若干省市负责同志讲话，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矛头直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毛主席洞察一切，当时就指出：“**江青干涉太多了，单独召集十二省讲话**”。并要人转告华国锋同志，江青的讲话不对。真是一针见血！批邓另搞一套，这就是“四人帮”的一条“既定方针”。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他们又一次地恶性发作，有计划、有预谋地策动一些人在会上发难，以批邓为借口，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猖狂进攻，妄图篡党夺权。华国锋同志在这次会上针锋相对，传达了毛主席关于“**照过去方针办**”的指示，作了精辟的说明，打退了“四人帮”的猖狂进攻。尖锐的斗争反复说明，“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同毛主席的指示“**照过去方针办**”，是根本对立的。

“四人帮”的意图之二，就是要用他们伪造的那个“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取代党的基本路线。

“四人帮”有一条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既定方针”，不自批邓始，历来如此。远的不说，他们窃据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年来，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到灭亡的纪录，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中他们煽动“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受到毛主席多次批判，他们多方抵赖。批林批孔大搞“三箭齐发”，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受到毛主席尖锐批判，他们阳奉阴违。策划“组阁”阴谋，诬告周总理，被毛主席及时察觉和粉碎。他们贼心不死，又抛出反经验主义为“纲”，再次受到毛主席批判。以后，他们一面假检讨，一面疯狂反扑，利用批邓、策划全面夺权。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他们疯狂反对，张春桥的《二月三日有感》就是证明。毛主席严厉警告他们“**不要搞四人帮**”，他们变本加厉。从一贯抗拒毛主席指示，直到迫害毛主席，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妄图打倒毛主席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哪一条、哪一款不是用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既定方针”即极右路线，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对他们的多次批判，他们不但不听，屡教不改，并且怀恨在心。“既定”到底，死不回头，恰好说明他们是走“定”了资本主义道路的、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的“既定方针”，就是他们那条篡党夺权复辟的极右路线。什么“按既定方针办”，就是要按他们那条极右路线办！

“四人帮”的意图之三，还在于用那个“按既定方针办”，混淆和取代毛主席关于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说什么，谁“篡改既定方针”，谁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和“修正主义头子”，走资派还在“走”的基本内容，就是所谓“篡改既定方针”。他们还别有用心地把所谓“篡改”问题作为“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作为“当前”“批邓”的“主要之点”。你敢“篡改”即揭穿他们伪造的“既定方针”吗，那你就是“革命对

象”，就是“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派”、“修正主义头子”，就要对你实行“专政”，置之死地。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的刀锋所向，何等清楚啊！

这一来，他们那个“既定方针”，就一下子变成了所谓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最高标准，也即是分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革命对象的最高标准。大家知道，“**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主席总结我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基本原则，是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真正标准，是战胜党内资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毛主席在批判“四人帮”时，多次强调的就是这个基本原则。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看来，“三要三不要”简直就是足以制他们死命的紧箍咒。他们一面把所谓“既定方针”抬到吓人的高度，一面千方百计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一九七六年九月中央准备华国锋同志致的悼词时，“四人帮”竟然反对写上“三要三不要”，“理由”是悼词“长”了。你看他们这一副叛徒嘴脸，堕落到何等可耻的地步！

“永远按既定方针办”这种提法，就是形而上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四人帮”的“既定方针”，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篡党、夺权、复辟。

（三）

粉碎“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大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列宁说：“**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当那些在被压迫阶级中素享盛名的革命领袖一旦逝世以后，他们的敌人便企图窃取他们的名字来欺骗被压迫阶级。**”（《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117页）

“四人帮”伪造毛主席临终嘱咐的大阴谋，正是列宁所说的敌人窃取伟大领袖的名字来欺骗人民的最新表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但窃取伟大领袖的名字，而且居然打起所谓反对“篡改”的旗号来欺骗。而他们自己，却恰恰是在这个旗号掩护之下，肆无忌惮地进行了极端无耻、骇人听闻的篡改和伪造。

正因为这样，所以这场粉碎“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的斗争，其实质，就不能不是一场维护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红旗的斗争，不能不是一场粉碎“四人帮”打着反“篡改”旗号来篡改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斗争。

一切革命运动的历史经验说明，革命的伟大领袖的逝世，对于革命阶级和革命运动来说，总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困难。而对于革命的敌人来说，则总是他们利用革命阶级的困难，向革命猛扑过去，扼杀革命的一个极好时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阶级及其政党能否后继有人，接班的领袖能否继承伟大领袖的遗志，高举革命旗帜，战胜一切敌人尤其是内部敌人变换手法的猖狂进攻，对革命事业的成败关系极大。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的遗志，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包括粉碎伪造临终嘱咐的阴谋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一个最新的光辉典范。我们华主席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树立的巨大历史功勋，最根本的，就是坚定地高举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捍卫和实践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坚持贯彻了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露了“四人帮”篡改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罪恶活动。伟大的斗争造就伟大的领袖。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英明领袖华主席，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四人帮"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曾经是那样狂妄地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了我们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军队、伟大的党，过低估计了代表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的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央政治局的大多数。他们兴高采烈地搬起一块叫做"既定方针"的"临终嘱咐"的大石头，来打无产阶级。但是却反过来打了他们自己的脚。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他们自己从头到脚打得稀巴烂了。

这就叫做物极必反。

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斗争，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证明了并将继续证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的正确。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一定要继承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遗志，把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原载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

〔附〕 "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揭批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罪行

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直接操纵下，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效尽了犬马之劳。它既是帮喉舌，为"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又是"四人帮"大搞阴谋活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它所炮制的一批批黑文，干下的一桩桩罪恶勾当，都说明了它是罪行累累的"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帮 喉 舌

这个"四人帮"的帮喉舌，从它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中，有时以两校"大批判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名"梁效"等，先后炮制了二百一十九篇文章，公开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其中大量的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党文章，"四人帮"亲自点题授意的黑文就有三十六篇。"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每策划一个反革命步骤，就由这个帮喉舌首先抛出黑文章，把"四人帮"的黑旨意伪造成所谓"中央精神"，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妄图左右全国舆论。他们炮制的反党文章，用心之险恶，手法之卑劣，都是罕见的。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列主义，接过革命的口号另搞反革命的一套。他们伪造历史，编造谣言，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攻击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无耻地吹捧"四人帮"。他们专横跋扈，以势压人，扣帽子，打棍子，狂热地鼓吹"四人帮"那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呼风唤雨，搅乱人心，搞乱全国，妄图乱中夺权。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的诡计被戳穿以后，又借着"批儒评法"大作文

章。大叛徒江青说什么"吕后是伟大的政治家、法家"，武则天"阶级基础宽广"，其黑干将便指使两校"大批判组"赶快写文章加以宣扬。然而，他们查遍史书，也找不到吕后执行法家路线的材料，便无耻地伪造历史，虚构了一个假吕后，编进《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中去。还炮制了《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黑文，明写"法家女皇武则天"，实为江青当女皇大喊大叫。另一方面，他们打着"批儒"的旗号，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江青急不可待地召见两校"大批判组"成员，面授机宜，狂叫"现在文章有个缺点，就是不讲现代的大儒"，"刘少奇、林彪是大儒，党内还有大儒"，"要揪党内的儒"。两个黑干将立即向两校"大批判组"成员"交底"。于是，两校"大批判组"便炮制出《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等几十篇黑文，连篇累牍地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这篇黑文，就是由"四人帮"直接授意，经张春桥、江青看过，又经姚文元加工修改，三次变更标题，三次更换署名而后出笼的。这篇黑文以研究儒法斗争为名，极其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并为江青篡党夺权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阴谋组阁。就在这个时候，两校"大批判组"炮制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黑文出笼了。它把"四人帮"打扮成当今的"法家人物"，赤裸裸地叫嚷什么要保证"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就必须重用"法家人物"，要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江青还把两个黑干将找到住处，当面授意炮制所谓批判"因循守旧"的黑文章。两个黑干将跟着大肆鼓噪："这是个大题目，要作大文章"，"要推倒大山"。四届人大临近，他们心急如火，再三催促说："现实斗争不能等，文章必须马上写。"两校"大批判组"加紧炮制这篇黑文，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费尽心机，三次为之改稿，修改的地方达三十九处之多。这篇黑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明目张胆地提出不要"补天"，要"冲天"，要建立"新天"，气势汹汹地要夺周总理的权。但是，正当"四人帮"大作总理梦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警告江青："不要由你组阁"，使他们的反革命夺权计划惨遭失败。

四届人大以后，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认清投降派，要警惕林彪一类的修正主义上台。"四人帮"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歪曲毛主席的这两个重要指示，竭力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江青亲自出马，带着两校"大批判组"成员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大反所谓经验主义，又窜到大寨，大谈《水浒》的要害是什么"架空晁盖"，定下写黑文的调子。反动文痞姚文元也亲自策划写作。在"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操纵下，两校"大批判组"先后炮制了六十多篇黑文。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又有计划、有预谋地要把教育战线搞乱，把科技战线搞乱，把文艺战线搞乱，把卫生战线搞乱，把全国各条战线搞乱，妄图乱中夺权。两校"大批判组"为此大造反革命舆论，充当了"四人帮"的急先锋。他们竟丧心病狂地把罪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四人帮"指使两校"大批判组"连续射出《再论孔丘其人》、《宋江一上山就……》等一支支毒箭，并且竭力颠倒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达到了顶点。"四人帮"的黑干将杀气腾腾地狂叫："现在正是战斗的时候，要大写、特写、快写"。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两校"大批判组"就炮制了二十五篇黑文，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特别恶毒的，是以伪造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为主题，他们加紧炮制出八篇黑文，准备陆续抛出。十月四日，以"梁效"之名在《光明日报》上抛出的大毒草《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杀气腾腾，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华主席，为"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

步伐发出了反革命的动员令。但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这不过是他们覆亡前的猖狂一跳而已

黑 据 点

这几年来，两校“大批判组”不仅炮制黑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而且充当了“四人帮”进行反革命串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这个黑据点里，“四人帮”的黑干将，与“四人帮”在中央一些部门的亲信、爪牙密谋策划，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相互勾结，南北呼应。他们经常保持书信、电话联系、人员来往不断，互送各种黑材料，大肆进行反革命串联。辽宁那个死党的同伙对两校“大批判组”成员表示：“誓做两校‘大批判组’的后盾”；两校“大批判组”成员也告诫他们要加紧反革命勾结，“不要联错线。”

“四人帮”还通过“大批判组”插手军队，大搞反军乱军活动。一九七四年三月，江青发表“放火烧荒”的反军讲话之后，私派那个男黑干将和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到一些部队单位去搜集军内情况和动态，为“四人帮”揪所谓“戴红五星的走资派”提供炮弹，妄图毁我长城。姚文元还授意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读＜盐铁论＞》的黑文章，打着研究儒法斗争的幌子，影射攻击我军的领导干部。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两校“大批判组”私自非法搜集、整理和编印了一百多种“材料”。他们竟然窃取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文件和会议记录，还到处搜集报刊的内部资料等。这些“材料”，有的是“四人帮”转送来的，有的是“四人帮”的余党、亲信提供的。“四人帮”那两个黑干将指使两校“大批判组”私自加以整理，又是复制、翻印，又是摘录、选编。他们别有用心地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讲话，采取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无中生有、张冠李戴、造谣中伤、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段，搞成所谓“右倾翻案言论摘编”，广为散发。他们还利用各地来信，搜集、整理了大量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四人帮”的黑干将竟然指使两校“大批判组”把毛主席批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等重要指示，进行歪曲篡改，并加以批判。其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对编写这些黑材料，“四人帮”费尽了心机，不仅直接授意，并且多次亲自审查修改。那个男黑干将传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反动意图，说这是为全国提供批判材料，准备转发全国的，强调要把这件事作为“班子”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集中突击”。“四人帮”背着毛主席，把《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打成三株大毒草，编成三本小册子。那个黑干将亲自传达、布置“四人帮”的反动意图说：“每本前边选两三篇文章，文章要选北京、上海、辽宁的，其他省、市不要选，北京当然也主要是两校的罗！每本前面要写前言，说明是作为反面教材，发全国批判。”他还野心毕露地说：“这样出小册子快，文章和反面材料都是现成的，不必等上面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急不可待。两校“大批判组”加班加点，日夜突击。一稿又一稿，先后三次送“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亲笔修改前言和文中的按语，并指使出版部门在全国印发几千万份，妄图掀起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把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把两校“大批判组”作为他们的顾问班子、秘书班子和情报班子，背着华主席、党中央、私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私自处理全国各地来信，充当江青的耳目和打手。从一九七四年开始，两校“大批判组”向领导同志选送所谓“学习材料”，两年内一共选送了各种文章一百七十多篇。这些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由两校

“大批判组”精心挑选，经“四人帮”的黑干将同意批准的。其中有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有大反所谓经验主义的，有影射攻击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而对不利于“四人帮”的文章，则严加控制，一篇也不得选送。“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如此肆无忌惮地搞反革命活动，令人发指。

黑　班　子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两校“大批判组”这个黑班子中，不仅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相反竭力加以歪曲和对抗，而对于“四人帮”的黑指示则传达不过夜，一句屁话也要体会三天。他们对这个黑班子大肆散布种种反动思想，反对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竭力美化和吹捧“四人帮”。江青和他们的黑干将，还利用种种手段，在两校“大批判组”里培养效忠江青的“特殊感情”。江青曾多次单独接见两校“大批判组”成员，带着他们四处巡游，还给这个黑班子送什么芒果、冬瓜、茄子、小米以及用文冠果、油莎豆做的点心和糖果等，甚至专门写信要那两个黑干将把小米“熬成稀饭”给“班子”的人喝。他们每吃一次，都要谈意义，谈感想，表忠心，有的头目心领神会地说：“吃了首长送来的东西，什么都明白了。”有的头目甚至十分露骨地在党支部会上发出效忠大叛徒江青的反动叫嚣。江青还亲自跑到两校“大批判组”的住地，和这个黑班子的成员分别照相，用这一张“合影”作为“升官符”，拉拢他们为其卖命效劳。“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继承林彪“诱以官、禄、德”的衣钵，在这个三十多人的黑班子里，就有四人被封为人大代表，八人出席过国宴，两人被派出国访问。在这种封官许愿的引诱下，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去年春天就按捺不住篡党夺权的急切心情，公开扬言：“什么这个部、那个部，不就是那么几个鸟人！我们大批判组就是一个部，我当部长！”

“四人帮”通过他们的黑干将苦心经营，严密控制，扬言要在这里为他们篡党夺权“锻炼出一支队伍”。他们袭用林彪组织“小联合舰队”的老谱，采取了一整套特务手段：单线联系，个别布置任务，等等。江青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那个男黑干将也狂叫：“你们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对我的态度如何，是衡量党性的标准。”他们还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不准暴露“班子”活动情况，不准透露那两个黑干将的行踪，不准向原单位党组织汇报在黑班子里工作的情况等等。如有违反，就严加惩处。这个黑班子的住处，日夜有专人值班，外人不经通报、许可不准进人。北京大学校务部一位党支部书记去了解在那里服务的工人的工作情况，“四人帮”的黑干将知道后大发雷霆，竟诬蔑这个支部书记是坏人，下令审查。一次，两位解放军同志到北京大学探亲访友，误走到两校“大批判组”住地附近，竟被怀疑为来刺探情报的，立即扣留起来审问。甚至这个黑据点附近一个单位的狗，夜里被汽车轧死了，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四人帮”的黑干将硬说是有人为了暗算两校“大批判组”，蓄意把狗毒死的，是一桩“政治案件”。他们如此严加防范，疑神疑鬼，就是因为他们干的是反革命，是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四人帮”要这个黑班子不仅写文章、编材料，造反革命舆论，还要他们直接充当江青的侍从、跟班。有的被派出去代表江青“抓点”，有的代表江青到处去“慰问”、送材料、搞调查。江青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装模作样地要学马列、读古书、吟诗赋，两个黑干将就派“大批判组”成员去当侍读，给她在书上划红线、标重点，装潢门面。江青四出游说。大搞阴谋活动，两个黑干将便派两校“大批判组”当随从，跟着江青去参加各种座谈会，随时为她

提供材料，帮腔。一次，在一个工厂的学习会上，不学无术的江青信口雌黄说什么“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完全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当时，弄得人们目瞪口呆，啼笑皆非。明明是胡说八道，两校“大批判组”的一个头目却叫嚷：这是新精神，要认真领会。两个黑干将还派遣“大批判组”成员充当江青特使，完成江青的秘密使命。江青作贼心虚，疑神疑鬼，唯恐阴谋败露，竟要两个黑干将派遣“大批判组”的一个头目，两次到一个工厂秘密调查所谓搞江青“情报”的“特务”，充当“四人帮”的密探。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操纵两校“大批判组”这个黑班子，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效尽了犬马之劳。昔日依仗“四人帮”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这个两校“大批判组”，如今同它的主子一起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原载 1977 年 7 月 13 日《人民日报》)

〔附〕　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的急先锋

——揭露“两校大批判组”的反革命面目

北京大学党委机关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在一九七三年底，指使他们的两个黑干将拼凑了一个所谓“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下简称两校大批判组）。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把它叫作“我的班子”。“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也狂叫什么：“班子要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主子、奴才一唱一和，充分暴露了两校大批判组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效劳的御用工具。

两校大批判组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工具。“四人帮”的许多黑旨意都是通过这里伪造成所谓“中央精神”，炮制出一篇篇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黑文，流毒全国。三年来，这个黑班子以两校大批判组和“梁效”、“柏青”、“高路”、“梁小章”等十几个笔名，抛出了一百多篇黑文章。他们打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们以“批判”为名，扣帽子，打棍子，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肆意篡改历史，大肆鼓吹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

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搞“三箭齐发”。“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马上指使两校大批判组炮制黑文、制造混乱，妄图扭转批林批孔的大方向，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之后，“四人帮”的黑干将又秉承江青的黑旨意，指使两校大批判组硬把“人情大于王法”这句话塞进林彪的材料中去，并在按语中继续鼓吹“三箭齐发”，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批评。“四人帮”借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名，大作文章，他们借古喻今，大肆吹嘘自己；以古讽今，恶毒攻击他们妄图打倒的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控制的两校大批判组在短短三四个月内，接连抛出了几十篇黑文章，狂叫要揪“现代的大儒”，恶毒地影射攻击敬爱

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九七四年二月底，两校大批判组连夜炮制江青亲自点题的大毒草《孔丘其人》。这篇黑文是“四人帮”射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一支毒箭。“四人帮”对这篇黑文大加赞赏、姚文元叫嚷写得“生动活泼”，江青多次夸奖“写得生龙活虎”。大野心家江青以当代吕后、武则天自居，梦想当女皇帝。“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心领神会，立即指使两校大批判组一连炮制了九篇吹捧吕后、武则天的黑文章。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的黑干将又为“四人帮”妄图“组阁”大造反革命舆论，布置两校大批判组按照江青出的题目，炮制什么“批因循守旧”的黑文章，狂叫要“向权威挑战”，叫嚣“要发动一个比批林批孔还要大的运动”，妄图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诬蔑成“因循守旧势力”，统统打下去，而把“四人帮”奉为“革新进步势力”捧上台。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四人帮”又公然篡改毛主席指示，篡改党的九大、十大路线。别有用心地要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来反，把矛头指向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老干部。他们的黑干将就布置两校大批判组炮制所谓反经验主义的黑文章。他们等不及这些大毒草出笼，竟不择手段地先在其他黑文章中硬塞进反经验主义的所谓“新精神”，以至弄得牛头不对马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四人帮”另搞一套，两校大批判组就接连抛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就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和《翻案复辟的自供状》等大毒草，公然把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肆意歪曲，当作右倾翻案的言论大加批判，用心极其狠毒。

毛主席逝世以后，“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让两校大批判组编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主席处于困难时期是如何坚持斗争的两份材料，为“四人帮”一伙壮胆打气，还翻印了国外材料，影射攻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为了紧密配合“四人帮”伪造“按既定方针办”这个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的阴谋活动，“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又操纵两校大批判组，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炮制了十几篇黑文章，叫嚷要“随时准备迎接斗争的新风浪”，提出“不管征途中存在什么险阻，出现什么风浪”，都要“坚守岗位，继续战斗”，急切地要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下毒手了。十月四日，“四人帮”悍然在报上抛出了署名“梁效”的反党黑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发出了篡党夺权的动员令，杀气腾腾，凶相毕露，反革命气焰之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他们低估了人民的力量。当他们的黑手一伸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立即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他们的罪恶阴谋，他们的末日到来了。

两校大批判组不只是“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御用工具，而且是“四人帮”大搞反革命串连、大整黑材料、大搞特务活动的一个黑据点。今年八月，“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奉张春桥、姚文元之命，竟把出版部门和一些印刷厂的负责人叫到两校大批判组，布置赶印所谓批邓的三本小册子的任务，而且造谣说这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在两校大批判组这个黑据点里，“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与外界进行的反革命串连极为频繁。他们在这里接待一些行踪诡秘的来访者，其中有的是从外地窜来的，有的是“四人帮”安插在某些单位的亲信，都是来为“四人帮”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提供炮弹的。他们把黑手伸向中央一些部门，伸向一些省市和部队，猖狂地进行反党乱军的罪恶活动。在这个黑窝子里，集中了王张江姚盗窃的大批中央文件、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的文件、会议记录，集中了“四人帮”的一些亲信提供的所谓“材料”等等，由这个黑班子把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和地方负责同志的言行，私自整理成所谓“右倾翻案恶果”的黑“材料”；利用所谓“群众来信”大作文章，私自整理了许多诬告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他们这样肆无忌惮地大搞阴谋活动，完全是为“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服务的。

“四人帮”苦心经营的两校大批判组，也是为他们实现篡党夺权阴谋效劳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江青经常带着两校大批判组的人，窜到各地煽风点火。“四人帮”的一个黑干将曾经扬言，“要在这里锻炼出一支队伍。”“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在两校大批判组，完全按照林彪“小联合舰队”的老谱，规定了一整套的法西斯纪律，对外严密封锁，不准向原单位党组织汇报在这里工作的情况。对内加强控制，规定了单线联系、个别布置任务、组与组之间不准交流情况、不准串门等反革命纪律。如有违反，就严加惩处。另一方面，江青和“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还经常带着两校大批判组成员大看反动的和黄色的电影，对他们进行腐蚀和毒害，据不完全统计，看了有四十九部之多。大野心家江青为了收买人心，加强控制，还多次给两校大批判组送小米、冬瓜、茄子，送文冠果油和油莎豆做的点心和酒，每次“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都要带头称颂主子的恩德，感激涕零，并让大家座谈感受，竭力培养对大野心家江青的“忠心”。果然，两校大批判组的一个头头流着眼泪说：“吃了这些东西，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什么“永远忠于江青”的反革命口号，也都在这里喊出来了。八月二十六日，江青还窜到两校大批判组，和每个成员分别合影。这一切不是充分说明了所谓两校大批判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反革命货色了吗！

三年来，两校大批判组在“四人帮”及其两个黑干将指挥下的所作所为，归根到底，就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英明的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是死心塌地为“四人帮”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卖命，推行他们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两校大批判组短命的历史，是一部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历史，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效尽犬马之劳的可耻记录！“四人帮”及其两个黑干将操纵两校大批判组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彻底批判！

(原载1976年12月18日《北京日报》)

〔附〕 “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清算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反革命罪行

申 涛 声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四人帮’调动他们操纵的舆论工具，竭力煽动层层揪所谓‘民主派’、‘走资派’。他们御用的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和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华主席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在“四人帮”反党阴谋活动中突出的反动地位和反动作用。

多行不义必自毙。随着“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这个五毒俱全、恶贯满盈的黑班子，顷刻瓦解，彻底覆灭。它对党对人民犯下的累累罪行，它所散布的种种谬论，必须一一清算。

“四人帮”的御用班子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完全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扶植起来的“四人帮”的御用班子，是“四人帮”的嫡系部队。它从一九七一年正式开张的第一天起，就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卖命效劳。它的所作所为是成千成万善良的人们所意想不到的。

它名为“写作组”，但地位之特殊，反革命能量之大，却异乎寻常。它利用篡夺的一部分权力，把持《学习与批判》、《朝霞》、《朝霞丛刊》、《教育实践》、《自然辩证法》等八个刊物，编辑、审稿全由它一手包揽。它操纵了上海全市新闻、出版、广播、文艺等舆论工具，出什么书，登什么文章，演什么戏，都要唯它之命是从。它是上海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的“太上皇”。“四人帮”不便公开讲的话，它来讲；“四人帮”另搞一套，它和两校大批判组南北呼应，率先发难。几年来，在它直接控制下炮制的文章就有一千多篇，出版书籍几十种，毒草丛生，流毒甚广。它是全国最大的一家毒草公司。

它名为“写作组”，但又不是一个单纯的写作机构。它私整上自中央下至地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编造诬陷不实之词，为“四人帮”提供反党“炮弹”。几年来，它直接送给张、姚的密信、调查报告、座谈纪要等各类情报、条陈达千件以上。

它名为“写作组”，但它的黑手伸得很长。它插手文教科技，插手工业农业，插手外地，插手部队，蓄意制造混乱，积极为“四人帮”的“稳定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方针服务。

它名为“写作组”，但又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监听哨”。它发现“帮”外“帮”内、干部群众有不利于“帮”的言行，就向张、姚告密。

这个“写作组”所以如此横行无忌，称王称霸，就是因为有“四人帮”撑腰。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就和张、姚相勾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姚密令他们投机“造反”。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借和那两个余党一起读书为名，历时一个多月，肆无忌惮地篡改党的历史，对那两个余党悉心进行“改朝换代”的路线交底。从此以后，那两个余党便抱定宗旨，紧跟“四人帮”。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只听张、姚的，其他谁也不听”，张、姚把他们视为心腹。据目前查获，几年来，张、姚直接写给原写作组的黑批示就有三百六十多件。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步伐的加紧，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和张、姚更是死死抱成一团。一九七四年七月，张春桥就曾向那个大头目表露过：“你们的信，我都锁在保险柜里，将来无非杀头，就先杀我的头好了。”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垮台时，那个大头目也狂叫：“我们有今天，全亏了张、姚”，“我准备杀头坐牢，豁出命来干。”主子不惜以杀头来保奴才，奴才也不惜“杀身成仁”来报答主子。

在原写作组内部，那两个余党也严加控制。他们竭力灌输效忠“四人帮”的“忠君”思想，经常宣扬：要“不辜负中央领导（指“四人帮”）的殷切期望”，“到我们这儿工作，就卷入了斗争的旋涡，你跑也跑不了。要准备杀头，坐牢。”他们的心目中，根本没有毛主席，没有党中央，没有党纪国法，有的只是“四人帮”的“邦纪”、“帮规”。

他们还通过举办各种学习班，为“四人帮”拉队伍。张春桥说，要在上海培养大批“理论骨干”。原写作组的余党，就大肆宣扬“这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部署”，“我们就是要影响一代人”。对于举办这种学习班，一个余党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就是要象蒋介石举办庐山军官训

练团那样，用我们的观点来培养自己的骨干"，"要他们经得起复杂环境的考验"。当然，这只是痴心妄想。

请看，这是一般意义上的写作组吗？不，不是！它完全是"四人帮"卵翼下的一具"怪胎"，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行帮组织。

疯狂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切活动，始终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竭力鼓吹和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他们按照"四人帮"确定的攻击目标，恶毒地提出："在一个时期打击最危险的一翼"，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特别是在中央掌握领导权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敬爱的周总理在世时，他们猖狂地攻击周总理；周总理病重和逝世后，他们就百般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在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他们又恶毒地攻击华国锋同志。这就是原上海市委写作组数年来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所走过的罪恶道路。

"四人帮"及其余党，一贯把敬爱的周总理看成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原写作组那个二头目就曾阴险地说："为什么全国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依我看……因为还有一个大人物在"。他叫嚷"老的去不掉，新的起不来"，扬言"要去掉这具偶像"，露骨地攻击周总理。一九七二年，他们又借关于基础理论研究和整顿企业管理的问题，大做反革命文章，叫嚷这是"刮理论风"、"右倾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总理。党的十大以后，"四人帮"加紧结帮篡党，阴谋"组阁"夺权，他们打击诬陷周总理也达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转移批林批孔运动的大方向，大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阴谋文艺，伪造历史，借古讽今，不批林、假批孔，大搞所谓批"周公"。在报刊上首先抛出"二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延续到现在"的反动观点，叫嚣要揪"现代大儒"的，是他们；在全国掀起大批"宰相"风的，是他们；大刮批所谓"尊孔卖国"风的，也是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又千方百计制造事端，打击陷害周总理。在北京，"四人帮"借"风庆轮"事件，在国务院大轰大闹，叫嚷要揪"后台"；在上海，那两个余党更是赤膊上阵，齐声鼓噪："要把文章做足"、"要十八般武艺一起上"。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抛出的大小文章就有一百多篇，以"风庆轮"为背景的电影、戏剧、小说、电视、广播也纷纷出笼。"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的恶言毒语，一起喷向敬爱的周总理。他们就象红了眼的疯狗，见到周总理的影子就狂吠，听到周总理的指示就反对，周总理讲到哪里，他们就反到哪里。

在周总理病重期间，毛主席亲自委托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四人帮"更是怀恨在心。他们窥测方向，伺机反扑。一九七五年七月，姚文元窜到上海向那两个余党交底，恶毒地说："你们不要急，反错必出错，到一定时候出来讲话比较合适。"这个阴险的反革命策略，充分说明了"四人帮"诬陷打击邓小平同志是完全有预谋的。到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张春桥便专门指示那两个余党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路线斗争上去"，责令他们"不要做桃花源中人"。与此同时，张春桥又把送给政治局的一份关于《汇报提纲》的材料，直接捅给原写作组；姚文元也捅来了他对《论总纲》的四十七条黑批语；他们又指示上海的余党对《二十条》要"系统地批一批"。原写作组的大头目得意忘形地叫喊："拿到了重磅炮弹"，狂吠要"加温"、"要四面八方开花"、"出点格没有关系"。一九七六年三月，他们伪造了一篇青年工人批《二十条》

的所谓《批判会纪要》，接着又炮制了《读一篇未及发表的文稿》、《（汇报提纲）出笼的前前后后》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选批》三篇黑文，为在全国批所谓"三株大毒草"打了头阵。他们兴高采烈地狂叫："抢到了三个头功"。

"四人帮"妄想通过打击诬陷邓小平同志之后自己上台。当时，他们在上海街头公然刷出了"要张春桥当总理"的大幅标语。但是，毛主席亲自指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又一次挫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恨得咬牙切齿，张春桥迫不及待地给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发出黑指示，要他们"警惕出修正主义，在党内，在中央"。他唯恐奴才们不明了，特地在"在中央"三个字下面划上了两条杠杠。余党们心领神会，又以百倍的疯狂攻击华国锋同志。他们抛出了司马光、袁世凯以至蒋介石等等一系列所谓"上台"的文章，对华国锋同志进行恶毒的影射和诽谤。尤其反动的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原写作组那两个余党，又根据张春桥关于"有些话国内不好说，可以借批苏修来说"的黑指示，绞尽脑汁，策划了一篇所谓《耐普曼日记》，假托苏联一个老资产阶级分子讲赫鲁晓夫上台以后的情况，来影射攻击华国锋同志。可是，他们做贼心虚，再三谋划，终究不敢拿出来，至今成了"四人帮"和原写作组反对华主席的一个铁证。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仅有一条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公开的战线，还有一条大搞特务情报的"隐蔽"的战线。这些年来，他们一直肆无忌惮地搜集私整黑材料，罗织罪名，诬陷中央领导同志。早在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就授意他们汇编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反动思潮资料简编》，将当时八位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断章取义、斩头去尾，统统作为"反动思潮"编进《资料》。一九七六年一月七日，他们为了适应"四人帮"加紧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需要，急如星火，连夜摘编所谓"奇谈怪论"的黑材料，一口气点了十几位中央领导同志的名。

与此同时，他们还调动各种力量，以"调查"为名，为"四人帮"搜集反党材料，说什么这是"上面打仗用的炮弹！"先后持续两年之久的所谓"外贸调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一九七四年张春桥授意搞"外贸调查"，因为四届人大召开，"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失败而草草收场。到了一九七六年，他们又搞第二次"外贸调查"。写作组的大头目亲自为这次调查定下基调，攻击"外贸部就是洋行买办部"。他们这样干，仅仅是为了要整垮一个外贸部吗？当然不是！那个大头目嚣张地说："真正的斗争不在外贸部，而是在中央政治局里头。"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还十分卖力地为"四人帮"出谋献策。一九七五年底，张春桥写信给那个大头目说："希望你们研究一下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它的特点。"那两个余党马上向张春桥送上条陈，别有用心地建议要批"四个现代化"。他们以所谓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名，把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领导干部，打成搞所谓"唯生产力论"的"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还建议要对"文化大革命的必然性"作"科学论证"，妄图以捍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为幌子，把一切反对"四人帮"的人统统打倒。这种极其恶毒的反革命策略，张春桥看了正中下怀，马上回信嘉奖："所有的意见，都对我有用，启发我想问题。"果然，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就掀起了一股股批"四个现代化"，批所谓"唯生产力论"，批所谓"复辟党""还乡团"的黑风。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为了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然而，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所有这些罪恶行径，恰恰起了从反面动员人民起来把他们打倒的作用。

卖力拼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帮"理论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不仅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而且妄图为"四人帮"拼凑所谓理论体系。他们凭着反革命的经验，深知理论的重要。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大头目在讨论一本书稿时曾毫不掩饰地说："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这本书如果站得住，其他问题就好办了。"这就是说，有了他们炮制的反动理论为基础，"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就可以站得住脚了。不仅如此，那两个余党还在私下议论说："共产党的领导总要会搞理论的"，"理论上的权威必然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他们竭力把"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打扮成"理论上的权威"，以便有朝一日，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成为"当然的领袖"、全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几年来，原上海市委写作组调集大批人马，著书立说，从哲学到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史、近代史到党史，从文艺理论到教育学，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理论，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全面篡改，另立"四人帮"的理论体系。

一九七一年下半年，原写作组在张春桥的授意下，私自设立了编写党史的摊子。他们全面篡改党的历史，竭力贬低和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还无耻地捏造历史，为"四人帮"树碑立传，在他们所编党史的社会主义部分中，提到叛徒江青的名字就有十处之多。在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原写作组的余党，也力图使这本书纳入"四人帮"的轨道，下令要以张、姚的反动观点作为指导思想。周总理逝世前后，他们根据张春桥的黑批示，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修改本中大肆宣扬"党内出现一个资产阶级"的理论，竟然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说成是"分析新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和灭亡的过程"。这是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道道地地的"四人帮"的"政治经济学"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炮制文章也好，编写专著也好，都是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制造理论根据的。这里略举几个例子，看看他们鼓吹的究竟是什么货色，要另立的是什么体系。

其一，所谓"半截子革命论"。他们在张春桥授意炮制的《革命与资本》等黑文中，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说成是"早年站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上参加了我们的党，到了社会主义时期，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便跳出来疯狂反对党的基本路线"，成为"走资派"，成为"半截子革命派"。胡说这种"前半生革命、后半生不革命"的"半截子革命派"，是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一条必然的规律。

其二，所谓"分配差别就是阶级剥削论"。他们胡编乱扯，说"党内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从处在大官们的利益这种经济地位上转化过来的"，那些由于分配上的差别而产生的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同老的资本家一样，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存在的"。他们荒谬地把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说成是产生所谓"党内资产阶级"的经济根源，把级别高、工资多、当作划分"走资派"的经济标准。

其三，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论"。原写作组在给姚文元的一份选题计划上提出这个论点，姚文元大加赞赏，在"焦点"两字下连划三道杠。于是，他们大肆鼓噪"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革他们的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焦

点"。他们炮制的这个所谓"焦点论"，把继续革命的全部任务，归结成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把参加过民主革命的老干部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维护者"，从而把老干部都打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对象。

其四，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发展的第三种形态论"。他们胡说什么："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产阶级，到垄断时期的资产阶级，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资产阶级，这是资产阶级在它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的几种形态。"这种谬论是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肆意践踏。

在炮制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他们还积极进行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的调查，筹划为张春桥炮制《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分析》的文章，狂妄地要同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相抗衡。他们还大搞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调查，宣称要编一本和当年毛主席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相类似的书，由张春桥来作序言，写按语。凡此种种，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要妄想使"四人帮"特别是张春桥由"理论上的权威转化为组织上的权威"。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犯下的反革命罪行，说明控制原写作组的余党完全是一伙反党成性的反动派。然而，这伙张牙舞爪的反动分子，内心里却虚弱得很。他们自己就把炮制的每一篇黑文比作一块块埋葬自己的墓砖，等待着"坐牢、杀头"的结局。但是，他们象一切赌棍一样，"干了又怕，怕了又干"，决计为"四人帮"卖命到底。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不甘心自己覆灭的命运，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在这出丑剧中，这批用笔杆子杀人的"文化人"，要拿起枪杆子杀向无产阶级了。写作组那个大头目狂叫："豁出命来干。"二头目叫嚣："我们一起干，我是不怕死的。"那个大头目连夜亲自赶到报社、电台进行策划，勒令报纸不发新华社的全国通稿，要电台不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他们还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出谋划策，提出"破坏铁路、桥梁"，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他们妄图孤注一掷，把上海一千万人民推向血海。

然而，就在他们疯狂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日子里，他们的反革命的绝望心境也暴露无遗。那几天，他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边叫嚣"大干，大干"，一边瘫在地上悲鸣："完蛋，完蛋"。他们在会上声色俱厉，一躺上床就吓得做恶梦，出冷汗，一个个象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及原写作组的那些余党，如同一切反动派一样，都不过是纸老虎。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原上海市委写作组也在这最后的猖狂一跳中，宣告了自己的灭亡。他们不是经常在帮刊《学习与批判》上恶毒地咒骂，要把革命者"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现在，这句话完全奉还给他们自己了。真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正是他们这伙十恶不赦的"四人帮"及其余党。

(原载 1977 年 10 月 27 日《人民日报》)

〔附〕 自掘坟墓　自造墓砖

——揭批“四人帮”通过帮刊《学习与批判》

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一九七三年九月，正当“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大做组阁迷梦的关键时刻，在上海冒出了一个所谓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的杂志《学习与批判》。三年中，这个刊物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抛出了大量的反党黑文，制造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

这个刊物名曰复旦大学学报，但在这个大学里却找不到它的编辑部。这究竟是哪一家的喉舌？现在真相大白：这个刊物是“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直接控制的，编辑出版大权完全操在“四人帮”安插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那两个心腹手中。广大工农兵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证明，《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的地地道道的“帮刊”，是为“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喉舌。

反革命文痞姚文元曾经假惺惺地为《学习与批判》规定了一条原则：“不得为天下先”。这完全是骗人的。《学习与批判》创刊号筹备之时，姚文元就从北京打电话，把党中央关于批孔的部署泄露给写作组的心腹，授意炮制《论尊儒反法》的黑文。文章在创刊号上一发出，姚文元就下令《红旗》杂志转载。创刊号上的另一篇黑文《巴黎公社与工人武装》，则是秉承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王洪文和张春桥捏造的“民兵改造”论，鼓吹“民兵独立”、“民兵万能”，煽动“四人帮”在各地的亲信反军乱军，阴谋拉“第二武装”的，这篇黑文也由姚文元下令转载于中央的一个报纸上。请看，这首先亮相的创刊号，不就正好表明《学习与批判》的宗旨就是要“为天下先”吗？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刮起的一股“批宰相”的黑风，正是由《学习与批判》带头的。姚文元授意炮制的那篇《论尊儒反法》，第一次批了反对秦始皇中央集权制的一个“丞相”。此后，这个“四人帮”的喉舌便根据江青“要批宰相”的指令，连篇累牍地批了一长串的宰相，歪曲历史，借古讽今，影射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其气焰之嚣张，用语之恶毒，在“四人帮”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中，确实是领了“先”的。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四人帮”刮起所谓“批资产风”、“打土围子”的黑风，也由《学习与批判》首先放出空气。一九七五年二月，姚文元把“四人帮”借学理论为名、制造大乱的阴谋密授给写作组的那两个心腹。三月份，《学习与批判》便马上发出“批资产风”的呼喊。他们又是列举所谓“资产风”的十条表现，又是回忆三反、五反运动，把姚文元那些隐晦曲折的反党语言加以明朗化。在张春桥提出“打土围子”的反动口号以后，《学习与批判》上更是鼓噪一时。什么要“动点外科小手术”啦，要揪“土围子里的土皇帝”啦，一个论调比一个论调凶。在《八路军的“样子”》一文中，竟把我军干部诬蔑为“资产风”的代表，妄图进一步在全国刮起反军乱军的妖风。《学习与批判》，就是这样的一个反党乱军的急先锋。

在去年“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步伐的时刻，这个“四人帮”的“帮刊”更加活跃起来。他们借反击右倾翻案风为名，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对抗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把犯错误的同志比作反革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还根据狗

头军师张春桥的黑话，在所谓"辫子"问题上大做文章，《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六年第三期《梯也尔小传》和《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两篇黑文中，说什么梯也尔搞复辟，是因为有俾斯麦的"授意"；赵七爷的反攻倒算，是因为有"辫帅"张勋的支持，恶毒地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在全国人民无限悲痛的日子里，《学习与批判》突然在三月间抛出了一篇《蒋介石是怎样起家的?》黑文，含沙射影地诬陷周总理。这篇文章先写了"这时的上海，已经被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领导的工人武装起义从军阀手里解放出来"这么一段话，然后在介绍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历史情况时，故意不提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领导广大工人群众与蒋介石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只说"优秀的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等同志惨遭杀害"。"四人帮"帮刊《学习与批判》的这一鬼蜮伎俩和反革命罪行，当时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声讨。

接着，在第四期上他们又拉开了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的阵势，抛出一顶顶"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刘少奇的理论家"等帽子，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扫清道路。

"四人帮"给《学习与批判》以这种"为天下先"的地位，就是要利用它带头发难，左右全国舆论，从而达到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这难道不是很明显的吗?

《学习与批判》制造种种反革命舆论，都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条极右路线服务的。把持《学习与批判》的"四人帮"那两个心腹，按照狗头军师张春桥的"文化大革命改朝换代"论、"阶级关系新变动"论，提出了许多蛊惑人心的反动口号。他们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敌我关系，别有用心地鼓吹"老的不行了"、"'新'的要上台"的谬论，卖劲地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鸣锣开道。

"四人帮"为了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富有经验的领导干部，公然打出反"经验主义"的黑旗。在这场反革命丑剧中，《学习与批判》为"四人帮"摇旗呐喊，甚至当他们知道反"经验主义"已经受到毛主席的批判之后，还抛出反"经验主义"的黑文，叫喊"不要紧，照发"。真是反动气焰嚣张之极。他们挖空心思，编造所谓经验主义的"三性"：保守性、惰性和顽固性，用耸人听闻的办法，把一支支毒箭射向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他们采取借古讽今、含沙射影的卑鄙伎俩，在《试论章太炎思想的演变过程》这篇黑文中，大讲"前半生革命，后半生不革命"的所谓规律。接着，又论李斯，论韩信，论康有为，论汪精卫，在这些黑文中制造一个个所谓"论证"，鼓吹"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妄图以这样荒谬的推论，影射攻击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真是反动透顶。

他们挖空心思，批"儒"，批"宰相"，批"经验主义"，批"洋奴哲学"，都是为了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又气急败坏地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为此，那两个把持《学习与批判》的心腹，又刮起一股批所谓"上台"的黑风，连续发表了《司马光上台一年》、《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蒋介石上台的头十年》等一连串黑文，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迫不及待地要取而代之。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时曾经指出，修正主义分子总是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的掩饰下**"，"**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拉出来**"。"四人帮"的"帮刊"《学习与批判》就是这样，一面大喊"老的不行了"，一面拼命为"四人帮"上台吹喇叭。"四人帮"的一个心腹炮制

的黑文《评淮西之捷》，大讲唐朝名将李愬和宰相裴度的关系，说什么“无论从门阀资历和官衔来看，李愬都比裴度要高得多”，但李愬呢，却“对裴度十分尊重”，打仗胜利了，“恭恭敬敬地站在路旁迎接裴度的到临”。他唯恐人们不懂，又特意点出：“这是为了进一步树立中央政权威信的需要”。“四人帮”要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又妄想这些领导干部自动交权，“恭恭敬敬”地迎接他们这一伙反革命黑帮上台，这就是他们的罪恶用心。

在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学习与批判》更是配合“四人帮”覆亡前的猖狂一跳，大造了反革命舆论。在一九七六年第十期，也就是破了产的最后一期，《学习与批判》大肆宣扬伪造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并且无耻地把它说成是“上海一千万人民的战斗誓言”。他们还根据张春桥的授意，炮制了一篇题为《坚持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文章。“四人帮”的那个心腹声言：“写好这篇文章，现实性很强。”什么现实性？就是反对毛主席在生前作出的华国锋同志为我党领袖的英明决策，猖狂地要篡党夺权、取而代之。他们炮制的另一篇《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文章，煞有介事地宣传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这里的所谓“党”，就是他们那个“四人帮”。“四人帮”大讲“党指挥枪”，就是要迫不及待地篡夺军队的领导权。“四人帮”的一个心腹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这就一语道破了天机。这期间，那两个心腹还布置了好几篇所谓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新民主主义论》等体会文章，要大讲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急不可耐地导演一场向他们的“领袖”劝进的大合唱。但是，谁都知道，毛主席这几篇著作主要并不是讲领袖问题的。当时有人指出，应当全面领会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然后才能写学习体会。“四人帮”的一个心腹大不以为然，说：“我们是假戏假做，谁要你假戏真做！”原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只不过是“假戏”，搞篡党夺权，那才是真意。这些话不是把“四人帮”及其一伙的什么“理论家”、“革命左派”的外衣剥个精光了吗？

今天，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毒汁四溅的《学习与批判》也寿终正寝了。这几年，“四人帮”的一个心腹曾经多次心惊胆颤地悲鸣：“每出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给自己增添一块墓砖。”这话算是说对了。三十八期《学习与批判》，已经成了“四人帮”一步一步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罪证。广大工农兵群众决心深揭猛批“四人帮”控制《学习与批判》大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彻底肃清这些反革命舆论的流毒和影响。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原载 1977 年 3 月 17 日《文汇报》）

中　共　中　央　通　知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现将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在党内传达。

中共中央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
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为了永远纪念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教育和鼓舞工农兵和其他劳动群众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决定：

(一) 在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

(二) 在纪念堂建成以后，即将安放毛泽东主席遗体的水晶棺移入堂内，让广大人民群众瞻仰遗容。

(新华社 1976 年 10 月 8 日讯，载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

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

半个多世纪以来，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在领导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毛主席的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朽文献。出版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一定要严肃认真地抓紧做好。中共中央决定：

（一）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在出版选集的同时，积极地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二）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全集》的工作，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下设一个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负责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具体工作。

（三）毛主席著作的所有原件，由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收集，保存。

中央责成各级党委将本地区、本单位保存的毛主席的一切手稿，包括文章、文件、电报、批示、书信、诗词、题词的原件，以及讲话的原始记录稿，尽快送交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应作出复制件，交提供原件的单位或个人保存。

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并且大力帮助收集毛主席的著作原件。中共中央希望各国马列主义政党、组织和进步团体、友好人士协助做好毛主席著作原件的收集工作。

（新华社1976年10月8日讯，载10月9日《人民日报》）

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在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决心继承毛主席遗志，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的时候，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了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中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这两项重要决定，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毛主席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光辉形象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巨大力量。中央决定在我国首都北京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让世世代代人民群众能够亲眼瞻仰毛主席的遗容，缅怀毛主席的丰功伟绩，重温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的革命斗志，这是八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也是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心愿。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在领导我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在各个方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主席的著作，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这对于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继承毛主席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是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我们一定要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掀起一个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的自觉性，坚持反修防修，把各项社会主义事业做得更好。

毛泽东思想是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同党内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要深刻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当前，我们要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习毛主席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学习毛主席“**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同一切违背这三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的党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久经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烈火锻炼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历史的经验证明，要搞垮我们的党是不容易的。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我们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

现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通知你们。

一、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罪行极为严重。

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

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宗派活动。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帮”背着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见毛主席、告周恩来总理的状，妄图利用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组织他们的“内阁”，遭到毛主席的痛斥。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在中央发出一号文件的同一天，张春桥亲笔写了一个《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有感》，疯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

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他们对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不满，妄图取而代之。

他们大搞阴谋诡计，私立秘密联络点，私整中央负责同志的黑"材料"，到处插手，煽风点火，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在宣传报导中，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为他们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在同某外国作家进行的几十小时的谈话中，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

他们动不动就训人，给人戴大帽子，捏造罪名，陷害同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王、张、江、姚以为时机已到，无所顾忌，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加紧秘密串连，阴谋策划。他们四出游说，标榜自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自封为"无产阶级钢铁公司"，提出蛊惑人心的口号，公然煽动反对党中央。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在九月十六日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并连篇累牍地加以宣扬。十月二日，华国锋同志在一个文件上的批示中指出，毛主席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亲笔写的指示是"**照过去方针办**"，"按既定方针办"六个字错了三个，戳穿了他们的伪造。十月四日，他们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用"梁效"名义写的《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的反党文章，肆意攻击党中央。文章说："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这就清楚地表明，他们加快了步伐，要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为了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十月六日，中央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

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进行了多次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改悔。

一九七四年一月，他们背着毛主席，也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林批孔又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批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十日，毛主席在答复江青的信中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又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毛主席两次讲："**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

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一九七四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江青托人向毛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又说：“**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指示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但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却违背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教导，公然篡改毛主席的指示，把经验主义作为当前的主要危险，大做文章。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大讲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并且要把它“当作纲，联系我们军队存在的这些问题来学习”。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新华社《关于报导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批判了他们的错误，指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

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他们只反经验主义、不反教条主义。毛主席说：“**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教育界、科学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主席强调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在反复讲了“三要三不要”之后，毛主席说：“**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九大、十大都讲过三条，这三条要大家再议一下。**”“**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不作自我批评不好，要人家作，自己不作。**”“**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用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是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

对待毛主席、党中央的批评教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当着毛主席的面，他们表示“按照主席的指示办”，背着毛主席，他们仍然抱成一团，继续搞他们的“四人帮”。他们不仅不作自我批评，毫无悔过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终于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堕落成为阴谋家、野心家的反党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中一些人的历史，也是极为可疑的。

有关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中央将陆续印发。

三、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对于我党今后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证明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他们妄图分裂我们党，只不过是痴心妄想。

中共中央号召，在这场关系到我党变不变修，国家变不变色的伟大斗争中，全党同志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提高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四、在揭发和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中，要注意政策。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要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对犯错误的人，要区别对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只有极少数人是跟着“四人帮”干坏事，陷得很深的。要允许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改了就好。不要揪住不放，不要纠缠历史的旧账，不要一棍子打死。中央热烈希望，跟随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犯了错误、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尽快觉悟过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划清界限，揭发他们的罪行，转变自己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在斗争中，要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保护符合毛主席关于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那些态度不端正的同志，要进行教育。

五、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一律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进行。要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对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等，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对反革命，对打砸抢者，要实行镇压。要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采取有力的措施消除资产阶级派性。不准串连。不准成立任何形式的战斗队。

六、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关心群众生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努力把各个方面的工作做好，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此件发至县团级，传达到全体党员，有关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罪行材料，应妥送中央。传达后有何反映，望及时报告中央。

向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猛烈开火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文汇报》编辑部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发表以来，上海一千万军民热烈欢呼、坚决拥护，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愤怒声讨那些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的反革命罪行。**"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战争的熊熊烈火，烧掉了他们一张又一张的"虎皮"，把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大快人心！

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反党篡权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比谁都响，其实是一伙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地地道道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叛徒。他们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制定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他们自有一伙，狼狈为奸，结成一帮，另搞一套，打击别人，以显其"正确"。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制造谣言，欺骗群众，突出地宣扬他们自己。他们当面是人，背后是鬼，两面三刀，祸国殃民，从"内里蛀空"革命事业。真是机关算尽，坏事做绝。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假如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党就要变修，我们的国家就要变色。但是，那些搞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阴谋家、野心家，人心丧尽，极为虚弱，极为孤立，一当他们的阴谋被揭露之后，就迅速变成了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我们要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一切行动听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坚持以级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动员起来，向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猛烈地开火。我们要彻底揭露和批判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反党篡权的人的反革命罪行，一定要把他们揭深揭透，批倒批臭。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伟大斗争中，我们要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造谣惑众，破坏捣乱。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很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决不辜负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对上海人民的热情关怀和殷切期望。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那些反党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彻底垮台了，好得很。历史的潮流是不能阻挡的。清除了这些钻进革命阵营中的"蛀虫"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洪流，将更加汹涌澎湃地朝前发展。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们的党是大有希望的，我们的人民更加朝气蓬勃，我们的军队更加斗志昂扬，我们的国家巍然屹立

在世界的东方。

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奋勇前进！

上海人民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反党篡权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上海人民愤怒声讨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反党篡权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其势如长空呼啸的狂飚，大海奔腾的怒涛，席卷浦江两岸。昨天下午，本市工人阶级和各界革命群众代表一百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坚决拥护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热烈欢呼中央两项英明决定，愤怒声讨和揭发批判那些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反党篡权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到会代表重温了毛主席关于“**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教导，愤怒地指出：那些篡改毛主席指示，违背“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的人，就是分裂党、搞行帮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就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誓同他们斗到底！

昨天，人民广场一片沸腾。上午十一时许，各界群众代表就怀着对反党篡权的走资派的无比愤慨，列成队伍，开着宣传车，高举战旗、标语牌，象无数股洪流涌进广场，旗海翻涌，如怒涛滚滚；口号震天，似重炮排排，显示出向反党篡权的走资派展开猛烈反击的强大阵容！

会上，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海机床厂、共青团上海市委、市委办公室招待处等单位的工人、机关工作人员代表发了言。在他们发言时，全场不断高呼口号：“热烈欢呼、坚决拥护中央两项英明决定！”“一切行动听从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彻底清算那些反党篡权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工人代表在发言中从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上，揭露了那些阴谋篡党夺权的走资派的反革命罪行。他们愤怒地指出，这些搞修正主义、反党篡权的人，窃取“左派”名声，以“一贯正确”自居，不惜采取一切卑劣手段，搞行帮，分裂党、吹吹拍拍，安插亲信，打击革命派，已经变成吸工人血的党内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状态之中，这些人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凶恶的敌人。

机关革命群众代表在声讨反党篡权的走资派反革命罪行的同时，还对他们的反革命手法作了充分揭露，提出，这些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要反党篡权，使用的一个阴险恶毒的反革命手法就是：利用手中窃取的一部分权力，疯狂地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他们乔装打扮，伪装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唱得比谁都响，实际上是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骗子，尽管他们靠这点骗术能在党内混上八年、十年，甚至更长一些时间，但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会上发言的代表严正指出：违背“三要三不要”原则，反党篡权的人，是不得人心的！因

为他们代表的是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阶级，维护的是狭隘宗派集团的私利。他们手里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在人民群众中非常孤立。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起来，上海人民一起来，那些篡改毛主席指示、反党篡权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就迅速垮台了！

气壮山河的发言，铁一般事实的揭露，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那些反党篡权的党内资产阶级的威风，全场人心大快！到会群众不时振臂高呼口号，充分显示了上海市广大人民群众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对那些反党篡权的走资派展开猛烈反击的战斗激情。到会革命群众一致表示，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决反对任何违背三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和行动，誓同那些反党篡权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作拚死的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会后，还分头上街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原载 1976 年 10 月 21 日《文汇报》)

北京、上海广大军民连日举行
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

首　　都

二十一日，首都一百五十万军民欢欣鼓舞，豪情满怀，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欢呼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首都全城当天到处充满了团结、战斗、胜利的革命气氛。从清晨开始，一队又一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民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红卫兵、街道居民和各界人民群众，由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带队，抬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画像，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兴高采烈、斗志昂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十里长安大街上，欢庆胜利的人群如汹涌的潮水；雄伟的天安门广场，红旗如林，歌声震天，万众欢腾，锣鼓声、鞭炮声和激昂的口号声响成一片。游行群众高举的横幅大标语上写着："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广大工农兵群众在天安门前仰望城楼红墙中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心潮澎湃，同声欢呼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决策已得到迅速实现。他们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这一大喜事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党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我们对以华

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完全信赖，坚决拥护。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中共中央各直属单位，国家机关各部门、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北京市党政机关，以及首都钢铁公司、北京矿务局、北京铁路分局毛泽东号机车组、北京石油化工总厂、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工厂、北京新华印刷厂、京郊芦沟桥人民公社、四季青人民公社、北京市百货大楼、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干部、群众都兴高采烈地参加了今天的游行。广大游行群众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广大群众指出，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广大军民纷纷谴责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伙阴谋家、野心家进行反党篡权的阴谋活动，指出他们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

参加游行的首都广大工农兵群众说，"四人帮"的罪恶活动，我们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头。如果他们的复辟阴谋得逞，我们广大劳动人民就要受二遍苦。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除了四害，真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人们不断高呼："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英雄的人民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北京部队、北京卫戍区指战员和首都工人民兵，结成浩浩荡荡的队伍，高呼口号，威武雄壮地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人们的热烈欢呼。广大指战员激动地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人民武装，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四人帮"反党集团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感到无比愤怒。我们坚决拥护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四人帮"采取的果断措施，一定要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我们要永远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英勇战斗！

首都人民的盛大庆祝游行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夜晚。入夜，天安门广场和各高大建筑物上，华灯齐放，辉耀全城。首都八百万人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欢乐中。

(新华社 1976 年 10 月 21 日讯，载 10 月 22 日《人民日报》)

首都军民二十二日继续举行盛大庆祝游行。喜气洋洋的群众冒雨上街，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两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已超过三百三十万人。

首都北京象欢度盛大节日一样，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天安门城楼上，红灯高挂，红

旗飘扬。大街小巷里，欢声四起，震天动地。扩音器里不断播送着革命歌曲。中央和北京市的各级党政军机关以及工农兵学商各界人民群众的游行队伍，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涌向天安门广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振臂高呼："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交织一片，从早到晚响彻首都的上空。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两件特大喜讯，使首都八百万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心花怒放，笑逐颜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刚下夜班的工人和从远郊区赶来的人民公社社员，有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也有受到文化大革命锻炼的革命小将，还有载歌载舞的文艺工作者。北郊木材厂、北京针织总厂、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工厂和北京化工三厂的职工们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燃放鞭炮，热烈欢呼。他们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实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的英明安排，这是全国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坚决拥护。我们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同"四人帮"进行斗争，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京郊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海淀区东升人民公社的广大社员，昨天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了庆祝游行，今天，上千名社员又欢欣鼓舞地列队来到天安门广场，他们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坚强的领导核心。有这样的党中央，我们的党就更加团结和兴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就会更加繁荣富强，我国人民对未来更加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出版印刷部门的广大干部和群众，欢庆胜利，干劲倍增，决心做好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准备工作，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做出新贡献。参加游行的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新华印刷厂的职工们高兴地说，他们连日奋战，赶印了华国锋主席的像，以实际行动表达出版、印刷、发行工作者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拥护和信赖。北京京剧团、中国歌舞团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有的挥动彩旗，有的扭起秧歌，尽情表达胜利的欢乐。

欢庆胜利的游行大军，对"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的罪行感到无比愤怒，对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感到无比高兴。他们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四人帮"挖了出来，把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真是大快人心。这是我们党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伟大胜利。

中央民族学院四十多个民族的师生员工，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挥动彩绸，跳起民族舞，弹起热瓦甫，热情歌颂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歌颂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他们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各族人民心连心，为我们除了"四害"，我们打心眼里高兴，我们要放声歌唱！

在西城区二龙路街道数千名居民的游行队伍中，一些五、六十岁的老太太兴高采烈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有的蹬着放有大鼓的三轮车，有的擂动大鼓，高呼口号前进。她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旧社会是童养媳和使唤丫头。她们说，如果"四人帮"的阴谋得逞，我们就要重过旧社会的牛马生活。党中央挖出了"四人帮"，除了这些害人虫，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东城区南池子小学一百多名红小兵挥动着手中的彩旗、举起小拳头高呼："打倒'四人帮'大坏蛋！"孩子们说：""四人帮"想让我们再过爷爷奶奶那样的苦日子，我们红小兵坚决不答应！

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指战员、人民警察和工人民兵队伍，排着整齐的队列通过天安门广场。八三四一部队的指战员簇拥着毛主席画像，迈着坚定整齐的步伐前进。他们手持钢枪，

刺刀闪亮，表达誓死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决心。曾经警卫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北京卫戍区某部一连的指战员们，这几天重温了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更加斗志昂扬。他们激动地表示，坚决响应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斗争到底。他们游行归来，回到营地，立即写批判"四人帮"的大字报、黑板报和墙报。首都工人民兵高举着毛主席亲笔题写的"首都民兵师"的大旗，浩浩荡荡地通过天安门广场。解放军战士、人民警察和工人民兵们一致表示，一切行动听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实际行动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在举行庆祝游行同时，首都各工厂、人民公社、部队、商店、学校、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部门以及街道等基层单位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还纷纷举行庆祝会、声讨会。远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也就地举行了隆重的集会和游行。广大干部信心百倍，斗志昂扬。他们坚决表示，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发展大好革命形势。

胜利的锣鼓，欢乐的气氛，激动着人们的心。为伟大的胜利所鼓舞的首都广大人民，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乘胜前进，争取更大胜利！

(新华社 1976 年 10 月 22 日讯，载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

首都军民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二十三日达到了高潮，三天来参加游行的群众已达五百八十万人。满怀胜利喜悦的广大军民，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当天天刚亮，游行队伍的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就响遍全城。一队队的工人、人民公社社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革命知识分子、街道居民、红卫兵、红小兵，以及各界人民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台湾省籍同胞，源源不断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全天共达二百五十万人。他们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和华国锋主席的画像，高举红旗和彩旗，不断振臂高呼："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扩音器里不断播送着《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大海航行靠舵手》、《歌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歌唱祖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歌曲。整个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上，成了欢乐的海洋。

北京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今天高擎红旗，抬着横幅大标语，顶着大风阔步前进。三天来，这个厂共有五千七百多名职工参加了游行。许多工人白天参加游行，晚上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全国电力工业系统和北京市"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北京石景山发电厂的三千多名职工，在厂里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集会后，又从三十多里外的郊区赶到天安门广场游行。首都钢铁公司的十万钢铁工人，这几天接连召开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声讨会，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愤怒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北京钢厂超额完成夜班生产计划的炼钢工人，今天一大早又身穿工作服，高举红旗，擂响战鼓，赶到天安门前游行。参加游行的工人们高兴地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我们

党挖出了“四人帮”反党集团，这是圆满完成毛主席生前英明决策的两件特大喜事，完全表达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它充分说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全国人民心连心。全国人民有了这样坚强的领导核心，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一定会更加团结一致，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乘胜前进。连日来，在欢庆胜利的同时，首都钢铁、煤炭、交通运输等各条战线不断传来胜利的捷报。连续一百零六个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木城涧煤矿的工人们，在井上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在井下大干社会主义，三天来为国家多生产了九百多吨煤炭。北京第二棉纺织厂最近五天分别超额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四完成棉纱和棉布的生产计划。

在首都郊区，从长城内外到永定河畔，连日来红旗飘扬，锣鼓震天；欢庆胜利的大字标语，贴满了社社队队，到处举行集会和庆祝游行。朝阳、海淀、丰台三个区的东北旺、来广营、王佐等公社的贫下中农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公社领导干部带领下，今天一大早就簇拥着毛主席的画像，高举写有“农业学大寨”的红旗，来到天安门广场，热烈欢呼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他们说，挖出“四人帮”，人民喜洋洋；除掉“四大害”，群众齐称快。“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党中央对他们采取了果断措施，我们贫下中农从心眼里高兴。这些天来，郊区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每天早出工，晚收工，搞好小麦和大白菜的管理，抓紧时机打井积肥，平整土地，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努力为明年夺取更大丰收创造条件。

科学技术工作者、革命师生、医务人员、文化艺术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们，在游行中挥动彩旗，不断高呼打倒“四人帮”的口号。他们表示，一定要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搞好教育革命、科技革命、卫生革命、文艺革命，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由东城区几千名红卫兵组成的舞蹈大队，人人手拿花环和彩色气球，一边跳舞一边前进。他们说，我们红卫兵小将一定要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香厂路小学的红小兵参加游行回到学校后，立即出板报、写儿歌，投入批判“四人帮”的战斗。他们写道：革命战旗迎风扬，特大喜讯传四方，革命人民心激荡，挖出反党“四人帮”。红小兵，斗志昂，挥起铁笔上战场，愤怒声讨野心狼，誓死保卫党中央。

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老中青领导干部，游行中走在各单位队伍的前列。许多两鬓斑白的老干部，回忆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战胜历次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历史，欢庆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更加豪情满怀。他们表示，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彻底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罪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北京部队和八三四一部队指战员继续参加今天的游行。北京卫戍区部队上午举行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和声讨大会。会后，指战员们抬着“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的大字横幅，气势磅礴地进行游行。十万首都工人民兵的游行大军特别壮观。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后面，十五名英姿飒爽的女民兵簇拥着“首都民兵师”的大旗，几十个戴有“首都工人民兵”证章的小伙子在五辆高大彩车上同时擂动大鼓，几百面红旗迎风飘扬。他们表示，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坚决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

浩浩荡荡的庆祝游行一直持续到夜晚。参加游行的首都军民坚定地表示，一定要最紧密

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新华社 1976 年 10 月 23 日讯，载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

上　　海

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这两件特大喜讯传到上海，全市群情振奋，一片欢腾。连日来，上海市区和郊区有四百多万军民走上街头，举行空前规模的庆祝集会和游行，表达了上海一千万军民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信赖和坚决拥护，显示了全市军民誓同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钢铁意志和坚强决心。

上海街头的群众游行活动连日不绝，规模一天比一天大，二十二日达到了高潮。从东海之滨到淀山湖畔，从长江口到金山湾，一百五十万群众浩浩荡荡地举行盛大游行，沿途红旗招展，鼓乐齐鸣，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鞭炮声、锣鼓声传遍浦江两岸。《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的雄壮歌声，激荡在整个城市上空。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一带张灯结彩。许多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长达数十米的巨幅标语，上面写着：“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南京路上的几百家商店，张贴着鲜艳夺目的大红喜报。许多工厂、人民公社、部队、学校、商店、机关、街道写给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致敬信和决心书，纷纷飞向北京。

当天从清晨到深夜，千千万万的工农兵和各界群众，由各级领导干部带队，抬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手持花束和彩带，举着火炬，载歌载舞，纵情欢呼。聚集在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喜气洋洋，热烈地向游行队伍鼓掌致意。

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广大产业工人，斗志昂扬地走上街头。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前时，工人们缅怀毛主席亲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心潮澎湃，激动地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这一伟大胜利，将永远记载在我们党的光辉史册上。它充分证明我们党的伟大、光荣、正确，显示我们党更加团结一致，朝气蓬勃，富有战斗力。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忠实地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和全国人民心连心。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毛主席亲临视察过的上钢一厂、上海机床厂、上海电机厂、江南造船厂、上棉一厂、上棉三十二厂等工厂的工人们，纵情欢呼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他们说，揭出“四人帮”反党集团，又一次证明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四人帮”反党集团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修正主义上台，法西斯上台，资本主义复辟，我们的党就要变修，国家就要变色，人民就要遭

殃，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我们挖掉了这颗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清除了一大隐患，大快人心，大得人心！上钢三厂、上钢五厂、沪东造船厂、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上海钟表元件厂、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上海一O一厂、上港三区、上棉十七厂、大众制药厂、照相机三厂、群众印刷厂、上海第一百货商店、上海星火日夜食品商店等单位参加游行的工人理论骨干说，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战无不胜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面前，他们原形毕露、终于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上海郊区的贫下中农和下乡知识青年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游行。在绿树环绕的村头，在稻谷飘香的田间，人们兴高采烈，欢呼胜利。宝山县吴淞公社陈巷大队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激动地说："四人帮"是我伲贫下中农最凶恶的敌人。我伲贫下中农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踢开绊脚石，打烂"四人帮"，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川沙县江镇公社的赤脚医生，今天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参加了庆祝游行。他们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喜事，我们坚决拥护。我们是毛主席支持的赤脚医生，如果"四人帮"反党集团的阴谋得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就会丧失，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就要受到摧残。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真是大快人心。

当威武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和驻沪的海军、空军游行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出现在欢腾的南京路上时，群情更加激昂，欢呼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呈现出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战斗的动人场面。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表彰的"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指战员，精神抖擞地走在队伍的前面。毛主席亲临视察过的驻沪海军某部"长江舰"、"洛阳舰"，曾三次接受毛主席检阅的空军某部三营以及某飞行部队"一等功臣团"的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唱着战歌行进。广大指战员一致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伟大胜利。他们愤怒谴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坚定地表示，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随时准备歼灭一切入侵之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上海各高等院校和中小学的广大师生员工，以及科技、卫生、文化、电影、出版、体育等战线的干部、群众，今天满怀胜利的喜悦参加游行。有的单位组织了乐队，奏起欢乐的乐曲；有的少数民族学员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载歌载舞，纵情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纵情欢呼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广大工农兵学员兴奋地说，清除"四人帮"，我党更坚强。我们一定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作坚决的斗争，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几天来，英雄的上海一直洋溢着团结战斗的革命气氛。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深入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

（新华社上海 1976 年 10 月 22 日电，载 10 月 23 日《人民日报》）

全国各省、自治区军民连日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们伟大祖国普天同庆，一片欢腾。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普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呼我们党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祖国各地到处洋溢着团结、战斗、胜利的革命气氛。

关系着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两件振奋人心的特大喜讯传到各地以后，五洲四海齐欢唱，八亿神州笑颜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立即沸腾起来。在我国中原和南方地区，人们满怀胜利的喜悦和战斗的豪情，冒着大雨举行庆祝游行。在乌鲁木齐、西宁和甘肃嘉峪关内外，人们在大雪中高歌行进。航行在远离祖国的三大洋和地中海上的我国许多远洋轮船，船员们听到喜讯后，升起满旗，举着红旗，在汽笛声中聚集在甲板上举行集会和游行。

据统计，仅全国三个直辖市、二十一个省会城市、五个自治区首府，几天来参加集会和游行的人数，就达五千万人。全国城乡各族人民对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表示坚决拥护，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表示愤怒声讨。各族人民热烈高呼："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他们说，根据毛主席生前的安排，由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表达了全国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真是大快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在全国各大城市，人们欢庆胜利的大规模游行，盛况空前。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连日来共有六百五十多万人参加了游行。全市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主要街道上高挂着绚丽夺目的彩灯、彩球。游行群众高兴得跳起秧歌舞、狮子舞，管弦乐队高奏《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东方红》等革命歌曲。上海五万造船工人连日来在建造万吨轮的船台上，在焊花飞溅的车间里欢庆胜利，今天他们又斗志昂扬地举行了游行。鲁迅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兴奋地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四人帮"挖了出来，把受到鲁迅痛斥的化名"狄克"的张春桥这条长期隐伏的"蛀虫"挖了出来，使他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照妖镜下显出了原形，真是大快人心。在天津市，三天来有四百五十多万军民举行了游行和集会。各单位的群众把对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限信赖和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无比仇恨，化为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巨大动力，各条战线出现了空前未

有的大好形势。沈阳市广大群众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庆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几天来全市有三百多万人参加了游行。广大工农兵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痛斥他们是反革命的两面派，是搞修正主义的头子，是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叛徒。他们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我们热烈欢呼这一伟大胜利。广州市从青翠的越秀山麓到奔腾的珠江两岸，这几天到处充满着团结战斗、欢庆胜利的革命气氛。有四百多万军民冒雨举行游行。广大群众表示，一定要一切行动听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挥，彻底清算“四人帮”的滔天罪行。这几天武汉地区有二百五十万军民举行庆祝游行。沸腾的武钢到处是一派节日景象。钢铁工人用抓革命、促生产的实际行动欢庆双喜临门，钢铁产量日日上升。成都、重庆两市连日来各有一百多万人举行庆祝游行。成都市新都机械厂两万多名职工和家属，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畅谈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我们除了“四害”，解了心头之恨，真是天大的好事。西安市这几天参加游行的工农兵群众有一百五十多万人。西安地区纺织、钢铁、电力、建筑等上百个厂矿企业的工人，下班后就从四面八方走上街头，工人们高呼：“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等口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兵种领导机关和所属部队，以及北京、沈阳、广州、南京、济南、武汉、福州、新疆、兰州、成都、昆明等部队的指战员，和驻地群众一起游行，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在祖国的千里海疆，万里边防线上，在空军机场、海军码头以及各部队营区，欢庆胜利的锣鼓声、口号声，每天从清晨响到夜晚。在南海前哨的榆林港，海军战士和渔民一起庆祝胜利。他们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我们坚决拥护；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我们万分开心；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我们充满了信心。空军某部“航空兵英雄中队”的飞行员们，最近两天在营区附近冒雨游行。他们表示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指挥，坚决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一切战斗任务。南京部队某部“临汾旅”的指战员说，“四人帮”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极端仇恨人民军队，对他们的罪行，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驻守在雪山草地巴西地区的成都部队某部骑兵三连的干部、战士，在当年党中央举行巴西会议的旧址，缅怀伟大领袖毛主席同张国焘作斗争的革命实践。指战员们指出，“四人帮”同张国焘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一样，都是搞篡党夺权的大野心家、阴谋家，但是，他们决然逃脱不了可耻的下场。我们要努力学习，努力作战，彻底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而英勇战斗。

在石家庄、太原、哈尔滨、长春、兰州、银川、济南、南京、杭州、南昌、福州、合肥、郑州、长沙、贵阳等城市，人们都举行了盛大集会和游行。南京市的工农兵群众愤怒声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时说，“四人帮”反党集团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除了“四害”，拔掉了祸根，我们打心眼里高兴，打心眼里拥护。在郑州，一些参加过“二七”大罢工的老工人冒雨参加了庆祝游行。他们说，我

们要发扬“二七”革命精神，以“三要三不要”基本原则为锐利武器，彻底揭露“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在煤都抚顺，矿工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了夺煤大战，天天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西露天矿已经在十月二十一日提前十天完成了十月份原煤生产计划。

喜讯传到大庆油田，辽阔的矿区一片欢腾。连日来，在炼塔下，在钻机旁，在星罗棋布的井场上和一座座工农村里，欢庆胜利的人群络绎不绝，全油田有四十五万人举行了庆祝游行。职工们兴奋地说，两件大喜事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气焰。我们一定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前列。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贫下中农和社员听到两大喜讯后，乐得心里开了花。他们说，这两大胜利，对我们今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都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大寨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辽阔的边疆连着祖国的首都，各族人民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心连心。全国各少数民族人民穿着节日盛装，跳起欢乐的民族舞蹈，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高原古城拉萨连续几天红旗招展，鼓乐喧天。华国锋主席视察过的拉萨市地毯厂的工人说，我们百万翻身农奴和西藏第一代工人阶级，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把同“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雪后放晴的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冒着寒风，踏着冰雪，高举红旗，川流不息地上街游行。他们说，特大喜讯传边疆，各族人民心花放，团结一致心向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永远前进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在内蒙古自治区，全国牧业学大寨先进单位镶黄旗的牧民，二十二日晚在草原新城镇新宝力格举行了火炬游行。千万把火炬映红了草原的夜空，反映了蒙古族人民群众誓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决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三江侗族自治县，群众举着火把，翻山越岭，冒雨到县城的中心会场和各公社的分会场，参加庆祝集会和游行。他们身着节日盛装，弹起琵琶和三弦，跳起欢乐的民族舞蹈，庆祝胜利。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六盘山区，一些回族老人来到当年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走过的长征路上，回顾我党在毛主席领导下进行举世闻名的长征，把红旗插到六盘山的情景，满怀豪情地说，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我们的党，是任何人也搞不垮的。“四人帮”妄想篡党夺权，只能落得一个可耻的下场。

昆明市的各少数民族人民，载歌载舞地参加了游行。他们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实现了我们边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打烂“四人帮”，各族人民大欢畅。二十二日，古城西宁从清晨开始，各族群众和干部就抬着毛主席像，浩浩荡荡地汇集到市区举行庆祝游行。千万面红旗辉映着胜利的笑脸，千万颗红心发出了同一个战斗的声音：“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居住在福建、广东等地的台湾省籍高山族同胞，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了庆祝游行。

喜讯传到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广大群众欢欣鼓舞。在韶山，这几天有四万多人冒雨举行庆祝集会和游行。广大群众说，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是毛主席生前的安排，我们坚决拥护。我们坚信，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将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他们表示，一定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发扬韶山人民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把“四人帮”反党集团揭深批透。在历史名城遵义，三十万人冒雨举行庆祝游行。各族群众和老红军战士纷纷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回忆党内

两条路线斗争史，更加激情满怀。他们无限喜悦地说：四十一年前，在毛主席领导下，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今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充分说明，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坚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征途上一定会取得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 1976 年 10 月 23 日讯，载 10 月 24 日《人民日报》)

首都百万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大会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首都一百万军民，十月二十四日欢欣鼓舞，豪情满怀，在雄伟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盛大的庆祝大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广大群众表示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这天，首都北京阳光灿烂，晴空万里。天安门广场装饰一新，分外壮丽。巍峨的城楼上红灯高悬，红旗飘扬。中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巨幅画像端挂在城楼的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东西两侧。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竖立着两条醒目的巨幅标语：“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出席了大会。当华国锋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声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城楼上下，广场内外，一片欢腾，欢呼声、口号声、锣鼓声响彻云霄，最生动地表达了全党三千万共产党员、全国八亿人民对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的衷心拥护和完全信赖，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光辉灿烂的共产主义前途充满信心。华国锋主席身着绿军装，高兴地频频向百万群众亲切招手致意。

出席大会的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是：叶剑英、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吴德、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陈永贵、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也出席了大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以华国锋主席为首

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大快人心的特大喜讯，使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英雄的首都人民今天一早就兴高采烈地从工厂、矿山、郊区人民公社、部队营房、机关、商店、学校和居民区，涌上街头。城郊的公路上，无尽的车队，满载着参加大会的群众驶向市区。他们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高举着华国锋主席的画像，高举着红旗、彩旗和标语牌，满怀胜利的喜悦，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从四面八方潮水般地涌向东西长安街，涌向天安门广场。整个广场和东西十里长安街上，红旗如林，人山人海，排满欢庆胜利的群众队伍。他们当中有英雄的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和首都工人民兵，有身穿工作服的钢铁、煤炭、纺织等各个行业的工人，有郊区人民公社社员，有中央和北京市机关干部，有大专院校的革命师生，有中、小学的红卫兵、红小兵，有街道居民。广场上群情振奋，万众欢腾。“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打倒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成果！”“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些表达亿万人民共同心声的激昂口号，如滚滚春雷，震天动地。

下午三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倪志福宣布大会开始。广场上锣鼓齐鸣，军乐队高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东方红》乐曲。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他说，我们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毛主席逝世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揭露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航向胜利前进。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吴德同志说，一个半月前，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沉浸在极其悲痛之中，都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心着我党中央能不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也关心着这个问题。这种担心和关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在我国的上空，确实是出现过一股乌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乘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之机，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家变色的现实危险。我们党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吴德同志在讲话中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他们大搞阴谋诡计，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

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吴德同志指出，他们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投降帝国主义。他们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

吴德同志说，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及时而坚决地揭露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证明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吴德同志最后说，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彻底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吴德同志的讲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雷鸣般的热烈掌声。

"毛泽东号"机车组司机长陈福汉、平谷县许家务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贾怀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英雄徐恒禄、清华附中红卫兵张红，分别代表首都工人、贫下中农、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红卫兵小将接着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衷心地、热烈地、坚决地拥护华国锋同志任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衷心地、热烈地、坚决地拥护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他们说，华国锋同志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完全信任、热烈拥护和衷心爱戴。我们坚信，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能够战胜任何惊涛骇浪，克服一切艰难险阻，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继续胜利前进!他们揭露"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愤怒声讨"四人帮"的反党罪行。

陈福汉同志在讲话中说，王张江姚"四人帮"是反革命阴谋家、两面派，他们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大搞修正主义。他们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另搞一套，宣扬他们自己。实际上，他们真比资本家还厉害，是不折不扣的吸我们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前对王张江姚"四人帮"多次进行批评教育，可是他们毫不悔改。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认为时机已到，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他们别有用心地伪造毛主席的所谓临终嘱咐，妄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陈福汉说，我们首都工人阶级有和修正主义坚决斗的革命传统，有同党内资产阶级战斗到底的英雄气概，有百战百胜的坚定信念。我们决心

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行动听党中央指挥，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进行坚决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以更大的革命干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更好地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贾怀珍同志在讲话中说，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罪恶滔天，我们贫下中农把他们恨透了。他们一不会做工，二不会种地，三不会打仗。专门搞阴谋，耍诡计，玩权术，放暗箭；舞文弄墨，招摇撞骗，颠倒是非，制造谣言；煽风点火，兴风作浪；为所欲为，称王称霸。他们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这些受尽剥削压迫的奴隶，最懂得社会主义好；饱尝旧社会苦难的翻身农民，最知道新社会的甜。王张江姚"四人帮"梦想把我们拉回到旧社会，叫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广大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贾怀珍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我们贫下中农心连心。我们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更好地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进一步发展农村大好形势，巩固农村社会主义阵地，对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徐恒禄同志在讲话中说，王张江姚这一小撮，是极端阴险狠毒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他们大耍阴谋诡计，疯狂反对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大搞篡党夺权活动。他们拼命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建军路线，竭力贬低、诋毁、诬蔑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否定我军的革命传统，破坏军队建设和民兵建设，破坏军内外团结，妄图把军队搞乱，毁我长城。徐恒禄说，我们向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表示我们的坚强决心：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切听从党中央的指挥，党中央指向那里，我们就打到那里，用鲜血和生命保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们一定坚持毛主席的建军路线，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加强军队建设和民兵建设，加强军政训练，加强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军政团结，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张红同志在讲话中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十年前，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当红卫兵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笔写信热烈支持红卫兵，赞扬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十年来，毛主席的教导象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着我们红卫兵前进的航程，一直鼓舞着我们同修正主义斗，同资产阶级斗，同党内的走资派斗。我们决心继续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四人帮"反党集团猛烈开火，把他们这些害人虫扫除干净。张红说，我们一定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努力按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去做，接好革命班。坚持上山下乡，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相结合的金光大道，用我们的进军步伐踏碎帝、修，反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

工农兵和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受到热烈鼓掌欢迎。讲话以后，全场高呼口号。

下午四时二十分，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大会胜利结束。华国锋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走到城楼东西两端，向广场上的群众再一次亲切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锣鼓齐鸣，百万群众挥动彩旗，欢呼跳跃，呈现出一派团结、战斗、胜利的欢乐气氛。

出席大会的还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北京部队和北京卫戍区的负责人，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爱国人士和在京的台湾同胞。在京的外国同志和朋友也参加了大会。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举国欢庆的大喜日子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中国人民，决心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争取更大的胜利。

（新华社1976年10月24日讯，载10月25日《人民日报》）

吴德在首都庆祝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首都党政军机关、工农兵以及各界群众的代表，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庆祝大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我们党取得了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几天来，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感到由衷的高兴，全国一片欢腾。亿万人民群众，纷纷走上街头，热烈庆祝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所取得的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一个半月前，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沉浸在极其悲痛之中，都担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担心着我党中央能不能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也关心着这个问题。这种担心和关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在我国的上空，确实是出现过一股乌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乘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之机，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家变色的现实危险。我们党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刻。经过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我们党胜利了，无产阶级胜利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表达了毛主席对华国锋同志的无限信任。毛主席逝世以后，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果断的措施，揭露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使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能够继续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航向胜利前进。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热烈拥护。斗争的实践证明，毛主席生前的决策是何等英明。毛主席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

我们热烈欢呼我们党战胜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

的宗派活动。他们大搞阴谋诡计，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路线的实质，就是根本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国内，篡改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在国际，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投降帝国主义。毛主席曾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所作所为，证明他们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妄图分裂我们党，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他们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及时而坚决地揭露了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证明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反对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我们坚持毛主席制定的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对于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团结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革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进行反对帝、修、反，特别是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彻底揭发批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发展大好形势。尽管在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困难和曲折，但是，我们坚信，前途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能够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

（新华社 1976 年 10 月 24 日讯，载 10 月 25 日《人民日报》）

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

万里河山红旗展，八亿神州尽开颜。全国各地亿万人民连日举行盛大游行，首都北京百万军民昨天隆重集会，热烈庆祝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热烈庆祝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愤怒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华国锋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九七六年四月，毛主席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四月三十日，毛主席又给华国锋同志亲笔写了"**你办事，我放心**"。按照毛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作出关于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这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是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喜事。毛主席无限信任、全国人民衷心爱戴的华国锋同志作我们党的领袖，使我们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胜利前进，有了可靠的掌舵人。

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复辟的阴谋，为我党消除了一大祸害。王张江姚结成"四人帮"，进行分裂党的宗派活动，由来已久。伟大领袖毛主席早有察觉，一再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教育，并对解决他们的问题有所部署。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七日，毛主席批评王张江姚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批评他们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同年十一、十二月，在中央准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申"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警告他们说："**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呢？**"同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对待毛主席的批评教育，"四人帮"采取阳奉阴违的反革命两面派态度，不仅毫无悔过之意，反而变本加厉，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他们更加猖狂地向党进攻，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使我们面临着党变修、国变色的严重危险。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恶极大。他们完全背叛毛主席谆谆教导的"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肆意篡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在国内国际一系列问题上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他们进行分裂

党的罪恶活动，抱成一团，另搞一套，在党内自成体系，为所欲为，称王称霸，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到处插手，煽风点火，干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战略部署，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他们颠倒是非，制造谣言，大造反革命舆论，捏造罪名、乱扣帽子，企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崇洋媚外，里通外国，出卖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大搞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他们采取种种手法，搞的是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一条极右的路线。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是一伙资产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四人帮"结党营私，篡党夺权，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中国人民将陷于严重的灾难之中。粉碎这个反党集团，为党锄奸，为国除害，为民平愤，党心大快，军心大快，民心大快。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对于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都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一九七一年毛主席指出："**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

毛主席总结了我们党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这是我们区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是我们识别党内资产阶级的锐利武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证明，坚持"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我们党就能步调一致，就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兴旺发达。谁要是违背"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就是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背离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必然不得人心，身败名裂。过去，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十次搞分裂，十次都失败。这次、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人心丧尽，极端孤立，同样遭到可耻下场。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要搞垮我们这个党是不容易的。我们党不愧为毛主席亲自缔造、锻炼和培育的党，不愧为政治上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愧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

在欢呼我们党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的时候，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决心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彻底揭露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深入批判他们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切实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要热情支持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自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大

好形势。

除掉“四害”，我们党更加团结，更加坚强，更加朝气蓬勃，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人民群众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祖国大地到处莺歌燕舞。**“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有这样伟大的党，伟大的军队，伟大的人民，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挡我们胜利前进的步伐。我们一定能够在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按照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推向前进，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宏伟规划，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争取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上海军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同志主持上海市的工作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在上海一千万军民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欢庆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热烈欢庆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篡党夺权阴谋的伟大胜利的大喜日子里，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喜讯传来，上海全城一片欢腾。广大军民奔走相告，坚决拥护，热烈欢呼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衷心欢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来上海主持工作。他们一致表示，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是对上海军民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力量，我们一定要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乘胜前进，坚决地、深入地开展同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斗争，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让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这个英雄城市上空高高飘扬。

二十七日晚上，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同大家见了面。苏振华同志宣读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时全场欢腾，响起了长时间的雷鸣般的掌声。大家高呼“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决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打倒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等口号。苏振华同志接着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说，上海是我们党的诞生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上海掀起了一月风暴。上海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生前对上海十分关心，曾多次亲临上海，作过一系列重要指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的人民，特别是上海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市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市，是全国人民和一千万军民的上海市，是具有光荣

革命斗争传统的英雄城市。"四人帮"反党集团妄图把上海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这只能是痴心妄想。事实证明，上海广大党员、干部、驻沪三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四人帮"的反党阴谋一经揭露，上海全市军民对"四人帮"的满腔仇恨，就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奋起声讨"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四人帮"反党集团只是一小撮，他们罪恶累累，人心丧尽，极为孤立，极为虚弱。

苏振华同志在讲话中对上海全市深入开展同"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作了部署之后指出，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决贯彻执行"**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反党集团。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要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保护符合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项条件的新生力量和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要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对那些态度不够端正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加强党政军民的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同广大干部群众在一起，把上海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决不辜负华国锋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同志说：我们人民军队和广大民兵热烈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一英明决定，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到底。

连日来，黄浦江两岸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全市一千万军民热烈庆祝我们党又有了自己的领袖华国锋主席，热烈庆祝我们党战胜"四人帮"反党集团的伟大胜利，全市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人们敲锣打鼓，鸣放鞭炮，上街举行庆祝游行。据不完全统计，几天来，上海市参加庆祝游行的群众已达七百五十多万人。二十七日晚上，苏振华同志传达的党中央英明决定，迅速地由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广大干部群众，上海军民兴高采烈，纷纷上街游行，张贴大红喜报。座落在外滩的中共上海市委、市革委会大楼门前，来自各条战线的报喜队，一队接着一队，红旗如林，锣鼓喧天，再一次显示了上海军民对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比爱戴、无限信赖的无产阶级感情，显示了他们坚决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到底的坚强决心。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满怀激情地说，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一英明决定，完全符合我们的心愿，我们早就盼望着了。我们一定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服从党中央领导，一切听从党中央指挥，一切按照党中央指示办，继承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掀起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新高潮，彻底揭发批判声讨"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剥去他们的画皮，把他们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新华社讯，载1976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

〔附〕 “四人帮”在上海大量选拔培植亲信
阴谋篡夺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权

长期以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在上海搞了大量阴谋活动，进行组织上的准备。他们大张旗鼓地培植亲信，公开叫嚣要向国务院各部委派部长，要向全国各省派干部，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在上海，“四人帮”和市委中某些人，议论中央这个部不行，那个部也不行。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拚命在中央各部门安插亲信，有的已经安插进去了，有的正准备安插。他们内定了许多亲信到中央各部门去掌权，连王洪文的一些“小兄弟”，人还在上海，就传出某某是中央什么部的部长了。

“四人帮”篡党夺权蓄谋已久，早在党的“十大”召开之前，王洪文、张春桥就多次以上海是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要为党多输送干部的名义，准备夺中央的权。一九七二年上半年，张春桥说，“我们也要培养工人大使，现在的外交人员，到联合国去的人都是知识分子”。根据他的黑“指示”，由当时分管组织工作的金祖敏亲自挂帅，选调了八十名工人，送到复旦大学培训，准备两年后分配到外事和外贸单位“熟悉工作”，一旦“四人帮”篡权后，即派往国外担任大使。一九七二年八月，王洪文提出“要准备一百名干部，随时准备抽调出去。”他到北京工作以后，多次通过金祖敏，布置抓紧进行挑选。一九七三年一月，王洪文迫不及待地指示市委召开全市组织工作会议，各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和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都参加了会议。王洪文也急急忙忙从北京赶往上海，亲自到会上作“指示”，要各级领导抓紧这件事。会后，金祖敏、王日初抽调了大批人力，分赴工厂、农村基层单位进行选拔。到一九七三年四月份，物色了二百余名干部，从中选出一百人，集中在工人文化宫办学习班。

这一百人的名单报送给王洪文，王看后大为不满。因为在当时选调干部时，没有完全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标准去办，这一百人中，没有多少他们“熟悉”的。他们只选定九人当“十大”代表。此后，王洪文多次密电金祖敏，要他寻找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选。他说：“现在我睡不着觉，也不能让你金祖敏睡觉，你必须连夜给我找出人来”。于是，金祖敏找到黄涛(市委常委、王洪文的心腹)密谋，指名把连“十大”代表也不是的祝家耀、周宏宝、汪湘君、张国权、陈佩珍五人，塞进上海参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这五人中，除了陈佩珍同志以外，都为王洪文所熟悉，对其有感情。“十大”以后，王洪文、张春桥得知四届人大即将筹备召开，以为时机已到，就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份，指示王秀珍、金祖敏“选拔一批工人出身的新干部”，准备到中央各部当部长。王洪文强调指出，“十大你们选了一批人结果没有用”；“你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是方向路线性的”，“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张春桥也反复叮嘱：“要吸取十大的教训”，“不要放过当前的时机”。王秀珍、金祖敏秉承他们的黑旨意，为了选派“真正能起作用”的干部，从一九七三年十月起，专门举办了“市委工农兵干部学习班”，进行考察选拔。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秀珍和王日初秘密赴京，借口汇报批林批孔情况，刺探情报、了解气候。王秀珍在京的七天中，多次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谈。王、张、姚对她作了一

系列黑指示。王洪文说："上海要尽快物色二十名年青干部，分别担任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公安部、商业部、建材部、邮电部、中组部、卫生部以及人民日报社的领导工作"。他还具体提出"冯品德可以担任全国海员工会头头"。张春桥生怕错过时机，一再叮嘱："上海市委开个会，抓紧部署"；"还要抓好上层建筑"；姚文元叫嚷"要注意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经过第九、十次路线斗争，有些问题一时解决不了的不要怕，林贼和小林贼，他们是非常关心要害部门的。上海也要抓要害部门，抓好电台、报社、机场、铁路、电厂以及港口等单位。"从这些谈话中可以看出，"四人帮"的野心很大，他们妄图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专政工具到宣传工具，掌握和控制越来越大的权力。他们妄想利用召开四届人大，在中央各部门安插亲信，网罗党羽，为篡党夺权作好组织准备。王秀珍对"四人帮"的黑指示心领神会，三月二十九日回沪后，急急忙忙跑到组织组，大谈特谈"四人帮"的黑指示，强调说："当前最急的问题是干部问题，选择新干部不能再拖了。"她还和组织部门研究了贯彻落实的措施。

一九七四年四月底；市委组织组提出了一个八十八名中央副部长备选名单，报送给在中央学习班的金祖敏。

一九七四年十月，"四人帮"以为篡党夺权时机已经成熟，加紧活动，大打出手。他们一方面背着党中央政治局，私自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妄图搞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篡夺国家最高领导权；一方面加紧在中央各部安插亲信，准备组织他们的"内阁"。这时，王洪文指示王日初："要准备把在上海的中委都调出来"，"上海还要抓紧培养一批人"。市委某些领导人闻风而动，坚决贯彻，先后提金祖敏、周宏宝、张国权、王乐亭、吴玉琴等派送中央有关部门。与此同时，王秀珍、金祖敏、黄涛、王日初等加紧活动，搞出一个二十一名部长备选对象名单，印出材料，供市委选定。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张敬标、黄涛、王日初等六人，在锦江饭店神秘讨论，逐个研究，正式圈定十六名，连同材料报送北京。

据王日初交代，他们还内定了这十六人要去的中央部门：陈佩珍去商业部，冯品德去全国海员工会工作，万桂红去中组部，杨佩莲去团中央，秦宝芝去建材部，王乐亭去邮电部，沈鸿去文化部，吕广杰、姚福根去六机部，陈杏全去冶金部，张国富去水电部，张秀清去文化部，汤凯臣去轻工部，周宏宝去人民日报社，朱栋去交通部，王桂珍去卫生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痛斥了王洪文诬告周总理，粉碎了"四人帮"组阁的阴谋。"四人帮"气急败坏，暂时收起组阁名单。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开展后，"四人帮"认为时机又到，"组阁"活动又死灰复燃。王洪文说："要注意发展一些骨干"，"要锻炼一支反潮流的干部队伍"。张春桥说，"形势发展很快，你们（指上海市委）要跟上。"在一阵紧锣密鼓后，王秀珍粉墨登场。她一方面布置收集整理几位副总理的讲话材料，印发给群众，组织批判，妄图搞倒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领导同志；一方面到处乱窜，煽阴风，点邪火，大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在一次组织组的干部会上，她胡说什么"现在中央许多部不行了，七、八、九月，中央各部跟得很紧，只有文化部是顶的"，"邓小平是还乡团头子，下面还有分团长"，"各部老爷不好好看看，不行。那里有长毒蘑菇的土壤，一下雨就发霉，就长毒蘑菇！"她还说："辽宁过去中央要人不给，现在思想通了，上海也要准备人"，"今后送干部，要多少给多少"。王日初也煽风点火地说："在天安门事件中，中央各机关只有两个半单位（文化部一个，全国总工会筹备组一个，卫生部半个）经得起考验，那里都是上海的人在主持工作。"他们一唱一和，态度极为嚣张。与此同

时，王秀珍布置组织组挑选一些干部，再次准备往外“输送”。毛主席和党中央洞察一切，及时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打烂了他们“组阁”的诡计。

（总社驻沪记者组）

（新华社上海电）

〔附〕民心不可欺

——“四人帮”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始末

《工人日报》记者　曹　章　徐绍昌　邵观光　张维新

愚弄人民的，必将被人民唾弃。

在粉碎“四人帮”的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刻，被“四人帮”一再吹嘘为“左派堡垒”的上海，发生了一幕严峻而又富有戏剧性的事件：

反革命武装叛乱指挥所里的余党，刚刚发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几声嚎叫，就被他们自己“调集”来的愤怒的民兵包围起来，淹没在“打倒四人帮”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回顾这段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事件，人们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决不能忘记，“四人帮”煞费苦心经营的帮派武装及其策划的武装叛乱，却是极其惊心动魄、发人深省的。他们的阴谋得逞，将是千千万万人头落地的历史悲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这幕罪恶丑剧的始末。

阴谋夺权

在十年浩劫期间，篡夺了部分党政权力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野心勃勃，凶相毕露，妄图进一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虎视眈眈地觊觎着枪杆子，多次窃窃私语，一再为没有夺得军权而伤心地哀鸣：

张春桥感慨万千地对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我们只有笔杆子，没有枪杆子。”

王洪文也在帮派小圈子里一再吹风：“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里没有我们的人。”“四人帮”的眼睛盯向了民兵。

张春桥在他审定的一份报告中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指使王洪文等在上海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武斗司令”王洪文立即策划，于是一份体现“春桥思想”的、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名义发出的文件，在1967年8月26日迅速下发了，这个文件中决定建立“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所谓“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从此开始了从上海警备区手里篡夺民兵工作领导权的罪恶活动。他们诬蔑原来的“民兵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下令市区民兵停止一切活动；他们把人武部的干部称作“老保”或“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刽子手”，迫使他们靠边站，有的还被揪斗。然后，他们在“改造民兵”的大棒下，成立了“上海市民兵指挥部”，任投靠“四人帮”的军队败类李彬山做领导小组的组长，实际上篡夺了警备

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权。王洪文对王秀珍说："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从此，上海民兵工作的领导权，特别是市一级的，基本上被张春桥、王洪文及其在上海的党羽掌握在手。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对他们篡夺的上海民兵工作领导权是死抱住不放的。王洪文多次说："上海民兵是我和春桥搞起来的"，"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就是有人把民兵一巴掌打下去，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二十年以后还要把它拉起来!"而且，他们还费尽心机进一步妄图建立全国民兵指挥部，把全国民兵武装抓到手里。后来，"四人帮"的这一恶毒阴谋遭到周总理、叶副主席、邓小平副主席的抵制，才宣告破产!

苦心经营

"四人帮"在阴谋篡夺上海民兵领导权逐步得手的同时，煞费苦心，经营帮派武装，妄图使它成为阴谋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说了算，调得动"的"强大"工具。

他们以百倍的疯狂，拼命搞帮派武装的武器装备。王洪文扬言："上海民兵要自己武装自己"，"要把我们的民兵武装得比正规军还好"。他几次窜到上海，声嘶力竭地叫嚣："民兵的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装备、抓紧分配。"七十年代初期，他们就欺上瞒下制造武器。王洪文等人在一个工厂搞了半自动步枪的生产线，并亲自到厂"视察"，指使马天水等人迅速予以正式投产，年产半自动步枪达到5，000支，从1974年到"四人帮"粉碎前共生产了15，000支。王洪文、马天水又瞒着中央有关部门，安排另一个工厂每年生产自动步枪10，000支，到粉碎"四人帮"前，共造了30，000支。他们还购买军事工厂的超产枪支。1974年底，几个工厂超产了步枪1，462支、枪弹392万发，马天水等人不向军委有关部门报告，就擅自动用地方经费将这批装备买了下来。1975年，中央有关部门要上海生产雷达指挥仪，马天水、黄涛等人，不顾国家统筹安排，强行要留下一部分供上海使用，并威胁有关部门说："不给，就不生产。"张春桥也多次"关怀"帮派武装的装备。他吩咐马天水等人，"加强"上海郊区造枪、造手榴弹、造地雷的阴谋活动。张春桥说："你们不要小看这些土地雷、土枪、土手榴弹，打起仗来还是起作用的。县办工厂也可以造。你们要抓。"王洪文还阴谋控制上海小三线的武器生产，把他的"小兄弟"、惯于进行投机倒把的戴立清，安插到那里去当上了一个地区的党委副书记，妄图建立帮派武装的后方基地。据统计，他们背着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从1974年到1976年，在国家分配的民兵经费之外，擅自动用地方经费3，283万元，用以购买和制造武器弹药装备。其中购买了自动步枪31，500支、半自动步枪16，962支、步枪子弹387万发、高射炮弹5万发、摩托车160辆、高炮牵引车10辆、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巡逻艇1艘，还有大量帐篷等装具，加强帮派武装。

有一次，"武斗司令"王洪文在党羽徐景贤、王秀珍陪同下，带了市民兵指挥部和10个区、2个县的民兵指挥部的头头们，耀武扬威地赶往靶场打靶。徐景贤肉麻地大肆吹捧："王副主席带领我们学军事。"射击开始之前，王洪文别有用心地重弹"要准备打游击"的老调。他还根据张春桥提出的"要学会打巷战"的黑旨意，在北京把马天水、王秀珍、金祖敏等党羽找去，专门看了一部美国电影，说："这个英雄很勇敢，一个人打了那么多人，给你们看看，今后上海如打仗，这样打。"党羽们回到上海，多次对民兵头头介绍那个美国电影，传授打巷战的所谓"经验"。在张春桥、王洪文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李彬山等人的策划下，他们还避开上海警备区，组织千余名民兵架桥强渡黄浦江，"加强实战训练"。

在苦心经营帮派武装的阴谋活动中，张春桥还一再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讲："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早就准备杀头了"，要他们的党羽，以所谓"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反革命精神。抓这支武装，为"四人帮"卖命。他们还通过所谓民兵"杀向社会"、"积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阴谋活动，毒害民兵，镇压群众，从根本上篡改民兵工作的正确方向，粉碎"四人帮"之后查明：上海民兵指挥部（包括它的前身文攻武卫指挥部），在浩劫期间，私设牢房多处，各种刑具齐全。他们利用非法的所谓"查询证"，非法抓捕的人，大多是对"四人帮"不满和无辜的干部、群众。

"四人帮"苦心经营帮派武装的用心是十分险恶的。王洪文在预审时供认不讳地说："我们抓这支武装的目的，就是用枪杆子保卫笔杆子，也就是保卫林彪、"四人帮"夺得的权力。"

叛 乱 前 夕

乌云翻滚。狂风阵阵。经历了多年浩劫的中国人民，又遭受了不幸和苦难：周总理、朱委员长和毛主席先后离开了我们。在这令人悲痛欲绝的时刻，丧心病狂的"四人帮"，躲在阴暗角落，利用篡夺的权力，磨刀霍霍，加紧策划他们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帮派武装的阴谋叛乱活动。

在震撼世界的天安门事件中，惶惶不可终日的"四人帮"指使他们在上海的党羽"加强战备"，乘机狠抓武装叛乱的准备。北京和上海之间，电话频繁，信使穿梭：

王洪文通过廖祖康给王秀珍打电话："上海要作些准备"，"不要因为没有准备"而"措手不及"；

王洪文又直接同王秀珍通话；"你们要有准备，把民兵拉出来，上海民兵是有战斗力的""天安门事件的'教训'不少，有的民兵没有汽车，有的有汽车没有民兵，不配套；再加上北京是单行道，结果时间拖长了。这一点你不要对外讲。上海民兵要吸取这个教训，要民兵指挥部作好部署，把我的意见告诉指挥部。"

姚文元也向上海的党羽下达了"指示"。姚文元在钓鱼台"接见"那个臭名昭著的上海写作组的核心人物陈冀德说："你们要准备有大的斗争"，"这次天安门事件，就是暴力行动。文化大革命是暴力，天安门事件是暴力，将来的斗争也还是暴力解决问题……"

黑指示不断从"四人帮"的黑窝里传到上海。党羽们策动武装叛乱的锣鼓越敲越响、越敲越密。

在王洪文的"指示"下，经过王秀珍、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等人的具体策划，由钟定栋等起草了以"反击"为代号的三个镇压群众方案，"假设"几种情况，分别采取"对策"。反革命方案中规定了"战备"兵力分为二批，第一批为2，500人和100辆摩托；第二批为30，000余人，生产待命。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也根据王洪文、王秀珍的黑旨意，炮制了"加强对重点地区的控制"、"加强侦察"等参与镇压群众的"方案"。王秀珍又"指示"公安、民兵两家要"联合行动"，"协同作战"。两家便合谋了以"4220"为代号的所谓"联合演习"方案。

随着这些镇压群众方案的炮制和出笼，一幕幕武装叛乱的预演也紧张地展开：

有240辆公安、民兵摩托车参加的夜间"武装示威"开始了。马达轰鸣，笛声尖叫，杀气腾腾。

市属十个区的所谓"夜间拉练活动"也都一项项具体策划了。

他们还策划了以徐汇区枫林地区为背景的所谓“保卫”康平路的反革命预演。

白色恐怖笼罩着上海滩。

在毛主席病重的严峻时刻，以卑鄙手段窃得这一不幸消息的原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这个投靠“四人帮”的军队败类，在炎热的8月暑天，赶到正处于紧张“备战”的上海，住进了延安饭店。第二天夜晚8点多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就匆匆来到了丁盛的住处，在一间密室里开始了阴谋密谈。

丁盛一开口，语惊四座。他在恣意诬蔑军队里的革命老干部之后，带点颓丧的口吻说：“我在南京很孤立，准备杀头的。我是个空头司令，有的部队我指挥不动。”

鬼头鬼脑的丁盛接着以神秘的口气，轻声慢语地说：“这个部队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这一线上，对上海是个大威胁，我很不放心。我准备把在苏州部队的干部调整一下，这样对上海有好处。”

“女将”王秀珍插嘴了：“丁司令，你准备杀头，我们也准备杀头。这个部队摆在这条线上，一头是南京，一头是上海，他一动，你那里和我们这里都危险。”

丁盛又说：“上海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保卫好。上海民兵这支力量很重要。”

马天水说：“是的，真正打起仗来，上海主要依靠民兵这支力量。”

半夜谈数小时，马、徐、王站起来告别同伙。马天水用感激的语调笑着说：“丁司令，你对上海这样关心，我们非常感激！”

丁盛也狞笑着说：“我们互相支持！”

“我们互相支持！”马、徐、王异口同声。

在秘密长谈后的第二天晚上，马天水、王秀珍急冲冲地赶到市民兵指挥部，同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阴谋策划，加强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准备。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王洪文曾经关照马天水，“要给民兵发枪”。为此，市民兵指挥部曾经打了个“报告”，马天水不征求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意见，同徐景贤、王秀珍一起就擅自批准了。原报告中提出将21，000支自动步枪“全部库存”，马天水迫不及待地大笔一挥：“2万多支自动步枪，既然上级（注：这个上级就是指王洪文）已同意下发，我们应即下发，不必入库。”但是这发枪的报告虽经马天水批了，徐景贤、王秀珍画圈了，由于有个具体问题没有解决，被市委办公室压了下来。当马天水得知后，对市委办公室经办人员大发雷霆：“我关照过的，马上发。这么重大的事给你们耽误了！”他气急败坏地拿过已经批了的“发枪报告”，又在“报告”眉题的正中加批三个字：“立即发”，转过身来，对施尚英说：“你们明天就发！”

在8月11、13两天，李彬山、施尚英分别召开紧急会议，把武器分配了下去，并限令各单位在8月底前全部从仓库中领回。在毛主席逝世前后，他们先后发下各种武器74，000多件，各种弹药10，369，526发，数量可观，用心险恶。

为了策动武装叛乱，黄金海等还布置有关部门大力准备“应变物资”。他们强令加工了：12，600担咸菜，采购了40，000担酱菜，腌制咸鱼，还准备了大批手电筒、汽油、压缩干粮、自行车，并且伪造了大量汽车牌照，供叛乱需要。

至此，“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上海从思想上、组织上、装备上打下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基础。9月21日，徐景贤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溜进了钓鱼台，向张春桥“汇报”了同丁盛的密谈，“报告”了上海民兵发放武器弹药的情况。老奸巨猾的张春桥点头频频，最后嘱咐：“要谨慎小心，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9月23日，王洪文从北京打电话给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

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9月27日、张春桥对肖木说："多难兴邦"，"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考验"、并要肖木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传达。9月28日，肖木到上海后立即做了传达。马、徐、王都供认，这是主子给他们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动员令"。

悍 然 下 令

1976年10月6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罪恶滔天的"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了。

10月7日凌晨，中央通知马天水去北京开会。徐景贤、王秀珍觉得很突然。马天水走后，联系中断，毫无消息。徐景贤、王秀珍慌了手脚，预感到事情不妙，一面派人去北京刺探消息；一面开始部署反革命武装叛乱。晚上，王秀珍把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叫到跟前，悄悄地对他说："小缪，你去北京打听一下消息，立即打个电话回来。"并和他约定三个联络暗号：平安无事报"健康"；有点小事说"胃病"；"四人帮"出事就说"心肌梗死"。

10月8日下午，康平路市委办公大院的门口站了双岗，戒备森严，小汽车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十分频繁，情况显得紧张而又异常。在学习室里，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冯国柱等党羽，正在密谋策划，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薛干青、徐成虎、朱永嘉、廖祖康等人先后起来了。在密谋中，徐景贤分析了从北京传来的"不正常的情况"：于会泳突然不出面了；跟《人民日报》鲁瑛通电话时吞吞吐吐，十分反常；在京的"领导"都联系不上，又来了"老胃病发作"的暗示。他说："可能出问题了。"施尚英一听，气势汹汹地跳起来。此人是王洪文手下一员战将，靠溜须拍马得到王洪文的赏识，突击入党，破格提升，任江南造船厂党委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委、上海市民兵指挥。他胸脯一拍，高声叫嚷："我们实力雄厚，弹药充足，只要市委一声命令，就可把民兵拉出来和他们对着干。"

这时，电话铃响了。

缪文金来电话："我还好。我娘心肌梗死。"

祝家耀来电话："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

刘庆棠也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

这三个电话完全证实四位"首长"出了问题。他们就加快步伐，悍然决定紧急部署反革命武装叛乱。

朱永嘉一反往日文质彬彬的书生态，也咬牙切齿地说："我们要干，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象巴黎公社那样。我们要发《告全市人民书》、《告全世界人民书》。"王秀珍立即布置民兵和公安系统"加强战备!"徐景贤疾书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二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他们经过策划、决定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组织了两套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指挥班子：徐景贤、王少庸、朱永嘉等在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负责抓总和武装叛乱的舆论准备；王秀珍、冯国柱、李彬山、廖祖康等进二号指挥点——东湖路招待所，直接指挥武装叛乱；张敬标在康平路办公室留守、联络。

半夜，王秀珍带着徐景贤的手令、和冯国柱、廖祖康、康宁一等一伙赶到市民兵指挥部、并通知正在李彬山家里制定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的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立即赶到。

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王明龙、印玉泉、汪湘君、沈涵等大小头目也都陆续来到指挥部。

紧急会议开始了。王秀珍歇斯底里地叫嚣:"现在情况很严重,小缪从北京打回电话说'心肌梗死',祝家耀来电话说'人员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肯定中央出了问题,可能'马老'和上海在中央工作的几个'领导'都抓起来了,中央发生了右派政变。"顿时,会议室人声鼎沸,乱作一团。陈阿大把拳头一攥,往桌上一砸。此人原是有名的地痞流氓,靠打砸抢起家。一听主子出了问题,他顿时火冒三丈,当场表示:"要豁出命来同他们干。"在场的人都纷纷表示:"我们不能束手待擒,要马上干。"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王秀珍立即宣布了他们事先策划好的两套指挥班子名单,拿出了徐景贤的亲笔手令,批准了李彬山等三人制定的武装叛乱方案,要他们在10月9日组织实施,抓紧落实。

在市民兵指挥部里,施尚英、钟定栋、印玉泉等人,召集了作战组、特种兵组、后勤组负责人会议,进一步策划制定了民兵参加武装叛乱的实施计划。施尚英决定10个区和2个指挥点以及上钢三厂都开设电台,架设15部15瓦的电台,拟订了通讯呼频和联络暗语,要求在9日下午6时沟通联络。确定了江南造船厂为基本指挥所,中国纺织机械厂为预备指挥所,精选了两个指挥所的工作班子。总的听从王秀珍的指挥。

施尚英又秉承徐景贤和王秀珍的旨意,召开了10个区和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会议,以"战备"为幌子,紧急部署武装叛乱。会议一结束,施尚英等人带着报务员、电台、手枪、匕首,分头钻进江南造船厂和中国纺织机械厂两个指挥点,开始进行指挥武装叛乱的罪恶活动。

杀 气 腾 腾

10月9日下午,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又悍然宣布:调集民兵进入"紧急战备"!真是秋风萧瑟,一派杀机。上海的反革命武装叛乱,犹如刀出鞘,箭上弦,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深夜,马天水从北京打来电话,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去北京参加中央打招呼会议。中央这一釜底抽薪的英明措施,使"四人帮"的帮派武装陷入"群龙无首"的状态。留在上海的"四人帮"余党,心慌意乱,连夜策划。

10月12日夜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倾巢而出,在市委召开紧急会议,密谋策划,妄图作垂死挣扎。施尚英谈了从李彬山处得来的情报,完全证实"四人帮"彻底完蛋;警备区对他们妄图进行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恶行径有所觉察,并准备采取相应的行动。这时,会场气氛紧张,叫的、骂的、哭的,丑态百出,乱成了一锅粥。马振龙第一个痛哭流涕,如丧考妣。这个自称文化大革命给了他第二次生命的马振龙,是当年王洪文的保镖,他当上了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什么手表、自行车、照像机、打火机、饼干、罐头……都往王洪文那里送。如今,主子完蛋了,奴才怎么不伤心呢!再看看陈阿大,一下坐在沙发上,一下又坐在地毯上,嘴里骂骂咧咧,心里很不耐烦,冲着张敬标说:"老是要什么好好讨论,到底干不干,不干老子回家睡觉去。"顺便提一句,头一天,陈阿大已经和老婆演过一场"别姬"了。他对老婆说:"中央出事了,把王、张、江、姚抓起来了,要准备干,我也准备被抓起来,你怕不怕?要怕,现在离婚还来得及。"说完就全身披挂上阵了。再看会场,朱永嘉当即写了"民气可用,决一死战"八个字给大家鼓气。他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准备用大幅标语刷到大街上去。他们指定市总工会的叶昌明等拟定了

21条反革命标语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陈阿大象个输光了本钱的赌棍，提出：一不做，二不休，要拖一条旧万吨轮在吴淞口沉船封航；要拉钢锭堵塞机场跑道；要停水、停电、停产，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最后，冯国柱宣布：要积极做好干的准备，等马、徐、王回来再统一行动。

在江南造船厂的指挥点，钟定栋找来有关人员，亲自标图，口授了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规定了重点保卫目标，布置了两个梯队8，000余人和100辆卡车及一个摩托团（350辆摩托）的机动兵力，内外三层包围圈以及内圈的六个口子，还有指挥核心的形成、弹药补给、通讯联络、社会治安等等。经过印玉泉修改和施尚英的同意，正式定为“捍一”、“方二”反革命武装叛乱作战方案。

“捍一”的主要内容：控制首脑机关、报社、广播电台、桥梁、车站、码头、机场和交通要道；确定指挥核心人员名单；开设指挥所；兵力部署；重点“支援”地域和反空降；口令、暗令、标记；弹药补给和武器修理；加强社会面的控制等。

“方二”的主要内容：从上海外围到市中心区设立三道“控制圈”；在上海与江苏、浙江交界处，设六个控制点，为第一控制圈；市区设两道控制圈；并规定了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另外还有通信保障计划，规定了通信任务和多种通讯手段。

10月13日下午，戴立清、马振龙窜到江南造船厂，要施尚英拉出队伍来干。戴立清说：“党中央已派工作组到上海了，我们不能束手待毙，现在是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上海带个头一动，民兵、工人一上街马上会乱，外地会响应上来的。如果失败了，历史也会记上我们的功绩的。”请看，这伙“四人帮”余党的反革命气焰是何等嚣张啊！

土　崩　瓦　解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经营帮派武装，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的罪恶勾当，遭到了有着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的抵制和反对，在阴谋武装叛乱的紧要关头，英勇的上海工人阶级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海染化十厂干部田波同志，当他接到区民兵指挥部有关“组织50名民兵住厂待命”的通知后，感到情况反常。他同工人民兵李庆永、叶其康、王科伟、邢彦乡、何晓梁等商量合计，大家说：民兵战士责任重大，为谁扛枪，为谁当民兵，可来不得半点含糊。他们认为“值班待命”“没有意思”，不如趁早散伙。说着，各自回生产岗位劳动去了，“值班待命”也就在这个厂告吹了。

3516厂的民兵干部董四立参加了虹口区民兵指挥部的“紧急战备会议”。他一边听指挥部头头的“布置”，一边想：既然是“战备”，为什么谈“情况”吞吞吐吐，七零八碎？为什么没有上级军事机关的通知？不对头，不对头！董四立叨咕着走出会场，回厂与另一位民兵干部严心华同志交谈后，立即向厂党委作了汇报。厂党委经过慎重研究，作出决定：枪支、弹药分别由专人管理，不经党委批准，任何人无权动用。

在武装叛乱的“预备指挥所”所在的中国纺织机械厂里，展开了一场更为惊心动魄的斗争。10月9日中午，工厂大院里来了两批人，一共十多个。随后，运来了6部电台，急急忙忙地架了天线，进行安装，开始了收发报的联络活动。为首的家伙，还要求厂里抽调120名民兵、两辆卡车，枪弹配套，24小时值班，参加这次“战备”。多令人费解！“战备”如此紧

急，为什么又不让上报下达？职工们陷入深思中。就在这时、那个焦躁不安的头头露了马脚。他在党委副书记、民兵团长张秀面前滑了嘴："昨晚我一夜没睡好，战备很紧急啊……""真急人啦，和北京的电话也打不通，连小缪（指缪祖康）的电话也打不进"。这些话，促使张秀进一步地思考问题：总有事情。什么事情呢？还难于判断。为了深入一点地了解情况，张秀便主动地拉那个头头下棋，借机试探。那个头头含糊其词地透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情况："……他们被抓起来了"。在这个时候，另一名厂党委的同志了解到是党中央拘留了"四人帮"。党委经过紧急交换意见，迅速采取对策："一、向车间民兵干部通气，使他们思想上有所准备，以免受骗；二、召开民兵团干部会议，强调"党指挥枪'的原则，枪杆子一定要听党的指挥，不被别人调动；三、利用夜间民兵训练的机会，把武器库的枪支、弹药搬出，转移到安全地点去；四、安排专人掌握来厂那批人的确切情况。经过摄影和实际观察，弄清了他们是枪口对内的。厂党委的一些负责同志立即磋商，决定越级上报。12日夜晚，厂里派专人到南京，把"情况"交给了军队负责同志。第二天，这一重要情况转报到了党中央。

由于上海广大军民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罪恶活动进行卓有成效的艰苦斗争；由于党中央、中央军委及时采取得力果断措施；特别是粉碎"四人帮"的巨大胜利，象春雷一般在上海上空响动起来了，"四人帮"及其余党策动的武装叛乱，顷刻瓦解，迅即破灭了！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象是三只漏了气的气球，从北京飘回了上海，飘进了东湖招待所的会议室里，哭丧着脸，两眼发直，冷若冰霜，呆似木鸡，有气无力地望着他们的"小兄弟"……。

黄涛躺在沙发里，象抽羊痫疯似地抖动；汪湘君哭得伤心异常，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陈阿大、叶昌明抱头呜咽，如丧考妣……；

几天以后，党中央派出新的领导人到上海主持工作，中共上海市委作出了关于加强民兵工作的决定：在市委的领导下，由上海警备区负责民兵的日常工作。上海十万民兵隆重集会和游行，热烈欢呼我党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

党胜利了！

人民胜利了！

（原载1980年12月13日《工人日报》）

〔附〕 从"文攻武卫"到"第二武装"的彻底破产

——深入揭批"四人帮"破坏民兵建设的反革命罪行

南京部队动员部、群工部

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四人帮"破坏民兵建设的反革命罪行，我们在上海就"四人帮"苦心经营"第二武装"的罪行做了调查。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

“第二武装”是由他们的“文攻武卫”组织演变过来的，是直接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服务的。

“第二武装”是怎样“起家”的？

一九五八年，随着大办民兵师高潮的到来，上海民兵如同全国各地民兵一样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大民兵组织认真发扬我党我军和我国民兵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建立起来的民兵武装，却被“四人帮”及其死党看做是肉中刺和眼中钉，必欲毁之而后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勾结林彪在上海的死党大造反革命舆论，扬言要抹掉全市的民兵组织。一九六七年七月，叛徒江青抛出“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和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参加三结合的指示。早想建立一支“帮武装”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盗用上海工人的名义，亲笔炮制了一个要求“成立武卫组织”的所谓请示报告，叫嚷要“从中找出一条改造民兵的办法”来。接着他们便指使余党、亲信、搞了一个“文攻武卫筹备小组”。经过一番策划和准备，在同年八月二十六日，正式成立了“上海市文攻武卫指挥部”。他们还在一些单位取消了原来的民兵组织，在所谓“造反队”的基础上，拼凑了“文攻武卫”直属团、营、连。为了扩大这支“武装”，“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无耻地伪造“成立武卫组织”，是毛主席批准同意的，胡诌什么毛主席“很关心”这支队伍的成长，“每年都要问到”，用以欺骗群众。从此，他们更是变本加厉地恶毒诬蔑民兵“不可靠”“不抓阶级斗争”，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力图一笔勾销原来的上海民兵组织，全盘推翻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路线和方针。同时他们指使人员编写“建立文攻武卫宣传提纲”，大量印发到基层，组织人员进行“宣讲”，极力吹嘘这支队伍“可爱”、“有权威”、“有战斗力”，“比原来的民兵好”。在一片喧嚣声中，他们按照所谓发展“文攻武卫的打算”，在全市范围内，下令取消专职武装干部，剥夺警备区和区县武装部做民兵工作的权力，并以打砸抢的手段搞掉所有民兵组织，禁止广大民兵的训练、教育和值勤等一切活动，并且很快在市区成立了“文攻武卫指挥部区分部”，就这样由他们精心策划“文攻武卫”组成的一支“第二武装”，开始“露峥嵘”了。

“四人帮”一手拉起来的这支“武装”，和原来的上海民兵组织完全是两码事。他们依靠社会渣滓，欺骗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以这支“武装”作工具，镇压人民，保护自己；他们不要党的领导，不让军事系统过问；他们搞资产阶级派性，以打砸抢来显示“威风”，这支队伍一出世，张春桥就洋洋得意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并叫嚣在市区就搞“文攻武卫”，“这个方针是肯定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也为此“喝采”。就在“文攻武卫”队伍拉起不久，一个反动家伙就上书张春桥说：左右形势的“最终力量势必要依靠掌握枪杆子的人”，进劝张春桥要“亲自掌握一批可靠的武装力量，是事不宜迟的事情”。这就清楚地说明，“四人帮”搞的这支队伍，完全代表了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纯属是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的“第二武装”。

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是怎样摇身变为所谓“上海民兵”的？

一九六九年，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一个中央文件，决定“撤销文攻武卫组织”以后，“四人

帮"恐慌万状，心怀鬼胎，感到再搞"文攻武卫"不行了，需要变一下"色"。于是他们就大搞变色术，把他们终日咒骂，视为眼中钉的上海民兵的光辉称号突然盗为己用，就连原来声称搞"文攻武卫"决不动摇的国民党特务张春桥，也不得不向其亲信说："妥协一下，还是改掉吧。"就这样，这个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便在一九七〇年五月三十一日，摇身一变改换了名称。但是改下不改上，市区两级"文攻武卫指挥部"仍然保留下来，直到一九七二年九月，才改为"民兵指挥部"。他们改是为了更好地"骗"，目的是要把"文攻武卫"的货色掩盖下来，利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兵对毛主席亲手创立的民兵制度的热爱，继续推行与毛主席民兵工作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可以明目张胆地发枪发炮、造枪造炮，变本加厉地搞他们的"第二武装"。张春桥曾向他们的亲信说过这样的私房话；"名称只是一种形式，原来怎么干的，今后还怎么干。"王洪文讲得更露骨："文攻武卫改为上海民兵，名称变了，性质任务仍旧不变，市、区指挥部仍继续保留不变，斗争中形成的一套干部班子，目前仍然不变。"王洪文的"三不变"与张春桥的黑话，很清楚地说明，"四人帮"搞的"第二武装"，完全是"文攻武卫"的变种。

其一，从思想体系来看，两者都是把"四人帮"的"改造民兵"作为黑纲领。早在拉"文攻武卫"队伍的初期，他们就把张春桥伪造的所谓"改造民兵"的指示搬出来，胡说"成立工人武卫组织"，是"改造民兵"的办法，王洪文叫嚷："文攻武卫队伍的建设，……最根本的任务，首先是改造民兵。"他们改换了"文攻武卫"组织的名称后，还是大念"改造经"，逢会必讲"改造"二字，把这个黑纲领仍然作为"重建"民兵的总则。一九七三年七月，王洪文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写信给上海的余党，并附上张春桥的那个"改造"和"重建"民兵的黑报告，要余党重加付印，学习领会，统一对"改造民兵"的认识。更恶毒的是，他们竟把所谓"张春桥思想"作为搞"第二武装"的理论基础。他们从搞"文攻武卫"之日起，就一直诬蔑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过时了"，不准学习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一系列指示，不准搞人民战争思想教育，不准讲我国民兵的光荣历史和革命传统，不准宣传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树立的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典型，否定党中央和军委总部下发的民兵工作文件，不让编写民兵革命斗争的历史故事。相反地却无耻地吹捧"张春桥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张春桥、王洪文是什么"城市民兵创始人"，经过"重建的上海民兵"是什么"新鲜事物"。更严重的是，他们还把"文攻武卫"的打砸抢作为"第二武装"的精神支柱。他们一个劲地叫嚷"这支队伍是打出来的，只有靠打，才能出威风，出战斗力"。为了鼓吹"文攻武卫"，他们指使或欺骗一些人员编剧本，写小说，拍电影，出画刊，硬是要把这些打砸抢精神作为教材塞进中学教科书里去。不仅如此，他们还诱骗一些人把"文攻武卫"的旗帜、袖章、符号保存好，不要忘记那段历史，在干部调到"指挥部"工作和吸收扩大"帮武装"的时候，都要给新来的人员上一堂"必修课"，大谈特谈其"文攻武卫的战斗历程"。真称得上是一套地地道道的"帮武装"教育。

其二，从组织基础上看，两者也是一样的。毛主席多次指示：民兵组织要贯彻阶级路线，政治上要可靠，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工人、贫下中农手里。"四人帮"同毛主席大唱反调，竟然提出以所谓"造反派为基础"的组织路线。这条极右路线，贯串了他们搞"第二武装"的全过程。"四人帮"把所谓"老造反派"掌权作为"重建民兵"的依据。开始成立"文攻武卫"队伍时，他们要求"一定要是老造反的单位"。以后又规定凡是有所谓"造反派"掌权的单位，才可以组建"文攻武卫"队伍，如果没有他们的"造反派"掌权，即使革命和生产形势再"好"，也不允许建立。一九七〇年六月改为"民兵"以后，他们仍旧把有没有所谓"造反派"掌权作

为、重建民兵"的根据，并把象陈阿大之类的所谓"造反队员"作为参加'民兵'的条件。否则，就是转业复员军人或者原来的民兵都不能参加，连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也不行。为了进一步控制民兵领导权，他们还规定"民兵营以上干部一定要是老造反派"。在他们物色的所谓"老造反英雄"中，不是党员的突击入党，不是干部的突击提干。所有这些，说明"四人帮"在组织上所依靠的主要对象，正是他们的死党、亲信、爪牙、"小兄弟"，流氓、阿飞等一小撮社会渣滓。

其三，从性质任务上看，两者又是一脉相承。毛主席、党中央和国务院、中央军委早就明确规定：我国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四人帮"从拉"文攻武卫"队伍一开始，就完全违背民兵的性质和任务。众所周知，他们拉的"文攻武卫"队伍，全靠打砸抢"起家"，在打砸抢中发展。王洪文不打自招地说：打砸抢"这个我也干过，也指挥过"。一语就道破了王洪文这个政治流氓的本色。后来他们又换上抓所谓"社会阶级斗争"的商标来掩盖打砸抢的罪恶。而张春桥则大加赞扬地指示他们的"帮武装"说："要发扬文攻武卫的传统"，"不要把这个宝贵的东西"丢掉了，要继续走"文攻武卫"的老路子。说穿了，就是要坚持当年的"武斗队精神"和打、砸、抢、抄、抓那一套。这那里有半点人民武装的气味呢?

其四，从领导、指挥关系上来看，更是一路货色。"四人帮"从拉"帮武装"的第一天起，这支队伍就是直接由他们指挥和控制的。在建立"文攻武卫"队伍的时候，他们就规定这支队伍没有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亲自批准，任何个人，任何组织无权调动。随着"帮武装"的发展扩大，他们对这支武装的领导权控制得更严。他们的余党、亲信，打着加强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的旗号，直接向"四人帮""请示报告"，一切听"四人帮"发号施令。在他们的帮派小天地里，自订发展规划，自订训练内容，自订"装备大纲"，并逼着警备区把掌握的民兵组织、民兵经费和民兵装备权交出来，由他们直接"统管"，不受各级人武部门的领导，不受大军区的领导，不受军委总部的领导。这就完全架空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民兵的领导和指挥。王张江姚窃取中央一部分领导权后，更加野心勃勃，不仅指使余党要抓住这支武装，而且规定不论有什么情况，都要直接向他们"报告"。一九七三年以后，王洪文每窜到上海，就召见其余党、亲信和坏头头私下交底：这支队伍"不能多头指挥"，更不能"被人家指挥"。这说明，"四人帮"不论怎样变换手法，打起什么"招牌"，其"文攻武卫"的反动实质没变，搞"帮武装"为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没变。

"四人帮"是怎样破坏民兵建设，进行篡党夺权活动的?

"四人帮"盗用民兵的名义，苦心经营"第二武装"，就是为了公开地大张旗鼓地掌握和运用这把篡党夺权的"杀人刀"，打击迫害大批革命干部，进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九七〇年，在他们盗用民兵名义之前，"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文攻武卫"的坏头头就曾叫嚷什么："我们是群众组织"、"不合法"、"上头不承认"、"报上不宣传"。可是当他们盗用民兵的名义之后，尤其是一九七二年九月以后，他们就公然利用民兵这个合法的外衣，大造反革命舆论，进行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等罪恶勾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那个"指挥部"的坏头头，在盗用民兵名义之后，就曾公开向《解放军报》进攻，说什么"过去我们不合法，你们不宣传，现在我们是'民兵'，为什么还不宣传!"狗头军师张春桥也亲自给一家报纸的负责人说："过去我不让你们宣传上海民兵，现在可以宣传上海民兵了。"于是他们的所谓

"新鲜经验"大肆出笼，妄图用民兵这个光辉名称，在全国拉起一支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第二武装"，由他们当"领袖"、当"司令"。

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四人帮"从成立"文攻武卫指挥部"起，就恶毒攻击人民武装部，扬言要砸烂这个"旧机器"，妄图把武装部的民兵工作大权抢到手，并且不准以武装部和警备区的名义抓民兵工作。警备区、武装部做民兵工作，他们就给你扣上"夺权"、"复旧"的大帽子。警备区出民兵工作简报，发民兵工作指示，他们就攻击是"二元论"、"多中心"，并利用批林批孔运动，到警备区、大军区"点火放炮"，大整特整军事领导机关，强迫承认他们搞的那一套是"合法"的。同时他们还在厂矿推广"三位一体"，取代了厂矿武装部；在农村用"民兵团部"取代了公社武装部。在区、县以上则用"民兵指挥部"取代了警备区和区县武装部。他们的野心，就是由下而上，砍掉原来做民兵工作的一切领导机构，全面篡夺民兵的指挥权。早在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以上海市革委会的名义，向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提出要"统一"民兵领导机构，"撤销原市区、郊县的武装部"，但阴谋未能得逞。一九七二年九月，"文攻武卫指挥部"改为"民兵指挥部"以后，他们又提出"五部合并"的狂妄计划，要把武装部和复退、征兵、人防办公室都并到"指挥部"里去，当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抑制和反对之后，他们又改变了主意，先合并武装部，然后再一口一口地吃掉其它部门。他们公开反对一九七五年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由王洪文亲自坐镇，指使余党、亲信、爪牙，在两个区、一个县搞了武装部和指挥部的"合并试点"，最后摘掉了武装部的牌子，拆散了武装干部，解散了武装部的党委和支部。不难看出，他们"合并"是假，吃掉武装部是真，抢民兵领导权是实。

在此期间，他们还按照张春桥绘制的发展"武卫"组织的"蓝图"，阴谋从小到大，从徒手到发枪，从市区到郊区，从上海到全国，大搞起一支同人民解放军相对立的"帮派武装"。他们一方面以上海为"基地"，把黑手伸向全国，置中央有关规定于不顾，把上海在外省的三线工厂的民兵工作权力也抓过来，成立什么"后方基地民兵指挥部"，归上海那个"指挥部"来领导。而这个指挥部还以"太上皇"自居，向外地寄材料、发贺电贺信，并指令外地向他们反映情况。另一方面，他们则通过参加总部召开的民兵工作会议，借机强行推销他们那一套黑货。一九七四年九月，他们竟利用总参召开民兵工作业务会议的时机，拼命挥舞"民兵改造"的大棒，乱打乱整，妄想把全国的民兵都纳入他们黑纲领的轨道，并且大肆叫嚣学不学他们的所谓"新鲜经验"是个路线问题。张春桥、王洪文在会上一唱一和地大发淫威，叫嚷什么："三大总部的认识问题要先解决"，并逼中央首长表态，强令全国各地去上海参观"取经"，以便把他们的所谓"新鲜经验"推向全国。

为了把复辟的希望变为现实，他们打着参加所谓"社会阶级斗争"的幌子，运用打砸抢的手段，不仅把公安、治保和消防工作统统管起来，要"立法"、"管法"，私开"查询证"、"拘留证"、"逮捕证"，随意抓人、关人、审讯、定案，滥施肉刑；而且大肆包庇坏人，残酷地镇压广大人民群众。特别令人难以容忍的是，他们竟公开阻挠广大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追查戴黑纱、鸣汽笛、贴悼念标语的人，妄图把一大批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他们大搞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冲击军事机关，多次搞以解放军为攻击对象的所谓演习。他们叫嚷"不要光抓流氓阿飞"，要"把精力转过来"，主要方向是"与戴红领章、红五星的走资派作斗争"，要揪"朱可夫式的人物"，要抓什么"还乡团"，要"层层揪，揪一层"，企图打倒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老干部，以便他们上台掌权。在"四人帮"灭亡之前又来了个猖狂一跳——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书写手令，召开黑会，炮制反革命宣言，制定叛乱

方案，突击发放武器弹药，设立秘密指挥点，架设电台，腾出牢房，狂叫"十年心血在于此"，疯狂地把矛头对着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但是，他们的美梦不长，一经党中央和上海广大民兵群众觉察，加以揭穿，便顷刻瓦解了。

一年多来，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南京部队党委和上海市委的直接领导下，上海百万民兵如同全国亿万民兵一样，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深揭他们搞"第二武装"破坏民兵建设的滔天罪行，打好第三战役，从各个方面扫除"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同时各级民兵组织在运动中还十分注意党的政策，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大限度地孤立和集中打击"四人帮"及其一小撮罪行严重而又不肯悔改的死党。目前全市已恢复了原来的民兵组织，各级人武部门都恢复了做民兵工作的权力，广大人民武装干部又活跃在民兵工作战线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民兵光荣传统已在开始恢复发扬，广大民兵和民兵工作干部，在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光辉指引下，在党的十一大精神的鼓舞下，正按照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战线、方针、政策和华主席的指示，为大办民兵，办好民兵，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努力奋斗！

(原载 1978 年 2 月 19 日《解放军报》)

〔附〕 十年经营 顷刻瓦解

——揭露"四人帮"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前前后后

上海警备区民兵工作理论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按照"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妄图从上海到全国，把民兵搞成一个脱离党的领导的、同解放军相对立的"第二武装"，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服务。他们从一九六七年在上海拉起"文攻武卫"队伍开始，到进而伪造所谓"改造民兵"的指示，篡改民兵的性质和任务，另立民兵指挥机构，篡夺民兵领导权，破坏"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直至一九七六年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整整搞了十年时间，作了十分猖獗的表演。但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们搞"第二武装"的阴谋也就彻底破产了。上海广大民兵和全国民兵一样，坚决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愤怒声讨了"四人帮"搞"第二武装"的滔天罪行。

拉起"文攻武卫" 图谋"改朝换代"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大革命。但是，"四人帮"却妄想利用这场大革命来"改朝换代"——改无产阶级专政之朝，换中国共产党掌权之代，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目的，他们拼命地抓枪杆子。因为拉军队拉不动，就一心想搞一支"第二武装"。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叛徒江青别有用心地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反动口号，公然与毛主席提出的"**要用文斗，**

不用武斗"的革命口号相对抗。当时还在上海的张春桥，听江青这么一说，立即接过这个反动口号，并伪造了一个所谓"改造民兵"的毛主席指示，伙同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上海拉起了一支队伍，取名叫"文攻武卫"。

"四人帮"对"文攻武卫"寄以很大希望。早在筹建这支队伍时，以"司令"自居的王洪文就说过："光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不行。"他还说："把我们这支队伍建设好，就是一个领导权的问题。"张春桥也十分得意地对同伙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队伍。""四人帮"对这支队伍抓得很紧。他们规定："文攻武卫队员必须是造反派战士，只要是造反派，均可参加文攻武卫组织；如果不是造反派，即使原来是武装基干民兵，也不能成为文攻武卫队员。"为了把这支武装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他们撇开了上海警备区和上海市各区人民武装部，另外挑选了一批亲信、小兄弟和爪牙，组成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各区的区分部。其中，一个政治上有过反动言论，生活上流里流气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当了市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的"文攻武卫"的土霸王，当了市指挥部领导小组成员；一个污辱青年的犯罪分子，一度掌握了市指挥部组织组的大权；一个原是某工厂里的小偷，因"文攻武卫"有功，一下子抽上来当了市指挥部作战组的副组长。他们并且明文规定，他们的这支队伍"是按文攻武卫组织的系统垂直领导的"，"队伍的调动、使用由市指挥部全面安排，统一调度，集中指挥"。这还不够，他们在《关于指挥和调动文攻武卫队伍权限的规定》中，又直截了当地写上"市文攻武卫的各级组织、各个成员不论平时或战时都必须听从张春桥、姚文元××的领导和指挥。"这就清楚地表明，所谓"文攻武卫"，既不是我们党领导的群众武装，也不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受"四人帮"直接控制，并为他们"改朝换代"服务的"帮武装"。

"四人帮"竭力吹嘘说："文攻武卫是打出来的"。且看他们打的是谁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些手执长矛、头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伍，在"四人帮"一伙的指使和把持下，不分白天黑夜，逡巡在黄浦滩上，耀武扬威，不可一世。他们砸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搞武斗，刮"台风"，随便抓人，镇压红卫兵小将，干了许多坏事。而张春桥、王洪文把这些都看作是"文攻武卫"的功劳。其中，他们最为满意的"文攻武卫"的第一仗，还是查封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当时设在上海的办事处。这是"四人帮"对抗中央、搞乱外地的一次反革命的表演。事情的经过是："文攻武卫"成立不久，张春桥就召开了一个黑会，下令对六十个驻沪办事处，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进行查封。一天深夜，"文攻武卫"队伍闯进了各驻沪办事处，把办事处的人员都软禁起来，大搞打砸抢。然后由"文攻武卫指挥部"出面搞了个所谓"查封沪办"的情况《简报》。在《简报》里，把有的省、市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早已封存的本省、市资本家的股票、保险金单据、帐本、地契、家谱等，都说成是"变天帐"；把上级发的工作用电台，说成是"敌特电台"；把警卫武器和原来封存的报废枪枝，说成是"私藏武器"，等等。于是，对六十个"沪办"分别加上"资本家的联络站、"牛鬼蛇神的避风港"、"逍遥派的安乐窝"、"两地走资派的政治交易所"等罪名，全部予以查封。事后，张春桥对他精心策划的这个"杰作"十分得意，他说："不那样子就抓不到人"，"过去文攻武卫没啥影响，查封'沪办'后，杀出了威风，权威就树立起来了。"这虽然仅仅是开场的一幕，但"四人帮"搞"文攻武卫"究竟想干什么，如何去干，也暴露得相当清楚了。

打出“改造”旗号　冒充“上海民兵”

“四人帮”经营“帮武装”，是打着“改造民兵”的旗号干的。王洪文早就叫嚷：“我们文攻武卫队伍的建设，应该把它提高到彻底改造民兵的高度。”这就是说，他们要用“文攻武卫”组织来代替民兵，以便搞起一支隶属于他们的“第二武装”。为此，他们狗胆包天，伪造说毛主席有过关于“改造民兵”的指示。并且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诬蔑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建立起来的上海民兵“脱离现实阶级斗争”，“是墙头上的官，抽屉里的兵”，“文化大革命中偏保、一冲就垮”。鼓吹“文攻武卫组织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比原来的民兵好”，“可以代替民兵”，等等。他们就是这样一面造谣，一面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下令停止原上海民兵的组织、训练、教育、值勤等活动，而改“由文攻武卫代替”。一九六七年九月，王洪文还摆出一副流氓架式狂叫：“从现在起停止基层专职人武干部的活动，如果谁要恢复活动，我就带头去把它砸掉。”短短数语，表现出他对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民兵组织的刻骨仇恨。他们所谓的“改造民兵”，就是妄图全盘否定我国民兵的伟大历史作用和光荣传统，彻底改变毛主席关于民兵建设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按照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来“重建”一支适合他们需要的“民兵”。

“四人帮”妄图用“文攻武卫”来改造和代替民兵，取消民兵制度，当然要受到坚持毛主席民兵工作路线的许多领导同志以及广大人武干部和民兵的抵制。于是，“四人帮”就进一步施展种种阴谋诡计。张春桥一面对驻沪三军领导干部说：“有一点我是不动摇的，上海市区还是文攻武卫，再搞民兵或者另外搞一套，我是不同意的，不能搞复旧。”另一面，他为了使“文攻武卫”取得合法地位，于一九六八年伙同姚文元、王洪文向党中央送了一份所谓“总结报告”，于一九六九年初带给“九大”一份所谓“参考材料”，于一九七Ｏ年又策划把这份“材料”拿到当时准备召开的“四届人大”的讲台上去。他们迫切希望能从毛主席、党中央手里骗得一个对“文攻武卫”予以肯定的批示，以便达到他们在暗地里所谋算的“那就好说话了”的目的。但是，他们的这些阴谋一个个地都破产了。

“四人帮”见势不妙，不得不变换手法。于一九七Ｏ年五月，他们宣布把臭名昭著的“文攻武卫”改名为“上海民兵”。张春桥、王洪文一面假惺惺地对其爪牙说：“名称只是一种形式”，“文攻武卫改为上海民兵，是为了全国武装力量名称的统一。”一面再三交代：“改变名称，并不意味着改变这支武装的性质、任务。名称变了，性质、任务仍旧不变。”“原来怎么干的，今后还是照样干下去。”就是说，他们要借着民兵的组织形式，继续搞他们的“帮武装”。

在此之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和亲信就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种宣传工具，假借“上海民兵”的名义，为其经营的“帮武装”大造舆论。王洪文要上海报纸“经常报道、定期报道上海民兵。”张春桥对他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心腹说：“上海形势好，有百万雄师作后盾，你们要好好报道上海民兵。”他们指使其御用写作组，炮制黑文，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鼓吹“民兵改造”论、“民兵独立”论和“民兵万能”论。在有的黑文中，竟肆意歪曲和篡改革命导师的指示，不顾我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军队这个根本条件，侈谈什么民兵要把人民军队的职能、警察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结合起来，公然为他们用“帮武装”代替人民解放军和其他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制造“理论根据”。他们还要上海有关单位为“帮武装”编故事、写小说、拍电影、创作和演出文艺节目，甚至要在中学的教科书中加进反映“帮武装”的内容。

他们经常吹嘘“文攻武卫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要发扬文攻武卫的优良传统”，“要用文攻武卫的斗争史教育干部和民兵”。为此，原“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亲自编写了“文攻武卫”斗争史，作为训练干部和对民兵进行“路线教育”的必修课。他们还把搞“帮武装”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贴上“新生事物”、“新鲜经验”的标签，到处兜售，蛊惑人心，制造混乱。“四人帮”在这样干的时候，打的是“上海民兵”的招牌，盗用的是“上海民兵”的名义，但是，大家知道，上海民兵是按照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发出的关于“**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建立起来的，它继承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解放前夕护厂斗争的革命传统，后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和发展。这支坚强的民兵队伍是党领导的以广大工人、贫下中农为基础的真正的群众武装。它同“四人帮”搞的所谓“以造反派为基础”，由他们一伙的小兄弟作骨干，由他们的几个余党、亲信指挥的“帮武装”，毫无共同之处。“四人帮”把“文攻武卫”换了一块“上海民兵”的招牌，不过是为他们阴谋搞“第二武装”壮壮声威而已！

大搞“两部合并”　实行“帮指挥枪”

“四人帮”彻底“改造民兵”，要害是改变民兵领导体制，篡夺党对民兵的领导权。他们狂叫：“民兵领导体制不能修修补补，要来个大革命”；他们诬蔑说，把民兵置于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的双重领导之下，是“条条专政”，叫嚷“要砸烂军事一条线”。他们把各级人武部、上海警备区、南京军区和军委三大总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处心积虑地要一脚踢开。

早在一九六九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就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一份报告中提出要“在市革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市指挥部具体负责抓好人民武装建设。原市区、郊县的武装部可以撤销。”他们公然否定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由地方党委和军事系统对民兵工作实行双重领导的领导体制，要把上海民兵的领导权都统到他们“四人帮”的手里去。

一九七三年，张春桥、王洪文在北京，接到他们安插在“上海民兵指挥部”的亲信写的诬告上海警备区和上海各区人民武装部如何不支持民兵建设上的“新生事物”的小报告。张、王阅后，经过密谋，就把张春桥伪造“改造民兵”指示的那封信抛了出来，再由王洪文写了一封黑信，一并寄回上海，说什么在对待“文攻武卫”这个问题上，“是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扼杀这一新生事物，实际上是存在着斗争”，要上海的党政军机关“认真讨论”。“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接信后，赶忙组织专门会议围攻警备区党委和警备区机关，攻击警备区抓民兵工作“是想夺市委对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发民兵工作文件、简报是“二元论”，各区派军队干部到指挥部工作“是抢民兵的领导权”。他们借口“加强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大搞“帮指挥枪”，规定警备区不准过问民兵工作。同年九月，王洪文陪外宾来上海，又鼓吹指挥部“不是一个随便什么形式的问题，而是根据整个战略来改变和确定（的）形式。”他的余党也在一旁帮腔，说这不是“权宜之计”，“有深远的战略意义”，等等。其实，所谓“战略意义”，说穿了，就是靠“帮武装”来建立“帮天下”。

一九七四年，“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运动，搞“三箭齐发”，阴谋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他们在上海的余党赤膊上阵，反军乱军，进一步大抓“第二武装”。他们公然提出“建立两支武装好，一支是军队，一支是民兵，相互可以牵制”，制造民兵同军队的对立和分裂。同时，逼着上海警备区把民兵组织、民兵经费和民兵装备权统统交出去。

一九七五年五月，毛主席严厉地批评王张江姚说：“**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并且下决心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在此之后，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

指示，指出不要搞什么民兵指挥部。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都不赞成搞民兵指挥部。"四人帮"对毛主席的批评教育，不但不听，反而怀恨在心，竭力对抗。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际，王洪文窜来上海，加紧炮制他们的"第二武装"。

一九七五年九月十八日，王洪文找原"上海民兵指挥部"头头进行反革命交底。他对当年七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加强人民武装部建设的精神，怀恨在心，恶狠狠地说："现在有人骂我们上海搞'第二武装'，有一点同志们要清醒，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过去争论的是民兵要不要参加社会阶级斗争，将来争论的是组织体制问题。如果否定了组织形式，也就否定了民兵的任务。你们要作点思想准备，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能站得住。斗争是激烈的，要作准备把你们解散。"他又说："如果有人把上海民兵指挥部撤了，把这个机构改过去了，只要我不打倒，我不死，二十年后还是要把它改过来。""我只要不死，我的思想不会变。谁把它拉下来，我就把它扶上去。"公然要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抗到底，要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争夺兵权。与此同时，他又给在上海的余党和爪牙下了命令："将人武部和指挥部合起来！"并要他们"抓二个区、一个县，大胆地试"。"指挥部"的坏头头们对王洪文的这番黑话心领神会，有的还向王洪文表了"不能当投降派"的忠心。接着，就在上海两区、一县搞起了"两部合并"的"试点"。但是，他们做贼心虚，既不准把"试点"问题报告给中央军委和南京军区，又不下发文件，而是采取阴谋手法，想造成既成事实再说。他们还说："两部合并，这是王×××考虑了很久的一个方向性问题，带有巴黎公社的意义。"当他们的阴谋遭到抵制时，就扣帽子，打棍子，最后则凶相毕露地说："两部合并是形势的需要，不并也要并。"强令限时合并起来。"四人帮"搞"两部合并"的目的，就是要用他们的民兵指挥部吃掉人武部，明目张胆地篡夺党对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

"四人帮"不仅要夺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而且要把公安机关和治保组织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统统抓到手里。为此，他们在基层极力推销"三位一体"的黑货。当王洪文一手炮制的上海第十七棉纺厂的所谓民兵、治保、消防"三位一体"经验破卵而出后，喽罗们就把它捧为"样板"，吹嘘这是"民兵建设上的一场革命"，"工人阶级的创举、，强行在基层推行，同时大批所谓"治保一条线"，公然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制定的关于公安治保工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们还宣称这是"先把基层搞好，然后逼着上层建筑改革。"很明显，实行"三位一体"，就是"四人帮"要用他们经营的"第二武装"取代公安机关和治保组织等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准备条件。

"四人帮"改变民兵领导体制，篡夺民兵领导权的胃口是很大的。王洪文叫嚷："体制问题，不光解决上海问题，是解决全国的问题。"为此，他们不仅炮制了鼓吹所谓"上海经验"的文件，而且要全国各地派人到上海"取经"，以便推销他们那些反动谬论和网罗党羽。一时间，原"上海民兵指挥部"成了"四人帮"在全国搞"第二武装"的联络中心。一九七四年，总参召开民兵组训工作会议，王洪文、张春桥对会议没有肯定"民兵指挥部"十分恼火，他们竟恶狠狠地责问三大总部的领导同志，对"民兵指挥部"这个组织形式，是什么看法？支持不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说：三大总部要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甚至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指使他们的爪牙提出要成立从基层到中央的独立的民兵指挥系统，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指挥部"，并且要由王洪文当"总指挥"。这一切事实说明，"四人帮"是破坏和分裂我国"三结合"武装力量，搞"帮指挥枪"，妄图用武力篡党夺权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

颠倒敌我关系　大搞残酷迫害

“四人帮”把他们搞的“帮武装”，看作是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实行法西斯专政的“拳头”。他们打着“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幌子，颠倒敌我关系，镇压人民，保护坏人，甚至提出“民兵的主攻方向是同‘走资派’斗”的反动谬论，妄图利用他们搞的“帮武装”，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效劳。

“四人帮”无视国家法律。在上海，他们擅立“帮法”，私设监狱，随便抓人关人。他们动用“帮武装”，想抓什么人就抓什么人，想定什么罪就定什么罪。被他们非法关押的人，有的纯属因反对“四人帮”而长期惨遭迫害。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上海革命群众掀起了揭露张春桥罪恶历史的革命浪潮，它击中了这个国民党特务的要害，动摇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的地位，使得这伙反革命黑帮惊恐万状。他们悍然出动“帮武装”，到处抓人。市革委会组织组两位负责同志，看了一看张春桥老婆文静的档案，说了几句怀疑张春桥历史的话，王洪文就下令“文攻武卫指挥部”把这两个同志抓起来，进行残酷打击，整了八年之久。有个区房地局的领导同志，按章丈量了“四人帮”的一个余党和一个小兄弟的住房面积，触犯了这班新生资产阶级老爷，他们就气急败坏地指令“文攻武卫”将其戴上手铐，抓起来“审查”。他们甚至指使“文攻武卫”非法抓捕人民解放军的现役军人，揪帽徽，扒领章，肆意侮辱，并擅自立案关押“审查”。对于被关进他们班房的人，“四人帮”一伙则大搞刑讯逼供，进行残酷迫害。他们还为此抛出一套反动的“理论”，说什么“文攻武卫的威信是打出来的！”说什么“抓人合法”，“打人有理”，“处理群众纠纷，动动手也没有关系”，“有的‘对象’不怕法，只怕刮”，等等。他们把人打死了，逼死了，还胡说什么“扶植新生事物，总要付点学费么！”“黄浦江那么大，又没有盖子，要自杀有什么办法呢！”真是凶残狠毒，令人发指。

另一方面，“四人帮”为了网罗党羽，对于同他们黑根相连、黑线相牵的地痞流氓和不法之徒，则是多方保护，备加照顾。有一个被称为王洪文的“五虎将”之一的坏家伙，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一个搞武装破坏的反革命集团，案发后，王洪文指令“文攻武卫指挥部”将其保护起来。过了不久，“四人帮”及其余党又把这个坏家伙请出来，拉进党内，加官晋爵，委以重任，成为王洪文的“后勤部长”。王洪文的狗丈人，是个一贯招谣撞骗，敲诈勒索，奸淫妇女的流氓恶棍，群众强烈要求将他依法制裁，公安部门也要求审理，王洪文却要“民兵指挥部”把他保护起来，给以优厚的生活待遇，最后，反诬革命群众“无中生有，制造谣言”，把这个坏家伙的罪行一笔勾销了。铁铮铮的事实，彻底暴露了“四人帮”鼓吹的所谓“民兵参加社会阶级斗争”的极右实质。

到了一九七六年，随着“四人帮”加紧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明确规定原上海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一些头头们，要“把精力转过来，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一九七六年九月，“四人帮”控制的原“上海市民兵指挥部”还专门写了一个文件，说“今后民兵的主要任务，……更重要的是同党内资产阶级的斗争。要把斗争的矛头、主攻方向对准党内资产阶级。”他们还编写了“明确民兵的主攻方向”的三课讲话提纲，发下去作为什么“路线教育”的材料。“民兵指挥部”的坏头头们也分头四出活动，煽风点火，要人们“想得深一点，远一点”，把攻击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他们还派人到一个旅社中心店“蹲点”，搞什么与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不择手段地要在外地旅客中揪所谓“走资派”。他们说：“最好揪县委书记以上的，实在没有，找个大队支部

书记也好。"由此可见，"四人帮"的所谓"主攻方向对准党内资产阶级"，就是疯狂打击革命干部的同义语。"四人帮"这一伙典型的党内资产阶级，就是妄图打着"揪走资派"的旗号，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同志，整垮我们共产党。他们的用心是何其毒也！

妄图垂死挣扎　结果迅即覆亡

王张江姚"四人帮"苦心经营"第二武装"的最终目的，就是阴谋用武力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在中国实行地主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为此，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时，"四人帮"搞"三箭齐发"，"放火烧荒"，大造"军队不如民兵"，"军队靠不住"的反革命舆论。在上海，他们加紧拟制了所谓"战备方案"，强调要抓训练，抓战备。他们还捏造了一个"解放军有行动"的谎言，搞了一次极其秘密的矛头指向解放军的"战备"演习。实际上，这是一次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预演。

一九七五年，反党分子王洪文窜回上海，一面加紧篡夺民兵的指挥大权，一面指令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的一些头头们，"要加强战备观念"，"要搞班、排、连、营的进攻防御"，"搞战役、战术训练"，搞"城市巷战、丘陵地带和开阔地带的战术训练"、"要学会指挥"，等等。他不仅带领市、区两级"指挥部"头头们去打了靶，还亲自去"检查"了战备工程，查问了粮油等储备情况。市"指挥部"的坏头头心领神会，大谈一九七六年"上海民兵军事训练要突破"、"要提高民兵高炮的自训能力"，"要能独立作战"，并且加紧举办各种骨干学习班，甚至计划筹办"上海民兵军政干校"，进一步为阴谋武力篡权培训骨干力量。

"四人帮"对于装备他们的"帮武装"也是下了力的。王洪文曾多次对他们在上海的余党交代："武器要抓紧制造，抓紧分配，抓紧装备"。他们炮制的所谓"十年规划"，是要掌握数十万件武器的。在这个规划中，要搞现代化的火炮，摩托化师，水陆坦克师，等等。他们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擅自在上海搞了一些军火工厂、造枪造炮。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三年当中就化去三千二百多万元资金，私造武器达四万余件。他们还撇开中央军委和总部机关，以釜底抽薪的手法，把国家军工生产计划内的枪弹，谎称是"增产"部分，强行"购买"下来。仅私购武器这一项，他们就动用地方经费二千二百六十二万元。

一九七六年上半年，由于"四人帮"长期以来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迫害敬爱的周总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恨，革命的怒火象火山一样即将爆发出来。有的地方贴出了直指"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惊恐万状，紧急召集"指挥部"的坏头头和王洪文的一群小兄弟开黑会，密谋策划，炮制了一个以"反击"为代号的所谓"防止反革命暴乱实施方案"，每天命令一万余名民兵，二百辆汽车值班待命。并在上海各区频繁组织"民兵夜间拉练"，实际上是在搞反革命武装暴乱的预演。

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更是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加紧了装备"第二武装"的步伐。一九七六年六月，王洪文打电话给其余党，催促原"上海民兵指挥部"把仓库里的武器全部发下去。到八月初，那个在上海主持工作的"四人帮"余党发现还未落实，就叫嚷"要立即下发，明天就发"。于是，他们在八月份就匆匆忙忙下发了步枪七万三千余支，机枪二百挺，八二迫击炮三百门。在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二天，他们又在二十小时内突击下发子弹六百余万发，炮弹一万五千发。与此同时，"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余党，还根据"四人帮"要上海"经受大的考验"的"指示"，深夜窜到市"民兵指挥部"阴谋策划，狂叫要"加强战备"。市"指挥部"的头头也下令限时限刻搞由民兵单独进行的"城

市防卫方案"，并检查重点目标，部署应急力量。他们甚至连续进行所谓"战备演习"，丧心病狂地把罪恶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广大人民群众，指向华主席、党中央。

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于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消息传出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感到末日来临，但他们仍想依托上海这块基地，作垂死挣扎。从十月八日到十四日，这帮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多次召开黑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部署兵力，妄图负隅顽抗。他们确定了暴乱的兵力、弹药补给、通信保障和联络暗号，规定了重点保卫目标，设置了从郊区到市区的三道保卫圈和六个封锁口，还专门设立了基本指挥点和预备指挥点，架设了几十部电台。他们拔剑出鞘，推弹上膛，叫嚷"十年心血在于此"。十二日晚，当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确切消息传到上海之后，这帮家伙象赌徒输红了眼，狂叫要"马上干"，要停电断水，要炸铁路、毁桥梁、封港口、占机场、与党和人民"血战到底"。但是，正如毛主席说的那样：**"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上海民兵，同上海广大军民一样，岂受"四人帮"及其余党的驱使。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一经揭露，事实真相一旦大白，上海百万民兵就鲜明地坚决地站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奋起造了"四人帮"的反，摧毁了"四人帮"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黑司令部——原"上海市民兵指挥部"，纷纷揭发批判"四人帮"阴谋策划武装暴乱的反革命罪行。并且，在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同志主持的上海市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迅速从"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手里夺回了民兵的领导权和指挥权，恢复了上海警备区、各区(县)人民武装部做民兵工作的传统。事实证明，在上海称得起所谓"第二武装"的力量，不过是"四人帮"的一小撮死党、亲信、爪牙，一度掌握了上海市、区两级"民兵指挥部"大权的坏头头，和混进上海民兵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而已。他们一下子便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这对于"四人帮"来说，正是：十年经营，顷刻瓦解。

目前，上海全市广大民兵正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决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指示，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深入开展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的群众运动，努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进一步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为加紧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解放台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军事学术》1977年第5期)

附　　录

十年中我国与各国建交情况

亚　　洲

国名	建交日期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1968.1.31
科威特国	1971.3.22
土耳其共和国	1971.8.4
伊朗	1971.8.16
黎巴嫩共和国	1971.11.9
塞浦路斯共和国	1971.12.14
日本国	1972.9.29
马尔代夫共和国	1972.10.14
马来西亚	1974.5.31
菲律宾共和国	1975.6.9
泰王国	1975.7.1
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1975.10.4

非　　洲

国名	建交日期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	1970.10.15
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	1970.11.24
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1971.2.10
喀麦隆联合共和国	1971.3.26
塞拉利昂共和国	1971.7.29
卢旺达共和国	1971.11.12
塞内加尔共和国	1971.12.7
毛里求斯	1972.4.15
多哥共和国	1972.9.19
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	1972.11.6
乍得共和国	1972.11.28
上沃尔特共和国	1973.9.15
几内亚比绍共和国	1974.3.15

加蓬共和国	1974.4.20
尼日尔共和国	1974.7.20
冈比亚共和国	1974.12.14
博茨瓦纳共和国	1975.1.6
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	1975.6.25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	1975.7.12
科摩罗国	1975.11.13
佛得角共和国	1976.4.25
塞舌尔共和国	1976.6.30

欧洲

意大利共和国	1970.11.6
圣马力诺共和国（领事级正式关系）	1971.5.6
奥地利共和国	1971.5.28
比利时王国	1971.10.25
冰岛共和国	1971.12.8
马耳他共和国	1972.1.31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1972.3.23
荷兰王国	1972.5.18
希腊共和国	1972.6.5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72.10.11
卢森堡大公国	1972.11.16
西班牙国	1973.3.9

美洲

加拿大	1970.10.13
智利共和国	1970.12.15
秘鲁共和国	1971.11.2
墨西哥合众国	1972.2.14
阿根廷共和国	1972.2.19
圭亚那合作共和国	1972.6.27
牙买加	1972.11.2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1974.6.20
委内瑞拉共和国	1974.6.28
巴西联邦共和国	1974.8.15
苏里南共和国	1976.5.28

大洋洲及太平洋岛屿

澳大利亚联邦	1972.12.21

新西兰	1972.12.22
斐济	1975.11.5
西萨摩亚	1975.11.6

说明：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双方商定，各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据新华社北京1976年9月30日电）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1]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初期"左"倾错误和政治动乱对经济体制的冲击

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林彪、江青等人组成两个阴谋篡夺最高权力的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错误，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使全国陷入了全面动乱，我国的经济体制也遭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

一、颠倒是非的"革命大批判"造成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上的严重混乱

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展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把许多有关经济体制的正确的方针政策、规章制度、理论观点，都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东西横加批判，无限上纲，搅乱了人们的思想。而这种批判又是以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因此对经济体制的冲击尤其猛烈，造成的恶劣影响更为深广。

（一）对有关经济体制的正确的方针政策的批判和否定。

建国十七年来，党和政府在组织管理国民经济方面，制定和实行了许多正确的方针政策，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可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一切被诬为修正主义路线，遭到了错误的批判。其中对经济体制影响比较严重的有：

把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调整生产关系，在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前提下，允许农民有少量自留地、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以及在局部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等，批判为"刮单干风"、"复辟资本主义"。同时，鼓吹搞所有制的"穷过渡"，即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强行使集体所有制加快向单一的全民所有制过渡。

把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提倡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努力改善经营、增加盈利，诬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利润挂帅"。鼓吹"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等荒谬论调，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和经营管理。

把坚持社会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说成是"腐蚀工人阶级"，是"产生贫富悬殊和阶级分化的经济根源"。全盘否定计件工资和奖励制度，甚至连计时工资也企图否定，极力鼓吹在分配上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

---

[1] 这是《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章

把加强中央对经济工作的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斥为“条条专政”、“扼杀地方积极性”。大搞自成体系、各自为政的分散主义。

把严格责任制、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公然鼓吹要“建立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煽动无政府主义。

把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学习外国先进技术，诬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鼓吹闭关自守、盲目排外的蒙昧主义。

这种错误的批判，颠倒了是非，否定了我们党和政府建国十七年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制定的大量的正确的方针政策，否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而用一套“左”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而代之。它直接损害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把这一时期经济体制的变动引入了岐途。

（二）对合理的经济管理的规章制度的批判和否定。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和政府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农业、工业、商业、教育、科技等各方面制订了一系列比较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一切却被当成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遭到批判和否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一九六一年中共中央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即《工业七十条》）的批判。《工业七十条》中提出的各项规章制度和有关国营企业管理体制的指导原则，还没有来得及在实践中很好贯彻，就被全盘否定了。例如，《工业七十条》规定，国营企业是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又是国家计划指导下的、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有权自主地使用国家交给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有权与别的企业订立经济合同,有权选择工人的工资、奖励形式等等。这本来是对原来经济体制的新的改进，却被扣上一顶“把社会主义企业蜕变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大帽子，进而荒谬地把企业定性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要求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服从阶级斗争的需要。再如，《工业七十条》规定，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企业党委的主要任务是搞好调查研究、实行检查监督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而不要去代替厂长，包办行政事务。这本来可能成为实现企业内部党政合理分工的一个良好开端，却被斥为“摆脱党的领导”、“让‘走资派’篡夺企业领导权”。《工业七十条》在建立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搞好企业民主管理等许多方面提出的基本原则，对于国营企业经营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批判和否定《工业七十条》，对经济体制，尤其是对企业管理体制造成的消极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三）对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正确的理论观点的批判和否定。

五十年代后期，我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并吸取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大跃进”时期的深刻教训，围绕着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等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曾提出过一些有关改革经济体制的正确建议。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同志。他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就对改革我国经济体制问题，从理论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比如，要在计划工作中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要注意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要扩大并适当规定企业经营管理的权限，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要提高固定资产折旧率，并把折旧基金全部留给企业，等等。孙冶方同志的这些正确的理论观点，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就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阴谋家康生曾给孙冶方同志扣上“经济战线最大的修正主义者”的罪名。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孙冶方同志的理论观点当作“修正主义的黑标本”进行批判，这不仅在理论上混淆了是非，而且堵塞了研究、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

道路。

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是建立合理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理论前提。毛泽东同志过去曾多次明确指出，我国现阶段还要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还要坚持按劳分配。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左"倾错误的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某些设想和论点的误解，又把这些社会主义原则作为必须限制的"资产阶级权利"而加以否定。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大做文章，掀起了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张春桥、姚文元炮制反动文章，把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诬蔑为"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还说什么"如果不加限制，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发展起来"。这种错误的批判，是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一系列"左"的经济政策制造理论依据。由于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使这种错误的理论长期处于合法地位，给以后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很坏的影响。

二、政治动乱对经济体制的严重破坏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利用"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竭力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陷入全面动乱，经济体制也随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一九六六年五月至十二月，"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处处、层层揪斗"走资派"，搞垮各级党政领导机构和管理机构。开始时，工业企业相对说来，乱得还比较轻。十二月三日，林彪在党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工交战线有严重的阶级斗争，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大搞。由此，企业的正常生产很快被搅乱。一九六七年一月，王洪文纠集上海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得到"中央文革"的肯定和支持，遂使"夺权"风暴席卷全国。这以后，所谓"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大规模的各种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动乱的局势整整延续了十年之久。

首先是组织上被搞乱了。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管理机构，上至中央各部委，下至企业的生产指挥系统，都受到冲击，有的甚至被撤销；各级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挨批斗，被当成"走资派"而排斥；大量宝贵的档案资料被抢劫或销毁；一批投机分子、打砸抢分子、阴谋分子乘机爬上各级领导岗位。国家已不能正常行使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以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国家计划委员会为例，由于政治动乱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构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两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成立了一个仅十几个人组成的业务班子，并规定原计委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所谓"斗、批、改"。一九七〇年六月，又决定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员会、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中央安置办公室等九个单位合并，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全部编制为 610 人，仅占原有编制的 11.6%。这样薄弱的力量，显然不能胜任繁重艰巨的工作任务。这一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处于半计划或无计划状态。

社会生产秩序也被搞乱了。宪法、党章等成了一纸空文。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大肆泛滥。许多矿山、工厂停产或半停产，不少地方铁路运输遭到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党中央先后发布命令，对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及一批煤矿和重要工厂实行军事管制。

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一些重要规章制度遭到废弃或被随意更改，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例如，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见所谓"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头头，胡说现行的

合同工、临时工制度"就象资本主义对待工人一样"，"非造这个反不可"。在她的煽动、支持下，"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强迫当时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责人签发了一个《联合通告》，完全否定了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规定合同工、临时工一律不准辞退，已经辞退的，要召回来，并补发全部工资。从而引起了全国各地大批工人外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利待遇的风潮，严重地冲击了国家的劳动工资管理制度。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国务院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和一九六八年一月两次发出通知，宣布"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全国总工会、劳动部的《联合通告》无效，规定劳动、工资、福利、奖金等制度的改革，放到运动后期统一处理；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等，在中央未做出新的决定以前，一律不得转为固定工；企业利润分配办法也不允许擅作变更。

"左"倾错误和政治动乱对经济体制的冲击、破坏，还表现在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大搞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升级"、"过渡"和割所谓"资本主义尾巴"。"文化大革命"前，经过经济调整，我国所有制结构有所改善，集体商业、手工业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个体经济也慢慢有所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一进程发生了急剧逆转。一九六七年，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下，大刮集体所有制转全民所有制的歪风，搞所有制的"升级"、"过渡"（指农村由生产小队核算升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升为公社核算；"小集体"向"大集体"过渡，"大集体"向国营过渡）。一些地区将农民从事编织、采集、渔猎、饲养等家庭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尾巴"，统统砍掉；把自留地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复辟地"，强迫社员搞"三献一并"（献自留地、宅边地、自有果树，并队"升级"）。据统计，江西省三分之二的自留地被没收，四分之一的大队由小队核算升为大队核算。有些地方将城镇的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合作社以及合作商店作为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大砍大伐，保留下来的，也推行国营经济的一套管理制度。集市贸易几起几落，到一九七六年几乎已完全关闭。供销合作社也于一九七五年正式改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商业。

人为地使经济结构单一化，其后果是严重的。在农村强制扩社并队、轻率改变核算单位的过程中，集体经济又一次受到破坏，许多社队储备粮、公积金被"分光吃净"。对农村多种经营和社员家庭副业的限制，减少了农副土特产品的供应，引起市场紧张，影响人民生活。随着集体商业、服务业、手工业的缩减，集市贸易的关闭，以及个体商贩的取消，商业服务业网点大大减少，基本上形成了国营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流通渠道日趋单一。这样，一方面限制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造成买难卖难、吃饭难、做衣难、修理难，等等。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第二节　以盲目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的大变动

"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即一九六九年以前，经济体制已经受到了冲击和破坏。到一九七O年，又开始了一场以向地方盲目下放权力为中心内容的经济体制的大变动。

扩大地方权力，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下，让地方办更多的事，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要依据每个时期的情况，对扩大地方权力掌握一定的适度点。一九六一年后，适应调整任务的需要，在经济体制上强化了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随着调整任务的完成和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中央在

某些方面集中过多，影响地方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一九六四年后，权力的下放已经在某些方面开始进行。一九六六年三月，毛泽东同志在给刘少奇同志的一封信中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1] 这已经预示着，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一场以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的大变动即将开始，只是因为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全国陷入严重动乱，经济体制的变动才不得不暂时搁置了下来。

到了一九七〇年，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当时，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促成这次经济体制的变动，以及对于变动的方向，都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一是所谓"以战备为纲"，强调各地方都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在战争危险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全国军民保持高度的警觉，加强现代化国防建设，是完全必要的。但国防建设要同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并要按照统一计划、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当时，由于对国际形势的分析估计不够切合实际，认为新的世界大战随时可能爆发，便把对付国外敌人的突然袭击和大规模入侵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因此，要求各地方尽快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以便打起仗来能够各自为战。林彪一伙也妄图借战备之机，攫取更多的权力，极力鼓吹"以战备为纲"，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一九七〇年二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提出，根据战备需要，把全国划为十个协作区，各自建立适应独立作战的工业体系，做到"自己武装自己"。既然要求各地方各自为战、自成体系，势必同国民经济调整后形成的"条块结合、条条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生尖锐矛盾，从而客观上要求改变这种体制，把管理经济、管理企业的权力以及财权、物权、投资权等，更多地下放给地方。

二是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指示、高速度的"左"倾思想再度抬头。一九六九年，在国民经济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后，开始回升。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23.8%（其中工业增长34.3%，农业只增长1.1%），基本建设投资完成200.8亿元，比上年猛增78%。这使得一些人的头脑又开始发热起来。一九七〇年二月至三月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制定了《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纲要不切实际地确定一九七五年钢铁产量要达到3，500万吨至4，000万吨（比一九七〇年增长106—135%），生产能力要达到4，000万吨以上。电力、轻工等部门先后提出一九七五年产量翻一番的高指示。燃料工业部也提出"大干三年，扭转北煤南运"的口号，要求到一九七二年江南九省实现煤炭基本自给。其他各行各业也都在酝酿着要大上、要翻一番。当时认为，要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向地方下放权力，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所以《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重申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2] 并要求各省力争做到煤炭、钢铁、电力、农机、轻工产品等自给自足。与此相适应，要求将原来直属中央各部的企业都下放给地方统一管理，并扩大地方的投资权、招工权、生产计划权、物资分配权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九七〇年，一场以向地方下放权力为中心的经济体制大变动，根据二、三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的设想，随即在全国急速推行。

一、盲目下放企业，加剧了生产经营管理的混乱状况

这次经济体制的变动是从下放企业、调整企业隶属关系开始的。早在一九六九年，毛泽

---

(1) 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

(2) 毛泽东同志视察天津市的谈话，1958年8月16《人民日报》。

东同志就亲自批示把鞍山钢铁公司下放给辽宁省，以此告诉人们：象鞍钢这样大的企业都能下放，还有什么企业不能下放呢？一九七O年三月五日，根据《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精神，拟定了《关于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直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的通知（草案）》。《通知》要求国务院工交各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绝大部分下放给地方管理；少数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极少数的大型或骨干企业，由中央部和地方双重领导，以中央部为主。正在施工的各直属基本建设项目也按上述精神分别下放地方管理。《通知》要求部直属企业下放工作在一九七O年内进行完毕。

随之，全面展开了一场企业大下放的运动。在很短时间内，将包括大庆油田、长春汽车厂、开滦煤矿、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在内的2，6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不加区别地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管理，有的又层层下放到专区、市、县。冶金工业部原有直属钢铁企业70个，除两个独立矿山外，包括鞍山、本溪、包头、太原、武汉、马鞍山等大型钢铁厂在内，全部下放给地方，或实行以地方为主的双重领导。煤炭工业部原有72个直属矿务局，一九六八年下放22个，其余的50个，在一九七O年内也全部下放给地方。部直属的设计院、科研机构，除保留个别单位外，一律下放。第一机械工业部当时有直属企业310个，也全部下放给地方。

随着工业企业的下放，商业部也将所属一级批发站全部下放给省，省属二级批发站下放给专区。外贸部在各地的企业也全部下放地方，实行双重领导，以地方为主。各部直属的高等院校全部下放给地方管理。

总之，当时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力，似乎下放就是革命，下放越多越革命。

“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中央直属企业曾经增加到10，533个，其工业产值占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的46.9%，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2.2%。经过一九七O年的大下放，中央各民用工业部门的直属企业、事业单位只剩下500多个，其中工厂142个，中央直属企业的工业产值在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下降到8%左右。

针对调整时期某些方面集中过多的状况，适当下放一部分企业归地方管理，是应该的。但是问题在于：

第一，不加区别地下放，下放过多，将一些显然不应该下放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骨干企业也下放了。结果，地方管不了，不得不仍由中央部门代管，继续按“条条”下达生产计划、供应物资，地方实际上主要管劳动和资金，造成中央、地方多头多层管理，人权、财权、物权、计划权相互脱节，使企业形成“多头领导”、“婆婆多”、办事难的状况更加发展，企业的管理效率进一步降低。

第二，下放过急、过猛，组织工作没有跟上，打乱了原有协作关系，新的协作关系又未能及时建立起来，使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以维持，生产经营的经济效果大大降低。一九七O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一九六九年提高了10%，而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二年则分别比前一年下降了0.2%和1.5%。一九七六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只及一九六五年的一半，亏损企业达到三分之一，亏损金额达到73亿元。盲目下放企业，是造成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之一。

二、实行财政收支、物资分配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企业的隶属关系为转移的。企业隶属关系变了，相应地，计划的上报下达，资金的上解下拨，物资的集中分配，以及劳动力的安排等都

要随之发生变化。因此，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确定下放企业的同时，就提出了实行财政、物资和基本建设投资的“大包干”，以扩大地方的财权、物权和投资权。

（一）财政收支“大包干”。一九七O年拟订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要求大力发展地方工业，为实现这个要求，没有相应的财力保证是不行的。因此，随着企业的下放，又提出了下放财权的问题。在《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中规定：实行财政收支大包干，在国家统一预算下，对省、市、自治区试行定收定支，收支包干，保证上缴（或差额贴补)，结余留用或者全额分成、收入留成的办法。一九七一年，全国开始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的体制。国家财政收入除中央部直接管理的企业收入和海关关税收入归中央外，其余全部划归地方；国家财政支出除中央部门直接管理的基本建设、国防战备、对外援助、国家物资储备等支出归中央外，其余也全部划归地方，由地方统筹安排。各地方的预算收支经中央综合平衡，核定下达，收入大于支出的，按包干数额上缴中央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由中央财政按差额数量包干给予贴补。在执行中，超收或结余都归地方支配使用，短收或超支由地方自求平衡。这种“大包干”的财政体制，在大批中央企业、事业单位下放地方管理的条件下，大大地扩大了地方的财政权限。

上述办法执行后，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也很快暴露出新的矛盾：一是收入打不准。年初分配给地方的财政收入指标难以做到完全符合实际，执行中出现了一些事前意料不到的因素，形成有的地区超收很多，有的地区没有超收，甚至短收，地区间机动财力过于悬殊、苦乐不均；二是就一个地区看，有的年份超收较多，有的年份超收很少，甚至短收，机动财力不稳定，也不便于地方统筹安排；三是超收的全部归地方支配，短收的不能保证上交，还要中央补贴，实际是包而不干；四是有些地区把财政包干指标又层层包到地区和县，造成地方机动财力过于分散，等等。鉴于以上弊端，实行一年后就不得不对包干办法作出部分修订，规定年终支出结余仍留归地方。超收不满一亿元的，全部归地方，超过一亿元的，超收部分上交中央财政50%。即使作了这些修订，弊端仍然没有克服。一九七二年预算执行的结果，全国14个地区超收，地方分得9.3亿元，而15个地区短收21.8亿元，不仅不能上缴，反要中央补贴8亿元，结果中央财政负担了29.8亿元，增加了中央财政平衡的困难。

一九七三年又再次修订财政体制，在华北、东北地区和江苏省试行“财政收入固定比例留成”的办法。即财政收入按固定比例留成，超收另定分成比例，支出按指标包干。这种办法保持了财政收支包干的基本精神，使地方能有一笔比较稳定的机动财力，超收还可再拿一点分成，有利于促进地方积极组织收入。但它的弊病在于收支不挂钩，收入短少了，支出仍按原定指标，结果造成花钱在地方，平衡在中央。因此，这种办法也没有能按原计划推广。

从一九七六年起又改为实行“定收定支，收支挂钩、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办法。地方多收可以多支，少收则要少支，既保证地方有较稳定的机动财力，也可以使收支挂钩。这一形式与一九五九年实行过的“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体制基本一样，只是地方财政收支的范围扩大了，机动财力增加了。过去一个省的机动财力，一般大省一年5，000万元，小省只有2，000万元。一九七六年按固定数额分给地方的机动财力就达21亿元，加上地方预备费10.7亿元，共计31.7亿元，平均每省一亿元以上。

我国是一个大国，财政分级管理势在必行，因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权关系如何处理，是经济体制改革所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一九七O年后，财政体制几经变动，基本的一点就是试图以“大包干”为原则，寻求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权关系的适当方式。实践证明：这

种包干的财政体制虽然扩大了地方的财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方便了地方的统筹安排。但是，它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分配上吃"大锅饭"的问题，因而对积极性的调动是有限的。相反，它在某些方面又造成了财力分散，增加了国家财政预算平衡的困难。一九七一年财政结余为12.5亿元，而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财政只结余2，000万元和4，000万元，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分别出现赤字7.7亿元和5.3亿元，一九七六年财政赤字高达29.6亿元。

（二）物资分配"大包干"。建国以来，我国对重要物资一直实行由中央统一分配，以部门管理为主的体制，这对保证重点生产建设任务的需要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中央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不问事情大小都要层层申请，层层批准，影响效率，同时也不便于地区内和单位间的物资调剂，做到因地制宜、统筹安排、合理使用。一九七Ｏ年，随着企业的大下放，提出了试行物资分配"大包干"，即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这次物资管理体制的变动，目的在于扩大地方的物资管理权，并与企业隶属关系的变动相适应。

首先，调整和减少了国家统一分配和中央各部管理的物资种类。一九六六年统配、部管物资为579种，一九七二年减为217种，减少了60%以上。由于大量物资分配权层层下放，组织工作没有跟上，致使原有协作关系被打乱，削弱了物资的统筹安排和综合平衡，给生产建设造成了困难，以致一九七三年又将统配、部管物资增加到617种，基本上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状况。

其次，将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工作移交地方管理。一九七二年在华北地区和江苏省进行试点，将400多个下放单位的物质分配和供应工作交地方管理。但是，由于许多下放企业的产品面向全国，生产计划不得不仍由中央部安排，而中央部制订计划时不知道地方能给企业多少物资，地方分配物资时，又不知道中央给企业安排多少生产任务，生产任务与物资供应的衔接发生困难。并且，这些企业所需的物资数量大、品种多、质量高，且协作面广，地方也管不了，不得不仍由中央部代管，称之为"直供企业"（即由物资部门根据企业归口部下达的生产计划安排物资供应），这种"直供企业"全国就有2，000个。从一九七六年起，下放企业的物资分配供应工作就不再移交地方管理了。

再次，在国家统一计划下，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缴的办法。一九七Ｏ年开始，先后对水泥、煤炭、木材、钢材、生铁、废钢铁、硫酸、烧碱、汽车、轮胎，以及火工产品等共12种重要物资，在全国范围或部分地区试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的办法。一九七二年起，又在华北协作区和江苏省进行以地区为单位的"地区平衡、差额调拨"，也就是"物资包干"的试点。实行这种办法，就是根据各地区的生产和需求平衡的情况，按不同产品分别确定一定的调出量和调入量，然后由各地区统筹安排，组织对本地区企业的物资分配和供应。

实行物资"大包干"，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地方在物资平衡、分配、供应方面的权力，有利于地区内物资的统筹安排和合理使用。但是，由于物资管理上的分散，造成地区间物资调度困难，甚至发生火车经过一个省加一次煤的怪事。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往往不能保证必要的调出，影响重点生产建设任务的需要，特别是计划体制、物资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相互脱节，造成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物资包干的办法实际上也没有全面贯彻执行。

（三）基本建设投资"大包干"。一九七Ｏ年，国家在拟订《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同时，为了支持地方发展"五小"企业，实现自给自足、自成体系，提出了要"试行基

本建设投资大包干"，即按照国家规定的建设任务，由地方负责包干建设。投资、设备、材料由地方统筹安排，调剂使用，结余归地方。地方暂时办不了的少数重点项目，实行双重领导。

为了扩大地方的投资权限，首先决定下放基本折旧基金。一九六六年以前，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上缴中央。一九六七年决定将地方企业基本折旧基金留给企业和主管部门。随着企业的大批下放，一九七一年又决定除第二机械工业部、水电部的基本折旧基金仍上缴60%外，其余的基本折旧基金全部下放地方，用于设备更新、技术改造和综合利用。这部分资金的数量越来越大，一九七五年达到100亿元。下放一部分基本折旧基金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如能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对于挖掘企业潜力，改变生产面貌，都将有重要作用。但是，问题在于：下放的折旧基金实际上大量被挪用于基本建设。据估计，一九七五年有三分之一的折旧基金被挪用，数额达30亿元。这就拉长了基本建设战线，挤占了生产、维修用的材料和设备，冲击了国家计划。

为了支持地方"五小"企业的发展，国家在一九七O年还提出，在今后五年内，安排80亿元专项资金，由省、市、自治区统一掌握，重点使用。

一九七四年进一步采取按"四、三、三"的比例分配投资，即投资的40%由中央主管部门直接安排，30%由中央部商同地方安排，30%由地方统筹安排。这就使地方投资权又有所扩大。

据统计，由地方安排的投资，一九六九年只占预算内投资的14%，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提高到27%左右。地方投资权的扩大，促进了我国地方小型工业继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又一次大发展。由于缺乏正确的行业规划和强有力的计划指导，全国有近300个县、市办起了小钢铁厂，有90%以上的县建立了自己的农机修造厂。这些地方工业的发展，有的是合理的，有积极意义的，但不少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

此外，与企业的管理权、财权、物权、投资权的下放相适应，在拟定《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时，还提出了计划的制订，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实行由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在地区和部门计划的基础上，制订全国统一计划的设想。但是，由于下放的大批大中型企业产供销面向全国，经济联系面广，生产技术复杂，地方无法安排，生产计划不得不仍由中央各部负责安排。因此，计划管理上"条条为主"的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变，以"块块为主"的局面并未形成。这项改革实际上是不了了之。

三、简化税收、信贷和劳动工资制度，削弱了经济杠杆的作用

由于对所谓"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批判，否定了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提倡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遭到限制和排斥。一九七O年以后，在整个经济体制的变动中，对锐收制度、银行信贷管理制度及劳动工资制度也进行了某些变动。变动的方向，除下放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权限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尽力简化制度，包括简化税收制度、银行信贷制度和劳动工资制度等。

（一）简化税收制度。一九五七年以前，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我国实行的是多种税、多次征的复税制，比较有效地发挥了税收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一九五八年的税制改革，使税收制度简化。一九七O年召开的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又提出要改变国营企业的工商税收制度，一个行业一般按一个税率征收，并在一些地区进行了试点。

一九七二年为扩大试点，国务院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草案）》，规定这

次税制改动的主要内容为：(1) 合并税种，把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盐税、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税种合并后，对国营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对集体所有制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所得税，改变了对一个企业征多种税的做法。(2) 简化税目、税率。税目由过去的 108 个，减为 44 个；税率由过去的 141 个减为 82 个。在 82 个新税率中，不相同的税率只有 16 个，多数企业可以简化到只用一个税率征税。(3) 一部分税收管理权下放给地方，地方有权对当地新兴工业、"五小"企业、社队企业以及综合利用、协作生产等确定征税或减免税。

税收是重要的经济杠杆，是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而税收又主要是通过对不同的对象确定不同的税种、税目和税率发挥其调节作用的。这次税收制度的变动，将过去行之有效的复税制进一步简化，基本上成了单一税制，大大削弱了税收这一重要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税收管理权的一再下放，也导致政出多门，管理混乱，并减少了中央财政的收入。

(二) 简化信贷制度。在简化税收制度的同时，也对信贷管理制度采取了简化措施，包括合并机构，下放权力，改变信贷方式，简化利率种类，调整利率水平等。

一九七〇年，根据财政部军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的报告，国务院决定将中国建设银行并入中国人民银行。实践证明：这一合并严重削弱了对基本建设财务和拨款的监督工作，有时甚至连一些基本情况和拨款数字也反映不上来。为了加强对基本建设财务的管理和监督，不得不在一九七二年又恢复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及其在各地的分行。

在一九七〇年召开的全国财政银行座谈会上，还提出了下放信贷管理权，实行农村信贷包干，一定一年的信贷管理办法。

一九七一年底，又决定全面调整银行利率。调整的原则是简化利率种类，降低利率水平。调整后，城镇集体经济和国营企业实行统一利率。贷款利率一般降低 30%左右，存款利率一般降低 20%左右。并规定国营企业由此少支付的利息，应作为利润上缴国家。与此同时，取消某些优待利率。

简化利率种类，降低利率水平的直接后果是使利息这一重要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被进一步削弱。

(三) 简化劳动工资制度。建国以来，我国已基本上形成了以固定工为主，用工形式比较单一的劳动制度。"文化大革命"中，又对"两种劳动制度"进行了批判，大批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要求转为正式工。一九七一年，在整个经济体制变动的同时，国务院作出决定，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的临时工、轮换工制度。当时，全国共有临时工、轮换工 900 多万人，其中从事常年性生产的约 650 万人，从事临时性、季节性生产的约 250 万人。国务院的决定规定，在常年性的生产和工作岗位上的临时工，凡是企业、事业单位生产和工作确实需要，本人政治历史清楚，表现好，年龄和健康状况又适合于继续工作的，可以转为固定工（临时性、季节性的生产、工作岗位，仍使用临时工）。这一改变，使临时工在职工总数中的比重，由一九七一年前的 12—14%，下降到 6%，进一步强化了单一固定工制度，这既不利于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增加了国家安排就业方面的压力。

在此期间，为扩大地方的人权，还一度将增加临时工的权力下放给省、市，有的省又下放给专区、市，以致有一个时期职工人数的增加失去了控制。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二年，全国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增加 1，200 多万人，是建国以来第二次职工人数的大突破。后来，中央不得不再次收回权力。

我国的工资制度不仅形式单一，而且存在着吃“大锅饭”、平均主义的弊病，但就是这样的工资制度也受到了“左”倾错误思想的冲击。随着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大肆批判，一九六九年将企业综合奖改为附加工资，相应地取消了原规定按计划完成情况提取奖励基金的制度，改为按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职工福利基金。与此同时，也在实际上取消了计件工资制度。这就使我国的工资制度进一步单一化，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有了新的发展，严重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此外，在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影响下，还一再缩小商品差价，扩大了全国一种价格、地区之间一种价格、城乡之间一种价格的范围。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虽曾调整了一些工农业产品的价格，但大部分商品价格基本上处于冻结状态，因而，价格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第三节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五年经济体制的两次整顿及其挫折

十年动乱，从总的方面看，是一次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经济工作、包括经济体制的变动，受到了运动的冲击和破坏。但在其中两段时间里（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三年，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主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同“左”倾错误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艰苦斗争，着手整顿国民经济，并对经济体制进行若干调整。只是由于“左”倾错误，特别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中央占据着重要地位，整顿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更不可能发展成为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支持下，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同志主持。他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着手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他首先从工业战线的整顿抓起。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同志在听取国家计划委员会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乱得很，要整顿。批判林彪必须联系经济战线的实际，清除林彪一伙干扰破坏造成的恶果。会议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在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下，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工业的若干措施，其中包括加强国家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的政策，反对无政府主义等内容。在企业管理方面，明确规定要恢复和健全岗位责任制、经济核算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安全生产制度等七项重要的规章制度；要狠抓产量、品种、质量、燃料动力原材料消耗、劳动生产率、利润等七项重要指标。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工业企业的混乱状况而写的，但也涉及到企业管理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纪要》由周恩来同志主持讨论定稿后上报中央，但竟被江青、张春桥一伙借口“文件长了，不好发”而否定了。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同志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明确指出，林彪思想路线的核心是极左，要深入批判林彪煽动的极左思潮，肃清其流毒影响。一九七二年八月八日，周恩来同志在一次接见我驻外大使时，又提出要批判林彪鼓吹的“空头政治”，强调政治挂帅一定要挂到业务上，鼓励各级领导干部打消顾虑，理直气壮地抓业务、抓生产、抓管理。这一系列的正确意见，对于纠正“左”倾错误、扭转混乱的政治经济形势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却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阻挠和反对，始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多次指示精神，一九七二年十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财政部、农林部

在北京召开了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批判了林彪、江青一伙散布的"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只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等谬论，提出了要切实地抓好企业整顿，严格实行经济核算，建立健全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经营管理的基础工作。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允许国营企业在完成七项计划指标后，从利润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励基金，用于职工的集体福利和给先进生产者以物质奖励。紧接着，国家计划委员会又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提到一九七三年一月的全国计划会议上进行讨论。这个文件针对在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过于分散，以及企业缺少责任制、分配上吃"大锅饭"等现象，提出了有关改进经济管理体制的十条规定。主要内容有：加强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搞好综合平衡，反对地方各行其是；严格控制基本建设规模，不许乱上建设项目；职工总数、工资总额、物价等控制权集中在中央，各地区各部门无权擅自决定；中央下放的大中型企业，由省、市、自治区或少数省辖市管理，不能再层层下放；企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坚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广泛推行计时工资加奖励，少数重体力劳动可实行计件工资。文件草稿在计划会议上讨论时，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都很赞成，唯有上海市代表受张春桥操纵，表示反对。张春桥还气势汹汹地说：这是"拿多数压我们，我坚决反对！"并迫使将文件草稿收回。

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还对国防工业管理体制作了较大调整。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国务院决定将分散在军队各部门领导的一些电子工业企业，划归第四机械工业部统一管理。一九七三年九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统一领导几个军工部门及军工厂的工作。

这一时期，周恩来同志还顶着江青一伙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爬行主义"的压力，排除"左"倾思想的干扰，为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批准从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了一米七轧钢机、几套大型化肥成套装置和多套综合采煤机组等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设备，对于提高我国工业的技术水平、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起了良好的作用。

在工业进行整顿的同时，在农村也开始纠正一些"左"的政策。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要求各地不要生搬硬套大寨[1]的劳动管理办法和分配办法，而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从实际出发，着重总结本地的经验，采用群众乐意接受的、简便易行的办法。强调注意农业的全面发展，不能把党的政策所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批判。一九七三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又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林彪、陈伯达一伙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大搞"穷过渡"和"一平二调"、没收自留地、乱砍家庭副业的谬论和罪行，重申了现阶段党在农村的一些基本政策。

这一系列的整顿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生产增长，经济效益也有所改善，一九七三年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3.3%，不少工业产品质量严重下降的情况也有了转变。周恩来同志为纠正"左"倾错误而作的努力，使江青反革命集团极为仇视。一九七三年底，他们阴谋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一九七四年初，又开展了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其矛头都是指向周恩来同志的。各地的帮派势力也乘机起来闹事，使刚有转机的各项工作遇到新的挫

---

[1] 大寨大队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文化大革命"以前，他们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了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曾把他们的一些错误经验硬性推广，在全国造成了一些不良的后果。

折，稍稍安定的局势再度陷于动乱，国民经济形势迅速地恶化了。

一九七五年初，周恩来同志强调指出，为扭转局势，必须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并在一九七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重申了要在本世纪末在我国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宏伟设想，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但是，周恩来同志重申的宏伟设想却遭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攻击。

周恩来同志病重后，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主持中央的党政日常工作，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从各方面的整顿入手，开始比较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全面整顿是以解决铁路问题为开端的。由于"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造成徐州、郑州、南昌等地的铁路长期堵塞，京广、京津、陇海等几条铁路干线不能畅通，危及许多地区的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八日，中央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专门部署铁路整顿工作。邓小平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对铁路工作，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重申集中统一。"[1] 会议期间，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全国铁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集中指挥；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及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度；调整和充实各单位领导班子；大力加强对干部工人的组织纪律性教育，严肃惩治违法乱纪的坏人。由于贯彻了中央的决定，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严重堵塞的几个铁路局都疏通了，平均日装车量由二月份的4.3万车，增加到四月份的5.37万车，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接着是整顿钢铁工业。"批林批孔"以来，鞍山、武汉、包头、太原四大钢铁公司生产极不正常，一九七五年前四个月，全国钢铁欠产已达195万吨。五月，中央召开钢铁工业座谈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提出，从冶金工业部到各个厂，都要建立起坚强的、敢字当头的、有能力的领导班子，限期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发动群众同资产阶级派性作寸步不让的坚决斗争；落实好对老工人、老干部、老劳模和技术骨干的政策，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和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经过一个月的整顿，钢铁严重欠产的局面根本改观。六月初，中央又批发了中共江苏省委紧紧抓住领导班子整顿这个关键，狠斗资产阶级派性，从而解决了徐州"老大难"问题的经验，号召全国学习推广。九月，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2] 这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整顿工作，沉重地打击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各地的帮派势力，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动乱的局势又逐渐安定下来了。

在"治乱"初见成效、国民经济中"卡脖子"的薄弱环节也得到加强的基础上，就有条件通盘考虑整个经济工作的整顿和解决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问题了。一九七五年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召开会议，指出当前经济生活中的主要问题还是"乱"和"散"，必须进行领导班子、职工队伍、企业管理的全面整顿。在计划体制上，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的管

① 邓小平：《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5页。

② 邓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顿》，《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32页。

理办法，国家计划不能层层加码，也不能随便降低指标。在企业管理体制上，凡跨省市的铁路、邮电、电网、航运、民航、输油管和专业施工队伍、重要科研设计单位、重点建设项目以及大油田等少数关键企业，要以中央各部委为主进行管理，其余由地方管理，但也不能层层下放。在物资管理体制上，物资部门管通用物资，专业部门管专用物资。在财政体制上，推行"收支挂钩，总额分成"的办法；大中型企业的折旧基金，由中央集中 20—30%。以上这些意见，虽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改革，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这一时期在整顿国民经济、改进经济体制方面所做的努力和达到的认识水平，集中地反映在一九七五年七月到九月国务院主持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对这个文件十分重视，亲自主持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关键性的修改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是强调树立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把促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注意带动周围农村的发展；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进出口贸易形式可以搞得灵活一些，比如引进外国技术装备开采煤矿，可用煤炭偿付；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提倡工厂办科研，密切科学技术与生产的结合；把质量第一作为一个重要政策；以责任制为中心建立健全的规章制度；反对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和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召开的会议精神，将文件修改、增补为二十条（即《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以下简称《工业二十条》）。《工业二十条》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种种罪行和谬论，提出了发展我国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它不仅是整顿工业企业，而且也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文件。

《工业二十条》强调要抓好企业领导班子的整顿，要求限期改变"软、懒、散"状态，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建立起精干的而不是臃肿的、坚强的而不是软弱的、能打硬仗而不是一拖就垮的领导班子。规定所有企业都必须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查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等七项主要的生产管理制度；全面考核并切实抓好产量、品种、质量、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流动资金占用等八项主要的经济技术指标。每个企业都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强有力的、独立工作的生产管理指挥系统，负责搞好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直接处理，妨碍党委抓大事。

《工业二十条》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集中统一领导，凡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工农业主要生产指标、基本建设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重要物资的分配、主要商品的收购调拨、国家财政预算和货币发行、新增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必须由中央集中决策，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不得自行其是。国家计划要着重搞好综合平衡，重点安排好农、轻、重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生产维修和基本建设所需材料设备的比例关系，以及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关系等等。计划的制订，要广泛听取基层单位的意见，实行"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块块为主，条块结合"的办法，经过逐级协调平衡，订出全国的统一计划。中央下放给地方的企业以及地方原有的大中型企业，原则上由省、市、自治区和省辖市领导，不能再往下放，中央各部对这些企业仍要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管理。

此外，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方面，在密切科研工作同生产的结合方面，在工业支援农业、城市带动农村方面，以及在引进先进技术、积极利用国际市场等许多方面，《工业二十条》都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意见。可以说，它是继一九六一年的《工业七十条》之后，对我

们党领导工业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又一次全面的、系统的总结，对于工业的全面整顿和管理体制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惜的是，它还没有形成正式文件，就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扼杀了，未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在讨论制定《工业二十条》前后，国务院有关部门还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意见，起草了企业管理、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物价管理、劳动管理等条例，并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也都开展了整顿工作。特别是当时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胡耀邦同志，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起草了《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即《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针对"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和影响，提出了加强发展科学技术的一系列指导原则和具体政策。邓小平同志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都是适用的。

一九七五年的全面整顿，对于消除"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起了很大作用。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上升，当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9%（其中农业增长 4.6%，工业增长 15.1%），各个领域的工作出现了一派新气象，使备受动乱之苦的人民看到了国家由乱到治的希望。不幸的是，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顿被说成是"复辟"，《工业二十条》、《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撰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的文章被当作"三株大毒草"进行批判，后来又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正在得到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恢复并发展起来，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又陷入混乱，正在趋向好转的经济形势也再度恶化。

十年动乱中进行的经济体制的大变动，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生活的无政府与半无政府状态，使我国经济既乱又死的状况更为严重。重复建设、盲目建设迅速发展，形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一九七O年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比一九六九年猛增 73%，积累率由 23.2%上升到 32.9%，一九七一年又进一步提高到 34.1%，这是建国以来除"大跃进"时期外的最高水平。基本建设规模的迅速膨胀，带来了职工人数剧增，工资支出和粮食销售量失去控制，以致造成"三个突破"，即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人数突破 5，000 万人，工资支出突破 300 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 800 亿斤。一九七二年"三个突破"还在继续发展，到年底，全民所有制职工达到 5，610 万人，比上年增加 292 万人，职工工资总额达到 340 亿元，比上年增加 38 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 916.9 亿斤，比上年多销了 46.6 亿斤。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导致了工农业生产由暂时回升又迅速转为停滞、下降，市场商品匮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五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 6%，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了更加严重的困境。

第四节　评　　价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是在极不正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在周恩来、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期间，对国民经济和经济体制进行的整顿和调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左"倾错误在中央占着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经济体制的变动不可能沿着正确道路顺利进行，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下，反而使原有的经济体制遭到严重的破坏。

经济体制的较大变革，不仅需要有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而且需要有一定的政治条件。"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干扰和政治动乱的破坏下，无政府主义到处泛

滥，整个国民经济正常的秩序被打乱。在这种政治、经济背景下，注定经济体制的任何改革都必然要失败，而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变动的主要内容是盲目下放权力。指导思想是追求高指标，各个地区自成体系，自给自足；做法上是大哄大嗡，仓促从事。其结果是国家对宏观经济失去控制，正常的经济秩序遭到破坏。这次权力的下放，仍然是局限于中央和地方权限划分的变动，基本上没有涉及国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企业管得过细、过死，统得过多，企业缺乏经营管理自主权的状况并没有改变。相反，由于瞎指挥、强迫命令盛行，使企业更加处于无权的地位。

这次经济体制变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简化税收、信贷、劳动工资等制度。长期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过多地依赖行政办法，很少使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这次经济体制的变动，使各种经济杠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更加被削弱，甚至被取消了。行政办法，甚至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完全取代了经济手段。又由于各种规章制度一概被斥之为“管、卡、压”，或被废弃，或名存实亡，各级经济管理机构或被“砸烂”，或被“造反派”夺取权力，因而国家对经济的行政管理职能也就不能正常地行使。

总的说来，“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的经济体制的变动，使“大跃进”时期的“左”倾错误和原有体制上的弊病，不仅没有克服，反而有所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生活的无政府状态，使我国的经济建设不能有步骤地朝着合理的协调的方向发展。

“十年动乱”中经济的主要问题和教训[①]

第一节　全局性的恶果和某些领域的成就

在十年内乱期间，经济发展经历了“三起三落”。第一次是1966年上半年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由于1967、1968连续两年的大破坏而急转直下。第二次是1969年至1973年经济刚刚得到恢复、发展，1974年再次受到破坏。第三次是1975年经过整顿后，国民经济又有起色，由于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受到摧残

在这起伏不定的经济过程中，由于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也由于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在经济工作中片面强调为备战服务，坚持以钢为纲，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取消综合平衡，不讲经济效益，忽视人民生活，对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主要问题是：

（一）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在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1970年以后，积累率一直很高。在我国经济发展比较协调的“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2%，而“三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6.3%，“四五”时期增为33%，其中1971年达34.1%。在这十年，国民收入总额增长较慢，而人口却急剧增加的情况下，这样高的积累率必然要影响人民的正常消费。在积累额中，这几年用于住宅、城市公用事业等方面的非生产性积累的比重也不断下降，在“一五”时期为40.2%，而“三五”

---

① 此为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二十七章。

和“四五”时期却分别降为25.5%和22.4%。这实际上又进一步加剧了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

在产业结构方面，第一，由于片面强调“以钢为纲”，加强战备，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在全国投资总额中重工业所占比重，在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的“一五”时期只占36.1%，而“三五”、“四五”时期却分别达到51.1%和49.6%。因此，在工农业总产值中，从1966年到1976年，重工业由32.7%上升到38.9%，农业由35.9%下降到30.4%，轻工业由31.4%下降到30.7%。第二，在农业内部，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受到排挤，甚至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来增产粮食，也使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第三，在工业内部，由于过分突出钢铁和机械加工工业，不仅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在重工业内部加工工业与原材料工业也不相适应。从1966年到1976年，我国重工业产值中，制造工业的比重由50.5%上升到52.8%，而原材料工业却由38.3%下降到34.9%。，机械加工工业盲目发展，不少产品不仅技术落后、型号复杂、物耗很大、质量不高，甚至因不适销对路，造成大量积压。第四，在工农业生产与交通运输的比例方面，这个期间由于过分突出内地新线铁路建设，忽视运输繁忙地段的铁路旧线改造，使铁路主要干线的运输能力越来越不适应甚至限制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从1966年到1976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将近1倍，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5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不到77%。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只有28.2%。这与“一五”时期交通运输先行，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7.8%（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28倍），而全部货物周转量增长1.38倍(其中铁路货物周转量增长1.24倍)的情况，成为鲜明的对比。上述这些主要产业部门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突出地表明了在这个期间我国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它给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二) 经济管理体制趋于僵化。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原有经济管理体制的缺陷就逐渐暴露出来。主要问题是：第一，经济管理权力过分集中在国家行政部门手中，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缺乏必要的权力；第二，过多地实行直接计划控制，忽视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第三，在财政上统收统支，吃“大锅饭”，企业和个人不负经济责任；第四，生产资料统一调拨，日用工业品统购包销，供产销不能直接挂勾；第五，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域管理经济，割裂了经济的内在联系。所有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党从1956年就开始觉察到这些问题，并多次试图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但在长期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影响下，未能找到问题的症结，也未取得成效。在十年内乱中，由于强调备战备需要，把许多经济权力下放给地方行政机关，未能扩大企业和各种经济组织的权力，使整个国民经济更加缺少活力。其主要表现是：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1970年批判所谓“条条专政”，把包括许多大企业在内的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管理，要求各省尽快实现主要产品自给。这虽有利于各省发展地方工业，但却造成了不少重复建设、盲目生产、地区分割、自成体系的现象。在地区之间，不能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发挥各自的优势，组织分工协作，甚至以封锁抵制竞争，保护落后的企业。企业在地方行政管理下，仍然缺少必要的自主权；而不少由中央下放的大企业，由于原来面向全国的供产销关系被割断，地方又无力解决，经营更加困难，不得不改为中央直供企业，形成多头领导。

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既缺少科学的有效的统一计划，更排斥了市场的调节作用。由于多年动乱，也由于“左”的指导思想，经济决策失误较多，计划常常不能正确地指导经济的

发展。市场方面，由于所有制急于向更高的公有化过渡，在农村三番四次取消自留地，禁止家庭副业，在城镇取消个体经济甚至排挤集体经济，流通的范围越来越小，渠道越来越少。1968 年就已规定，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社员一律不许经营商业。1970 年又重申除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和有证商贩外，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准从事商业活动。到了 1975 年，正式宣布供销合作社并入国营商业，工业部门的自销门市部除个别外一律交由商业部门经营，城市集市贸易全面封闭，农村集市也严加限制。至于价格，从 1967 年起就一律冻结，更从根本上排除了市场的调节作用。

在劳动者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上，由于曲解、诋毁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反对按劳计酬，企业取消奖金、计件工资，农村人民公社按劳动力等级实行固定工分制，进一步助长了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倾向。

(三) 经济效益全面下降。

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僵化，加上政治上动乱，企业管理应有的规章制度被破除，内地建设中又错误地强调了靠山、分散、进洞，导致全社会经济效益的下降。投入不断增多，产出日趋减少，这是这个时期十分突出而明显的事实。最集中的表现是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由“一五”时期 35 元，降到“三五”、“四五”时期分别只有 26 元、16 元。在工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税金，由 1966 年的 34.5 元，降到 1976 年只有 19.3 元。在商业方面，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由 1957 年的 20 元，降到 1976 年只有 9.7 元。在基本建设方面，固定资产的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时期的 83.7%，降到“三五”、“四五”时期分别只有 59.5%；61.4%。非政策性亏损的企业数目不断增多，亏损金额也越来越大。

(四) 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高效累、低效益，必然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全民所有制各部门职工除 1971 年调整一次工资外，再未动过。从 1966 年到 1976 年，平均工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降低了 4.9%。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十年合计达 1，600 多万人，给职工增加不少负担。加上城镇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建设、职工住房、学校、医院等没有注意增加，许多轻纺产品质次价高、花色品种长期未能改进；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商业网点、服务行业又大批并缩，城市人民生活的困难和不便与日俱增。农民的平均纯收人，在这十年中也基本上没有增加。由于农村急于过渡，生产中又片面强调“以粮为纲”，而农副产品价格又被卡得很死，广大农民长期以来终年劳碌，收入很少。在相当一部分贫瘠低产地区，不少农民难保温饱，甚至需要国家救济、或者外流就食。

上述这些比例关系失调，管理体制僵化，经济效益低下，人民生活困难问题，在这十年中不断加剧，终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带有全局性的，一时难于根本医治的“顽症”。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持不懈地努力，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在某些领域仍然取得了进展。主要是：

(一) 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

在这十年期间，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改善。前几年大批建设的水利工程，进一步配套发挥效益。特别是农业现代化装备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6 年拖拉机和手扶拖拉机的产量达到 7.37 万台和 24 万台，分别相当于 1965 年的 6.7 倍和 66 倍，全国 1／3 耕地实行了机械耕种。1976 年农村排灌动力机械的拥有量比 1965 年增长了 4.9 倍，机电灌溉面积占总灌溉

面积的53.9%，比1965年增加1倍多。1976年农用化肥产量达524.4万吨，比1965年增加2倍，每亩耕地的化肥施用量达7.8斤，比1965年增加了2.1倍。此外，1976年农业用电平均每亩达13.7度，比1965年增加了4.7倍；农村载重汽车拥有量4.8万台，比1965年增加3.3倍。

由于有了上述比较有利的条件，因此在十年动乱中，农业的平均发展速度仍然达到3.9%。粮食生产稳定增长，1976年达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6亿斤。在人口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同期按人平均的粮食产量由544斤增加到610斤、增长了12.1%。其他农作物总产量也有一定增长，但按人口平均，则几乎没有增加，油料、棉花还分别比1965年减少20%和25%。

（二）建设了一批技术先进的大型工业企业。

首先是石油工业。在这十年中，石油资源进一步探明。大庆油田连年大幅度增产，形成为年产5，000万吨原油的大型企业，山东胜利油田和天津大港油田也初具规模。我国原油产量1976年达8，700多万吨，相当于1965年的6.7倍，我国由贫油国一跃而成为自给有余的产油国。随着原油产量的增加，石油化学工业迅速崛起。1973年引进并先后施工建设的13套大型化肥装置，生产能力合计为合成氨357万吨、尿素580万吨。同时引进的北京、上海、辽宁辽阳、四川长寿等地的大型化工、化纤装置，也先后开始安装建设。

冶金工业这几年新建了四川攀枝花钢铁厂，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重要企业。攀枝花地区有丰富的煤铁资源，自从解决了钒钛磁铁冶炼技术后，1970年开始出铁，1976年钢铁厂已初具规模。为了解决钢材品种问题，当时引进的武汉钢铁公司一米七轧机工程，设计能力为热轧钢板300万吨、冷轧钢板100万吨、硅钢片7万吨，全部采用国外新技术，具有大型化、自动化、高速化、连续化的特点。这项工程于1975年正式施工、1978年全部建成投产。

此外，机械工业建设了湖北第二汽车厂、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械厂，陕西富平压延厂，四川大足汽车厂等一大批企业。煤炭工业建设了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顶山、芙蓉山，山东兖州等大型煤矿。电力工业重点建设了甘肃刘家峡，湖北丹江口等一批水电站和火电厂。著名的湖北葛州坝大型水电站及由国外引进设备建设的唐山陡河电厂，也开始动工建设。

（三）建成了一些内地铁路干线和长江大桥。

全长1，085公里的成昆线，，北段自从1966年通车到甘洛后，经铁路工人和解放军战士继续奋战，在1970年完成了最艰巨的路段，通车至西昌，与同时建成的南段相联结，并于1971年全线交付营业。全长820公里的湘黔线，自1970年继续由湖南金竹山向西修建，1974年到达贵州贵定，完成了该线的主要路段。全长760公里的焦枝线（河南焦作到湖北枝城），自1965年开工，1970年7月建成。接着北面的太焦线（山西五阳至河南修文，全长209公里），南面的枝柳线（湖北枝城至广西柳州，全长885公里）也全面动工，后来都在1979年正式完工。此外，还修建了湖北襄樊至四川重庆的襄渝线，并在该线的安康另修一条铁路与宝成线上的阳平关相连接。华北地区继续修通了京原线（北京至山西原平），还建设了通坨线。（北京通县至河北坨子头）。

宏伟的南京长江大桥全长6，700米，是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双层铁路、公用两用桥，1959年动工建设，1968年完工。大桥建成后，两列对开的列车只需6分钟就顺利到达彼岸。

此外，为了适应石油工业的发展，1974年建成了从大庆油田到河北秦皇岛我国第一条

长距离输油管道，接着又建成了秦皇岛到北京、山东临邑到南京等输油管道。邮电通信方面，1976年建成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同轴1，800路载波通信干线，和连通全国20多个省市区的微波通信干线。北京、上海还各建了一座卫星地面站。

（四）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在这期间，我国广大科技人员冲破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在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推广、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培养水稻杂交种，国外几十年前就有人研究，但一直未能用于生产。1964年我国农业科学工作者开始进行研究，1972年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共同组织全国性的科研协作，配制出一批一代籼型杂交水稻种，一般比水稻良种增产20%左右，为我国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自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1966年5月9日进行了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1967年6月17日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这颗氢弹距离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时间仅2年8个月，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1969年9月23日，我国又首次成功地进行了地下核试验。在空间技术方面，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次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导弹飞行正常，精确命中预定目标。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颗卫星重173公斤。1971年3月3日又发射了一颗重212公斤的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在运行中成功地发回了各项科学实验数据。1975年11月26日，我国发射的人造地球卫星，在正常运行后，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使我国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第三个能回收卫星的国家。

在此期间，我国在经济遭到破坏的困难情况下，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数目相当可观的经济援助。

当然，以上这些建设成就，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辛勤劳动的结果。它决不表明“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也不可能改变我国在这十年经济畸形发展中的困境；它只能表明如果没有这场十年浩劫，我国的经济建设将要快得多，建设成就也将要更大得多。

第二节　历史的教训

“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从经济工作方面说，这个时期除了重复“大跃进”时期中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的“左”倾错误外，还有以下几条教训。今后应永远记取。

（一）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

政治总是要与一定的经济相适应，要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作用，既表现于保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表现于保证安定团结，以促进经济的正常发展。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以后，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无产阶级政治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新的生产关系下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积极因素，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但是“文化大革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了一场向所谓“走资派”夺权的“全面内战”，使全国陷入动乱。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把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诬蔑为

"只拉车不看路"。结果我国经济在十年期间，在动乱的政治影响下，几度停顿或倒退，不但使经过调整得来不易的大好经济形势丧失殆尽，而且整个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没有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就不可能有经济的正常发展。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发展经济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基本任务。当然，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在一定范围内开展阶级斗争，仍然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所必要的。但是，如果夸大阶级斗争的形势，把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为全局性的阶级对立，主张一切都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所谓政治大革命，不但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反而成为经济发展中一股极大的破坏力。"天下大乱"只能是乱了自己，"政治冲击一切"首先是冲击了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国内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为了长期地、稳定地发展生产力，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努力消除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彻底肃清"左"的错误，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生产建设，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

（二）思想理论上的谬论，必然导致错误的经济政策。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理论的重要性，正如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确的理论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并在指导实践中接受检验，不断发展。如果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科学的理论当作教条来奉行，或者用歪曲了的所谓理论去指导实践，那么不但不能推动，而且必然束缚、甚至破坏经济的发展。十年内乱期间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在一些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例如，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资产阶级权利"发生了误解。把按劳分配中等量劳动交换原则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似乎按劳分配本身就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权利，把消费资料的分配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几乎全部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都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来说应当否定的按劳分配所体现的"资产阶级权利"，误解为社会主义社会就应该破除的弊端。又如，机械搬用了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把列宁在1920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很不巩固，小农经济尚未改造，富农投机十分猖獗的情况下提出的观点，搬用到了社会主义改造早已基本完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根据这些错误的理论制订的城乡经济政策，必然愈来愈"左"，愈来愈脱离我国实际。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把这些错误的理论进一步推向极端，把坚持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分配制度及人与人的关系，统统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全部当作"走资派"打倒。结果十年期间个体经济被取消，集体经济受压制，商品交换萎缩，许多生产门路被堵死；国营企业生产不计成本，经营不问盈亏，大量社会财富被白白浪费；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干与不干一个样，大家躺在国家身上吃"大锅饭"。所有这些，极大地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极大地挫伤了我国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再一次告诉我们，要保持理论指导的正确，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国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必须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经济形式长期并存。党中央早在八届六中全会就曾指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原则，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因此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必须贯彻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采用各种有效的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同时，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多种流通渠道，在国家计划统一领导下，灵活运用价格、税收、利率等经济杠杆，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和市场的调节作用，搞活国内市场，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三）必须正确估计国际形势，对生产力布局的改变，不可操之过急。

生产力的地区布局合理与否，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安全，都是关系十分重大的。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生产力布局极不平衡，现代工业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资源丰富、地区辽阔的内地，则经济比较落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我们决不能有丝毫麻痹。为了开发我国内地的丰富资源，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防御外敌可能入侵的威胁，我们必须注意努力加强内地的工业建设，逐步改变不合理的地区布局，有计划地建立我国巩固的战略后方。

关于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际建设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作了正确的阐述。但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特别是七十年代初期，由于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过分突出强调备战，对加快内地建设要求过急。当时，一是只强调加快内地建设，未能兼顾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对内地省区片面强调建成独立的经济体系，未多注意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三是在内地建设中过分突出国防工业及其有关的重工业，忽视了对轻工业、农副业、文教卫生、职工住宅等必要的安排；四是许多建设项目又因执行了"靠山"、分散、进洞"和"边勘测，边设计，边施工"的错误方针，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和损失。其结果在这十年内地建设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尽管建设了不少骨干企业，但总的来说，经济效益很差，并且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遗留下不少严重的问题。这是"三五"、"四五"期间经济建设中一个付了很大代价的教训。

实践证明，对于国际形势、战争危险应有正确的估计，既要保持应有的警惕，又要看到世界人民的团结斗争完全可能推迟、甚至制止外敌的入侵；应当努力争取、抓紧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不应片面夸大战争的危险。同时，对于改变地区布局的艰巨性、复杂性，也应有足够的认识。要看到我国内地由于经济基础差、交通不便，建设条件和投资效果都不如沿海地区，根本改变地区布局决不是短期内所能实现的。在我们努力加强内地建设的同时，只有充分利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注意发挥内地各省区的资源优势，加强有关地区、企业之间的协作配套，组织军工与民用相结合，努力做到综合平衡、循序渐进，才能逐步改变我国不合理的地区布局。

（四）科学的管理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是现代化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

现代化的大生产，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普遍使用现代生产手段，以进行细致的分工和严密的协作为其基本特点。与这种特点相适应，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特别是企业中要求建立一套科学的、完善的管理制度，并依靠严格的纪律来保证其贯彻实现，否则，社会化的大生产无法正常进行，经济生活必然陷于严重的混乱。正如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对现代化大生产所作的详细分析后指出的："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1]

我国现代化大生产的发展历史比较短，已建立起来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办法还不够完

---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备，存在不少缺点，需要继续加强和改进，但它们毕竟有助于建国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正常进行。十年内乱期间，各项经济管理制度，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冲击和破坏。许多必不可少的规章制度，被扣上了“管、卡、压”、“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条条专政”之类帽子，统统作为“修正主义‘黑货’”来批判。在当时崇尚“造反有理”、盛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有法尚且不依，无章更加妄为，经济管理长期处于极端混乱的状态。生产节奏被打乱，管理漏洞百出，纪律涣散松弛，致使相当数量的企业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产品质量下降，责任事故增多，经济效益很差。

实践证明，管理在现代化大生产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没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的设备和掌握这些技术设备的科学技术人才固然不行，缺少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人才，同样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管理也是生产力。同样的设备、技术队伍，管理得好或者不好，效果大不一样。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上不但要致力于生产能力的扩大，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必须十分重视学习和引进先进国家的科学管理经验，改进我国的管理制度和办法，培养管理人才，实现管理的现代化，向管理要速度、要效益。

（五）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前途的重大战略问题。

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正如周恩来所说，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科学技术是依靠人来掌握和发展的，懂科学、有技术的人才的多寡和水平的高低，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科技人才的培养与使用问题，不仅对于当前的建设，而且对于长远的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年内乱中，知识分子普遍被贬为“臭老九”，受到歧视和压制，许多科学家和教授则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挨批斗。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干扰和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艰苦努力已经与世界先进水平逐步接近的许多领域，重新拉大了差距。教育战线更是十年浩劫的重灾区。停课“闹革命”，使教学活动荡然无存，一些高等学府一度成了武斗的战场；关于教育战线的“两个基本估计”[①]以及据此提出的一整套“左”的政策，使正常的人才培养根本无法进行。高等学校直到 1982 年才重新有经过比较正规学习的大学生毕业，中间整整隔了十五年之久。结果不仅少培养了大学毕业生约 100 万人，中专毕业生约 200 万人，造成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比例严重失调。而且在我国科学技术队伍的组成上，出现了一个长达十年以上的空白。不论经济管理部门，还是科研单位和工商企业，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的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都明显缺乏，给人才队伍的接续造成了很大困难。这个损失，较之物质生产的损失，是更为巨大、更难以弥补的。

“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战略问题。在研究经济发展战略时，必须把人才问题放到重要位置来考虑，在重视物质资源开发的同时，充分注意智力的开发。由于十年动乱的影响。各种专门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我们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各种途径，包括对原有科技人员的知识更新和年轻科技人员的大胆起用，迅速造就一批高质量的建设人才。这样，既可以部分地挽回过去的损失，也是我国经济振兴的真正力量所在。

（六）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是一个基本国策，决不能等闲视之。

---

①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四人帮”控制下提出：解放后的十七年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大多数教师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对此，后来简称为两个基本估计。

人是生产者，是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口的增长，可以组织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也可以为各种消费品提供广阔的国内市场，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人的一生都必须消费生活资料，在成年就业以前和老年失去劳动能力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还是不创造社会财富的纯粹消费者。人口增长过快，每年增加的国民收入过多地耗费在维持新增加人口的需要方面，既限制了积累的增加，也影响全部人口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还会给劳动就业、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住宅、交通和城市公用设施的建设等方面带来沉重的压力。更严重的是人口问题不象物质生产，某些物质生产部门一旦发展过快，比例失调，可以及时通过调整有意识地收缩。人口如果盲目增长，其后果只能由社会一直承担下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口的发展比经济发展更需要有计划地进行。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多是我国基本国情。但是，在相当长时间里，我们对于这个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制约因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六十年代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强调了计划生育工作，但在十年内乱中，因各级政府机构瘫痪，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这项工作一度几乎无人过问，即使后来抓了，也很难贯彻。结果在物质生产遭到破坏的同时，人口失去控制、长时间地盲目增长，十年增加了近2亿人。而且，由于人口基数大，即使努力控制出生率，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仍将很大，并不断加大对生活资料和升学、就业等需求的压力。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本来就比较低，每年能增加的国民收入很有限。人口这样盲目膨胀，新增的国民收入在解决新增人口所必须的消费资料后，能够拿出来用于追加建设的资金已很微弱，改善全体人民的生活就更难了，这样势必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劳动就业问题处理不好，还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在人口控制方面的深刻教训，我们应当永远记取。今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忘记人口多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人口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的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改善的程度。我们必须采取坚决措施，把实行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长期地坚持下去。

（七）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才能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是也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我们的经济建设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国际交往。因为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交换的扩大，不但国内市场愈来愈大，而且已经从国内交换扩展到国际交换。同国际市场联系起来，扩展对外贸易，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以及发展各种形式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都是以自己的长处，通过平等交换，补自己的不足。这不但不会妨碍，而且必然会增强我们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四化建设的进程。"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努力下，我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由于中美、中日建交而大大前进了，当时利用有利的外交形势，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对我国经济建设是有重要作用的。但在十年内乱期间，"四人帮"把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与经验，当作"崇洋媚外"来批判。他们挑起所谓蜗牛事件和买船事件，以此攻击国务院领导推行了"卖国主义"、"爬行主义"，为继续开展国际经济交往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得我国在日趋活跃的国际经济活动中闭目塞听、自缚手脚，错过了发展经济的宝贵时机，极大地延误了四化建设的进程。

实践证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但是对我们经济工作来说，当前更迫切需要的是打破闭关锁国、墨守陈规的"左"的思想影响，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我们应当充分发挥我国的优势，放开手脚，争取更多的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总结历史经验，在复杂的国际交往中迅速学会开展对

外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本领；充分发挥沿海地区的有利条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加强同一切愿意和我国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国家和人士的联系和合作，以便利用国际上的资金、资源、市场和先进的经验和技术，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十年内乱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

——兼论这一期间统计数字的可靠性

李 成 瑞

不久前出版的国家统计局编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一次分布了从 1949 年到 1982 年共三十四年中每个年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数字，其中包括十年内乱即"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1976 年）每个年度的数字（1982 年出版的《年鉴》，有些指标只列每个阶段头年和末年的数字）。有些人问："文化大革命"中统计工作受到严重干扰破坏，这十年的统计数字是怎样取得的？它的可靠性如何？从发表的数字看，"文化大革命"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6.8%、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 4.9%，这是否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如果说这些数字是基本可靠，反映实际的，那么，对十年内乱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情况应当怎样看待?它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本文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说明一些情况、谈谈个人的看法。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情况，过去由于没有公布数据，难以做深入的研究。现在有了数字，可以这样做了。我认为，对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完整更深刻地认识建国以来经济工作的历史经验，而且对于当前和今后的经济工作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

首先从十年内乱期间统计数字的来源和可靠性谈起。

我国的统计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在十年内乱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破坏。在 1967、1968、1969 年三年中，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工作几乎完全停顿（国家计委尚有少数人收集少量数据），国家统计局的大部份干部被下放劳动或调走了。各省、地、县和各部门、各单位的统计工作虽然没有完全中断，但许多统计机构的负责人被当作"走资派"来斗争，许多统计制度被当作"修正主义"来批判。这种情况，对国家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为了扭转这种情况，周恩来总理在 1970 年明确指出："统计工作不能取消，统计机构还要有，基本统计还是要搞的、但不能搞烦琐哲学。"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国家计委内部设立了统计机构，并由国家计委于 1970 年 5 月 14 日发出通知，要求自当年 5 月起，恢复工业、农业、基本建设、职工人数和工资总额、社会商品零售额、工业财务成本和物资库存等定期统计报表制度，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门搜集、整理、补报过去三年的统计资料。1971 年 8 月 20 日到 9 月 22 日、国家计委召开了有二百多人参加的全国统计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国民经济基本统计报表制度。1972 年以后各个年度，统计工作尽管仍受到不

同程度的干扰，但总的趋势是在逐步恢复。特别是 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政治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当时，为了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报告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完成情况，许多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亲自抓统计年报工作，增加了统计机构的人员和经费，统计工作颇有起色。1976 年虽有“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干扰，但主要数字的统计还在继续进行。

这里要说明，在国家一级综合统计工作中断的三年中，有若干部门、地区和许多基层单位还在坚持进行统计工作。从专业部门看，有三个系统仍在坚持或基本坚持：一个是银行、财政、税收系统；一个是铁道、交通、邮电系统；一个是商业、粮食、外贸系统。其中尤以人民银行各级机构的数字较为完整、准确。尽管当时武斗时有发生，环境动荡不安，但作为社会“总簿记”的银行账目，始终没有乱，没有断，这对于以后补上当时的统计数字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后来许多部门和单位都到银行去核对账目。银行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赢得了“铁帐本”的赞誉。至于基层单位，只要生产还在进行，一般都保存了若干原始记录和帐表。许多统计人员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仍然采取各种形式进行抵制，坚持工作。有些统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基层统计员在街上武斗、枪弹乱飞的情况下，仍然堵起窗户作报表，积累了基本的统计资料。此外，不少地区的“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为了工作的需要，自己布置了一套报表，收集了相当数量的统计数字，包括每年农产量的数字和工业产值、主要产品产量的数字。

总之，十年内乱中，国家级综合统计中断了三年，其余七年还是大体坚持了基本数字的统计；在国家级综合统计中断的三年当中，不少部门、地区、单位并没有中断，仍然收集和保存了不少重要的统计资料。

那么，1967—1969 年三年的全国性统计数字究竟是怎样补上的呢？如前所述，这一工作是在 1970 年 5 月统计机构恢复后不久着手进行的。经过各级统计人员深入收集和反复核对，到 1971 年底，这三年的主要数据基本补全。具体做法是：农业统计数字，一方面收集各地方“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积累的产量数字；一方面收集商业部门、粮食部门的农产品收购数字，按国家对各种农产品收购的比例和农民自用自销部分的比例加以估算，然后把两方面的材料加以核对，纠正某些地方夸大的产量数字。此外，还根据各个年度农村集市贸易粮价的涨落情况对产量数字的可靠性加以分析鉴别，得出定案数字。工业统计数字，一方面向地方和企业收集账表和原始记录材料；一方面同银行往来账目、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购销账目以及财政部门收缴利润和税收的材料相互补充、相互核对，尽量纠正由于生产管理混乱、计量不准所造成的数字误差，然后得出定案数字。商业统计数字，由于各个公司、商店的会计工作一般没有中断，在此基础上结合若干业务统计材料加以整理，并同银行往来账目相核对，然后定案。外贸部门的统计比较完整，可靠性较高，一般按当时统计材料上报。基本建设投资数字，首先向各地收集资料，再把这些资料同财政拨款和银行结算的数字相核对，然后定案。经过各级统计人员和有关人员的艰苦努力，当国家统计机构把整理编印的包括“文化大革命”以来各个年度数字的《国民经济统计提要（1949—1969）》送到国务院时，周恩来总理立即从头到尾仔细审阅，看完后高兴地说：很好，立即印三百本，以便发给中央委员，大家好长时间不了解全国经济情况了。周总理还对改进和完善《统计提要》做了具体指示。

1967—1969 年三年空缺的主要数字是补全了，但有些较细的分组数字或分年数字，如工业生产中的某些经济技术指标、农村人民公社分年度的收益分配数字等，没有补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级统计机构从国家计委中分立出来，恢复了国务院直属

的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通知各部门、各地区对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进行了核对，并将其中一些不确实的数字作了改正。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国家统计局在1980年编出了《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在内部印发，请各地方、各部门对其中"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数字再一次进行核对。1982年编印第一本《统计年鉴》时，因核对工作尚未完成，所以没有列入。直到这次核对完毕之后，才在最近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公开发表。

总之，现在公布的十年内乱期间的数字，尽管有若干估算成分，但数字来之有据，又经过反复核对，可以说是基本可靠的。

二

下面，具体地分析一下这十年的数字是否反映了当时国民经济总的发展变化趋势。

请看十年内乱期间各年度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数字与上年的比较（以上年为100)[①]：

下表中的数字反映了这十年国民经济所经历的"两起三落"的曲折过程，展现出这一期间政治上广大人民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反复较量，经济上的破坏与反破坏此起彼伏，生产的上升与下降交替出现的历史情况。从表中数字可以清楚地看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三次大破坏。第一次是1967年和1968年。1967年社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9.9%，1968年再降4.7%；国民收入，1967年下降7.2%，1968年再降6.5%。当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夺"走资派"的权，煽动"踢开党委闹革命"，谁要是抓生产就扣上"以生产压革命"的帽子把他打倒。由于周恩来总理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以及广大人民的斗争，从1969年到1973年这五年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逐步回升。其中，1969年国民收入增长19.3%，是由于前两年连续下降，带有恢复、补偿性质；1970年增长23.3%，1971年增长7%，主要是内地建设，投资猛增，促使重工业加快发展的结果。1972年增长2.9%，速度较低，主要是气候不好、农业减产所造成的。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了第二次大破坏，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谁要是抓生产就扣上"儒家"的帽子把他打倒。这一年，社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到1.9%，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下降到1.1%，其中工业净产值比上年降低0.9%。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召开了解决工业、农业、科技

年份	社会总产值	其中		国民收入
		工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1967	90.1	86.2	101.6	92.8
1968	95.3	95.0	97.5	93.5
1969	125.3	134.3	101.1	119.3
1970	124.1	130.7	111.5	123.3
1971	110.4	114.9	103.1	107.0
1972	104.4	106.6	99.8	102.9
1973	108.6	109.5	108.4	108.3
1974	101.9	100.3	104.2	101.1
1975	111.5	115.1	104.6	108.3
1976	101.4	101.3	102.5	97.3

① 社会总产值是指工业、农业、建筑业、交通邮电业、商业五个物质生产部门总产值之和；国民收入是指这五个物质生产部门净产值（总产值扣除物质消耗）之和。

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这一年，社会总产值增长 11.5%，国民收入增长 8.3%。为时不久，江青反革命集团发动了第三次大破坏，大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批“唯生产力论”，谁要把生产搞好了，就攻击他是“为走资派涂脂抹粉”；再加上唐山地震的影响，这一年的社会总产值增长率降到 1.4%。国民收入则比上年降低 2.7%，其中工业净产值下降 5.3%，钢产量由上年的 2，390 万吨下降到 2,046 万吨。总之，统计数字的升降，与当时各个年度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是基本吻合的。

有人问：为什么十年内乱期间干扰破坏那么严重，工人不能正常地做工，农民不能正常地种田，而从统计数字看，国民经济的发展还有相当的增长速度呢？不错，这十年中，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平均年增长速度不算很低，但同以前的十四年和以后的六年相比，速度都是比较慢的。请看下表中的年平均增长速度（%）：

	1953—1966	1967—1976	1977—1982
社会总产值	8.2	6.8	8.9
其中：工农业合计	8.5	7.1	8.7
农　业	2.9	3.3	6.8
工　业	12.9	8.5	9.4
建筑业	10.3	7.1	10.7
运输业	9.1	4.7	8.6
商　业	3.9	5.0	9.6
国民收入(净产值)	6.2	4.9	7.5
工农业合计	6.4	5.2	7.5
其中：农　业	2.0	2.5	5.0
工　业	13.6	7.2	9.1
建筑业	8.5	6.2	6.8
运输业	8.1	3.7	6.3
商　业	3.2	3.3	9.3

从上表看出，十年内乱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为 6.8%，低于前十四年的 8.2%和后六年的 8.9%；工农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 7.1%，低于前十四年的 8.5%和后六年的 8.7%；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为 4.9%，低于前十四年的 6.2%和后六年的 7.5%。如果从受十年内乱影响最大的工业生产来看，十年内乱期间工业总产值年增长率为 8.5%，比前十四年的 12.9%和后六年的 9.4%都低；工业净产值年增长率为 7.2%，比前十四年的 13.6%和后六年的 9.1%更低得多。

这里要着重说明，十年内乱期间国民经济的增长所以有上述速度，主要是由于能源工业上得快。原油产量，1966 年为 1，455 万吨，到 1976 年达到 8，716 万吨，平均每年增加 726 万吨，年增长率为 19.6%。原煤产量，1966 年为 2.52 亿吨，1976 年达到 4.83 亿吨，平均每年增加 2，310 万吨，年增长率为 6.7%。原油、原煤、天然气再加上水电等能源，合计一次性能源（折标准煤）由 1966 年的 20,833 万吨增加到 5O,340 万吨，平均每年增长 9.2%。石油产量的大幅度增长不仅增加了能源，而且为石油化工提供了原料，而石油化工的发展又为轻纺工业提供了原料。这样看来，十年内乱期间，在能源平均每年增长 9.2%的

情况下，社会总产值每年增长 6.8%（其中工业总产值每年增长 8.5%），国民收入每年增长 4.9%，就不难理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从能源生产增长同整个工业生产增长的比例看，在十年内乱以前十四年和以后六年，都是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高于能源增长速度，只有十年内乱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低于能源增长速度。请看下表：

年　　度	能源产量平均每年增加量（标准煤，万吨）	能源平均每年增　长　%	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	能源增长速度同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比例（以工业速度为 1）
1953—1966	1,140	10.9	12.9	0.84
1967—1976	2,951	9.2	8.5	1.08
1977—1982	2,739	4.8	9.4	0.51

从上表看出，十年内乱前的十四年，能源每增长 0.84%，工业总产值即可增长 1%；十年内乱期间，能源增长 1.08%，工业总产值才能增长 1%；十年内乱结束后的六年，能源每增长 0.51%，工业总产值即可增长 1%。这说明十年内乱中是在能源有很大浪费的情况下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上去的。如果按照前十四年工业增长速度与能源增长速度的比例计算，那么，十年内乱期间的工业总产值就不是每年增长 8.5%，而应当是每年增长 11%了。

那么，为什么这十年内乱期间能源增长这样快呢？除了这十年中国家对能源投资约 500 亿元，石油、煤炭、电力部门的广大职工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岗位努力生产之外，有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一个是"寅吃丑粮"，动用前十四年能源生产的"积蓄"；一个是"寅吃卯粮"，动用应当为以后生产预备的生产储备。十年内乱前的十四年，国家在能源建设上投入大量资金，取得了显著成绩。石油工业相继建成了大庆、胜利、大港、华北等油田，并且做到了储采比例的合理化，掌握了雄厚的可采储量。煤炭方面，建成了大批煤井，并且在三年调整时期集中力量调整采掘比例，1965 年开拓煤量可采期达到 5.08 年（一般规定为 3—5 年）；准备煤量可采期达到 25.7 个月（一般规定为 12 个月）；回采煤量可采期为 8.1 个月（一般规定为 4—6 个月）。所有这些条件，促成了十年内乱期间能源生产的较快增长。但由于十年内乱期间片面追求能源产量的一时增加，不按科学规律办事，造成采储比例，采掘比例的严重失调。原煤生产 1976 年产量比 1966 年增长 91.7%，而同一时期开拓进尺反而减少 4 万米，下降了 6%，这些为后来能源的发展留下很大的"生产欠账"。粉碎"四人帮"后，1977 年和 1978 年继续片面追求产量，更加重了采储比例和采掘比例的失调，致使以后有一段时间不得不把主要力量用来偿还过去的"生产欠账"，能源生产不仅不能增长，而且有所下降（1980 年比上年下降 1.3%，1981 年下降 0.8%）。

弄清了这些情况，就可以看出，十年内乱期间的统计数字基本上是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变化的趋势的。

三

既然这次发表的十年内乱期间的统计数字是基本可靠的，是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数字来对这一阶段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了。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国民经济遭受巨大损失的十年。仅以其最后三年（1974—1976）大体估计，同正常发展速度相比，少创造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这三年中，如果不是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而减少了损失，损失会更大。另一方面，这十年又是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知识分子、各级干部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斗争的十年。这就使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受到一定限制，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1966年社会总产值为3，062亿元，1976年上升为5，43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6年增长92.8%；1966年国民收入为1，586亿元，1976年上升为2，4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66年增长62.1%。从主要产品看，除煤炭、石油已如前述外，从1966年到1976年，粮食年产量从21，400万吨增加到28，631万吨，油菜籽从90.6万吨增加到134.8万吨，甘蔗从1，141万吨增加到1，663万吨，布从73.1亿米增加到88.4亿米，钢从1，532万吨增加到2，046万吨，水泥从2，015万吨增加到4，670万吨。这十年中，建成了一批重要工程，包括战略后方的一批钢铁、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和一批机械工业企业，包括发电装机容量122万千瓦的刘家峡水电站和库容200亿立方米、发电容量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包括贵昆、焦枝、湘黔、阳安等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此外，还有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等等。这些成就都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应当如实地加以肯定。当前，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一定会大得多。

在研究十年内乱期间国民经济问题时，面对着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对国民经济千方百计加以破坏。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这里不去多说。另一个是经济工作本身的问题。这是本文所要着重研究的问题。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错误是"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这种严重错误不可避免地也在经济工作中表现出来。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请看1966—1976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中各生产部门比重变化情况：

从下表看出，国民收入（各部门净产值）中，农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43.6%降低到1976年的41%；工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38.2%上升到1976年的43.3%。如果把工业净产值作为100，那么，轻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47.2%下降到1976年的40.4%；重工业净产值所占的比重由1966年的52.8%上升到1976年的59.6%。这就是说，农业、轻工业更加薄弱，重工业片面发展的现象进一步加剧（在重工业内部还存在采掘工业薄弱、加工工业片面发展的问题）。建筑业净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66年的3.7%上升到1976年的4.9%，这主要是由于基本建设投资大幅度增加引起的，而基建投资主要是重工业投资，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重是下降的，民用建筑投资比重下降的幅度更大，许多地方新住宅的建设抵偿不了旧住宅的报废。运输业净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1966年的4.2%降到1976年的3.8%，商业比重由1966年的10.3%降到1976年的7%，这就使商品的运输、流通更加迟缓，交通运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

	社会总产值(100)		国民收入(100)	
	1966	1976	1966	1976
农　业	29.7	25.4	43.6	41.0
工　业	53.1	58.1	38.2	43.3
建筑业	6.4	8.0	3.7	4.9
运输业	3.3	2.9	4.2	3.8
商　业	7.5	5.6	10.3	7.0

	工业总产值(100)		工业净产值(100)	
	1966	1976	1966	1976
轻工业	49.0	44.2	47.2	40.4
重工业	51.0	55.8	52.8	59.6

年　份	国民收入中积累与消费的构成(%)		积累额的构成(%)	
	积　累	消　费	生产性积累	消费性积累
1966	30.6	69.4	68.9	31.1
1967	21.3	78.7	82.2	17.8
1968	21.1	78.9	78.5	21.5
1969	23.2	76.8	76.2	23.8
1970	32.9	67.1	71.8	28.2
1971	34.1	65.9	76.2	23.8
1972	31.6	68.4	78.7	21.3
1973	32.9	67.1	73.7	26.3
1974	32.3	67.7	75.4	24.6
1975	33.9	66.1	73.4	26.6
1976	30.9	69.1	79.3	20.7

	1966年	1976年
粮　食（斤）	379	381
食用植物油（斤）	3.5	3.2
猪　肉（斤）	14.0	14.4
棉　布（尺）	19.9	23.6

注：粮食是贸易粮食，不是原粮。

这种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状况，从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变化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消费资料中，粮食平均每年只增长3%；棉布平均每年只增长1.9%；棉花、油料不仅没有增长，而且有所下降。生产资料增长则比较快，特别是机械工业的增长更快，但增加的重工业产品大部分是为重工业本身"自我服务"，而未能有力地推动消费资料的增长（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到头来，消费资料生产增长的缓慢，又拖住了生产资料生产发展的后腿。

第二，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严重失调。

请看1966—1976年积累与消费比例、积累中生产性积累与消费性积累比例的变化：

在十年内乱期间的头三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到处"夺权"，大搞武斗，许多工程建设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1967、1968、1969年这三年，积累率从1966年的30.6%暂时被迫下降到21.3%、21.1%、23.2%，到了1970年，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有所恢复后，长期存在的高速度、高积累的指导思想，便又发挥作用，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从1970年到1976年这七年中，除1976年因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基建工程受阻，积累率为30.9%以外，其余年份都在31.6%至34.1%之间。按照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31%以上的积累率显然过高了。

在这十年中，不仅积累率过高，而且在基建投资的使用方向上，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过高，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住宅、医院、学校、商店等）比例过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生产性建设投资占67%，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33%。十年内乱期间，生产性建设投资占

82.8%，非生产性建设投资占17.2%，结果，住宅、教育、文化、卫生、环保设施等方面大量欠帐，给人民生活造成很大困难，妨碍了人才的培养。

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破坏生产，加上积累率过高，必然影响到人民的消费。从左表可以看出，在这十年中，人民的粮、肉、布的消费水平提高很少，食用植物油还有所降低。如果同建国以来历年的情况比较，1976年每人平均消费粮食381斤，还略低于1952年（395斤）的水平，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植物油低于1952年（4.2斤）的水平，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略低于1956年（25.9尺）的水平，比最高的1959年（29.2尺）低5.6尺。

人民消费水平的低下，同这十年人口增长过快是分不开的。1966年人口比上年增长2.8%，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政治动乱，政府的各种机构包括计划生育指导机构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上升。1967年到1971年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7%，五年共增加人口10，68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100多万人。1972年以后，由于计划生育工作有所恢复和加强，人口增长率才逐步降低。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经很大，十年共增加1.9亿人，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我国人口从1966年的74，542万人增加到1976年的93，717万人，平均每年增长2.3%。

第三，经济效益大大降低，国家财政发生赤字。

十年内乱期间，国民收入的总额是有一定的增加的，而这种增加，主要是靠多投资、多用人和单位产品多消耗能源和原材料来取得的，不是靠提高经济效益取得的。

请看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几种经济效益指标的数字；(单位：元)

	1966年	1976年	1976年比1966年增减%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税金和利润	34.5	19.3	−44.1
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税金和利润	46.6	29.0	−37.8
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	21.9	12.6	−42.5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总产值	110	96	−12.7
每百元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	23.5	36.9	57

经济效益所以大大降低，是企业管理制度遭到破坏、陷入混乱状态的结果，也是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结果。

十年内乱期间，财政收入有了相当的增长，这反映了经济规模的扩大，但由于经济效益下降，财政收入不能与生产同步增大，而财政支出则比财政收入增大更多。十年中有四年是赤字，最后三年，即1974—1976年则连续发生赤字。十年共计，账面赤字36.1亿元，实际上的赤字要大得多。有些国营企业把次品废品出售给国家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而缴纳的税金和利润，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收入，用这种虚假的收入所作的开支形成一种变相的财政赤字。由于财政困难，对于应当由财政拨付的流动资金拨付不足，从而造成过多的信贷支出和货币发行，实际上也是变相的财政赤字。此外，由于人为地压低人民消费，应当由财政开支的不开支，欠了帐，以后要还，这也为以后一定时期内的财政难以达到完全平衡埋伏下根源。

通过以上对十年内乱期间统计数字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鲜明地呈现出高积累、高速度、低效益、低消费"的基本特征，急于求成的冒进思想仍在起作用，只不过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使生产受到损失，在各年度间起伏较大，致使有的年份积累率和速度显著降低罢了。应当说，这是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的。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发表的十年内乱期间的统计数字，不仅在年度间起伏的趋势上，而且在生产、分配、消费以及各种比例关系上，是基本上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四

最后，简单地谈谈十年内乱期间经济工作给予我们的经验教训。

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国民经济进行了疯狂的干扰破坏。当时，许多领导干部、经济计划和经济管理人员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冒着很大的风险，顶着沉重的压力，以各种方式抵制干扰破坏，坚持工作和生产，是难能可贵的，成绩是必须肯定的。今天回过头来总结历史经验，应当看到在当时出现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工作也难以摆脱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和影响。过去常说，建国以来，除了1956年的冒进刚一露头就得到纠正外，大的冒进主要有两次：一次是1958—1959年的"大跃进"；一次是1977—1978年在实现现代化中求成过急的冒进。现在看来，还有一次冒进，就是十年内乱期间的冒进。我认为，过去常说的那两次冒进可以叫作"突发型冒进"，而十年内乱期间的冒进可以叫作"累集型冒进"。两种冒进各有特点，但它们的实质和基本特征是相同的。

从历史事实看，不论"突发型冒进"还是"累集型冒进"，根本的特点是：不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而从片面追求速度的主观愿望出发，忘记或者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它们所造成的共同结果是：（一）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的发展赶不上工业的发展；（二）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能源工业、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例失调，在农业内部、农林牧渔之间，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之间比例失调；（三）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积累率过高，积累内部生产性积累与非生产性积累比例失调；（四）人民消费增长远远落后于生产的发展，甚至出现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五）经济效益上不去，甚至大大降低，财政发生赤字（包括变相的赤字）。事实证明：片面追求高速度，必然要求高积累，而超过现实合理限制的高速度、高积累，必然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从而导致低效益、低消费；由于低效益减少了国家的积累，低消费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而这种高速度是不能持久的，在高速度之后带来一定时期的低速度，造成国民经济较大的起伏，想要快，反而慢。

"突发型冒进"和"累集型冒进"本质相同，表现形式则有所不同：前者容易觉察，持续时间短，相对而言后果的消除比较容易（当然也需要艰苦的努力）；后者不大容易觉察，持续时间长，后果的消除更为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消除十年内乱的后果、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大成就，但是，要完全消除各部门生产比例失调和经济效益低等方面的后果，还需要继续作很大的努力。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超过实际可能的冒进倾向，看不到有利条件和巨大潜力的消极保守倾向，都是应当防止和纠正的。但从三十多年来的实践经验看，应当更多地注意防止急于求

成的冒进倾向；而在冒进倾向中，又要更多地注意防止"累集型冒进"的倾向。经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科学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二大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的方针，又确定了公元2000年以前的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这就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有利条件。但在实际执行中，在一定程度上拉长基建战线、分散国家财力物力、影响重点建设的问题并不是不可能产生的。在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这有其必要性）以后，这个问题更容易产生。在新的条件下，不仅可能出现基建规模过大的问题，而且可能出现消费基金偏高的问题，值得认真注意。党中央、国务院已经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看来，根据党的十二大的精神，进一步深入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包括十年内乱时期在内的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努力按客观规律办事，仍然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原载《经济研究》1984年第1期）

国民经济发展情况部分统计数字

（一九六六年——一九七六年）

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

单位：亿元

年份	工农业总产值	农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	其中	
				轻工业总产值	重工业总产值
1966	2,534	910	1,624	796	828
1967	2,306	924	1,332	733	649
1968	2,213	928	1,285	690	595
1969	2,613	948	1,665	837	828
1970	3,138	1,058	2,080	960	1,120
1971	3,482	1,107	2,375	1,020	1,355
1972	3,640	1,123	2,517	1,079	1,438
1973	3,967	1,226	2,741	1,189	1,552
1974	4,007	1,277	2,730	1,213	1,517
1975	4,467	1,343	3,124	1,376	1,748
1976	4,536	1,378	3,158	1,395	1,763

农林牧副渔总产值及比重

单位：亿元

年份	总计	农业		林业		牧业		副业			渔业	
		产值	占%	产值	占%	产值	占%	产值	占%	其中：队办工业产值	产值	占%
1966	640.9	488.0		12.5		90.8		39.0			10.9	
1967	651.3	497.3		13.0		91.5		39.0			10.5	
1968	634.5	483.1		13.5		89.2		39.0			9.7	
1969	641.8	483.9		14.0		88.2		45.0			10.9	
1970	716.3	534.8	74.7	16.0	2.2	92.6	12.9	62.0	8.7		10.9	1.5
1971	1,090.1	818.6	75.1	27.8	2.5	161.3	14.8	67.2	6.2	53.5	15.2	1.4
1972	1,088.0	796.3	73.2	30.3	2.8	167.0	15.4	77.8	7.1	65.8	16.6	1.5
1973	1.179.0	872.3	74.0	33.2	2.8	171.0	14.5	85.5	7.3	73.2	17.0	1.4
1974	1.228.0	905.3	73.7	36.3	3.0	173.3	14.1	94.6	7.7	85.1	18.5	1.5
1975	1,285.0	932.4	72.5	37.1	2.9	179.4	14.0	117.0	9.1	96.2	19.1	1.5
1976	1,317.4	913.5	69.3	42.9	3.3	183.4	13.0	158.3	12.0	119.6	19.3	1.5

注：1、产值计算，1970年以前按1957年不变价格计算，1971年以后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2、产值比重，以总产值为100的百分比。

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年份	粮食			棉花			花生、油菜籽、芝麻			黄红麻		甘蔗		甜菜		蚕茧	茶叶	水果	烤烟
	总产量	增长比上年%	亩产量(斤)	总产量	增长比上年%	亩产量(斤)	总产量	增长比上年%	亩产量(斤)	总产量	亩产量(斤)	总产量	亩产量(斤)	总产量	亩产量(斤)				
1966	21,400	10.0	236	233.7	11.4	63	351.1	7.3		32.8	267	1,140.8	4,404	262.6	1,808				
1967	21,780	1.8	244	235.4	0.7	62	349.3	–0.5		36.4	300	1,264.1	4,881	260.1	1,876				
1968	20,905	–4.0	240	235.5		63	306.7	–12.2		31.9	356	1,034.1	4,298	215.5	1,693				
1969	21,095	0.9	239	208.0	–11.7	57	296.6	–3.3		29.5	329	1,049.7	4,268	238.6	1,715				
1970	23,995	13.7	268	227.7	9.5	61	337.7	13.9	111	28.1	338	1,345.7	4,630	210.2	1,410				
1971	25,015	4.3	276	210.5	–7.6	57	374.3	10.8	114	27.3	307	1,313.9	4,114	212.5	1,291				
1972	24,050	–8.9	265	195.8	–7.0	53	374.8	0.1	104	37.9	302	1,641.7	4,589	232.2	1,164				
1973	26,495	10.2	292	256.2	30.8	69	374.1	–0.2	105	55.8	297	1,696.5	4,481	267.8	1,252				
1974	27,525	3.9	303	246.1	–3.9	66	393.1	5.1	111	63.0	292	1,643.3	4,448	228.8	1,145				
1975	28,450	3.4	313	238.1	–3.2	64	401.4	2.1	107	70.0	314	1,666.7	4,244	247.6	1,092	19.5	21.1	538.1	70.1
1976	28,630	0.6	316	205.6	–13.7	56	344.9	–14.1	92	73.1	297	1,663.1	4,099	293.2	1,097			540.6	

历年大牲畜头数

单位：万头

年份	大牲畜年底头数		在大牲畜头数中：				
	合计	其中：役畜	牛	马	驴	骡	骆驼
1966	8,740						
1967	8,982						
1968	9,179						
1969	9,228						
1970	9,436	4,935	7,358.3	964.8	840.0	224.5	48.7
1971	9,537	4,990	7,398.6	992.6	851.3	244.4	50.5
1972	9,576	5,145	7,386.6	1,034.1	835.3	268.2	51.5
1973	9,718	5,140	7,467.6	1,073.0	835.0	292.3	50.0
1974	9,753	5,191	7,455.4	1,110.3	823.3	313.9	50.4
1975	9,686	5,122	7,354.7	1,129.9	812.7	335.4	53.5
1976	9,498	5,042	7,169.3	1,143.8	776.6	353.6	54.5

历年肉类产量和猪羊头数

年份	猪、牛、羊肉产量（万吨）	肥猪出栏头数（万头）	猪年底头数（万头）	羊年底头数（万头）		
				合计	山羊	绵羊
1966		13,187	19,336	13,808		
1967		13,378	19,006	14,433		
1968		13,114	17,863	14,421		
1969		12,620	17,251	14,021		
1970	596.5	12,593	20,610	14,704	6,141	8,563
1971		14,798	25,035	15,011	6,278	8,733
1972		16,598	26,368	14,932	6,134	8,798
1973		16,684	25,794	15,728	6,410	9,318
1974		16,244	26,078	16,087	6,617	9,470
1975	797.0	16,230	28,117	16,337	6,804	9,533
1976	780.5	16,650	28,725	15,817	5,546	9,271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项目	单位	1966年	1967年	1968年	1969年	1970年	1971年	1972年	1973年	1974年	1975年	1976年
钢	万吨	1,532	1,029	904	1,333	1,779	2,132	2,338	2,522	2,112	2,390	2,046
钢材	万吨	1,035	718	666	926	1,188	1,389	1,561	1,684	1,466	1,622	1,466
生铁	万吨	1,334	963	857	1,280	1,706	2,100	2,355	2,490	2,062	2,449	2,233
铜	万吨	15.90	10.42	7.51	12.58	16.53	20.69	24.12	27.23	23.47	25.77	23.68
焦炭	万吨	1,634	1,102	1,098	1,676	2,330	3,023	3,437	3,451	3,104	3,653	3,570
原煤	万吨	25,200	20,600	22,000	26,600	35,399	39,200	41,000	41,700	41,300	48,224	48,300
原油	万吨	1,455	1,388	1,599	2,174	3,065	3,941	4,567	5,361	6,485	7,706	8,716
发电量	亿度	825	774	716	940	1,159	1,384	1,524	1,668	1,688	1,958	2,031
水泥	万吨	2,015	1,462	1,262	1,829	2,575	3,158	3,547	3,731	3,709	4,626	4,670
木材	万立方米	4,192	3,250	2,791	3,283	3,782	4,067	4,253	4,467	4,607	4,626	4,573
化学农药	万吨	26.2	22.4	17.1	26.2	32.1	38.7	40.2	45.6	37.1	42.2	39.1
农用化肥	万吨	240.9	164.1	110.9	174.9	243.5	299.4	370.1	459.2	422.2	524.7	524.4
塑料	万吨	13.9	11.0	10.6	15.1	17.6	21.6	24.8	29.5	30.4	33.0	34.5
化纤	万吨	7.58	5.22	3.60	6.66	10.09	11.99	13.73	14.88	14.26	15.48	14.61
金属切削机床	万台	5.49	4.07	4.64	8.56	13.89	14.57	16.22	18.33	16.45	17.49	15.70
汽车	万辆	5.59	2.04	2.51	5.31	8.72	11.10	10.82	11.62	10.48	13.98	13.52
拖拉机	万台	1.18	0.85	0.89	1.34	3.19	4.45	4.93	5.79	6.27	7.84	7.37
棉纱	万吨	156.5	135.2	137.7	180.5	205.2	190.0	188.6	196.7	180.3	210.8	196.0
棉布	亿米	73.1	65.6	64.3	82.1	91.5	84.2	83.5	87.1	80.8	94.0	88.4
自行车	万辆	205.3	177.1	201.1	292.1	368.8	412.6	440.4	496.8	519.6	623.2	668.1
手表	万只	128.9	134.5	168.0	246.1	247.6	422.8	483.8	562.2	656.4	782.2	910.0
缝纫机	万架	142.4	126.3	139.2	192.2	235.2	249.9	263.2	293.6	318.9	356.7	363.8
电视机	万部	0.50	0.51	0.21	0.09	1.05	1.78	3.22	7.58	10.18	17.78	18.45

基 本 建 设 投 资

时期	年份	基建投资总额(亿元)	在投资总额中国家预算内投资(亿元)	基建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	基建投资增长速度(%)	基建投资：生产性建设投资：生产性占(%)	农业：总额(亿元)	农业：占%	工业：总额(亿元)	工业：占%	其中轻工业：金额(亿元)	其中轻工业：占%	其中重工业：金额(亿元)	其中重工业：占%	非生产性建设投资：非生产性占(%)	其中住宅投资：金额(亿元)	其中住宅投资：占%
四五时期	合计	1,680.37	1,371.14	40.2	4.4	86.6	189.91	11.3	1,010.96	60.2	90.38	5.4	920.58	54.8	13.4	96.01	5.7
	1971	321.45	321.45	42.3			32.14	10.0			11.74	4.0	197.77	61.5		13.70	4.3
	1972	312.79	309.09	40.3	−2.7		35.82	11.5			11.85	3.7	176.42	56.41		17.97	5.7
	1973	321.26		39.2			40.24	12.5			14.15	3.8	172.99	53.8		19.85	6.2
	1974	333.01		39.6			39.75	11.9			17.92	4.4	170.47	51.2		21.55	6.5
	1975	391.86	318.12	39.8	17.7		41.96	10.7			34.72	5.4	202.93	51.8		22.94	5.9
五五时期	合计	2,242.75	1,660.3													266.29	
	1976	359.5	294.01	38.6	−8.2	85.1	44.50	12.4			26.93	7.5	190.97	53.1	14.9	21.81	6.1
	1977	364.41	294.39	35.7		83.3	44.79	12.0			24.98	6.9	200.44	55.0	16.7	25.06	6.9
	1978	479.55	395.93	40.7		82.6	56.47	11.8			27.40	5.7	267.10	55.7	17.4	37.54	7.8
	1979	500.0	394.97	40.4	4.4	73.0	62.50	12.5			30.33	6.1	251.43	50.3	27.0	74.00	14.8
	1980	539.39	281.0	35.0	7.8	66.3				54.1	43.60	8.1	248.00	46.1	33.7	107.88	20.0
	1981	428.0	208.0		−20.6	58.9						10.0		64.1	41.1	109.23	25.5

国家财政收支总额

单位：亿元

年份	总收人	总支出	收支差额
1966	558.7	541.6	+17.1
1967	419.4	441.9	−22.5
1968	361.3	359.8	+ 1.5
1969	526.8	525.9	+ 0.9
1970	662.9	649.4	+13.5
1971	744.7	732.2	+12.5
1972	766.6	766.4	+ 0.2
1973	809.7	809.3	+ 0.4
1974	783.1	790.8	− 7.7
1975	815.6	820.9	− 5.3
1976	776.6	806.2	−29.6

外贸部门进出口贸易总额

年份	按人民币计算（亿元）			按美元计算（亿美元）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总额	出口额	进口额
1966	127.1	.6.05	61.1	46.2	23.7	22.5
1967	112.2	58.8	53.4	41.6	21.4	20.2
1968	108.5	57.6	50.9	40.5	21.0	19.5
1969	107.0	59.8	47.2	40.3	22.0	19.3
1970	112.9	56.8	56.1	45.9	22.6	23.3
1971	120.9	68.5	52.4	48.5	26.4	22.1
1972	146.9	82.9	64.0	63.0	34.4	28.6
1973	220.5	116.9	103.6	109.8	58.2	51.6
1974	292.2	139.4	152.8	145.7	69.5	76.2
1975	290.4	143.0	147.4	147.5	72.6	74.9
1976	264.1	134.8	129.3	134.4	68.6	65.8

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

单位：万人

年份	总计	高等学校	中等学校 合计	其中 中等专业学校	其中 普通中学	小学
1966	11,691.9	53.4	1,296.8	47.0	1,249.8	10,341.7
1967	11,539.7	40.9	1,254.5	30.8	1,223.7	10,244.3
1968	11,467.3	25.9	1,405.1	12.8	1,392.3	10,036.3
1969	12,103.0	10.9	2,025.3	3.8	2,021.5	10,066.8
1970	13,181.1	4.8	2,648.3	6.4	2,641.9	10,528.0
1971	14,368.9	8.3	3,149.4	21.8	3,127.6	11,211.2
1972	16,185.3	19.4	3,616.7	34.2	3,582.5	12,549.2
1973	17,096.5	31.4	3,494.7	48.2	3,446.5	13,570.4
1974	18,238.1	43.0	3,713.7	63.4	3,659.3	14,481.4
1975	19,681.0	50.1	4,536.8	70.7	4,466.1	15,094.1
1976	20,967.5	56.5	5,905.5	69.0	5,836.5	15,005.5

主要卫生机构数

单位：个

年份	总计	医院 合计	医院 其中：县及县以上医院	疗养院、所	门诊部、所	专科防治所、站
1966	206,613	42,156	5,588	818	153,730	793
1967	196,455	52,055	5,713	734	134,725	775
1968	171,494	57,041	5,837	473	108,090	635
1969	153,891	57,988	5,839	359	90,744	600
1970	149,823	64,822	6,030	359	79.600	607
1971	131,367	62,766	6,660	183	62,457	659
1972	135,127	63,050	6,974	183	66,067	613
1973	143,733	64,583	7,361	238	72,117	601
1974	149,965	65,258	7,570	252	76,988	626
1975	151,733	62,425	7,757	297	80,739	683
1976	157,959	63,184	7,952	317	85,616	737

正　气　歌

张　书　绅

清明节前一天，一股寒潮突然袭击了沈阳城。

阵阵冷风抽杀着街道两旁柳桃的蓓蕾，抽杀着行路人的心。

天是灰暗暗的。没有了阳光。没有了蓝天。也没有春天特有的芳馨。

终日紧闭的沈阳监狱的铁门开了，一辆囚车从高墙里冲出，沿着东北大马路向东飞驰而去。

行人一个个止住了步，望着远去的囚车，心一阵紧缩。

"车里是什么人?"

"没看到贴布告，也没开公审会，这是……"

"是秘密处决吧?"

"……"

囚车在刑场上停下来。一个女"政治犯"走下车。她穿一身绛紫色囚服。瓜子脸，一双秀丽的眼睛很快地扫过刑场，从容地向前迈了几步，面向着东方。

四十几年酷爱整洁的习惯，使她在临刑前，很想梳理一下散乱的头发。但是，她的手被死死地扣在手铐里。于是，她高昂起头，迎风而立。风好象理解了她的心意，把飘落在脸颊上的一绺黑发吹到耳后。她满意了，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就要告别这个世界了，她多想高唱国际歌，表达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至死不渝。她多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象无数先烈那样英勇就义。她多想大声地呼唤那远在北京的老母:"永别了，妈妈!"她多想轻轻地嘱咐身后的一双儿女:"孩子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然而，她不能，不能了!"四人帮"及其死党惨无人道地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就义时高呼口号、高唱国际歌的权利!

英雄无声地倒下了。

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上午十时十二分。

鲜血染红了印在囚服上的三个字：张志新……

一

"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这是二千二百多年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面对动乱、危机、濒临灭亡的祖国，用血和泪唱出的哀歌。想不到二千二百年之后，屈原的缕缕忧思重新漂荡在祖国的大地上。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个无星的夜。十一次特别快车在京沈线上飞驰着。机车好象一头激怒的雄狮，焦躁地向山海关冲来，不时发出悲壮的长鸣。志新坐在靠近车窗的座位上，昏黄的灯光照着她的匀称身材。瓜子脸，齐耳短发，穿一件青呢大衣，看上去十分清净、质朴，身边的衣帽钩上挂着一条鲜红的长围巾，随着车厢的震颤，微微摆动着。围巾的颜色和大衣

的颜色似乎不大协调，但这正是志新性格的特征，要么是青，要么是红，她不喜欢乌乌突突的中间色。

列车在到达天津之前，车厢里闹闹哄哄，一直安静不下来。旅客们大声地发着牢骚：

“晚点，又是晚点！真不象话。这叫首都车站啊，首都！首都！”

“晚点是小事，但愿不要遇上武斗劫车。”

说这话的人立即住了嘴，惊慌地回顾着。接着是可怕的沉默。

人们在沉默中前进。

终于，对于晚点的抱怨，对于武斗的忧虑，被瞌睡战胜了。于是，就在沉默中睡去。

志新却怎么也睡不着，旅客们的议论在她的思想里激起了轩然大波。一年前，她作为辽宁省委宣传部的一个干部，一名共产党员，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加入一个群众组织，参加各种形式的集会，可是，不久她的激情冷却下来了，随着运动的发展，许多事情使她迷惑不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群众分裂成几大派，用大喇叭对骂，用大字报攻击，后来又上升为武斗，由棍棒、石块发展到机枪、土坦克。六月一日，在某大学里发生了有上万人参加的全市性武斗，多少无辜的青年倒在血泊中，南湖的树林里出现了令人不忍目睹的学生的新坟，而“屠杀”他们的人，也许就是他们的父亲、兄弟、同学、好友。武斗还在升级，沈阳城内枪声整天时起时伏。听说有的儿童在街上玩耍被流弹打死了，志新也深为幼小的儿女担忧，同爱人曾真商量好，把孩子送到天津姨家躲一个时期。她原以为只有沈阳这样乱，可是到了天津，天津也在进行大规模的武斗。从天津又到北京，去看望几个弟弟妹妹，看到北京也在武斗。又听说武汉、济南、重庆、广州……全国都处在武斗之中。这是为什么？难道武斗就是革命？这个善于思考，勇于追求真理的共产党员决心在实践中进一步地探索。她亲自跑到北京街头，倾听着，观察着，分析着。游斗的旋风刮遍了北京市的大街小巷，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包括中央和国务院部委领导同志，六七十岁的老人，也都戴上高帽，挂上大牌子，在卡车上作“喷气式”，受到各种难以忍受的训诉和侮辱。她每天都看到一些传单，听到一些传说。“江青点了×××的名了！”“江青说×××是叛徒、特务！”“江青说……”江青只要说一句话，北京城的墙壁上、柏油路上就到处出现“打倒×××”、“油炸×××”的大字块，连德高望重的朱老总、贺龙、陈毅、李富春等老一辈革命家也在劫难逃。从中央政治局，到街道党支部，所有的党组织都被摧垮了，被中央文革和各种名目的“造反总部”代替了。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大小小当权派，成了“走资派”、“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被关进了监狱，关进了牛棚，关进了“学习班”，靠边站了。党组织瘫痪了，政府瘫痪了，工厂瘫痪了，交通瘫痪了，人们整天掉在派性的漩窝里不能自拔。

那天，志新从街头回到母亲家里，一进屋，看到哥哥的衣服被撕破了，就找出针线，叫哥哥把衣服脱下来给他缝补。志新接过哥哥的衣裳，猛然间看到上面有一片陈旧的血迹。按照血迹的部位，她看到哥哥身上伤痕斑斑。她问哥哥是怎么回事？哥哥含泪述说了天外来祸。原来，哥哥买了一个像框，想镶一张毛主席像，但是像片大、镜框小，他就把像片的四周剪掉了一条，因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遭到严刑拷打。哥哥刚说完，妹妹志勤在一旁抽泣起来。志勤在乐团工作，因为提琴拉得太好，遭到了批判，说她是“黑尖子”、“提琴匠”，为“封资修”唱赞歌。从哥哥、妹妹的不幸，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不幸，志新非常难过。受冲击的何止是“当权派”？连小学教员、乐队演奏员也遭到了无情打击。多灾多难的黄帝子孙啊！可是，谁是这灾难的制造者？谁是罪魁？

志新回忆着同父亲的一段谈话。那是在天津旧居里，父亲同女儿久别重逢，唠了些别后

之情，很快就谈到了国家的命运。父亲清瘦的脸上严峻得可怕。老人家已年逾八十，在人生的道路上经过了无数的坎坷，正在艰难地走着最后一段路程。他年轻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为人刚正不阿，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热爱祖国，他的爱国情绪对幼年的志新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父亲酷爱音乐，加上他家的楼下就是琴行，所以志新姊妹从小就喜欢音乐，成了天津市有名的"张氏三姊妹"小乐队，每次演出都哄动全城。虽然家境困难，常常用豆腐渣果腹，但老父亲还是积蓄了一些钱，给女儿买了两把小提琴。父亲经常带着三个女儿为抗日救国作捐款演出，用音乐痛斥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罪行。在漫长的岁月里，父亲到处寻找着富国强民的救国良策，但他终于没有找到。解放了，盼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崛起。十几年的时间，"东亚病夫"变成了东方巨人。可是好事多磨，如今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大武斗"把好端端的中国糟蹋得不成样子，工不能工，农不能农，学不能学。他忍不住对女儿大呼道："如此下去，国家不堪设想，爸爸死不瞑目!大清的江山亡于慈禧，今日之中国将断送在何人之手?"说完，老人干枯的眼窝里滚出两大滴泪珠……

列车在暗夜里前进。志新闭上眼，继续沉思着。半月前，她带着一双儿女从沈阳奔向天津，是为了消除对儿女安全的忧虑，想不到，现在却带着对党和人民的更大忧虑从北京返回沈阳。

清晨，志新踏着地上的薄霜，走出沈阳站。刚踏上马路，突然，五六辆武斗卡车从身边呼啸而过。已经跑出老远了，还隐约可见车上刺刀的寒光。卡车在视野里消逝了，迎面又来了一列长长的队伍，拉着一大串"当权派"在游斗。志新不忍再看，赶紧拐进胡同。她路过几家工厂门口，又看到一大排"牛鬼蛇神"大弯着腰在请罪。志新急匆匆往家里飞奔。越走近家门，越想念亲人。她打开家门，见到爱人的第一句话就说："老曾，这半个月我心里很乱，很不安，天津、北京到处在批斗、武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江青一手遮天，她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怀疑！"

志新回到了省委机关。熟悉她的人都说，她从北京回来后变了，变得沉默了。她总是一个人长时间地思索着、苦恼着、探寻着，她几乎一句话也不说。沉默，一连数日孤独地沉默着。这沉默是痛苦的，又是短暂的，就象一个蓄满山洪的水库，看上去连一点波纹也没有，可是一个大的可怕的爆发已经孕育成熟了。

一天，礼堂里又召开了批斗省委书记的大会。照例是老一套，挂牌子，戴高帽，搞喷气式、呼口号。人们对这一套早已看惯了，厌烦死了，却又不得不跟着做。因为这是最时兴的"造反"，最纯粹的"革命"。然而，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在打倒×××口号声的极短的间歇里，会场上响起了悲伤的啜泣声。这啜泣的人就是张志新。

志新再也忍不住了，她有许多的泪要流，有许多的话要说。会后，她在同志们面前失声痛哭，却又滔滔不绝："你们说文化大革命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可是现在毛主席身边还有几个人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打倒这么多人，省委领导全靠边了，难道这些人都是敌人？我想不通啊！老干部总是为党作过一些好事，有些人犯了一些错误，是否都该打倒？这里面有名堂！中央文革里有名堂!我对江青、叶群这些人根本不了解，对林彪就是不信任！"

志新的这些话是对同志们谈心时说的，她还没来得及公开讲出来，就同几万名原东北局、省委、省人委的干部一起被赶到了盘锦五七干校。大家刚放下行李，"清队"的十二级黑风便席卷了干校所有的连队。多少无辜的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一批又一批的共产党员被审查、专政，上午还是同志，下午就是"敌人"，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原省委宣传部到盘锦

的不足四十人，一多半被立案审查，还抓出一个小"三家村"。因为揪的过多，连外调人员都派不出。和志新睡在同一铺炕上的五个人中就有四个被审查、专政，没过多久，睡在炕梢的那位副部长被迫自杀了。那一天正是春节，连里改善生活，这位老干部一个饺子也没吃，就吊死在荒凉的野地里了。死后，在她的脸盆里发现了她的亲笔遗书，上面只写了这样几个字：

"我当时不是党员，我没有出卖过同志。"

这哪里是什么遗书呀，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洁的心，是向林彪、江青一伙讨还血债的控诉书！

志新久久地凝望着这份遗书，泪水止不住地流呀，流呀，这不是软弱女子伤感的泪，这是忧国忧民的泪呀，正是这忧国忧民的泪水，浇开了光彩夺目的英雄之花，谱写了威武不屈的生命之歌！

二

志新在干校忍着肝病的痛苦，白天和同志们一起劳动，拉车，她把身子尽力前倾着，使出全身的力气，手指粗的麻绳磨破了肩膀，碾碎了厚厚的垫肩，她咬破了嘴唇，坚持着、顽强地坚持着。夜里，借着暗淡的灯光，她拼命地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寻找答案，解决难题。她沉默寡言，忧心忡忡。

志新默默地劳动，默默地学习，默默地思索，在默默中形成一整套观点、看法，而一旦观点成熟了，她便立即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冲破了林彪、"四人帮"所制造的封建法西斯的白色恐怖，不畏强暴，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系统地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在和同志们的交谈中，在连排会议上，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批斗会上，志新同志庄重申明：

"对江青我就是怀疑，对江青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可以？中央文革到底是集体领导还是江青自己说了算？江青历史上到底是干什么的？江青审查了没有？江青把很多电影、戏剧都批了，现在就剩下几个样板戏，唱唱语录歌，这样搞下去，祖国的文化艺术不是越来越枯竭和单调了么？江青有问题为什么不可以揭？中央文革也可以揭么？"

"什么'顶峰'？什么'一句顶一万句'？什么'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样下去不堪设想！这不是树毛主席的威信，是树林彪自己的威信，我对林彪没有什么信任！"

"现在天天搞什么'宣誓'，搞这个形式主义干什么？他不忠于毛主席，就是做那些事也不行。忠不忠于毛主席，主要看认不认识真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以来，毛主席坚持了正确路线，尤其是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党，毛主席的威望不是靠大树特树树起来的，是在几十年革命斗争中自然形成的，毛主席在党的历史上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容否定的。"

在那乌云蔽日、风雨凄凄的日子里，人们啊，连呼吸都要谨慎，连吃饭都提心吊胆，有谁敢对林彪、江青一伙说半个不字！"现行反革命分子"、"三反分子"等各种型号的帽子就象影子一样时刻追踪着无辜的人们。在这万马齐喑的时刻，志新同志勇敢地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里话，表达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心声，向着林彪、"四人帮"公开地挑战，公开地进击了。

同志们为志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深深感动了，对她的革命气节十分敬佩，同时也为她的处境和命运忧虑不安。

同志们私下里找她谈话："志新啊，你不能再讲下去了，这是'反革命'言论啊，无论如何，你必须立即刹闸！立即刹闸！"志新理解大家的心，但是她回答说："同志啊，这个闸我不能刹！你看看我们伟大的党被践踏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

为了"拉"她，一些好心的同志想出一个办法，叫志新最疼爱的女儿林林写信，要妈妈赶快刹闸。

志新读着女儿的信，泪珠在眼窝里滚，那些字儿歪歪扭扭、蹦蹦跳跳，多象天真的小林林！世界上最细心的是母亲的眼睛，志新在信纸上看到了一滴泪痕，她知道，女儿的信并不是女儿的心。志新看完信，微微一笑，立即给女儿写了一封回信："想念的林林，妈妈知道你的心。妈妈一定坚持真理，作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一个值得你们热爱的好妈妈！"

整党开始了。"四人帮"玩弄着拿手把戏，向党的组织和党员又一次下手了。党员们已经二年没过组织生活，象风筝断了线，象孩儿离开了妈，他们重新聚在一起，心似大海翻腾。他们多么希望听听党的声音，多么想向党的组织汇报汇报自己的思想，谈谈心里话，心里的话积得太多太久了，就是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他们多么希望恢复党的组织，过过正常的党的生活。可是，党员们失望了。"四人帮"的"整党"是要彻头彻尾地整垮党，以"整党"为名，继续整老干部，整党员。他们逼迫党员承认"当了国民党兵"，检查，无休止的检查，交待，没完没了的交待。可是，就连这样的整党，志新同志也不能参加，她被立案审查了。

志新独自坐在炕上，房东和孩子们都出去了，屋子里空荡荡。她再也忍不住了，泪水涌出眼窝。离开党的组织，离开同志们，在所有的痛苦中这是最难忍受的痛苦。她呆呆地坐在窗前，夕阳透过窗镜照在她的脸上、身上。她的思想里掀起了一层层狂涛巨浪，难道我真的错了么？难道我真的离开了党？不，经过几个月的思考，不是我过于固执，也不是个性太强，我看不出错在哪里，怎么能向谬误投降？古往今来，有多少革命者、科学家为捍卫真理而献出了生命，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卑怯者总是过于看重生命，只有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比较出真理和生命的分量。她想起了曾经看过的歌颂伟大科学家哥白尼的话剧，哥白尼为了捍卫"地圆说"被教会杀害了，但是教会只能消灭哥白尼的肉体，却无法扑灭哥白尼发现的真理。哥白尼的热情赞助者乔尔丹诺·布鲁诺，勇敢地接过哥白尼手中的火炬。在宗教猖獗的中世纪，他公然脱掉袈裟，向神圣的教会发动猛烈攻击。他到处宣布宇宙是无限的，整个宇宙没有中心。他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分子，被教会当局的异端裁判所逮捕了，关了七年监牢。布鲁诺至死不屈，于一六OO年二月被判处极刑。教会在罗马城的鲜花广场燃起熊熊烈火，活活烧死了布鲁诺，布鲁诺在烈火中忍受着极大痛苦，却高昂着永不低垂的头。后来，鲜花广场的熊熊烈火，竟成了更加巨大的真理的火炬，照亮了罗马，照亮了欧洲，照亮了全球，照亮了未来的新世纪。林彪、江青一伙就是二十世纪的教会，两年来，他们妄图以他们的封建宗教邪说，扑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的火炬。不！这绝对办不到！志新心情十分激动，她决心做一个高举真理火炬的共产党员。鲜花广场的火照红了志新美丽端庄的脸，她的眼睛迸射出兴奋的光。她写道，我没有离开真理，也就没有离开党。我决不是一个人，我同党在一起，同八亿人民在一起！哪怕暂时只有我一人，我也要参加整党。于是，她下了炕，对着镜子梳了梳浓黑的短发，坐在桌旁，开始了第一次整党学习。

志新精心地阅读毛主席的著作，系统地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构成这场路线之争的内容究竟表现在哪些问题？它的由来、发展过程和内容又是怎样？什么性质的斗争？什么特点？错误的一方错在哪里？她如饥似渴地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向斗争中学习，也向历史学习。她仔细地翻阅着历史，总结着历史的教训和规律。

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复过这样的情形：当过于强大的邪恶势力作为一种潮流突然袭来时，有少数的人便立即舍生奋起，不畏强暴，英勇搏击，于是就成了英雄，为祖国和人民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则在强大的潮流冲击下，不得不将愤怒和真话埋在心底，不得不跟着走一段路，正如雄鹰有时也顺风滑行一样，但这沉默是短暂的，而一旦人民从沉默中奋起，那就是反动派的殉葬日。在黑云压城的形势下，照例少不了投机者，他们出卖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出卖原来信仰的真理，追随邪恶势力，坑害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最无耻的人连在一起。自然，又有少数的自私者、懦弱者，违心地成了温顺的奴隶，作了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英雄、人民、投机者、懦弱者，这是历史剧不可缺少的人物。当乌云过去胜利到来的时候，人民将敲响锣鼓，欢呼英雄，奏起哀乐，悼念烈士。"帮凶"们将受到历史的公判，在公判中求得新生，而懦弱者、自私者，也将受到"良心"的审判，在哀乐声中忍受精神鞭子的抽打，那痛苦将是长期的和难以忍受的。……

志新决心向英雄们学习，做独立支撑的大树，背靠马列，扎根大地，同林彪、江青一伙斗争到底！这次个人整党收获很大，她眼含热泪，向党写下了心里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应当无所畏惧的，她襟怀坦白，因为不是为了谋求什么私利，不是维护利益相关的某一宗派和阶层，所以不能不坚持真理，不能不旗帜鲜明，政治上采取诚实的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采取欺骗的态度，是软弱的表现，我要敢于正视真理，不管真理使人多么痛苦！

志新的整党尚未结束，"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就下了逮捕令。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在清队的"台风"中时刻惴惴不安的同志们被聚到广场上，他们原以为开什么批判会，可万万没想到，是逮捕张志新同志的大会。志新的爱人曾真，事先一点也不知道，走进会场时才看到"批斗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的大字横幅，他几乎晕了过去。曾真同志望着台上的志新，心中百感交集，但是他不敢掉泪，因为没有哭的权利。他把泪水吞进肚里。胃溃疡发作了，他用拳头顶住胃部，一眨不眨地望着亲爱的志新，朝夕相处的亲人。

例行步骤作完了，志新被戴上手铐。她昂首挺胸，向吉普车走去。曾真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他同亲人的永别！

志新被抓走了。但这并不是"四人帮"死党的全部目的。他要抓一儆百，要叫全体干部、群众在江青"女皇"的面前垂手称臣、匍伏在地。在逮捕大会之后，全干校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他们叫嚷：张志新背后没有人，没有个摊摊，她的胆子不会那么大，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要将计就计，要盯住那些同情者、支持者，予以狠狠的打击！

在黑风阵阵的暗夜里，各连队都在开会，人人都要表态、声讨，同张志新"划清界限"，但是，志新就象一颗火种，在风暴中没有熄火，反而变成照耀全干校的火炬。在肃毒会上，巍巍然又站立起一个共产党员，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张志新同志错在哪里！共产党员公开阐明自己的见解怎么是犯法？她的观点有道理！"

这位同志当即被捕，判了十八年徒刑，投进了监狱。但是，更多的同志已经被镣铐的铿锵声唤起，斗争在继续……

三

志新同志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有着坚强的革命意志，有着高尚的革命情操。即使在那漫长痛苦的牢狱生活里，那阴森的高墙，冰冷的手铐、脚镣，无情的棍棒皮鞭，也无法禁止

她对同志，对人民，对伟大的党，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最真诚的爱和尊敬。

她爱同监的“政治犯”，她一进监房，就象投进一块磁石一样，不论是纯洁的钢，还是有杂质的钢，都一下子被她吸引去了。她在这些难友中很快就获得了信赖和威望。她一个一个地拜访“政治犯”，问她们何时入监？因何判罪？判了多少年？通过这样的调查，她知道了这些人大部分和她是同类型的“政治犯”。她，作为省委的机关干部，一个共产党员，有责任组织起一个战斗集体。于是，她开始了“地下”工作。一个只有二十岁的“现行反革命犯”，从入监那天开始就老是哭泣喊冤。志新象母亲一样爱抚她，劝她不要哭，坚强起来，要坚信总有一天会昭雪平反。这个孩子不再哭了，望着志新，第一次在监牢里露出笑脸。

当她忆起被捕的场面时，心如刀绞。她写道：这种处境对一个自尊心十分强的人，又怎能容忍？一个女共产党员，机关干部，究竟犯了什么罪？被两个大汉抓头发、挂牌子，双臂背扭？如果她不明确自己是坚持党的政治原则，这样的尝试，就只能使她魂飞气断。但想到党的利益，自己吃点苦头算什么？她相信同志们能够以不同的形式投入斗争的洪流，彼此心心相印，为埋葬人民的敌人做出贡献。

她爱人民，常常把老房东怀念。在干校时，有一次过节分了一些糖果点心。她全部送给了房东的小孩。后来，她被专政了，同志们为了“拉”她，请贫下中农给她办学习班。有个李大嫂拉着她的手说：“咱庄稼院有句话，小胳膊可扭不过大腿呀。你，你就忍两天吧，哪有不晴的天？哪有不干的道？”真挚的感情，朴实的语言，深深感动了她，她眼里含着泪说：“多好的贫下中农呀，就是为了他们，我也要坚持真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

她爱自己的亲人，最惦记的是妹妹志勤。志勤在北京乐团工作，因为钻研业务受到了批判，害了神经官能症。她给志勤写了好几封信。

“志勤：

……你这病好治，我给你开个药方。一是听医生的话；二是关心国家大事。记得我们俩一起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小说么？保尔不是说过这样一些话：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可以说，我的一生都已贡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勤妹，保尔的话应当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人们说游泳是最好的体育活动，能帮助治疗几种疾病。我看投入政治斗争的游泳行列并真正下水学习游泳，也是治疗政治上几种疾病的最好办法。……决心投进去吧！我是下了决心，在政治风浪中学会游泳。”

她爱那些革命老干部，对他们怀着热烈的敬仰。在狱中，她认真研究了党的历史，研究了当时被打倒和“靠边站”的朱德、叶剑英、邓小平、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这些老同志在每个关键时刻，在每一个重大的战役中建立的丰功伟绩。她激动地写道：每当重温这些战斗的诗篇，仿佛见到了那些动人的场面，在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里，在皖南事变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转折时刻，在收复革命圣地延安的喜讯中，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组成的解放战争的新航程中，在向全国大进军的神圣命令中，哪一个革命者不应看到，这一切一切都是由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血和生命写成。正是这些革命先辈使反动的蒋家王朝土崩瓦解。这些军事统帅以自己对党的无限忠心，为党，为革命，为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绘成了这可歌可泣的战斗画面，在那些残酷斗争的历史年代里，他们没有被敌人子弹撂倒，也没有被敌人铁锁把肋骨压弯，革命胜利了，祖国解放了，社会主义理想在实践中实现了，就在这个

时刻遭到了来自党内、来自昔日"战友"的突然袭击，是谁？根据什么作出了与事实相背离的武断？是林彪、江青狼狈为奸。写到这，志新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她要大声疾呼，为革命的老干部叫屈鸣冤。

她热爱生活、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即使穿着难看的囚服，她也总是利利整整、干干净净。衣袖飞了边儿，她为此十分不安，怎么办呢？没有针也没有线，她想出了一个办法，用条帚"迷子"当针，从破衣服上扯下几条线，坐在铁窗下，一针一针地仔细缝补起来，把袖口补得平平整整。补完，穿在身上，又用手扯了扯袖头，脸上露出孩子般欢欣的笑容。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她入党十五周年的纪念日。这一天，她早早起了床，仔细地把衣妆打扮，把浓黑的短发梳了又梳，然后立在墙边，透过窗上的铁栏，望着天上温暖的太阳，眼里闪着泪花。十五年前这一天，她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此刻，身在牢房，耳边又响起了入党时的誓词："承认党纲党章，愿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在党的领导下，勇敢地进行革命斗争，在任何环境下，接受一切考验，永不动摇，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昨天发誓言，今天要实践。她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挥笔写下了《迎新》诗篇：

十五年前的这一天，
我庄严地宣读了誓言，
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为人类解放而献身。
十五年后的这一天。
我严肃地接受"党"的"审判"，
不是我违背了誓言，
也不是党来把我屈冤。
为什么还没有落案？
时间和实践将公正裁判！
追求真理，坚持战斗，
奔向党指引的航线。
驾驶起生命的航船。
铲私根，战恶浪，永向前，
勇敢地去接受考验，
用胜利去迎接春天。

这一天放风时，她戴着铁镣，步履却特别有力，还做了几节操。

她象儿女热爱母亲那样衷心热爱伟大的党。同党的感情，铁镣锁不住，高墙隔不断。入监那年的七月一日，她要纪念党的生日。找不到红纸，就用白纸扎了两朵小花，扎完了，心里又非常不安，白花怎么能献给党呢？她苦恼地来回踱着步子，然后，手扶床栏，默默地站着，突然间，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床栏杆是紫红色的，可以用它来涂染！她用双手捧起白水，洒在栏杆上，用手指搓着，搓呀搓呀，栏杆上浮起了一层红水，她用手指沾着红水，仔细地涂染着一个个花瓣。两朵小白花终于变成了红花，那颜色虽不鲜艳，却有一种特别的美。她打开藏在身边的党章，翻开封皮，露出党旗，轻轻地放在桌子上。她把两朵小红花分放在党旗两边，面对着鲜红的党旗，脸色庄严而沉静。几年来，党的组织被破坏了，党的生活停止了，党员就象孩子失去了娘，感到没依没靠，孤孤单单。今天，面对党旗，她更加怀

念亲爱的党。

她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她力量的源泉，行动的指南。在监狱里，每人每月只发给两元钱生活费，她除了买点肥皂、牙膏，从不错花一分钱，一元一角的积，一角一分的攒，用这些可怜的生活费，买了几十本马列和毛主席的书。有一次，书店到监狱里卖书，她一次就买了十六元钱。为了读书，她还用手纸上的商标，作了几个非常精美别致的书签。在狱中，每天只有两个小时的自由活动，她就用这些宝贵时间，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共十二卷，还细读了毛主席五篇哲学著作和《共产党宣言》。起初，监狱发给她纸，要她写认罪材料，后来发现她都用来写学习笔记，而且越学越坚定，管教员在她面前经常张口结舌，丢脸出丑。一怒之下，不给她发纸，还收缴了她的笔。可是这难不住英雄，她用木扦沾墨汁，在手纸上顽强地写下去，写完的手纸堆起老高。五年来，就这样戴着铁镣，写下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她入狱后，对狱中的工作人员尽力作些教育启发工作，但对于夺走她的笔，却十分愤怒地痛斥道："身为专政机关之长，你听着！你为什么不敢把笔退还给我，看来我的笔是被你当作枪缴去了，但指挥这支枪的思想你们却永远也缴不去。自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执行者，你们哪一点象无产阶级？你以为利用这一恶劣手段就可以软化革命者的意志，可以向错误路线投降么？这除了说明你们手中没有真理、在真理面前束手无策、软弱无能外，你们什么也得不到！你们还有什么办法，都使出来吧！行凶者、帮凶者，你们可以逃之夭夭么？不！我要向党向人民控诉你们！声讨你们！你们将受到历史的严惩！这笔帐是要算的！"

"这笔帐是要算的！"

这声音震撼了黑洞洞的监狱，吓破了"四人帮"死党的狗胆，他们把志新钉上两副脚镣，戴上背铐，打进"小号"，长达一年半。他们挑动那些流氓犯、盗窃犯、无情地殴打、折磨志新。流氓们用摧残她作为资本去争得减刑，换来"模范犯人"的称号。

为了彻底打掉志新的"反革命气焰"，逼她投降，他们无耻地施用了法西斯下流手段。

一天，刚吃过早饭，几个大汉突然闯进监狱，把志新五花大绑，推上一辆囚车。囚车上已有两个男犯，面色惨白，摊在车厢板上。为了防止志新抗议、申辩，他们用泡沫塑料，塞进她的嘴里，又用透明指纹胶把嘴糊上。

志新见此情景，心里明白了，生命就要结束了，但她十分安然，只是略感遗憾。走得太匆忙了。没能向同屋的难友们告别，也没来得及把书籍遗物分赠给她们留作纪念。

志新坦然地坐在凳子上，挺起腰杆，昂着头，风儿吹拂着她的短发，她是那样庄重安详。

囚车在刑场上停下了。

两个男犯瘫在地上，但志新却挺胸昂首，戴镣前行。

枪声响了，两个男犯被击毙，志新没有被打死。原来她是被带来陪绑的。企图以此威吓这个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然而，他们失算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永远也不能理解英雄的精神世界。不明白她何以这样坚定？这样视死如归？

志新有着强烈的爱，也有着强烈的恨，正是这爱和恨的土壤使她获得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压倒的力量。她凝视着地上的两滩鲜血，嘴角浮现出一丝冷笑。在那淡红的血泊中，她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在那震耳的枪声里，她听到了死神在猛烈地敲打着江青一伙的窗棂。

四

志新被捕后，看守所、法院进行了多次提审。每次她都是理妆整容，从容地步入审判厅。审判员指令她坐下，她不坐，不让她坐时，她却坐下来，好象在家里一样安然自如。每一次她都郑重申明：我没有罪，我不是罪犯，你不可以用对待罪犯的口气同我说话。审判员几次审问，她都拒绝回答。没有办法，只好改用谈感想的方式提审。下面就是这种感想式提审的部分记录：

问：到这儿来以后，有什么想法？对个人问题怎样认识？

答：九月二十四日批斗后逮捕了我，我没有构成犯罪，我想不通。

问：你始终不认罪，劲儿到底别在哪里？

答：我说的都是事实，是真理。我没有向任何人乱讲，包括我的爱人。我是按照组织原则向党讲心里话，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权利，怎么会是犯罪？

……

谈来谈去，审判员得出了如下结论："张志新纯属思想问题，构不成犯罪，无法判刑。""上头"听了这个结论，大为恼火，认为这是惊人的"反改造"，说这位审判员严重右倾，撤离了岗位，派了新的审判员。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新的审判员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质问志新：

"你为什么这样嚣张地攻击林×××？"

"这是我的看法，这不是反革命行为。"

"反对林×××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哪一条是反对社会主义？你回答我！"

审判员在志新的严厉质问下张口结舌了，他强作镇静，牛头不对马嘴地叫着：

"你犯了攻击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罪行！"

"我不是攻击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培养我参军、上大学，我怎么会反党？一个共产党员提出自己的看法是符合党的原则的！"

"你拒不认罪，要考虑个人前途！"

"离开党，谈不上个人前途！我没什么考虑的！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审判员的气势被志新的厉声质问压下去了，审判庭内再一次出现审判审判者的尴尬局面。审判员只好草草收场，他无力地说："回去吧，写一份认罪书交上来"志新略加思考之后，毅然地回答说："好吧，我会交给你一份认罪书的！"

夜幕降临了，志新站在铁窗下望着监狱外高远的夜空。耳边响着哗啦啦的镣铐声和时高时低的哭声。她心潮起伏，泪湿前胸，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江青一伙的卑鄙行径，也想到提审时的情景，她奋笔疾书，写下了《谁之罪》这首悲壮的诗篇：

在漫长的岁月里，
在尖锐的斗争中，
夺去党的具体领导，
她可知怎么行？
呼唤没回应，
喉干泪水净，
在战友的带领下，

她锻炼成长，

红心献革命，

永不忘誓言！

为真理而奋斗，誓死捍卫党。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人?!

今天来问罪，

谁应是领罪人?!

写完了诗，大家劝她吃一点东西，她摇摇头，在囚室内来回踱着步子。听着脚下镣声锵锵，她为《谁之罪》谱了曲。先是轻声哼唱，继而引亢高歌：

"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人?!"

"今天来问罪，谁应是领罪人?!"

悲壮有力的歌声穿过牢笼震响在辽阔的夜空。有几个难友也跟着唱起来。真理是困不住的，人心是锁不住的，歌声是关不住的！志新望着难友们，心情非常激动，她从几年来的实践中预感到，埋葬那些王八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她鼓励难友们要勇敢地坚持下去，用斗争去赢得胜利！

这一夜，志新通宵未眠。十天之后，她交出了一份长达万言的"认罪书"：

"……在这段时间里，我进行了学习和考虑，坦率地讲，没有解决认罪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立场观点不变，态度如前，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高举着真理的火炬，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想要革命么？你就应该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

这是捧向党的赤热的心，这是讨伐林彪、"四人帮"的锋利的剑！哪一个革命者读了这份"认罪书"不慨然下泪！只要还有一点共产党员气味，谁忍心对她再施酷刑？当这份"认罪书"放在审判员桌上时，他的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的良心受到了责备，反复量刑只能从轻，而他的私心又在作祟，鼓动他狠反"右倾"。良心和私心谈判的结果，决定判十五年徒刑。

省里主管政保的一位"大人物"听到这个决定，再一次大发雷霆：这是首长排号的大案要案，怎么能判得这样轻？你们只会死抠条条框框，不理解领导的意图。他亲自跑到盘山，亲自阅卷，亲自审问。志新再一次受到提审，她已预料到事情的严重，从容不迫地来到"大人物"面前，抢先厉声质问：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你受谁的指派?"

"我……"

"大人物"口吃了。

志新同志义正辞严地揭穿了他们的阴谋，"大人物"威风扫地、理屈辞穷，恼羞成怒地咆哮道："张志新死不认罪，从严，从严，从严！"他推翻了地方法院的意见，判处志新无期徒刑！

志新心如火焚。她对着高窗铁栏忧愤地自语道："真痛心啊，在我们的国家里，竟有人如

此公开践踏法律，如此滥用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器！真理啊，你在哪里？”

虽然判处了无期徒刑，但志新从不承认是犯人。在她写的所有材料里、都把犯人二字加了引号。有一天，志新在车间劳动，他负责扎鞋口这道工序。管教员训话时说：“你们每天的定额是一千二百双，争取多干，立功赎罪。”

下午四点钟，管教员发现志新的机器停了，她正静静地坐在那里休息。管教员气极了，大声申斥道：“张犯志新，你怎么停了机器？”张志新连理也不理，还是静静地坐着。管教员闯到她面前又喊了一篇：“张犯志新，你怎么停了机器？”志新从容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张志新，不是犯人！我做完了一千二百双，那是给国家创造的财富。你说多做是立功赎罪，我没有罪，一双也不多做。”

管教员气得没有办法，就去清点鞋帮数目，想找个茬治治志新，可是数来数去，刚好一千二百双，也只好作罢。

志新的申诉石沉大海，她已意识到，在这血雨腥风的日子里，冤狱遍中国，冤案堆如山，千千万万的革命者在经受着诬陷的痛苦，监禁的磨难，杀头的危险。但是啊，那过多的冤狱不就是过多的火山！地下的火正在沉默中孕育着天翻地覆的明天。志新知道，为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更流更多的血，付更大的代价。她为此牺牲心甘情愿！

一九七O年十月二十六日，志新从盘山转押到沈阳监狱。象战士调防一样，她勇猛地跨进新的战场，迎接新的斗争、考验……

五

谁人没有骨肉？哪个没有亲人？志新也有一个温暖的家，一张全家照片一直带在她身边。入监那天，她要求带着这张照片，遭到了无理的拒绝。身边虽然没有了照片、但亲人的面孔时刻浮现在她的眼前。她常常向难友们叨念：爱人曾真太老实，胃病很重，家里担子都压在他肩上了，我心里很不安。说到这，志新总是皱着眉，沉默地把爱人惦念。过了一会儿，却又满脸带笑地夸奖她的一对儿女，说女儿林林多么可爱，五岁就学会了弹怀琴。儿子彤彤聪明伶俐，三岁就能随着收音机的乐曲自编舞蹈动作，那天真的样子，真是笑死人，又逗死人。每当说到这里，她就幸福的闭上双眼、于是高墙和铁窗立即消失了。就这样长时间的回忆着过去，当她再次睁开眼睛时，总是对难友说：刚才我看到彤彤、林林了……泪水在眼眶里转。

志新想起了临来干校时的情景，那时，她背着行李包，提着旅行袋。爱人抱着儿子，女儿紧靠在妈妈身边，走了一程又一程，谁也不愿先说“再见”。林林已经长得齐肩高，象个大姑娘了，志新望着女儿苗条的身影，轻轻地皱了皱眉。父母都上干校了，社会秩序这么乱，丢下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当母亲的怎能放心？她搂着林林的肩头，轻声地嘱咐了些女孩家该注意的事情。说完了，又抱过三岁的小儿子亲了亲。临了，对林林说：“妈妈走了，你要好好学习，有什么事就去找张大娘。再见吧！”说罢加大步伐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又站下来，回过头，望着正在招手的一双儿女。

她走了，身后传来林林甜脆的声音：“妈妈早点回来呀，早点回来呀！”

整整一年之后，志新回来了，她是戴着手铐回来的。几个公安人员押着她。当她迈进那熟悉的家门时，心情十分矛盾。她想象着突然打开房门的情景。儿子一定不认得妈妈、会瞪大眼睛问，哪来这么个犯人？懂事的林林会怎样呢？她会扑上来，抱着大腿哭叫着，妈妈，

妈妈，你是怎么了？警察叔叔，你们是最爱人民的，我小时候走迷了路，不是你们送我回的家么？你们抓错了人！为什么要抓妈妈？为什么？为什么呀？

志新推开门，屋子里空空的，没有彤彤，也没有林林，孩子们阿，你们都在哪？为什么不来看妈妈？

抄完家了，林林和彤彤还是没回来。

走出楼门了，楼门口有一大群孩子，还是没有彤彤和林林。志新明白了，一定是好心的张大嫂怕吓坏了孩子，把林林和彤彤哄在她家里了。志新的眼睛湿润了。

志新被押上吉普车，车轮转动了，志新紧扒着小玻璃窗，向外边望着。车后跑来一个小孩，那不是我的小林林？林林在车后面追赶着，她已听到了林林的呼叫声："妈妈——妈——你不能走啊、还我妈妈——"志新擦了擦眼睛，想看得更清楚一些，可是林林不见了，只有灰尘。

吉普车开出沈阳，开始猛烈地颠簸了。志新就在颠簸中闭上眼睛，回忆着可爱的林林……

林林五岁那年，妈妈就教她弹怀琴，她很快就能准确地弹出七个音符，妈妈夸奖她，又教她弹曲子。第一支曲子就是教的《东方红》，妈妈在女儿幼小的心田上，播下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爱的种子。记得有一次，妈妈带林林去看歌剧《江姐》，林林看到台上反动派的狰狞面目很害怕，把头偎在妈妈怀里，妈妈亲昵地扶起孩子的头，说："不要怕，反动派没什么可怕的，你看，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坚强起来，孩子！"林林似乎懂得了妈妈的意思，就昂起头，眼睛盯着台上，一眨不眨地看。林林问妈妈："妈妈，什么叫烈士？"妈妈说："烈士是好人，最好最好的人……"林林说："我懂了，烈士是最好最好的人，江姐是烈士，妈妈也是烈士……"

想到这，志新更加惦记林林，她想，回到监狱第一件事就是写一封信……

一九七一年夏未秋初的一天，身着绿装的邮递员带着志新从狱中寄出的一封信，走进省委宿舍新六楼。他举着信喊道："曾真同志——曾真——"没有回音。又到二楼、三楼继续呼叫："曾真同志——曾真——"还是没有回音。一个男孩子把邮递员领到志新住处的门口，邮递员敲开门，得到的回答是：这不是曾真的家，他是反属，早已赶下乡了。"邮递员问："到什么地方去了？"回答是："不知道"邮递员为难了："这封信可怎么投递呢？曾真啊、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志新怎么会想到，她投出一封"写错了地址"的信，她的爱人曾真拉着十几岁的女儿，背着不懂事的儿子，被赶出了沈阳，来到辽西最偏远的一个小山村插队落户了。志新怎么会知道，亲人曾真由于生活的艰难和精神的折磨，几乎丧了命，一个月里动了三次大手术。后来，因为顶着"反属"帽子被赶出疗养院大门。志新怎么会知道，女儿小林林在"反属"帽子的压力下，十几岁的孩子过早地成熟了，学会了看别人的眼色。她写了几十份入团申请书，批了几十次"反革命"妈妈，还是入不了团。志新怎么会知道，儿子彤彤考沈阳音乐学院少年班，初试已经合格，却被取消了复试权。志新怎么会知道，曾真的心有多难，他几次想去探监，一怕重犯不让见，二怕给孩子带来麻烦，被说成划不清界限。这个大老实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下决心提出离婚，用处理志新衣物为理由赶到沈阳监狱，要求同亲人会面，可是，还是被无理拒绝了。曾真长久地呆立在监狱的高墙下，真是望眼欲穿啊！

然而，志新什么也不知道，她只知道寄出的家信给打回来了，没有收到回信，却收到了建昌县法院发来的离婚判决书。

一张薄纸，重如千斤，压碎了志新的心。她双手捧着判决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从跨进监狱大门那天起，她就做好了一切思想准备：清苦的生活、繁重的劳动、精神的侮辱、肉体的摧残，她准备在高墙里度过后半生，也准备随时为真理献出生命。但是啊，她从来没有想到离婚。这沉重的一击来得太突然，她几乎难以支撑。她多想推倒高墙，冲到亲人的身旁，当面问一问爱人，"曾真啊，难道你真……"她要搂住林林，抱紧彤彤，"孩子啊，你们不能没有母亲！"可是，怎能埋怨爱人？又怎能埋怨孩子们？是谁夺走了亲人？千罪万孽来自祸国殃民的林彪、江青。株连，株连，这封建社会最毒辣最阴险的手段，想不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竟作为监狱的补充在流行泛滥。志新轻轻地呼叫着，亲人们啊，我明白了，你们是没有被捕的"犯人"，你们戴的是精神的手铐、脚镣，狱外还有更大的狱，监外还有更大的监。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竟发生了如此残忍的事情，真理和家庭成了你死我活的矛盾。要家庭么？你就得丢弃真理；要真理么?你就得丢弃家庭!该怎样做出抉择呢?反正都不轻松!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竟发生了如此奇怪的事情，共产党员的称号和母亲和称号，不能同时并存。要作共产党员么？就得抛掉最可爱的子女；要作母亲么?就得丢弃最圣洁的党性。该怎样做出抉择呢？反正都够痛心!

林彪、江青一伙，为了扑灭真理的火炬，不知残杀了多少人。可是啊，生离比死别更狠毒，夺走母亲的孩子甚于杀死母亲，他们企图用这样残酷的手段，降服高举真理火炬的人。

志新流着泪对难友说，世界上母亲千万个，哪一个没有慈母心？难道唯有我张志新的心最毒狠？不，凡是了解我的人，都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罗马城鲜花广场的烈火在她的眼前跳跃，江姐临刑前的高大形象在她的眼前出现了。真理的火炬映照着志新，她全身沐浴着真理的金光。

志新擦干了泪，把手里的判决书撕成条条，又把条条扯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理理短发，就坐下读毛选，她一边读，一边做着笔记。写下了如下的话：

"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

"两个家庭加起来二十一个人，就是都抛掉了又有什么了不起？为了追求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抛开，生活本来就不是这么个小圈圈。现在好了，一身轻，无牵无挂，斗争到底！"

六

一九七五年春天，慷慨的大自然照例用红花绿叶妆点了烟雾蒙蒙的沈阳城。第一朵柳桃花在街头悄悄地绽开了粉红色的花瓣。然而，人们无心赏花，因为心中已没有了花，没有了花的春天。

在这无花的春天里，"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动用专政工具，开始了血腥的大搜捕、大镇压。无数革命老干部、革命群众被专政，被"办班"，被投进监牢。志新所住的牢房里，"现行反革命犯"在急剧增加。

志新望着身边的那个辽西来的姑娘，刚满三十岁，已经有了十年狱龄，监狱吞掉了她人生中最可贵的青春。她是怎样被捕的呢？原来，十年前，讨厌的派性斗争使她厌倦了，有一天，她心情很烦躁，拿着笔在报纸上信笔乱写，她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一个善于观察"阶级斗争新动向"的人把这张报纸拿去，作了一番考究。划了各种形状的圈圈，有鸭蛋形的，有烙饼形的，有鸡肠子形的。一共划了二十四个圈圈，圈出二十四条"反动"标语。证据确

凿，铁证如山，有口难辩，抓进大牢，判了十五年徒刑。

志新转过头，望着紧靠山墙的那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来自辽南，现在正望着铁窗低低哭泣。她是那么朴实、厚道，有话不会说，有冤不会喊，这个"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只因为做鞋打袼褙用的旧报纸上有一张像，判了有期徒刑十年。

志新的眼睛里突然流出热泪，她望着对面床铺上一个空荡荡的床位，那是老干部陈钧同志，因为怀疑、反对江青，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这位原东北局的老处长受到大家的热爱和尊敬。她身患严重高血压、心脏病，志新曾多次半夜起来，守护在陈钧床边，倒水喂药。可是，再也看不到她了，前天，被活活打死在走廊里。

监狱是政治斗争的风雨表，"现行反革命"塞满监狱，说明斗争到了决战的时刻，邪恶势力已处于风雨飘摇。志新同志手扶铁栏，笑望着火红的太阳，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她抓紧一切时机，无情地揭露、批判江青一伙的反党罪行。

斗争到了关键时刻，祖国正处在黎明前的黑暗。张春桥叫嚣要"杀人"，"四人帮"在辽宁的死党积极照办。他穷凶极恶地说："张志新死心踏地，活一天和我们干一天，杀了算了。"下令法院办理加刑手续。

四月三日，志新再一次以审判者的气势出现在法庭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斗争。经过简单的几句对答之后，志新不等再问，便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演说，她以法庭为战场，有力地揭露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罪行。她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说了一个共产党员该说的话，我的观点起之有因，立之有据，坚持不改有理！"

第一个审判员被顶下了台，第二个上来了，又哑口无言。审判只好草草收场。法院要志新签字，志新已经看穿了这次审判的卑鄙目的，要求看记录，遭到了无理拒绝。志新抗议道："不给看记录是非法的，我拒绝签字！送我回监！"

为了杀害英雄，他们竟明目张胆地践踏法律，以这份没有签字的提审记录为根据，改判张志新同志死刑！按照法律程序，判死刑后，应有十二天上诉期，可是，他们杀人心切，第二天上午就执刑了。

四月四日，当属于英雄的最后一个黎明来到时，管教员问志新："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志新坦然地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观点至死不变！"这就是英雄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千古不朽的"正气歌"。

从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四日被捕，到一九七五年四月四日英勇就义，志新同志同人民的敌人针锋相对地斗争了二千一百个日夜。没有一刻松懈过斗志，没有一天不奋笔疾书，慷慨陈词。敌人用泡沫塑料没有堵住她的喉咙，用透明指纹胶没有封住她嘴，用株连、离婚、陪决，没有削弱她的斗志。敌人害怕了，颤抖了。害怕志新同志在刑场上继续揭露他们的罪行，竟毫无人性地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利。

志新同志无声地倒下去了。在给烈士遗体拍照时，他们用一条黑布缠在烈士的脖子上。但是，一指黑纱怎能掩盖得了反党反人民的滔天罪行！历史是公正无情的，企图涂抹历史的人，终究逃不脱历史的审判！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临终前曾引亢高歌："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但是，残暴的奴隶主比起"四人帮"到底仁慈得多，屈原终于没有被肢解，清清的汨罗江保存了他的完美躯体。而张志新烈士的遗体却在肢解之后，不知丢弃到什么地方了。

七

志新的老妈妈，一个年近八十的爱国知识分子，听到女儿的噩耗后，悲痛欲绝，放声大哭。刚哭了几声，就用强力克制住了，对女儿志勤说："你到隔壁邻家去一下，要是问我为什么哭，就说你姐姐病死了，她，病，死了……"老人家怕别人知道是"反属"，给活着的儿女带来更多的非难。她哽哽咽咽挥笔写道："我的女儿是刘胡兰，是韩英，决不是反革命！不看到这样的结论，我死不瞑目！"

老人家的宿愿终于实现了。历史还了她女儿的本来面目。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共辽宁省委召开了为革命烈士张志新同志平反昭雪大会。追认张志新同志为革命烈士，称誉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号召全省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向她学习。

四月四日，在志新殉难四周年的这一天，辽宁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张志新同志的追悼大会。林林、彤彤捧着妈妈的没有骨灰的骨灰盒，在宣传部领导同志的护送下，送往革命公墓安放。

在召开追悼会的这天晚上，曾真同志带着林林、彤彤和从北京赶来参加平反大会的烈士的两个妹妹围坐在一起，颂扬着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恩情，回忆着烈士光辉的一生。志勤问："姐姐牺牲前没有留下什么遗书么？"曾真说，留下了一封信。曾真把一封烈士的遗书双手捧给志勤。志勤急速地读下去。

"曾真：

结婚十四年，我们生下了一男一女，我没有也无力完成自己的义务，希望你很好地抚养下一代，对林林要耐心，女孩子每长一年，事就更多，更很好地爱护她，叫她不要早婚。妈妈对不起她们，过去自己修养不好，打骂过孩子，让他们别往心里去。要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改正"没有坚持精神"的缺点。让林林好好照看小弟弟。不要伤心，要坚强！

那一百元钱，是我平时节俭积攒起来的，打算为父母办理丧事用。请把钱寄给我母亲，这也是最后一次孝敬！我没给父母写信。你也不要把我的事告诉她们，免得受刺激犯病。你平时要多注意身体、为了革命，多照顾自己吧。如果你照看不了孩子，可写信和母亲商量，把孩子放到天津。我不在了，收入减少了，担子都是你的了。对孩子要耐心，我对不起你！

一个人不管是生或死，只要是为了革命就是有意义的。

我懂得了革命，决心要为革命贡献一切！真正的革命事业永远是兴旺的、蒸蒸日上的。我愿为美好的未来添点土，出点力，但有没有这种可能，看来不由我决定了！

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祖国万岁！

毛主席万岁！"

这封信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晚写的，但是没有寄出来，被非法扣押，作为志新的反革命罪证装人档案。同时，又复制了一份，并在信的末尾写上"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写给曾真的信"，作为曾真的罪证塞进曾真的档案里。

曾真同志百感交集，在信上"这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志新写给曾真的信"的后面，写了下面的话：

"我在经过了十年又七十一天的漫长岁月之后，终于收到了这封永诀的信……"

(原载《鸭绿江》1979年第5期)

划破夜幕的陨星

——记思想解放的先驱遇罗克

几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似群星灿烂，彪炳于历史的太空

那些扭转乾坤、功昭日月的巨星，那些有创造发明、能利国福民的名星，将永远被人们称颂。然而，人们也不会忘记，当银汉低垂、寒凝大地，我们民族蒙受巨大苦难的时候，那拚将自己全部的热，全部的力，全部的能，划破夜幕，放出流光的陨星。虽然看来它转瞬即逝了，却在千万人的心头留下了不熄的火种。

恰似长夜的十年动乱中，被残酷杀害的青年遇罗克，就是这样一颗过早陨落了的智慧之星。

"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1957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从那一年起，不但一家人的生活水平大大降低，连遇罗克的操行也由过去年年的"优"突然变成了"中"。仿佛从金色的塔尖上跌落下来，小罗克开始尝到人世间的辛酸了。

15岁的遇罗克是多么留恋过去无忧无虑的日子，多么想念小学校里那总是笑眯眯的勉励他天天向上的班主任王老师啊!

在老师教育和社会影响下，小罗克努力提高觉悟，刻苦读书，决心做一个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人。

他一上中学就写了入团申请书，还给自己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每天不看完50页课外书，我决不睡觉!"

可是现在，罗克遇上了严重问题，但是，罗克坚定地说："不管爸爸妈妈怎样，咱们应该抱定一个信念——照革命导师的话去做，真理永远是真理。走自己的路，这就是结论。"

他学习劲头不减，入团决心不变。但是，接连发生的变化，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使他难以理解。

给课外文学小组讲学的两位老教师，学识渊博，谈吐幽默，深得同学们的欢迎。反右开始不久，他们就销声匿迹了。过了些日子，叫同学揭发这两位教师的问题。尔后，大炼钢铁的浪潮把学生们席卷进去。当他也象别人一样兴致勃勃地从炉子里钩出一块蜂窝状的铁块时，他有点疑惑了"这就是钢吗？"细细端详一会儿，他执着地说："我在工厂里见过钢，不是这个样子。这还是碎铁，只不过是把它烧结了。"一句大实话，当即招来一顿声色俱厉的训斥。

遇罗克心里就是不服。结果，他又一次因"否定大炼钢铁伟大成果"而受到了批判。

尤其使遇罗克恼火的是，几乎每一次的打击，都要同他的家庭联系起来。

遇罗克没有被命运的一次次打击击倒，他照样发愤努力，从思想上、学习上提高自己。高考临近了，遇罗克清醒地估计到这一关的考验，尽管他知道自己的文理科成绩在班级和年级里都是拔尖的，他还是报了地质专业。他想，报考这个冷门也许比较容易用优异的考试成绩掩盖父母的"政治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坚持天天跑步，练哑铃。在他经过的地方，常常响起欢快的歌声，那是他最爱唱的《地质队员之歌》。

"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背起我们的行装，踏遍了层层的山峰……"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有一颗赤子之心"

自从父母被划成右派，弟弟妹妹发现，罗克哥哥一下子真成了大人。他常常用一只手支着头，长久地趴在桌子上读书；有时还抬起头来，凝望着窗外，陷入深深的思索之中。

住房比过去小多了，一家挤在一间半小屋兼厨房里，出出进进，纷纷攘攘，罗克怎么能看得进书呢？他问母亲："能不能把装煤的小屋腾出来，让我住和念书用。""那怎么行？没窗没门，又黑又潮，是住人的地方吗？""没关系，我去和房管所商量，请他们来修一修安个门。"

不久，这间夹在两屋之间只有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果然修好了。罗克用鲁迅的诗笺、徐悲鸿的画《逆风》、《奔马》和自己书写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条幅，挂在壁上和床头，以此表达他的心胸和情愫。从此，这间小屋的桔黄色灯光经常从黄昏亮的深夜，遇罗克读了多少凝结着人类思想精华的著作啊！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历史的，文学的，还有天文、地质、地理、数学，凡是能找到的，他都找来读。

在所有领域中，他特别喜爱哲学，反复读过不少中外哲学家的名著，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中国的孔孟直到黑格尔、马克思。他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说："只有了解每一个学派的思想，他选定的信仰才是坚定不移的。"当他驾着求知的小船，航行在古今哲学的浩瀚海洋时，他发现唯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象一座光芒四射的灯塔，引导人类前进；又象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认识人生。经过深思熟虑，他说："我坚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正确的。"他下定决心："坚持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唯物辩证观点，立志做个完人。"

高考越临近，罗克的心绪也越紧张。他对自己的功课是知底的，"高考门门不能下 90 分！"可他又担心因为父母"问题"的影响，他的操行成了"一蹶不振"的"中"哟！1960 年夏末发通知那天，班上只有两个人什么也没接到，一个是有盗窃行为的学生，一个是门门功课一直名列前茅的遇罗克。

整整一天，罗克坐在自己的小屋里，不说一句话，不喝一滴水，不吃一口饭。他的担心终于成了可怕的现实。

遇罗克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他打开小灯，铺开稿纸，一只手插进黝黑，蓬乱的头发里，一只手愤笔疾书。

"我没有金色的衣裳，

没有金色的衣裳……"

第一次高考后，罗克自愿报名到京郊人民公社当农民。1961 年春节前夕，他的申请被批准了。

"少年幸遇读书风"，这是遇罗克在农村写下的诗句。夏天，为了在灯下静坐读书，罗克总是"重装上阵"，三伏天穿起老蓝布制服，将裤角、袖口掖紧，外加一盒清凉油。他就是在

这里，穿着铠甲似的衣服，一晚一晚地在灯下读着列宁的《哲学笔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还有《世界哲学原著选读》……

1962年，大学扩大招生的消息传来，罗克积极应考，试后觉得很有把握。不料，又是名落孙山。这时，传来蒋帮企图窜犯大陆的消息。征兵开始了。罗克又立即报名。"大学不要，我们上前线去，战斗会证明我们有一颗赤子之心！"然而，他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新打击落在旧创口上，更觉疼痛，更感惶惑。

出身！出身！什么时候才能掀掉这块压在身上的大石头呢？遇罗克提笔写了一首诗，表达了他的不屈的赤子之心，要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坚决地走下去。

"千顷雪原泛夜光，诗情人意两茫茫。

前村无路凭君踏，路亦迢迢夜亦长。"

"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1965年11月，反动文痞姚文元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个精心制造的大冤案开始了。乌云压顶的海面上，罗克就象一只渴望战斗已久的海燕，挺身而出了。

短短的时间里，一篇一万六千多字的《论"清"官非"官"》完成了，一篇一万五千多字的《人们需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商榷》草就了，又一篇一万四千多字的《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问世了。

《从〈海瑞罢官〉谈到历史遗产继承》，投到陈伯达把持下的《红旗》杂志，被退了回来，遇罗克在当天的日记中用嘲笑的口吻写道："报纸上一些无聊文人大喊：'吴晗的拥护者们态度鲜明地站出来吧！'今天有一篇态度鲜明的文章又不敢发表。"

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他在这篇文章中点名批评了姚文元的种种谬论。他在日记里写道："凭心而论，《文汇报》大部删的也还不失本来面目，文笔依然犀利，论点也还清楚。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晗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

随后，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终于开始了，多少人为之惊慌，多少人感到迷惘，遇罗克却表现出惊人的冷静，对发生的一切作了锐敏的观察和无情的批判。

他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一月的日记中，他就感到"今天的学说正在走向神秘之途"。在2月6日日记中，他批判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词句颂扬毛泽东同志，他写道："人民的力量何在呢？""陈的这个错误是最起码的。由陈来主编《红旗》，欲不教条，诚大难哉！"5月4日日记中写着："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主席）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的。"

他坚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6月4日日记中对运动中的狂热极为不满，他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动性……学校大哗，每个学生都效仿北大七同学，给领导大刷大字报。所谓北大七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这时，他已来到北京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他在7月29日日记中写道："开全厂大会，宣布中央两个文告，今后运动方向是直指当权派，……这根本不是什么阶级斗争"，"总之，这跟文化毫无关系，也跟阶级毫无关系。"

他激烈抨击毁灭文化的倒退行为。他的日记中记载着:"晚上看到受批判的电影《红日》,这么一部深受束缚的片子所以受批判,就是因为里面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今天要求的决不是什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而是要求的是'革命的空想主义'。要一切死人活人给我们说假话,欺骗人民。希望现实也去迁就那些假话。"

他对揪斗的所谓黑帮特别同情,并对他们始终不承认黑帮的气节格外赞颂。8月8日的日记中写到斗所谓黑帮时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种气节是值得学习的。假使他认为是对的,就死也不能说是错。革命,只能信托给有气节的人"。

更大的考验到来了。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辉的日记,被发现了,被当作"变天帐"出现在"红卫兵战果展览会"上了。接着,又成了遇罗克的"反革命罪证"。

几天之后,深夜一点,厂里来人把他带走了,因为他竟敢反对大名鼎鼎的"左派"姚文元。

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

"1966年9月×日

今日释放回家。小屋浩劫一空,破破杂杂,收拾干净,重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75页,并记了笔记。

如果我自欺了,或屈服于探求真理以外的东西,那将是我一生中最难过的事。我要做一名马列主义的忠实信徒,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

这是遇罗克从工厂"学习班"回来写的第一篇日记。就在这天晚上,他开始撰写《出身论》。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写的。

他剖析了流毒极广的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指出:"它的错误在于:认为家庭影响超过了社会影响,看不到社会影响的决定性作用。""依照他们的观点,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共产主义就永远不能成功,所以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依照他们的观点,父亲怎样,儿子就怎样,不晓得人的思想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所以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控诉了血统论对青年的毒害,最后发出呼号:同志们,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平这人为的鸿沟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10月深秋的北京街头。被一片"打倒"声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们,忽然在许多公共场所读到一份油印的《出身论》,仿佛漫天阴霾中透出一片晴日,多少人在阅读,在抄录、在沉思,在议论。《出身论》引起的反响,甚至出乎遇罗克的意料。

难以数计的来信从全国各地飞来。

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出来表态,公然说《出身论》是反动的。面对来自权力顶峰人物的强大压力,年轻的遇罗克始终坚强不屈。

对于未来的危险,遇罗克早有准备。他在给广东一同志的信中说:"我只有一半自由了,我的身后总有人跟踪,我的朋友开始受到讯问,我的信件都被邮检了。""尽管我们不是阴暗角落里的跳蚤。不过,……整个一部历史也并非一册因果报应的善书。罚不当罪的决不是没有。"

1967年底，罗克象往常一样，作了“1967年的总结”，写了“1968年的读书计划（104册）”。在长达7，000字的“总结”中，他写道，血统论横行“是‘社会主义’时期一个奇怪的现象。以中国之大，竟无一人大胆的抗议、强烈的控诉，实在是时代的耻辱。我尽了历史必然规律性所负（赋）予我的任务，或者说由于主观的努力，比别的人先走了一步。即使我不做这件事，也会有别的人做的。”他深知与封建主义做斗争的艰巨性，他写道：“我知道与强大的传统势力宣战不会有好结果的。但我准备迎着风浪前进”。“从《出身论》一发表，我就抱定了献身的宗旨。我想，历史是会把我的这一段活动当作注脚的，它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历史会看到，在跃进了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封建的意识形态还怎样广有市场，和它战斗还会有多少牺牲。”

“未必清明牲壮鬼　　乾坤特重我头轻”

就在写完总结的第5天，遇罗克被捕了。

在狱中，遇罗克实践了自己在1966年8月26日日记中的誓言：“我想，假若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烈，豪杰！铡刀下，不变节。”在频繁进行的几十次审讯中，遇罗克大义凛然，唇枪舌剑，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势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预审庭宣布：“你公开点名攻击姚文元就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遇罗克说：“我不知道姚文元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当预审庭说他攻击中央首长时，遇罗克说：“我认为陈伯达是左倾教条主义者”，“陈伯达用封建时代的词句歌颂毛主席是不合适的。”预审庭又问“你为什么攻击江青××？”罗克毫不掩饰地回答：“我认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不应该只有八个样板戏。”预审员气得大骂：“混蛋！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让你攻击遍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你一句也没有批判……”

对强加在自己头上的“恶毒攻击”罪，遇罗克绝不接受。他多次在法庭上、自述里，倾吐了对党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无保留地陈述了自己的一系列观点。他在材料中写道：“我过去认为，59年到63年期间，如果没有错误，就不会那样困难。”他还在法庭上说过：“我对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各种理论都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认为占时间太多。”这些当时被看做“恶毒攻击”的话，岂不正是现在人们公认的真理吗？

由于违犯狱规和“态度不好”，遇罗克多次被戴上背铐和重铐。不可名状的痛苦，折磨着这个纤弱的书生。背已经微微驼了，顶开始渐渐秃了，脸色更白、更黄，看不到一丝血色。但是，“丹砂粉碎丹仍在，铁链锻成铁愈铮。”在他躯体内为真理而斗争的烈火还在熊熊燃烧。

虽然“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在林彪、“四人帮”把持下的法庭还是决心以“思想反动透顶”、“大造反革命舆论”等罪名置遇罗克于死地。

在真理即死亡面前，遇罗克象我们民族的无数英雄一样，昂起了高贵的头。

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在狱中的诗篇吧！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真实写照，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临终遗言：

纪　行

淮河黄河与海河，风尘万里泛浊波。
人生沸腾应拟是，歌哭痛处有漩涡。

恶浪恶浪奔驰速，风雪日夜苦折磨。
认定汪洋是归宿，不惧前程险阴多，
多少英雄逐逝波。

赠友人

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
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1970年3月5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红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拼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为了坚持真理，藐视林彪、"四人帮"，遇罗克就是这样威武不屈，壮烈献身。

一颗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他的生命。一颗正在升起的新星陨落了。那一年，他才27岁。

十年之后，我们到北京东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探访遇罗克的遗迹。他的一家人已经迁走了，他的小屋也改建他用。真正是"物去人飞"，一切都似乎不存在了。但是，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者的思想又怎么能够消灭得了呢？他用自己的鲜血在人们心头播下的火种，终于映红了祖国的长空和大地。

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遇罗克平反，正式宣告"遇罗克无罪"。

"历史是会估价我的功过的。"遇罗克的预言完全得到了证实。这位思想解放的先驱，这位捍卫真理的勇士，通过历史的凯旋门，重新回到了我们中间。他的短短一生迸射出的光辉，将永远闪耀在人民的心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　王　晨
《光明日报》记者　张天来

（转自1980年7月25日《人民日报》）

九　死　一　生　献　国　策

叶　永　烈

"反革命"万言书存入革命博物馆

《人民日报》海外版上一则短讯，像一星灿烂的火花，从我的眼帘中闪过：

本报讯　四川省雅安地区一位名叫李天德的知识分子，一九七五年写的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万言书——《献国策》原件，最近被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革命文物收藏。《献国策》的核心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李天德因写这份万言书被"四人帮"打成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后经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二十年，直到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平反。……

飞机。火车。汽车。千里迢迢，我从东海之滨的上海，赶到西南古城雅安——当年西康

省的省会。

在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我见到了刑二庭庭长杨正全。他曾为李天德平反冤案，熟知详情。他用一口浓重的四川话兴奋地告诉我："一九八五年四月，我们收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来信。信中说，李天德的《献国策》是珍贵的革命文物，他们要征集、收藏原件，希望得到我院的支持。我们经过研究，同意把《献国策》原件移交中国革命博物馆，让千千万万的人——特别是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磨难的青少年、从中得到教育。"

"你们手头有《献国策》影印件吗？"我赶紧问道。

"你可以在这儿看到原件。"杨庭长告诉我，"李天德当时把《献国策》抄写了三份。其中两份投邮寄往党中央，一份亲自送往当时的中央办公厅接待站。这三份原件都在——十年前、那是作为李天德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大罪证保存的。这次送交中国革命博物馆、只是其中的一份原件。"

——就这样，我在封面上赫然写着"案由：反革命"的案卷里，有幸全文拜读了《献国策》原件。这是一篇以生命为代价写下来的征讨"四人帮"的檄文……

震聋发聩、力透纸背的《献国策》

笔写下来的，斧头也砍不掉。在和煦明媚的春日，读着在一灯如豆的寒夜中写成的万言书，我的心中充满着对作者的敬意。他超越了时代。他的许多真知灼见，即使在挣脱了"四人帮"的禁锢后的一九七七年、一九七八以至一九七九年，也未必为人们所接受。《献国策》的作者具有政治上的火眼金睛。

端端正正的字，写在二十二页五百字方格稿纸上。首页写着"献国策——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

《献国策》锋芒所向，直指那场"好得很，就是好"的"文化大革命"。他指出：

"关于文化大革命，我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坏处大大超过好处。

"（A）我们的许多好干部受到林彪一类的迫害。

"（B）我们的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愚弄，受了坏人的唆使，像仇人一般相互厮杀。

"（C）让林彪一类大小坏蛋捞了便宜。小坏蛋搞打、砸、抢、抄、抓、奸淫、烧杀；大坏蛋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政、搞法西斯主义。为一切仇杀、个人报复大开绿灯。"

"（D）国民经济遭到建国以来仅次于'自然灾害'几年的空前大破坏。中央当然不可能知道文革期间中全国工农业产值的真实数目。

"（E）在精神道德方面，由于林彪搞的神秘主义宗教迷信，极权崇拜，使人们变得不诚实、伪善，变得奸滑。……"

他还进而从"文革"上溯"三面红旗"和反右派扩大化，痛斥种种"左"的所为：

"关于三面红旗，虽然有人极力肯定，但我要否定。……人民公社是'共产'风，大破坏、乌托邦的狂热。……层层的干部弄虚作假，谎报成绩，欺上瞒下。……大跃进的第二个年头（五九年）一切工农业产品减少，到了六O年、就变得奇缺。……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正确的。"

"大学生右派一律无罪释放。对治理国家大事确有独特进步见解者，可担任国家干部。"

他那犀利的笔锋，触及当时人们讳言的个人迷信，要求正确评价毛主席的功与过，尖锐地指出毛主席晚年的严重错误。

他建议废除干部终身制，明确提出"中央主席，不得连任二十年"。"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各部委，任职均不得超过十五年"。他认为："这样做，即（既）避免了形成个人专制和宗派集团，也造就了更多的国家领导人，让人民中的更多的优秀人物都有机会管理国家事务。"

他在万言书中，提出整整十二个方面的国策。

在同一案卷里，我又读到十年前——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对现行反革命李天德案审理总结》，我的心一下子收紧了。

"李犯天德曾因反革命犯罪两次判刑，不思悔改，公然流窜到首都，疯狂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屡教不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分子。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

人妖颠倒，明珠暗投，革命志士李天德险些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押上断头台。九死一生，劫后幸存，我终于找到了依旧健在于人间的李天德……

他追求光明，但被投进了黑暗

一个中等身材、瘦削的中年人，穿着一身旧的蓝色公安制服，向我走来。他，就是李天德。看上去普普通通，只是眼角、嘴巴的皱纹使他显得比四十七岁更苍老一点。

"我的青春年华，是在铁窗下度过的。"他长叹一口气说，"一九五八年，我才十九岁，就被错划为'右派'。当年被捕入狱。此后，在漫长的二十年中，我的身份一直是'囚徒'、'反革命'、'现管分子'。直到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我才被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但是仍然给我留下了一条'有政治错误'的尾巴。在一九八一年国庆节，我四十二岁了，这才结婚，有了小家庭。艳艳出生的时候，我已经四十三岁了。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如果没有党中央领导同志对我的关心，我今天还在监狱里。尽管我一生坎坷，甚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有人整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党的信念。我在监狱里的漫长日子，就是全靠坚信党才挺了过来的……"

一九三九年，李天德出生在四川荣县李子乡，父亲李佛海靠染布为生。他才二岁，父亲就被日本飞机炸死。母亲是文盲，在他十一岁时死去。靠着大哥的照料，他才艰难地念完小学、中学。他十二岁入队，十五岁入团。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中学代课教师，终于在一九五六年九月戴上了重庆大学校徽。

虽然他念的是冶金系，却酷爱文学。他担任了系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写过诗，演过京剧《捉放曹》中的陈宫……他，沿着"红领巾——共青团员——布尔什维克"的道路前进。他，向往的英雄是卓娅、马特罗索夫、邱少云、黄继光、吴运铎。他，读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是五十年代纯真向上的大学生中的一员。

然而，一九五八年三月，他的书桌上，他的宿舍里，被贴了许许多多触目惊心的标语："警告你，狡猾的狐狸李天德！""反党分子李天德必须低头认罪！"……

他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保留学籍，劳动考察。我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四日中共重庆大学核心办公室所发的一份平反文件上，查到如下的话："在五七年反右中，李天德对当时个别班的反右斗争提了意见，写了三张大字报和一些诗。根据中央一九七八年五十五号文件和中央一九五七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六条标准》衡量，不是右派言论。原划李天德为右派骨干分子实属错划，应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然而，这份平反文件发到李天德手中时，

他已步入不惑之年了!

祸不单行。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在重庆南桐矿区下放劳动的李天德，正在吃力地背着铁矿石。突然，他被叫到操场上开会。重庆市公安局派人出席大会，当众宣布逮捕四名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李天德刚听见念到自己的名字，双手就被冰凉的手铐反铐起来。从此，手铐脚镣如同家常便饭。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他被判处五年徒刑。罪名相当可怕——“妄图偷越国境”！原来，他被划为“右派”之后，跟几个“右派”学生一起劳动。其中一个云南籍的“右派”学生说他的家乡土地肥沃、气候温暖，大家不如上那儿混口饭吃，起码比“监督劳动”要自由自在些。不料，打算去云南被说成“妄图偷越国境”，打成了“反革命小集团”。

逆境中冰水般的生活，没有使他那颗火热的心变冷。别的犯人觉得狱中的时间格外漫长，度日如年，无处打发那无穷无尽的时光；他却深感光阴似箭，分分秒秒一去不返。白天，他给犯人们上机械制图课，为制造小火车头而设计夹具，搞工艺；夜晚，他把时间花费在苦读上。他读了《毛泽东选集》，读了《资本论》，反反复复研究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还读了黑格尔、亚里士多德、费尔巴哈、康德、尼采等哲学名著，写下数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心明眼亮。在许多人沉醉于“大跃进”狂热之中的时候，他的头脑十分冷静。他在一份《反省书》中，写下了鞭辟入里、透云穿雾的文字：

“对于我个人的言行，勿需反省，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我坚持我自己的观点，这就是：

“（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各国共产党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斗争，党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反‘右’运动把阶级斗争放在第一位，这是违背‘八大’路线的；

“（三）总路线的提法含有极左因素，反映了一部分群众中的冒进情绪，违背了我国现阶段的客观条件。‘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斗争便是这条路线‘左’倾因素的产物。”

《反省书》交上去了，“顽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场”的大帽子扣了下来。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李天德终于刑满。但是，他的头上依旧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留厂管制就业。

一九六五年底，他写了五幕九场话剧剧本《和平里的战争》，投寄给《人民文学》和《剧本》两杂志。剧本以他亲身经历的重庆大学“五七风云”为背景。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四川省石棉县人民法院判处他六年徒刑。判决书上这样写着：“李犯天德借写剧本为名，大肆散布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反动言论，污蔑、攻击党的各项政策，污蔑‘五反’、‘肃反’搞糟了，妄图反革命复辟。……”

在法庭上，李天德面不改色，从容自若。因为他早已听惯这类“大批判”词句，他坚信：真理绝不是权势的儿子。”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理”！

在困难当头的日子里他忧国忧民

一九七五年春天，李天德仿佛与往昔判若两人似的，变得十分“积极”：干活抢在头里，

连星期天也不休息。一向"顽固不化"的他，忽然常常找干部汇报思想，"检查"自己的"错误"……"顽石"点头了！

就在管教干部的表扬声中，李天德递上了申请回家探亲的报告。跟他同住多年的犯人，第一次听他说起，他还有家！

他，一九七二年十月刑满后，仍然戴帽，在四川苗溪茶场管制劳动。在将近二十年的监禁生活中，他不敢跟哥哥、姐姐联系，生怕祸水横流，牵连兄姐。在漫长的岁月里，兄姐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间。

此时此刻，他为什么萌发了思乡怀亲之情？

天天细心阅报的他，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中旬关于四届人大的报道中，读到了确定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国务院人选，燃起了心中的希望之火。

他打算仿效毛遂自荐，前往北京南国策——他在狱中思索多年的心血结晶。尽管他人卑言微，但是他决心以自己细弱之力尽匡正时弊之责。

他深知此行凶多吉少，无异于自投罗网，但是，与其庸庸碌碌而生，不如壮壮烈烈而死。他记起文天祥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记起《国际歌》震撼人心的歌声——"这是最后的斗争"！

世伪识忠贤。他身在囚笼，心怀华夏。他常常在小板床上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构思着《献国策》。

只能记在心里，不能形诸笔墨，因为他身处那样的逆境，被剥夺了言论的自由。他更无法从苗溪把《献国策》寄往北京，因为他的一切信件要经过检查才能付邮。

唯一的办法是亲自冒死晋京，递送《献国策》。

要进京，必须设法从劳动茶场脱身。于是，他想到了申请"探亲假"——他毕竟近二十年来未探亲。

要探亲，必须表现"积极"。要进京，必须积攒路费。从成都到北京，硬座票也要三十元五角。他每月才二十九元工资，除去十六元生活费，每月省下七元。好不容易，才悄悄积存三十多元钱。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探亲假——总共十天。

此行必死无疑。然而，启程前，他不动声色。他把蚊帐暗地里抵给别人，换了八元钱，一床被子换来五元钱，一只箱子换了五元钱，一口铝锅换了二元钱——他抵押了他的如此"全部家产"，不过换来二十元钱而已！

踏上旅程的刹那，形销骨立的他，心境是极其芜杂的：他欢欣，终于成行。他忧愁，忧国忧民。他焦急，急于把腹稿付诸笔端。他痛楚，自知飞蛾赴火，难免杀身之祸。真的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他的心中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面对"四人帮"的高压政策，敢怒者众，敢言者寡。他敢怒而敢言，置生死于度外，喊出人民的心声。

他计划中的头一桩大事，就是把《献国策》》赶紧写出来。要写万言书，得找个地方住下来。他来到成都，在老南门总算找到一个住宿费最低廉的红星旅馆，十几个人睡一个大铺，每夜三角钱。他又花了三角钱，买了一刀方格稿纸。白天，趁别的旅客外出办事，他躲在旅店里写作。

才住了一天。他就发觉那里不安全。因为民兵查铺查得很紧。他的身边既没有工作证，也没有户口簿，只有劳改农场开的探亲证明——正是民兵重点盘查的对象。万一被查出《献国策》，那就糟了！

没办法，只好搬到新南门旅馆去住。那里六个人住一个房间，民兵不大“光顾”，不过要五角钱一天——对于他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支出了。

白天，他躲进离新南门不太远、在四川大学附近的望江公园里。竹林茂密、幽静，倒是写作的好地方。可是，在公园里写东西，游人一走近，他就不安心，仍旧写不成。

想来想去，还是躲到旅馆里写。白天，旅客们都出去了，他关门写作。写好一页，就往床板底下塞。为了以防万一，他的稿纸旁放着红色的语录本，还写了好几页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随时可用来遮住写作中的《献国策》。

写出初稿以后，反反复复地修改，端端正正地抄写了三份。然后烧毁了草稿。那三份《献国策》，用塑料薄膜包好，塞进随身所带的一件破棉衣里……

为了《献国策》，他真的被打入了地狱

北京。陶然亭公园对面的永定门车站。子夜，一个疲惫不堪的男人，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呼呼酣睡。他就是李天德。

他是在八月十二日到达北京的。一下火车，他就直奔新华门——那是他在梦中思念已久的地方，国务院的神圣大门！他听说过，周总理、邓副总理坐的是红旗牌轿车，就向人详详细细打听红旗牌轿车是什么样儿的。他打算当红旗牌轿车从里面驶出来的时候，上前拦车，当面向首长呈送《献国策》——他生怕邮寄到不了周总理、邓副总理手中。

新华门毕竟门卫森严。他不敢在门口滞留。装成一个普通的行人似的，从门前走过。过了一会儿，踅回来，又从门前走过。走了几个来回，仍不见一辆浑身乌黑、车头镶着透亮红旗的轿车。不知道是由于心里紧张，还是真的如此，他似乎觉得有人在注意他。

他不得不赶紧走开，步行到永定门车站过夜，打算第二天再去新华门等候。

然而，候车室里曾遇到过一场盘查的虚惊，使他意识到必须加紧行动，意识到那件破棉衣并非“保险箱”。第二天清早，取出了三份《献国策》，扔掉了破棉衣。他把其中的两份，用纸包好，一份写“中共中央收”，一份写“‘人大’”常委会朱德委员长收”，投进了永定门车站邮筒。

他怀揣着最后一份《献国策》，又向新华门进发。他知道周总理正身罹重病，住在医院。他决心无论如何要面见邓小平副总理，递上《献国策》。

新华门红色的大门敞开着，警卫守候两侧，显得那么庄重。他又在门前走过来，踱回去，依旧不见红旗牌轿车的影子。他下定决心，径直朝敞开的大门走过去。

警卫拦住了他，问清事由后，由一位工作人员陪着李天德，来到太平街八号的接待站。门口、站着的、坐着的、半躺着的、挤满了操着各种口音的人，都是进京上访的。

李天德想离开这里，因为他明白在这里不可能见到邓副总理。但是那位工作人员一直陪着他，使他无法走开。一直到下午四点多，终于轮到李天德。

接待室里，坐着一个女接待员，说的倒是一口四川话。

“什么事？”

“我从四川来，要面见邓副总理，送一份文件。”

“你把文件交给我，我可以代为转交。”

“我一定要面交。”

“交给我就行。我一定给你转交。”

李天德终于掏出了《献国策》，交给女接待员。

她当即开阅。起初，她的眉头皱了一下。接着，脸拉长了。紧接着，她满脸愠怒，用恶狠狠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李天德。

"你坐在这儿等着。不许走开！"她用命令般的口气，冷冷地说道。

李天德意识到大祸即将降临。但是，他镇定自若地坐在那里。如同《老子》七十四章所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正是以"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英雄气概，决心燃烧自己，照亮别人，这才不远千里晋京死谏。逆境是一面筛子，弱者早已筛去，强者才留存下来，才会坦然坐在那接待室的椅子上。在那"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的年月，他宁直毋曲。

晚上八点，呼啸的警车把他押往北京市公安局审讯室。他落进"四人帮"爪牙之中。

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了四川苗溪茶场核查……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北京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李天德——这是他平生第三次接到逮捕证了。八月二十八日，四川派出的四名公安人员，抵达北京。翌日，李天德被用囚车送到北京站，押上火车。他双手戴着手铐，铁链把手铐紧紧锁在车厢的茶几上，两边坐着佩枪的公安人员。就这样，他"免费"坐上南下的火车，回到四川苗溪茶场……

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建议判处李犯天德死刑立即执行"，已明明白白写在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上。

但也有人指出：李天德终究是亲自进京直接向中央献万言书。除此之外，他未向任何人阐述他的政治见解。判处死刑未免过重。

判决书终于正式下达了。李天德以"反革命罪"，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刑期自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九日被捕算起，至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止。

如果不是发生在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李天德迄今还身陷囹圄……

宜人的春风与料峭的春寒

难忘的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这一天，雅安劳改大队接到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现押你队李天德，经我院改判无罪释放，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特送上判决书一份。……"

李天德像冲出囚笼的小鸟，奔向邮电局。

当他写好给姐姐的电报，递给营业员，顿时整个邮电局轰动起来：

"你就是李天德！"

"你从三元宫（监狱所在地）里出来啦！"

"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帮'，你连命都没有罗！"

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情的手，使李天德第一次感受到春天的温暖。

就这样，李天德终于重见天日。

根据李天德的专长，他被分配在雅安汽车配件厂技工学校担任教师，教机械制图和工程力学。这家工厂是劳改工厂，隶属公安部门。本来，李天德判刑后，就在这家工厂里劳改。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穿上了公安警服，成了公安干部。

一九七九年八月，他被任命为校务主任。

饱受三九寒彻骨的人，最知春日春风暖人心。

不料，即使在春回大地之时，也会有春寒料峭。

春寒料峭使李天德再度陷入困境。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七日，雅安地区公安处作出了错误的决定："李天德同志已不适合作公安劳改工作，应调出劳改单位，另行安排工作。"

调令下达了。李天德被调离公安部门，调往远离雅安的泥巴山脚下的泗坪。调令上特别注明，李天德今后"长期在泗坪"。

事出有因。李天德在出狱之后，依然还是那般刚正不阿。他看不惯不正之风，曾向上级反映。如同捅了马蜂窝，有人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于是，趁整顿公安队伍之际，便抓住他的"尾巴"，把他赶出公安部门。

所谓"尾巴"，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为李天德平反时，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还不能完全理解李天德在《献国策》中对"左"的尖锐批评，在平反结论中虽肯定了李天德的革命热情，但仍保留着"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曲解，是有政治错误"这样的"尾巴"。

逆风起，浪连浪。很快的，波及到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杨正全同志——李天德作为县人民代表候选人，是他提名的。

杨正全正气凛然，仗义直言："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李天德能够写出《献国策》，他的爱国热情是难能可贵的。我是依据国家法律为他平反。他平反后，不再是劳改犯，而是公民。宪法规定，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提名他为县人民代表候选人，是符合宪法规定的。在选举中，李天德的得票数大大超过其他候选人。他是通过公民选举当选为县人民代表的，这也完全符合法定手续。我作为人民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依法办事是我的天职。

杨正全在歪风邪气面前不低头，不弯腰，坚决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李天德向来嫉恶如仇，无所畏惧。然而，如今有了爱妻娇女，他不能不为她们考虑。李天德决定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他对妻子说："春华，如果我出了事，你一定要跟我离婚。把女儿交给我姐姐……"妻子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如同荷花一般高洁，如同竹子一般刚直，她坚强地说："你要是出了事，我就带上孩子进京告状！"

阳光下的小草

一九八三年三月，李天德在多次向雅安地区公安处和地委某领导反映情况而无济于事之后，寄出了写给中共中央组织部的信。

中组部领导同志十分重视这位历尽苦难的知识分子的呼吁，在信上作了重要批示。

四月，四川省委组织部接到批示，当即电告雅安地委有关部门，要求认真调查李天德和他的《南国策》情况，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下旬，雅安地区公安处才送上了一份"调查报告"。这份"调查报告"列举了李天德"政治思想上有自由化倾向"等七个问题，坚持要把李天德清除出公安队伍，还指责了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错误"地推荐李天德为人民代表候选人。

就在这时，公安部门的雅安汽车配件厂党总支对李天德作出了最后决定："停止工作，停发工资，限期离厂。"

李天德终于被驱出公安部门，于一九八四年元旦调往雅安矿山机器厂，做一名普通的技术员。

实在忍无可忍，李天德于一九八四年三月，写信给胡耀邦、王兆国同志，倾诉了内心对

"左"的愤懑……

在李天德发信后的第八天，就清晰地听到来自党中央的亲切回音!

四川省委组织部长冯振伍同志调阅了《献国策》，不由得拍案叫绝，连声道："好，好，真是个难得的人才!"

雷厉风行，省委组织部派出了工作组前往雅安，仔仔细细地调查了李天德一案。他们发现，那些网织李天德七条"罪状"的人，居然没有读过《献国策》，这位对党赤胆忠心的知识分子，竟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遭"左"的打击!

为了认真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一九八四年七月，冯振伍部长亲赴雅安。

七月二十五日，雅安地区公安处政治处写出了《关于对李天德同志问题进行复查的情况报告》。八月七日，雅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4）法刑申字第83号刑事裁定书，彻底纠正了给李天德留"政治尾巴"的错误，指出原裁定书中写有李天德"'对党的方针政策有曲解，是有政治错误'的结论不当，应予纠正，特此裁定"。

恶风险浪终于过去。党的阳光，照进李天德心中。他双喜临门；

一九八四年七月，被任命为雅安矿山机器厂副厂长；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他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下旬转正。

李天德貌不出众，言语朴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棵平平常常的小草。我跟他久久地促膝而谈。他说，一次又一次的蒙冤受屈已成为过去，他的目光注视着未来；宝贵的青春年华已在历史的误会中耗尽，他要抓紧有限的分分秒秒为党为国竭尽全力。

历史是公正的，最终承认了《献国策》的真正价值，存入了庄严的中国革命博物馆。然而，它的作者却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献国策》写得太肤浅了，太幼稚了……"

面对中国的未来，他正陷入新的更深刻的思索之中……

（原载《民主与法制》1986年第4期）